新太子黨

群體姿態 掌控實權

于石坪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內容簡介

如果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共“太子黨”的生長階段，那麼二十一世紀則是“太子黨”走向成熟階段。二十多年前，他們在父輩的刻意栽培下步入仕途，根正苗紅的優勢帶來不僅是機會和態勢，還有捷徑和擢升；二十多年後，他們依靠父輩的人脈資源，憑藉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段，進入中共權力高層。只是這一次他們不再是個體方式，而是以群體姿態全面接班。

中共十七大，可以說是新太子黨集體亮相的世紀慶典。在太子黨“龍頭大哥”“權謀大師”曾慶紅的運籌帷幄下，習近平平步青雲變成中共“王儲”；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五個席位中，“太子黨”一舉佔有七席。難怪有人驚呼：數風流人物，還看“新太子黨”！

但更風流的現實，卻是新“太子黨”們正全面掌控實權：

正忙著鞏固接班位置的“王儲”習近平，已是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幾乎指日可待。

在國務院四名副總理中，有“政績不佳”“不太勝任”的張德江，還有掌握金融大權的“京城名嘴”王岐山。在五名國務委員中，掌管港澳事務的“大美人”劉延東位居第一；還有被稱爲胡錦濤的“國家安全顧問”、中國外交事務掌門人戴秉國。

中共中央組織部門，有“鐵腕治吏”的組織部長李源潮把守；中國央行，則由上榜美國《時代》週刊的被稱爲“中國的格林斯潘”周小川操盤；負責對台事務的中台辦和國台辦，原外交部“帥哥”副部長王毅成新掌門人；而曾經掀起“環保風暴”的潘岳，仍在國家環保部“勵精圖治”。

在四個直轄市中，“太子黨”“封疆大吏”占了一半：有“打黑除惡”“四海揚名”的“西南王”薄熙來主政重慶，還有鎮守中國第一大都市的“俞氏後代”俞正聲統治上海灘··

本書共列入十二位新太子黨代表人物，他們不但掌控著當今的中國政壇，而且還將在中共十八大上登上權力頂峰。本書運用精心收集的資料，還原每一個新“太子黨”的真實形象，並對其最新動態和接班前景有關詳述的介紹、分析和點評。

《中國掌權者》系列(三十四)

新太子黨

于石坪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Xin Taizidang

by

Yu Shiping

Published in 2010 by Mirror Book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978-962-8744-24-4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Yi Hua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TEL: (516)338-6976

Web: http: //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目錄

因為，我們和世界一道，一直都在用非常審慎的目光打量著中國的未來領導人。

曾慶紅

從前台走到幕後的“大哥”

曾慶紅的父親曾山，是中共早期高幹，曾任內務部部長，中央財經委副主任兼商業部長等要職。母親鄧六金，是參加過長征的27位女紅軍戰士之一，曾負責籌辦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保育院並擔任院長，後來她所照顧的上百名高幹子弟都叫她“鄧媽媽”。

1984年，從石油部外事局調到上海組織部，是曾慶紅的仕途轉捩點。此後20多年中，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副局長幹部到如日中天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中國政壇創下最神奇最詭秘的傳奇。

他是“太子黨”，也是“上海幫”，更被稱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核心智囊，同時又大力輔佐了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他還十七大上“以退為進”讓同是“太子黨”出身的習近平成為“王儲”。

有人稱他“三代帝師”，也有人叫他“權術大師”。他在中南海的權力圈中縱橫捭闔，在江湖的幕後運籌帷幄;他的狡詐和智謀，他的手段和謀略，既讓人佩服，又令人生畏;他毀譽參半，他也樹敵無數。

歷史在許多時候都會記得台前第一主角，而幕後軍師能丹青留名的為數不多，但至今仍在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曾慶紅或許除外，他的影響力和他在“太子黨”中“大哥”地位，都已給中國未來政治和中共未來政治格局，打下撲朔迷離的曾氏烙印。

偕夫人“低調”返鄉，數萬人十里相送

2009 年 10 月 24 日一大早，平時冷冷清清的江西省吉安縣縣城，一下子熱鬧起來，人們開始從四面八方聚焦在主要大街兩側，等待著某個“重要時刻”的到來。

當天並不是什麼重要節日，也沒有舉行什麼重要活動，衹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星期六，但對吉安縣的官員和老百姓來說，卻是一個“相當大的日子”——偕夫人返鄉的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即將離開吉安。



10 月 22 日上午，曾慶紅攜夫人來到吉安縣永和鎮錦源村考察

人群越聚越多，還有人打出了紅色横幅。不少人開始不停地向吉安賓館方向眺望……

據吉安網友描述：9 點鐘，在一陣熱烈的鞭炮聲中，中央警衛局車隊從吉安賓館魚貫而出，數里長街擠滿了夾道歡送的吉安百姓，在奧迪 A8 的導引下，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偕夫人坐在隨後的中巴車上，打開車窗，向群眾揮手致意！感受家鄉百姓濃濃的熱愛之情。

據網友披露：此次夾道歡送雖帶有些許官方色彩，組織了各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幹部及學生，包括自發形成的群眾隊伍大約有數萬人之眾，從吉安賓館一直排至吉安北高速路口，綿延十里，場面壯觀，但從人們的言談中還是很樂意為他歡送。

從現場圖片看，當地政府為了維持“萬民歡送”的秩序，不但出動了大批警力，還有武警列隊出現在大街上。

“大家熱情高漲，從早 7 點左右，就陸續開始集結，翹首盼望曾慶紅的出現，作為一位為家鄉做出若干貢獻的中央領導，口碑載道，家鄉人民沒有忘記他！”網友“秦戈歌”寫道。

據網友說，此次曾慶紅返鄉是為了參加其父曾山 110 年誕辰。還有網友說，曾慶紅離開吉安後前往井岡山參觀。

網友“秦戈歌”在貼出圖片後留言說，“被後面的人一擠，結果把主角給錯過了，曾慶紅與夫人坐的車過來了，群眾熱情歡呼，揮手致意，車速太快，只拍到了一個後腦勺。他雖是七旬老人，但依然精神抖擻，紅光滿面，面帶微笑與家鄉百姓揮手。”

儘管吉安政府網對曾慶紅高調返鄉極為低調，卻網民們卻議論紛紛。在貼出有民眾打出了“日子好了，心情好了，歡迎常回家看看！”“歡迎常回家看看！”横幅的照片時，“秦戈歌”說，“確實道出吉安人民以及江西人民的心聲。”但在出現了“請首長放心，吉安的明天會更好！”横幅的照片時，這位網友評論說，“這好像是吉安官員的心聲，吉安人民更習慣直呼其名。”“宣傳部做這些條幅也花了點腦筋”……

“我想曾慶紅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幕，雖退居二線，但此番輕車簡從，感受到家鄉人民的熱情，一定心生感慨 人民沒有忘記他！”網友議論說。

一名井岡山大學學生留言說："呵呵，我是井岡山大學的，今天早上井大大一的 5000 餘名學生到市區去歡送曾慶紅！作為井大的學生，我們感受的到曾主席對家鄉的好！沒有曾主席，就沒有井大的今天！"

還有網友說："估計曾應該在井岡山機場乘坐軍用專機返京，好幾天前就聽說他來了，家鄉吉安縣政府就派人將其回家路上兩側雜草清除。""看來吉安的領導諳熟為官之道，曾哥肯定非常受用。"更有網友直言道："為官之道，就是拍馬屁者之道。"

從下面家鄉網友的評論中，不難看出家鄉人對曾慶紅"低調"返鄉的複雜感想：

"從家鄉觀念而講，他無疑在這方面還是比較到位的，有些投資項目傳聞他起了莫大作用，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雖然並不值得提倡，但老百姓腦髓裏的那點知恩圖報的本能還是無法輕易拋棄，這也是其在家鄉受到推崇的原因。"

"其實這也是地方幹部鼓搗的，曾也不是高調之人，不過現在不在位了，送送也沒什麼。當天是有記者拍攝，晚上看本地新聞卻無此報道，我想衹能是當作歷史資料保存了。"



送行的場面

"既然他回來可以交通管制，那比他官小一個級別的 A 回來可不可以也來個交通管制？既然 A 回來可以管制，那比 A 官小一個級別的 B 回來可不可以交通管制？在吉安這片『熱土』，經常可以看到警車開道呼嘯而過的車隊，和古代官員出巡的『回避』挺像的。"

"不過，不可否認曾是具備政治天賦的，很大程度也源於其紅色血統搭建的人脈，另方面其政治手腕也的確過人。"

……

儘管吉安縣政府網對曾慶紅返鄉隻字未提，但在其第一欄目"吉安概況"中卻提到了他的父親曾山：

吉安縣地處江西省中部，古稱廬陵，秦（前 221 年）始置縣，1914 年改為吉安縣。現轄 11 鎮 8 鄉，總面積 2117 平方公里，人口 46 萬。

廬陵自古多俊傑，文章風物照江天。吉安縣湧現了民族英雄文天祥、愛國志士胡銓、三朝重臣周必大、著名詩人劉辰翁等一批彪炳史冊的仁人志士；演繹出"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壯闊史詩，誕生了余秋里、蕭望東等 46 位共和國開國將軍，以曾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功載史冊，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父親曾山，母親鄧六金，都是中共元老

曾山（1899—1972），原名曾如柏，又名修生、憲樸、曾珊、唐古。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鎮錦源村人。據《吉安縣誌》中的《曾山略傳》介紹，曾山小時隨父親曾采芹讀過上年私塾，後做過學徒，種過田賣過肉。

1925 年秋，在哥哥曾延生（中共黨員）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

團體"覺群社"，投身革命。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2月當選吉安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參與組織全縣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隨起義軍南征到廣東。同年冬入教導團當上士、事務長，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春回家鄉，任中共支部書記、吉安西區區委書記，組織發動農民參加贛南武裝起義。同年冬任中共吉水縣委書記。1929年1月任中共贛西特委組織部部長。3月會見毛澤東、朱德，此後隨紅四軍開展地方工作。6月被選為贛西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0年2月被選為中共紅四、五、六軍共同前委常務委員。3月被選為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務委員，同時被選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主席。6月兼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並任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被選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並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務委員。參與領導贛西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領導江西蘇維埃政權建設，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為蘇區中央局委員。同年11月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動員組織贛南革命根據地群眾，支援主力紅軍取得第一至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2年11月受到"左"傾領導者不公正的批判，改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部長。1934年2月再次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擔任中央政府內務部部長。1934年9月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江西軍區政治委員。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率江西省黨政軍機關堅持原地鬥爭，1935年指揮機關人員和少數部隊分散進行游擊活動。5月游擊隊失敗後潛往上海，找到黨組織，後被派赴蘇聯。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



新四軍軍長葉挺（中）、副軍長項英（右二）、參謀長張雲逸（右四）和曾山（右一）、傅秋濤（右五）在八路軍辦事處留影。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冬回國，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併兼新四軍駐江西辦事處主任。協助項英組建新四軍開展江西地區的抗日民主運動。1939年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任中共中央東南局組織部部長。1941年2月皖南事變後，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組織部部長，參與領導鞏固和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堅持華中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組織部部長兼財經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華東財經辦事處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并兼上海市副市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華東地區財政經濟工作，動員大批人力物資支援前線，恢復國民經濟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紡織工業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商業部部長、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內務部部長等職。被選為中共第八、九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72年4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鄧六金（1911—2003），1911 年 9 月出生，福建省上杭縣舊縣鄉新坊村人。1929 年加入少年先鋒隊，參加本地農民運動。1931 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 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1934 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央主力紅軍中參加過長征的 27 位女紅軍戰士之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9 年參加革命活動，先後任中共福建省上杭縣舊縣區委青年幹事、縣委婦女部長，福建省蘇維埃婦女部巡視員、婦女部部長、中共慶陽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34 年被組織派到瑞金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同年 9 月隨中央主力紅軍參加長征。1936 年 1 月到延安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婦女部部長，1937 年 5 月任中共中央婦女部巡視員。

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皖南、皖中、蘇北、山東等地工作，擔任過東南局婦女部巡視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婦女部幹事。1948 年 4 月，受命在山東青州大官營村的一個教堂裏，負責籌辦保育院。這個保育院收養和照顧了 100 多名戰友和烈士的後代，包括陳毅、粟裕、譚震林等將帥的子女。這些小童大的六歲，小的才兩歲，1949 年，保育院又遷至上海，更名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保育院，保育院的孩子增到 300 多人。

1953 年 2 月起，鄧六金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人事處副處長（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人事處副處長），中央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人事處副處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監察組副組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顧問等職務。

1982 年 12 月離職休養。是全國婦女聯合會第四屆執行委員、中國兒童和少年基金會理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2003 年 7 月 16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2 歲，比曾山晚逝世 31 年。著有回憶錄《我與曾山》。

三歲目睹奶奶挨打，文革父親挨整

曾慶紅，是曾山、鄧六金夫婦的長子。1939 年 8 月 29 日（即農曆七月十五日）出生在皖南根據地。據鄧六金說，她是在那天工作時感覺到自己可能要生產了，來不及回自己的住處，於是就在她的丁家山辦公地附近借了老百姓的一間房子待產。在李堅真等幾個女戰友幫助下，臨時找了當地一個有經驗的老大娘接生。因為孩子生在丁家山，鄧六金就將其起小名叫丁兒。

曾慶紅滿月後，鄧六金才帶著他回到自己的住處。曾山中年得子，非常高興。生下丁兒不久，皖南根據地就很緊張。曾山要鄧六金將孩子送回江西老家，讓曾山的母親養育。於是，1940 年初，曾慶紅四個月時，鄧六金就將他送回曾山的老家江西吉安。在那裏，曾慶紅和他的奶奶、兩位嬸嬸、大媽（注：曾山參加革命前，曾在老家結婚，並與前妻生有兩個女兒）、兩位同父異母姐姐共同生活。當時的曾家是一個寡婦匯集的大家庭，曾山的父親曾采芹、大哥曾延生、弟弟曾炳生都已被國民黨殺死，家中只剩下曾山的母親、大嫂、前妻、弟媳等四個寡婦和自己的兩個女兒度日。

曾家一家幾口慘遭殺害，據說，當時毛澤東還專門前往曾家慰問，稱讚曾家"滿門英烈"。

年幼的曾慶紅就是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的。據官方媒體報道，1941 年 1 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軍隊到吉安把曾山的母親

抓去毒打拷問，並縱火燒掉了曾家的房子。

當時曾慶紅衹有三歲，他意識到情況不妙，偷偷地獨自跑到野外一個大樹洞裏藏了兩個晚上。遠遠看見奶奶慘遭毒打，曾慶紅卻不能哭出聲來。幾十年後，鄧六金憶及往事，老淚縱橫地說："那時，這個孩子在鄉下喫了不少苦。然而，這段經歷也決定了曾慶紅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

1941年春末夏初，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淮出生。不久，鄧六金籌備組建了華東幼兒園，曾慶紅終於回到父母親身邊。

建國以後，曾山任內務部部長，一家舉遷北京。像大多數高幹子弟一樣，曾慶紅也在北京101中學學習，這是一所專門為北京的高幹子弟而設的學校，曾慶紅從這所中學裏結識了今日已飛黃騰達的很多高幹子弟，這為他日後的發展，打下了很堅實的政治基礎。1958年中學畢業後，他沒有像一些高幹子弟那樣幸運考入清華、北大，而是進入了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學習。大學二年級時，曾慶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在當時的大學生中並不多見。大學畢業後，先被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743部隊當了兩年技術員。1965年起，調任第七機械工業部二院二部六室任技術員。

鄧六金在《我與曾山》一書中披露了曾家的"文革"遭遇。"文革"中，內務部一共402人，就有七個造反組織。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在曾家家裏和住的胡同裏貼滿了大字報，到處寫著"打倒走資派曾山"的標語。1967年1月，各種造反組織都搞串聯。內務部機關總共才400多人，一下住進了10000多名全國各地來北京搞串聯的紅衛兵、造反派，把內務部除了檔案室、機要室外的所有辦公室、會議室都住滿了，機關工作陷於癱瘓。為了扭轉工作癱瘓的局面，周恩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打回老家就地鬧革命"。曾山立即貫徹周總理的指示精神，盡全力抵制

"左"的錯誤造成的混亂。他不顧機關造反派已經提出"打倒曾山"的複雜局面，立即在機關召開了萬人大會，傳達落實周總理的指示。會議剛一結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虧有王青爭、韓英等掩護著，曾山才從後門脫離開了會場造反派的圍追糾纏。



曾山和鄧六金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騙辦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輪番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強迫他低頭、彎腰、搞"噴氣式"。批鬥會散後，曾山一個人靠在金水橋的欄杆邊，花白的頭髮散亂不堪，手捂著腰，臉色發黃，流著虛汗，疼痛難忍。當時曾山已經68歲了，家里人看見他這個樣子，難過極了。

1969年，在作黨的"九大"籌備工作時，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對內務部軍代表萬海峰說："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蘇聯也是黨安排的。曾山是個老同志、好同志，應該把他選出來參加黨的九大。"經過軍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當選為"九大"代表。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來的電報，說母親去世了！要曾山和家人趕快回家，為母親送終。曾山放聲痛哭。後來才知道，是內務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裏，說要挖曾山的黑材料。他們恐嚇老太太，說曾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了，被關起來了。老太太一聽，就暈過去了。臨去世前，老太太還費力地抬

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記她兒子，想見見曾山。

曾山接到電報後，立即向組織請假，可造反派竟然不同意他回家。隨後，曾山和鄧六金找孩子們商量，讓孩子們回去，結果他們單位也請不了假。最後衹能給家裏拍了電報，寄了錢，請大嫂和鄉親們代曾山和全家安葬老人。因為不能回家為母親送終，曾山難受了很長時間。

1969 年 10 月，中央決定一些老領導幹部戰備疏散到各地。曾山和葉劍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長沙。由於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瘡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因病得厲害，曾家不得不寫信告訴周恩來，周隨後安排曾山立即乘火車趕回北京，下火車後就馬上送到醫院。最後，還是周恩來出面，醫院才馬上給曾山做手術，病情才得到控制。

同父母的遭遇一樣，曾家長子曾慶紅在 1969 年至 1970 年被先後下放到廣州部隊赤坎基地、湖南西湖生產基地勞動。下放結束後，於 1970 年重回七機部二院原單位任技術員。

1972 年 4 月 16 日晚，蕭克來看望曾山。兩人十多年不見，見面很高興，越談越激動，談林彪、AB 團、富田事變、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個多小時後，門開了，曾山靠在門口，臉色蒼白。他捂著心口對鄧六金說這裏不舒服。

蕭克見曾山身體不好，安慰幾句，就站起來告辭了。曾山躺在床上，胸悶，臉憋得通紅。不久，醫生來了，背了一個大箱子，但是連最簡單的急救藥都沒有，氧氣也沒有。後來又來了一個醫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說在家裏不行，趕快送到醫院吧。就叫了一個救護車，把曾山送到醫院搶救。

幾個小時後，曾家的孩子們流著淚，過來扶著鄧六金去看曾山。她摸摸他的頭、手，涼涼的，臉色慘白，已經不行了。她一下暈了過去。第二天，蕭克還打電話來，問曾山好了嗎。蕭克聽說曾山已經不在人世了，驚訝得好長時間說不出話來。

4 月 20 日，曾山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毛澤東獻了花圈。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郭沫若、傅作義、王震、華國鋒、李富春、張雲逸、張鼎丞、余秋里、粟裕、蔡暢、方毅、萬里、蕭克、康克清、王定國、姬鵬飛、廖承志、萬海峰、李步新等都參加了追悼會。

汪東興主持追悼會，葉劍英致悼詞，稱曾山是優秀黨員，忠於黨，忠於人民，艱苦樸素，聯繫群眾，為黨、國家和人民貢獻了一生。

在父親曾山去世一年後，也就是 1973 年，曾慶紅從七機部調出，到北京市國防工業辦公室工作，任北京市工辦生產處、科技處技術員。

利用父母政治資源走上仕途"快車道"

曾慶紅走向仕途的第一步，完全得益於中共元老余秋里的幫助。

余秋里，1914 年生，江西吉安人。1929 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 年正式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長征時任中共元老任弼時的警衛員。抗日戰爭時期，任賀龍指揮的 120 師三支隊政治委員、三五八旅第八團政委。1946 年，任晉綏野戰軍第七縱隊旅政委。1947 年，任晉綏野戰軍第七縱隊師政委。1948 年，昇任晉綏野戰軍第七縱隊副政委。1949 年 3 月，任第七軍副政委。1949 年 10 月，任青海軍區第二副政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大學副政委、第二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委，西南軍區後勤部部長兼政委。1955 年，獲授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1956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總財務部部長。1957 年 11 月，昇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1958 年，任石油部部長，先後指揮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開發。"文革"中因為抓石油，未受衝擊。1974 年，昇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國家計委、石油部工作。1977 年，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1982 年 7 月，重新回部隊工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常委、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1987 年初，在軍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態度最積極。1987 年中共十三大前，是中共元老中第一個向中央寫信，表示願意響應鄧小平的倡議，在中共十三大不再擔任黨內外一切職務，轉入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意願。1987 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99 年 2 月逝世。

余秋里和曾山同為吉安老鄉，是革命幾十年的老戰友。1979 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余秋里，在鄧六金的請求下，將曾慶紅從北京市國防工辦生產處的一名普通技術員調到國家計委，擔任自己的秘書。1980 年 9 月起，在余秋里的關照下，曾慶紅獲得晉陞，曾慶紅雖仍是余秋里的秘書，但他的正式職務則是國家能源委員會辦公廳副處長、石油部外事局聯絡部處長。

1982 年 7 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要求余秋里重回軍隊，余秋里又重新穿上軍裝，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常委、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曾慶紅也穿上軍裝，跟隨余秋里到總政治部。

宗海仁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第四代》一書中介紹說，當時，改革開放的步伐已經在農村如火如荼地鋪開，中國城市改革的號角也開始悄悄吹起"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



余秋里

幹部正在全國各地大規模地被提拔，曾慶紅意識到，離開部隊留在石油部工作將更有利於他的發展。為此，他向余秋里作了說明，表明自己不願到軍隊，而願意留在石油部工作的願望。余秋里沒有阻攔他，反而對他的意願表示理解。於是，曾慶紅跟隨余秋里到總政治部，協助辦理工作交接手續，待工作交接妥當後，曾慶紅又重回石油部。儘管余秋里離開了石油部，但作為 1958 年石油部成立時的第一任石油部部長，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大慶、大港、勝利三大油田開發建設的總指揮，余秋里在石油部的影響力仍然巨大。余秋里對留在石油部的曾慶紅仍然關懷備至，於是，1983 年，曾慶紅先後昇任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長，中共南黃海石油公司黨委書記。短短四年時間，曾慶紅從一名普普通通的辦事員昇任為司局級幹部，這對於普通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沒有余秋里的作用，曾慶紅很難打下這一深厚的政治根基。

美國漢密爾頓學院的李成教授在撰寫《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過程中，專門接觸了不少熟悉曾慶紅的人。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曾慶紅是一個城府很深、比較有遠見的政治家，有很多

與眾不同的地方，他個人職位的移動就顯示了他的與眾不同和遠見。

李成說："他一開始在石油工業做，在余秋里負責的時候，在石油工業做外事局的副局長。我們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很多高幹子弟都是在從商，石油工業我們知道是一個非常賺錢的地方，但是他不久就把這個工作辭掉了。當余秋里轉到軍隊作軍隊總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曾慶紅有很大的機會跟他一起去，這對他來說，也會有很大、很快的發展。但是他沒有走這條路，為什麼呢，因為他已經看到，未來10年到20年，軍隊在中國政治中的作用可能會減弱，而且他軍隊的背景對他以後的陞遷可能是不利的。"

專家研究中國高層政治的分析人士高新說，曾慶紅在部隊裏是研究導彈的。他曾經立志要發展中國的導彈事業，但是由於科技工作在文革中都被荒疏，他才改行搞政治。從業務上來說，他有很強的工作能力。不過高新說，曾慶紅首先是一個對共產黨具有深刻感情的人。

高新說："曾慶紅這個人對共產黨的感情，對這個政權的感情是與生俱來的，是融化在他自己的血液裏的。1949年共產黨的華東部份的野戰軍在從戰場到濟南，然後從濟南進入上海，那個時候的曾慶紅是剛剛被他的父親派警衛員從江西老家接到自己身邊，然後他就跟著自己的弟妹一起，由鄧六金組織，用毛驢馱著，坐在毛驢筐裏，然後晝夜行軍到了濟南，到了濟南才坐上火車，才進了上海。曾慶紅從 10 歲就親身體會到共產黨政權讓他翻身得解放的這種滋味。"

司局級，這是一個官員晉陞到省部級高級官員的最必要的條件。有了這一台階，再加上利用有效的政治資源，當然還有自己的才能，就有可能登上中國最高的權力舞台。曾慶紅深諳這一點。在具備了司局級這一基本條件後，他再一次及時調整自己的目標，這

一次他將目光投向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他渴望在上海幹出一番事業來，這一次，他又一次利用了其父遺留下的政治資源。

曾慶紅是幸運的。他之所以能如願到上海，主要是利用了其父曾山的政治資源。那時，領導上海的正是曾山的兩個老部下：陳國棟、汪道涵。據瞭解，曾山在華東根據地主要從事財經方面的領導工作，並於1945年受命組建成立華中銀行，以後曾山又將華中銀行發展到華東、上海，在工作中，曾山很重視選擇培養使用年輕的知識分子幹部，方毅、李人俊、陳國棟、汪道涵、孫冶方、徐雪寒等都在曾山的直接領導下在華東根據地從事財經工作，這些人都獲得曾山的栽培。憑著這樣一層關係，1984年，曾慶紅通過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上海市市長汪道涵調到了上海，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時年45歲。

曾是最受歡迎的上海市委領導人

1985年初，在陳國棟、汪道涵的關心、支持下，曾慶紅用不到半年時間昇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比他小四個月的趙啟正作為他的助手。同年6月，即在芮杏文、江澤民分別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組成新一屆中共上海市委領導班子時，曾慶紅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組織部部長。

隨後，曾慶紅對上海的組織人事系統進行前所未有的大膽改革，大面積地在上海推行幹部年輕化，為中共組織系統這一最保守的領域開創了改革開放的風氣，成為當時全國組織系統和省部級幹部中思想最解放的官員。

曾慶紅改革中最炫目的就是創辦了全國第一家組織系統報紙《組織人事信息報》（現改名為《組織人事報》）。這是當時全國組織

系統獨一無二的報紙，雖為內部發行，但它大膽倡導改革，大聲呼吁政治改革，給死氣沉沉的全國組織系統注入了一縷清新的空氣。在曾慶紅的鼓勵、支持下，該報年輕的主編主動與中南海有關人士保持經常性的工作聯繫，使該報得以保持最新鮮的消息來源。不可避免的，該報曾因發表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內部講話摘要和一些呼吁激進政治改革的文章，多次遭受來自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壓力，一次又一次，都是在曾慶紅甚至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的保護下才得以化險為夷。可以說，曾慶紅在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的大膽改革，為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在上海市委幹部民意測驗中，市委書記芮杏文、組織部長曾慶紅成為最受歡迎的市委領導人。

芮杏文與曾慶紅都先後在七機部、國家計委工作過，儘管不是同一時間，儘管一個是權勢顯赫的副部長，一個是默默無聞的辦事員。但類同的工作經歷，使他們的心理距離拉得很近。一開始兩人就有一種相互信任感。曾慶紅在市委組織部大刀闊斧的改革，很有成效，進一步得到了芮杏文的賞識。曾慶紅昇任市委常委不久，芮杏文即將他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芮杏文調曾慶紅到市委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更直接地更多地聽取曾慶紅的各方面意見，對上海市委進行更加大膽和全面的改革。

曾慶紅在調離市委組織部時，向芮杏文推薦他的得力助手趙啟正接替他的職務。在市委協助芮杏文工作的日子裏，曾慶紅與芮杏文配合得非常默契，芮杏文和曾慶紅互相信任，雙方都感覺到非常愉快 當時一位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說 “慶紅是杏文最重要的助手、參謀”。正是因為得到芮杏文的鼎力支持，曾慶紅又大刀闊斧地在市委辦公廳、市委研究室等部門進行改革，為沉悶的市委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風。1986 年，在芮杏文的提議下，曾慶紅昇任中共

上海市委副書記，分管新聞輿論宣傳文化教育系統。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是：江澤民、吳邦國、黃菊、曾慶紅。



芮杏文於 1985 年

曾慶紅於 1984 年從北京到上海，江澤民於 1985 年從北京到上海，前後相差不到一年時間。但是，從 1985 年到 1987 年整整兩年時間裏，曾慶紅主要協助芮杏文抓常務工作，在康平路辦公；江澤民抓市政府工作，在南京東路外灘的市政府大樓上班。江澤民、曾慶紅除了參加市委常委會議有一些交流，很少有工作上的接觸。如果說，曾慶紅去上海是由於陳國棟、汪道涵的關係，那麼，曾慶紅從市委組織部長昇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 則主要是芮杏文的作用。

江澤民、曾慶紅真正的工作接觸開始於 1987 年末。為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對全國各省市區的領導班子作了重新配置。1987 年 11 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芮杏文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接替北上的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外來人”芮杏文終因敵不過“上海人”江澤民而離開上海。

像芮杏文一樣，江澤民也看中了曾慶紅高超的政治手腕、活躍

的思維、豪放的性格、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以及在上海青年幹部中的巨大凝聚力。由此，江澤民與曾慶紅在工作中建立了互信，增強了友誼，為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話說回來，如果江澤民繼續主政上海，他就不可能重用曾慶紅。江澤民任市委書記後，朱鎔基接替江澤民任上海市長，餘下的三位市委副書記吳邦國、黃菊、曾慶紅的工作一直沿襲芮杏文時期的分工，未作任何變動。在吳邦國、黃菊、曾慶紅三人中，最投江澤民所好的是黃菊，黃菊此人特別善於拍馬，善於察言觀色，1986 年黃菊當選副市長後，完全按江澤民的意旨行事，在芮杏文與江澤民產生矛盾時，唯有黃菊態度最鮮明地站在江澤民一邊。相比之下，吳邦國就不這樣，他善於抓大事幹實事，為人誠實，從不在芮杏文與江澤民中搬弄是非，其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特別善於與普通老百姓交往，芮杏文、朱鎔基都比較喜歡他而不喜歡黃菊，與江澤民的關係決非像黃菊一般熱絡。

而曾慶紅，他既不能像黃菊、吳邦國那樣講一口地道的上海話，也不會像黃菊那樣巴結江澤民。儘管曾慶紅是陳國棟、汪道涵調入的，但他與芮杏文的關係也很親近，這決定了江澤民不可能將曾視為自己的頭號親信，更何況，在當時的市委副書記中，曾慶紅排名最後。

六四事件後曾慶紅江澤民的政治蜜月

江澤民、曾慶紅真正的蜜月開始於 1989 年六四事件後。當江澤民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江除了誠惶誠恐，更多的是一種前途莫測的感覺，不僅他的夫人王冶坪為他的北上流淚，他自己也似乎預感到重蹈前兩任總書記覆轍的風險。因此，當江澤民赴任之時，

他向楊尚昆、李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帶曾慶紅進北京，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李鵬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什麼江澤民不敢隻身一人進京？為什麼江澤民偏偏要曾慶紅與他共行？為什麼江澤民不帶更獲他信任的黃菊進京？宗海仁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趙紫陽前兩任總書記的下場令江澤民膽怯，他設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況他一點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況。相比胡趙，江在黨內的資歷更淺。稍有出錯，可能導致比胡趙更為悲慘的結局。

二、從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國家大權仍然由這些老人掌握。更何況楊尚昆、薄一波仍然參與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務的決策，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江澤民深感要處理好、協調好這些老人的關係非常不容易。

三、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可謂無功受祿。主導六四事件決策的"頭號功臣"李鵬沒有獲得晉陞，內心積怨在所難免。如何處理好與氣勢逼人、內心不服的李鵬的關係，令江澤民的確無所適從。還有，喬石、姚依林這兩位政治局常委資格老，權力根基深，人脈資源廣泛，同樣難以對付。

這就迫使江澤民儘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夠利用的一切資源，來應對難題，處理危機。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兩生疏，沒有人能協商，更沒有人能幫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導致政治上的翻船。如果帶黃菊，充其量能為江澤民分擔一些日常事務，但黃菊從基層上來，長期在上海工作，對中南海的情況比江澤民更不瞭解，不可能指望他出謀劃策。因此，當江澤民獲悉自己被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曾慶紅。曾慶紅從來以完全平等的姿態與江交談，並且敢於當面糾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這使江對曾刮目相

看。江深諳曾慶紅政治手腕高超，同時還想倚重曾慶紅家屬的政治資源和曾慶紅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廣泛的人脈關係。

《第四代》披露說，曾慶紅的政治手腕得益於他父親的薰陶。曾山任內政部長時，曾專門花時間苦讀大量的明朝、清朝檔案，從中體味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並不喜歡讀書的曾慶紅對明清的宮廷秘諱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閱讀了大量的明清檔案，據說曾慶紅最感興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權力鬥爭中保護自己、打擊異己，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把握時局，化解矛盾，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在鞏固權力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所有這些，都在曾慶紅後來的政治實踐中應用了。事實證明，曾慶紅與江澤民的合作真可謂天作之合。沒有曾慶紅，江澤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穩定的統治期。

曾慶紅協助江澤民做了最重要的六件事。前三件為江澤民保權位，求穩定。後三件為江澤民樹權威，也為自己撈取最實用的政治資本。



鄧小平與江澤民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反戈一擊，整肅楊家將，使江澤民渡過了執政以來的滅頂之災。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保守勢力空前強大，鄧小平在黨內的影響力比六四前大大降低。政治上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經濟上進行“治理整頓”，當時中國的處境，一方面，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一方面，是整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

的徹底崩潰。更重要的是，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和平演變”為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已經停滯甚至倒退。鄧小平多次告誡江澤民、李鵬“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不但這一屆領導人要堅持，下一屆、再下一屆都要堅持，一直堅持下去。因為十年來的實踐證明，這一套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放棄改革開放，就等於放棄我們的根本發展戰略。”

然而，鄧的這些意見並未為江澤民、李鵬所接受，鄧的改革開放不能變的政策失靈了，鄧在北京說話失靈了。無奈之際，1991 年 1 月，鄧小平到上海發表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搞市場經濟的談話，這個談話仍然沒有被江澤民、李鵬所領會並接受，衹有喬石、田紀雲在中央黨校發表了旗幟鮮明的呼應，朱鎔基在上海組織專門班子以“皇甫平”名義對鄧小平談話發表了“七評”，然而掀起的則是一場始料未及的軒然大波，鄧的說話仍未獲得江澤民、李鵬的積極回應，這令鄧小平十分寒心。

1991 年底至 1992 年初，鄧小平決定以 88 歲高齡再次南下，以老邁之軀推動停止轉動的改革開放車輪。他先後到達湖北、江西、廣東、福建，公開發出了“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警示，對江澤民、李鵬發出了最後通牒。鄧小平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準備在中共十四大更換中共中央領導層，撤換江澤民、李鵬，讓堅決執行改革開放路線的人擔綱。鄧小平認為，江澤民軟弱無力，思想保守，以反和平演變代替改革開放，態度曖昧；李鵬領導主持經濟工作，是外行領導內行，治理整頓只會扼殺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為此，鄧小平曾考慮由喬石、楊尚昆、萬里、薄一波牽頭，成立中共十四大籌備小組，對中央委員會人事作出重大變動。這是一個摒棄江澤民、李鵬以及當時分管組織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方案。這一方案包括：由喬石替代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在八屆

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由李瑞環或朱鎔基替代李鵬，擔任國務院總理；由萬里繼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楊尚昆卸任國家主席；徹底解散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

最發人深省的是，這個方案還包括重新啟用因六四事件下台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讓趙擔任全國政協主席。鄧曾就這個方案向楊尚昆、萬里徵求過意見，並要求楊尚昆在合適的時候捎話給趙紫陽，要求趙紫陽在出來工作前承認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錯誤，以防趙日後為六四翻案。為配合這一方案，1991 年中，在鄧小平支持下，楊尚昆、萬里、喬石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讓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重新出來工作，不久，胡啟立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芮杏文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閻明復任民政部副部長，這是鄧小平準備讓趙紫陽出來工作的先聲。同時，為了表示對喬石的支持，鄧小平對喬石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喬石在四川等地的講話予以高度肯定，並說，"好久沒有看到那麼好的文章了"。

在這次南行中，陪伴著鄧小平的是他的密友、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反應最快、態度最鮮明、最積極的則來自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的楊白冰，他在《解放軍報》公開喊出了"堅決響應小平同志號召，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口號。

鄧小平南行發出了準備在中共十四大更換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明確信號，引起了江澤民、李鵬的極度驚慌，更令執政兩年半來一直樹立不起權威的江澤民陷入沮喪之中。作為江澤民最親近的助手，曾慶紅非常明白眼前的處境，如果江澤民在十四大黯然下台，那也就意味著曾慶紅此生政治命運的終結。與其被動下台，不如起而反擊。除了曾慶紅多次與江澤民一起拜訪李鵬，讓李鵬更加清醒地認識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政治含義，更讓李鵬感到與江澤民精誠合作，

面對挑戰的極端重要性。在這個緊要關頭，曾慶紅讓江澤民放下身段，主動與李鵬合作，很好地協調了江澤民與李鵬的關係，起到了穩住陣腳的作用。面對可能下台的危險，江澤民、李鵬一連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了將近二十個文件，這些文件全部是關於學習鄧小平南方談話，大膽促進改革開放的。有明確要求，有具體措施。一時間，江澤民、李鵬對鄧小平要求改革的態度來了個 180 度的大轉彎，以此化解鄧小平對他們的不滿。

更重要的，則是曾慶紅對鄧小平施以離間計，主動將矛頭對準與鄧小平關係最親密的人，向他發動出奇不意的攻擊。這是迄今為止曾慶紅施展的最大膽、最凶險、最富政治智慧的政治手腕。曾慶紅清楚，在鄧小平正在醞釀的讓楊尚昆、萬里、喬石等人中，無論從資歷、實權還是與鄧小平的關係看，萬里、喬石都不可能與楊尚昆相比。如果挑戰萬里或喬石，即使把他們打垮了，仍然不能保證江澤民不會下台，這不僅打不著鄧的痛處，反而更激怒鄧小平，從而加速江澤民的下台。祇有離間楊尚昆與鄧小平，才能達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然而，楊尚昆是能被輕而易舉地挑戰的嗎？

用變幻難測的高深政治手腕"倒楊"

有關曾慶紅助江澤民搬倒"楊家將"這段歷史，宗海仁在《第四代》一書中披露了不少不被外界鮮知的內幕，尤其是曾慶紅在幾個太子黨中騰轉挪移，用變化難測的高深政治手腕，一手導演了這初政治大戲。

楊尚昆與鄧小平是四川同鄉，早在三十年代於中央蘇區工作時，兩人的關係就很緊密。中共建國後，楊尚昆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1956 年的中共"八大"，鄧小平出任中共總書記，楊

尚昆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兩人的關係愈加密切，開始成為相知相交的親密戰友。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與楊尚昆一起被打倒，鄧小平被流放江西，而楊尚昆則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被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比鄧小平遭遇更慘，自1966年7月起即被捕入獄，直到“四人幫”垮台後的1978年底，鄧小平復出重新掌握國家大權，楊尚昆才得以重見天日，前後離開政治舞台達十二年之久。

楊尚昆復出後，得到鄧小平充分信任。1979年2月，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廣東省副省長，與習仲勛一起主持廣東工作。1980年9月，從廣東調入北京，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1981年7月，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1982年9月，昇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1982年和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楊尚昆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繼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7年，經鄧小平批准，楊尚昆的堂弟楊白冰從北京軍區政委直接昇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鄧小平的竭力堅持下，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楊尚昆更以80歲高齡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六四事件後，楊白冰更上一層樓，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主管軍隊日常事務。可以說，鄧小平與楊尚昆的關係非比尋常。正是這種非比尋常的友誼，楊尚昆可以隨意出入鄧家，楊尚昆更成為鄧小平退出權力核心圈後，傳遞、溝通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信息的使者。中共中央政治局遇有重大事情向鄧小平請教，都是通過楊尚昆傳達的。因此，要離間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非有過人的膽魄和才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楊尚昆在軍隊中有著非常強大的勢力，他與廖漢生、蕭克、賀龍家屬有著天然的親屬關係，非一般人能夠抗衡。因此，要對抗楊、廖、蕭、賀四大家屬，除非獲得鄧小平的支持，不然，誰都不可能與之抗衡，更不必想從根本上削弱他們在軍中的勢力。

真是天助曾慶紅。就在曾慶紅實施離間楊鄧之計時，江澤民與曾慶紅把握住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楊白冰提出了一個晉陞100名將軍的龐大名單，這個名單包括：

時任副總參謀長的49歲的何其宗中將，

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52歲的周文元中將，

時任總後勤部副部長的51歲的宗順留少將，

時任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的48歲的賀鵬飛少將，

時任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的53歲的熊光楷少將。

這個方案需報經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批准。劉華清經楊白冰親自當面詢問，表示同意這個方案。楊尚昆同意這個方案，並批示請江澤民審閱批准。江澤民拿到這個材料時，一時顯得不知所措。他隨即找曾慶紅商量如何如置。曾慶紅建議他壓下，先置之不理。同時，他建議江澤民找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來一起商量。于永波是江澤民在軍中關係最親近的人。江澤民任職上海期間，于永波當時是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曾兩次與江澤民一起隨團出國訪問，與江澤民很談得來。在江澤民於1989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接替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後一個月，江澤民即調于永波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說，楊白冰提出的那個100人方案從未徵求過他的意見，他根本不知道。從這個方案看，這100人基本都是楊尚昆、楊白冰的親信。目的是完全剝奪江澤民的知情權，徹底架空江澤民。曾慶紅認為，這個方案的出台，說明楊白冰有恃無恐，不僅根本不把江澤民放在眼裏，更不把小平同志放在眼裏。楊白冰

就是想以楊家將人馬來徹底替換鄧小平在軍隊中的班底。於是，在江澤民實施拖延戰術之時，曾慶紅親自聯繫了他的兩個“太子黨”盟友、也是鄧樸方好友的俞正聲、劉京，這兩人都先後作為鄧樸方的得力助手，先後擔任過中國殘疾人理事會副理事長，俞正聲當時任青島市市長，劉京當時任昆明市市長。先由俞正聲、劉京向鄧樸方論及當時的局勢、論及楊家將的危險。隨後，曾慶紅親自出面，與鄧樸方深談。

在曾慶紅與鄧樸方會面之時，北京城關於楊家將不可一世的流言盛傳，“楊尚昆想取代鄧小平”、“楊尚昆、楊白冰試圖搞一場不流血的政變”、“鄧小平將不久於人世”、“楊尚昆想當軍委主席”等等，一切不利於楊尚昆、楊白冰的流言突然間鋪天蓋地地流傳開來。我們無法查證這些流言到底是被誰製造的，曾慶紅是否主導了這一流言事件。但隨著流言傳播面的越來越廣，楊尚昆、楊白冰的命運頃刻間黯淡下來。正是這個時候，曾慶紅與鄧樸方會面了。

據極其可靠的來源，曾慶紅與鄧樸方首先談了江澤民的處境，大意是：江澤民從來沒有對“老爺子”（鄧小平的尊稱）不忠，他衹是力不從心，因為楊尚昆實際上控制著黨政軍的實權，令江澤民沒法幹工作。特別是軍中事務，根本插不上手，完全聽命於楊，沒有最終拍板權。江澤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衹要全權予他，他一定能放開手腳幹得很出色。不管怎樣，江澤民是徹底忠於“老爺子”的。

在談了江澤民的處境後，曾慶紅特別向鄧樸方剖析了楊家將在軍隊中的勢力。

曾慶紅的論述主要圍繞二條：

一、楊尚昆、楊白冰的勢力在楊、廖、蕭、賀四大親屬關係的基礎上越來越膨脹，已經沒有一個家屬能與之抗衡。這次楊白冰推



鄧小平和楊尚昆

出100名將軍方案，名義上實行軍隊的新老交替，實際上就是以楊家將人馬來徹底替代“老爺子”的人馬，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演變成變相的楊家軍。有恃無恐。現在，楊尚昆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白冰是中央軍委秘書長，是軍委的第四號人物，這種現象於黨、於國家、於軍隊都是十分危險的。

二，楊尚昆有比較明顯的平反六四的意圖。如果“老爺子”考慮讓趙紫陽復出，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等於間接承認了自己的決策錯誤。六四以後，楊尚昆一直間接否認是自己下令清場開槍，同情趙的處境，這就等於把責任推給了“老爺子”，這也就給了楊尚昆與趙紫陽重新合作的機會。如果趙紫陽復出，楊尚昆與趙紫陽合作，一切局面都會顛倒過來，國家可能再度出現不穩定。堅決不能讓六四成為“老爺子”的一樁心事，讓“老爺子”不高興，“老爺子”健康長壽、頤養天年是人民的心願。六四的事，可由歷史來評說，匆忙不得。

在曾慶紅與鄧樸方會面不久，江澤民親自拜見了鄧小平。江澤民是帶著于永波去的，鄧小平則召來了他的愛將，時任中央軍委副

主席的劉華清。在這次會談中，先是于永波介紹了楊白冰所提 100 人方案的來龍去脈，說明了有關的背景情況；江澤民著重談了為什麼他壓下這個方案不辦的想法，並說他壓下這個方案後，楊尚昆曾問過他，為什麼還不批，他說要請示小平同志後再辦；劉華清則從旁邊證實江澤民在軍委大權旁落的狀況。鄧小平衹是聽取他們的情況反映，沒有發表自己的看法。

楊白冰所提 100 人名單事件悄然無聲地在中共高層內越傳越廣。一些本來就對楊尚昆、楊白冰看不慣者更是抓住機會反擊。李先念對比他大一歲而接替他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一直耿耿於懷，現在則對楊表示幸災樂禍，陳雲、彭真也認為楊尚昆、楊白冰的權力過大，不利於團結；出自第三野戰軍的張愛萍等堅決要求不搞“家天下”，張愛萍親自找江澤民談話，並向鄧小平、江澤民推薦了他的老部下、時任國防大學校長的張震協助江澤民的軍事工作。

在一陣緊似一陣的“倒楊”聲中，鄧小平不露聲色地放棄了與他共事幾十年的四川老鄉兼親密友人楊尚昆，與陳雲、李先念協商，成立了由江澤民、李鵬、宋平以及中共元老薄一波主導的中共十四大籌備小組，對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人事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清理。鄧小平與楊尚昆這對經常相見的朋友互不聯繫了，頻繁走動的兩家子女互不來往了。在 1992 年 10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楊尚昆、楊白冰徹底退出了軍界，代之以鄧小平的老部下劉華清、張愛萍的老部下張震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輔佐無從軍經驗的江澤民。

1993 年 3 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楊尚昆、萬里正式宣佈退休，趙紫陽也永遠失去了復出的希望。相反，江澤民則成為繼毛澤東、華國鋒之後，全面掌握黨政軍最高權力的第三位最高領導人，李鵬則再次連任國務院總理。

1992 年對鄧小平、楊尚昆、江澤民、李鵬來說，都是極富刺激性和戲劇性的。與其說這場戰鬥是江澤民、李鵬的勝利，不如說是曾慶紅的勝利。通過“倒楊”，江澤民領教了曾慶紅變幻難測的高深政治手腕，認識到唯曾慶紅能成其業，由此，江曾的關係已無人能夠取代。儘管曾慶紅在中共十四大仍被排斥於中央委員會之外，但是，江澤民不能否認，如果不是曾慶紅幫助他主動挑戰“楊家將”，他肯定會屈從楊白冰提交的這 100 人大名單。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肯定將會改寫。

打倒陳希同，最大地削弱李鵬的權勢

曾慶紅協助江澤民做的另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陳希同，最大地削弱李鵬的權勢，從而穩固江澤民的力量。

中共十四大“倒楊”事件後，江澤民名義上獲得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力，地位得到相對穩固，但他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掣肘，除了仍然得聽命於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儘管鄧小平公開表示再不過問政事，但江澤民仍然小心翼翼地主動向鄧、陳請示）外，軍的方面，他仍處於實習階段，仍然需要鄧小平指定的兩位副主席的輔佐；黨的方面，他仍然無法直接插手政法系統，與已經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喬石抗衡；政的方面，他更是無法主導李鵬的決策。其中，李鵬勢力對他的挑戰最嚴重，李鵬親信、在中共十四大晉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自恃與鄧小平、李鵬等的親密關係，對江澤民歷來采取陽奉陰違態度，使北京市成為江澤民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

1992 年春末夏初，陳希同事先未向中央報告，親自陪鄧小平到首都鋼鐵公司視察，並巡視北京市容，這是鄧小平繼南方講話後再

一次發表關於改革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第一次公開稱讚朱鎔基“懂經濟”，同時對周冠五領導的首鋼改革表示支持，對陳希同領導的北京市政建設進行讚揚。鄧小平視察首鋼後，陳希同才讓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報告中央，並於當天晚上整理出鄧的講話內容，以中共北京市委文件的名義呈報中央，同時在北京市委高級幹部中率先傳達。

這令江澤民和曾慶紅十分氣惱，當時曾慶紅就按奈不住心中的怒氣對其一位親信說，“這是陳希同對江澤民和中央的污辱。太不把中央放在眼裏。”在鄧小平視察首鋼中，沒有一個中央領導人陪同，中央辦公廳也沒有獲得任何信息，江澤民、曾慶紅更蒙在鼓裏，中央傳達鄧小平的首鋼講話完全來源於北京市。這說明陳希同與鄧小平的關係非同一般，也說明陳希同眼中根本沒有江澤民。陳希同如此囂張，如不對其進行打擊，必引致中央各部委、各省區市仿傚，導致各部委和地方坐大，江澤民大權的進一步旁落。為此，江澤民、曾慶紅蓄意找陳希同的“碴”，打擊陳希同，並以此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對曾慶紅來說，對付陳希同要比對付“楊家將”容易得多。自鄧小平赴首鋼視察以後，曾慶紅開始留意有關北京市特別是陳希同的信息，對陳希同、張百發、王寶森等人的腐敗行為也有所察覺，因此，凡有陳希同的講話、會見、考察等信息，曾慶紅都叫人專門搜集起來。功夫不負有心人。江澤民、曾慶紅終於找到了打擊陳希同的機會。

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部等同時收到關於鄧斌案的舉報。舉報信詳細羅列了江蘇省無錫市鄧斌非法集資達32億元一案的充分證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命劉麗英負責處理這個案子，並向江澤民作了通

報。由於鄧斌案直接涉及北京市，因此引起江澤民、曾慶紅的極度關注，曾慶紅更被授權隨時過問此案的進程。鄧斌案的背景之深的確觸目驚心，從鄧斌到最後挖出陳希同，一共有七層關係。

在鄧斌案挖掘到第三層，即揭露出周北方後，曾慶紅一直主導了幕後策劃。周北方是曾被鄧小平稱讚過的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周冠五的兒子。與鄧小平的小兒子鄧質方以兄弟相稱，鄧質方、周北方和香港首富李嘉誠合作在香港成立了“首長四方”公司，並在香港股票上市。抓不抓周北方？抓周北方會不會得罪鄧小平家族？怎麼區別周北方和鄧質方的關係？怎麼既抓周北方，又讓鄧小平家族放心？所有這些，早已不是中紀委和劉麗英能左右的了。所有這些難題，全部都由曾慶紅親自處理。據悉，曾慶紅多次找鄧樸方會面，並親自與鄧質方進行了面談。最後，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結果：周北方被正式逮捕並起訴了，鄧質方將自己擁有的“首長四方”股權以象徵性的一港元價格出售，鄧家人繼續平靜地生活。這種效果，衹有曾慶紅才能達到。

逮捕並正式起訴周北方，是鄧斌案的一個轉捩點。由此案情順勢而上，終於導致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自殺，再由王寶森自殺挖出了江澤民曾慶紅的死敵陳希同。在嚴懲陳希同的同時，為了讓鄧家徹底放心，曾慶紅同時又施展了對鄧家拉攏的政治手腕。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召開。在全會審議通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的同時，決定增補鄧小平的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兩件事情放在一起解決，再一次證明了曾慶紅的政治手腕非常人所能企及，也充分表明了江澤民曾慶紅尊敬鄧小平、嚴懲陳希同、削弱李鵬的策略的成功。

與此同時，曾慶紅建議江澤民穩妥地安插自己的親信進入北

京，不搞一步到位。這就有了讓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兼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將時任北京市市長李其炎貶職勞動部副部長，讓江澤民的心腹賈慶林從福建調任北京市市長，並最終接替尉健行的方案。這一策略起到了四方面的效果：尊敬鄧小平、嚴懲陳希同、削弱李鵬、將北京這一“獨立王國”改造成親江的“嫡系王國”。

更高明的是，在嚴懲陳希同的同時，為了加強並鞏固江澤民的權威，曾慶紅向江澤民建議，在堅持現行領導體制前提下，重申和建立以下五項制度：


曾慶紅和江澤民

（1）按照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的有關精神，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工作需要，選派部級幹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其任務是瞭解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廉政情況，直接報告中央紀委，中央紀委及時報告黨中央。

（2）黨的地方和部門的紀委（紀檢組）發現同級黨委（黨組）或它的成員有違反黨的紀律的情況，有權進行初步核實，並直接向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報告，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干預和阻撓。需要立案檢查的，按有關規定報批。

（3）黨的地方和部門的紀委（紀檢組）接到對下一級黨委（黨組）成員的檢舉和控告，必須報告上一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任何人無權扣壓。

（4）凡屬地方和部門主要領導幹部的提拔任用，黨的組織部門在提請黨委（黨組）討論決定前，應徵求同級紀委（紀檢組）的意見。

（5）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領導幹部的提名、任免、兼職、調動，各級組織人事部門必須事先徵得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同意。

曾慶紅的這項建議，經江澤民批准，於1996年1月24日至27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通過。

199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決定，開除陳希同黨籍。檢察機關已對其依法立案偵查。同年9月6日至9日，中共十四屆七中全會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希同問題的審查報告。1998年秋，陳希同被宣判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並被投入秦城監獄服刑。陳希同的另兩位親信：鐵英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黃紀誠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與鄧小平、彭真、萬里、李瑞環關係極好的張百發，未被追究刑事責任，不久退休。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曾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的張健民因揭發有功並主動退贓，江澤民曾慶紅對其手下留情，只令其在黨內作深刻檢查，未追究黨紀國法。

宗海仁指出，以腐化墮落進行指控，在人格上搞臭陳希同，而不涉及政治問題或意識形態之爭，這是江澤民曾慶紅在處理陳希同案時的極高明之處，意在說明江澤民曾慶紅並不是隨便可以欺侮的。幾乎所有的高官都明白，陳希同下台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腐敗，其實像陳希同這種情況在省部級以上官員中有的是，比如後來被執行槍決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就是一個例子，陳希同的厄運祇

是因為從未將江澤民曾慶紅放在眼裏，得罪了江曾的緣故。因此，陳希同案一出，中央各部門、各省區市再也不敢學陳希同對江澤民的中央表示不敬了，各部門、各省區市報送中央辦公廳的各種文件比原來多出將近四分之一。李鵬因為陳希同的入獄更大傷元氣，他對北京市由過去的頤指氣使變成不敢涉足，對江澤民也開始變得尊重起來了。

對江澤民來說，如果"倒楊案"只解決了他名義上的權力問題，那麼，陳希同一案則使江從沒有權威到開始樹立權威。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曾慶紅在從中多次化解矛盾，出謀劃策，妥善處理與鄧小平家庭的關係，江澤民想如此乾淨利索地懲治陳希同是根本不可能的。

請出薄一波逼喬石退休，樹立絕對權威

江澤民、曾慶紅都認識到，迫使喬石退休，成為繼清洗"楊家將"，削弱李鵬權勢後的當務之急，唯有此，才能真正樹立江澤民在黨內的絕對權威。

喬石是中共最高層中的開明派人士。在十四屆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祇有喬石和李鵬是連任三屆的政治局常委，但喬石在1982年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就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併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當時的李鵬是電力工業部部長、江澤民是電子工業部部長。喬石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這些資歷，使喬在中共十四屆黨的最高層無人能出其右。因長期分管政法、紀檢和人事，喬石在中共政法、紀檢系統的威望勝過江澤民，當時喬石雖已離開政法系統，但他的兩位親信任建新、尉健行分別擔任著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喬石仍然是政法、紀檢系統的無冕之王，同時，喬石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大力強調"依法治國"，強調各黨派都必須遵守"憲法"，強調全國人大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橡皮圖章"硬了起來。特別是喬石的每次講話極少提"江核心"，講話的調子也與江澤民不一樣。這一切，江澤民、曾慶紅都非常清楚。

江澤民就任總書記後，喬石一直堅持他獨立行事的風格，一些政治局成員明顯感到，喬石讓江澤民不自在。喬石在場，江澤民總顯得緊張，講話放不開，好像被喬石壓住了，在政治局會議上束手束腳，連玩笑都不敢開。喬石不在場的場合，江澤民可以談笑風生，海闊天空，不僅開玩笑，有時甚至會唱起歌來。如果讓江澤民在李鵬和喬石中作出選擇，江肯定選李鵬而棄喬石，因為喬石給他的心理壓力太大。但是，在如何迫使喬石退休的問題上，的確成為江澤民的一塊心病。

曾慶紅非常理解江澤民的心情，他認為要真正樹立江澤民的"核心"權威，必須在中共十五大上迫使喬石退休，如果不能迫使喬石在中共十五大退休，那就意味著喬石仍將與江澤民共事五年，而有喬石的五年和沒有喬石的五年對江澤民來說是完全不同的，喬石在，江澤民仍然不可能顯示出絕對權威，仍然不可能提出自己的理論；喬石不在，江澤民將會顯示出作為第三代"核心"的絕對權威，並提出自己的理論。客觀上，李鵬已任兩屆總理，必須離開國務院而改任他職。如果喬石十五大不退，將名正言順地連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那麼，李鵬必須從江澤民的三個職務中佔去國家主席一職，這對江澤民奠定"核心"地位，樹立絕對權威不利；如

果喬石退休，李鵬就可接替委員長之職，江澤民仍可掌握黨政軍的最高權力，從而樹立他作為第三代“核心”的絕對權威。為此，江澤民、曾慶紅煞費苦心，終於尋求到借薄一波之口迫喬石退休之法。

1997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書記處的成員在北戴河專門就如何召開中共黨的十五大作最後部署，其中最關鍵的是中共黨政最高層的人事安排。這次會議，確定了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人選；確定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一把手名單；確定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部長候選人名單。唯一不能最後確定的是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成員的名單，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如何迫使喬石體面退休的問題。

從 1997 年 7 月至 8 月，江澤民、曾慶紅三次往返於中南海北戴河，尋求中共元老的支持。當時中共元老的排序為：楊尚昆、萬里、宋平、薄一波和宋任窮。“五老”中，因為發動“倒楊”，江已經遠離楊尚昆，不敢相近；萬里，自江澤民任總書記後就一直沒有說過肯定江的話，江自然也不敢去討教；宋平，帶有濃厚的“左””的色彩，在政治局的資歷一直比喬石淺，說話沒有份量；宋任窮 1993 年以來一直疾病纏身，早已不問國事，黨內權威也不足。“五老”中唯有薄一波可以利用。薄一波自平反“復出”以來，在鄧小平、陳雲的共同支持下，一直參與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決策，在人事安排方面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胡耀邦時期、趙紫陽時期直至江澤民時期的中共十四大，薄都是中共主導人事方面的最高決策者之一。

江澤民就任總書記以來，與薄一直有著比較親密的關係，也不時“請教薄老”。而江澤民與薄一波的關係，就是通過曾慶紅建立起來的。曾慶紅與薄一波的子女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都是曾慶紅的好朋友，薄家子弟的“野”、講義氣在北京高幹圈中是出了名的。在這棘手時刻，曾慶紅再一次幫助了江澤民。為請薄一波出來替江澤民講話，曾慶紅曾多次面見薄家兄弟，更把遠在大連的薄熙來請來相商。終於，薄一波答應見江澤民，並為江出來“壓台”。

1997 年 8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會議。在江、曾的一再懇求下，薄一波應邀出席會議。會上，薄一波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向與會政治局委員講了中共發展的歷程，態度極其誠懇。薄一波說，“中國革命與建設就是靠著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的順利接班而走過來的。十五大的領導班子一定要有新面孔、要有新鮮血液、要體現集體領導的特色。在坐的都為黨和國家的事業興旺做了大量的工作，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為了保持黨的事業的連續性和領導班子的年輕化，我提議，我們能否以 70 週歲劃條線。過線的政治局委員、常委是否都退下來。當然，這次江澤民同志是個例外（注：此時江澤民剛過 71 歲生日）。雖然是集體領導，總得有個帶班的人，有個核心，江澤民同志就是我們的核心。”



江澤民和薄一波

接著薄一波的話語，江澤民當眾表態："我也曾經考慮過在十五大退下來，但這樣不利於黨的事業的順利交接和工作的連續性。我將在中共十六大的時候退下來。"面對薄一波突如其來的提議，毫無思想準備的喬石衹能被迫表態同意。此前，年屆73歲的喬石卻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表示過要退休的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一大批支持喬石的改革派人物也都真切地希望"喬石同志再幹滿一屆"，然而，中國政治就是這樣充滿戲劇性和令人不可捉摸，喬石退休的命運就在剎那間決定了。因為喬石的退休，困擾江澤民的最高黨政領導班子配備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江澤民的心頭大患也就除去。江澤民不僅可以不交出自己的國家主席職位，還可以將喬石騰出的委員長寶座當作順水人情送給已越來越依附於他的李鵬。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開，這次會議標幟著江澤民時代的到來。根本原因有二條：一是鄧小平的去世，"倒楊"的成功，造成中共元老們已無真正實力干預江澤民的執政路線；二是喬石的徹底退休，使現職中共最高領導人中無人敢像喬一樣牽制江。在中共十五大的閉幕式上，老邁的薄一波雙手顫抖著念一份擁護江澤民的講稿，使更多的人聯想到江澤民、曾慶紅與薄一波、薄熙來父子達成的一筆政治交易。今日薄家父子幫助江澤民，明天江澤民能不助薄熙來？試想，如果沒有曾慶紅，不問政事五年的薄一波還會管江澤民的這份閑事嗎？

用"三講"和"三個代表"撈到政治資本

隨著江澤民時代的到來，曾慶紅考慮問題角度和出發點與以前已大不一樣。曾慶紅認為，江澤民的每一個大的政治動作，都應該達到既加強中央權力，又突出其個人權威；既威懾那些膽大妄為的貪官污吏，又不失時機地為江所用的目的。面對如洪水猛獸般的黨內腐敗，如何重塑黨的權威，同時樹立江澤民的權威呢？

1998年10月，曾慶紅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於在全國縣處級以上幹部中開展『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的建議"，建議在世紀之交，在全黨範圍進行一場類似四十年代延安整風運動的思想教育，以江澤民1995年提出的"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為主題，學習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人的有關著作，反腐倡廉，端正黨風。這是中共黨內第一次通過曾慶紅之口，將江澤民放在與毛澤東、鄧小平相并列的位置上。

江澤民在1995年提出的"三講"，為什麼到1998年底才被曾慶紅揀起作為法寶提出嗎？當時主要是受到了喬石、李瑞環的抵制而開展不起來。對於這次曾慶紅倡議的"三講"，李鵬、朱鎔基、李瑞環都不積極，他們都認為這是一次替江澤民樹碑立傳的造神運動，是一次變相的個人崇拜，至於在端正黨風方面的作用則是治標不治本，解決不了實質問題。但因胡錦濤、尉健行和李嵐清三個常委已經表態支持，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黃菊、李長春、吳官正等也表示同意，所以不便反對。不過，就從曾慶紅倡議通過的那一刻起，李鵬、朱鎔基、李瑞環就根本不將其放在心上，顯得有點陽奉陰違。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三講"教育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展開。那麼，"三講"教育具體又是如何展開的呢？

曾慶紅在那次政治局會議上演繹了江澤民1995年提出的所謂"三講"。曾慶紅說："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是緊密結合和相互統一的。講學習，是講政治、講正氣的基礎，講正氣是講學習、講政治的體現，講政治是『三講』及其教育的核心。這裏講的政治，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歸根結底，講政治，就是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觀，堅持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和清醒，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98年12月5日下午，“三講”動員令正式向全國吹響，“中央決定，今明兩年集中一段時間，在縣級以上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中，深入開展以『三講』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

曾慶紅在“三講”中的作為表明，他既要從“三講”中真正樹立起江澤民的權威，同時又要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組織體系。曾明知“三講”會走過場，但對“三講”的預設結果卻千方百計要達到。通過“三講”，曾慶紅幫助江澤民至少在形式上、名義上在全國樹起了絕對權威。但是，“三講”的確是一場華而不實的走過場的運動，在中南海，有一副關於“三講”的對聯，對此刻劃得維肖維妙：“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講過來講過去講來講去無官正，反貪污反腐敗反墮落反其上反其下反上反下未見行”，這大概是中國的老百姓對曾慶紅倡導的“三講”教育的一個恰如其份的評價吧。

如果說開展“三講”教育，目的是為了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那麼，“三個代表”則旨在奠定江澤民的歷史地位，使江與毛鄧齊名。“三個代表”是“三講”的衍生品，是曾慶紅參與設計的為江澤民量體裁衣的又一傑作。

為推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江澤民、曾慶紅、華建敏、王滬寧等為此不知開了多少次碰頭會，並請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哲學理論工作者等或徵求意見，或參與研討，曾慶紅也組織參與了一些小型的理論務虛會。在曾慶紅、華建敏、王滬寧、滕文生等為江澤民精心炮製的基礎上，2000年春，曾慶紅陪同江澤民赴廣東考察，在廣東考察工作及參加高州市領導幹部“三講”教育會議時，江澤民第一次提出了“三個代表”。江澤民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取決於黨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狀況和戰鬥力、領導水平。祇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

自廣東考察回北京後，曾慶紅親自組織專門班子，撰寫《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文章，並以新華社特約評論員的名義，於2000年3月9日公開發表。這是第一篇將江的講話概括為“三個代表”，以大力宣傳“三個代表”的文章。

文章說，江澤民的這一講話，“不僅對於當前深入開展縣（市）『三講』教育是有力的推動，而且對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保證黨和國家事業永遠興旺發達，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指導意義。所有共產黨員和領導幹部，都要認真學習領會江澤民同志的重要講話精神，深刻認識和牢牢把握這『三個代表』，併用以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

文章指出，“歷史的經驗表明，『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立黨之本、力量之源、生命之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要解決的難題很多，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很重，經濟成份、利益主體、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樣化，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帶來種種影響，給黨的建設帶來許多新的課題。在這樣的國內外環境中，我們黨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堅定地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確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文章強調，“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學習和牢牢把握這『三個代表』，深入把握其精神實質，防止和克服片面性、絕對化和簡單化，把思想和行動進一步統一到全面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

路線上來。”

曾慶紅將“三個代表”作為江澤民的“重要思想”，是為了給即將功德圓滿的江澤民一個滿意的歷史定位。但是，在推出“三個代表”時，曾慶紅也的確說了他的一番心裏話。曾慶紅說，“我們黨是一個有 6600 萬黨員的執政黨，治理這麼一個大黨，確實不容易，又非做好不可。祇有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大力加強黨的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我們才能在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保持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三個代表』回答了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新的重大問題，回答了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幹部群眾關心的重大思想理論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

比江澤民更加積極、主動、大膽，曾慶紅對允許資本家入黨持非常開放的態度，他渴望改造甚至改變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中是極其少見的。

的確，像他的出奇不意的政治手腕一樣，曾慶紅很多時候的想法也是出奇不意的。“三個代表”的推出表明，不僅曾慶紅想以此奠定江澤民的歷史地位，更透露出曾慶紅改造共產黨的一種決心。

宗海仁指出，曾慶紅協助江澤民所做的幾件最重要大事，既保住了江的權位，樹立了江的權威，也為自己撈取最實用的政治資本。

主導十六大人事，全面安插江派人馬

曾慶紅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這一點與鄧小平非常相似。只講實權，不圖虛榮。對改革大刀闊斧，但一涉及自己的仕途，卻又格外小心。與昇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時一樣，曾慶紅也是極其耐心地、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走向中央組織部的。1997 年 9 月，曾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江澤民讓他聯繫中央組織部。到 1998 年 10 月，開展“三講”時，他則以中央“三講”領導成員的身份重點過問中央組織部的事。

1999 年 3 月，對曾慶紅來說是一個成熟的時機，分管組織人事的胡錦濤當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曾慶紅開始接替早已超齡的張全景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宗海仁指出，曾慶紅接任中央組織部的根本目標，就是全面主導十六大人事，儘可能大面積地安插江派人馬，並為自己撈取最實用的政治資本。

對曾慶紅來說，從張全景手中接過來的中央組織部已是暮氣沉沉。八十年代末以來，中央的組織路線一直為宋平所把持，宋平也好，呂楓、張全景也罷，行的都是宋平的一套。摒棄宋平一派僵硬的組織路線，是曾慶紅改組中央組織部的第一個目標。曾慶紅對中共組織體系的改革可謂處心積慮。他在中組部進行的改革被形容為“風雷激蕩”，一些思想保守者被棄用，曾慶紅說，“我們必須拿出一往無前的勇氣，在幹部人事制度方面進行改革體制，絕不能有畏難情緒。”

曾慶紅特別強調要對高級幹部特別是一把手實施監督，並倡議中央組織部與中紀委聯合，每年定期派出巡視組赴各地各部門，重點對省部級官員特別是黨政一把手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對中央批示、交辦的各項工作落實情況，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選擇任用幹部和廉潔從政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並依照有關法規和要求，“嚴格規範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行為，積極推行省部級現職領導幹部家庭財產報告制度，擴大領導幹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適用範圍，在省部、地廳級領導幹部中進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的試點。”這些措施，使省部級官員的貪瀆腐敗行為有所收斂。同時，曾慶紅將觸角伸向外事系統，對外事幹部人事制度進行改革。將選

派駐外使節的人選，由外交部內部改為面向全國選才，通過組織推薦、資格審查、綜合考試、面試、考察和審定等六個步驟，首批選出十二人。2001年3月19日，12人赴任之際，曾慶紅親自與其面談，進一步展示了曾慶紅的魄力。總的說，曾慶紅在組織系統的改革是比較得人心的。

但是，曾慶紅的確有私心或者說有野心。在負責籌備中共十六大人事方面，曾慶紅已經大面積地提拔了江澤民的人馬和他自己的親信。在十六大中央委員會中，我們將會看到一長串新的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名單，他們都是屬於江澤民和曾慶紅的：王剛、習近平、薄熙來、趙啟正、李鐵林、白克明、劉京、陳良宇、孟建柱、王歧山、周小川、喬宗淮、栗戎生、劉源、黃麗滿等等。客觀地說，



江澤民和曾慶紅在十六大前

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年富力強、有政績，又與江曾關係極好的現任省部級官員。但的確也有少數不是靠政績 而是完全憑江澤民的面子。李鐵林，59歲。中共元老李維漢之子，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的同父異母弟弟。1968年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畢業。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市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秘書長兼經濟科技局局長。1992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並於1993年兼任人事部副部長。1999年，曾慶紅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昇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此人為人正直，思想敏銳，工作細緻，行事低調，與曾慶紅、胡錦濤的關係都非常親近。

白克明，59歲。劉志丹的戰友白堅之子。白堅是1928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是江澤民的老上司。白克明是曾慶紅在北京101中學時的同學。白克明197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7 年 7 月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曾任國家教育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教科文衛組組長。1993年4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2000年3月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同年6月任人民日報社社長。2001年8月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此人極為圓滑，待人精明，思想解放，行事張揚，與袁木、丁關根、李鐵映關係都不錯，但曾慶紅則是其真正的恩人和朋友。

劉京，58歲。烈士子弟。從小在曾慶紅母親鄧六金的華東幼兒園長大，與曾慶紅一起在北京101中學讀書。陝西西安人。1968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無線電技術專業。曾作為鄧樸方的助手，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執行理事會副理事長。經鄧樸方推薦，先後任昆明市市長、雲南省副省長。1998 年任海關總署副署長，并兼任中央"420 調查組"副組長，負責查處廈門遠華走私案。曾慶紅昇任中組部長後，劉京於1999年10月任公安部副部長。現任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負責人。此人精明能幹，作風明快，是曾慶紅最器重的助手之一。

不管曾慶紅作何設想，在安插江澤民的親信進入十六大中央委員會和重要崗位方面，曾慶紅的確做到了不遺餘力。其中，最令人非議的就是密謀提拔陳至立、黃麗滿兩位女性了。江澤民喜歡與女性在一起 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中南海有一則流行甚廣的小道說法，說江澤民喜歡四個女人：王曉棠、宋祖英、陳至立、黃麗滿。這裏的"喜歡"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有生理上的關係，也並不是說這四

漢密爾頓學院教授李成也認為，曾慶紅不可能取代胡錦濤，儘管曾慶紅的權力炙手可熱，儘管曾並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李成說："他代表了很多東西，譬如說太子黨的背景、高幹子弟的背景，他和上海幫的淵源很深，然後又是給江澤民做了很多事情，又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黑箱操作。這三個方面是現在的民眾所不希望看到的。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有兩點，一個是很多人對他的誤解，第二個是他咄咄逼人、鋒芒必露。儘管他自己想掩蓋，但是因為他的才華和遠見，所以使很多人不安。"

在公開場合，曾慶紅對胡錦濤是尊重的，胡錦濤對曾慶紅也是



胡錦濤和曾慶紅

謙讓和禮貌的。但是曾慶紅一直被視作是胡錦濤接班的最大威脅，因此西方媒體上也出現了不少曾胡二人明爭暗鬥的報道。不過，李成強調說："曾慶紅跟胡錦濤的關係，是有競爭，但更多的是合作。合作有多方面，包括人事的安排，包括他們在中央黨校的合作，搞一些改革的措施。"

獨立分析人士高新也指出，中共建黨以來，的確出現過黨內矛盾和權力鬥爭，但是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多於他們之間的矛盾。

現在的江澤民政權也是如此。

高新說："江澤民政權在已經沒有鄧小平、毛澤東權威的前提下，這些人如果還想維護這個政權，這個時候，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就變得最大，他們之間的矛盾就相對變得最低。"高新認為，曾慶紅的黨性和對共產黨政權的感情都決定了他不可能去和胡錦濤爭奪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另外，曾慶紅也還會受制於江澤民的權威。

高新指出："曾慶紅的那種黨性即使不存在，祇要江澤民說一句，你不要輕舉妄動，他就不能輕舉妄動。因為江澤民現在確實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權威。"高新認為，十六大之後，曾慶紅會繼續輔佐胡錦濤，主持黨務工作。

不過，李成說，曾慶紅至少在目前沒有做一把手的野心。長期關注中國高層政治的分析人士、《江澤民的幕僚》一書的作者高新也駁斥了有關曾慶紅和胡錦濤明爭暗鬥的報道。

研究中國高層政治的分析人士高新說："曾慶紅這個人，我之所以在《江澤民的幕僚》裏邊收錄了他，是因為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輔佐黨的最高領導人，無論他的出身，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方向以及他本人的工作興趣，包括他對共產黨這個政權的感情所在，都決定了他不可能和胡錦濤去競爭黨的最高領導人。"

高新同時解釋說，曾慶紅沒有這樣的個人野心的另一個原因是，黨內建立了接班梯隊制度。高新說："他之所以沒有個人野心，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曾慶紅還擔任上海市組織部長和市委副書記的時候，就已經製定了這樣一個接班梯隊的計劃。這樣一個接班梯隊的計劃，祇要你曾慶紅沒有及時的像胡錦濤那樣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這個階梯上鍛煉 5 到 10 年，那麼這個黨的最高領導人交給你的話，就有一個黨心不服，民心不服的問題。"

高新指出，瞭解曾慶紅的人說，現實生活中的曾慶紅其實是一

個淡泊名利的人。高新也否認了外界一度廣泛流傳的江澤民三次提名曾慶紅成為政治局委員，但是因為阻力太大而沒有實現的說法。高新說，這是媒體炒作的結果，並沒有事實根據，因為有關曾慶紅晉陞政治局委員的議題從未列入中央全會的議事日程。

高新說，曾慶紅在十六大之前的重要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以這個名義協助胡錦濤主持黨務工作。政治局委員是各方各面的代表，並沒有決策權。政治局常委做出的決定則由中共中央書記處來負責執行。也就是說，曾慶紅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並不妨礙他進入政治局常委。

那麼，十六大之後，曾慶紅將會扮演什麼角色呢？高新和漢密爾頓學院的李成教授都認為，在正常情況下，曾慶紅應該進入政治局常委，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主持最重要的黨務工作。《第四代》一書更是斷定，事實將證明，曾慶紅會理所當然的在十六大任政治局常委，成為新一代中共核心層中的關鍵一員。

助習近平空降上海，曾的勢力隱然成形

2007 年 3 月，中共另一名“太子黨”習近平從浙江省空降上海擔任市委書記後，揭開中共新一輪省委書記大換班的序幕；緊接著，天津等四個省市的“一把手”也進行大執位。當時有香港媒體分析說，從這一波省委書記的換班行動來看，大贏家並非胡錦濤，而是近年手執中共組織人事大權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除了習近平，原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調任另一直轄市天津任市委書記，這兩人篤定會成為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率先曝光的兩名政治新星。此外，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調任浙江省委書記；原青海省委書記趙樂際則出任陝西省委書記；上

海市委副書記王安順，調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內定接任市長。

這些諸侯更替，事關當年秋天中共十七大最高領導層人事佈局，因此備受矚目。這些省級人事變動方案，確實讓外界相當意外，而隨中共十七大逼近，相信越來越多敏感省份，例如廣東、北京、重慶等，都會出現新面孔，預示更多十七大政治新星陸續曝光。

香港《蘋果日報》指出，過去五年，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或“江派”逐漸失勢，很多“江派”人馬的仕途都已走到盡頭，很少獲得拔擢；而且，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下馬、黃菊病重而大權旁落，都預示江派人馬將從北京政壇沒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共青團系統），胡的人馬已成為當時得令的炙手可熱人物。不過，從此次涉及五省市的省級高幹調動來看，一股新勢力已在中共高層隱然成形。

在此次五名新封疆大吏中，有四人是曾慶紅人馬，分別是習近平、張高麗、趙洪祝和王安順。眾所周知，曾慶紅是“太子黨”首領，近年與他關係密切的太子黨成員，包括中組部長賀國強、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商務部長薄熙來等，都獲重用。習近平出掌上海市，固然與他主政浙江時，成功說服浙江官員在規劃定位上全力配合上海，要浙江甘心做上海的後花園，令中央對他刮目相看，認為這是顧全大局的表現，但同樣重要是他的“太子黨”身份。

曾慶紅的人馬，除了高幹子弟，另一個重要來源是石油系統。曾慶紅從七十年代初開始，獲得父親的老戰友、主管計委和石油系統的副總理余秋里照顧，擔任余的秘書。

因此，石油系統，特別是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正是曾的嫡系。隨曾慶紅權勢日漲，石油系統出身的國務委員周永康、海南省委書



曾慶紅在十七大

記衛留成等都獲得重用，而此次獲得調昇的諸侯中，張高麗和王安順都長期在石油部門任職。至於趙洪祝，是曾慶紅擔任中組部長時，一手提拔的愛將。

《蘋果日報》還評論說，在今後幾個月，相信還有更多的"曾派"曝光。從上述中共領導層可看出，"曾派"的實力絕對不容小覷，對胡錦濤應會產生一定壓力！

夏飛撰文指出，曾慶紅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中共十七大最大的謎團之一。在中共十七大未召開前，夏飛便根據多方信息作出判斷：這位中國實權人物，確定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

夏飛撰文稱，曾慶紅選擇了退休。曾慶紅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之職，堪稱胡溫這一屆班子中最神秘莫測，最為外界猜測不已的一位。一般認為，曾慶紅是"太子黨"一員，在黨內人脈深厚。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全力輔佐在"六四"後的嚴峻局勢下倉促間接掌黨政軍大權的江澤民，搬開"楊家將"整垮陳希同、掌控中央日常工作，鞏固了權力，扭轉了被動，打開了局面，有人稱他是江澤民的頭號功臣和親

信。

中共十六大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曾慶紅進入政治局常委，分管黨務、組織，港澳事務。儘管數年來一直有傳言說他與胡錦濤明爭暗鬥，甚至有人說胡錦濤大權旁落，曾慶紅要全面架空云云。但是觀察人士告訴筆者，傳言未必可靠，不能說他們之間沒有看法上的分歧，但是總的看，合作是有成效的，曾慶紅維護了胡錦濤的權威，協助胡錦濤處理了不少棘手事務。還有熟悉曾慶紅的人士透露，曾慶紅實際上是中共最高層中思想較開明、頭腦較開放的人之一。

夏飛認為，曾慶紅在十七大後之所以急流勇退，並非權力之爭落敗，而就是簡單的年齡因素。曾慶紅已滿了68歲，按照上一屆黨代會形成的規定，交卸職權。夏飛指出，近來中央部委、地方諸侯和軍隊人事任免頻繁，大面積新老交替，其中雖然有一部分涉及權力爭奪，或者具有派系背景，但是不能將所有昇降都歸結為權力之爭、派系之爭。事實上，在官員晉陞問題上，除了看其政績、聲望、資歷（資歷中當然也就包括了某些背景），還有兩個最關鍵的因素，可以說是兩條"硬杠杠"：一個是看年齡，一個是看是否查出涉嫌貪污腐敗。當然，十七大上也會有例外。

那麼，曾慶紅的位置是由誰決定的？真的是由江澤民胡錦濤決定的嗎？我們再來看看當時港台媒體的報導，曾有評論文章引述明鏡出版社《遺囑》一書，肯定曾慶紅是鄧小平欽定的接班成員之一。書中鄧小平對胡錦濤和曾慶紅說："最後一個問題，……關於你們兩位，雖然都50歲上下，但你們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領。在蘇東問題爆發後，我曾給政治局說過要沈著應對，穩住陣腳，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絕不冒頭，這話也適合於你們。尤其在澤民他們主政時，你們要用這20個字去做好助手。今後當你們主政時，這20

個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衹是在 20 字後面再送你們四個字：有所作為。”

台灣中央社說，由作家沙士撰寫的新書《遺囑》，描繪鄧小平在 1992 年經過半年考察、思考和反覆徵求其他人的看法，最後用中國方式留下了遺囑。挑選了胡錦濤、曾慶紅以及鄧的秘書兼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王瑞林，作為江澤民以後的決策核心圈。

《東方日報》說，《遺囑》描述鄧小平於 1992 年 6 月在北京家中小院，召來胡錦濤、曾慶紅及王瑞林，對他們說：“趁我還清醒的時候給你們交代些事情”。

鄧小平隨後說：“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來讓鄭必堅執筆弄出個南方講話要點。很多人講，這是鄧老爺子的臨終遺囑或者說是最後的政治交代。這話不全面，我今後是不會再說甚麼太多話了。但真正核心的政治遺囑是不能弄得這樣滿城風雨的。今天，我倒想小範圍地真正講一下我的政治遺囑或者說真正的政治交代。”

作者沙士不僅披露鄧小平挑選胡錦濤、曾慶紅和王瑞林三人為江澤民後的決策核心、規劃了十年以後的憲政之路；還在內容提要表示，品味其遺囑會領悟到“中國眼前的變革僅僅是開始，鄧小平雖然辭世，他還在影響中國。”

從《遺囑》內容來看，作者不僅思想非常開放，而且掌握大量內幕情況，從中南海高層，到鄧小平本人。其一定的真實性值得重視。全書的高潮和精華是最後一部分，鄧小平向胡錦濤、曾慶紅及王瑞林交待他的“政治遺囑”。

十七大急流勇退，讓習近平當上“儲君”

在 2007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曾慶紅激流勇退，退出中共領導層。北京在香港的喉舌《鏡報》月刊發表文章透露，身為

十七大秘書長的曾慶紅在談及自己退出中共高層的民主協商時說：“我可以發揮的作用發揮了，我可以盡到的責任都盡到了，我再也沒有任何理由留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了。”

當然，曾慶紅的“高風亮節”並不是沒有條件的。《鏡報》披露，曾慶紅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就是一種政治素質，也是我們選擇黨的領導人的一種標準。這種素質和標準是和擴大黨內民主及人民民主的時代要求相適應的。當年小平贊同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就是看重江澤民具有這種素質。現在我們又到了選任和培養黨的領導接班人的時候了，也要按照這種標準來選擇。習近平就是一個人選。

這也是在十七大權力佈置中，習近平在最後階段後發先至，超越早前被普遍看好的李克強，躍居接班首位的原因所在。十七大落幕後便傳出是曾慶紅在關鍵時刻，急流勇退，護送中共元老之後習近平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開創了“太子黨”與“團派”“平衡共治”的權力新局。

原被忽略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奠定其“儲君”地位，解決中共血脈的傳承問題，並緩解了中共當局永續經營的危機。而這場政治大戲的導演，正是在急流勇退的政治強人曾慶紅。

據稱，曾慶紅在黨大會前，曾準確預測十七大常委人事的《十七大之變》（《太子黨和共青團》）作者指出，以退出常委的代價，顛覆共青團全面接班的佈局，換來“太子黨”的新時代。曾以“高超政治謀略”，面對江胡聯手挾殺的困境，在最關鍵關頭，知所進退，順勢將中共元老之後習近平送上“儲君”之位，太子黨鹹魚翻身，改變了中共的政治生態，或至少令政治生態暫時恢復平衡。

文章指出，曾慶紅是在關鍵時刻，以習近平接替他的職位作為交換，同意不再爭取連任，解決了胡錦濤面對江澤民干政，和賈慶



習近平在十七大上

林、李長春堅持不退的難題。稍早前，江以賈和李的年齡比曾小為由，力挺賈和李留任，而以68歲的大限，要求曾退休，似乎以此報十六大之後曾慶紅與他漸行漸遠、離心離德的一箭之仇。

文章稱，曾慶紅似乎已料到會有這個問題，在與賈慶林和李長春堅持留任，並爭論誰應留任，誰不留任的最後過程，曾慶紅指著賈和李說："你們留，你們留，我走！"但他提出除了李克強，還應有一位"年輕的同志"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他並力推內定為政治局委員的習近平，表示願讓出他的位置給習。

對曾慶紅的提議，胡錦濤在面對賈、李、曾爭持不下的較量局面，還有遭遇前總書記江澤民干預的情況下，對此提議表示支持。而賈慶林、李長春和江澤民也不好反對中共元老之後習近平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因此，曾慶紅實際上是習近平躍昇政治局常委的最重要推手。

香港雜誌刊文說，曾慶紅和家人不戀眷個人權位。曾慶紅二弟曾慶洋原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長，少將軍銜，按規定60歲退休。但2005年，就在退休前，軍隊高層突然要提拔他為中將，昇任解放軍總裝備部副部長，為大軍區副職，可以工作到65歲。但曾慶洋拒絕了"好意"，堅持按規定離職。

文章稱，曾慶紅更重視自己在歷史上的定位。所以，他要帶領中共"與時俱進"，永續經營。為此，他提出加強中共黨的"基本建設"主張，建立各級黨員幹部培訓機制。他還在這次中共權力鬥爭中以實際行動固化規矩：既然十六大規定68歲退休，十七大人事安排他也不能例外，而且將來誰都不能例外，包括五年之後中共十八大，九位常委有七人都過了"68歲"大限，也必須一樣退休。

2007年12月12日，在會見到訪的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時，曾慶紅親口告訴日本人自己下台原因。

日本共同社說，據野中在會談後向記者透露，曾慶紅稱，他在中共十七大後不再擔任政治局常委，"並非有其他原因，而是經各機構嚴肅討論後作出的決定。"報導引述日本駐華大使館相關人士的話說，這是曾慶紅從政治局常委退下來之後，首次會見外國政要。當天曾慶紅氣色頗佳，面帶笑容並迎接野中的到訪，并稱野中是"我黨、政府和人民的老朋友"。

就在曾慶紅首次談論因何退出中共最高領導層之際，他所力薦的習近平僅用一個月就一口氣接下曾慶紅在中共黨內的所有職務，如：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黨建工作小組副組長等，而十七大後，由於習近平分管組織和黨務工作，因此，中央黨校校長職位也順理成章地落到習近平的肩上。至此，現年54歲的習近平已經全部接替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全部職務。

當時的媒體評論都對習近平接班給予很高期待，因為習近平本身就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是中共元老之後，是"太子黨"，可

能全力維持現狀、維護共產黨江山；另一方面，他的父親習仲勛，卻是中共黨內少有的開明人物，力主“改革開放”；在胡耀邦落難時，敢於出頭仗義執言；六四時期，反對軍隊鎮壓學生；等等。如果習近平能夠受到乃父影響、潛藏乃父之風，面臨歷史關頭時，未必就不會棄一黨之私，而就民族大義。

《蘋果日報》指出，習近平正式取代曾慶紅，接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成為北京的港澳事務最高負責人。表面上，曾規習隨，北京的香港政策會保持連續性，不會有大變化。不過，習近平的“儲君”地位還沒確立，需要跟另一位政治局新常委李克強進行競爭，這種妾身未明的狀況，對他處理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應有很大的影響。

習近平雖然在中共十七大會議後，晉身為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常務書記，比胡錦濤的心腹愛將李克強還要前一名，似乎在接班競賽中稍稍領先；不過，未來幾年，胡錦濤的權勢有增無減，對高層人事任命的話事權，必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胡的接班人首選一定是李克強。因此，習近平能否笑到最後還是一個大問號。如果習近平想成為下任中共總書記，除不犯任何政治錯誤，還要做出亮麗政績。

最後政治亮相：鞠躬致意，三次擁抱

2008 年 3 月 15 日，是曾慶紅最後一次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公眾面前亮相。

上午 9 時，身著深色西裝搭配紅底斜紋領帶的曾慶紅，步入會場，不時揮手示意，與台下的代表互致問候。

入座後，曾慶紅的左邊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右邊則是即將接

任國家副主席職務的新晉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未幾，曾慶紅主動與身旁的習近平交流，時而低下頭細細交談，時而舉起手做手勢，興致之高，溢於言表。反觀習近平則低調內斂得多，多數時候衹是側身聆聽，偶爾插話幾句。兩人的交談，幾乎持續了大會投票的全程，將近半個小時。

香港《大公報》指出，年齡相差 14 歲的曾慶紅和習近平都曾經在上海工作，各自的父親均為中共元老，此次又在國家副主席的職位上交接棒，兩人在家族背景和工作經歷上的交集頗多。據說，習近平已搬進原先曾慶紅在中南海勤政殿的辦公室，此前也接管了曾主掌的中央黨校和港澳工作。

當天，新老交替的一幕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出現。當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王兆國宣佈習近平當選為國家副主席時，習近平起身向代表們鞠躬致意，此時，面帶笑容的曾慶紅也站了起來，與習近平緊緊握手，向其表示祝賀。他更主動與習近平熱情擁抱，以此完成兩任國家副主席的交接。隨後，曾慶紅又移步來到胡錦濤和吳邦國身邊，與他們握手、擁抱，向已宣佈分別當選為國家主席和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兩人致以熱烈祝賀。而在其返回座位時，鄰座的溫家寶也主動伸出手來，與曾慶紅握手致意。大會結束後，仍有不少代表上前與曾慶紅攀談。談笑風生間，曾慶紅邊走邊說，緩步走下主席台，完成其從中國政壇退出的謝幕之作。

香港《亞洲時報》以“從容告別政壇：曾慶紅燦爛謝幕副主席”為標題報導說，曾慶紅與習近平握手的照片，登上了許多大型門戶網站的頭版頭條，成為當天最搶眼、最風光的圖片新聞。至此，曾慶紅副主席已卸下所有職務，正式告別政壇，為政治生涯劃了個圓滿的句號，開始過起平民生活；其從容、燦爛的政治舞台謝幕定格在歷史的記憶中。



曾慶紅擁抱習近平

現年55歲的習近平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這些正是曾慶紅以前擔任的職務。換言之，習近平副主席已從曾慶紅（現年69歲）手中全面接過班。

《亞洲時報》稱，對於港人來說，大陸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堪為"頂頭上司"，該職原由曾慶紅兼任；2007年11月9日後，改由習近平兼任。

習近平與曾慶紅還有不少共同點。首先，兩人均都來自革命根據地，曾慶紅是江西人，紅軍長征前，江西井岡山、瑞金為中央蘇區、中國革命的搖籃，是毛澤東親手創建的中國首席紅色根據地；習近平為陝西人，陝西延安更是長征後中國革命的中樞、燈塔、大本營，為毛澤東決勝於千里之外的總部。

其次，兩人都是革命家的紅色後代，根正苗紅，曾慶紅父曾山曾於建國後出任政務委員、商業部長、內務部長等職；習近平父習仲勛更是大名鼎鼎，曾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等要職。

第三，習近平、曾慶紅均曾在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鍾煉、過渡。

曾慶紅1984年至1986年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1986年至1989年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後上調中央。中央查處原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大貪官陳良宇後，習近平於2007年3月由浙江省委書記轉任上海市委書記，2007年10月十七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後，上調中央。

第四，兩人陞遷均較快，不拘泥於常規；不拘一格降人才。曾慶紅晉陞最高層的（十六屆）政治局常委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也就是說跨越了政治局委員這個層級；習近平晉陞十七屆常委前，為中央委員。此外，兩人均曾有過軍旅生涯，曾慶紅早年從北京工業學院畢業後曾擔任部隊技術員；習近平清華大學畢業後曾任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現役）。

曾慶紅2002年當選為十六屆政治局常委時63歲；習近平2007年當選為十七屆政治局常委時54歲，為最年輕的常委之一。外界普遍預料，到2012年十八大時，年富力強的習近平可更上層樓，成為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媒體還注意到，除曾慶紅外，包括剛退下來的吳官正、羅幹和以前的元老們均未出席本次兩會，因此曾慶紅尤為引人注目，成為閃光燈的聚焦點。曾慶紅幾乎全程參加了兩會的開幕式、政協閉幕式及各次重要會議，與十七屆九大常委一起端坐於主席台前排中央，且仍然排名第五。15日謝幕後，16日上午人大第六次全體會議投票表決、選舉一府兩院的最高首長時，曾慶紅未有（也沒必要）再出席。

在曾慶紅卸任前，妹妹曾海生少將曾向媒體透露，其兄卸任後將在北京居住，料不會定居上海。曾任職總參謀部管理保障部政委的曾海生，2007年是十屆全國人大代表，2008年被選為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曾海生說，向來家中兄弟姐妹之間就有個傳統和風氣，

不見報、不見記者、不做宣傳，為人處事極其低調。雖然知道外界極為關注其兄長曾慶紅退休後的生活狀況，但曾海生口風甚緊，衹是和藹微笑，但也不惱記者的追問。

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朱鎔基與曾慶紅一樣，進入中央高層任職前都來自上海。江澤民退休後在京、滬兩地居住，冬季偶而也會到深圳小住。而朱鎔基則在京居住，閑暇雅好京劇，自拉胡琴。

曾慶紅曾在上海工作，但其早年在京求學和工作差不多有 25 年時間。1984 年後在上海擔任組織部副部長等職，到 1989 年再次返京出任中辦副主任等職至今，也將近 20 年，對北京生活環境可謂熟悉。因而，在曾海生看來，兄長衹是“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

談及母親、老紅軍出身的鄧六金革命老人，曾海生流露出母女情深的一面。早年母親健在的時候，曾海生也在北京，每周都會回去探望老人家，而曾慶紅等兄長雖然工作繁忙，但也會時常抽空回家探視，事母至孝。“兩會”之後，很快將是中國傳統的節日“清明節”，屆時，卸去公職的曾慶紅、曾海生等兄妹預計都會去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祭拜父母親。

政治強人七十壽宴透露心路歷程

自最後一次政治亮相後，就很少能看到曾慶紅的蹤跡，甚至在一些絕大部分政治老人共同出現的政治場合，都沒有看到他的影子。雷厲行 2009 年 10 月撰文指出，這位當年叱吒風雲、安邦定國的政治強人，瞬間從中國政治舞台消失，退休之後到底在做什麼？是不是在研究他喜歡的明清歷史？或和李嵐清、朱鎔基一樣，也在著書立說，撰寫回憶錄？總結數十年在中國政壇的經驗，要為中國

歷史留下一部現代版的《資治通鑒》？

就在外界對他的行蹤表現出高度好奇和興趣，也出現各種各樣猜測的時候，北京近日流傳一則有關曾慶紅七十壽宴的故事，透露了這位政治強人的心路歷程。這位曾協助江澤民、胡錦濤主導中國政局，以超凡謀略排棋布子的政治人物，在親朋好友為他祝壽時，以“人生七十古來稀”的高度，以言簡意賅的曾氏風格語言，以“二回”、“二不”、“三隨”，總結了他退休之後的行為準則，也似乎是他對人生的頓悟和總結，並正按照他的日程表，開始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既要享受晚年的退休生活，在“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的同時，也似乎要用實際行動，在不聲不響間，為中國政治遊戲規則的逐漸完善樹立一個典範。

2008 年 7 月 16 日，是北京奧運組委會在北京鳥巢舉行奧運開幕式首場內部帶妝彩排的日子，這天，北京官民全力以赴，為保證彩排的成功進行緊張準備。而這天，也恰逢曾慶紅七十大壽。晚上，當鳥巢的奧運開幕式首場彩排在鼓樂聲中隆重開始時，北京城中曾府大宅也洋溢著喜樂的氣氛，曾慶紅家的親朋好友、中央和地方有關官員以及身邊工作人員，也在向這位壽星公祝壽。

其實，1939 年出生的曾慶紅，2008 年的實際年齡應該是 69 歲，但按照中國民間的習慣，則是七十虛歲，而根據習俗，應該在 69 歲慶 70 大壽。自古至今，中國 50 歲以上老人誕辰日的慶祝活動，逢十稱大壽，如“50 大壽”、“60 大壽”、“70 大壽”等。但這種大壽並非真正逢十，而是指 49、59、69 等逢九的歲數。因為九在十個數字中數值最大，人們為討個吉利，故形成了這種“慶九不慶十”的風俗。

就在眾親朋好友舉杯為曾慶紅七十大壽祝賀之後，曾慶紅即席發表了他的七十壽誕感言。他總結概括了從中共十七大激流勇退之

後半年多來的感受，首先是“二回”，即要“回歸大自然”，因為退休之後，放下公務之後，可以有更多時間到處走走，飽覽祖國的大好河山；此外就是“回歸民眾”，可以回到人民當中，“享受普通人的生活，不再當官做老爺”。

曾慶紅表示，除了“二回”之外，他還要做到“二不”，就是“不參與政務活動”，和“不擾民”。他表示，不參與政務活動比較容易做到，但“不擾民”這點，從中國目前的客觀情況考慮，則很難做到，比如出行時，當地警方都要按慣例和規格，由警車開道甚至采取封路等措施，因此，就比較身不由己，所以，那就只好“少擾民”，不要給民眾添加更多的麻煩。

為了實現自己的諾言，曾慶紅在從中國政壇退下之後，就很少再在官方重大活動場合出現，包括北京奧運開幕式，在所有中共前高層傾巢出動的人群中，都沒有看到曾慶紅的身影。

除了上述的“二回”和“二不”之外，曾慶紅還表示在退休之後還有做到“三隨”，即要“隨遇而安”、”隨風而動“和”隨緣而居“，表明了他退休之後的一種心態以及他對人類生命的認識，即不要因為環境的變化和待遇的變化和隨之而來的人情冷暖而計較；人類的一切活動要隨波逐流，藉勢而為，而不能逆潮流而動，識時務者為俊傑。他似乎意識到，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在生命歷史的長河裏，人類顯得多麼的渺小和無助，人的一生或許祇是短短的一瞬間，所有的一切都祇是緣分而已。因此，不要把自己看得多麼偉大。

雷厲行撰文指出，這似乎是曾慶紅對政治和人生的領悟。他要遵守自己的這個諾言，從此淡出中共政壇，最少是不再參與政務活動，為中共政壇的遊戲規則樹立一個典範。

曾慶紅年青時代的業餘愛好，包括在父親曾山啟迪下對明清歷史的研究，以及中國古典音樂藝術，比如二胡藝術。北京圈內人士透露，退休之後的曾慶紅，其喜好與前總理朱鎔基和前常務副總理李嵐清有些類似。據稱他現在一有時間，就聽聽中國民族歌曲，研究中國民族器樂，他有個夢想，就是希望把中國的民族音樂、民族器樂推向世界，尤其是實現中西音樂的結合。

十多年前的 1998 年 6 月，就在北京忙著準備接待即將訪華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曾慶紅，知道克林頓喜歡薩克斯風，於是，對中國民族器樂有相當研究的他，設計了一個特別的接待細節，他要給克林頓一個驚喜，要讓西洋的薩克斯風和中國的二胡進行對話，寓意於中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寓意於中西文化各有所長，既不同卻可以結合。

文章稱，曾慶紅借慶賀七十大壽的機會，表明了他退休之後要扼守的行為準則，不但要隨遇而安，而且決不參與政務，從自身做起，解決中共政壇政治老人幹政的問題，使中國的政治踏上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正軌。

習近平
正忙著鞏固接班地位的"王儲"

曾有評論稱，習近平是"太子黨"中最有平民情懷的一位。

他說，上山下鄉的那段經歷，讓他有了黃土地情結，這讓他獲益終生。

他還說，插隊七年，最大的收穫是讓自己懂得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是什麼，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

"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這句話在 2007 年再次得到"驗證"。這一年習近平"更上兩層樓"，春天主政上海，秋天進入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其震撼力和衝擊力可想而知！人們沒有想到，最高決策層竟然真的拔擢了一位"太子黨"，將他推到了未來中共和中國掌門人的起跳點。

那麼，"習是誰？"這個問題其實早在習近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時，人們就已經提出來了：為什麼是習近平來主政上海？現在人們進一步問：為什麼是習近平當總書記的接班人？

身材高大、臉龐微胖、喜歡穿西服，係花色傳統領帶的習近平，據說不喜歡別人提及其他高幹家庭出身的政壇明星，若有人觸犯禁忌，生性溫和、不好交際的習近平會怫然變色。相對於"團派"形象鮮明的李克強來說，習近平的"太子黨"特徵並不明顯，他與太子黨保持一定距離，在中共政壇上是有名的。

然而，縱觀習近平自 2007 年連跳兩級後的所言所行，給人留下

的似乎在一直都在忙於鞏固自己接班人地位的印象。從"鳥籠熱鬧論"，到痛斥"喫飽沒事幹的外國人"，再到出訪日本所引起的政治風波，都讓全世界以更加審慎的目光打量著這位中國未來領導人。

訪日見天皇惹爭議，到底誰利用誰？

2009 年 12 月 14 日至 22 日，被稱為中國"王儲"的習近平對亞洲四國展開訪問，其中第一站就是日本，而訪日的"重頭戲"則是拜見日本明仁天皇。作為 2009 年中日互動的壓軸戲，此訪備受兩國乃至東亞輿論的關注。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說：12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55 分，習近平副主席乘車比預定時間提前 10 分鐘抵達。他滿面笑容地與前來迎接的宮內廳負責人握手，然後在皇宮"竹之間"殿與明仁天皇會面。

據日本宮內廳透露，天皇與習近平的會見始於上午 11 時，全程 20 多分鐘。習近平對天皇在百忙之中特地安排此次會見深表感謝，並向明仁天皇轉達了胡錦濤主席的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

習近平說，胡錦濤主席去年 5 月對日本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全面推進了中日關係。陛下一直關心中日關係。199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週年之際，天皇和皇后陛下首次訪問中國，給中國人民留下美好印象，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寫下重要一頁。去年中國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後，陛下致電慰問，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給予寶貴支援，體現了陛下和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

明仁天皇感謝胡錦濤主席的問候和祝願，表示："胡錦濤主席去年對日本的訪問非常成功，習近平副主席對日本的訪問將進一步加強日中友好關係。"

日本《每日新聞》隨即發表評論稱，習近平副主席會見天皇是

中日構築長期發展關係的體現。這是日本民主黨執政後第一次接待中國首腦級要人，和中國這樣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近鄰構築良好關係是日本亞洲外交的基礎。

中國《環球時報》報導說，日本明仁天皇繼位20年來已經在皇宮內先後22次會見中國高層領導人日本媒體普遍對此次會見給予了高度關注。有日本媒體將目前中日關係的熱絡與日美因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而引發的摩擦聯繫在一起，稱鳩山天平明顯倒向中國。

就在一個月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將自己亞洲之行的第一站安排在日本。雖然鳩山政府一直強調必須與美國和中國同時發展關係，但與中國領導人正在進行的訪問相比，日本媒體認為鳩山政府的天平倒向是十分明顯的。

《讀賣新聞》評論稱，政府高規格接待習近平副主席，甚至打破慣例促成和天皇的會見，這和日本遲遲不能解決駐日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對美關係形成強烈對比，不得不讓人產生日本向中國傾斜的印象。看完這些報導和評論，要是真以為習近平的訪日及中日關係繼續昇溫的話，或許大錯特錯了。



習近平會見日本天皇

因為習近平訪日前後已在日本引發一場不小的政治風波，而習與天皇會面則正是這場政治風波的導火索。

日本媒體當天報道稱，對於習近平此訪，日方給予了最高級的

"國賓"待遇。但由於安排天皇"從快"會見習近平有違常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日方稱，皇宮方面12月15日的接待形式相對簡單，習近平是以"工作訪問賓客"身份會見日本天皇的。

日本媒體指出，儘管習近平與天皇的會見氣氛十分友好，但日本國內仍對此有不同的聲音。批評者強調，日本政府1995年以文件形式確認，外國要人若希望會見天皇，應提前一個月遞交正式書面申請。而這次中方的會見要求11月下旬才提出，日本內閣在安排這次會見上違規。輿論把矛頭對準了力挺此次會見的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

對此，小澤一郎12月15日下午在東京出席政治籌資集會時重申："雖然有多處被誤解的地方，但我的信念沒有錯。""如果問天皇本人的話，相信天皇陛下也是會答應（與習近平）會面的。"他還再次批評宮內廳長官羽毛田信吾，稱"官員不應對政府決定的事說三道四。應該在辭職後再開口。（羽毛田）沒有隨著政權更迭而改換腦筋"。

首相鳩山由紀夫當天上午也在東京回答提問時表示："非常遺憾（習近平）來訪期間出現這種狀況。對於這樣的貴賓，我們應該舉國歡迎。"

其實，早在習近平訪日前，與天皇會面就已成為日本輿論的焦點。英國廣播公司稱，日本媒體普遍關注鳩山政權迫使宮內廳打破必須提前一個月申請的見天皇規定，破例在不到三星期的申請下，安排習近平見天皇的政治動作。批評人士說，這一做法涉嫌違反憲法規定天皇不為政治利用的原則。

包括日本雅虎在內，在習近平抵達日本的當天，日本各大傳媒就紛紛報道稱，日本政府曾以天皇身體不適的理由拒絕中國要求以中日關係大局為重，讓習近平破例見天皇，此舉更可能引發愛戴天

皇的不少一般日本國民的憤怒。

共同社當天報道說，習近平訪日期間可能出現抗議示威。“大日本愛國黨”等右派組織已經在外務省等政府官廳所在的東京霞關地區舉行了抗議遊行，有近百人和兩輛卡車參加。

他們用中文指責中國通過日本民主黨政府迫使天皇與習近平見面，是侵犯日本國家尊嚴，呼吁日本與中國斷交。

習近平破例見天皇已成為鳩山政權9月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日本最大在野黨——自民黨指責鳩山政權把天皇作為政治工具，全盤否定了二戰後天皇僅作為象徵性的憲法規定。前首相安倍晉三說，習近平見天皇與小澤一郎訪華受到款待是一個套餐，令人產生喪權辱國的憤怒，要求中止習近平見天皇的日程。

12月16日，習近平結束了三天的訪日行程後，作為在鄰國日本的首次政治亮相，習近平此行的預期目的和成效是否達到，還有待觀察，但習強硬要求“特例”晉見天皇而在日本朝野引發不滿，被日本媒體形容成“反效果”和“將來的禍根”。

朝日新聞指出，自民黨在16日設立特別委員會，以調查此次“破例晉見”是否牽涉政治性利用天皇。產經新聞說，新華社等中共媒體對習近平和天皇的會面進行了詳細報導，但對“破例晉見”在日本朝野捅的婁子則幾乎隻字不提 把其歸為“日本國內問題”。

前首相安倍晉三批評民主黨把日皇當成政治棋子。主管皇室事務的宮內廳，指責鳩山內閣“政治利用”天皇，有違日本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對待的原則。而民主黨內部同樣存在異議。民主黨總務副大臣渡邊周12月13日在朝日電視台的節目中批評說：“竟然要求破例接見，被說成是政治利用天皇，我深感遺憾”。

針對政治對手指責鳩山內閣“政治利用”天皇的說法，有日本學者指出，其實恰恰相反，不是鳩山在“政治利用”天皇，而是中國“王儲”習近平在“政治利用”與天皇的會面，來鞏固其接班人的地位。

日本中央大學現代中國問題研究學者水谷尚子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評論說，中方的此次做法是對天皇進行政治利用，這讓日本人很難接受。在日本人看來，習近平為了確立自己在國內政壇的地位，所以需要通過獲得天皇的接見得到顯示。中共政權總是批評日本沒有認真反省過去的歷史，但現在中國的做法卻恰好是政治利用天皇。這讓我們感到很不舒服。

水谷尚子說，習近平現在是中國國家副主席，他在中國政壇上的競爭對手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所以日本人就容易想到，習近平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用天皇。日方不願意參與中國政治方面的矛盾。

為何在訪問德國時自曝“家庭秘密”？

2009年10月中旬，習近平展開歐洲之行，而主持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式，則是其此行的重要任務。10月13日開幕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中國首次以主賓國的身份參加本屆書展，更被視為“繼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舉辦的最重要的對外文化展示活動”。

當時，加拿大《星島日報》刊出文章《習近平文化之旅，演繹價值觀》說，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日前的歐洲之行可說是文化之旅，演繹中國的軟實力。中國經濟騰飛之後，開始注重構建軟實力，輸出自己的價值觀。

習近平在出席開幕式之前曾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不同民族之間心靈溝通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誠如習近平和海外親中媒體所言，習近平的歐洲之行每走一站都在強調中國的軟實力，但與此同時他也在言談中故意表露出自己的“實力”，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軟實力”。這一點，從他自曝“家庭秘密”便一目瞭然。

據報導，10 月 11 日，正在柏林訪問的習近平，參觀了柏林中國文化中心。他向當地文化中心幼兒漢語班正在學習《三字經》的孩子們介紹中國古代經典《三字經》：“《三字經》是中國傳統啟蒙讀本，包含了很多歷史人物和故事，意義深遠，從學習漢字開始，再領悟其中的道理，一生受益無窮。”

在鼓勵小朋友們學好《三字經》的同時，習近平還透露了一個秘密。習近平說：“第二句叫『性相近，習相遠』。我跟你們暴露一個秘密：我的父親，他的這個字，就叫『相近』，（他的姓名）就叫『習相近』。為什麼呢？當時起名的有一個私塾先生，他說：『《三字經》講習相遠，為什麼習要相遠呢？我們習相近嘛，一定要相近嘛。』所以就叫『習相近』。”從習近平的介紹中，我們至少知道兩個秘密：一是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字為“相近”，二是在“習相遠”之外，還有“習相近”一說。

當時，國內曾有人撰文解讀稱，這確實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花絮。習近平在這裏肯定不祇是介紹他父親的字。

中國自古以來都講“性相近，習相遠”—— 人在剛出生時，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很相近，但隨著各自生存環境的不同變化和影響，每個人的習性就會產生差異。《三字經》所謂的“性相近，習相遠”，說的是一種現實存在。無論是同一個地方的不同的人，還是不同地方的不同人，其習性都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個性”。

評論文章稱：我們不得不佩服那個私塾先生的高見，他硬是從傳統的“習相遠”中“挖”出個“習相近”來，十分令人玩味。是

的，從客觀存在的角度看，“習相遠”是個常理。但是，人們為什麼總是處在“習相遠”的環境裏呢？有沒有“習相近”的可能？文章還說，習近平這次出訪，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文化的交流。他



10月12日，習近平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談

先後視察了柏林文化藝術中心、中匈雙語學校、比利時魯汶大學，出席了被稱為“面向歐洲的一次盛會”的“歐羅巴利亞—中國藝術節”開幕式，以主賓國主人的身份出席了世界最大的書展法蘭克福世界書展開幕式。他向有關人士贈送的文化禮品也頗具內涵，他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了江澤民關於環保和能源的兩本新著，向魯汶大學校長贈送了“中華數字學苑”電子書庫。如果加上關於“習相近”的花絮和笑談中國足球的花絮，那麼，習近平這次訪問的文化韻味就十分濃厚了。

其實，習近平所“自曝”的“習相近”從新聞角度看，並無新意可言。有報導稱，復旦大學一些院系的學生住宿已經開始嘗試了“習相近”：一直以來學校都是隨機分配學生住宿，現在則根據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提供的學生心理測評報告，把生活習慣相近、性

格脾氣相投的學生分在一個寢室裏。

但大學生住宿講求"習相近"，引發爭議。贊同者稱，復旦這一做法有其科學性，體現了對學生的關愛，與其說是人為製造"順境"，還不如說是構建和諧校園的一種探索。將"習相近"的學生分配在一屋，可省去許多矛盾。反對者質疑，如此人為製造"順境"，會不會削弱學生適應社會、人際互動的能力？

那麼，習近平為何要在出訪時大談"習相近"呢？筆者認為，大致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在文化交流上，另一個則是在政治方面。

習近平的歐洲之行，旨在加強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則是實現相互間的瞭解、理解和融合。這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因此，習近平在法蘭克福世界書展開幕式上表示，"我們認為，文化的影響力是超越時空、跨越國界的。文化因交流而豐富，因交融而多彩。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各種文明不斷交流、融合、創新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各種不同文明都以各自的獨特方式為人類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從政治層面理解，"習相近"的意思是，無論彼此有多大的差別，通過努力，大家可以求同存異，走到同一條道上，也就是有相同的"性"，所以"習相近"也強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社會主義學者可以認為"習相近"就是達到共產主義階段，消滅國家，消滅階級，按需分配。

當然習近平的"習相近"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含義：一直不透明的中共高層其實是"性相近"的，即使外界經常傳出中共高層內鬥不斷也不是"習相遠"，更應該被理解為"習相近"，因為共同的利益可以讓"習相遠"變得"習相近"。套用一下習近平的話說："為什麼習要相遠呢？我們習相近嘛，一定要相近嘛。"

因事物本來就是矛盾的統一體，習相近和習相遠既矛盾又統

一。當初，習仲勛也把這種對立統一體現在了兒子的名字上，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叫習近平，一個叫習遠平。而對於習近平和習遠平這兩個矛盾的名字，是否還有其它深刻的含義呢？可能衹有習父能給出準確的答案，可惜老將軍已經過逝，謎底或許永遠被塵封。

既然，習近平主動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曝出父親名字的來歷，那麼我們一起來看看習仲勛的經歷，以及他對兒子習近平仕途的影響。

習仲勛的政治品格，與胡耀邦合拍

習近平在十七大脫穎而出獲重用，有十分曲折的隱情，其歷史淵源與胡耀邦有關，也與他父親——中共的開國元老之一習仲勛，在政壇上迭遭打擊的經歷和在逆境中展現的政治品格有重大關係。

習仲勛（1913－2002），陝西富平人，1928 年加入中共。他曾經對夫人齊心自我介紹，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中最年輕的一位。

曾經擔任過胡耀邦秘書的西安異議人士林牧，在《習仲勛晚年的幾件大事》一文中披露：1935 年，朱理志、徐海東、郭洪濤在陝北進行極"左"的"肅反鬥爭"時，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陝北紅軍和陝甘蘇區的創建者就被逮捕，"幾乎活埋了"。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將他從肅反受押中解救出來。1945 年他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後給彭德懷當助手，擔任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又是賀龍的搭檔，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

中共建政後，習仲勛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1950 年進京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他是第一屆政務



習仲勛和齊心

院秘書長，第二屆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直到六十年代初受到毛澤東定案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事件牽連而被撤職拘押。

習仲勛一直顯示不凡的精神氣度，為民請命。五十年代初他就指出，不能抄襲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的鬥爭方式。即使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由習仲勛主政的西北地區殺人指標減少一半，為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60%，保長一級舊政權官員基本沒碰，而在鄧小平主政的四川，保長以上“敵偽人員”全部被殺。1951年，他敏銳發現下級報告中所稱當地“人民代表由選舉產生”是謊言，馬上展開調查，堅決糾正。在他看來，“人民代表將來要進行直選”不可蒙混，也不可動搖。

在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年代，習仲勛告誡周圍的人：“知道的就揭發，不知道的會有人揭發，何必搶著說呢？”高崗事件中，中央高層讓習仲勛“勸降”高崗，他卻提醒高崗不要亂咬別人；他甚至訓斥要與丈夫“劃清界線”的高崗夫人，當場撕毀她寫的“揭發”材料。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革”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

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在《我與習仲勛風雨相伴的55年》中回憶：1943年4月，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範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帶隊人之一齊心，認識了剛剛到任的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

1944年4月28日，在綏德地委後院一個窯洞裏，舉行了習仲勛和齊心的婚禮。證婚人是時任抗大總校教育長何長工，來慶賀的有抗大總校負責人之一李井泉等。

齊心還回憶，西北局書記習仲勛領導土改，抵制“左”的傾向，不許采用挖底財、使用肉刑、侵犯中農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護了開明紳士和工商業者等。

習仲勛有五個子女：長女齊橋橋、次女齊安安、三個兒子習正寧（1998年逝世）、習遠平和習近平。

習遠平和習近平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家裏沒有請保姆，由習仲勛照顧。後來都住校或全托。男孩們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紅布鞋，齊心還記得習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願穿女孩子的鞋子，習仲勛對他說：“染染穿一樣”。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習仲勛搞突然襲擊，習仲勛從九重天跌到十八層地獄，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此後是漫長的審查、關押。1965年，他被調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掛名副廠長，“文革”中又被百般盤查批鬥，還被關進監獄，1975年春才被解除監護，被安置在耐火廠的宿舍區度過三年流放生活，其子女自然也大喫苦頭，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

齊心披露，“四人幫”粉碎後，王震非常關心習仲勛的問題，第一個出面說話要為習仲勛恢復名譽。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組部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錯案。”

齊心說：我第一次見到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方面稱讚了仲勛同志，而葉帥則是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仲勛於 1978 年 2 月 22 日作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出席了五屆全國政協會議，4 月初便被恢復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勛談話之後，中央決定派仲勛同志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耀邦同志原話）。

1980 年 11 月底，習仲勛調回北京，隨後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胡耀邦深感習仲勛思想合拍，行動默契，富有改革理念，有意讓他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主持處理日常繁雜事務。但鄧小平沒有同意，於是習仲勛成為不掛常務書記頭銜的常務書記。一位中共元老級官員透露說，他去見胡耀邦時，多數是先見習仲勛。

制止一場未遂政變，贊同鄧小平退下

1982 年 9 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政治報告，提出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在這個報告中，胡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幟。”曾任胡耀邦秘書的林牧認為，這就是人們今天熟知的“三個有利於”的最初版本。

“左”傾保守主義分子深知胡耀邦這個講話可能產生巨大影響，於是由胡喬木出面，反對發表和下發胡耀邦的講話。胡耀邦遷就了胡喬木，請他修改後再發表，但胡喬木置之不理。這時，習仲勛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二百餘人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歷史會形成一片空白，怎麼給後人交待呢？但胡喬木仍然堅持不許發。

2 月 16 日，胡喬木更把《人民日報》主編秦川和副主編王若水叫到他家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聯繫，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政治壓力，但耀邦同志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耀邦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要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過了一兩天，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會，陳雲一人發言，系統地、異常尖銳地批評胡耀邦。批評的內容，一是盲目追求發展速度。當時耀邦主張工業產值增長 7%，陳雲堅持 4%（後來的實際增長率超過 7%）。二是反對改革，陳雲不贊成城市改革，當然更不贊成“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陳雲憤慨的說：“連一五都要改？”三是，批評耀邦不懂經濟工作，他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的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陳雲發言以後，藉故離開會場，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著出去了。後來胡喬木竟然對耀邦說：“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極。”鄧小平沒有講什麼意見，衹是說：“到此為止。”

左派們並沒有“到此為止”。鄧力群先後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和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傳達了陳雲抨擊胡耀邦的講話。聽了鄧力群傳達的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言年，當晚就把講話紀錄整理出來送給習仲勛。第二天，接替胡績偉的《人民日報》新任總編輯秦川，又把該報記者部主任林鋼聽取鄧力群講話的記錄原本送給

習仲勛。

在這次批胡耀邦的會議上，胡喬木建議立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來解決胡耀邦的問題，其他政治局委員均未表態，會議也就沒有做出開會決定。可是，胡喬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里看到通知後找習仲勛詢問，習仲勛說，他不知道，習又找胡啟立來問，胡啟立也說不知道。總書記、實際上的常務書記和中辦主任都不知道，竟然有人私自發出召開要總書記下台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林牧認為：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是一次宮廷政變。習仲勛和萬里認為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作了工作，鄧小平表示："胡趙格局不能變。"一場未遂政變流產了，但是，發動政變的人，絲毫沒有受到追查和批評。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未有的。

鄧小平同胡耀邦之間的分歧在於是否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實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導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是，胡耀邦贊同鄧小平退下。林牧說，本來，這是胡、趙、萬、習的共同意見；但是，在最後關頭，支持胡耀邦最堅決的是習仲勛。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幹部談話時提出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倡議。胡喬木認為再一次倒胡時機已到，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這些比他（鄧）小十多歲的人，充其量衹能稱之為黨的領導人，而小平可以說是我們黨的第二代領袖。……在我們國家政治制度面臨轉捩關頭，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政治領袖繼續領導我們完成這個轉變。"王震、楊尚昆、彭真、廖承志發言支持胡喬木的意見。

胡耀邦則直率地說："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大家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

衹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同志讓路。"

據林牧披露：習仲勛發表了"充滿現代民主意識、毫無黨腔黨調的精辟見解"，其看法之超前，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屬大膽。習仲勛這樣說："法治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實際上，今天這個會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間選擇。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一是恢復和繼續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偉大領袖發號施令，用計劃經濟甚至專營的辦法去解決經濟領域層層盤剝的問題，靠學習領導人講話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決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問題，用加強紀律去解決思想、理論、文化界的是非問題，如果還是這樣，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歲也解決不了我們的體制轉變。"

習仲勛講到這裏，王震按捺不住："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還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同志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

萬里說："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想糾正一下，現在要樹立的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最高的權威。"

楊得志、烏蘭夫、倪志福發言贊成鄧退下來；彭真提出上了年紀的都退，只留鄧小平一人當代表，陳雲、宋任窮贊成彭真的意見。鄧小平眼睛盯著趙紫陽指名要他表態，林牧說"趙只好說了幾句違心的話，胡喬木又趁機起鬨"。這時，習仲勛旗幟鮮明、措辭尖銳："防止封建專制披著革命的外衣頑固的盤踞在統治地位。……從現在起，我們應當堅持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為了改革，為了前進和發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實行退休制，就會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鄧小平冷冷地說："說穿了，你們是不希望我再過問中央的事，

嫌我干涉你們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幹，一退到底。”

習仲勛馬上說：“不是這個意思，耀邦和我沒有嫌小平過多干涉我們工作的意思。我衹是從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出發來講這番話的，同時也考慮到小平的健康。周恩來同志由於工作太勞累，活了76歲，就過早地離開我們，毛澤東同志雖然活了82歲，但有幾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的行使領導職能，所以我們必須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啊！”

會議沒有達成一致決議，不歡而散。可是鄧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馬的決心就此下定。據說：就在這次會後，王震對鄧小平說：“誰讓你下台，就讓他下台。”鄧小平點點頭：“那些做夢都想讓我下台的人，矛頭必然要針對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我們必須堅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你們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

1986年年底，安徽、上海、北京相繼鬧起學潮。12月30日，胡耀邦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準備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當前時局的意見。鄧小平發脾氣、摔電話，不許開常委會，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談話。鄧認為學運的發生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鄧小平越說火氣越大，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

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發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鄧小平家裏，彭真、陳雲、王震、薄一波緊鑼密鼓地策劃宮廷政變。胡耀邦還蒙在鼓裏。三個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離開中共書記處的習仲勛，憑政治敏感已覺察到危機迫在眉睫，

乘新年探問之機提醒：“耀邦啊，我在為你擔心！”胡耀邦不在意：“我嗎？不會有什麼，黨畢竟已經成熟了。”當天夜裏，胡耀邦辦公桌上的紅機響起，是趙紫陽打來的：“耀邦，你現在幹什麼？”胡耀邦說：“還在研究學潮問題，我試圖尋找一種更穩妥的解決當前危機的新路子。”趙說：“我勸你先別忙著幹別的，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你讓我檢討什麼？”趙紫陽急了：“耀邦同志，現在黨內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眾望所歸的政治家、軍事家，我們應該儘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講，我們黨再也經不起窮折騰了，你難道願意看見我們黨再面臨一次分裂？”“再拖幾天就晚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趙的建議，求見鄧小平。談到分歧時，鄧小平擺擺手說：“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範圍，我們之間沒有必要再糾纏了。我打算召開一次中央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來談，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通知，到中南海小會議廳開所謂“生活會”，會議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開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檢討”。耀邦只講了一兩分鐘，彭真就打斷他的話，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打得火熱”。楊尚昆接著說：“如果你想亡黨亡國的話，那你就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震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不必待在這裏了。”薄一波說：“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二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歷史上幾位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逛景，嘩眾取寵。”鄧小平說：“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讓

辦公廳的人通知我參加，我偏不去！我在別人面前不敢擺架子，在你面前還是有資格的。”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對待小平同志的態度。”

兩天以後召開第二次所謂“生活會”，政治局又有幾個人被邀請參加會議，其中有習仲勛、喬石、李鵬、胡啟立。李鵬先發言，他說：“由於耀邦同志放鬆思想領域裏的領導權，導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濫。”接著，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辭職，王震認為彭、薄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想法。



習仲勛

首次被通知參加“生活會”的習仲勛忍無可忍，站出來指著薄一波、彭真、王震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他拍了桌子：“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幹法！”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幹我就辭職。”

鄧小平板著面孔對習仲勛說：“我當然不是說中央召開的高幹部生活會上要討論耀邦同志總書記職務的去留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決定。但是，難道不可以在生活會上發表一下個人的看法嗎？近些年來，耀邦，也包括仲勛同志大講特講民主和自由，為什麼今天在黨的生活會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沒有了呢？所以我歷來講，那些越是口頭上講民主的人，其實並不想真正給大家民主，而衹是允許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這種『自由化』衹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就是這個道理。”

在第一次“生活會”上，鄧小平就決定停止胡耀邦的總書記的職務；在第二次“生活會”上，又確定了令胡耀邦辭職。實際上，政治局也無權罷免總書記，因為總書記是由中央全會選出的。

習仲勛 1988 年 4 月被選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耀邦晚年體會到世態炎涼，視習仲勛將個人沈浮置之度外的支持為十分難得的慰藉，非常珍惜。

“六四”以後，習仲勛更在 1990 年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指名批評對民主學潮訴諸武力的鄧小平和楊尚昆。

但習仲勛在最高決策圈逐漸邊緣化，身體也惡化，於 2002 年逝世。習近平一位朋友透露，父親病危期間，至孝的他一直服侍在病榻前，父親對他更多不是“言傳”，而是“身教”。

據齊心敘述，習仲勛恢復工作後，自己是由在清華讀書的兒子近平陪同去河南洛陽辦理手續。這間接透露，習近平對父輩的坎坷遭際有切身感受。

趙紫陽 2005 年 1 月去世後，習仲勛的遺孀齊心不避嫌，以其個人和“率子女”的名義向趙家送上花籃。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習仲勛的態度，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其子女的態度。

父親挨整，兒子成“反動學生”

1953 年 6 月，習近平在北京呱呱墜地。

此前一年（1952 年），他的父親習仲勛剛剛從西北局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並同時兼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習近平三個月大的時候，父親習仲勛又奉調擔任了中央政務院的秘書長，成為周恩來總理的助手之一。

習近平六歲的時候（1959 年），他的父親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繼續兼任國務院秘書長。不過，習仲勛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滿 10 年的時候，一場橫禍，從天而降。

1962 年 9 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他人創作的小說《劉志丹》存在所謂的“反常問題”，遭康生誣陷，被中央免去所有重要職務。從 1962 年 9 月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習仲勛同志受到審查、關押、監護等殘酷迫害，前後長達 16 年。

習近平的童年、少年，半是陽光，半是陰霾。

文革爆發之前，習近平在北京八一學校讀書。這是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寄宿學校，它有“響亮的名字”和“光榮的歷史”。1947 年初，解放軍開始全面反攻，戰爭形勢要求部隊輕裝前進。為保障革命後代和烈士遺孤的安全，為培養教育後代，在聶榮臻司令員的關懷下，1947 年 3 月，一所因陋就簡的寄宿制學校，在戰火硝煙中誕生了。1949 年，八一學校隨著解放軍的勝利步伐，遷入北京。

據北京八一學校網站介紹：學校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軍區榮臻學校。在聶榮臻司令員的關懷下，1947 年 3 月 1 日創建於河北省阜平縣向陽莊（原名：溝槽村），1949 年隨解放軍的勝利步伐進駐北京。

校方簡介還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學校的建設與發展始終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至今校史館內還珍存著開國元勛、解放軍高級將領和老一輩中央領導同志的題詞。網上流傳的一篇由北京一



習仲勛與兒子近平、遠平

零一中學老師撰寫的“我所認識瞭解的中共高幹子弟”一文寫道：待中共定都北京，情況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北京，按兩條渠道成立了幹部子弟學校。一類是地方幹部子女進的；像景山小學、育英中學，劉少奇同王光美生的孩子都在那裏上學。

另一類是部隊的。最知名的兩所部隊高幹子女寄宿制學校是北京十一學校和北京八一學校；前者隸屬中央軍委，後者隸屬華北軍區。朱德、蕭華等人的子女都在“十一”；葉劍英的小女兒（生於 1950 年）開始在“十一”，只在初中上了一年，但因其父不同意男女同班，便於次年轉入男女分班的“八一”去了。

隨著 1967 年 1 月全國奪權風暴的日趨白熱化，文革紅人終於大開殺戒。中旬以後，石油附中、清華附中、人大附中等校接連被抄被砸，學生被抓。八一學校被視為“聯動”的最後據點和堡壘，成為他們的重點打擊目標。

在八一學校也同樣“天下大亂”後，習仲勛的“反黨”問題本來還是“內部問題”，一下子轉為盡人皆知的公開事。14 歲的習近

平衹是稍微表達了一些不同意見，立即被打成“反動學生”，遭到殘酷折磨。

1968 年，毛澤東發出了上山下鄉的號召，不滿 16 歲的習近平決心響應號召，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以此證明自己絕對不是“反對學生”。於是，他回到了父親的老家——陝西省富平縣，他想投奔父親的親戚們，因為他們都是貧苦人出身的“紅五類”。

可是，親戚們因為政治壓力大，竟然不敢收留他。返回北京，那豈不是證明自己不願意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尚未成年的習近平萬般無奈時，想起了父親曾經工作和戰鬥過的地方——延安。

由陝西電視台和陝西老三屆企業集團聯合錄製的紀錄片《老三屆故事》之習近平故事——“苦難鑄風流”解說道：苦難有時會成為一種財富，老三屆整整一代人所擁有的秉性和品質，正是那段特殊經歷所賦予他們的特殊饋贈。這些或許會在成功者身上找到答案。

梁家河是習近平插隊的地方，文革中他的政治生涯被判了死刑。這位“黑幫子女”硬是憑著苦幹，贏得了老鄉們的信任。

“陝西光榮與驕傲：看從陝西走出的國家領導人”網文也介紹了習近平的這段經歷：1969 年，年僅 16 歲的習近平來到陝北插隊，並和樸實的老鄉成為朋友。時至今日，他都難以忘記那段在梁家河村度過的歲月，他說：“這段時期就成為我人生的一個轉捩，可以說陝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歷歷在目，現在有很多思維行動都和那時候有關聯，就像賀敬之那句詩『幾回回夢裏回延安』。”

在這個陝北小山溝裏，習近平這個名字，是家家戶戶再熟悉不過的名字。他們說，“習近平是從我們梁家河村出去的。”

梁家河村的老支書老梁回憶說，習近平每天書不離手。很快，習近平已經學會鋤地、送糞，一挑兩個簍，100 多斤，走路最快，上山還跑，“他個子高，跑得比誰都快”，老梁回憶道。

1973 年，習近平在梁家河村寫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1974 年 1 月，習近平順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他就當了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

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石陽春說，在習近平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後，梁家河的面貌就發生了明顯變化。他在原來的旱地打了兩口井，把旱地變成良田，接著就是改變地理條件。從水渠開始，前後修了五個大壩，打壩造田。

習近平一年四季為了隊裏的事忙得顧不上自己，村裏的老鄉們便拉著他去自己家喫飯。習近平當年的房東說：“我們家有八口人，連他九口人一塊喫飯，你做什麼 他喫什麼，不嫌髒 ，也不挑食，反正習近平和我比較合得來。”

這段紀錄片還說：習近平與這方土地，與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當他被推薦上大學時，全村男女老少都來為他送行。“在他走的那一天，我們梁家河的男女老少，不用人組織都來送習近平。兩邊站滿了人，開著一輛手扶拖拉機把他送出村口。”

好多年以後，已經擔任領導職務的習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他對老鄉們說：“梁家河窮，就是因為缺少文化。”他為這裏聯繫興建了一所希望小學，他還說有機會一定帶著自己的家人回來。

開小差，蹲“學習班”，上清華大學

其實，習近平在剛到梁家河插隊時，還有一段“開小差”偷偷跑回北京的歷史。《看天下》雜誌有一篇文章曾這樣介紹說：當初親戚們都不敢收留的習近平，雖然在梁家河村落下腳來，可因為當時他年齡小，舉目無親，特別是思想上仍有抵觸情緒，因此剛插隊時，別人天天幹活，習近平卻很有些隨意，勞動並不十分積極。

幾個月後，消息閉塞的習近平又回到了北京，他想打探父親的消息。結果，消息沒有打探出來，他自己又被“四人幫”關進了所謂的“學習班”，直到半年之後，才被放出來，此時的習近平，真有點走投無路了。

就在習近平考慮要不要回農村的時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姨父——一位原東北大學的大學生、“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姨父說：你知道嗎，共產黨在最困難的時候，總是想方設法往群眾那裏“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還能依靠誰？

聽完姨父的話，半是明白，半是懵懂的習近平，返回了“陝北邊區”。

習近平曾經對自己的插隊生活有過詳細的回憶，他說：“回去以後，我也努力學習著和群眾打成一片。時間大約是1970年，我跟群眾天天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過了，老鄉見我轉變了，對也好了，到我住處串門的人也多了，我住的那間屋子，慢慢地變成了我們村裏老鄉聊天、侃山的中心。”

“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後，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他們願意聽城里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村裏的黨支部書記遇到什麼事，也喜歡找我商量，他說『你雖然是個年輕人，但見多識廣，比我懂得多。』就這樣，我在村裏逐漸有了威信。”

但最奇怪的是，當初在北京被定為“反動學生”的習近平，跑到陝北農村，卻先後入了團入了黨。習近平回憶說：在農村插隊的時候，“我已先後寫過10份入黨申請書，但由於父親的原因，上級都不批准。那一次，公社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了縣委去研究。延川縣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習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大隊）姓氏矛盾挺複雜，如果是本地人當書記，恐怕很難處理得好，我看，

這個村確實需要他去主持工作。他爸爸習仲勛的結論在哪兒？目前還沒有？那好，沒關係，他爸爸的問題，應該不影響他入黨……”

結果，“黑幫子弟”習近平競然被批准入黨，然後又當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習近平感嘆道：“我感覺自己好幸運，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那麼一番折騰，這個村子裏的老鄉居然需要我，離不開我了。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覺得在農村好啊！如果我當初不去陝北農村插隊，而是賴在北京，就算進了工廠或者去了東北、內蒙古的生產建設兵團，文革氛圍下，這些地方的運動也會比農村搞得厲害，我少不了還是要天天挨批判。在陝北農村，雖然也要搞大批判，也要批『劉少奇、鄧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批『彭（德懷）、高（崗）、習（仲勛）』，但搞大批判的時候，還是常常由我來念報紙。我天天念，念得司空見慣了，也就無所謂了。”

“而且，陝北的老百姓非常樸素，也非常理解我，畢竟，那裏是我父親過去參加紅軍的根據地。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的蘇維埃主席，他當主席的時候，也才19歲。有了這個背景，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暗中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自己也變得比較堅強了，所以，最艱難的時光，就那麼過來了。”

習近平出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不久，便帶領社員到寨子渠“打壩”（維護水渠）。陝北的冬天，天寒地凍。打壩，河渠裏冰塊很厚，不處理掉，壩基不穩，春天一融化，壩就塌了，會勞民傷財。工地上，習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塊”的動員，可是渠道裏半是渠水、半是冰塊，社員們誰也沒有行動。習近平二話不說，第一個跳進冰水裏往外搬冰碴。幹了一陣，群眾感動了，紛紛脫掉棉襖、棉褲下水，跟著黨支書幹了起來。

後來，習近平曾對《中華兒女》的記者說：“我的成長、進步，

應該說是從陝北插隊開始的，我插隊七年，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是什麼，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鍛煉很大，後來不管遇到什麼困難，衹要一想起插隊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為什麼不能幹？現在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呀。一個人要有一股子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敢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那你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1975年，推薦上大學的機會再次來了，那一年，延安地區有兩個清華大學的名額，其中一個名額，被分給了延川縣。

當時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也報了名，而且志願表上的三個志願，全都填的是清華。習近平回憶說，“我當時想：你讓我上，那我就上清華；如果上級領導不推薦我上，那就拉倒。”



在送習近平上大學時，梁家河村民和習近平的合影

（前排中為習近平）

縣裏把所有被推薦者的材料，全都報到了延安地區，當時，延川縣教育局的領導，仗義執言，為習近平努力爭取。可是，清華大學到陝北招生的同志，卻不敢做這個主，於是打電話請示清華大學的校領導。

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的那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緊跟“四人幫”的遲群、謝靜宜，恰好都不在學校裏，相反，緊跟鄧小平的劉冰同志，正好在清華大學掌權，劉冰說，（這個人）可以來嘛。

習近平回憶說：“當時，我父親正在下放勞動，下到了河南洛陽的耐火材料廠。這個耐火材料廠的領導也很大膽，居然幫我開了個『土證明』，證明說：『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就憑這麼個證明，我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有一些知識青年沒有離開農村，他們都特別羡慕我。不過，留下來的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1977年一恢復高考，他們幾乎都考上了大學，而且還都是前幾名。”

在劉冰的支持下，習近平的清華錄取通知書，終於寄到了梁家河大隊。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沒上山幹活，排了很長很長的隊伍，送支部書記上路，送了十多裏，社員們還在送。習近平哭了，說：“你們對我這麼好，我不想走了，就在這裏幹一輩子吧。”

一位和習近平非常要好的青年農民，大聲對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華大學，我們就有條件去北京，要不然，我們去了北京沒有人管我們的飯。為了我們將來能夠去北京看你，你非得走。”

這之後，送行的社員才依依不捨地回去了些，但十幾個年輕人，仍然堅持步行60里，一直把習近平送進了縣城。晚上，習近平又和這十幾名青年農民擠在國營旅店的一間平房裏，打地鋪睡。第二天，習近平帶著青年社員們到照相館拍攝了紀念照。照相的費用是5.50

元錢。習近平付錢時，社員不讓，你三角、他五角就湊夠了。

習近平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切。他說，“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老三屆這一茬人，影響相當深遠，在我，則是一種情結——黃土地情結。從插隊之後，遇到困難時，衹要一想起插隊的生活，我就會感到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畢業進中央軍委，為何要求下基層鍛煉？

雖然，中國媒體在介紹習近平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時，都沒有使用“工農兵學員”這幾個字，但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要是一沒關係，二沒後門，三沒個人表現，是很難成為“工農兵學員”的。而習近平上清華這段經歷，便是最好的證明。

正是這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工農兵學員、幹部子女、學制縮短、學業荒廢、水平不高，等等，中國媒體在介紹習近平的政治生涯時，都不約而同地跳過了他在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上學經歷，把這三年半的大學生活一筆帶過——

1975 年 10 月至 1979 年 4 月，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學習。在清華，習近平一心撲在學習上，功課相當出色。

1979 年 4 月畢業的時候，中國的大形勢已經天翻地覆。《中華兒女》介紹說，從 1978 年 4 月起，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先後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務，成為推動廣東改革開放走在全國最前列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習仲勛這一時期的工作，得到了鄧小平的大力支持和充分好評。

習近平從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普通班畢業後，分配到中央軍委辦公廳，擔任當時的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耿飈的秘書。

對習近平一畢業就進入中央軍委給耿飈當秘書這段經歷，一些

知情人士和評論人士指出，不是太子黨，不靠老子，誰能一畢業就“一步登天”進入中央軍委呢？！況且，習衹是一個普通的工農兵學員，學的又是化學工程，其專業跟軍事沒有一點關係……可見，當時坊間對習的評論和議論都很負面。

迄今有關習近平的生平資料，包括官方資料，都對習近平給耿飈當秘書這段經歷諱莫如深，甚至北京大媒體介紹他的從政履歷，只從 1982 年當正定縣委副書記算起。不提他在軍委的經歷、軍銜，沒有見過一張軍裝照片。官式履歷只提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現役）”。

也許是受這些負面輿論的影響，也許是感覺到壓力越來越大，習近平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幹了三年後，就於 1982 年“忽然”向時任國防部長耿飈提出：我想回地方、下基層，再鍛煉鍛煉。這是說法之一。

後來，北京曾流傳另一種說法：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國和英國已開始就收回香港主權舉行談判，耿飈在香港駐軍問題上和鄧小平意見不和，便離開了國防部長崗位。當時，耿要小習另投他人，說跟著自己不會有什麼前途了。於是小習就到河北省正定縣做了縣長。

對於以上兩種說法，北京觀察家指出，顯然後一種更可信更實際。

其一，太子黨出身的習近平“好不容易”一畢業就進了令人羨慕的中央軍委，再加上父親的人脈關係，可謂前程似錦，他不會輕易放棄。

其二，耿飈在 1979 年 1 月，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81 年 3 月任國防部長，1982 年 5 月任國務委員。耿飈當了 14 個月的國防部長，

便成為新增設的“國務委員”。北京觀察家指出，耿飈離開軍委，昇任國務委員前，給秘書習近平一個更好安排——再到基層鍛煉鍛煉，會比在中央軍委更有前途。

至於鄧小平與耿飈在香港駐軍問題上的矛盾公開化，黃華回憶錄《親歷與見聞》也曾介紹過。中英談判期間，耿飈在回答港媒關於是否可以不駐軍的問題時，不經意答了一句“也可以考慮不駐軍吧”。第二天香港報章頭條就是解放軍不進駐香港。同時，鄧小平還聽說，黃華也曾接受過香港記者的採訪，並在採訪中談到了香港問題。

所以就有了眾所周知的，鄧小平向大批香港記者澄清駐軍問題，並怒罵“耿飈、黃華胡說八道”的事情來。不過，後來鄧小平得知黃華沒有說過駐軍問題後，專門借與包玉剛會見之際，公開向黃華致歉。

黃華針對這件事，專門辟了一大段來敘述，並在書中專門提到一些鄧小平怒罵的細節：當時，鄧小平先罵耿飈是胡說八道，隨即，坐在鄧旁邊的“主管香港交涉事務的副總理”插話說：還有黃華。正在氣頭上的鄧小平，於是也罵多一次胡說八道，並也點上黃華的名字。

從這段歷史中至少可以看出，當時鄧小平怒罵耿飈，已讓耿感覺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快結束了，從而才有了坊間流傳的“跟著自己不會有什麼前途了”，“耿飈讓習近平另尋它路”的說法。

不過，2000 年夏天，習近平曾這樣披露過當時自己決定“下基層”的經過：

“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這一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下到河北之前，是給耿飈同志當秘書，他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耿飈同志當時也曾挽留我說，『如果你想下基層，我支持，不過你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

習近平說：“那時候，主動提出從北京下去的人，就是劉源（劉少奇的兒子）和我。他是七七級的，首都師範大學剛畢業，也是堅持要下去。我呢，是在中央機關工作了幾年，也要下去，我們倆是不謀而合。”

“劉源當時去了河南。走之前，我們還在北京一起參加了好幾個聚會。許多人對我們的選擇不理解，問我怎麼到了 82 年還想下去？要知道，我們這些老三屆，那時候剛從紅土地、黑土地、黃土地、綠草原上回來，回到北京的時間並不長。有些人認為，文革喫夠了苦頭，現在可不能再『虧待』自己了。還有一些人甚至存在著要『補償』的心理，尋求及時行樂，可是，我還是忘不了基層樸實的農民。對於某些幹部子弟對我的不理解，我也感到悲哀。”

習近平還說：“我們有些幹部子弟，就是離不開北京。生怕去了外地、去了基層，就會把北京的戶口再次丟了。讓我說，我們在文革中上山下鄉，那是迫不得已。但就是這種『不得已』，也使我們學到、體會到了很多的東西。現在，各方面的條件比文革時好多了，難道我們不該去更好地奮鬥、努力，幹一番事業麼？”

這樣，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的習近平，下放到河北省正定縣，擔任了縣委副書記。《中華兒女》的文章寫道：從河北正定起步，習近平一步一個腳印，一直堅定不移地走到了今天。

正定起步，南下福建成仕途轉捩點

1983 年春，習近平來到河北正定縣，一共幹了三年。有評論說，習近平在正定縣積纍了豐厚的經驗。

當時年近 30 歲習近平，到正定縣任縣委副書記，不久又提任了

縣委書記。中國紅色旅遊網有篇文章說，習近平在正定縣任職期間，廉潔奉公，工作扎實，也很有魄力。時間不長，就千方百計地爭取到《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榮國府等外景工程來正定建造。如今，這裏的旅遊事業從少到多，已成為全縣經濟很有特色的支柱產業。

後來，“榮國府”這根“火柴”點亮了正定的旅遊業。1992 年春節，正定縣請習近平回去參觀，縣裏幹部眉飛色舞地告訴這位前任縣委書記：“正定的『榮國府』發了，旅遊收入一年可得 1000 多萬元。”

正定縣官方網站有篇文章，記錄著幾位“老幹部回憶習書記”。文章寫道：八十代初，習書記在河北正定縣委擔任過正、副書記，在此工作時，無論在幹群中的印象，還是在社會上的影響，都反映他是個“樸實清廉，尊老敬賢”的好幹部。老幹部們評價說：“他雖是年輕的高幹子弟，但不怕喫苦，沒有架子，非常樸實”。

八十年代初期，當時國家還不富裕，他總是穿著一身舊軍裝。和全縣下鄉幹部一樣騎著自行車去下鄉，到村裏就喫農民家常飯，在縣機關則在食堂。有時下鄉回來晚，機關食堂下班，他就回到宿舍喫方便麵。生活標準極其儉樸。

在工作生活上，他非常關心老幹部。他對老幹部局長說：“老一代革命幹部是今天中國的財富，今後你晚上閑暇家中沒事，就到我這裏來，如我沒事，咱倆就去看望看望全縣的老幹部。我準備在這段時間裏，把縣裏的老同志都看看。”

有一天晚上，他和老幹部局長去看望老幹部李長青、祁勇等同志，瞭解到老幹部們退休後的文化生活很單一。回來後，為調劑好老幹部的退休生活，歡度晚年，習近平同志和其他領導商榷：把縣委、縣政府的大會議室讓出來，作為老幹部的“活動室”。在這裏讀文看報，開展文化娛樂活動。這年春節老幹部座談會、聯歡會都

是在此召開，老幹部們的退休生活從此以後開心舒暢。

一年後工作條件改善了，在縣委、政府的部、室、局等部門，都還沒有進口轎車的時候，他就先為老幹部局配備了一部進口轎車，為老幹部們生活服務專用。他自己後來購置的是一輛北京 212 吉普。這兩件事在今天看來或許沒什麼特別，但在當時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縣級機構是不容易做到的。

文章還說，在習近平臨調走前的一次工作會上，大家還不知情，他把要調走的事給大家說了，這時，會場頓時鴉雀無聲，肅靜下來，一時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好。後來，舊任正定縣的老縣長王世恭、老區委書記祁勇同志發了言：“習書記，說實話俺們都不願意把你調走哩！”

從官方公佈的習近平簡介中，不難看出 1985 年南下福建是一個關鍵轉捩點。這一年，他出任中共廈門市委常委、廈門市常務副市長等職。此後，他歷任中共福建省寧德市委書記、寧德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福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省長等職務。前後在福建工作了 17 年。

有人曾這樣概括習近平的從政之路：從陝北農村大隊支書做起，在河北正定正式起步，在福建政壇走向成熟。

習近平平時常把蘇東坡在《晁錯論》中的一段話掛在嘴邊：“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

福建 17 年是習近平從政履歷上的濃重一筆。積纍了地方各個行政層級的工作經驗。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說，“從河北到廈門，32 歲進入特區，這一步是一個很大的跨度。”在以後的 17 年裏，他主政寧德、福州等重要地區和城市，並在 1999 年昇任福建省長。

"我當時很踴躍地到廈門來啊，就是想來嘗試對改革的實踐、對開放的實踐。"習近平曾談及他到廈門的初衷。

習近平後來還回憶說"我的32歲生日是我在廈門當副市長履新的時候度過的。就是那一天，廈門市領導說給你接風，你今天上任了。我說今天恰恰是我的生日"。

習近平到任不久，遇到經濟過熱，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治理整頓，"大氣候不利於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變，希望我來了以後帶著大家變。我衹能講，治理整頓也是一種機遇，把大家心氣提一提。我當時主要的思想是：這時候不能炒熱。所以，我采取的辦法是小火燒溫水，常燒不斷火，有時還給添點冷水，而不是燒三把火。他們給我講閩東要幹三件大事：開發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溫鐵路、撤地建市。我說，這些事要慢點來，因為我們的經濟基礎薄弱，不可好高騖遠，還是要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多做一些紮紮實實打基礎的工作。"

據跟習有過接觸的福建人士透露，在福建期間，他引進台資的力度很大，在他任上，全國第一座台商會館——廈門台商會館竣工並開始招商。


習近平

習本人對這段經歷很看重。他曾坦言，那是他第一次親歷城市的管理和發展，加上特區工作無經驗可鑒，在廈門的三年是最艱苦的學習過程："在廈門工作的三年，我感受很深、獲益很大。應該說，這三年的特區工作歷練，對我後來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

官方媒體稱，在福建主政期間，習近平一直倡導閩台合作。他曾在很多場合提及，閩台合作是篇大文章，必須做好。據有關人士透露，在對台經貿合作方面，習近平的作為頗受高層認可。也是在那個時期，習近平提出了政府要建設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務，有所為有所不為，做那些不錯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

1990年習近平調任福州市委書記，在福州市委大院裏，四個大字——"馬上就辦"十分顯眼。習近平曾向媒體解釋："『馬上就辦』不光是對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要求人們審慎地作出最快反應。每個人都有這種敏感，福州的事業才會保持年輕。"在傳媒眼裏，習近平是位改革人物，有時代感、思想解放。

除了在廈門和福州兩個主要城市任職外，習在寧德地區的反腐工作曾名震一方。當時習近平是寧德地委書記。寧德屬經濟落後地區。按舊習俗，蓋房、修墳、娶媳婦被稱為人生三件大事。習任前的好幾年，很多幹部蓋房缺錢，就以權換錢。習到任後，確定把"敢於碰硬，敢攻難點，抓反面典型，拔釘子戶"作為查處的突破口，以鐵腕之力剎住了這股建房風。

"這裏有一個誰得罪誰的問題，你違紀違法佔地蓋房，為一己之私破壞了黨的權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黨，得罪了人民，得罪了黨紀國法，而不是代表黨和人民利益查處你的幹部得罪了你。"習近平在地委工作會議上這樣說。

"人民所關心的事情就是我們關心的焦點，人民群眾不放心的事情、不滿意的事情就是我們過失的所在。"這是習近平曾說過的一句話。在福建出任省長期間，他治理餐桌污染一時成為全國佳話。當時，他向福建省老百姓莊嚴承諾："三年的時間，全省23座城市基本上實現治理餐桌污染的目標；五年的時間，全省範圍基本實現

治理餐桌污染目標。”

習近平還記得第一次到福建時的那種感受：“當時福建整個形勢比我想象的要欠發達一些，我是1985年6月份到廈門上任的，從福州到廈門一路走了8個小時。交通條件比較差，道路比較狹窄，到了廈門以後呢，感覺也是出乎意料，過去說是海上花園，但是我看到的市容市貌，都是顯得比較陳舊一點，所以廈門的同志也跟我說，美麗的廈門島好像是一個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

南下福建後，習近平一直保持低調。他曾透露說，已拒絕了100次以上的個人採訪要求，他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不標新立異，突出個人，他主張“笨鳥先飛，滴水穿石”。

二婚娶彭麗媛，成全國娛樂話題

習近平的第一次婚姻，一直不被外界所知，但自從娶了在中國久負盛名的少將歌唱家彭麗媛後，這段婚姻便成為老百姓津津樂道的娛樂話題了。尤其是在習近平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有關他與彭麗媛鬧分居鬧離婚的消息，曾吸引了全國網民的眼球。為了給這位“王儲”消去負面影響，官方輿論機器一度開足馬力，高調宣傳兩人的愛情故事。

網上有評論稱，環顧中國政壇，除了習近平，還沒哪位領導人享受過媒體大張旗鼓的宣傳，來讓全國老百姓分享愛情的“待遇”。由此可見，習“王儲”的婚姻成敗，早就被提陞到政治高度。

於是，有關習近平和彭麗媛的愛情故事，便在互聯網上鋪天蓋地了，當然全是正面報道，全是讚美愛情：

彭麗媛15歲考入山東藝術學院中專部，18歲參軍到總政，後考入中國音樂學院聲樂系，攻讀大專、本科直至研究生，獲碩士學位(國聲樂專業最高學歷)。她是國家一級歌唱演員，全國政協委員。

20餘年的舞台生涯，彭麗媛為什麼總是光彩照人，有什麼秘訣？她坦言道：“這跟我的家庭有關，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難的話，我能有這個光彩留給大家嗎？”對於事業和家庭，彭麗媛的態度很鮮明：“一個女人，事業和家庭都很重要。若叫我為事業，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覺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靜的港灣。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樣，是一個普遍的家庭，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官方媒體稱，有的人朝夕相見相知甚淺，有的人初見一面就相見恨晚。彭麗媛和習近平就屬於後者。本來，彭麗媛最不喜歡那種媒妁之言介紹式的戀愛婚姻。她想象中的愛情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浪漫。在她的心靈深處，意中人既有清貧的書香之氣和質樸無華，又有寒門天才的自信與傲骨。然而，她自己也沒料到，命運安排給她的伴侶卻是一個高幹子弟。



習近平與彭麗媛

1986年底，朋友給彭麗媛介紹了個對象。當聽說此人在廈門工作時，彭麗媛說：“兩地分居怎麼辦？”她本不想接觸，但聽朋友說此人“出類拔萃”時，才答應見見面。當時彭麗媛已在歌壇擁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

軍總政歌舞團國家一級演員。早在1982年她就已參加中央電視台第一屆的春節聯歡晚會，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獲得滿堂彩。

見面當天，彭麗媛故意穿條大軍褲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驗一下對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見面，彭麗媛心灰意冷，對方土裏土氣不說，還非常顯老。誰知那人一開口就吸引了她。他不問“當前流行什麼歌”、“出場費多少”之類，開口便問：“聲樂分幾種唱法？”彭麗媛回答後，他又問：“很對不起，我很少看電視，你唱過什麼歌？”“唱過《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聲，“這歌我聽過，挺好的。”也許這就是心有靈犀。女友在樓下喊她，她沒有走。她不僅同他談了很久，還和他約定了下次“不見不散”。彭麗媛說：“當時我心裏一動——『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嗎？他純樸又很有思想。』後來他告訴我，『和你相見不到40分鐘，我就認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兩顆心更加被對方強烈地吸引著。習近平坦誠地告訴她：“我從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幾個小時都不能顧及家。”彭麗媛說：“事業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兩者相輔相成。”談歷史，談現在，談中國，談國外，談生活，談追求。臨別時，他深情地對她說：“雖然我們都受過很多苦，但是我們都保持了原有的純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見……”

後來，家庭出現了一些阻力。彭麗媛的父母不願女兒嫁給高幹子弟。他們認為高幹子弟中不乏紈絝子弟，不想攀高結貴，更不願女兒受委屈。習近平安慰彭麗媛：“我父親是農民的兒子，很平易近人。我家的孩子找的都是平民的孩子，況且家庭不能跟我們一生，我會向你父母解釋清楚的，他們會接受我的。”

1987年9月1日，彭麗媛和習近平舉行了簡單的婚禮。當時，身在京城的彭麗媛接到遠在廈門的習近平的電話，幾句話商定後，

她到單位開了張介紹信，坐上飛機直飛到廈門。一下飛機，習近平就帶著她到照相館去拍結婚快照。負責結婚登記的工作人員登門服務，到家裏給他們辦結婚證。接著習近平給市長彙報，市長立即向市委、市政府領導發出電話邀請：“晚上7點，集合喫飯。”

晚上7時許，新娘新郎準時恭候，迎接客人。市政府秘書長先到，他認出了彭麗媛。秘書長與習近平握手時不解地問：“她怎麼來了？”習近平說：“她是我愛人。”同事們陸續來了，望著牆上的大紅“喜”字，再相互瞧瞧，都有些納悶。習近平又忙著介紹：“這是我的愛人彭麗媛。”這下熱鬧了，“好你個老習，你真能當保密局長了。”“搞得我們喝著喜酒還不知你和誰結婚……”

新婚第四天，彭麗媛飛回北京參加全國藝術節，接著又出訪加拿大、美國。新婚後的第一次小別就是兩三個月。

官方媒體在報導習近平和彭麗媛結婚後的生活時，都強調說“這麼多年來，他們總是聚少離多”，似乎要給這種不正常的婚姻生活強加一種“正常”印象，但卻明顯讓人感覺到“此地無銀三百兩”。



彭麗媛

官方報導說，習近平先是從廈門市副市長崗位上調任閩東寧德地委書記，後調任福州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2002年11月又調任浙江省委書記，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書記。

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來；而彭麗媛的工作單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邊去，兩人一直過著當代牛郎織女的生活。可做丈夫的從不挑理兒，相反，他在生活中總是對彭麗媛說："國家培養你那麼長時間，尤其是部隊培養你那麼多年，已形成了這個狀況——許多觀眾都離不開你，我不能讓你為了我馬上離開舞台，那樣也太自私了。"彭麗媛很少對家庭付出，而習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們結婚後，心態一直都是平衡的。

"或許是年齡差距的緣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認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稱職的丈夫，女兒心目中最稱職的父親。近平很辛苦，心裏牽掛著千家萬戶，哪裏顧得上自己？有時我去看他，他還要把會議、下鄉往後推，就為了有時間和我在一起。我覺得太麻煩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邊，我就給他做可口的飯菜，調劑一下生活。"像普通婦女一樣，彭麗媛也操持柴米油鹽，上街買菜。

彭麗媛懷著平常心過非常平凡的生活，她從不將台上的感覺混同於台下的感覺。"近平回到家中，我從沒有意識過是什麼領導來了，他在我眼中，祇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會想什麼明星、名人來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習近平面對彭麗媛總是一種平和的心態，從未要求過彭麗媛在家做家務，伺候自己。他說："我沒有為彭麗媛的事業、生活方面操心過，也幫不上忙。因此，我怎麼能反過來要求她做這做那呢？祇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幹不幹家務，我都高興。"

彭麗媛拿到碩士學位那天打電話告訴習近平，"是嗎？"電話那頭是習近平不緊不慢的聲音："你趕緊回來吧！"彭麗媛問："怎麼不祝賀我？"他說："有什麼好祝賀的？我這裏有一大批碩士，還等著分配工作呢。"

賴昌星：習近平執政我就回國度晚年

1999 年至 2000 年，習近平昇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和代省長，期間爆出了轟動世界的涉及 800 億的廈門遠華走私案。有評論指出，習近平在福建當官覆蓋遠華案發的全部時間，而賴昌星善於走上層路線，從一開始習近平就是賴昌星力求打點和結交的權貴。祇是習家的人脈廣，中紀委一有風吹草動，習近平就著手脫身。

還有評論說，習近平在福建當官長達 17 年，而福建的巨額貪污案例卻接連不斷，從遠華走私案到福州首富陳凱案，從莆福生億元腐敗案到周金伙外逃案，可習近平不但毫髮未損，反而卻一昇再昇，靠的就是太子黨的人脈、清華權貴的庇護和夫人外交。

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其涉案金額之巨，辦案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案件涉及面之廣，是前所未有的，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經濟大案，從而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案件的主角是廈門遠華集團董事長賴昌星。賴於 1994 年成立遠華集團，從 1996 年到案發，遠華集團從事走私犯罪活動達五年之久，走私貨物總值人民幣 530 億元，偷逃稅額人民幣 300 億元，合計造成國家損失 830 億元。

遠華案曝光後，海外媒體對此案作了大量報道，坊間也出現眾多傳聞，其中包括習近平也是賴昌星"紅樓"常客的傳言。官方媒體稱，面對這樣的輿論宣傳和壓力，福建省省長習近平扮演著"救火隊長"的角色。

2000 年 1 月，習近平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遠華案"是一個特大走私案，其涉案人員之眾、範圍之廣、金額之大，令人怵目驚心，正由中央有關部門認真查處，福建省委、廈門市委

正積極配合。偵破、審理和終結需要一個過程，結案時一定及時如實公佈於眾。現在斷言什麼人涉案、多少金額為時過早。

對於境外有媒體報道原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的夫人林幼芳涉案，習近平說，這純屬無中生有。



遠華案中的“紅樓”

在省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習近平明確表示“要堅決按中央和福建省委的部署，大力查處違法違紀案件，特別是大案要案，毫不手軟地清除腐敗分子，不管涉及哪一級、哪些人，都要一抓到底，嚴肅處理。”1999年，福建已偵查職務犯罪案件1164件，其中百萬元大案60件，處理廳處級領導幹部55人，涉嫌受賄罪最高案值990萬元。

2000年9月9日，習近平在接受境內外記者採訪時披露，備受外界矚目的廈門遠華案件，現已進入司法程序，一旦有結果將會公諸於眾。

習近平針對記者的提問回答說，關於廈門遠華案件，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現在在走私案件方面的調查，可以說整體輪廓基本上已經查清，反腐敗將會繼續深入。整個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一旦有結果將會公諸於眾。

2001年1月31日，習近平在福建省政府廉政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又表示，要依法從重從快查處大案要案，嚴懲違法犯罪分子。要敢於碰硬，不論涉及什麼人，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

習近平還表示，福建省在積極協助、配合中央專案組查辦以廈門遠華集團為首的特大走私案的同時，及時揭露和查處了一批涉及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大案要案，懲辦了一批腐敗分子，充分顯示了黨和政府反對腐敗、除惡務盡的堅定決心和力量。

不過，到了2002年，習近平就甩掉福建這個“爛攤子”，調到浙江省當省委副書記和代省長，2003年又昇為省委書記和省長。由此可見，即使福建的巨額貪污案再多再大，都無法“阻止”習近平步步高昇。

說起遠華案，就離不開賴昌星。而賴昌星談起過去，總離不開中共高官。這不，就在習近平重返中南海，外界普遍預測將成為胡錦濤接班人之際，遠在加拿大西海岸溫哥華避難的賴昌星也看到了希望，並放言說：習近平一執政，我就回國安度晚年。

海外媒體2008年12月中旬報道說，賴昌星近日與國內的親屬電話透露，習近平一執政我就回國度晚年。

賴昌星說他是中共官場鬥爭的犧牲品，說他現在如果被遣返回國可能被殺掉，這話也一點都不假，但是因為前“紅樓”貴客習近平、賈慶林地位的提陞使得賴昌星看到了希望。利益相關者都是中共高官，甚至就在政治局常委中。若果真如此，殺與不殺，就看誰佔上風了，而不在於中國政府是如何向加拿大政府保證的，那可是你死我活的爭鬥，顧不得什麼信譽了。

賴昌星回國已經是遲早的事。賴昌星回國後，他的喉嚨就不再由他自己發聲了，而完全由權力佔上風者控制。賴昌星表示一切低調，希望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

已經離國多年的賴昌星，幾進幾出加拿大監獄，但其在中國大陸各地還有很深的內線，對中共內部情況的掌握非常及時。比如2006年加拿大當局將對其遣返的消息，就是他首先在5月11日就

已得知，之後才有媒體跟進報道。因為他懂得保護朋友，現在還有人對他投桃報李。

但賴昌星遣返問題掀起的風波，卻有意無意中揭開了一個掩蓋了多年的事實，即他到底認不認識現在位居中共高層的賈慶林和其夫人？他和賈氏夫婦的關係到底有多深？是不是真如賈妻林幼芳所言，他們相互不認識？與此同時，幾年前賴昌星遣返案所掀起的風波，也似乎透露了加拿大和中國之間政經利益關係的某些信息，加拿大當局借賴昌星案作為雙方關係的政治籌碼，有利用賴案向北京



想回國安度晚年的賴昌星

示好之嫌，故意做球給北京，以獲得某些政經利益；而北京現在的執政當局則借力使力，要在中共十七大人事佈局上利用賴案做文章，除了鎮嚇對手之外，最起碼可以進行一些利益交換，就像當年江澤民借力使力，利用遠華案抓住瞭解放軍軍頭的把柄，最終實現了對軍隊的掌握控制。

不過，賴昌星表示，這些年他講出來的都是事實，被遣返回去後，他還是會這麼說，至於其他的人事問題，他都會據實和盤托出。

他告訴媒體，中國大陸有些人，尤其是以前做同樣生意的人，可能會緊張，"因為我有問題，他們難道就可以乾淨嗎"？

這就是賴昌星案可能產生的衝擊，不單單是生意場上的人，包括中共高層實際上都將受到影響。因此，有網友評論道，就憑賴昌星知道的太多，即使幾年後習近平真執政了，他也不敢讓賴回國，更別說安度晚年了。

從福建調浙江：醉翁之意不在酒

到了2002年10月，習近平被從福建調往浙江，仍然出任省長。官方媒體老調重彈稱：有人曾經這樣概括過習近平的從政之路：從陝北農村大隊支書做起，在河北正定正式起步，在福建政壇走向成熟，而在將知天命之年，他又來到浙江，踏上新的征途。

不過，據知情者透露，習近平由福建省省長任上調來浙江主政，原本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準備，組織上可能調他到陝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因為他與陝西的淵源要深得多。也許是因為浙閩相鄰有諸多類似，也許就是考慮到對"浙江經驗"的思路對接，習近平最終沒去陝西而來到了浙江。

到浙江短短一個月後，習近平又當選為浙江省省委書記。無論是當省長，還是當省委書記，習近平始終都以平常心從容面對。他說："沒有想到一個月以後又兼任書記，一點都沒想到。當時，我想一定要做好，絕不能做不好。因為我做不好的話，不是我個人的事情，這是對浙江 4600 萬人民的事情。組織上給你這麼重要的工作，我們有信心、有決心做好這個工作，但是我們確實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又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浙江媒體稱，習近平到浙江以後，馬上開展了系列調研。他說，

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在到任浙江9個月後，他跑了90個縣市區中的69個。

習近平在考察調研時多次指出，民營經濟是浙江活力所在，是浙江的品牌，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佼佼者。他曾細數民營經濟對浙江的四大貢獻：一是浙江縣域經濟的主要支柱；二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與推動者；三是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生力軍"；四是成為就業和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為了更好地弘揚民營經濟，習近平迅速確定了浙江發展的戰略方向，提出了主動接軌長三角，打造生態浙江、文化浙江，發揮深海資源優勢等八大舉措。習近平說，長江三角洲的滬、蘇、浙三省市，是中國東部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是中國最具活力與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也是世界上公認的第六大城市群。主動接軌上海，積極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一體化，必將促進滬蘇浙三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保持長江三角洲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發展態勢，加快打造世界級的城市帶，從而牽引和推動長江三角洲地區、沿江地帶乃至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剛到浙江時的習近平

不過，艾仰樺在《習近平冒昇之謎新解》長文中指出，習近平從福建調浙江，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習近平被中央調到浙江，2002年10月12日，在浙江省九屆人大常委會

第38次會議上被選為浙江省副省長、代省長。

這時，正是中共十六大前夕，在浙江當省委書記的是張德江。習近平接替了比他整整大一輪的、本鄉本土的原省長柴松岳。水電出身的柴松岳，從1988年當副省長算起在浙江省級崗位幹了14年，此時辭職調去當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主席。

習近平在十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張德江則進了政治局。當時人們還以為張"入局"是浙江省地位暴昇的標誌，沒有想到張德江立刻被調去廣東，習近平當代省長才三個月，就昇為浙江省委書記，省長一職還沒有到手，就轉給了比他大七歲的呂祖善。

呂祖善是浙江杭州人，學航空機械出身，1993年起任浙江省委秘書長，一路晉陞為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省委副書記。2003年1月在浙江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浙江省長。

中央對浙江的人事安排為何如此多此一舉？為何不一步到位，讓習近平直接接替張德江當省委書記，讓呂祖善直接取代柴松岳當省長，而要讓習近平先當三個月代省長？

有人說，這是要吸取俞正聲十四大上進不了中央委員的教訓，所以搶在十六大前將習近平調到浙江。此說顯然並不合理：習近平在福建已經是省長，調到浙江，剛開始只能掛副省長、代省長，反而不如在福建更有入選中委的資格。

其實，中央如此不怕費事地折騰，一個直接用意，是為了給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盧展工讓路，讓盧進入中委。中央準備讓盧展工接替習近平，但是如果不在十六大前讓他在福建當上代省長，很可能被十六大代表們在選舉中差額下來——畢竟，省委書記和省長是當然中委，而省委副書記就未必。當時，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已經被診斷出患不治之症，中央對福建班子有了腹案。後來，盧展工果然進了中委，2003年1月正式當選省長，5月宋德福住院治療後，

中央明確盧負責省委日常工作，第二年4月，中央決定盧展工代理福建省委書記。

不過，這樣一來，習近平給盧展工讓了位，卻給浙江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呂祖善擋了路——呂就無法進中委了，三個月後當上浙江省長的呂祖善，在十六大上只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胡錦濤為何任命習近平主政上海？

自2006年7月5日開始，中共中央紀委會同有關部門，對反映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運營社保基金問題進行調查。在調查中發現，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涉嫌嚴重違紀。

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了對陳良宇有關問題進行初核的決定。中央紀委隨即組織力量進行了初核。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對陳良宇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檢查 。

中共高層經過激烈權鬥，2007年3月24日宣佈原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不再代理上海市委書記職務。按照中共慣例，上海市委書記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陳良宇落馬後，中共各派搶攻上海市委書記職位。社保案是上海幫的滑鐵廬，社保案後上海幫大勢已去，但胡錦濤嫡系“團派”與“太子黨”卻有一番爭奪。

早在2005年8月，路透社就報道，胡錦濤準備空降團派女將劉延東取代陳良宇。兩會期間，又再次傳出胡的心腹劉延東將出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消息。時隔兩個星期，上海灘權落“太子黨”之手，權鬥之激烈中可見一斑。

習近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打破20多年來，上海市委書記都是由上海市幹部直昇的記錄。現任上海市長、代理市委書記韓正難以擺脫上海幫色彩，不僅沒有轉正，恐怕市長的職位都保不了。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胡錦濤親信、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有望擔任上海市市長一職，至於韓正的去向則不得而知。圍繞上海市長一職，中共各派系還有一番較量。

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雖然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他的政治歷練非常完整，一步一個腳印地從最基層做起，直至成為地方大員。按照慣例，上海市委書記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這意味著習近平將進入中國最高核心領導層，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在3月24日全市黨政負責幹部大會上，新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作了表態：中央決定調我到上海工作，這是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和重托，深感責任重大。我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決心儘早儘快適應新環境，盡心盡力做好新工作，盡職盡責履行新任務，決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那麼，習近平是怎麼被選中主政上海呢？據《習近平PK李克強》一書分析，習主政上海有著充分的理由：從1985年來到福建算起，他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工作了22年，情況十分熟悉，近年來“長三角”的江浙滬高層還建立了聯動溝通機制，應該能夠很快適應在上海的工作，保證上海在全國的領先地位；他豐厚的上層社會關係將“有利於與中央的溝通”；而他與“上海幫”沒有牽扯，沒有什麼“小圈子”，有助於繼續清查腐敗，整頓吏治。

有觀察家說：習近平被賦予重任，與其說是因為他的能幹，不如說是因為他的低調，派系色彩不明顯，所以基本上沒有政治對手。

在“共青團派”咄咄逼人，“上海幫”節節退卻之際，被視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出線，是妥協的產物——在“團派”與“上海幫”角力下的一種權力平衡。

中組部長賀國強特別強調了“這次上海市委書記的配備，是從全國工作的大局出發”。這句話的潛台詞，到這次十七大才算讓人們品味出來。

《胡錦濤傳》作者之一任知初說，胡錦濤任命並非“團派”出身的習近平出任上海一把手，是十七大人事佈局中具有戰略意味的一步棋。前一段“團派”勢力急劇擴張，擠佔政治空間，引起議論和不安，黨內摩擦有可能帶來不穩定。胡錦濤必須應付這一挑戰，平衡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這一舉措也就為繼續提攜他的“團隊”而預先堵住了一些人的嘴。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成說，中共高層的內部權力博弈，已不再是過去那種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而是黨內兩大派政治力量的不斷磨合、談判，以及進行必要的妥協與合作，以求取自己力量的存在。擅長黨組織、宣傳、統戰等工作的“團派”，仍需要與對金融、外交、外貿等專業經驗的“精英聯盟”高幹互補。所以十七大的人事佈局，還是會看到這兩大勢力組成政治精英進行合作，互補和相互制衡。

習近平被任命為上海市委書記時，就超越了一直在領跑的“團派二李”李克強和李源潮；十七大上被安排為在政治局常委位居第六，更成為後胡溫時代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的領軍人物。

習近平 2007 年春天剛剛就任上海市委書記，這個職務必然在十七大上成為政治局委員。有理由認為，當時中央是考慮讓他在一段時間內不挪動的。但令人多少感到意外的是，僅僅事隔半年，就安排他進入政治局常委，這樣他勢必要被調到北京，而不能再坐鎮上海。習近平進常委，是在安排他到上海任職之後中央的突然決定。海外輿論認為，這是江澤民和曾慶紅在幕後施壓的結果，並不是胡錦濤改變了初衷。但實際上，習近平一年更上兩層樓，是在江澤民操盤、胡錦濤接招的背景中實現的。

對外宣稱座右銘是“自豪不自滿，昂揚不張揚，務實不浮躁”的習近平，在福建昇為省長，在浙江昇為省委書記，主要是江澤民的提攜之功。他在上海主政幾個月尚稱順利，也有江澤民暗中保駕之力。消息人士指出，習近平進常委，也是江澤民保薦，而共青團的“三胡”——胡耀邦、胡啟立、胡錦濤一脈相承，對習家父子先後寄予很大期望，胡錦濤最終接受習近平。

胡錦濤對“共青團派”教主胡耀邦深懷崇敬，曾經去江西共青城拜謁過胡耀邦的陵墓。胡耀邦當年對習仲勛的器重，胡錦濤也瞭然於胸，對習仲勛的政治品格也十分敬重，對習仲勛之子習近平，也就早有提攜之意，更想將習近平收到麾下。雖然胡錦濤在十七大沒有特別“欽點”某位特定的接班人，然而不“欽點”並不代表他不會去“栽培”特定人選——習近平和李克強。

人們已經開始預測：2012 年，中共十八大上，59 歲、正處於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黃金年齡段”的習近平，將正式“接班”。

習近平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受到父親的命運的制約，這從幾個關節點上就可以看出。例如：1975 年是習家的轉捩之年，一是習仲勛重獲自由，二是習近平回到北京當上工農兵大學生；再如：1997 年，對習仲勛給予政治冷遇的鄧小平去世，習近平才在同年當上了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習近平本人不喜歡人家提起父輩的高幹背景，但是直到今天，他並未走出了父親的光環和影子——這是歷史的宿命。

整肅上海有功，黨報高度表揚

2007 年 5 月 24 日，也就是習近平掌管上海整整兩個月後，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會揭幕。身為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會上誓言要高舉胡溫旗幟，不僅對陳良宇案進行批評反思，還強調上海未來發展必須放在胡總書記提出的上海戰略定位上。

香港媒體說，在此前召開的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四個中央直轄市的中共黨代會中，無疑以上海黨代會最受外界關注，一來這是習近平從浙江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在上海黨代會上首次亮相，上海地方官員希望知道這位新當家的施政理念，二來是中央對陳良宇案查處多時，此次應當借上海黨代會的召開，向上海官員有所交代。

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也一口氣連發五篇新聞稿，重點報道習近平的"施政報告"，規格超過近日舉行的北京、廣東黨代會。

習近平在會上向上海市黨代會發表報告時表示，社保基金案和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的發生，暴露出現行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嚴等



空降上海時的習近平

問題，案件"危害極大、教訓深刻"。

習近平還強調，"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違背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將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外界由此分析認為，這樣的指控清楚顯示，胡錦濤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對社保基金案和陳良宇等人所涉及的貪腐案，絕不僅僅從經濟犯罪和貪污腐敗方面去看問題，而是與他在政治上不能與中央保持一致有關。

香港《明報》評論稱，習近平如此指摘陳良宇，當然也是要表明，自己將絕對不會犯陳良宇那樣的錯誤，而發展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將是上海今後製定發展思路的關鍵。用習近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上海未來的放在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放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思考和謀劃"。

對胡錦濤的態度上，習近平則稱，"加快推進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上海未來發展提出的『四個率先』的要求和期望。"

然而，就在上海市黨代會舉行之際，數百名市民到市信訪辦要求當局落實徵地賠償等政策，當局派出數百名公安到場戒備。部份上訪的民眾還發表致習近平的公開信，抗議楊浦區動用大批公安監視、跟蹤、控制、阻截、關押合法上訪群眾。

此外，在習近平剛到上海上任不久，就有 370 名市民因被剝奪基本人權和受到各種不公平對待，致信習近平，要求市政府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還他們以公道。

這 370 名上海居民，或因野蠻拆遷而失去家園，或因企業改制而被解除勞動關係、以致衣食無著，或因司法腐敗而遭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他們說，之所以給新市委書記習近平寫信，是因為"上海幫陳良宇和韓正"利用所控制的國家機器，欺壓遭到厄運的冤民，堵截、毆打上訪市民，甚至將一些人送進精神病院，他們希望

習近平為他們做主。

不過，中共喉舌《人民日報》2007年7月21日在頭版頭條，以“喜聽上海新濤聲”為題，報道了習近平治下的“新上海”，讚揚上海更主動緊密的與鄰近省份合作、照顧困難家庭的住屋需要和重視“三農問題”、加強反腐等。

這篇文章從三方面剖析“新上海”的新氣象。第一，上海不再自私，而是顧全大局。在習近平治下，“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堅定地在國家戰略下思考行動”，更願意當好長三角的龍頭，更願意與周邊省市合作，分享利益，與“舊上海”比較，“浙江、江蘇的一些幹部明顯感到，與上海溝通更容易了”。

第二，上海現在更重視顧弱勢社群的需要，比以前更和諧了。報道說，“居民住房的顯著改善，是上海大發展的標幟性『亮點』之一”，市政府今年投入3000萬元改善民工子弟學校的設施，且更重視“三農”問題。總之，新上海是“急胡溫所急、想胡溫所想”。

第三，“經歷了社保案，經歷了一些身居高位官員的落馬，上海市委高度重視反腐倡廉工作。市紀委等單位拍攝了題為《貪欲之害》的警示教育片，對廣大幹部進行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更重要的是，新上海在反腐之餘，並沒忘記發展，是反腐與發展並存的最佳例子。

《人民日報》的文章蘊含很多政治訊息，特別是頭條新聞和社論，更是體現北京政治氣候的風向標。因此，這次該報以頭版頭條文章盛贊“新上海”，應是極不尋常的政治動作。

《亞洲時報》的文章評論說，新舊上海的強烈對比，不僅凸顯習近平功勞，也是他十七大昇職的訊號。《人民日報》是中共體系的特殊產物，不僅是中央與7000萬黨員溝通、發施號令和統一思想的媒介，也是當權領袖打擊異己的工具。

“喜聽上海新濤聲”這條題目，絕非《人民日報》編輯部信手拈來的，而是經過很多推敲和政治審查，甚至由高層拍板決定，藉此體現中央的意見和宣傳調子。誰“喜聽”呢？當然是中央了，準確的說，就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新”者，習近平今年3月上任後的新上海也；“濤聲”者，胡錦濤的聲音，胡錦濤的指示？意思就是，在習近平同志領導下的新上海，服從中央，忠實推動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溝建和諧社會，令上海出現煥然一的新景象，對此中央非常滿意，特此表揚。

《亞洲時報》說，這篇文章說的是事實嗎？衹要問問上海的鄭恩寵律師及一眾拆遷戶，就知道這些溢美之詞言過其實，上海更不可能在短短半年之內就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這篇文章的酒翁之意，是要帶出幾個政治信息，而閱讀這些訊息的對象，應當是全黨員和幹部。

首先，上海有此成績，說明中央當初選對了人才，空降習近平到上海是正確的決定。其次，習近平上任半年多，表現如此優秀，是否應該在十七大“更上一層樓”，甚至出任副總理呢？第三，習近平領導的新上海“改邪歸正”，與中央保持一致，擁護胡錦濤、具大局觀後，立即受到中央讚揚，甚至在政治上即將得到回報，其它省市的諸侯豈能視而不見，漠視這種警告呢？

最後，《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借今天的好局面來反證以前的上海，在“全局觀”、“發展觀”和“執政觀”上的不堪，際此十七大前夕的敏感時刻，中央竟然肆意把髒水潑向“舊上海”，這意味著江澤民的影響力已凋敝，他對十七大人事應無討價還價的能力。

十七大成“王儲”，沒表現出政治野心？

北京時間2007年10月22日上午11時36分，在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後，新當選的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走進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同中外記者見面。九名政治局常委是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這個順序與多維社早在一個半月前的獨家報道完全一致。



九名常委集體亮相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見面會上對中外記者說：剛才，我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九位同志組成，全會選舉我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當選的其他八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是：吳邦國同志、溫家寶同志、賈慶林同志、李長春同志、習近平同志、李克強同志、賀國強同志、周永康同志。

胡錦濤還介紹說：其中，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同志是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都比較熟悉了。習近平、李克強是兩位比較年輕的同志，他們分別為54歲和52歲。賀國強、周永康同志是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家也都比較瞭解。

胡錦濤在談到新一屆領導機構成員時表示：我們深知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我們一定牢牢秉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心實意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努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華盛頓郵報》當天以“中國迎來下一代領導人”為題報道說，54歲的習近平是中共元老之子，是一位法學博士，在新的政治局常委四名新增成員中排名最靠前。這個包括胡錦濤和另外四名續任者在內的九人小組揭曉了。在胡錦濤的帶領下，各人向前邁步，向攝像機招手，新來者緊張地微笑，資深者則似乎老練些。

新來者當中，排在習近平後面的是李克強。52歲的李克強也是一位博士，20年前曾在共青團與胡錦濤共事。

分析家認為，在當代，中國的權力移交已經變成談判和結盟的問題，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不過，兩位排在最前面的新來者似乎和胡錦濤很相像，長期職業生涯的標幟是審慎而不是大膽。在介紹他們的時候，胡錦濤只指出他們的年齡，顯示他們被視為年輕的一代。因此，黨的選擇似乎預示渴望堅持胡錦濤的路線，謹慎地推行30年前發動的經濟改革，但堅持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華盛頓郵報》說，經過數周，黨內三名最強有力的領導人為新血讓路。他們是68歲的副主席曾慶紅，69歲的吳官正以及72歲的羅幹。

當天，《華爾街日報》從北京發回的報導則強調，中國共產黨中

央委員會選舉習近平與李克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兩人成為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委員。

現年 64 歲的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以及現年 65 歲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 52 歲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和 54 歲的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有望在五年後成為中國的國家主席或總理的繼任者。

英國《金融時報》10 月 17 日指出，被外界廣泛視為中國領導層"假定繼承人"的幾位快速晉陞的共產黨高級幹部，十七大期間，在媒體面前用謹慎的語言表示了對現任領導層提出的各項優先任務的支持，並且絲毫沒有表現出自己的政治野心。

中國的精英政治一直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但在五年一屆的黨代會上，提高透明度的相關措施，讓記者得以提問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和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人們廣泛預計，在本週的黨代會上，習近平和李克強將入選政治局常委 使得他們有望在 2012 年成為中國的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

在上海廳，習近平同樣機智地回避了潛在的政治麻煩，讓他的下屬回答有關上海腐敗醜聞的問題。上海的這場腐敗醜聞導致他的前任被撤職，並使他晉陞成為上海市委書記。不過，習近平抓住一個機會，詳細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性。

10 月 25 日，《金融時報》又以"十七大之後的中國"為標題，發表社評說：對 13 億中國人和全世界來說，中國共產黨剛召開的五年一度的全國代表大會有巨大的重要意義，但它缺乏戲劇性。

中國觀察家對已發生的事件已取得的共識，可能是正確的，但肯定並不完整。胡錦濤不得不同意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比他的支持者、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的排名還靠前一位。按常理，這意味著習近平在 2012 年後將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而李克強則將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並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

如果這兩位新人掌權，他們分別會做些什麼？這還是個謎，如同不喜歡在媒體露面的胡錦濤的真正想法一樣神秘。有人指出，儘管上一屆政治局常委會所有成員都是工程師出身，但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中，有的成員具有其它領域的專長，如習近平擁有社會科學和教育學背景，李克強則具有法學和經濟學背景。

但是，此類技能並不意味著這些新人將會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現代化改造，或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從鄧小平時代起，中國政治就不再是個人領導黨派，而是黨派吸收個人，並將他們同化。在某種程度上，這很管用。中國經濟增長了，外交政策危機也得到瞭解決。

痛斥"喫飽沒事幹的外國人"，牛！

如果說，習近平跟香港記者談的"籠子熱鬧論"，展現了他的"施政風格"，那麼，事隔幾個月他跟墨西哥華僑談論"外國人喫飽了沒事幹"，則表現出其強硬的一面 甚至被認為有討好"憤青"之嫌。

2009 年 2 月 11 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表示，今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嚴峻的一年，不過中國會從容面對。他批評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指手畫腳。

中國媒體報道說，離開墨西哥前，習近平與當地華僑見面，介紹當前中國經濟新勢。他說，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 13 億人口的喫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

他還指出，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

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此言一出，迅速在中國及海外華文互聯網上引起轟動效應。這一點，從新華博客刊登的一些網民的觀點便可略見一斑。其中，宋寶石的博客這樣寫道：對於少數外國人對於中國的說三道四和指手畫腳，過去國人更多的是聽到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強烈抗議或是強烈譴責”，很久沒有聽到這麼直白直接的聲音了。

文章稱，對比強烈抗議和強烈譴責等外交辭令，這直白直接的聲音，更能直戳那些“喫飽了沒事幹”的喜歡指手畫腳、干涉別國內政的外國人的痛處。祇有這樣的直白才更顯示一個負責人的大國的底氣；祇有直白才更能表明一個走向強大的中國的鮮明態度；也祇有直白才更能讓國人感到痛快！



習近平痛斥外國人的鏡頭

這篇博文還寫道：有些外國人就是喫飽了沒事幹，看到中國日益強大心裏就不爽。一會是指責我國的人權問題、一會會見達賴集團，就是西藏設立農奴解放紀念日，一些喫飽了沒事幹的人也說三到四，孰不知這些都是我們的內政嗎？這不是喫飽了沒事幹是什麼？

有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訪拉美向美國“後院”發出了合作信號，中國也預料到此舉將遭受西方大國非議，於是先聲奪人，強硬表態，這顯示中國正有意識地利用金融海嘯帶來的機遇轉移外交重心，儘可能地繞過美國拓展市場，同時宣示中拉合作的信心與決心。

“如此說來，習近平副主席對某些指手畫腳的外國人的痛批真是一箭雙雕。我們支持習副主席的強硬態度，這強硬態度讓國人倍感痛快！！”宋寶石最後寫道。

還有網民留言說，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了，就應該說話霸氣；還有的說對某些外國人指名道姓更好，建議外交部發言也應該這樣。新浪網的一名網友乾脆對現今三位中國領導人列出評語：“溫總理親民，胡主席大氣，習主席硬氣。”並說“習近平繼承毛澤東時代中國對西方的骨氣”。

“直白快語，大快人心！”這是署名“李澤生”的博文對習近平痛罵“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的稱讚。文章稱，想起近幾年有些外國人對中國的胡說八道，國人都很氣憤。他們動輒打著所謂的民主、人權的旗號，一會兒批評中國宗教政策不符合民主，一會兒批評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違反人權——似乎祇有他們才是對的。

西方的某些新聞媒體如CNN等更是充當了急先鋒，從2008年的奧運前開始，它們就無中生有、甚至指鹿為馬地誣陷中國。在當目前這場世界金融風暴席卷全球的時候，西方國家一些領導人本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上，但他們卻拼命想轉移本國廣大民眾的視線，將髒水潑到中國身上。

還有網友解讀說，習近平的“三不”，言外之意就是，我們不給你們找麻煩，不折騰你們，你們也別來管我們——凸現了中國目前在國際社會的牛氣。

"習近平痛批『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彰顯大國威嚴"——這是華龍網登出的文章標題。"斥『喫飽沒事幹』外國人，習近平獲民眾拍手叫好"——這是於澤遠撰寫的評論文章題目。

《聯合早報》指出，習近平在墨西哥的言論引發外界猜想和網民熱議。作為胡錦濤的第一接班人，習近平用通俗直白的語言痛斥"某些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令外界多少有些錯愕。北京一名研究中國政情的學者指出，雖然習近平出身高幹家庭，但少年時父親被打倒使他與草根階層有長期接觸。他用"喫飽了沒事幹"、"折騰"這類草根語言斥責"外國人"，在改革開放後中國領導人中還十分少見。這番斥責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習近平對西方國家缺乏好感，也顯示他將來可能采取比較強硬的對外政策。

中國民眾大多對習近平斥責西方的言論拍手叫好。在新浪網跟帖留言中，大多數網民支持習近平批評外國人。一名網民留言說："溫總理親民，胡主席大氣，習主席硬氣。"還有網民說，習近平繼承毛澤東時代中國對西方的"骨氣"，"習主席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不過，也有網民認為習近平的言論有些偏激和老套，不大符合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有關學者指出，習近平這番言論不像是經過高層集體討論的口徑，因為主流官方媒體並沒有報道這些言論。習近平嚴詞指責"有些外國人"干涉中國事務，既是對西方在西藏、人權等問題上壓制中國表達不滿，同時也希望通過展示個人強硬的一面來提升形象，獲得更多的國內輿論支持，為三年後接任大位打造輿論基礎。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在接受香港《太陽報》報採訪時，稱讚習近平在美國"後院"所發表的講話很實在，很堅定，很有信心，準確表達了獨立自主、堅持和平發展的中國外交政策。

陶文釗說，幾十年來，"中國威脅"一說從未停過，祇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但是中國現在的所處環境、周邊關係、國際同情以及地區作用，是過往任何時期所不能相比。陶文釗認為，習近平的講話是告訴世人，中國人在風浪中要有堅持不動搖的風骨，人家愛怎麼講就讓他講去。

"習近平金剛怒目：外柔內剛顯強硬一鳴驚人"，香港《東方日報》2月24日評論說，慈眉善目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一反常態公開指摘外國人"喫飽了沒事幹"，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的強硬言論，道出了中國人的心聲，折射出習近平金剛怒目的一面，其外柔內剛的性格特質，令人耳目一新。

自從中共十七大凸顯了習近平作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的地位之後，外界一直通過各種場合觀察和揣測習近平的政治取態、性格特質及行事風格。在外界的印象中，習近平持重厚道，面相莊嚴，言詞謹慎，是一個深藏不露、胸有丘壑之人。但未曾想到，習近平不僅有謙謙君子之風，更有錚錚傲骨，尤其是今次的強硬發聲，給國人心頭帶來一股清風。

文章稱：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領導人的性格特質往往與國家命運榮辱緊密相連，一個堅忍不拔、鐵骨錚錚的領導人，不僅能夠帶領國家走向富強，而且還可以給國家帶來尊嚴與榮譽；而一個懦弱平庸、偽善多變的領導人，帶給國家的祇能是災難與恥辱。

文章還說：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今次用語坦白直接，沒有任何外交辭令，頗有毛澤東當年的"遺風"，讓聽慣了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強烈抗議"或是"強烈譴責"的國人，有一種久違的痛快感覺。

"習近平今次發聲，讓人想起當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東方日報》的文章稱讚道。"習近平今次

的表現，讓外界見識到其強硬一面，使其原本雲遮霧繞的形象和個性，顯得更加清晰豐滿。雖然這次衹是初試啼聲，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今後還可能有更多令人注目的舉動緊隨其後。習近平所代表的中共下一代領導班子，將令世界震驚。”

輿論反彈，官方下令刪掉習近平言論

BBC中文網評論說，中國領導人的罵功由來已久，其中最知名的恐怕就屬毛澤東在1965年秋寫的詩詞《念奴嬌鳥兒問答》。不過他當時罵的不是西方，而是共產陣營的老大哥蘇聯。

這首詩詞中包含了對前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的罵詞，“還有喫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這段由中央電台播音員字正腔圓地反覆播出，耳熟能詳毛澤東詩詞的確顯示出在中蘇交惡時期中國人的骨氣。

但這句“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後來幾乎成了把中國鬧得個天翻地覆的紅衛兵小將的座右銘。難怪習近平罵某些外國人“喫飽了沒事幹”贏得充當新一代紅衛兵的憤青們熱烈喝彩，拍手稱快



習近平痛斥外國人的畫面

到了鄧小平時代，罵功進一步昇級。鄧小平在1978年出訪東南亞時乾脆就用髒字稱蘇聯是“王八蛋”。不過，自江澤民主政後就再沒怎麼看到中共領導人對外國人橫眉冷對了。江澤民國外訪問期間時時用英語朗誦歌唱，跳華爾茲，拉二胡。這被中國媒體讚譽為“大國外交”。

儘管這種接近於對西方獻媚的外交手段有些讓人看了肉麻，但江澤民畢竟改變了以往中共領導人在外人面前鐵板一塊的形象。

但是，習近平對西方叫板似乎是胡溫時代中共領導人中的一個唱紅臉的。這多少平衡了溫家寶在劍橋講演時遭扔鞋的外交窘境。同時，這也彰顯了習近平的太子黨式的霸氣。

有評論文章稱，在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經濟衰退，西方大國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時候，的確有一些熱血憤青認為現在該輪到華人喫肉，洋人喝湯。腰纏萬貫的“救世主”中國該好好教訓一下對中國指手畫腳的外國人了。

但這種觀點經由中國國家副主席的口說出來未免有失一個大國的風範。一個在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與一夜暴富的無賴完全是兩回事。不錯，中國政府現在能夠解決13億人的溫飽問題，這是很了不起。但如果認為這就足以堵住外人的嘴，要他們對中國存在的其他問題熟視無睹未免有些政治幼稚。

網名叫“勞百姓”網友說，好一個“喫飽了沒事幹”，好像到了無賴潑皮當街撒潑的市井之地。以“三不”為理由而自我標榜，正好像一個人用“一不偷二不搶三不當婊子”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一樣，可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道德底線已經淪落到何等地步。泱泱大國、悠悠神州，還在以這樣的“三不”為自己壯膽，實乃可悲至極。這就是文明古國即將迎來的“元首”的政治追求嗎？

網友“ysq2096”表示，中國能夠基本解決 13 億人口的喫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共產黨有了這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貪點，糟蹋點，折騰一點，屁民們竟然說三道四確實讓人氣憤，已經讓你們喫飽了，你們就跪呼萬歲吧。據說，習近平先生，已經 100%是胡錦濤先生的接班人，讓人不寒而慄！！！未來中國基本離朝鮮更近了。

網友“恒威”回復“習近平痛批有些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痛快！”的帖子說：痛快麼？如果沒有這些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不管是陰謀還是陽謀的批評，我們能進步的這麼快麼？習能得此高位，是人民的選擇麼？是哪些人民的選擇。我們的事都幹的很好了麼？聽到一些批評就不舒服。

學者朱學淵評論說：“習近平先生在墨西哥城的講話很令我非常失望，卻激奮了一幫無知的『憤青』。要問什麼是『憤青』？就是那些使用『暴力語言』的『思想暴民』；那麼他們的『思想』又是什麼呢？主要是『民族主義』；我為什麼說『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呢？因為它是失敗而拒絕進步的民族舉起的『敗兵的旗幟』。”

不過，習王儲也不過僅僅硬了兩天，據在香港出版的英文《南華早報》報導說，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已把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墨西哥時批評西方“喫飽了飯沒事幹”，對中國“指手劃腳”等措辭強硬的話從網頁上撤下。

《南華早報》援引至少兩家中國官方媒體的消息來源說，他們分別接到上級指示，因美國國務卿希拉利近日要到訪，要求撤下關於習近平有關批評西方的言論和視頻。

不過，香港《明報》指出，其實，習近平在墨西哥的強硬言論，內地官方傳媒並未報道，衹是香港隨行的電子傳媒獨家拍下了習的這番原話，這則新聞在廣東出街後，有人將相關內容透過互聯網在

內地廣泛傳播，有人甚至將短片擺上網，用的是深圳電視台的片段。

雖然，中國很多左派“憤青”對習近平的講話拍手叫好，在很多討論區“頂”聲不絕。但官方宣傳部門卻暗自叫苦，雖然對於轉播香港電視的廣東電視頻道，一向有封殺泛民主派聲音的命令，但對領導人的“爆肚”之言，卻無明確的封殺指引，所以也難怪罪他們，只好下令刪除相關的討論留言。

《明報》不無憂慮地表示，衹是經此一役，不知今後北京會否收緊對隨行香港傳媒採訪限制。

薄熙來

打黑除惡，還看“西南王”

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他從不否認“沾老子光”，又害怕“沾老子光”；他有兩次婚姻，兩個岳父都是高幹；他有兩個兒子，一個為人低調，連張照片都沒公開過，另一個則頻頻亮相，網上到處都有他的“艷照”。

他高大英俊談吐幽默，一直是媒體的“寵兒”，也一直遭媒體質疑；他愛草、愛球、愛時裝、愛即興演講，但更愛數字、政績和形象工程，更愛刮“薄氏旋風”。

從大連到遼寧，再從商務部到重慶，幾乎每次工作調動，他都能調動出風風雨雨，都調動得轟轟烈烈；從大連的“綠色風暴”，到重慶的“打黑風暴”，從向世界“推銷”遼寧，到阻擊歐美“貿易保護主義”，他的每一次華麗轉身，每一個角色轉變，無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無不留下“太子黨”根正苗紅的烙印。

因此，有人說他野心勃勃，有人稱他是“另類”太子黨。但不管怎麼說，都不可忽視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薄熙來走到哪裏，他都能搞出政績來。以重慶為例，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期間，在世界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下，薄熙來帶領重慶通過考驗，讓“重慶模式”被中央電視台拍成教材，成為其它城市的學習教材。2008年重慶市的年經濟成長率為14.3%。

他在重慶掀起“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運動，

並展開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糾正了重慶的社會風氣，得到了廣泛好評。輿論認為他是重慶有史以來最有作為的市委書記之一。

但是隨著打黑行動的深入，對打黑行動中存在問題的質疑聲音也開始出現，部分媒體因此也呼吁薄熙來出面處理這類問題。

是什麼促使薄汪共進渝粵（愉悅）大餐？

自2007年11月30日薄熙來主政重慶，汪洋調任廣東後，這兩位都有望在中共十八大更上一層樓的“封疆大吏”，便各自在自己的管轄區“呼風喚雨”“大顯身手”。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在重慶“打黑除惡”的薄熙來卻力壓在廣東“騰籠換鳥”的汪洋，於是薄熙來“唱紅打黑”劍指汪洋的說法，以及民間出現的“揚薄抑汪”的輿論，鋪天蓋地，居高不下。

不少網民追問重慶黑惡勢力何以坐大，潛台詞就是質問汪洋前兩年主政重慶期間為何養虎遺患？黑惡勢力後台文強為何還屢屢受到提拔重用？

在網民一邊倒的擁薄聲中，廣東的媒體則發起保汪運動，廣東媒體曾經援引汪洋說，廣東的“打黑除惡”已經常態化，常態化才能持久，廣東打黑不搞轟轟烈烈的專項行動，不搞“形象工程”。很明顯這是影射薄熙來在重慶搞運動式打黑，有作秀之嫌。

另外，廣東傳媒更是多角度挖掘材料，影射打黑對重慶經濟不利，有以廣東為基地的網絡傳媒更是打出“探索政府機構改革，勝過宣揚紅色崇拜”的口號，暗諷薄熙來“唱紅”之舉務虛不務實，還不如汪洋在廣東實幹。

在輿論含沙射影的攻擊之下，薄熙來主動向汪洋伸出和解之手。薄熙來高調表示，汪洋等前幾任重慶市委書記都對打黑除惡“態

度鮮明，而且力度很大，工作很實”，並特別提出要向廣東學習打黑除惡的經驗。

2009 年 12 月 1 日，汪洋突然率領廣東省一千多人的龐大代表團赴四川省、重慶市學習考察，簽訂了兩省市戰略合作協議，合作項目約五百多億元。

汪洋希望促成廣貨西進，攜手西部實現無障礙經貿合作。薄熙來則表示，西部有 3 億消費者，重慶當然應該成為廣貨西進的中轉站。同時，薄熙來冀望渝粵兩地在不久的將來有更大規模、更大手筆的深入合作。

香港《東方日報》評論說，這是汪洋針對薄熙來早前提出的“向廣東學習掃黑”所作出的實質性回應，也可以理解為是汪向薄發出的“和解”信號，更可以理解為這是上面的有意安排，彰顯黨內高層團結，顯示兩位封疆大吏不拘小節的政治胸懷，來平息有關薄與汪、重慶與廣東“對著幹”的傳聞。

據媒體描述，當天，汪洋和薄熙來肩并肩，邊走邊聊進入會議室。汪洋表達了對這座山城的濃厚感情，他脫下咖啡色外套掛在椅



汪洋和薄熙來

背上說：“這件衣服還是我在重慶時一直穿著的呢！”在場兩地官員聞之開懷大笑並鼓起掌來。汪洋接著說：“今天是我離開重慶兩年零四天，這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讓我倍感親切。我在重慶工作不到兩年，但是卻對這裏有著深厚的感情。我要拜託在座的各位重慶同志，向我過去共事的老同事和重慶人民問好。”

薄熙來透露了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薄熙來說：“全國兩會的時候，我遇到汪洋書記，我當即邀請汪洋書記來重慶，為了邀請到汪洋書記，我對他（汪洋）說，你要是不來，我回去就跟重慶的同志說，說你樂不思『蜀』(1997 年以前，重慶隸屬四川）”。

隨後，薄熙來感謝汪洋實現了率團到訪重慶的承諾。當聽到汪洋說自己一直牽掛著重慶，每晚 6 點半先看重慶電視台新聞、7 點鐘看央視新聞聯播、7 點半再看廣東電視台新聞時，薄熙來笑著請汪洋一定繼續保持這一習慣。薄熙來還稱汪洋是“重慶人民認可的重慶人”。

在雙方座談時，汪洋稱讚薄熙來主政以來重慶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尤其在六個方面表現突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探索城鄉統籌發展路徑、三峽庫區建設、“五個重慶”建設、黨建工作以及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他特別指出，許多廣東人到重慶來看了之後，都誇這里社會安定、投資環境好。“我聽到後覺得臉上有光，感到驕傲。”汪洋說。

薄熙來表示，廣東省是中國改革的前沿先鋒，同時也是經濟大省，汪洋主政廣東後推動了廣東與東盟四國的合作，並一舉推動體制改革。從以前在重慶市推動城鄉統籌 綜合配套改革，到如今推動深圳市的綜合配套改革。“充分體現了汪書記從大局和長遠發展在定位地區發展特點，把地區發展戰略與國家大戰略緊密結合。”薄熙來說。

薄熙來盡地主之誼，設“渝粵（愉悅）大餐”款待率團來訪的汪洋一行。午宴除粵菜之外，還特地準備了汪洋喜愛的梅菜扣肉和正宗川菜川味紅燒肉、酸菜湯等。

“渝粵（愉悅）大餐”後，官方喉舌人民網發表《有感於汪洋薄熙來的”惺惺相惜“》的評論文章，公開了這場一直在背後議論的“薄汪之爭”。

文章稱：眾所周知，重慶自打黑以來，就有許多聲音出來，引起外界廣泛關注。一是借薄熙來打黑否定前任論。有人認為薄熙來打黑打了那麼多“保護傘”，他的前任汪洋等領導同志不重視打黑工作，這種言論在各種論壇留言中都有出現，筆者以為這種言論雖然一定程度能起到督促各地方加大打黑除惡力度的作用，但是這種聲音的背後不排除有“折騰者”在興風作浪的不良傾向，借重慶打黑，否定汪洋等前任為重慶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工作成就，繼而阻礙國家區域協調發展。

文章還說：薄熙來用數字有力地駁斥“前任不作為”論。現在汪洋代表廣東省委、省政府對重慶的打黑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並表示祝賀，汪洋此舉再次證明薄熙來打黑非“作秀”，我們深切感到兩位書記並沒有被“折騰者”影響，彼此相惜有加，信任有加，互相給予對方肯定是給折騰者有力的駁斥。

文章最後寫道：總之，汪洋薄熙來兩位領導人在面對打黑除惡，以及科學發展協調發展此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能做到通力合作，足見兩位黨的領導幹部心胸寬廣而且坦蕩。他們之所以惺惺相惜，志同道合，……他們向全社會展示了當代黨的領導幹部敏銳的時代眼光、全局意識、責任意識，讓人佩服！

相對官方媒體對薄汪會面的高調評論和大唱讚歌，香港《東方日報》的文章則點出了促使薄汪共進“渝粵大餐”的背後原因：汪洋和薄熙來都是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這也是外界猜測他們難免有“瑜亮情結”的主要原因，但實事求是地講，雙方雖有競爭空間，但卻無鬥爭的本錢。

按照中共的人事安排傳統，如果薄汪兩人隔空對戰，結果祇能兩敗俱傷。汪洋雖然在重慶打黑之爭中處於下風，但薄熙來也不可能毫無痛腳，尤其是其主政大連、遼寧以及商務部期間，非議也是如影相隨。如果雙方互揭瘡疤，沒完沒了，不僅會讓黨內元老不滿，連普通民眾也難以認同，結果祇能在十八大上雙雙出局。

因此，薄汪兩人祇能是鬥而不破，以一場熱情的“薄汪會面”維持表面和諧。薄熙來與汪洋在鎂光燈下笑容可掬，言談甚歡，表現得相當愉悅，但各自內心怎麼想，恐怕外人難以琢磨。

政治往往這樣，即使是你不喜歡的人，也要對他表現出足夠的熱情，甚至對自己的政敵，表面上要比自己的兄弟還親切。所以，玩政治的人大多是兩面三刀，一般人玩不起，但很多人卻偏偏飛蛾撲火般地熱衷於玩政治。

薄熙來與汪洋在鎂光燈下笑容可掬，言談甚歡，表現得相當愉悅，但各自內心怎麼想，恐怕外人難以琢磨。

薄一波善於“見風使舵”“落井下石”

與中共第五代領軍人物習近平一樣，薄熙來也有著顯赫的家世，父親薄一波原為國務院副總理，但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打擊，妻子自殺，兒女飄零，薄熙來也一度被關進監獄。“文革”後，薄一波任中顧委常務副主任，2007年1月15日去世，享年99歲。

曾有外國記者問薄熙來，“當大官是不是沾了老子光”。薄熙來回答說，“我不否認『沾老子光』，而且還樂意告訴諸位，我曾沾

的光使我終身受益！當我還是個正在認識社會和人生的中學生時，因為家庭牽連，我被關進了監獄。五年的監獄生活，使我經受了磨難，鍛煉了意志，懂得了民主、法制對一個社會是多麼重要，自由、尊嚴對一個人是多麼重要。命運在這五年裏給予我的饋贈，並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沒有一個倒過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這份禮物，這豈不是沾了大光？”

而談及父親對他的幫助，薄熙來認為主要是教育。“一個人將來能否做點事，主要看青年時代是否受到學識、品德和素質上的教育。我從我父親那裏得到很多這方面的幫助。”

後來，媒體評論說，薄熙來的這番表白顯然有些矯情，他只強調“文革”時沾了老子的光而被關進監獄的那段經歷，卻閉口不提自己從政後依靠父親的人脈關係而步步高昇的事實。還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沒有壽命最長的“八老”成員之一的父親，為兒子的仕途討價還價，就不會有薄熙來的今天。

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不想承認“沾了老子光”的另一個原因，恐怕就是被官方媒體稱為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民間的口碑實在不好，因為他跟胡耀邦下台和“六四”事件都有直接關係。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薄一波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部長。1954 年 9 月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 年 5 月起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 9 月當選為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9 年 4 月、1965 年 1 月兩次繼任國務院副總理，並曾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文革”中薄一波曾因所謂“61 人叛徒集團案”遭受迫害。1979 年 7 月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他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又被增補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82 年 5 月任國務委員，曾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同年 9 月和 1987 年 11 月，兩度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上世紀 60 年代，在極“左”思潮的環境下，薄一波提出“政治掛帥要落腳到發展生產力”的思想，獲得鄧小平肯定。1966 年的全國工交會議上，薄一波的觀點遭到圍攻、責難，鄧小平又站到了他的一方。

1967 年 3 月，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 1936 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履行自首“簽字”手續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61 人叛徒集團案”。

有海外媒體評論說 在中共官場 許多人都知道薄一波是個“善於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老手”，儘管他曾官至副總理，但他主管經濟政績乏善可陳，比如 1958 年薄一波為討毛澤東歡心，曾提出“兩年超過英國”的計劃；還有他“忘恩負義”幫助鄧小平整倒胡耀邦。

文革之後，薄一波一直要求為自己平反。據胡耀邦女兒滿妹所著《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介紹，在 1977 年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時，他著手平反的第一個大案就是“61 人叛徒集團案”，為此胡還做了好幾頁的批示。

據滿妹指出，當年胡耀邦要替薄一波平反時，連鄧小平也喫了一驚，鄧問胡說：“哦，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幾天之後，連當時中共主席華國鋒也打電話“關切”，可見胡耀邦為了替薄平反，承受了極大的政治壓力。

然而 1985 年 8 月 22 日，在鄧小平 81 歲大壽時，鄧在北戴河酒席上稱，會在兩年後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信以為真，在與香港記者陸鏗閑談時，將此絕密消息告訴了陸鏗，而陸鏗卻“違背諾言”

把消息公佈於世，讓鄧的主動退變成了被動退，胡因此得罪了鄧。

1987 年 1 月，鄧小平主持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帶頭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當時負責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的薄一波，讓會議通過了公報，決定接受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請求”。

中共“八老”最初指的是：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鄧穎超。“八老”中部份成員過世後，又換入宋任窮、習仲勛和萬里。他們通過個人威望及相應人馬，對中國政治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八老”當中，薄一波則是最長壽的一位。

據海外雜誌指出，“六四”之前部署鎮壓，薄一波積極主動，“功不可沒”。

1989 年 5 月 6 日，薄一波向鄧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勢惡化發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斷措施，恢復社會秩序。”5 月 15 日，包括薄一波在內的多位老人給鄧小平打電話或登門拜訪，對局勢惡化表示擔憂，要求采用武力平息“動亂”。

5 月 18 日晚 10 時，首批軍隊第 26 集團軍第 77 師到達京郊待命。與此同時，根據鄧小平的提議，再度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陳雲、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參加了會議，最後決定對學生動武。

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共青團和太子黨》一書指出，薄一波的這些劣跡，致使改革開放之後的民眾對他少有正面評價，儘管有大批年輕女記者、女學生為薄熙來瘋魔，但很多人帶著對薄一波的糟糕印象而遷怒於薄熙來。

《共青團和太子黨》也指出，其實，薄熙來與他父親的性格和觀念並不一樣，不過，他攀登高位，在經濟部門飛黃騰達，除了個人能力，應該說還是託庇於他父親的。

小學是乖孩子，中學成“聯動”頭頭

1956 年 9 月，七歲的薄熙來開始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上學。班主任關敏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說，在新入學的一群生龍活虎的學生中，就有薄熙來。他長相英俊，兩道濃眉、一雙大眼睛透著正氣，說話彬彬有禮。關老師見小薄熙來個子很高，就把他安排在最後一排靠窗子的位子上。從此關敏卿陪伴他度過了小學六年的美好時光。

實驗二小的高幹子弟非常多，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也和薄熙來同班。學校要求幹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接送孩子的小汽車儘量遠離學校停靠，為的是不要影響平民百姓孩子的心態。

家住在東四北邊一條胡同的小薄熙來，上學總是由在首長家裏從事保衛工作的解放軍叔叔接送。劉平平則一直是坐中南海的兒童車上學，那是一種由三輪車改造的、後面帶遮風擋雨的棚子的簡易車，裏面可以坐五六個孩子，這種車平平一坐就是六年。

《薄熙來師生情》一文說，少年薄熙來很隨和，不淘氣，很聽話，像一個小大人似的，從來沒讓關敏卿操過心，他和同學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從來沒和同學打過架。薄熙來也不偏科，數學、語文學得都不錯，字寫得也很漂亮。關老師在批改作業時，總看到薄熙來的作業工整認真，從來都按時完成。

1962 年薄熙來畢業考試時，全北京市統一出題，薄熙來的語文、算術各考了 100 分。後來，他靠自己的實力考進了北京最優秀的中學——北京第四中學。

據薄熙來的小學同學、非政府機構清水同盟主席、環保專家高中透露，在小學三年級時，薄熙來和高中都被學校選為為外國元首獻花的兒童。



少年薄熙來

高中在一篇博文中寫道：我出生於東北一個普通家庭，卻有幸進入了北京當時最好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班上有很多高幹子弟，比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廖沫沙的女兒等等。小學三年級時，學校開始挑選為外國元首獻花的兒童。條件是：是乖孩子，而且長得還要漂亮可愛，並且個頭要高。我和薄熙來都被選中了。

不過，這位在同學和都是眼中一直都是"乖孩子"的薄熙來，在進入北京四中後，尤其是在"文革"爆發後，他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文革前，北京四中作為北京最牛中學，其初中部的錄取線就是198分（2門課，滿分200），高中部的錄取線為270分（3門課，滿分300）。那時，四中高考陞學率即達100%，每年考入清華、北大、哈軍工的名額都很多。當然，那時候北京市的人大、北大、清華三校的附屬中學，還不是北京重點中學。

北京四中的校史上，確可尋覓到不少紅牆子弟。譬如60年代，劉少奇之子劉源，陳雲之子陳元，林彪之子林立果，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陳毅之子陳昊蘇、陳小魯，賀龍之子賀鵬飛，徐向前之子徐小巖，張雲逸（大將）之子張光東，王樹聲（大將）之子王魯生，黃敬（俞啟威）之子俞正聲、喬冠華之子喬宗淮，

王震之子王軍，張愛萍之子張翔、張勝，安子文之子安民、萬里之子萬仲翔，范長江之子范蘇蘇、范東昇等。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礦院附中、地質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鋼院附中、農大附中、北醫附中、101中、女六中、八一學校、育英學校、十一學校、豐台三中等十幾所中學紅衛兵負責人在北大附中舉行會議，商定聯合起來，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

12月5日，"聯動"發佈成立宣言，他們以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海淀區糾察隊為骨幹，聯合了部分"保皇派"紅衛兵，總部設在北大附中。這是一批十六七歲的青年人，多為烈士子女和高幹、軍幹子弟，他們也是曾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最早的老紅衛兵。

這群資格最"老"的紅衛兵由於長期自命為"天然接班人"，於是將出身不好的紅衛兵的造反行動看成"狗崽子翻天"，利用"血統論"組織起來自救。

他們一方面與首都"三司"蒯大富等進行激烈的辯論，一方面騎著自行車穿越北京大街，呼口號、散傳單、貼標語——"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批評當前運動過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

當時，謝富治掌握著公安大權。"聯動"成員對他執法不公，偏袒"三司"，歧視"西糾"、"聯動"的言行甚為不滿。從12月中旬到1967年1月上旬，他們六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聯動被抓人員，抗議"公安部下放專政權力"，要"火燒謝富治"。他們還聯合了遍佈上海、瀋陽、武漢、長沙各地、上百所學校的紅衛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對中央文革。

"聯動"的活動嚴重干擾了毛澤東打倒走資派的戰略部署。公

安部長謝富治於1967年1月17日發表公告稱：“『聯動』是反動組織，頭頭是反革命。”《紅旗》雜誌同年3期社論《論無產階級的奪權鬥爭》也斷定聯動是“反革命組織”。清華大學、北航等校紅衛兵在授意下搗毀聯動的“據點”，舉辦“聯動罪行展覽”，抓捕139人。失意的聯動成員怒氣沖天，甚至將父輩的呢料將軍裝、佩戴的刺刀裹在大衣裏，在同伴面前示威、泄憤。

4月22日，毛澤東下令釋放“聯動”成員。5月29日，以“聯動”為核心，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紅衛兵萬歲”的紅衛兵一週年紀念會，聯動也從此結束了活動。而個別成員的活動則維持到了1968年春夏間。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分配工作、上山下鄉時，檔案裏都被註明“聯動分子”、攻擊“中央文革”等，也因為具備這些背景，他們在參軍、入黨和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時都受到阻礙，一些人為了避免麻煩，被迫改名換姓。

“聯動”的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壽（總聯絡員）、李單綱、項東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宮小吉（北大附中）、卜大華、馬曉軍（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張路寧（人大附中）、任志明、鄒平、趙戰平、董良翮、孔丹等。

雖然在“聯動”代表人物中，北京四中衹有孔丹名列其中，但不少媒體和“文革”專家指出，薄熙來也曾是這個由高幹子女組成的“聯動”組織頭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過五名紅衛兵“革命小將”，薄熙來就是其中之一。當時被接見的還有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還為她改名叫“宋要武”。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說：外表溫文爾雅的“帥哥”薄熙來，是文革初期令北京人聞風膽喪的紅衛兵組織“聯動”的活躍分子。因其父薄一波文革後成為輔佐鄧小平、江澤民的功臣，令薄熙來與其他參與“聯動”的太子黨成員一樣，未被清算當年的惡行，官位反愈昇愈高。

父親挨整母親自殺，兒子蹲五年監獄

文革中，薄一波被“四人幫”扣上“61個叛徒集團”的帽子，打入牢獄。官方媒體說，少年的薄熙來和他的兄弟姐妹，一下子全成了“黑五類”，受盡了磨。

後來，北京四中開始對“狗崽子”們展開批鬥。據說，薄熙來當年在全家兄弟中最不顯眼，是最不活躍的一個。當年參加紅衛兵中的風雲人物是他的哥哥薄熙永和薄熙成。現在他的中學同學在講述當年在四中時，還說薄熙來不過是個老實巴交的書呆子。

官方媒體如此強調薄熙永和薄熙成是紅衛兵風雲人物，而薄熙來衹是一個書呆子，似乎是想告訴人們，薄熙來並不是“三種人”，而是一個“文革”受害者，並因為父親挨整而被關了五年監獄。

曾有報道描述說，“文革”爆發後，造反派命令薄家兄弟交出有關薄一波的罪證，薄熙來在造反派抄家前偷偷藏起一包父母及家庭的歷史資料，交給一個關係好的同學藏了起來。不料看到薄家三兄弟都被拉到北京四中批鬥台上示眾，嚇壞幫薄熙來藏資料的同學，把這包資料交了出來。

資料中有許多是與被打倒的國家領導人的合影，照片被造反派送到了中央文革處邀功。江青親自批示：“把薄一波的狗崽子薄熙來抓起來”。17歲的薄熙來因此被關了整整五年監獄。在文革後為這段歷史平反的《人民日報》曾這樣寫道：就連年僅17歲的薄熙來僅僅因為藏了幾張照片，也給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被關了起來。

網上資料說，薄熙來一家在文革時都被關進了監獄，祇有一個小妹妹在外面，忙著在家做飯，然後挨個監獄送飯，手、臉、腳都凍壞了。還有資料稱，薄熙來在監獄被凍得腳骨都露了出來。

海外網站說薄熙來是"三種人"，應該是指薄熙來鬥過其父薄一波，這種情況在文革非常多，那是個非正常的年代；然而薄熙來內心恐怕一直不舒服，因為年輕氣盛，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鬥了自己的父親，而且被人長期議論。

多維社 2001 年 10 月發表的"揭露太子黨薄熙來醜事，文匯報記者下獄"一文說，雖然薄熙來在"文革"被關進了監獄，但他也是薄家中唯一跳出來攻擊已在中共權爭中失敗的父親薄一波的子女。仍然在世的薄一波已經原諒薄熙來，何況他的子女中唯有薄熙來繼承了他的政治專長，他的其他子女更熱心於經商，長子薄熙永在香港光大任副老總，三子薄熙成在北京從事酒店管理。

香港媒體在談到這段歷史時也指出，薄熙來在文革中六親不認、打倒父親，劃清階級立場，是當時有名的紅衛兵"聯動"分子。1977 年薄一波被"解放"了，薄熙來又忙著在父親的蔭影下大發利市。

BBC 中文網的評論文章說，薄熙來在接受外界記者採訪時，從不避談自己的"紅色家庭出身"，這也是他頗得外界，特別是港台媒體記者好感的原因之一。不過，每當他在表示"不否認『沾過老子光』"，時，都會強調當年，也就是"文革"時代，如果不是因為他那個"倒過霉的老子"，也不會在自己還是個正在認識社會和人生的中學生時，被關進了監獄。

"五年的監獄生活，使我經受了磨難，鍛煉了意志，學會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對一個社會是多麼重要，溫飽、自由、尊嚴對一個人是多麼重要"。從如上回答裏，不難感覺出薄熙來在

利用媒體宣傳自己方面是如何得精明。

針對"文革"中薄熙來"六親不認"攻擊父親的歷史，海外評論人士指出，祇是不知道在父親薄一波去世前，薄熙來是否向父親認個錯，如果認了，心情會好很多，如果只在心裏認錯，而沒說出來，那麼這種悔恨有可能嚴重影響他。

李彥春撰寫的"我是一個來自老百姓的兵"一文中寫道：薄一波疼妻愛子，但在黨性與親情間，三件事可說明他的傾向性。1967 年，薄一波在一次批鬥會上始知妻子胡明已與他陰陽永隔。"你老婆都畏罪自殺了，你還不承認你是叛徒"，薄一波故我。對胡明真正死因，他對組織表態："這事就交給組織了，我相信組織。"自此不提。



薄一波與胡明 1945 年結婚照

同是這一年，造反派要挾他再不承認叛徒罪行，其子女就會受到牽連，薄一波依然故我，於是，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在"學習班"裏度過五年鐵窗生涯。1973 年 10 月 27 日，子女們首赴 304 醫院探父時，欲留照片給他做紀念，然而他擺擺手。事後，薄一波坦告"怕你們軟化我"。

說起薄一波的婚姻，網上不少資料都說他對第一個妻子“忘恩負義”。1927年5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對共產黨員進行清洗，薄一波被通緝後逃到了一戶人家。男主人和他的女兒不顧危險收藏了薄，度過了生死關。薄與那位姑娘產生好感，結婚生了一女，就是後來中國駐丹麥大使鄭耀文的妻子薄熙瑩。

後來薄一波和女秘書胡明，也就是薄熙來的親母，發生感情，提出要和結髮妻子離婚。起初妻子不同意，到胡明打第三胎時，薄的結髮妻子主動提出了離婚。

幾十年後提起這事時，她還淚流滿面的說，“那時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麼也沒想。我爸爸對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離婚實在是傷了老人家的心。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也是一個女人，他的女秘書已經打了三個胎，我不能置她的命於不顧啊！”

胡明，原名李瓊英，祖籍福建閩侯，1919年10月出生於廣東瓊崖。少年時代聰明好學。“向往於捨生取義，崇拜岳飛、花木蘭，憧憬著做歷史上第二個女英雄”（胡明《歷史自傳》）。16歲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同盟。193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廣東省青年群社宣傳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中央黨校研究員、中央婦委研究員等職。

1945年與薄一波結婚。隨後，任職於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華北局。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中財委人事局，建工部勞動工資司、機械施工總局、技術情報局，第二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局，擔任處長、副局長、局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入獄12年，災難也同樣降臨到胡明身上。1967年1月5日，就在薄一波被紅衛兵揪回北京不到半個月，胡明又被造反派從廣州押上開往北京的十六次特別快車。在火車上，胡明被迫害致死。時年不滿48歲。

兩次婚姻都門當戶對，兒子李望知低調

1972年11月，薄熙來獲釋後不久，便到北京市二輕局五金機修廠當工人。此時薄熙來的感情生活也橫遭劫難，因蹲了整整五年的監獄，青梅竹馬的初戀早已分崩離析。據五金機修廠的工友講，師傅們都很喜歡他，大家紛紛給已年歲不小的薄熙來張羅找對像。

這時，一個叫李丹宇的女人，闖進了他的生活。李丹宇的父親是李雪峰。在薄一波坐牢、薄家家敗人散的時候，李雪峰仍處在政治春風中。

薄熙來和李丹宇都出身高幹，但境遇不同，兩人成長的經歷和所走的路也很不同：一個是在父蔭下參軍、學醫，有著令人羨慕、令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地位，一個則是受父連累坐牢、下鄉、進廠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因此被注入的精神內存很有差異。

李丹宇的父親李雪峰，與薄一波一樣也是山西人。“文革”前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文革”初期彭真被毛澤東整垮，李雪峰當上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隨後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權勢炙手可熱。在薄一波坐牢、家破人亡的時候，李雪峰仍走在政治春風中。

薄熙來和李丹宇都出身高幹，但“文革”中境遇不同，兩人成長的經歷和所走的路也很不同：一個是在父蔭下參軍、學醫，有著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地位；一個則是受父連累坐牢、下鄉、進廠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被注入的精神內存很有差異。當李丹宇進入薄熙來生活時，兩家的處境又發生巨大逆轉：薄一波被“解放”，而李雪峰卻在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上受林彪、陳伯達失寵的牽連，被隔離審查達八年之久。

不管怎樣說，薄陳兩家總還是門當戶對。據說李丹宇當時“強勢追求”，薄熙來的師傅們十分熱心地撮合，他們結成夫妻，並很快有了一個兒子。

知情人士透露，李丹宇是一個政治成熟、足智多謀的強勢女人。相比之下，薄熙來顯得“簡單得多”。兩個人的價值觀根本不同，感情不合在婚後不久就爆發了，直至鬧到離婚地步。

正當薄熙來在仕途上前景日益絢爛之際，他的家庭生活卻焦頭爛額。

他的離婚拉鋸戰持續了四年多。糾紛的後期，由於薄熙來又認識了一位叫谷開來的女孩，鐵心不離婚的李丹宇，正好把谷開來扯進來，將薄刻劃成“陳世美”的形象。調解過他們婚姻矛盾的人士說，在那個年月離婚有“新規定”，如果有第三者插足的案子，一般不判離。薄熙來認識谷開來就成了李丹宇不離婚的理由。

後來有中國媒體援引全國婦聯一位資深人士的話說，“挽救婚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李丹宇）的做法適得其反：到處寫信罵人家是『陳世美』，還到全國婦聯公開宣講薄熙來多壞，而且還傷害一個無辜的女孩子，這怎麼可能挽救婚姻呢？”但是也有人講，李丹宇的精神很讓人佩服。

《諸侯爭鋒》一書說：這場曠日持久的離婚案，在京城圈子內弄得盡人皆知。雖然從初級法院到中級法院都判決了離婚，但是韌勁十足的李丹宇，又以自己是現役軍人，“軍婚應當受到保護”為由，告到高級法院，最後甚至鬧到了最高法院。離婚後，李丹宇帶走衹有四五歲的兒子，和薄家脫離了關係，並很有骨氣地把孩子改姓了李，繼續進行她與薄熙來的漫長鬥爭。

據說李丹宇十年中散發了上百萬字的控告信。薄熙來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時，她的告狀信就寫到中央；薄熙來下放到金縣，她的告狀信就跟著到大連。後來有網友佩服地說，一個女人能堅持十多年窮告不捨，跟著薄的屁股後面不停地扔“炸彈”，也真夠薄熙來喫的了。李丹宇成功地使薄熙來終生背負著“離婚”的輿論，她對薄熙來和谷開來的指責，一直跟隨著這對夫妻。

這場感情悲劇，使得要強的李丹宇，不斷地按照自己的價值觀的指引，勇往直前。有網友評價，她最智慧的表現是，當薄熙來名聲鵲起、大權在握以後，她立刻調整了策略，成功地讓人們感到了她和已成年的兒子，似乎又回到了薄熙來的生活中；並還成功地造成谷開來和薄熙來離婚的印象。她善借薄熙來的聲望，成功地為自己打開商界大門，進入富婆行列。現在還有不少人錯把李丹宇當成薄夫人呢。

應該說李丹宇也是一個成功的女人，她成功地使薄熙來終生背負著“離婚”的輿論。李丹宇對薄熙來和谷開來的指責，一直跟隨著這對夫妻。

薄熙來與李丹宇的兒子李望知，已經過了“而立”之年。他1996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海歸後現在何處，尚是一個未曾揭開之謎。有網友披露李望知“器宇軒昂地打著薄熙來的旗號掙大錢”，還不無刻薄地評價：“他們母子倆活躍在大連商界，擁有豪宅、名車，用盡了薄熙來在大連的餘威。就報復薄熙來這一說，李丹宇幹得漂亮啊！”但語焉不詳，無法證實。

知情人透露，是薄一波發話，支持了離婚離得身心俱疲的薄熙來，把谷開來一手領進了薄家。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包辦了時任遼寧省大連市金縣的縣委書記薄熙來與谷開來的婚事。

薄熙來的第二次婚姻，也是門當戶對。谷開來與李丹宇一樣，也出身於高幹家庭，原籍也是山西。薄熙來的前岳父李雪峰，是中

央領導人層級；而第二任岳父谷景生，也不是等閑角色，他是“一二九”運動發動人之一，妻子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後代，抗戰時期太行山區的婦救會幹部。

谷景生是山西猗氏（今臨猗）人，1932年入團、入黨，比薄一波只晚了五年。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書記、北平學聯黨團成員。

在國共內戰時期，谷景生在第二野戰軍擔任軍政委。參加了淮海、渡江、廣東等戰役。中共建政後，擔任過中共昆明市委書記，在抗美援朝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政委，參與指揮上甘嶺戰役。他的部隊，後來湧現出黃繼光、邱少雲這樣兩位戰鬥英雄，至今仍名列解放軍著力宣揚的七大英模。

與親家薄一波一樣，谷景生在“文革”中被關押審查長達12年之久。復出以後，1978年11月，他剛剛平反，回家住了八天就飛赴廣州，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協助許世友司令員和向仲華政委，指揮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許世友後來多次說：谷景生有膽有識，能文能武，讓我非常省心。

1983年，谷景生調到到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工作，率中央聯絡組赴東北、華北，仍是擔任整黨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的薄一波的部下。

在“文革”中，谷景生夫婦相繼關押，谷開來的四個姐姐都被趕到農村，谷開來本人小學沒畢業，就上房當泥瓦匠，還到副食品店操刀賣肉，據稱是個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為了生計，她決定學彈琵琶，很快達到專業水平，被確定為獨奏演員，在北京電影樂團為電影錄音，毛澤東逝世紀錄片的琵琶伴奏，就是她演奏的。她還會彈鋼琴。



谷景生

1978年谷開來考北京大學。她沒學過中學的數學，幾近白卷，但是她的語文答卷作文寫得好，考上了北大法律系，後攻讀北大國際政治學碩士學位，畢業後成為職業律師。1995年，開來律師事務所由大連遷往北京。

“妻子谷開來眼中的薄熙來”一文說，和薄熙來相似的是，文革之中，谷開來的父母也相繼被造反派關，開來的4個姐姐，都被趕到了農村。谷開來沒有去農村，因為那時她還衹是個小學生。中學畢業，開來被分配到副食品店操刀賣肉。令人驚訝的是，這個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小的姑娘，卻在這一行裏練成了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

為了更長遠的生計問題，她決定學門手藝，她開始學彈琵琶，聰穎的她一學就會，很快就達到了專業水平，被確定為獨奏演員。在北京電影樂團錄音棚中為電影錄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紀錄影片中的琵琶伴奏，就是谷開來演奏的。

1978年，穀開來參加了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二年考試，並且報考

了北京大學。文革讀書的時候，她幾乎沒有好好學過數學，■此數學考試的分數很低，但她的文學答卷才情過人，竟然考上了北大的法律系。

谷開來和薄熙來，同為北大校友，但是他們的相識、相知，卻遲至1984年才開始。

許多人對於他們夫婦二人的名字，感到好奇：為什麼兩人名字的結尾一字，剛好都是一個“來”？對這個問題，谷開來笑著給出了答案，她說：“我父親給我起的名字，準確地說應該叫『開萊』，但我嫁給薄熙來之後，有一次他半認真地對我說，『現在你入了我們薄家的門，按舊時傳統，你要婦隨夫姓，今天咱們就不興這個了，你就婦隨夫名吧。』於是，熙來趁我還未來得及提意見時，就把我名字上的『草』給砍了下來。於是 我的名字就成了現在的『開來』。”

谷開來和一位朋友談到自己的丈夫時，曾這樣動情地說：“熙來也算是一個攝影家，他貼了一本我的照片，每張照片下面都寫了一段話，都是一些非常脫俗的讚美的話，他總是把影集放在他的身邊，從不給別人看。他把對我的這種感情不時放大著，一直放大到他的為人處世和心愛的事業之中。”

赴金縣“鍍金”，遭地方官員奚落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並於1980年10月加入中共。1982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後，他曾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辦公廳短暫工作過。

1984年，薄熙來“主動”要求赴基層鍛煉，他選擇了到遼寧省金縣擔任縣委副書記 當時人們都認為 薄熙來到金縣就是為了“鍍金”，人們更相信那就是對柯雲路筆下的理想化的“新星”李向南

炒作的結果。“老子在中央，兒子來地方，鍍上一層金，到哪都放光”。所以，薄熙來在金州的日子裏並沒有引起市民們的太多關注。

多年後，薄熙來回憶說：我35歲到金縣，那時候的事我還記得很清楚，先是到省委組織部報到，由省委組織部同志從瀋陽送我到大連，到大連以後住在大連飯店。當時，我跑到“天百”買了一個大皮箱，就到金縣了。

薄熙來到金縣擔任縣委書記時，人們對身為“高幹子弟”的他頗有微詞。有報道指出，當時人們都認為，中央領導的子女到地方任官是“沾了老子的光”。金縣經濟相對落後，地方保護主義濃重，薄熙來思考再三，決定取消地方保護主義。但他的意見剛一提出，就受到重挫，幾位老官員極力反對。他們還當著薄熙來的面奚落道：“你以為你有什麼本事？還不是沾你老子的光，想在我們這裏耀武揚威 沒門！衹要我們活一天，我們就不會允許外來商品進入本縣。外來商品一衝擊 我們靠什麼喫飯？你拍拍屁股走人 但我們呢？”

薄熙來感到很失落，為了百姓，辛辛苦苦的尋找致富的道路，卻遭到如此打擊。

回到住處，他心痛難忍，傷心地落下了眼淚。隨後，他撥通了父親的電話。父親沒有半點同情他，相反，還大聲訓斥：“男子漢要有骨氣，要用實際行動證明一切！你連這點小事都處理不好，還如何當個好官？”

薄熙來再次遭到打擊，而這次的打擊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父親。隨後幾天，他照常去上班，但他卻坐在辦公室一動不動，獨自在那裏發呆。他想：自己一個人獨自在外地為官，拼命為老百姓做事，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屢遭冷落，既然如此，還不如辭官回家，但他的偉大抱負又在心底一次次打敗他的想法，他想：既然來了，就好好拼一把！輸就輸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良苦用心得不到老百

姓認可。於是，第二天，他就決定腳踏實地的繼續幹下去！

當年老父親過生日，薄熙來跪到父親的面前，咚咚咚地磕了三個響頭！父親語重心長地說：熙來，當官不容易，當個好官更不易，但是，我希望你是個好官，是個為人民做事的好官，別給你老子臉上抹黑……"

薄熙來在金州的那些日子裏條件一直是比較艱苦的，但是，他把金州這座古城的各項工作抓得井井有條，是金州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實。當薄熙來離開金州時，他交出了在地方工作的第一份成績單：金州的鄉鎮企業、計劃生育、教育、體育、科普等 10 多個項目獲評先進。

薄熙來與第二個妻子谷開來相識，也是在金縣。1984 年，谷開來和中央美院的傅天仇教授，一起到大連金縣考察一個環境藝術課題，薄熙來當時正是那兒的縣委書記。

谷開來回憶說："我沒想到，他也是北大畢業的，可是我去的時候，這位北大的高材生正蹲在荒涼的海灘上，和當地農民興致勃勃地策劃農村經濟發展的前景……他是個很像我父親那種極具理想主義的人。我去了他的住處，他住在縣委一個像是永遠也掃不乾淨的小髒屋子裏，用放在桌子下的一個破紙箱裏的小蘋果招待我和傅教授，然後開始大談他的理想。"

在當了商務部長後，薄熙來在談到金縣那段經歷時說："對於幹部家庭出身的人來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對他的態度會有所保留。我當年到大連市的一個縣工作時，大家對我的態度就有所保留。但是，時間一長，人們接受了我。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關鍵在於你是否對大家有感情。"

原遼寧大學老校長馮玉忠回憶說，1987 年，薄熙來還在金縣當縣委書記時，馮玉忠帶著遼寧大學的百人考察團去大連考察，薄熙來邀請他去當時一片荒蕪的金石灘。薄熙來指著荒地對馮說："幾年後，我把這裏變成國內最大的旅遊度假村。"

馮玉忠心裏嘀咕："這不是想入非非嘛。"然而多年後，當金石灘真的成為全國最大的國家級旅遊度假村時，馮不得不嘆服："我的思路一般還是比較超前的，但事實證明還是不如薄熙來。"

大連三寶：足球、時裝節和薄熙草

從政至今，薄熙來仕途最重要的經歷，無疑是 1992 年起先後出任大連市長、市委書記的階段。

女作家陳祖芬曾說大連有三寶："足球、服裝節和薄熙草"（薄熙來在任大連市市長時，對種草情有獨鍾，簽名時草書"來"字像"草"字)。薄熙來在大連刮起了"綠色風暴"，在垃圾場上崛起了星海廣場；墳墩頭上建起了森林動物園；昔日的漁村、漁港變成了如今聞名遐邇的"金石灘"、"海之韻"；數百家工廠、數十萬居民大動遷，騰出來地方搞綠化。

於是有人戲言："大連的草種比糧貴"。的確，這幾年大連綠地多了，空氣清了，城市靚了，經濟也搞活了。如今，大連城市綠化覆蓋率已達 41%，人們稱讚大連像新加坡一樣，不是花園建在城市里，而是城市建在花園裏。2001 年 6 月 5 日，聯合國授予大連為中國唯一、亞洲第二個"世界環境 500 佳"城市。

不過，據說薄熙來剛到大連時，一些機關人浮於事，每天中午撲克牌聲、麻將聲不絕於耳。"誰打誰下台"，他下了道命令，沒多久，麻將桌撤了，撲克牌聲再也聽不到了。在大連還流傳著"半夜『機』叫"的故事。在重要官員基本都配備手機後，薄熙來發了條不成文的規定：晚上 11 點前不許關手機。因為他白天忙著開會和

調研，找人談工作基本上都在下班以後。有一次，一位局長晚上睡著了沒接電話，次日就被薄熙來“請”進市長辦公室：“看來你的工作壓力不大，那就多給你一些任務吧！”



大連

海濱城市大連有著“北方香港”的美譽，說到扮靚這座魅力城市，薄熙來功不可沒。“市長經營城市！一靠良好的環境，二靠吸引外資。環境加外資，就能發生化合反應，城市就能增值。”他這樣表明自己“經營城市”的理念。

在薄熙來力倡下，大連投資40多億元，在一片荒涼的鹽鹼地上建起了一個面積達110萬平方米、比兩個天安門廣場還要大的星海廣場。廣場建成後，隨著周邊設施的完善，地價直線攀昇，政府先期的投入資金全部收回。經過數年努力，大連到處是大片草坪；同時，大小廣場多達80多個，風格各異，形成了獨特的城市廣場文化，在中國絕無僅有。

從經營大連開始，薄熙來逐漸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人物。在大

連他一幹九年，其與足球（大連萬達）、服裝（大連國際服裝節）併列被稱為“大連三寶”。1993年，美國《華爾街日報》曾將他列為中國前景最好的20名官員之一。1999年9月，薄熙來獲晉陞為遼寧省委常委、大連市委書記，因“在住房建設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傑出貢獻”還榮獲當年的聯合國人居獎。

這與薄任職前的大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些老市民回憶，1980年代的大連，除了一個俄國人留下的天然良港和一些輕工業，大連整體經濟發展乏善可陳。“是薄市長改變了大連。”他們說。

輿論也普遍認為，薄熙來對於大連的經營是卓有成效的。10年來，大連城市競爭力逐年提陞，地價10年漲了10倍。在薄熙來任職期間，大連外資利用率佔遼寧全省外資利用率一半以上。

薄熙來還被外界追捧為“大連的名片”。他時時不忘宣傳大連。1996年大連國際服裝節上，基辛格、施特勞斯等國際知名人士的光臨，讓薄熙來和他代言的大連在鏡頭前著實過了一把癮。大連國際服裝節隨後也成為大連對外經貿的重要渠道。

而薄本人，也給大連留下一個個“事必躬親”的故事。至今在大連官員間還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薄熙來某晚工作到深夜，上廁所發現有水管漏水，馬上就打電話把人叫來呵斥一頓，要求立即修理。

大連市民至今對薄熙來“念念不忘”。一份民間統計資料則顯示，市民對薄熙來的滿意度達到了97.5%。許多接觸過薄熙來的人評價說，在招商引資方面，薄熙來是“行家裏手”，而且注重與外商“交心”。

在大連的一次年終聯誼會上，薄熙來問外商，你感覺大連什麼地方還讓你不滿意。一位外商談起大連一些機關辦事作風存在問題。一向在公眾場合溫和有加的薄熙來拍了桌子，要求嚴肅處理，

不久，該單位領導就寫了檢查。

薄熙來還有一個稱呼——“足球市長”或者“足球省長”，在大連萬達狂飆國內的幾年，薄熙來甚至下死命令要求奪冠。1998年元旦，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試圖用徐根寶換掉本地教練遲尚斌，此舉在薄熙來的直接干預下最終作罷。

不過，對於薄熙來在大連和遼寧時的政績，外界有著不同看法。眾多城市廣場通常佔地頗大且花費不菲；大片綠地耗去大量淡水，作為北方城市的大連卻嚴重缺水。因此，有人質疑，這是典型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超前建設，大連被譏諷為“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薄熙來“經營城市”，用賣地來發展城市的理念，也為後來的城市地價及樓價不斷攀昇種下了惡果，並連鎖性地影響到全國其他城市。

還有觀點認為，薄熙來在大連工作確有魄力，對“經營城市”的理念把握很好，大連在其任內是發展最快的時期，一個花園般的城市吸引了海內外的目光，當地人也充分享受了這種風景。但薄熙來對民生重視不夠，大連以高物價、低工資讓民眾不滿。

海外中英文雙語政經雜誌《CBF 中國經貿聚焦》發表文章指出，除此之外，海外普遍認為，香港《文匯報》記者姜維平被判刑六年與薄熙來不無關係。

姜維平是大連人，當地一些政界、新聞界人士對其很熟悉，而姜也因此知道很多“小道”消息、“內幕”消息。他多次以筆名在香港媒體上撰文，揭露大連乃至遼寧的政壇腐敗，並多處涉及薄熙來。由於消息來源出自二手，內容摻雜許多感情色彩，文章偏激的方式也成了其獲罪的把柄。2001年1月，姜維平被大連國安局秘密逮捕並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重刑。不少人認定這是薄熙來打擊報復，薄也因此備受譴責，甚至有人罵薄熙來是“軍閥式政客”，

對其負面報道不斷加劇且長期持續進行。

與許多“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地方官員不同，薄熙來還非常善於利用媒體塑造自己的形象：女作家陳祖芬曾為其撰寫長篇報告文學；在一份時尚雜誌舉辦的中國“時尚先生”評選中，薄熙來被列在候選人榜首，提名者認為他是“最具時尚眼光的中國官員”。他出席一些場合也時常遭遇媒體“瘋狂圍堵”，尤其是受到女記者們的追捧。

有分析指，儘管薄熙來擁有政治背景優勢，品貌和才能出眾，但與其父薄一波性格不同，薄熙來不太擅長成熟政客的圓滑，不善於隱藏自己，在大連任職時，在推行自己的主張時，往往采用強力手段，在政治鬥爭中也比較剛硬，“做事情太霸道”，結果導致許多公務員甚至普遍民眾的不滿。

遼寧腐敗案頻生，薄熙來被調離

早在2004年年初，在遼寧省腐敗大案頻頻曝光之際，就傳出遼寧省高層將有大變動，遼寧省長薄熙來即將調離遼寧省，到北京出任商務部部長。

外界頗為關注遼寧省領導層的變化，頻傳省長薄熙來將調離遼寧省，有傳他到北京任職，也有傳他將到南方某省任職。東北的腐敗問題接連不斷，而且級別越來越高，不能不讓人聯想領導層的變動與胡溫反腐有關。

當時東北曝光一系列腐敗大案，從震驚中外的哈爾濱“國貿城”案，到轟動全國的“慕馬”案，到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案，據稱涉案金額超過“慕馬”案；從掀起全國網壇關注的黑龍江“寶馬”案 再到據稱被人“自殺”在監獄裏的哈爾濱副市長朱勝文案

“慕馬”案：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原副市長馬向東案總涉案人員達 100 多人，其中副省級 1 人，副市級 4 人，僅黨政“一把手”就有 17 人。從市長、法院院長到檢察院檢察長，從財政局局長到國稅局局長，從土地局局長、物價局局長、煙草專賣局局長、建委主任到國資局局長……一個又一個要害部門幾乎全部“淪陷”。

大東案：原瀋陽市大東區委書記聶秉孝、副書記靳鐵玨已經因涉嫌受賄被“雙規”。據說大東案也是一起窩案，涉案金額超過曾轟動中國的“慕馬”大案。

劉克田案：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交待出受賄的 450 餘萬元，還牽扯到省內的一批廳局級幹部……

遼寧省一系列腐敗案件給遼寧造成很大震蕩，並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官方新華網公佈的“2003 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員職務犯罪”數據表明，遼寧省的職務犯罪數字居全中國之冠。根據這個公佈，中國東北遼寧省的職務犯罪案件高達 8486 宗，涉及金額最少 4.8 億元人民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薄熙來完成了由“封疆大吏”到“內閣”部長的角色轉換，重返北京，出任中國商務部長。

2 月 15 日，中共遼寧省委召開全省領導幹部會議，中組部副部長李建華宣佈薄熙來調離遼寧，另有任用。媒體指出，儘管有關部門對薄熙來的去向沒有明說 但 54 歲的薄熙來接替呂福源擔任商務部部長的消息，已不脛而走。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呂福源由於健康原因已經不能主持日常工作，薄熙來被委任為呂的繼任者，屬於正常的工作調動。

這應該是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後最為醒目的省部級官員人事變動之一。據瞭解，先是中組部官員找薄熙來談話，2 月 14 日，遼寧省委常委為薄熙來舉行了歡送會，15 日，全省領導幹部會議宣佈

中央的決定，16 日，薄熙來在遼寧省政府辦公廳門前小廣場與大家話別，飛往北京。

此前，沒有跡象顯示薄熙來會離開遼寧。2004 年 1 月 8 日，有記者在北京見到薄熙來，曾問他是否會像傳聞中那樣出任北京市或廣東的要職，他予以否認。

進入 2 月份後，薄熙來的工作日程極為稠密：2 月 9 日，邀請遼寧各界人士 80 餘人進行座談，徵求對遼寧省《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作為省長，薄熙來一直在為即將召開的遼寧省兩會準備自己的報告；12 日，出席遼寧省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工作會議，當晚會見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13 日，出席表彰 2003 年度做出突出成績公務員的會議 14 日，出席“扶貧幫困成果展”開幕式並致辭。

2 月 9 日那天應薄熙來之邀參加《政府工作報告》座談會的遼寧大學法律系教授姜群和瀋陽市二十中校長于萬祥等人告訴記者，他們當時沒有聽到任何薄熙來將會調離的消息，沒有想到薄的卸任會這麼快。



任遼寧省長時的薄熙來

由於要在 3 月上旬舉行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前完成對薄熙來的任命，以便通過人大批准，從而引發了遼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一系列重要的人事變動。原

定於2月中旬召開的遼寧省兩會決定推遲到2月下旬召開。

薄熙來曾經對《文匯報》記者說，做官身不由己。這句話使人感到他一度也很難確定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這一次看似有些偶然和倉促的調整，外部輿論普遍認為，薄熙來進京主持商務部工作，使他能夠及早超越錯綜複雜的地方政治體系，從而將自己鎖定在圍繞政府核心的軌道上。

於2003年3月組建的商務部是本屆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一步，由於將原來分別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管理的進出口工作和反傾銷工作統一到商務部中，使其在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中承擔著重要職責。由於身體原因，商務部第一任部長呂福源沒有來得及完成自己的使命。

半年之前在大連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上盛情接待呂福源的薄熙來，現在則要像當時的呂福源一樣，竭力使中國加入到更多的國際俱樂部當中。顯然，中國的貿易政策不可能因為薄熙來擔任商務部長而有大的改變，而是繼續遵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另一方面，中國似乎難以在短期內再承擔新一輪大規模的市場開放。很顯然，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商務部長需要與遼寧省長有所不同的政治智慧和行政能力。

一直被薄熙來尊為師長的原遼寧大學校長、遼寧省政府參事馮玉忠對薄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以薄熙來的個性和行事作風，他可能不適合在地方工作，最適合的崗位之一就是外經貿部。因為薄熙來擅長與媒體溝通，很容易成為一個符號性人物。”

15年前，薄熙來還是一個縣級幹部，登門請教馮玉忠。當時馮玉忠就認定薄熙來具有“大手筆”潛質，他認為薄熙來早就應該調走。但是直到2004年2月5日晚，馮玉忠在遼寧友誼賓館見到薄熙來的時候，絲毫看不出薄有調離遼寧的跡象。那天是元宵節，遼寧省領導與全省各界代表400餘人歡宴一堂，被稱為“老爺子”的馮玉忠提議大家舉杯。他只記得薄熙來連連說：“這些年，遼寧不容易，大家不容易。”

其實在幾年前，外經貿部（商務部前身）中就有薄熙來要來擔任部長的傳言，後來不了了之，隨著機構改革，也沒人再提起這事。直到最近薄熙來的任命明確之後，商務部裏才有人想起兩年前的傳言。

“魅力部長”的五種面孔

無論是“薄熙來的五種面孔”，還是“『魅力部長』的五種特質”，在薄熙來出任商務部長後，中國媒體都喜歡用這樣煽情的標題和內容來吸引眼球。

因為“在莊重壓倒活潑的中國政壇，薄熙來是個特例，俊朗的外表、優雅的談吐、開放的作風使得他獲得明星般的待遇。他的能力更是令人側目，短短幾年，他從大連市委書記到遼寧省省長，再到商務部部長，上昇勢頭強勁。”——北京《時代人物週報》稱。

薄熙來出任商務部長後，媒體再次給予高度關注，德國的《今日中國》雜誌稱，“他善於跟媒體交流，憑著流利的英語和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能力，薄熙來對於中國這個正處於上昇期的世界經濟大國有著積極的作用。”德國《世界報》則把他稱為“穩定執政黨領導地位的推動者”。

薄熙來出任商務部長，可用“臨危受命”來形容。2003年3月組建的商務部首任部長呂福源自當年下半年開始就因患病不能正常工作，次年5月病逝。評論指出，調任商務部長後，薄熙來一反在遼寧的處事風格，開始表現得非常低調。

據悉，當時國務院一位主要領導人曾告誡薄熙來，擔任國務院部委領導跟地方領導不同，還是謙虛謹慎點好，否則會走彎路。這個傳言是否真實無從考證，但在中國內斂穩重確是為官的潛規則。

官位的變遷讓薄熙來改變了行事基調，卻未改變他依舊雷厲風行的作風和率直性格。在上任幾天後，薄熙來就迅速公佈了一份被稱為“薄15條”的工作改進意見。規定譬如所有外事活動的談話必須錄音，兩小時內須將文字記錄報送他本人，四小時內報送簡報；部裏所有高層領導的手機必須24小時開通等。

薄熙來是部委官員中少數能說流利英語的人。2005年，在一次與美方的會談中，因美方翻譯不是很流利，作為中方主談的薄熙來忍無可忍，用流利英語直言：“我們的時間非常緊張，在座的中方人員都聽得懂英語，你可以不用翻譯了。”

北京《時代人物週報》評價說，薄熙來身上具備五種特質：低調、率直、忙碌、幽默和念舊。



時代人物週報封面

在來商務部之前，無論身為大連市市長還是遼寧省省長，薄熙來總不忘在各種場合進行主動推銷。中央推出振興東北的方針後，他更是屢屢作為“推銷”遼寧的主角。“媒體採訪我，我可以借機把瀋陽、大連等城

市的優勢好好和人家聊聊，讓人家知道，人家才能來投資。”調任商務部部長後，薄熙來一反在遼寧高調的處事風格，轉為不出頭、不亮相、不講話，表現非常低調。

薄熙來履新的第一週，就有內地、香港等十多家媒體希望採訪他，都被他以“剛剛上任，需要先熟悉工作了”為由而拒絕。直到“兩會”期間被記者堵住，薄熙來才第一次公開對媒體說話，但回答十分謹慎。當有記者讓他談談“本屆政府一年來的工作成績”時，他只簡單地說：“我覺得這一年幹得很好，非常好。”

官位的變遷讓薄熙來改變了行事的基調，卻沒有改變這位新部長率直的性格。在大連市和遼寧省擔任領導時，他敢說能講，沒官腔，做事乾脆利落，不拖泥帶水。在商務部，他的這種性格同樣得到了體現。

2005年6月，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一行訪華期間，薄熙來曾設宴款待。席間，美國萬豪集團的老總抱怨在中國開飯店手續繁多，薄熙來立刻回應道，有什麼問題你來找我，我處理。接著轉頭責成在座的相關負責人立刻著手解決問題。

商務部的一位工作人員稱，他們的部長喜歡按照自己的路子走。薄熙來承認自己是個急性子，幾乎是“有什麼說什麼”。

因為時間緊而不用翻譯，對於薄熙來而言，這樣說並不是“作秀”，他的確非常忙。商務部一名工作人員說，部長的工作態度是沒得說，可以用“沒日沒夜”形容，更不用說過週末了。有時外事會見要安排到晚上九點多，一天會見三、四批外賓是司空見慣的。

有人統計過，薄熙來到任商務部長的三年多時間裏，出國訪問的次數就達200多，如以平均每次三天來計算，有逾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外國度過。

文章稱，一表人才的薄熙來，口才極為了得，在很多公開場合，都不時顯現出他的幽默，使氣氛十分輕鬆。在 2005 年 12 月中國美國商會舉辦的“年度答謝晚宴”上，他笑談中美貿易關係：“在世界貿易市場上，美國產品處於高端和中端，我們則是在中端和低端。這就像在宴會上，你們有錢喫龍蝦、喫牛排，而我們在喫饅頭、喫三明治。有趣的是，美國朋友一邊喫著龍蝦和牛排，一面還盯著我們，看三明治是不是喫多了。這種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實在難能可貴。”他的風趣講演多次被掌聲和笑聲打斷。

2004 年 7 月的第二屆大連國際軟交會，薄熙來在致辭中對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於百忙中出席深表感謝，接著他突然話鋒一轉：“我們希望吳儀副總理不僅僅出席第二屆大連軟交會，還希望她能夠出席第三屆、第四屆大連軟交會！同意的請鼓掌通過。”頓時，台下掌聲雷動。鼓掌完畢，吳儀笑稱自己被“預定”了。

而薄熙來對大連軟交會的支持也表現出他對昔日故地的念舊之情。軟交會的規格不高，影響力有限，但吳儀與薄熙來的一道出席，相當於將會議的規格提高了許多。

上任伊始，薄熙來就遭遇了中美貿易危機。2004 年 4 月，他陪同吳儀飛到美國，這是其任商務部長後的第一次出訪。經過三天磋商，中美雙方簽署了八個合作協議和備忘錄，並在知識產權、服務貿易、農產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消費者安全、第三代無線通訊標準、最終用戶訪問和促進美對華出口等若干問題上取得了重要進展。

雖然關於此次會談的具體細節外界知之甚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薄熙來的務實、幽默和機敏促成了談判的順利進行。

薄熙來能言擅辯的水平在中共高官中少有，他總是在為自己的行為和立場進行解釋的時候，殺一個回馬槍，爭取主動。例如，2005 年 3 月在就中非經貿答記者問時，他說：“批評的一個最重要依據是中國從非洲拿石油，但從統計角度來看，去年非洲全部出口的石油，中國只佔了 8.7%，歐洲佔 36%，美國佔 33%。如果說進口 8.7% 都有掠奪資源之嫌，那 36% 和 33% 應該怎麼來看呢？”

2005 年 5 月，正值中國與美歐紡織品貿易爭端達到白熱化時，薄熙來以商務部長身份首次出席國務院新聞發佈會，直言美國的所作所為是“貿易保護主義”，在 WTO 自由貿易這個普遍原則下，對中國的紡織品采取數量限制，是“不光彩的行為”。“你給我們的企業加上半斤的壓力，我就要給它撤掉八兩的負擔。”

此後，在歐美試圖將中國紡織品出口同人民幣升值議題“捆綁”之際，薄熙來再次表現出他的硬朗，明確表示兩者“橋歸橋，路歸路”，中國絕不接受將二者“混為一談”的做法，絕不以這樣的錯誤邏輯來進行貿易爭端磋商。

同年 6 月，在中歐就紡織品出口達成備忘錄後，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曾評價薄熙來是“一個強硬的談判對手，對於談判細節有非常強的把握能力，有強烈的個性”。

《華爾街日報》文章說：“薄知道何時應作出讓步，何時應該保持強硬”，“善於學習”的薄熙來在貿易問題上的影響力將迅速上昇——“在中國必須對其貿易夥伴不斷指責不公正貿易行為作出回應的時候，薄熙來的個人魅力應該具有愈來愈重要的價值。”

調到重慶，薄熙來一度拒絕上任

在備受關注的中共十七大上，薄熙來晉陞政治局委員，並確定接替汪洋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但薄熙來在十七大閉幕後一個多月既沒有到重慶履新，也沒有在最近北京的兩次重大國際商務活動中露

面，其行蹤惹人疑猜。

中共十七大閉幕後，人事調動頻繁：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都已經先後進行權力交接，到北京報到，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也已經交卸職權，調往上海上任。按照中央安排，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將調往廣東接替張德江，張德江則上調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職務則由現任商業部長薄熙來接任。但奇怪的是，薄熙來遲遲未前往重慶，致使汪洋和張德江也都不能成行。

2007 年 11 月 13 日，重慶市委舉行三屆二次全會，重慶市包括所有區縣主要負責人在內的 300 多名幹部出席，汪洋發表了告別講話。人們本來以為薄熙來也會在這個會議上出現，接過權柄。海外多家媒體甚至報道"多名商務部幹部隨薄熙來一起到重慶"，稱"根據 17 大期間商務部與重慶市政府簽署和合作框架協議，今後商務部和重慶市幹部將相互掛職鍛煉"。

但隨後海外媒體立即發現實屬誤報，薄熙來並未前往重慶接任。政治觀察家注意到，那幾天，北京兩個重要的國際經貿活動相繼舉行，第一個，是法國總統薩科奇訪華，兩國簽訂價值 200 億歐元的經貿合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了簽字儀式；第二個，是中歐食品安全研討會，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出席了會議，闡述中國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原則立場。但是，如此重大的活動，商務部長薄熙來卻沒有按照慣例出席，媒體上也沒有關於薄熙來出席別的更重大活動的消息，這不能不使海內外人士感到詫異，連香港大公網都說"不能不使人感到一點奇怪"

政治觀察家分析說，薄熙來既未到重慶履新，又不在北京如此重大的活動中露面，有兩種可能：第一是他身體染恙，不克出席；第二就是他對中央安排他去重慶不滿，拒絕到任。

如果是前者，按照中國的慣例，往往會讓薄熙來以某種方式，例如寫信、對記者發表談話等等來"露面"但薄熙來並未如此，而是"神秘匿形"。但北京謠傳，他在十七大中央進行權力調整佈局時，意在國務院副總理，沒有想到高層將他安排主掌重慶。

北京謠傳說，薄熙來對中央調令思想不通，拒絕上任。但如此一來，產生卡位效應，其他相應的許多人事調動也因此受阻，使已經發表告別演講的汪洋陷入尷尬境地，而且此舉甚至可能牽動原定的整個人事佈局，後果難料。

據消息人士稱，薄熙來和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定於 11 月 29 日到重慶，隨後正式宣佈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新華社 12 月 1 日報道說，日前，中共中央決定：張德江同志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汪洋同志兼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薄熙來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

香港媒體評論說，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表明其政治前景難被看好。十七大前，關於他可能被任命副總理的傳言頻繁，此番任命與早先的猜測相差懸殊。當時，薄熙來高調動用媒體為其宣傳。當時媒體炒作商務部黨代表大會選舉十七大的代表時，薄熙來以全票的第一高票當選，成為該部排名第一的十七大代表。

香港《明報》說，另外，關於其父、也曾經擔任中共商務部部長及副總理的薄一波的遺囑被炒作。遺囑雖然後被否認，但此類新聞被視為是替薄熙來拉分。無奈中共高層內部也是派系林立，意見重重，最後在太子黨內選了一個相對低調，能令各方接受的習近平。

薄熙來的仕途受影響，除了中共內部鬥爭的考量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醜聞不斷、官司纏身。他不僅在國內有生活作風問題的傳言和打壓記者姜維平的記錄，海外更有人權團體對他在任遼

寧省長期間打壓法輪功的罪行窮追不捨。

商務部部長不光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職位，很大程度上還具有外交的職責，在國際舞台上需要頻繁露臉。而薄熙來幾乎每到一處，都碰到法律起訴，非但讓他本人頭疼，更讓其他中共高層大為惱火。薄熙來幾次遇到的起訴事件，都是在他陪同溫家寶、吳儀等訪問時候發生的。

也有評論指出，其實薄熙來早就是公眾心目中的政治明星，也早就進入中共高層的接班後備名單。1993年，美國《華爾街日報》就曾將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列為中國前景最好的 20 名官員之一。

媒體有這種眼光，固然是著眼於薄熙來的才幹，但更著眼於他的家世背景——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公子。薄一波拜長壽之賜，笑到最後也就笑得最好，到了90歲還有餘熱可發。薄家子女眾多，但素有"美男子"之稱的兒子薄熙來，最有官運。

官場中許多人遵循這樣的規則以求仕途順暢："說別人說過的話，走別人走過的路。"不過，薄熙來的為官之道就"公然"違背上述"蕭規"，以至，有關他的爭議也源源不斷。

"開放，大開放"，掀起紅色高潮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出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在頭一個月為數不多幾次公開露面中，對於重慶未來發展提及最多的，就是打造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開放，大開放。

《21世紀經濟報道》說，當地政經觀察人士將之稱為：薄熙來的大開放觀。

在2008年1月15日召開的重慶市政法會議上，薄特別強調了

完善法制與"大開放"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一個法治健全的成熟市場，各種經濟要素會不期而至，越發展越順利。無論是世界500強還是中國500強，就會因有章可循和安全感而放心、安心到重慶來。"

他還強調："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一定要在政法戰線培養一批精通金融、財務、房地產、國際經貿規則的專家型人才。這樣才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自去2007年12月1日正式上任1個多月時間內，薄熙來給重慶人留下了非常低調的印象。他僅在一些常規性會議露面，其餘時間大都在"微服私訪"，最遠的地方涉足渝東北三峽庫區的萬州和雲陽。

但不論如何低調，凡在公開場合，薄熙來總是會提及改革開放，其對引領重慶走向"大開放"之路，顯得迫切而堅定。很多重慶人相信，這祇是一個開始。前任市委書記汪洋，在任期兩年內，為重慶發展開拓出全新局面。由此不難理解，重慶人對新市委書記亦期望極高，何況薄早就是全國耳熟能詳的"魅力高官"。

有人將薄熙來來渝，與之前央行行長戴相龍就任天津市市長的例子相比擬。戴為天津引入了以千億計的資金，而薄的優勢在於他的開放人脈與資源。

薄熙來強調，"重慶根本出路在擴大開放，最大動力也在擴大開放，重慶人必須做出科學的定位，有勇氣把自己置身於開放的前沿。"

不過，也有媒體指出，要想實現這個"大開放"，對於重慶，路還很長。對於薄熙來自己，祇是剛剛開始。

薄熙來赴重慶任職後不久，人民網就開闢了專欄，名字是：薄熙來——"魅力"高官背後的多個角色，該欄目收錄著薄熙來在重

慶的“政績”，比如說：

“總導演”薄熙來——重慶市各級官員電視辯論賽；山城官員大 PK，“總導演”是薄熙來；“歌手”薄熙來：帶頭唱響紅色經典歌曲；唱響經典紅色歌曲激發改革發展豪情；推薦 27 首經典歌曲，供全市大中小學生傳唱……

2008 年 7 月 7 日晚 7 時半，重慶市三峽博物館學術廳，重慶“解放思想、擴大開放”電視辯論賽半決賽場開幕。

來自重慶市外經貿委四位辯手氣勢如虹的開場白，分別借用了阿迪達斯、李寧、耐克、雪碧的廣告語。他們是辯題“三十年後，重慶與京津滬比肩而行可能性大”的正方。

當地媒體報導說，台下聽眾之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他率領的 12 位市委常委。這是一場面向公眾、由重慶各級官員擔任辯手的電視辯論賽。薄熙來是這場大 PK 的策劃者，他本人出席 7 月 7 日的半決賽和 7 月 14 日的總決賽，並親自登台發表點評。

剛導演完山城官員大 PK，薄熙來又在重慶掀起一場唱響經典紅色歌曲的“高潮”，用官方喉舌人民網 7 月 11 日的報道說：火紅的夏日，一股歌唱紅色歌曲的熱潮在山城重慶湧動。近日，由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教育委員會推薦的首批 27 首革命歷史經典歌曲，以及 18 首改革開放以後的現代經典歌曲面向重慶市民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紅星歌》、《我的祖國》等一批廣為流傳的經典革命歌曲均在其中。

以下是人民網對薄熙來在重慶“唱響經典紅色歌曲激發改革發展豪情”報道：“紅星閃閃放光彩……”“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6 月 21 日下午，以“祖國在我心中”為主題的愛國主義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動在重慶市九龍坡謝家灣小學啟動。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辛勞為民族，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7 月 1 日晚，“頌歌獻給親愛的黨”——重慶市直機關迎“七一”歌詠會在重慶市體育館拉開帷幕。當重慶市黨政軍領導、老同志代表與重慶市市委辦公廳等 14 家單位機關幹部共同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時，全場掌聲雷動，數千支小紅旗隨著歌聲飛舞。

薄熙來強調說，“在新世紀新階段，回顧和唱響紅色歌曲，對於貫徹落實市委關於建設紅色城市的指示精神，激發全市人民振奮精神、負重自強，艱苦奮鬥、努力拼搏，加快實現『314』總體部署，有著重要的感召、激勵和推動作用。”

2008 年，薄熙來帶領重慶高唱了一年的紅色歌曲；2009 年，他又帶頭“原創”紅色短信。薄熙來的系列紅色“運動”讓重慶成為媒體關注焦點，得到官方媒體的支持和稱讚，但也遭到網民和海外媒體的奚落和抨擊。

人民網報導說，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最近親自創作并發送了一條短信：“我很喜歡毛主席的幾句話，『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人是要有精神的！』這些話很精幹，很實在，也很提氣。”市民反響熱烈，迅速在市民當中傳播，短短數日，就以 1600 萬次轉發量而榮登最受群眾喜愛的紅色短信。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 年 5 月 20 日發表倪洋軍“薄熙來原創紅色短信為何最受百姓喜愛？”一文，把薄熙來倡導的紅色系列稱為軟實力和競爭力的提陞。文章稱，“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發短信”，由薄熙來親自動議的“四位一體”的群眾性文化活動推廣以來，每次都讓重慶人的眼前一亮、心頭一熱。為鼓勵健康有益

的手機短信創作，薄熙來更是率先垂範，親自創作並向市民發送，弘揚紅色文化、倡導奉獻精神，給重慶這座有著革命傳統的紅色城市增添了無盡力量。1600 萬次的轉發量，凸顯了市民對薄熙來紅色短信的喜愛。正如薄熙來在短信中所述，毛主席的這幾句話很精幹，很實在，也很提氣。



薄熙來帶頭高唱"東方紅"

不過，與官方媒體宣傳形成對比的是，薄熙來在重慶推出的"紅色系列"，卻遭到海內外網民的奚落和抨擊。

作者石飛在"懇請薄書記莫用『紅段子』擾民"一文中說，當下，手機已經成了民眾的不可或缺的通訊工具，有關資料顯示，全國現有用戶手機六億多部，可見其大眾化、普及化的程度。手機在為人們提供交流極大方便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乃至痛苦，就是大量的"垃圾短信"，防不勝防，無可奈何，衹能撒開雙手任人"強暴"。這種"強暴"不是偶爾的，而是沒完沒了的，無時無刻的，晝夜不分的，人們忍無可忍，苦不堪言，又不得不一

邊詛咒一任其"施暴"。

文章稱，"垃圾短信"泛濫成災，讓億萬手機用戶苦不堪言。然而，在當下的科學水平狀況下，想要遏制和阻攔又是無法做到。於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強力推廣了一種"妙招"，並率先垂範踐行，就是給手機用戶發送"紅段子"。自此，其轄區內拉開了"紅言頌活動"的大幕，官員百姓大張旗鼓地傳送、轉發"紅色短信"。為把這項"紅言頌活動"引向深入持久，重慶市委專門召開會議發動，並製訂獎勵措施：每天從民眾發送的原創紅色短信中，選出 50 條好短信，給予 10 元返費獎勵，再從中選出 3 條最佳短信，給予 100 元返費獎勵。如此組織和鼓動、激勵，自然成績斐然。

文章最後說，什麼"紅歌"、"紅言"？對於這些，凡是親歷過文革浩劫的人們，觸目驚心得很，無非都是那些"造神"的東東，還美其名曰是什麼"文化思想新潮"，不過文革故伎重演而已！重慶的所謂的"文化思想新潮"的狂瀾驟起，不免讓我們有一種"文革欲來風滿樓"的悚駭之感。

吹捧紅色文化，薄熙來打政治盤算？

我們再來看看媒體對薄熙來在重慶掀起的"紅色風暴"的評論。香港《東方日報》指出，重慶吹捧紅色文化，薄熙來打如意政治盤算。在薄熙來的主導下，重慶最近力捧紅色文化，包括唱紅色歌曲、發紅色短訊、讀紅色經典。薄熙來今次的做法，大有政治深意，目的是為了向外界表明自己是紅色江山的接班人。

官方媒體報道，薄熙來主政重慶一年多之後，全市有 3300 多萬人次參加了紅歌傳唱，而去年 12 月發行、由薄熙來親自命名的《讀點經典》叢書，很快成為重慶人的"口袋書"，已累計發行 26 萬冊；

講故事活動啟動才幾天，“故事會”便由重慶人民大禮堂開到了居民小區和農家院壩。之後，重慶當局又開展了紅色短信的創作活動。

這一系列活動的背後，總導演、總策劃都是薄熙來。重慶宣傳部長何事忠說，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從整體創意到具體方案，薄熙來都親自謀劃、審改，不僅推薦首批 45 首經典歌曲、為《讀點經典》叢書作序並審定每輯內容，還設計講故事活動的架構，而紅色短信創作活動，也是薄熙來發出第一個紅色短訊。薄熙來花費如此大的精力來推動紅色文化，並不僅僅是為了“提振重慶精氣神”那麼簡單。

中共十七大，薄熙來雖然更上一層樓，晉陞政治局委員，但卻發配到西南的重慶，並沒有如外界所料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可謂有得有失，這也說明他的晉陞在黨內高層存在一定的爭議。

從年紀上看，雖然薄熙來在未來的中共十八大有晉級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但由於他現在所處的位置並不是很有利，尤其是相比廣東的汪洋、國務院的王岐山、中組部的李源潮，薄熙來並不佔優勢，這些人不是掌握經濟重鎮，就是掌握金融實權，或是組織大權。

《東方日報》評論說，薄熙來要想在十八大上出頭，必須在主政重慶期間有所作為，他需要民意的擁護與黨內高層的支持。薄熙來在大連及遼寧期間，曾以一句“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揚名全國，說實話，在此期間他敢作敢為，也做出了不少實績，但同時也留下桀驁不馴、難以共處的惡名。薄熙來在擔任遼寧省長期間，與當時省委書記聞世震水火不容，便是一例。

薄熙來擔任商務部長的時間不久，但期間外資在華購併如入無人之境，尤其是對中國各行業排頭兵進行斬首式的收購，讓中共高層相當不滿。2008 年被雙規的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官員郭京毅腐敗案震驚全國，國內媒體口誅筆伐，不時影射薄熙來，這些都是薄熙來的軟肋。

習近平成為中共第五代接班核心，讓薄熙來意識到，紅色江山代代傳，是中共黨內高層的共識，衹有高舉紅色江山代言人的大旗，才能獲得黨內元老們的鼎力支持。正是這個原因，促使薄熙來不遺餘力地推動紅色文化，彰顯自己的政治立場。

BBC 中文網在“紅色短信弘揚何種紅色文化？”的文章中說，50 多年前在薄熙來八歲的時候，毛澤東在莫斯科對數千中國留學生發表了著名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當時的“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們（指青少年）如今都已經過了“耳順”、不爭論的年齡（子曰：六十而耳順）。近 60 歲的薄熙來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他最近親自創作併發送了第一條所謂“紅色短信”，帶頭鼓勵健康的手機短信，弘揚紅色文化。

不過薄書記紅色短信很快在網絡上有了更正版：“我很喜歡毛主席的幾句話，『世界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不過）做事要大家來”、“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所以世界最怕共產黨）”、“人是要有精神的！（就像鄧玉嬌那樣。）這些話很精幹，很實在，也很提氣。”還有網評說：“世界不是我們的，而是那幫孫子的”

50 多年過去，世界不僅沒有像老一輩革命家預言的那樣變成紅色，沒有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天下，中國反而主動同西方世界接軌，國內的社會和政治伴隨經濟發展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紅色接班人變成了太子黨和權力精英，“紅色貴族”和“紅色短信”裏面的“紅色”已經具有強烈的反諷意味，引起許多網民的反感。



薄一波去世後的薄熙來

BBC說，薄熙來，和習近平一樣，是有顯赫家世背景的高層中共領導人。薄在遼寧和重慶主政行事高調，善於利用公共輿論造勢，其風流倜儻的形象同習近平的低調形成對比，但兩人都以不同方式顯示出太子黨獨有的自信。年初習近平在海外痛指"有些喫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中國說三道四。習近平強硬的外交姿態得到不少中國人的讚揚，但也有人說，習近平一不留神暴露了公眾最反感的太子黨"主子"心態。

薄熙來的父親是中共元老薄一波，薄熙來的兄弟姐妹的身份多為大公司總裁、政府高官……薄熙來自己也在實踐許多中共高官的家庭經營模式：老公從政，老婆經商，兒子留洋。

可見紅色貴族，發紅色短信，弘揚紅色文化，其中不乏諷刺，並在許多網絡評論中得到印證。在中國目前所處的後意識形態階段，似乎還沒有一種官方主導的理念能夠強大到引導群眾偏離自己喜聞樂見的各種"低俗"之風，包括手機黃段子、灰段子、山寨春晚……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評論說，薄熙來大搞"紅色文化"，被網民們譏諷為典型的愚民教育。

薄熙來在重慶大力推動的"紅色文化"活動，一浪高過一浪。從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發展到互發"紅色短信"活動。為了避免單純提倡這類短信很少有人響應的尷尬，官方也鼓勵把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格言警句以及市民自創的、符合中華傳統美德的勵志箴言當作"紅段子"傳播。

不過，網民們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有網友認為，唱紅歌是搞形式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愚民教育，我們這代人已經被愚弄了幾十年，難道還要再讓下一代繼續被洗腦嗎？也有網友點評說，這是不務正業！高官們想回到那個專制時代，老百姓卻不答應！另有北京學者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官方曾多次發動以弘揚"紅色文化"為主題的宣傳活動，但往往都是虎頭蛇尾，成不了氣候。

兒子薄瓜瓜當選英十大傑出華人青年

正當薄熙來正在帶領重慶高唱紅色歌曲、原創紅色短信時，中國官方媒體卻在熱炒正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的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從以下官方媒體的標題，就能看出這位紅色後代的火爆程度：薄瓜瓜當選英十大傑出華人青年、薄瓜瓜：海外求學佼佼者、紅紅的孩兒薄瓜瓜、"薄瓜瓜新聞"也是一種改革開放、薄瓜瓜：出身名門的時尚先生、連線薄瓜瓜：身在世界著名學府仍牽掛重慶……

中新社倫敦5月9日電：2009"大笨鐘獎"，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評選今天在此間揭曉，來自中國大陸的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哲學學生會主席薄瓜瓜當選十大傑青之一。

今年22歲的薄瓜瓜，曾是英國著名的哈羅公學首位大陸學生，

後又以優異成績進入牛津大學，再次成為 Balliol 學院的首位大陸學生。他在牛津大學活躍推廣中國文化，參與競爭最激烈的牛津聯合會的選舉，併用醒目的大字打出“中國人”一詞。最終以多年來最高選票入選，成為第一位華人理事。



薄熙來兒子薄瓜瓜當選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

2008 年薄瓜瓜又當選為牛津歐洲事務委員會執行主席，在每年一度的大型活動上推出中國主題，成功策劃舉辦了“絲綢之路”文化盛會。汶川地震後，他立即成立“牛津大學四川地震捐款委員會”，組織捐款超過 1.5 萬英鎊。

本次評選中另外九名當選者分別是：著名檯球選手傅家俊；第一位製作英國電視系列片的華人，影視導演、編劇何雪怡；日本野村證券歐洲投資銀行分析師孟明毅；Akur 公司金融顧問，英國 48 家集團俱樂部董事會成員、青年破冰者英方主席廖錦揚，被稱為“民間中華美食大使”的黃瀚億，英國乃至國際時尚界的著名顧問古克溫；英國區議員中最年輕的華人成德仁；小提琴演奏家陳美；英國皇家建築協會註冊建築師范鐵。

此次由英國華人青年聯會主辦的評選活動，共推出了二十八名候選者，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檯球選手丁俊暉，足球選手孫繼海、鄭智，及演員湯唯等，但最終他們未能出現在當選者名單中。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官方電台國際廣播電台所屬的國際在線發表的“『薄瓜瓜新聞』也是一種改革開放”的評論。該評論的作者張軼水寫道：

領導幹部的活動多是新聞，領導幹部子女的活動是否也是新聞？這次，見到“薄瓜瓜新聞”，筆者“眼前一亮”。多年來，坊間對各級在職的和“已退休的”領導幹部子女的的姓名、職業及他們的活動，往往有多種版本的“外傳”，但大眾傳媒似乎有一種“潛規則”——一般不報道有關領導幹部子女新聞的。然而，這次多家媒體大張旗鼓地報道“薄熙來之子薄瓜瓜當選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改革開放，也是一種進步。

評論稱，薄熙來同志作為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活動有時要公開報道，有時需要保密；但作為他的兒子薄瓜瓜的相關活動是否也需要保密？那就沒這個必要了。薄瓜瓜衹是一個留學生，法治社會，民主時代，對於各級領導幹部來說，老子是領導幹部，兒子或許還是平民，領導幹部的“平民兒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應該靠他們自己去努力，去打拼，領導幹部子女的相關信息，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對社會保密。

恰恰相反，當今市場經濟時代，對領導幹部子女的相關信息給予公開報道，倒便於社會的公開監督。有了這種“公開”對領導幹部本人及其子女，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陽光不鏽”。“薄瓜瓜新聞”一出，可算為新聞界乃至中國政壇開了一個好頭，但願這類“領導幹部子女新聞”的改革開放，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不過，英國廣播公司的評論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新一代的

特權精英早已與時俱進，摒棄了他們先輩的紅色意識形態，但似乎並沒有放棄以“主人翁”自居的掌權意識。

最近中國媒體炒作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在英國榮獲“10 大傑出華人青年獎”的消息。雖然英國華人青年聯會評選傑出華人青年，類似過去共青團支部評選模範團員，但中國主流媒體似乎在以此渲染薄氏家族滿門精英、人才輩出。



薄瓜瓜

我們再來看看官方媒體是如何熱炒薄瓜瓜的：

從小學到初一在北京景山學校讀書，薄瓜瓜一直連任中隊長。初中時報考了英國哈羅公學，在預考中獲得名額後，經全英公立學校統考，被該校錄取，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中國學生。後因成績突出授其獎學金，並將他的學習筆記印發為範本。17 歲時國外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還有不同》，該書主題是反對盲目追趕時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譯為中文，正在徵求本人同意出版。

2005 年底薄瓜瓜參加英國統一高考，報了競爭最激烈的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哲學、政治三項綜合專業的創史學院，經全國統考和

本校復考及再淘汰面試等程序，薄瓜瓜名列前茅，成為該學院本專業的首位中國學生，並獲得全額獎學金。2006 年 10 月正式入學後，在牛津最高聯合總會換屆選舉時，當選為常務理事，也是首位進入該會領導機構的中國人。

然而，就在中國官方喉舌熱炒薄瓜瓜當選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第三天，也就是 2009 年 5 月 11 日，一張有薄瓜瓜擁抱兩名西方女性的照片便出現在網上。隨後幾天，有關薄瓜瓜在英國留學期間過著糜爛和淫亂生活的更多照片，鋪天蓋地地出現在海外網站。半個月後，中國數家網站也出現了薄瓜瓜的艷照，甚至有地方媒體也將其公諸於眾。

最早公佈薄瓜瓜艷照的網站是德國熱線網站的萍聚社區，發貼人是 BUTONGYI（不同意），發表時間是 2009 年 5 月 11 日，標題是：“中國新聞”十大傑出青年薄瓜瓜艷照來了！！內容衹有一行：這照片是從旁邊那 2 女的 FACEBOOK 上坑來的。



薄瓜瓜艷照

隨後，便是這張塗著口紅的薄瓜瓜，摟著兩個西方女性的親密合影。幾天後，這張照片便開始迅速在網上流傳，而且還有更多的

“瓜瓜精彩”的照片相繼出現，甚至還有網站推出“史上最全薄瓜瓜艷照及女友照片合集，附薄瓜瓜檔案資料介紹”的專題。一時間，兒子薄瓜瓜和父親薄熙來再次成為網友們消遣的主題。

轉貼照片的網友留言稱：有人在網上發佈薄熙來兒子薄瓜瓜淫亂照片——哈哈，應了那句老話：有其父，必有其子！

有網友爆料稱，薄熙來居然還把用贓款在英國留學的兒子的消息拿到新華網上去炫耀，一位政治局常委說，“這就是薄熙來貪贓枉法的罪證！”過了幾日，薄瓜瓜在英國的數張淫亂照片就傳的滿天飛。

更有意思的是，中國官方媒體居然也公開報道薄瓜瓜艷照了，衹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傳播這條具有轟動效應的新聞。據《生活常州》和《揚子晚報》報道，5 月 29 日晚，江蘇常州市城管局網站被“黑”，頁面掛著一張俗艷的照片，竟然是薄熙來兒子薄瓜瓜的淫照。6 月 1 日，這張帶有薄瓜瓜婬照的網站截圖還出現在《揚子晚報》當日的報紙上。

5 月 29 日晚，常州市民吳先生無意中在政府網站上打開該市城市管理局網站的時候，網頁竟然跳出來一張俗艷的照片：一位男子衣衫不整摟著兩個濃妝的女子。周圍欄目裏充斥著和首頁上大致一樣的內容。

報導沒有透露照片中該名男子的身份，但經網民留存的網站截圖顯示，這名摟著兩個濃妝的女子的衣衫不整男子正是薄熙來兒子薄瓜瓜，這張照片近來在海內外中文網站瘋狂流傳。

網頁下面則是一排類似內容的小標題：“城管隊員深入實踐，集體視察洗頭房”；“城管隊員深入實踐，集體毆打小販”；“城管隊員武藝高強，菜農潰不成軍”等。在“市容廣告”的欄目中則出現：“今天我把一個賣茶葉蛋的老太婆打了”、“我把一個賣蘋果的打成了半身不遂”等字樣。

不只如此，這張網站截圖還出現在《揚子晚報》6 月 1 日的報紙上，據悉，《揚子晚報》是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主辦的官方喉舌媒體，如此高調曝光薄熙來兒子的淫照，其中隱情頗讓人玩味。

打黑除惡，司法局長文強落馬

2009 年 6 月，重慶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政法各部門、紀檢監察、組織、宣傳、工商、稅務、銀行等均參與聯動，公安機關組織了 15 個專案組重點突破。

同月 25 日，重慶市公安局向市民發出公開信，呼吁市民“積極行動，檢舉、揭發、控告黑惡犯罪活動”。公開信印製了 20 萬份，並第一時間發送。與此同時一個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絕密”字樣的信封以及足夠資費的郵票也被送達市民手中。

公開信承諾，將依法嚴格為檢舉、揭發者保密。還破天荒地提出，在提供涉黑線索時，市民可以“直接約見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在接到預約要求後，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將及時安排時間與您面談”。

打黑宣傳工作被逐片逐人落實，每一個轄區派出所、片區民警都被安排負責一個區域，在送達公開信的同時也得向市民講解如何向警方提供打黑線索。重慶市較場口街道一位社區民警回憶說，這是他從警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經歷，即便是在奧運等重大事件前夕也沒有如此聲勢浩大。

有媒體曾這樣評論說，重慶的“打黑除惡”已經不僅僅是公安部門的責任，更像是一個“全民運動”，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發動

群眾，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

在薄熙來提出的"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重慶"五個目標中，最受重慶市民關注的是"平安重慶"。隨著"打黑英雄"王立軍奉調入渝，薄熙來坐鎮打黑的大戲就這樣掀開帷幕。

據稱，真正點燃"除黑引信"的是2008年11月3日，重慶市發生8000輛出租車集體罷市事件。當時出租車司機訴求稱，出租車公司收取高昂的規費，導致司機受到嚴重盤剝。重慶市政府要求主城區出租車公司每輛車降低50元"板板錢"。但在一些涉黑的出租車經營公司，該項措施卻受到強力阻撓。

而在2009年對於"7字頭"公交收歸為國有的過程中，"民營公交公司"要價達1億多元，導致政府收購陷入僵局。

正是在這樣屢遭政令不通甚至暴力對抗的情況之下，重慶主政者薄熙來才決定讓聲名遠揚的"除黑英雄"王立軍啟動25年來重慶最大打擊暴力犯罪、打黑除惡、緝槍制爆專項整治行動。

2009年6月以來至8月15日，重慶掀起的"打黑"風暴成功破獲黑惡勢力團夥104個，逮捕陳明亮、馬當、岳寧、岳村、陳坤志、龔剛模、黎強等67名涉黑涉惡團夥首犯及骨幹人員，抓捕黑惡團夥成員1544人；收繳槍支48支、子彈877發；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資產15.3億元；累計破獲查處各類案件1009起，其中破獲刑事案件892起。

2009年7月31日，重慶新任公安局長王立軍在一次座談會上，親自給老百姓描述了不同版本的重慶治安與重慶"黑幫"。重慶的"黑幫"，殺人、敲詐、綁架、販毒、"放水"、強姦……無惡不作，甚至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企業法人、婦女兒童都未能幸免。

王立軍指出了重慶社會治安的兩點事實。第一點，重慶涉黑案件的總體特點是時間長、跨度大、背景深、人數多、質量高、影響

惡劣；第二點，重慶警方歷史欠賬多，有60多萬起積案未偵破。

王立軍還鄭重向重慶人承諾："將從警方內部挖出黑勢力的保護傘，還安寧給人民。"

王立軍的承諾，7天後就實現了。

2009年8月7日，中共重慶市紀委有關負責人向媒體證實，重慶市司法局局長（公安局原第一副局長）文強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當時他正在參加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



文強（中）正在送轉途中

文強出生於1955年12月，重慶市巴南區人，在職大專學歷，一級警監。1972年1月參加工作，197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過四川省巴縣公安局副局長，巴縣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局副局長，巴縣縣委常委、副書記等職務。1992年9月，文強調任四川省重慶市公安局任副局長。1997年重慶直轄後，文強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在任11年，並在擔任此職其間，於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廳局級偵察員。2003年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2008年7月，文強出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

文強在重慶市公安局任職多年來，在政界和民間口碑都頗為不佳。重慶市司法系統一位官員對媒體透露說，文強擔任重慶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和局長期間，重慶市治安狀況趨於惡化，黑社會活動猖獗，高利貸屢禁不止，民間多有怨言。"他的落馬衹是遲早的問題。"

文強被捕後，其腐敗傳聞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文強在水池裏藏了3800萬元錢，擁有價值數千萬元的豪華別墅，收藏著失竊的文物古董，被他玩弄過的女明星數不過來……此後又有爆料稱，文強落馬的主要原因，是與全重慶最著名的地下色情場所"亮點"之

間的秘密關係，或涉及強迫犯人做妓女以此換取減刑。

2009年10月，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文強涉黑案即將進入訴訟程序，“鑒於文強職務比較高和案情重大具有特殊性，此案將會在異地審理。”文強案件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跨入訴訟準備期，“是因為文強9月初以來認罪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消息人士說，“他的心理底線已經被攻破，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不但供認不諱，還主動補充提供一些細節。”

據報道，被異地關押在貴州的文強，最初對專案組審訊人員說：“我想吃的時候就要讓我吃，想睡的時候就要讓我睡，別想用那些手段對付我，那些東西還是老子我發明的！”並且還揚言：“你們不判我死刑就罷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沒那麼便宜，我什麼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著一起死吧！”

被“雙規”後，文強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違法事實難以過關，最初裝出很坦白的樣子，在審訊時天天講自己喜歡女人和玩女人的大量故事，他還主動講述一些強姦少女、玩女明星的過程，“他說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慶走穴演出，祇要能想到辦法搞定她們，包括用錢買、利用女星的隱私恐嚇她們等，他都要和這些明星睡一覺。”

知情人士稱，“幾個黑幫到學校為他『選美』，有確切證據的就有4個女孩被其強姦，都是中學生。”

但文強聰明反被聰明誤，他老婆得知文強交代的這些情況後，“大哭不止，一直罵文強是個畜生，”消息人士說，“然後她交代了文強的一些問題，還帶著我們去挖魚塘取出了贓款。”

而文強一直不承認其涉黑並充當黑勢力的保護傘，還振振有詞地說：“和黑社會打交道是為了掌握他們，我要深入黑社會才能掃黑，要是和黑社會打交道就是當保護傘，那我敢說全國的公安局長

都是黑社會的保護傘！”

到了9月初，直到文強得到確切的消息，他在美國做生意的兒子已經回到重慶，“他的心理防禦才徹底瓦解了”。消息人士說，“他痛哭著悔過，說對不起黨對不起組織，就變得很配合專案組人員審訊了。”

“經過幾番大起大落，現在的文強看起來比較平靜。”消息人士說，“他時常對一些普通幹警說……還是你們好，平凡一點好，平凡才是福。”



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原總隊長陳光明

此外，消息人士還透露，“重慶市公安局禁毒總隊總隊長、現重慶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總隊長陳光明因為涉及文強案再次接受調查。”“上次接受調查時她只承認了和文強是情人關係，隨著對審訊文強的順利進行，一些涉及陳光明的事件也暴露出來了。”

從警28年的陳光明，曾是全國省（市）級公安禁毒戰線上唯一的女總隊長，2004年，她榮膺“全國三八紅旗手”，2009年2月又獲得了第五屆“中國十大女傑”的光榮稱號。陳光明17歲到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當了8年的赤腳醫生。回重慶後，經過在四川公安管理學院學習兩年，畢業後當了一名警察。1996年，陳光明被任命為重慶市公安局禁毒總隊總隊長，8年的禁毒生涯，她破過許多大案，其領導的禁毒總隊連續3年執法質量考評達到優秀。

一位警方人士向媒體透露說 文強"霸佔"情婦陳光明 10 多年也是事實，"不准她結婚，陳也至今未婚。"

薄熙來打黑為何全中國袖手旁觀？

"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在重慶市打黑除惡已經幾個月，聲勢浩大，但是整個中國卻衹是袖手旁觀。"——這是美國之音發表的評論。

重慶市 6 月開始打黑除惡，已經有 1000 多人被逮捕，搗毀了幾十個黑社會組織，數十位官員和兩百多警官由於為黑社會提供保護傘而受到追究。

西方媒體普遍報道了這個消息。美國有線新聞網（CNN）10 月 22 日報道：在重慶，警方行動從 6 月開始，已經逮捕 4800 多個黑社會嫌疑人，沒收了 1700 件非法槍支。調查導致很多城市官員落馬，包括警官。

西方媒體的報道突出了中國政法官員腐敗，為黑社會提供保護傘的情況。美聯社 10 月 22 日報道：這些審判正在暴露在大型中心城市重慶市里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官員之間骯髒和密切的聯繫。犯罪嫌疑人當中有這個城市公安局副局長 46 歲的弟媳 她被指控經營了 20 個非法賭場，都得到警方的保護。

英國《泰晤士報》10 月 21 日報道：在西南中心城市重慶進行的這場打擊地下幫派的運動範圍很廣，突出顯示了黑社會和政府官員之間的密切關係。這些政府官員多年受賄，對有組織犯罪視而不見。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為幫派提供了空前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利用制度中的漏洞，並且向薪水微薄的官員行賄。

一些中國媒體尖銳地指出"官、商、匪相互勾結，沆瀣一氣，

盤根錯節，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的殘酷現實。中國當紅網 10 月 27 日的一篇文章說："三惡"之中，最可怕的，是握有權勢的腐敗官員自願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加劇了百姓的無奈與無助。對黑社會的囂張，別說弱勢的老百姓難以撼動，就連不少想為民除害的"清官"，也得謹慎地掂量自己的打擊力和持久力，否則"打狗不成，反被狗咬"；勢成騎虎，進退皆難！

重慶市的黑社會和他們的保護傘規模如此之大，層次如此之高，顯然不是短期內形成的。為了應付社會上批評薄熙來之前的幾屆領導人打黑不力，中國媒體報道了中國重慶市官方的解釋。

《重慶晚報》10 月 27 日報道：黑惡勢力嚴重危害社會穩定，歷屆市委、市政府對此都高度重視。（市委副書記）張軒通報說，直轄以來，張德鄰、賀國強、黃鎮東、汪洋等歷任市領導都高度重視打黑除惡，歷屆市委、市政府將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堅持不懈組織開展打黑除惡，有力維護了社會穩定。在歷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堅強領導下，我市根據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部署，打黑除惡不輟不息，持續推進，在 2001 年、2006 年先後掀起了聲勢較大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全市政法機關打掉了一批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判處了一批涉黑犯罪分子，查處了一批"保護傘"。

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下屬的華龍網 10 月 22 日報道說：歷屆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堅持嚴厲打擊帶黑社會性質的刑事犯罪和黑惡勢力。在九年的時間裏，全市上下先後掀起 2001 年、2006 年、2009 年三次聲勢較大的打黑除惡風暴。2001 年，除了永川涉黑團夥落網外，2002 年底，我市法院又宣判了 10 起黑社會性質案件，179 名罪犯被判刑。在 2006 到 2007 兩年時間裏，我市就偵辦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 28 起，打掉惡勢力團夥 251 個。通過

偵辦黑惡案件共打擊處理違法犯罪人員 1790 人。2009 年，……截至 9 月，我市警方已成功抓捕 2000 餘名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4 個涉黑涉惡團夥受到致命打擊。



薄熙來回應，還將繼續打黑

不過，上述報道儘管試圖說明重慶市歷屆領導都在打黑除惡，重慶市黑社會卻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一次比一次多。而且，《重慶日報》10 月 27 日的一篇文章也"自我否定"了"歷屆領導都很重視打黑"的說法。這篇文章說："重慶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破獲了一大批積案、命案，社會治安得到有效整治。今年 1-9 月，已破獲積案 27198 起，同比上昇 52.9%，破獲積案命案超過過去五年總和……。"這"一大批積案"不正說明薄熙來之前的領導人打黑不力嗎？

這次薄熙來在重慶市打黑除惡之所以引起中外媒體的熱追，其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中國想打、能打、敢打黑社會保護傘的官員太少。

美聯社 10 月 22 日報道：重慶的打黑本來是要顯示中國領導層剷除腐敗的決心，但是卻突出了勢力強大的犯罪團夥已經徧佈中國各地的現實。研究中國黑社會犯罪的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說：地方政府基本上已經失去了對有組織犯罪的控制。中國公安部的一份內部報告估計，中國在 2004 年有大約兩百萬到三百萬人涉及有組織犯罪，有 4200 個"黑社會性質的團夥"。他認為參加黑社會的人可能多達 400 萬人。"

參與重慶市打黑除惡案辯護的律師周立太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時說：重慶打黑引起舉國關注，"說明全國都出現了黑惡勢力活動比較猖獗的情況"。

英國《衛報》說：存在有組織犯罪的城市遠不止重慶市，但是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面比多數城市都走得遠。在北京和上海這種城市，由於缺乏政治問責、司法獨立和媒體監督，已經為黑幫分子營造出成熟的條件，使他們能夠與腐敗官員合作，開辦非法企業，敲詐勒索。

上海一個俱樂部經理告訴《衛報》記者說："我們必須給黑社會和警察錢。在這個城市里總是有兩兄弟一起喫飯。一個是警察；一個是黑社會頭子。這些人都是我們的顧客，但是他們都很危險。"

中國當紅網的文章說："黑社會現象，不獨重慶一隅存在。按照法學專家的說法，它是在社會轉型、經濟轉軌時期的一個社會現象樣本，即警匪勾結、官匪勾結已成為較普遍的社會問題。"

更有甚者，一些黑老大已經進入政界，成為"紅頂"黑老大。中國當紅網的文章說：……越來越多的黑老大如黎強、陳光明之類，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紅帽子"，或者背後支檸著如文強、彭長健之類的"紅柱子"。以紅護黑，以黑養黑，亦紅亦黑，左右逢源，成為一種新的"無間道"。

《南國都市報》的一篇評論說：黑老大黎強原來是重慶市人大代表；陳明亮原來是重慶渝中區人大代表；王天倫原來是重慶大渡

口區政協委員。評論說：戴著“紅帽子”，有“白老大”撐腰，重慶“黑老大”的成長史，就是一部中國某些地方社會轉型期的真實寫照。

新華社10月23日指出：一些黑惡勢力已由尋求權力保護膨脹到自行獵取、掌控權力，從“以商養黑”、“以黑護商”演變為“以紅護黑”乃至“由黑變紅”。黑惡勢力犯罪活動在一些地方呈現出經濟上漂白、政治上染紅的“昇級”現象，令人觸目驚心。

然而，既然黑社會徧佈全國，為什麼沒有全面打黑除惡呢？美國有線新聞網報道說：現在還不清楚重慶市目前的打黑行動是否會擴展到全國。玩世不恭的人懷疑共產黨領導人是否有意願真正地隨時隨地剷除腐敗。

人民網10月27日的一篇文章說：類似於長期盤踞在重慶市的黑惡勢力和重大涉案團夥，肯定也不光是重慶才有，其他地方肯定也有，為什麼其他地方就沒有像重慶這樣去打黑除惡？這個問題也許是個一下子不好回答的問題。

據說，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司法局長文強被抓後曾揚言：“要是判了我死刑，我什麼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著一起死吧！”文強的這番話意味著什麼？又向外界透露了什麼？

薄熙來“唱紅打黑”旨在十八大？

在官方媒體和絕大多數網民都在為薄熙來重慶重拳打黑稱讚不已時，也有海外媒體發表文章質疑薄高調打黑的政治目的。

李天笑的文章稱，薄熙來到重慶後的“唱紅”，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件文革式的蠢事，但他有其背後的算計。薄熙來這一招首先是與太子黨崛起遙相呼應。今年以來一個由近150名將軍之後組成

的“將軍後代合唱團”到處巡回演出，大造聲勢，而薄熙來“唱紅歌”是亮身份，取得太子黨背書。其次，在中共政權面臨崩潰的關口，表明自己才是維護紅色江山的真正棟梁，是中共靠得住的人。

但光有紅色接班人的忠誠是不夠的，想進中南海還要有功績，“打黑除惡”就是薄熙來走捷徑的方法。重慶掃黑並非起自全國的統一佈置，而是薄熙來自行展開的。薄熙來走任重慶不到兩年時間已進行了兩輪打黑，為其製造民望。

文章稱，很明顯，薄熙來的目的是進軍中南海。薄熙來貶放到重慶，憋足了怨氣。但他無可奈何，因為胡溫已通過李克強和賀國強抓住他與當地黑社會和貪官勾結的滿把小辮子，況且在十八大想進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汪洋、俞正聲等。薄熙來通過打黑掌握重慶前任汪洋和賀國強的罪證就取得了反制手段，逼迫胡溫妥協，同時也造成汪洋等的卡位。打黑成了薄熙來進退得據的手段和在短時間重返權力中心的機遇。

此外，薄熙來打黑也添補了胡溫“和諧”社會的空洞。中共官場腐敗，全國此起彼伏的民眾抗暴事件和各地冤民形成的上訪大潮，已使中共顏面掃地，“和諧”社會徹底破局。在這種情況下，薄熙來的掃黑治渝能為破碎的“和諧”社會打幾個補丁，才獲得胡溫縱容中共媒體為之捧場作戲。

陳國軍撰文指出，薄熙來“唱紅打黑”贏得了中共黨內外不少掌聲支持，也暴露了他強烈的企圖心，引起了黨內各方競爭對手的關注，令不少人坐立不安，“犯了嘀咕”，亦因此為中共高層派系博弈提供了最新素材，提前打響了中共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前哨戰。

北京政壇消息人士透露，今年60歲的薄熙來，是在經過認真的算計之後放手一搏，目標是以重慶打黑的成績為敲門磚，瞄準三年之後現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位置，或現任政治

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賀國強之後的空缺，甚至成為取代習近平的備位儲君，“這是薄熙來的最高目標和政治理想，也是薄熙來『唱紅打黑』背後的真正目的”。



薄熙來帶頭高唱紅歌

薄熙來以“唱紅打黑”的組合拳，不但凸顯了自己根正苗紅、政治正確的正統地位，而且要以此展現了自己的能力、魄力和謀略，要因此贏得民心，並以民意的支持為後盾，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這位北京政壇人士表示，三年之後的中共十八大，如果還是目前的九常委格局，那麼“前面的幾個坑包括總書記兼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總理和常務副總理、政協主席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等，都已經有人填滿，薄熙來在經過認真的分析之後，發現衹有後面的中紀委書記和中央政法委書記，他或許還有希望”。

因此他這是最後一搏，背水一戰，不但有可能達到這個目標，而且說不定還有機會奪取大位，在競爭中把習近平比下去，前提是三年之後的中共十八大有政治改革的大動作，學習越南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經驗，總書記也采取差額選舉的辦法，以民意和黨意為依歸的理由，擺平利益，競爭上崗。北京政壇分析人士認為，三

年之後的中共十八大，假如團派人馬和太子黨利益無法擺平，胡錦濤並非沒有可能作出這樣的動作。

文章指出，這樣的假設，從不久前剛剛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發佈的公報，或許可以發現一些端倪。公報用數段的篇幅，談了中共黨內民主發展的問題 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要“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但更重要的是首次在中共黨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了“民主、公開、競爭、擇優”八個字的選人用人原則，似乎是在為未來中共十八大可能出現的權力爭奪預留伏筆，並奠定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法理基礎。

而這恰恰是薄熙來最後的希望，他或許可以借此沖破原先設下的格局，突破框框，競爭上崗，實現逆轉勝，從而實現他的政治理想。雖然年齡不佔優勢，但他不怕競爭，也善於競爭，這是他的強項。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的薄熙來，是中共高層少數瞭解媒體運作的專家，也很善於利用媒體造勢，並在中國媒體界有不少老同學、老朋友和眾多粉絲。重慶“唱紅打黑”開始之後，薄熙來即刻成了中國媒體的新聞人物，畢竟打擊黑社會符合老百姓的期待，符合社會的利益，他因此成了不少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文章強調，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顯然凸顯了他根正苗紅的合法性基礎，並贏得了民心的支持，卻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果，比如在中共黨內就有一些人覺得不以為然。最引起爭議的，是質疑他的這一系列做法，有挑戰其前任賀國強和汪洋的嫌疑。據稱在這次打黑行動中因為與黑社會有牽連，被薄抓起來的重慶高層官員中，有些是當年由賀國強和汪洋提拔起來的，是這兩位中共高官當年倚重的幹部。

但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得到了中共總

書記胡錦濤的肯定，據稱胡錦濤對此讚揚有加。根據北京中宣部的有關規定，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媒體上的有關報道，包括版面的位置、大小、時間的長短等是有規矩的，而薄熙來已經位居“黨和國家領導人”序列，在媒體版面上的安排是有規定的，但他近來卻頻頻在中央和地方媒體佔據大量的版面和時間，曝光率位居前列，顯然是得到了中共高層某種特許或默許。

北京知情人士認為，胡錦濤這次支持薄熙來，除了顯示他順應民意、從善如流的立場外，顯然也有他的政治考慮。他要借力使力，借薄熙來的咄咄逼人，借薄熙來旺盛的政治企圖心，借薄熙來來挑戰習近平，扭轉中共十七大以來形成的權力格局。

這是自中共十七大曾慶紅“一退定江山”之後，形成的太子黨和團派權力共享的格局。以習近平為首的太子黨從那之後咸魚翻身，顛覆了共青團系全面接班的局面，以順位的優勢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位置，如不出意外，將在三年之後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而團派原來呼聲最高的李克強，則衹能屈居第二，接任國務院總理的位置。

這一個似乎板上訂釘的權力格局，現在卻可能因為薄熙來的強勢崛起而產生變數。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強勢作為給中共黨內高層博弈增加了新的內容，而薄熙來則成了胡錦濤與江澤民暗中較量的一個新棋子。北京政壇分析人士認為，有人要讓薄熙來挑戰習近平，利用薄熙來旺盛的企圖心，在政治上和能力上讓兩人一比高下，並在習薄的爭鬥中，坐收漁翁之利，顛覆已經被顛覆的權力格局，奪回已經失去的順位優勢。

正是這樣的不穩定因素，使得江澤民久久不能離去，不敢撒手不管，要一直把習近平扶上馬，再送上一程。這也是為什麼在剛剛過去的中共六十週年國慶閱兵，江澤民高調亮相，在電視上出鏡時間僅次於胡錦濤，且遠遠多於其他八位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兩人如影隨形，有胡錦濤出現的地方就有江澤民的深層原因，並要以此向中共黨內黨外表明，江澤民雖然退了，但在中共黨內仍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胡錦濤和江澤民在中國國慶六十週年的共同亮相，從某種角度證明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和權力制衡確實存在。毛澤東曾經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共黨內太子黨和團派之間的暗中較量，不管當局是否承認，但從江澤民久久不願離去的事實，已經證明確實存在，而這對中共黨內民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表明中共黨內派系已經悄然成形，並正在進行相互制約和相互監督。

文章最後說，事實上，從派系的角度考慮，薄熙來的強勢作為對太子黨也有加分的效應，在未來中共的權力格局中，與團派人多勢眾相比，太子黨的人馬略顯單薄。因此，薄熙來在重慶的雄起，對太子黨的實力是一種增強，對雙方力量的平衡並非壞事，而薄熙來以打黑行動取信於民，爭取民意支持，更為中共官場樹立了一個示範，為將來中共黨內民主開闢了新的路徑。

李源潮

執掌"權貴階層"的鐵腕部長

可以把李源潮的仕途以2000年任職江蘇為界分成兩部分：2000年以前的李源潮，穩重有餘，膽魄不足；儒雅有餘，生猛不足；細密有餘，恢宏不足；2000年以後的李源潮，左右逢源，與時俱進，脫胎換骨，判若兩人。

但在江蘇官場和民眾看來，更準確地說，李源潮的"巨變"是從2002年底當上江蘇一把手之後開始的。海外有媒體評價李源潮"得胡總真傳"：他像胡錦濤一樣，在當副手、助手、二把手的時候，低調韜晦，不強出頭；當上一把手、主政一方之後，才大刀闊斧，令出法隨。

李源潮的派系背景很複雜，既可歸為"太子黨"，也是"共青團派"，還可以算"上海幫"。"李源潮"這個名字，乍聽上去，很容易被人誤以為是"援朝"，他確實生於抗美援朝的1950年11月。學數學出身的李源潮，考慮問題比較縝密深入，也喜歡舞文弄墨，衹要時間允許，他寧願自己親自起草在會議上的講話稿。

鐵腕，這是李源潮主政江蘇時留給媒體的印象，無論是鐵腕治污，還是鐵腕治吏。他毫不諱言自己的"鐵碗"。江蘇官員對李源潮的普遍評價是平時溫文爾雅，待人接物非常謙和，富有親近感，但如果遇到違法亂紀的事，他的鐵腕特色就會毫不含糊地顯露出來。

2007年10月下旬，被稱作"鐵腕"部長的李源潮正式掌管中

組部，不久便連施"鐵腕"，提出了一系列的"治部"方略。

英國《金融時報》說，中組部複製了前蘇聯所稱的"權貴階層"，即一份組成共產黨統治階層的黨員"名單"，名單上的人有資格在政府控制的各個領域擔任要職。雖然這個制度完全從蘇聯照搬過來，但中共將其發揮到了極致。

而李源潮，正做得更加徹底。

"人事制度不改，共產黨有危險"

2009年11月，在進行一輪省級黨政首腦大換班的同時，主管幹部工作的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熱點問題進行瞭解分析，其中頗多新意。比如對於廣受讚譽的民主推薦、票決制以及幹部年輕化等問題，李源潮就提醒，不簡單以票數決定幹部任用，防止誤用不講原則、不負責任的"老好人"，而選拔年輕後備幹部也不能就年齡"一刀切"，後備幹部不搞"終身制"，幹部競選要防止選用誇誇其談的"馬謖"。

李源潮的長篇論述刊登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頭版頭條。此前9月份舉行的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將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列為黨建的重大問題。李源潮指出，這項改革主要有八個方面的任務。一是建立健全幹部選任提名制度。二是建立幹部考核評價機製。三是完善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等選拔方式。四是積極推進幹部教育培訓的改革創新。五是完善年輕幹部、後備幹部培養選拔制度。六是健全幹部管理機製。七是加大幹部交流力度，完善幹部交流制度。八是匡正選人用人風氣，不斷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

此外，李源潮10月中旬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權力和利益關係的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改

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

《大公報》指出，中國的幹部年輕化工作歷來備受海內外關注，此次七省黨政大換班的兩位“60後”省委書記 昆明的“70後”副市長，湖北宜城市“80後”市長，都引發熱議。但輿論也擔憂幹部年輕化過分看重年齡。

李源潮強調，候備幹部隊伍實行複式年齡結構和梯次配備，根據幹部成長週期，分為近期和中長期，分別提出不同的年齡和職務層次要求，避免在年齡上層層遞減和“一刀切”。他還強調，候備幹部在使用時與其他幹部同樣標準、同樣程序，不搞照顧；堅持優進絀退、動態管理，不搞一次選拔定終身。

為避免“一把手”專斷，在目前的幹部選拔中廣泛推行民主推薦和票決制。不過，李源潮對此提出，要全面分析民主推薦結果，不簡單以票數決定幹部任用，防止誤用不講原則、不負責任的“老好人”。

他還強調，在幹部管理方面，既要堅持分級管理，又不能簡單地以級別論輕重，而要根據崗位的重要性來考慮。比如，對縣委書記就不能按一般的處級幹部來對待，必須實行重點管理。

中共十七大以來，各地普遍加大了競爭性選拔幹部力度，公開選拔、競爭上崗，被認為是近年來最有成效的選人用人改革措施。李源潮指出，下一步將加大競爭性選拔幹部的力度；黨政機關中層以下領導職位，除特殊崗位外，逐步把做到競爭上崗為主要選拔形式。

但他提醒，要提高競爭性選拔幹部的質量，把考試和考察更好地結合起來，全面準確地瞭解幹部的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防止選用誇誇其談的“馬謖”。



李源潮在哈佛大學演講

10月1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在二版刊登李源潮的長篇文章《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推進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他強調，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現在已進入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尤其需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強化改革共識，凝聚改革力量，齊心協力推進改革。

第一，要充分認識改革的艱鉅性、複雜性、長期性，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幹部工作中的矛盾和問題錯綜複雜，“官本位”的影響根深蒂固。改革堵了那些投機鑽營、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者的路，必然會遭到激烈的反對和非議。

文章指出，現在有些幹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有些低能低效，也有些以權謀私，群眾意見很大。這些問題發展下去，就會導致黨脫離群眾、喪失先進性和執政地位。要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堅定改革的信心和決心，以無私無畏、與時俱進的精神，堅持改革、推進改革、完善改革。

第二，要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支持改革、鼓勵創新。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許多重大舉措，比如公開選拔、競爭上崗、任前公示、全委會票決等，都是先有基層探索，然後經過總結提煉、規範完善，

上昇到制度層面的。

第三，要加強宏觀指導，保證改革積極穩妥、有序可控。要增強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合理性、協調性；加強對改革風險的評估；加強對改革局勢的研判，把握好改革的時機、重點、力度和節奏，堅決排除各種敵對勢力干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自己的路。

第四，要加強輿論引導，營造良好的改革氛圍。要加強對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新舉措、新進展、新成效的宣傳，讓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及時瞭解改革、支持改革、參與改革、監督改革。要加強輿情分析，加強對熱點問題的輿論引導，防止不當炒作，形成有利於推進改革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氛圍。

第五，領導幹部要解放思想，做改革的引導者、推進者、駕馭者。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會約束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用人權。但從長遠看，改革不僅對黨的事業有利，對用人管人的領導幹部也大有好處。

短短幾個月中，李潮源就對中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發表如此之多的言論，足以證明“中共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現在已進入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直接涉及權力和利益關係的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嚴重性，正如李源潮所說的“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中共就會有危險”。

李源潮的文章還說，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現在有些幹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群眾意見很大。這些問題發展下去，就會導致中共脫離群眾、喪失先進性和執政地位。

另據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報導，李源潮日前在浦東、井岡山、延安幹部學院 2009 年秋季開學典禮上說，貪污受賄、權錢交易、買官賣官等現象，在一些地方和少數部門屢禁不止，已成為

損害黨和人民關係最突出的問題之一。黨員幹部要抗得住誘惑，把好欲望關。必須明確一條約束，就是黨員領導幹部不許涉足低俗場所，不許找“三陪”小姐陪酒陪唱，否則幹部考核時就要在日常品行方面記上污點。

李源潮還要求黨員幹部把好“交友關”，不能為了貪圖享樂而去“傍大款”。他指出，現在社會上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挖空心思與領導幹部套近乎，把掌有實權的幹部當作“資源”來經營，把表現優秀的年輕幹部當作“潛力股”來投資。因此，領導幹部一定要對那些懷著個人目的來拉拉扯扯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嚴把“社交圈”。

他還痛斥一些幹部政治上糊塗，民怨已起還不在意，矛盾已釀毫無察覺，面對歪風無動於衷，聽任錯誤思想傳播不加抵制。他警告，這種現象不加改變，工作要誤事，幹部會誤身，最終會導致誤黨、誤國、誤民。

“被普遍看好的中組部長”

2008 年末，在“責任中國”——人民網 2008 年度系列評選活動之“十大最強聲音”評選中，李源潮的“不用不講原則的『老好人』，不用不幹實事混日子的人”的講話備受網友歡迎，位居“十大最強聲音”首位。

《中國改革》發表文章稱，在執掌中央組織部的這一年，李源潮在不同的場合曾經發出過很多強有力的聲音，痛陳官員各樣惡習，針砭選人用人的不正之風，施行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具體改革措施，強力推行官員選拔制度的改革，在全國掀起一陣不小的“治吏風暴”。李源潮鮮明的個性特點、富有遠見的觀點和思路以及鐵腕

的風格也給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論家評價說，這是一個既能夠看到問題，又敢於行動的領導人。

2007 年 12 月，剛剛走馬上任不久的李源潮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明確提出要用“四種眼光”做好新形勢下的組織、幹部工作：要用面向世界的眼光來認識組織、幹部工作；要用服務全局的眼光來謀劃組織、幹部工作；要用歷史進步的眼光來研究組織、幹部工作；要用創新發展的眼光來推進組織、幹部工作。

這是公眾視野中作為中組部長的李源潮較為正式並且高調的第一次亮相，他明確提出了 2008 年及今後一段時期選人用人總體目標要求。

此後，他的每一次亮相和講話，都在逐步揭開組織工作的“神秘”面紗。現在看來，公開和透明，提高組織工作的公信度已經勢不可擋。

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他多次重申，重用什麼樣的人，不用什麼樣的人。這樣的表態，在組織工作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實屬鮮見。而且他愛用大白話，人們聽了很痛快。

2008 年 1 月，署名為“仲祖文”的中央組織部評論文章《不能讓老實人喫虧》、《不讓投機鑽營者得利》連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接下來，李源潮的許多講話，都贏得好評如潮。2008 年 8 月中旬，在全國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座談會上，李源潮提出“一重用四不用”選任幹部標準：“要重用那些政治堅定，有開拓創新精神，工作有實績，清正廉潔，群眾公認的優秀幹部；不用那些以權謀私、為己幹事、幹部群眾信不過的人；不用那些不負責任、拉私人關係、投機鑽營的人；不用那些不講原則、不分是非的『老好人』；不用那些不幹實事、無所作為混日子的

人。”

2008 年 10 月，李源潮在《求是》上撰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2008 年 12 月，在黑龍江考察的李源潮表示，要旗幟鮮明地支持和保護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讓想幹事、幹好事、會幹事、不出事的人受到重用，讓說空話、大話、風涼話、泄氣話的人沒有市場。

“這是一種全新的理念變革。目前中國改革到現在這個階段，究竟應該將什麼東西放到一個重要地位？我認為選人的理念和價值觀念非常重。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理念的改變，就不可能把高水準的人才選拔出來。”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說，造就一批高水平的領導幹部，對推進下一輪的改革非常重要。



李源潮在北京調研

這一年，組織部門采取一系列的舉措，確實存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有明顯的改進。

2008 年 7 月，貴陽市委通過公推競崗和公開選拔的方式最後決出區（縣）委書記人選。吉林、廣東、河南、浙江等六七個省都存

大力推薦本省的官員選舉。這種現象，在四五年前很罕見。這本身就是一個改革，就是用人制度、用人取向的改革。

《中國改革》的撰文指出，李源潮是被普遍看好的中組部長。稱他很有分寸感的人，與其交往的人對他的普遍評價是：溫文爾雅，待人接物非常祥和；他的臉上永遠帶著微笑，嘴角微微上揚，分寸感極強。

在江蘇任職期間，李源潮曾以鐵腕治吏而聞名。到任中組部部長後，李源潮以同樣的鐵腕開始整治"吏部"。在幹部監督工作聯席會議上，李源潮明確要求，"用人上不正之風具有很強的頑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必須有更強的戰鬥力。"

2008 年 10 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聯合印發《關於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見》，幾天之後，中組部製定了《中央組織部工作人員行為規範》，並向全國組織系統印發了《組工幹部"十嚴禁"紀律要求》。再次彰顯了中共嚴厲整治官場的決心。

在此之前，廉政制度更多的是針對官員本身，而鮮有直接針對選拔官員的系統。這一次，李源潮提出要以最堅決的態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進行戰鬥，力爭用三至五年時間，使人民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滿意度明顯提高，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目標。

這樣嚴厲的措辭和這樣堅決的態度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認為，這表示他們承認了不正之風的存在並且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從組織系統本身來看，我們的人事權力是比較集中的，在這種環境下，『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之類的說法本身就表明組織部門有產生腐敗的可能性，用人不正之風的確是存在的，而且，已經破獲的一些案子也說明人事腐敗的確很厲害。"

"基層幹部是幹出來的，再往上的幹部是吹出來的，再往上的幹部是跑出來的"。在中國官場，這樣的"潛規則"耳熟能詳。然而，在 2007 年 12 月人民日報發表仲祖文評論《幹部選拔要讓顯規則取代潛規則》之前，人們甚少在官樣文章中看到"潛規則"這個名詞的出現。令人們驚訝的是，該文總結道，"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拉票是正常的，不拉票是不正常的，誰不拉票誰喫虧""，似乎是當官的"潛規則"。

該文表示，"潛規則"是一種嚴重的不正之風，必須堅決加以剷除。"但這種局面不可能一天改變，必須要有一些實實存存的舉措和工作才有可能使這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父親李干成，兩次蹲監獄

到 2009 年年末，執掌中組部才兩年的李源潮，便贏得廣泛好評，其前程也被普遍看好。有政治評論者指出，可謂大器晚成的李源潮，能在中組部如魚得水，能大刀闊斧地對中共組織工作進行改革，他的從政經歷和經驗、深厚的關係背景和政治人脈資源，起著決定性作用。

李源潮 1950 年 11 月在江蘇常州出生時，父親李干成在常州擔任中共地委書記。三歲時因父親調職，全家遷到了上海。

李干成原名李學斌，又名李慈，1908 年 11 月生於江蘇淮安漣水縣紅窯鎮龍興村一個殷實的富農家庭。家有百畝地，讀書有塾師，小學在淮安，中學到揚州。1926 年他考上了上海建設大學，成為家鄉第一個高考狀元。1929 年，他加入了共青團，1930 年春轉為共產黨員，接著就任了中共宿遷縣委書記。之後在上海、河南、江蘇的

共青團省委工作過，1932年因叛徒告密，他在上海被捕。

關入國民黨上海監獄，因堅持獄中鬥爭，被列為政治犯中最不安分的50人之一而受盡折磨，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國共合作後，他才走出國民黨的監獄。

七年牢獄之災，使他重病纏身，雙目幾乎失明。但回到家鄉，他又不顧渾身病痛，迅即組織成立抗日同盟會、抗日義勇隊，並親任會長、隊長，率領家鄉熱血健兒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打響了漣水抗日第一槍。

後來李干成的孩子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父親一直戰鬥在第一線，不論遭遇何種艱苦困難，他從不動搖，直到現在，淮漣地區還流傳著許多有關他和同伴們可歌可泣的動人傳奇。"

網上文披露說，李干成出獄後就開始找黨，找到黨後卻一時難以恢復黨籍。接著他組織了蘇北抗日同盟會，被選為漣水抗盟理事長。還組建漣水抗日義勇隊，任隊長，打響了民眾武裝抗日第一槍——魯渡戰鬥。建設根據地，組織反掃蕩，直到1942年他才得以恢復黨籍。這時距離走出國民黨監獄已六年了。

李干成解放後是當了"大官"，先是1949年，他當了蘇州地區專員。之後，1958年12月當選為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7月，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

文化大革命中，李干成在上海受到衝擊，被關進了他曾被國民黨關過的監獄——漕河涇監獄。造反派們要他揭發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但他不但不揭發，還堅稱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並且不肯寫檢討。有人說，你糊弄一下給造反派寫個檢討就算了，但他說："不敢講真話叫什麼共產黨員！"

"四人幫"倒台了，李干成得到了解放。但安排不太好，只當了一個局的顧問。有文章指出，李干成被打倒前住房很好，可解放後分配的房子卻不好。自然有人為他憤憤不平。但李干成卻坦然處之，不但勸阻同志不要向組織提要求，還主動要求從顧問的崗位上退下。

前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的兒子陳小津在《我的文革歲月》一書中是這樣評價李干成的：是一位鐵骨錚錚、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輩革命家。1929年，李干成在上海建設大學讀書期間，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後轉為共產黨員，並於當年冬季輟學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宣傳部長。

從1930年開始，李干成先後擔任中共宿遷縣委、邳縣委書記，共青團徐海蚌特委、吳淞區委、滬西區委書記等職。1931年，李干成在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巡視員期間，到上海開會，因叛徒出賣，全部參會者被國民黨反動派一網打盡。李干成後被判刑六年，關押在蘇州陸軍監獄。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蘇州面臨被日本侵略軍佔領的危險。國民黨陸軍監獄將在押的政治犯全部無條件釋放。李干成出獄後，回到家鄉江蘇漣水，成立抗日同盟會和地方抗日武裝，歷任抗日同盟會理事長、抗日義勇隊隊長、八路軍南進支隊第八團政治部主任。1940年蘇北淮海抗日根據地建立後，他又相繼擔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處長兼糧食處長，中共泗沭縣委、宿遷縣委書記，淮海地委組織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李干成先後擔任淮海區第二中心縣委書記、華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職。1953年，擔任蘇南區常州地委副書記、代理書記的李干成調到上海，先後擔任市政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交通工作部部長，基建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1962年，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在我父親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數十年。

“文革”初期，張春橋等考慮“三結合”問題，曾經想拉攏李干成與馬天水、王少庸，條件是必須揭發陳丕顯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嚴辭拒絕，隨即被打倒，長期關押在少教所。專案組人員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問題大做文章，對他進行瘋狂批鬥和審訊，逼其承認是“叛徒”。李干成的這段歷史問題，1941年在華東整風運動中已作出明確結論，並恢復了他的黨籍。而審訊人員仍不放過他，采取了“車輪戰”、“蘑菇戰”。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風倒下，神智不清達20多天，報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關押期間，還患上了肺結核，不得不入院治療。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見天日。

陳小津在書中還寫道：李干成是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准安沒有向國民黨低頭自首的兩個半共產黨員之一。僅這一點，就讓他的人生起點很高。

母親呂繼英，曾嫁給李超時

都知道李源潮的父親李干成曾當過上海副市長，雖然級別不算很高，但坊間一直把李源潮視為“太子黨”，這些都與他曾在上海讀書，並在那裏靠著父親的人脈關係踏上仕途有直接關係。不過，與父親李干成相比，李源潮母親呂繼英的名聲甚至更大些，尤其在江蘇，她一直被稱為“女中豪傑”。而呂繼英先後嫁給兩人，第一個是李超時，第二個是李干成，則是一段不被外界鮮知的故事。

說起呂繼英，還得先介紹一下李超時。

官方資料顯示：李超時生於1906年，原名李振華，邳縣柴莊人（今江蘇省邳州市碾莊鎮才莊）。1926年冬，他在徐州省立第十中學讀書時，投筆從戎，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次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5月參加討伐夏斗寅叛亂的戰鬥。

1929年7月省委調李超時到通海地區工作。11月，和劉瑞龍參加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專門向中央和省委領導彙報了通海地區的工作和游擊運動情況。中央代表李立三、周恩來和項英對此很感興趣，決定在通海如泰地區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

1930年2月，李超時主持召開通海區內各縣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傳達了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精神，討論了通海如泰地區的政治形勢和工作路線，研究了開展游擊戰爭和紅軍游擊隊的編組等問題。


李超時將軍

1931年6月23日，李超時到徐海蚌地區巡視工作，他和愛人呂繼英一上火車就發現有特務盯梢，車到鎮江，兩人剛下車，就被盯梢的特務截住。李超時的身份暴露後，1931年9月19日被殺害，年僅25歲。

有關李超時的婚姻狀況，除了呂繼英和未出生的孩子外，無法從官方資料找到更多線索。不過，有知情者在網上透露說，呂繼英是李超時的第二個妻子，第一個妻子在17歲那年嫁給李超時，但只在一起生活了三天，李超時就再沒有回來過。第一個妻子一輩子未

曾改嫁，孑然一身。

當地媒體介紹說，呂繼英是江蘇海州地區重新建黨以後發展的第一個女共產黨員，她曾與李超時、惠浴宇、呂鎮中等一起，參加海州地區黨組織的創立活動，她組織海州地區婦女運動，發動救國救亡的學生運動，領導著名的雲台山大村扁擔會暴動。她是1929屆江蘇省海州中學校友，是海中歷史上的一代英傑。

呂繼英1911年出生在江蘇沭陽縣吳集大呂莊的一個書香門第。1928年，17歲的呂繼英就考入了當時海、贛、沭、灌最高的學府——東海中學。在校期間，她接受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思想。思想進步的呂繼英積極參加學生宣傳隊奔赴縣鄉演講，宣傳"禦外侮、伸民憤、保國權"，提出"抵制日貨、與日斷交"等口號。

2008年12月27日，江蘇省海州高級中學校史館舉行"海中三女傑"塑像莊嚴揭幕。

三尊青銅人物雕像的名字：呂繼英，馮菊芬，馮若愚。"三女傑"之一馮若愚的兒子周永卓在《連雲港日報》發表"母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文章，紀念母親誕辰99週年。文中有一段介紹了呂繼英和兒子李鐵城：

直到1937年，呂繼英才和六歲的兒子李鐵城走出監獄和反省院。此時，抗日的烽火已燃遍祖國大地。呂繼英攜子又回到沭陽老家教書，恰逢母親馮若愚也攜七歲長子周永亮"跑反"來到沭陽教書，兩姐妹相逢，悲喜交集。教書之餘，兩姐妹經常徹夜長談，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切齒痛恨，愈加擁護共產黨全民抗日的主張。不久，呂繼英去上海找到了黨組織，又投入到黨的懷抱。

呂繼英帶著兒子李鐵城再次到上海，除了找到黨組織外，後來又在陳毅的介紹下，與李干成結婚。有關呂繼英和李超時的兒子李

鐵城，也就是李源潮同母異父的兄長，媒體報道很少，僅有以下幾條信息：

2008年4月4日，江蘇碾莊鎮超時小學揭牌儀式在原碾莊鎮才莊小學校園內隆重舉行。報道稱，"李超時將軍之子、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鐵城"參加了揭牌儀式。

檢索人民大學官方網站，已無法查到李鐵城的資料。不過，網上資料顯示，李鐵城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中國企業家協會下屬的"中企協培訓中心"任教授。後來，北京中美華管理科學研究院成立，該院介紹說，"研究院是以中國人民大學一批資深教授為主體，由博士生導師、原中國人民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李佔祥教授、徐昶教授、解培才教授、中企協培訓中心李鐵城教授及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管理研究所副所長楊德向研究員、原寶鋼集團現代化管理研究所所長張俊傑教授等聯合組建，聚集了30多位知名專家、教授集體創辦成立的。"

江蘇"鎮江烈士陵園"資料顯示：2002年4月5日，省委書記李源潮在市委書記史和平等陪同下來陵園祭掃先烈，並參觀烈士紀念館。同年12月22日，紅十四軍軍長李超時之子李鐵城全家，在民政局長戴善民陪同下參觀紀念館。

李源潮和李鐵城在同一年到"鎮江烈士陵園"祭掃先烈，因為李超時將軍之墓就在鎮江烈士陵園。此外，2006年4月5日，李超時紀念館在碾莊鎮才莊村落成時，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向將軍墓敬獻花藍。

從文革"逍遙派"到中學教師

李源潮原籍江蘇漣水紅窯鄉龍興村，不過他1950年11月出生

在常州，那時他父親在常州擔任中共地委書記。他 3 歲時因李干成調職，全家遷到了上海。

李源潮的青少時代都是在上海度過的。“文革”期間，李干成被打成陳丕顯、曹荻秋黑市委的黑幫重要成員，遭到迫害，身心受到極大摧殘，在關押中幾次病危，李源潮被列為“黑五類”子女，遭抄家、關押、毆打。

不過，《蘋果日報》說，外傳李源潮在文革初期是上海紅衛兵的武鬥幹將。其父李干成原任上海市副市長，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一結束即復出擔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而李源潮因文革期間參加的是力保當權派的紅五類組織，所以武鬥問題未被追究。

但知情人士告訴本書作者，李源潮“文革”期間並不是武鬥幹將，也不是造反派，而是一個“逍遙派”，因為父母都被打倒了，他還是個“黑五類”，沒資格當造反派，衹能當個“逍遙派”。

知情人士引述李源潮上海同學的話說，“外界所傳李源潮是造反派與事實完全相反，正因為他是逍遙派，文革結束後提幹和陞官都未受到任何影響。”

至於李源潮在“文革”時期的遭遇和表現，由於相關資料都未提及，現在已很難考究。甚至，官方媒體對其文革後上山下鄉期間的介紹，也只用一句話代替，“1968－1972 年在江蘇省大豐縣上海農場職工”。

不過，徐衛平撰寫的“上山下鄉『知青』文化”一文透露，李源潮當年曾任大豐海豐農場慶豐分場的知青男一排四班班長李源潮。文章對當初上海知青赴蘇北農場插隊有這樣的描述，從中可以看到李源潮的影子：

1968 年 10 月的一天，一艘裝點一新的東方紅 402 號客輪，汽笛長鳴，滿載著肩負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上海熱血青年，緩緩地離開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口號聲聲的上海十六鋪碼頭，遠離親人和家鄉，駛向南通，轉征江蘇省大豐縣（1996 年撤縣建市）的海豐農場。

大豐東部有 112 公里的黃海海岸線，由於長期處於長江、黃河沖蝕搬運泥沙入海的地質條件，在海流海潮的地質力學作用下，不斷堆積成陸、海岸線每年東移 50-80 米，形成一片廣闊的灘塗。

大豐安置的知識青年，有上海、無錫等地近十萬餘人，佔大豐當時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尤其以上海知識青年為主體達 84000 多名，分別安置在元華、新華、前鋒、慶豐、安豐和下明等分場，大豐當年真可謂是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戰場，成為大上海大批知識青年的第二故鄉。

當年的荒灘生存條件極為艱辛，是後輩人難以想象的茅草房、蘆葦牆、喝咸水、喫雜糧、提馬燈、進會場、洗浴靠食堂、睡覺上下床。耕地、播種、施肥、灌溉、治蟲、鋤草、收割、脫粒樣樣學，腳上起了繭，手上起了泡，冬天臉被凍傷了，夏天身體曬黑了，但心境純樸了，深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用當年知識青年的話說，上山下鄉的青春歷程為這代人今後人生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定不移、堅忍不拔的信念。

文章還說，無論是時代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代，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大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出生的第一代人，他們雖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但他們是上山下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先鋒隊，是回城發展城市經濟的中流砥柱，是改革開放中華民族承上啟下的堅強基石，當年曾任大豐海豐農場慶豐分場的知青男一排四班班長李源潮（原江蘇省委書記，現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曹樹民（光明乳業集團總裁）、金凱平（澳大利亞澳中集團董事會主席）、郭衛（上海芷新集團董事長）、嚴裕民

（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等都是當年下放在大豐知識青年中的傑出代表人物。



李源潮

在海豐農場當了四年知青後，1972年李源潮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在上海師範大學數學系學習兩年。網上一篇文章稱，李源潮22歲至24歲時曾在上海師範大學學習，而這兩年經歷是他的知識儲備期之一。李源潮在上海師範大學讀書時，正值上海師範學院與華東師範大學等五校合併成立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的校訓是：厚德，博學，求是，篤行。

1974年畢業後，李源潮被分配到上海市南昌中學當了兩年教師，1975年至1978年，在上海市盧灣區業餘工專當老師。

四年的教師經歷，對李源潮的影響很大。在任江蘇省委書記時，他曾撰文強調師範教育的重要性。稱：師範教育是師資培養的源頭，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緊密相連。辦好師範教育，是江蘇教育發展的百年大計。

李源潮還說，教師是神聖的職業，全社會都要滿腔熱情地關心教師、愛護教師，不斷提高教師待遇，依法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吸引和鼓勵優秀人才從事教育工作，大力宣傳優秀教師的先進事跡，讓教師職業成為社會上最受尊敬、最體面的職業。

復旦畢業後，靠陳丕顯一路陞遷

1978年恢復高考後，已經當了四年老師的李源潮考入了復旦大學數學系。早前介紹李源潮的文章，都很少提到他在學校時表現。有海外媒體稱，李在復旦期間的學習成績一般，畢業後靠關係留校并當上復旦團委書記。但也有當時的復旦同學說，李在校期間表現很低調，很"不起眼"。

不過，李源潮所在的復旦數學第78級，的確出現一批專家和教授，從政的衹有李源潮是最有名的。這一點，"復旦數學系78級：全國最牛的班級"一文列出一長串名單：

李駿—斯坦福大學數學教授（哈佛大學數學博士）（1978年首屆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第一名）

陳貴強—西北大學數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數學博士）

劉建國—馬里蘭大學數學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數學博士、計算數學）

柏兆俊—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計算機系、數學系教授、計算機系系主任（復旦大學數學博士、計算數學）

孟曉犁—哈佛大學教授、統計系主任

范劍青—普林斯頓大學運籌與金融工程系講座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統計學博士）

應志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統計系主任（哥倫比亞大學大學博士）

姚大衛—哥倫比亞大學運籌學教授（多倫多大學博士）

何華—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博士）

李樂德—耶魯大學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西北大學博士）

梅建平—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副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

博士）

周林—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商學院凱瑞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

李源潮—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部長

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召開李源潮晉陞政治局之後，他的復旦老同學"木辛"在海歸網的"海歸茶館"發表文章，透露了一些李源潮在校期間的細節，並對這位"時事人物"進行了點評。文章寫道：

> 關於復旦李源潮，咱得多說幾句。因為他是咱的同學，一個系上過課的。李源潮雖是和我同系同屆，年齡比我卻大很多。他那時也才20多歲，在系裏一點也不起眼。我記得，他們專業分兩個班，一個班年紀比較靠中，一個班年紀比較小，都是十四五歲的學生，而年紀小的班裏還配了幾個年齡較大的同學。李就在這個小班裏。
>
> 作為大學生，李行事非常低調，從不張揚，屬於很能團結人，很能讓人信賴的那種人。直到快大學畢業，李一直在學校都是默默無聞，最多是擔任系裏的學生會的職位。原來系裏的學生頭是另外一個人，後來那位同學因為要和夫人離婚，被鬧到學校，最後被撤換掉。李沒有這個問題，他父親是原上海市副市長，他的夫人是長征醫院的醫生。
>
> 我記得有幾件事，一是有一年，李被評為市里的三好學生，因此可以隨著上海市的三好學生夏令營去三峽和桂林。但是，他沒去，而是自費帶領班裏的小同學參加了去青島的夏令營，睡甲板，睡桌椅。將心比心，要是我，肯定不會幹這個事，所以，我一直很看重他的個人素質。二是考研究生時，李已經內定留校擔任團委書記。我去系裏報名時，看到他班裏的同學拿著他的報名表去替他登記研究生考試報名，結果系主任老師說，你叫李源潮自己來一趟。意思說，不許他報名研究生的。所以我估計，他並不是起初就想從政的人。只不過，政治體制挑選了他，他又無法逃避。
>
> 我離開復旦後，很快就看到他的名字先是出現在團中央書記的名單裏，又成為上海團市委書記，他是先中央後地方。據說通知他去團中央當書記時，他的臉都白了。可能因為昇的太快，沒有想到。後來，他又先後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不知是怎麼念的？
>
> 前些年，江蘇省來人，我還問起李的情況，李是江蘇省的第一把手。江蘇的人說，李可能會提陞到中央去。後來昇上去的是薄熙來，而不是他。
>
> 李源潮走向政壇的路，開始肯定不是自己選擇的。雖然，我通常很鄙視走仕途的人，現在想想，如果他拿了個數學博士，也未必會成為成就斐然的數學家。走向仕途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為這個位置肯定會有人來佔住，李也算是個不錯的人選。
>
> 原來想哪天去南京還可以拜訪一下老李，省委書記的門檻還是可以邁的。可是現在也沒有這個可能了。

這是到目前為止，網上出現的有關李源潮在復旦上校時表現最"詳細"的文字介紹，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李源潮當初走上仕途可能並不是他的第一選擇，而是政治體制挑選了他。也可以說，李在校期間的低調表現，還有他父親的人脈關係，最後讓復旦大學選擇他留校當團委副書記。

從官方簡歷更能看出這種人脈關係所起到的"直昇機"式陞遷的作用：1978年3月在復旦大學數學系數學專業學習，任團總支副書記、書記；1982年1月復旦大學管理系教師、校團委副書記；1983年4月任上海市團委副書記，1983年5月任上海市團委書記，黨組書記，1983年12月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從復旦畢業到擔任上海市團委副書記，李源潮只用了15個月時間；從上海市團委副書記昇到團委書記，只用了1個月時間；而從上海市團委調到團中央書記處的時間更短，才不到7個月時間。

為什麼李源潮能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一下子昇到團中央呢？知情人士稱，李源潮的仕途與陳丕顯密不可分。文革時，李源潮的父親因為不肯揭發陳丕顯而被關進監獄，前文介紹過，陳丕顯對李干成評價甚高，稱他是"一位鐵骨錚錚、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輩革命家"，由此可見兩人關係確實不一般。八十年代初，在陳丕顯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便把李源潮推薦給共青團中央，列為"跨世紀接班人"的培養對象。這一點從兩人的簡歷中就可以看出：1982年9月，陳丕顯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10月調中央工作；李源潮在1983年4月被調到上海市團委，1983年12月調到團中央。有評論人士稱，八十年代前期，陳丕顯官昇一級，李源潮就晉陞一次，如果沒有陳的大力提攜，恐怕不會有李源潮的今天。



陳丕顯

難怪他的復旦老同學在文章中稱，因為昇的太快，連李源潮自己都沒有想到，所以"據說通知他去團中央當書記時，他的臉都白了"。其實，當時李源潮對父親的人脈關係，對已經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陳丕顯將會"照顧"老朋友的兒子，對自己的前途，早就心知肚明瞭……

陳丕顯在1995年8月逝世，隨後李源潮從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調任文化部，並一幹就是四年多，一度仕途也不被看好，這些多少都跟陳丕顯的勢力和影響消退有一定關係。這些都是後話，下文有更詳細的介紹。

陞遷之路停步：從團中央到文化部

1983年12月在共青團十一屆二中全會上，由中共中央提名，團中央委員舉手走個過場，李源潮被選為團中央書記處的第四把手，分管宣傳，全國青聯副主席，後來又兼任中國少年先鋒隊工作委員會主任。

在團中央工作期間，李源潮看準了高學歷對於進一步陞遷絕對是有必要的。他在職讀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的研究生，1986年獲得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碩士學位，12年後，1998年又獲得中央黨校法學博士學位。後來他又被選送參加了為期半年的哈佛大學的中國高官

培訓項目。李源潮還有著作若干，例如1991年8月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這本212頁的小冊子署名是厲以寧、孟曉蘇、李源潮、李克強——一位導師加上三名在職博士生。

八十年代中後期，李源潮在團中央的陞遷之路曾一度停步不前。那時他身上的書生氣與官場習氣還有點格格不入，文思詠與任知初《胡錦濤傳》中曾提到過，李源潮當時下到各省市去調查時堅持要遵守中央規定的"四菜一湯"，否則就不肯入座就餐，或者堅持要自己付費，下面條，省市委接待者當然不允，於是弄得場面僵持，有時團省、市委書記很是下不來台，事後一肚子意見。

還有一次，李源潮去四川出席探討團組織在新形勢下如何定位的座談會，在會上發表看法，肯定了某些省市共青團組織開設企業的嘗試。他的這個看法，被與會的新華社記者整理出來寫成一份"內參"，報到中央。時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兆國讀到，又聽到中央某些元老對"團辦實業"這一嘗試不以為然的風聲，突然光臨團中央機關，當著李源潮的面，不點名地批評這種主張"改變了共青團組織的性質和宗旨"，李源潮十分難堪。如果王兆國後來沒有遭貶抑，很難設想李源潮是否還能在官場上晉陞。

1993年，李源潮的父親去世，他也在這一年從團的崗位上"畢業"，調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1996年，又調任文化部副部長，一幹就是四年。相對於前後離開團的崗位的書記們，他的這個副部級崗位實在屬於實權小、風險大那一類。李源潮在離開團中央之後的仕途命運飄忽不定，重用中又似被冷藏，冷藏中又似有玄機。199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1996年3月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在這把無論如何算不上重要的交椅上一坐就是四年半，當時甚至有人認為他的仕途之路"也就是這樣了"。

據知情人士向本書作者透露，1993年3月，李源潮剛到文化部任副部長時，時任部長劉忠德和副部長艾青春都不太搭理從團中央出來的李源潮，後來艾青春和另一名副部長孟曉駟處處排擠李源潮，而部長劉忠德與李源潮也有矛盾，1998年劉忠德離開，孫家正當部長後，孫李也矛盾重重。

知情人士稱，不苟言笑的李源潮初到文化部時，還像在團中央一樣，對官場格格不入，於是便遭到時任副部長艾青春的排擠。1940年8月出生的艾青春，1964年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畢業。1964年—1985年在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任教，兼任人事處副處長，著有《力》、《熱》、《機械》等書。1985年任北京圖書館黨委副書記、館長助理。

與李源潮的資歷相比，艾青春在文化部可算是老人，1987年任文化部人事司司長，1990年任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黨委書記、副局長，1993年任文化部人事司司長，1996年初與李源潮一起任文化部副部長，但排在李後。

現任全國婦聯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的孟曉駟，1956年出生，1982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分校黨史系畢業後，歷任文化部黨委宣傳部幹事、文化部機關團委書記、文化部社會文化司副司長、文化部文化市場管理局副局長、文化部文化市場管理局局長等。1997年至2003年，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華峰文在"中國文化部對中華民族的危害"一文中，披露了一些當年劉忠德與李源潮之間的矛盾，以及文化部的一些內幕。

文章說，當年，當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請劉忠德、孫家正幫忙為胞弟陳佐湟第三次要求回國工作鋪路時，劉、孫交給了孟曉駟辦理。為了討好中央領導及陳佐洱、劉忠德、孫家正等，孟竟然不顧

黨紀國法和文化部其他部領導的不同意見，藉在墨西哥訪問時和陳佐湟培養“感情”。回國後又委託上海市委副書記殷一璀，聘用陳佐湟擔任上海愛樂樂團的領導和總監。

文章指出，當年劉忠德、孫家正和原文化部副部長李源潮鬧矛盾時，孟曉駟全線一邊倒，變本加厲地陷害李源潮，連李源潮培養的幹部都不放過，直至李源潮離開文化部。

看來，李源潮在文化部的那幾年日子的確不好過。知情人士透露說，這也是不少人認為他的仕途已經快走到頭的原因，當時文化部內部普遍認為李源潮即使在文化部幹下去，也沒機會昇任部長，如果調到其它部，頂多還是個副部長。

當時誰又能料到，在文化部鬱鬱寡歡的李源潮，在年近半百和新世紀到來時，突然時來運轉？

團派和太子黨雙重身份助其“翻身”

八十年代李源潮在共青團任職期間，正逢胡錦濤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此外，再加上其作為高學歷、複合型的人才，這樣的官員在中國省部級官員中並不多見，其發展潛力不言而喻。後來調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源潮也和胡錦濤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

當初，李源潮在上海擔任上海團市委副書記期間，與當時分管宣傳和團委的市委副書記曾慶紅，相處得不錯，工作能力受到後者的肯定。

海外媒體稱，當年江澤民曾想把李源潮安排到中央辦公廳擔任副主任，但遭到宋平反對，宋平指：李源潮人浮躁，喜歡講過頭。後來，才被調到文化部任副部長。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的“上海幫”出身的曾慶紅，與李源潮也有很深的淵源。早在五十年代初，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和李源潮的父親李干成都曾當過上海市副市長。解放後，曾慶紅也曾跟著華東保育院轉到上海，在那裏生活了兩年多；而李源潮的青少年時期也是在上海度過的。後來兩人又先後在上海工作過，可以說上海是他們的政治根源。

但，不管李源潮與江澤民和曾慶紅關係多好，還是他與胡錦濤的工作關係多密切，2000 年李源潮突然時來運轉，調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和南京市委書記，離開遠談不上重要的是非之地文化部，足以證明其“團派”和“太子黨”的雙重“身份”，再加上來自上海的政治根源，助他重新“翻身”。

李源潮是在自己即將“知天命”——50 歲生日的前夕，才突然得知自己被中央欽點回到家鄉擔任省委副書記的。這顆政治新星，這時在海內外政治評論家的眼中才驟然亮了起來，進入了“共青團派”一線後起之秀的名單——在此之前，人們津津樂道的往往是宋德福、李克強，而給李源潮打的政治印象分均屬平平。

但據熟悉內情的人士告知，離開北京前往南京，是李源潮主動要求“下放”到地方鍛煉，這是他為打破自己陞遷上的“僵局”，爭取更廣泛更全面政治資歷的一步棋。

雖然仍為副部級平調，但是江蘇不僅是江澤民的故鄉，也是胡錦濤出生、童年到少年成長之地，更是中國經濟、文化上舉足輕重的大省，李源潮這才走上了仕途快車道，似乎是在彌補被耽誤的時光，職位一年一變：2000 年 10 月從文化部調到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副書記；一年後的 10 月，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又一年後的 10 月，在中共十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兩個月後，2002 年 12 月，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昇為江蘇省委一把手。這時他的南京市委書記交

椅才剛剛坐了 13 個月多，還沒坐熱呢！沒過幾個月，2003 年 2 月，他又當選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江澤民在任時，讚揚最多的是：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江蘇省委副書記李源潮。江澤民讚賞李源潮，說他是以新思維、新方式抓政治工作，以新思路、新形式到江蘇巡視，都是由李源潮打點一切，專門為江安排好兩名淮揚菜大廚、兩名俄羅斯西廚，安排好揚劇、滬劇傳統劇目、古典音樂、懷舊音樂會等節目。

李源潮自 2002 年 12 月出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而溫家寶自 2003 年履新以來，每年都考察江蘇，胡錦濤也在 2004 和 200 到訪。在 2004 年，中共中央九名政治局常委當中，六名先後考察江蘇。可以說，除了首都北京以外，中共中央領袖出現最多的省級地方，就是江蘇。

中央當局對江蘇省的滿意也是顯而易見，不單頻頻到訪，還把江蘇經驗介紹到外國去。2006 年中國政府第一次和 19 個非洲國家開展的合作交流活動，為期四天的國際人口與發展高官研修班，10 月底選擇在江蘇蘇州舉行。李源潮在會上介紹了中國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和內容，重點講述了和諧社會在江蘇的實踐，博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掌聲背後意味著不只來自非洲地區 19 個國家的謝意，更重要是中央的肯定。

李源潮從政的座右銘是："政治問題不要急於表態，要摸摸情況，要多請示，要耐心等指示"；"大事，輪到該管的要管，但不要認真，認真了會得罪人，中庸之道適合社會"；"生活問題、作風問題，難有個標準，衹要不搞得滿城風雨，一隻眼睜，一隻眼閉"；



李源潮在江蘇

"經濟發展硬指標，過了頭、上得快，最多作一下檢討，要顧全大局"；"國務院的部長，下來還是地方的省委書記、省長容易坐穩，我看是地方一把手容易坐穩，有機會進核心層（指政治局）。"

曾有評論說，人們常常將"共青團派"與"太子黨"相提並論，但是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源潮這裏，則很難劃分了，他一身而兼二任：從胡錦濤擔任團中央一把手的歲月開始，擔任過長達近十年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是道道地地的"團派"成員；其父親李干成又是 1929 年加入共青團（後來轉為中共黨員），"文革"前就擔任過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他是不摺不扣的"太子黨"。與他相同背景的還有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起來更巧的是，李源潮還是個"團派世家"："九一八"事變後他父親就擔任過共青團河南省委書記。

不過，在十七大召開前，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在討論十七屆委員人選時，據說，吳官正、羅幹等曾明確表態：李源潮不適宜進政治局，不適宜擔任組織部長，又指：不能因為年齡而忽視基本條件和黨內外反映，在江蘇省的表現和業績。

在爭議僵持時，是胡錦濤拍板說：還是要用，給李源潮創造條

件，如果不行再調離。胡的拍板，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滿足江澤民、曾慶紅的提名，並以此回報曾的退休。

鐵腕治吏，反貪路子很野很狠

有人說，江蘇省作為中國多年來數一數二的經濟文化大省，李源潮在施政中本可以“蕭規曹隨”，平平穩穩地出成績。但知情人士稱，李源潮是個很有抱負的官員，他顯然不願躺在前任的功勞上坐享其成。

在 2001 年 11 月，以省委副書記兼任南京市委書記後，李源潮就以一種近乎苛刻的方式，在南京以及江蘇省各機關推行作風改造工作。於浙江寧波醉酒非禮女服務員的南京市政公用局局長朱自強第一個觸了霉頭，2001 年 12 月 8 日，南京市委召開了局以上幹部大會，宣佈對朱等五人的撤職處理。

如果說，這還祇是李源潮“小試牛刀”的話，那麼，隨後推行的“萬人評議機關”則堪稱“大刀闊斧”，直指政府機關作風頑疾，衝擊“官本位”觀念。儘管輿論對這項活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頗有質疑，但他不為所動，力求藉此達到加強公眾監督、遏止權力濫用和腐敗蔓延的目的。根據 2002 年的評議結果，南京市委提請市人大常委會免去了評議中排序居末的房地產管理局和市容管理局局長的職務。

就任省委書記以後，李源潮繼續以其鐵腕治吏的風格著手整肅江蘇官場。有網絡評論說，李“看似有些容貌憨厚，不過膽子不小，敢在中國社會矛盾突化的當下搞『萬民評議』，值得欽佩，而且反貪的路子很野很專也比較狠”。

為落實執政理念，李源潮把著力點放在了制度建設上。他明確

提出建設“法治江蘇”的戰略舉措。他反覆強調，要大力建設法治政府，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穩步推進司法改革，努力實現司法公正。他特別強調，要著力構建對公共權力的有效監督機製，確保公共權力始終置於黨和人民嚴密的監督之下。

值得關注的還有，江蘇省於 2006 年 3 月 31 日通過了《江蘇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並於同年 6 月施行，成為中國內地首份保障新聞機構採訪權利的省級條例。

該條例規定，“新聞媒體對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履行職務活動，進行輿論監督”，並規定妨礙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單位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將給予批評教育，責令限期整改，由監察部門依法處理，以至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李源潮鐵腕治吏

把江蘇省和早前該省無錫、南京兩市已施行的《預防職務犯罪條例》的相應內容比照可見發現，省的條例對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或責任）寫得簡單直接，不帶條件，並且清楚言明“妨礙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要負法律責任。

有外界評論說，這表明江蘇在這方面已成中國改革先鋒，李源潮在為中國輿論監督搶灘。

李源潮的抱負實際上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隱含命題：隨著經濟轉型，政府如何順應經濟形態和體制的變化，及時轉換職能？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已經領先的江蘇如何實現更大的突破？前述鐵腕治吏的就是著眼於此的系列舉措之一。

早在南京任上，李源潮經過一段時間探索，提出了"綠色南京"的口號。他的工作有這樣兩個支點，一是倡導建立"服務型政府"，一是倡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在南京形成的這一核心思路，自2002年12月李任江蘇省委書記後，被進一步推向整個江蘇省。

江蘇省在"九五"期間曾提出"強省富民"的奮斗目標。執政江蘇一年多後，李源潮將之改為"富民強省"，開始實施"富民優先"的發展戰略。這反映出其戰略思路的新取向，即"富民強省"，打造民營江蘇。按外界的理解，就是說江蘇從此也要走浙江的路了。

對江蘇而言，提出"學習浙江"很不容易，這意味著"放下老大哥的架子"，意味著一場區域發展模式轉型的大戲即將上演。浙江有"溫州模式"，江蘇有"蘇南模式"，兩種模式並存，並暗中較量了20餘年，現在江蘇"易幟"學習浙江，其遭遇的最大挑戰就是"蘇南模式"固有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管理體制。從長遠看，"民營江蘇"的題中之意，就是要以市場主導型管理體制取代政府主導型管理體制。在此過程中，政府一方面要大力扶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民營經濟逐步發展壯大的同時，政府還要適時地逐步地淡出市場。

對此，李源潮說："目前制約江蘇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仍然是思想障礙，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最緊迫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思想。"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制止政府與民爭利。

然而，正當江蘇全省上下雄心勃勃拓展全新發展空間漸成氣候之時，一場來勢凌厲的宏觀調控不期而至，而且，第一個拿來"祭刀"的對象正是江蘇常州的民營企業"鐵本"。"鐵本"的墜落因其自身的違法違規，並不在於其作為民營企業參與鋼鐵行業。然而，此事在江蘇商界和官場引發的衝擊波無疑是巨大的，對李源潮這位年輕的省委書記更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鐵本事件，李源潮專赴中央檢討

2003年，全國鋼鐵行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427億元，同比增長96. 6%；2004年一季度又完成投資334. 9億元，同比增長107. 2%。從產量看，2003年達到22234萬噸，佔世界的23%。媒體驚呼，"大煉鋼鐵"再現中國大地。

此時，國家發改委對鋼鐵行業的盲目投資、重複建設一再叫停。繼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發改委的通知，對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提出明確要求後，國務院於2004年2月4日召開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電視電話會議，會議要求各地要對鋼鐵、電解鋁、水泥投資建設項目進行認真清理，並將結果上報。隨即，國務院派出聯合檢查組赴重點地區進行督促檢查。鐵本撞到了"槍口"上。

2002年初，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籌劃在常州市新北區魏村鎮、鎮江揚中市西來橋鎮建設新的大型鋼鐵聯合項目。該項目設計能力840萬噸，概算總投資105. 9億元人民幣。2002年5月，鐵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國芳先後成立7家合資（獨資）公司，把項目化整為零，拆分為22個項目向有關部門報批。2002年9月至2003年11月，常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江蘇省發展計劃委員

會、揚中市發展計劃與經濟貿易局先後越權、違規、拆項審批了鐵本合資公司的建設項目。在“審批程序”完成之前，鐵本在2003年6月就進入現場施工。

2004年3月，江蘇省政府責令其全面停工。其實，“鐵本事件”早在2004年2月份就已經暴露。此後，國務院派出由發改委、監察部、國土資源部、人民銀行、稅務總局、工商總局、環保總局、審計署、銀監會等有關部委的人員組成的檢查組，對鐵本項目進行了全面調查。公安機關對該公司法人代表戴國芳等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拘強制措施。

2004年4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鐵本公司違規建設鋼鐵項目有關責任人作出處理。隨即，包括常州市委書記、揚中市委書記、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在內的各級官員受到嚴重警告、撤免、責令辭職等相關處理。之後，公安部和有關部門配合，繼續深入查處涉案單位和人員的經濟犯罪等問題。

中行、建行、農行等6家銀行因涉及鐵本項目的貸款有160多筆而深陷漩渦。國務院檢查組的調查顯示，截至2004年2月末，中國銀行常州分行等金融機構對鐵本公司及其關聯企業合計授信餘額折合人民幣43.39億元，其中25.6億元的銀行貸款已實際投入到項目中去。

“如果中央檢查組晚來幾個月……”，在媒體報道或評析中，不少人提出這樣的假設。這種“生米煮成熟飯”的思維，正是鐵本挑戰國本的註腳。在人們的印象中，如此大的項目，一旦投產運營，即使遭到查處，最多是被罰款而不是停項。

鐵本開足馬力違規上項目。違規項目的上馬理應“磕磕絆絆”才對，鐵本卻將遇到的審批關、土地關、環保關、貸款關一一化解。

2003年起，針對各種開發區的“圈地運動”，國務院開始嚴查，並撤消了數千個開發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有關規定，涉及徵用基本農田要由國務院批准。然而，鐵本與當地鎮政府僅憑雙方簽訂的投資、供地等“協議”就佔地6000多畝，其中相當部分是基本農田。同樣，鐵本並沒有上報國家環保總局進行“環評”。



央視：“鐵本”案件，發人深思

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結果：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並造成嚴重後果的案件。

2004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鐵本事件”是一些地方對中央宏觀調控“置若罔聞，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結果。“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

作為地方主政一把手，非常時刻，李源潮感到了巨大壓力。隨

後，李主持省委省政府全面展開對經濟過熱的整肅和治理工作。當時官方媒體還評論說，處在特定位置上的政治明星們的行為方式和表現姿態，總是獲得包括普通公務員在內的大眾的種種猜測——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從來就被南京乃至江蘇的人們關注、評論，尤其在2004年6月底，種種流言侵襲南京的時刻。

“我們的李書記最近比較煩，比較煩。”江蘇省級機關的一位普通公務員信口就套用了流行歌詞的一句話，來形容在非常時刻的李源潮。雖然含有一絲下屬對上級的善意調侃意味，但語氣中還是流露出普通人對“在其位、謀其政”的主政者的同情。

也有媒體強調，鐵本案實是因地方政府掌控民營企業命運並為其政績服務而起，很典型地反映了地方的利益取向與中央宏觀調控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政府職能的錯位，對市場的參與程度之深，退出難度之大。

2004年4月29日，在向全省領導幹部通報查處鐵本項目違規建設情況時，李源潮表示鐵本的問題出在江蘇，省委、省政府有責任，作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要負責任。據說，在此之前，李曾專赴北京就此事向中央作檢討。

有分析認為，“鐵本事件”發生在江蘇，按照慣例，發生這麼大的案子，會有省部級官員受到懲處。但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政治局討論時，中央領導表態稱，江蘇能夠自己發現並堅決執行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因此，對江蘇涉案官員的處理不宜擴大。

2004年3月開始，中央領導人先後視察江蘇，包括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曾培炎，以及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等。在“鐵本事件”陰影下，中共高層的舉止無疑給南京城內的地方諸侯構成巨大壓力。

不過，當年4月30日至5月6日胡錦濤專程到南京視察，給李

源潮打氣。其間，胡再次提出，江蘇要實現“兩個率先”，這對主政一方的李源潮多少是一種安撫，後者也就此避免瞭因“鐵本事件”而翻船之虞。

徐國健賣官案，讓李源潮得口腔潰瘍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鐵本事件”暫告平息之際，江蘇省又出了省委組織部長徐國健被“雙規”案。幾天後，坊間就流傳著好幾個版本。一說此案涉案官員在400人以上，另一說約在140人左右，甚至還可能有幾個地級市的一、二把手會出問題。隨著數位廳局級高官落馬，有媒體稱“江蘇正掀起該省建國以來最大一輪反腐風暴”。

南京市政府一位官員說，即使沒有2004年的“鐵本事件”和“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雙規案”，李源潮也一直都工作刻苦，由於睡眠不足，弦繃得很緊，結果患有長期反覆發作的口腔潰瘍。

作為全國第一個因腐敗案落馬的在任省級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原常委、原組織部部長徐國健的受賄案在江蘇乃至全國引起不小的震動。

的最後一次公開亮相。當天中共江蘇省委第十屆委員會第7次全體會議在南京召開，徐國健出現在大會主席台上。

6月4日，徐國健原計劃列席一個會議，但會議開幕後，他的秘書突然發現怎麼也聯繫不上他。6月5日，江蘇省委向全省各市發佈了徐國健被中紀委“雙規”的內部通知。6月30日，《新華日報》發佈簡要消息：經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徐國健的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委員職務。



徐國健檔案照

年屆六旬的徐國健出事與江蘇交通廳腐敗窩案被查處有關。早在徐國健落網的前四個月，即 2004 年 2 月 3 日，江蘇京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文錦與江蘇省原交通廳廳長、江蘇交通產業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章俊元先後被“雙規”。

作為江蘇交通廳腐敗窩案中關鍵一環的章俊元，2001 年 1 月被委任為江蘇省交通廳黨組書記，6 月任廳長，這一任命實際上得到了省委組織部長徐國健的大力支持。當時，章俊元因差一票沒通過人大關於交通廳廳長的任命，便找徐國健幫忙。在徐國健的斡旋下，幾個月後，章俊元高票當選為交通廳廳長。

2004 年春節，章俊元帶著一個白底藍格、上方有拉鏈和提手，寬約 50 多厘米、高 70 厘米、厚約 25 厘米的編織袋，來到了徐國健家，並帶了兩幅名畫，說是感謝徐國健幫他當上交通廳長，並希望在成為省級後備幹部的事上繼續幫忙。

後來，徐國健的妻子沈秀如清點，裏面是 200 萬元的現金，都是新版的百元鈔票，而這也是徐國健單次收受最多的一筆賄賂。

而最早出事的王文錦，掌控的江蘇京滬公司國有資產近百億元，是經江蘇省政府批準成立的大型國有企業，由江蘇交通產業集

團控股，江蘇京滬高速全長 261.5 公里，2000 年 12 月建成通車，江蘇京滬公司負責對該路段的養護、收費和經營管理。

王文錦行事相當高調，經常標榜自己“應該是年薪定位在 200 萬的大型企業改革家”。他的年收入是公司平均工資的 35 倍，是一線員工的 50 倍。2003 年 2 月開始，反映王文錦涉嫌貪污腐敗以及背後有保護傘的舉報信，不斷地寄給江蘇省有關領導。

中紀委親自經辦王文錦一案，由此牽出交通廳廳長章俊元，繼而牽出徐國健。

徐國健被查證的最早受賄案情和當時的江蘇華良集團總經理張忠良有關。1992 年，徐國健任鹽城市委書記後，一次偶然的飯局上認識了張忠良，當時張忠良是一家企業的負責人。

張忠良在徐國健的幫助下，順利當上了副鎮長，後又掛職鎮副書記。1993 年春節，徐國健在鹽城市政府大院家中收到了之後他被查證的第一筆受賄款 10 萬元。

此後，張忠良的賄賂款不斷送上門來，當然前提是徐國健在此後 10 多年間，利用職務便利，為張忠良本人或他人在職務陞遷、企業經營、子女陞學等方面謀取了大量利益。

張忠良把徐國健當作自己的財神爺，自然也不忘了回報。一次張忠良到徐國健家，看到徐國健的妻子已經退休，就建議她到股市上走一走，消磨消磨時間，然後張忠良以自己的名義開了戶，分 6 次打進 109 萬元，名義上是讓其妻沈秀如替他炒股，實際上是送股給他們。徐國健在感覺要出事後，和其妻及張忠良密謀串供，企圖稱股票賬戶是張忠良的，其妻衹是幫張忠良炒股，並非張忠良送錢給他們。

2005 年 12 月 30 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轄，該案由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經審理查明，1992 年至 2004 年，

徐國健利用先後擔任江蘇省鹽城市委書記，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的職務便利，為江蘇華良集團總經理張忠良、江蘇省交通廳廳長章俊元、江蘇悅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友林、江蘇省溧陽市糧食購銷有限公司總經理姚洪軍、江蘇省阜寧縣副縣長王禮等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張忠良、章俊元、胡友林、姚洪軍、王禮人民幣 631 萬元、美元 1.1 萬元，折合人民幣共計 640 萬餘元。案發後，贓款已全部退繳。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徐國健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賄賂，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受賄數額特別巨大。鑒於徐國健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有認罪悔罪表現，贓款已全部退繳，依法判處徐國健死刑，緩期 2 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06 年 2 月 24 日，徐國健的兒子徐一，因犯轉移贓物罪，被廈門中院一審判刑一年半，緩刑兩年，並處罰金 5 萬元；之後他的妻子沈秀如因利用丈夫職務便利收受賄賂 109 萬元、轉移家中部分受賄贓款，被廈門中院以受賄罪、轉移贓物罪，數罪並罰，一審判刑八年，並處沒收財產 20 萬元、罰金 1 萬元。

徐國健一案這對李源潮來說，無疑面臨一場極為“非常”的考驗：如何安撫人心、回應民意，重樹江蘇主政團隊廉正形象？之所以說“非常”，因為此次事件已並非三年前南京市政公用局局長朱自強寧波醉酒事件可以歸結為僅僅是官員個人素養問題，這已經涉及到一個不小的“塊面”、涉及到一地官場整體的純潔度問題了：一向低調行事的李源潮一反常態，主動改變了上任伊始指示當地媒體儘量淡化對本人及政府報道的做法，頻頻出現在當地媒體的頭版頭條：

6 月 30 日，李率省級機關 1000 多名新老黨員在雨花台烈士陵園重溫入黨誓詞；

7 月 2 日，李在江南劇院觀看了以反腐倡廉為主題的大型話劇《啊！娘親》；

7 月 5 日，李代表江蘇省委常委發表保證自身廉潔的公開承諾。

熟悉李源潮的人士透露，熟悉宣傳力量、但一直與媒體保持相當距離的李源潮在此“非常時刻”終於準備借用一下輿論的力量，來整肅江蘇官場，以屏除暫時還無法從根源上解決的種種官場陋習並壓縮不透明的幕後操作。

有知情者說，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各省的“封疆大吏”難得聚到一起，為了圖得“半日之閑”，大家無不閉門謝客，暫時中斷一切“社交”活動。他們太累了。一種不為公眾所知的疲累，不衹是體力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可以想像得到，李源潮無疑是那一陣子最勞累的省委書記。

率先領會“和諧社會”，遭遇公共危機

2007 年除夕，一如往年，胡錦濤和溫家寶離京與農民過年，而李源潮也前往南京六合區看望村民。香港《文匯報》說，李源潮將這份從 2002 年起延續六年的“除夕之約”送到了基層。

新春之際，大陸和香港的媒體突出的“政治新星”還包括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前者陪同溫家寶前往撫順花區古城棚改新區視察，充分反映遼寧推動的棚改工程深受中共高層肯定；後者則在湖南紅網發帖拜年，受到中國官方各大媒體的追捧。

南京六合區鐵倉村是李源潮的“學教活動”聯繫點，從 2002 年起，李源潮每年春節都到村裏來，從基層實例掌握和分析江北農



李源潮在基層

村的發展，瞭解農民的情緒和願望，看村幹部是否兌現對民眾的承諾。

自胡溫執政以來，不少省級一把手紛紛在春節前的除夕下農村，但能夠早在2003年就與胡溫同步“深肖朕躬”的，僅李源潮一人。不過，他並不完全重複胡溫做法，而是彷傚中又創新意，選擇每年都訪同一條村，觀察農村有沒有逐年改善。

近年來，江蘇在經濟快步發展的同時，兼顧社會公平方面亦做得不錯。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大約是3.23倍，即3.23個農民的收入總和與一個城市居民相當。而江蘇的城鄉差距 2004 年下降至2.15倍，為全國最低。在胡溫強調協調發展、關注弱勢群體的大環境下，也讓李源潮的政績顯得非常可觀。

依據江蘇省的規劃，“十一五”期間，人均GDP將實現從3000美元向5000美元過渡，力爭2010年，總體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蘇南等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向基本現代化邁進。

全面小康四大類18項指針的目標值，除了包括人均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硬指標，還包括城

市登記失業率、恩格爾係數等反映分配均勻度的指標，城市綠化覆蓋率、環境質量綜合指數等環境指針，和農村村委會依法自治達標率這政治指標。

胡溫新政其中一項指導思想是評定發展成績不光看GDP，還要環境、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成績。江蘇率先把各類別要求量化成指標。據《人民日報》報道，李源潮痛恨地方政府為追求GDP，而不顧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他曾經在公眾場合表示，摩天大樓既不美觀，也不實用。這是對我們祖先的一種侮辱。

政治指標方面，江蘇毫無疑問已經處於全國領先位置。2005年推出20個省屬正廳級職位，公開向社會招聘，這是中國內地各級政府提供最高級別的公開招聘職位。至目前為止，江蘇也是唯一推行省級機關，包括省委辦公廳，讓逾萬名群眾代表評議政職的省份。

作為江蘇省主政高官，李源潮的曝光率相當高，省會南京的主要傳媒常有李源潮的最新動態。或是在大街小巷探訪民情，或是在會議上指點論政，他那真誠而自然的笑容一次次定格在報章上、熒幕上，江蘇人十分熟悉。

主政江蘇五年後，李源潮在2005年“兩會”期間表示，江蘇省GDP增速位列中國所有省級地區中的前三位，言語間流露自豪。過去三年，江蘇省農民收入也迅速增長。李源潮表示，城鎮居民收入增幅達到兩位數比較容易，但農民收入增幅達到兩位數就不容易了。

身為江蘇人的李源潮給江蘇人的印象是“勤政務實，關注民生”。2002年初，時任南京市委書記的他，提出了在內地建立首家惠民醫院的構想，專為該市12萬低收入貧困民眾提供醫療服務。南京惠民醫院的質優價廉立即在當地獲得好評如潮，上海、北京、新疆、貴州等省市紛紛彷傚。

2004年發生的“鐵本事件”和省委組織部長腐敗案，胡溫在李

源湖親赴北京檢討後力保其過關，未料在十七大召開前又爆發藍藻事件，李源潮可謂一步一坎，步步心驚。以他骨子裏不服輸的性格，他當然不會放棄。藍藻事件稍稍平息，他即火速製定拯救太湖計劃，並撂下狠話：哪怕全省的 GDP 下降 15%，也要“向大自然還賬”。

而就在美國財長保爾森訪華抵達首站青海湖之時，胡錦濤在江蘇就環境問題發表講話。胡選在江蘇談此問題，顯示中央對李源潮是批評，更多的是鞭策。李源潮未來如何，就看他是否能咬牙跨過這道道坎。



太湖藍藻大面積爆發引發生態災難

自 2007 年 5 月 28 日起，太湖藍藻爆發使得無錫市自來水出現臭味，導致一場影響全市的供水危機。面對突發性災害，根據中央和江蘇省指示緊急啟動公共危機應急處置預案，無錫市政府全力奮戰 72 小時，到 6 月 1 日晚“恢復正常供水的目標初步實現”。太湖出現大面積藍藻災害，水污染突破了湖泊生態危機最後的防線。由於經濟發展、人口劇增和不合理的開發利用，導致湖泊生態系統結構遭受嚴重的破壞。

李源潮不得不考慮江蘇經濟增長方式的徹底轉型，調整產業結構，恢復生態平衡。在 7 月 7 日江蘇省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會議上，

李源潮承認，太湖藍藻事件爆發後，外界已經對江蘇全面小康的經濟發展模式產生質疑。他表示，“無論經濟怎樣繁榮發達，如果不能讓老百姓飲用乾淨的水，人民群眾就不會認可我們的全面小康模式，江蘇全面小康的成果就會被顛覆。”

自太湖藍藻爆發後，無錫市自來水無法飲用，市民紛紛到各大超市搶購純淨水。發生了這次事件，無錫政府都把責任推給無權無勢的農戶；但原來，太湖水質惡化，既跟關鍵地方 GDP 的大老闆有關，也涉及地方行政體制不完善、環保政策不合理和一些地方有官員執法不力等問題；不過，無錫政府的一面之詞，自然不足以騙倒李源潮。

在這次辦公會上，李源潮強調，今後要下決心以更大力度治理太湖，並下令地方一定要“鐵腕治理”。李源潮下令，太湖和周邊地區除小化工企業要堅決實施關停並轉。這對意欲把責任都推給無辜農民，但卻不提企業責任的無錫地方來說，實在是一記當頭棒喝。

事實上，無錫一帶農民被逼把含有農藥污水排入太湖，農民固有責任，但地方上沒有足夠的生活污水處理廠才是出事主因。這次李源潮一方面下令要要實行“更嚴格的區域環保制度，提高太湖周邊地區的環保標準”，一方面也下令地方要“加快建設更多的生活污水處理廠”。

2007 年 6 月 3 日，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播出《無錫藍藻重災未除，企業排污不斷》，片中，宜興部分企業仍然在頂風作案，直接向太湖排放污水，畫面觸目驚心。此時，無錫市政府及時處理了五名相關人員。這對那些漠視污染的企業和官員，產生了一定的威懾力。同時，也向公眾表明了政府治理污染的決心。

在江蘇省十一次黨代會上，李源潮說 要再用五年時間的奮鬥，努力建設一個不含水分、人民群眾得實惠、老百姓認可的高水平的

全面小康，努力建設一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充滿活力、和諧安寧的新江蘇。這也就不難理解他在太湖藍藻風暴中表現出的堅決而強硬的態度，以及直面問題的勇氣。

“江蘇之最”與李源潮的左右逢源

2007年初，也就是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各省的評議、考核中，對李源潮主政的江蘇省評議、考核概況如下：

（一）地方黨政機關架構最混亂的六個省區之一；

（二）環境受到污染最嚴重的四個省之一；

（三）社會貧富二極化最懸殊的五個省市之一；

（四）連續多年固定資產投資失控的三個省市之一；

（五）社會黃、賭、毒狀況最泛濫的六個省之一。

這樣的考核成績，對外界一直傳言將在十七大晉陞政治局常委的李源潮來說，無疑是個“致命”打擊。在3月召開的兩會期間，李源潮本人“闢謠”稱，有關他“晉陞政治局常委”的傳言“都是瞎傳”。

當時有香港記者提問：“李書記，十七大將進行新的高層人事佈局，外界非常關注，外界對您非常看好，認為您可能晉陞政治局常委，您有信心十七大後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嗎？”

面對尖銳問題，李源潮略為思索了一下，才緩緩地答道：“你所說的外界傳言，它沒有什麼根據，正如我們剛才老書記（指原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十七大代表）所說的瞎傳，我贊成他說的，這是瞎傳。既然是瞎傳，我就不用再繼續回答了。”話音剛落，他自己也笑出聲來。

李源潮四兩撥千斤，對於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話題，他也不回避從容對答。他表示，中國正在通過多種形式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當然，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要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統籌兼顧考慮。

當天李源潮在會上時而與江蘇省長梁保華低頭交換意見，時而向記者們露出笑容，就連他離席上衛生間時，數十名記者也將衛生間門口團團圍住，生怕他會突然“消失”，正在現場的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秦剛見此情景，不得不親自出來解圍，表示會後有提問環節，記者們才作罷。

長期關注中共第五代接班梯隊部署的多維社早在十七大召開前便率先判斷說，李源潮將進入中共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可能的職務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或宣傳部部長。

多維社指出，李源潮一直是香港媒體上預測的十七大上最耀眼的新星：接班群體中最熱門的人選是所謂“團派二李”，即出身共青團中央的現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

不過，多維社在2007年9月開始作出判斷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並沒有李源潮。多維社訪問多位政界人士得出的結論是，李源潮是接班群體中備胎的備胎，屬於政治局層次。

媒體的關注和外界的傳言，在半年後就得到印證。在十七大上，左右逢源的李源潮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被外界視為是胡錦濤加強權力基楚的又一舉動。分析人士指出，李源潮的陞遷其實是得到了中共黨內三個派別的一致認可，這包括團派、上海幫以及太子黨。

有評論稱，在2003年出任江蘇省委書記後，李源潮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緊跟中央，中央說要宏觀調控他就開始搞宏觀調控，鐵本項目就停掉了。而上海就是抵制，不調控，然後陳良宇就被開除黨籍，還關進去了。

評論人士指出，再比如太湖藍藻事件沒有追究責任，就是關了幾家污染廠而已。環保人士吳立宏被判了三年多，迫害他的就是李源潮。當時沒有省委書記拍板，也不可能有新華社記者輕易地寫吳立宏是敲詐。

由於李源潮有在團中央工作的背景，外界一直視他為胡錦濤為首的團派的嫡系人物。也有海外人士稱，李源潮和團派的關係很鬆散，並不屬於嫡系。1983年李源潮進入團中央就是要衝淡胡耀邦、胡啟立的團派色彩：李源潮衹能說是團派的一個鬆散成員，他從來不是核心成員。當時是把他和宋德福作為沖淡團中央團派色彩的兩個人選進團中央書記處的。

也有分析說，李源潮和當時任團中央副書記的胡錦濤關係並不近。正由於他和團派的關係比較疏遠，才導致李源潮花了20年時間才在2003年被提拔到江蘇省委書記的位子上。李源潮之所以能夠當上江蘇省委書記以及昇任中共組織部部長，是因為他得到中共黨內三個方面的認可。首先，儘管他不屬於團派嫡系，但是為了擴大團派影響，胡錦濤仍然全力提拔；第二，李源潮也獲得上海幫的支持；第三就是高官家庭背景被太子黨接受。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不要過分看重中共組織部的作用，因為它不能獨立行使權力。組織部長直接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的領導，而且，部長、省長、副部長、副省長這些重要領導幹部的任命的決定權不在組織部，而在更高的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

李源潮主掌中組部，對他本人來說是更合適的去向。笑臉常開的李源潮，善於掌控宣傳，引導輿論；他還有未為外界所知的“一手”：整肅官場，實施人事改革。這兩年他把一度弊案叢生的江蘇，整理到基本“清靜”的局面，不簡單。

新加坡媒體評論稱，57歲的李源潮在中共十七大後從中央候補委員連跳兩級，昇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成為共青團係在中共新一屆領導層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共政治局中，除政治局常委外，中組部長執行考察、選拔高級幹部的具體工作，地位十分顯赫。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認為，李源潮出掌中組部，不僅有利於團系幹部的成長，也有利於執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要注重從基層選拔幹部的方針，減少那些“高來高去”的高幹子弟進入領導層的機會。

掌中組部，“潛規則”觸怒李源潮

在昇任中央組織部長兩週後，李源潮2007年11月1日便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論述“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增強黨的團結統一”，其中包括“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的主要原則”和“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的重要舉措”。

2008年初，李源潮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員座談會上指出，廣大中青年幹部要在科學發展上開創新局面，在為民謀利上創造新業績，在廉潔自律上達到新境界，在勤奮學習上樹立新目標，努力做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表率。

李源潮說，人這一生幾十年，能在關鍵崗位上為人民工作的機會難得、時間有限。將來的路如何走？人生的歷史怎麼寫？能否對得起百姓對我們寄予的期望，能否對得起黨和人民給我們的幹事舞台，能否對得起自己所趕上的中華民族復興時代，很值得深刻地思考。

從官方媒體發表的報道看，李源潮當中組部部長的第一年，只“露面”七八次，主要是出席會議和發表講話，並沒有提出新論，也沒有實施什麼新舉措。但到了2008年下半年，“不甘寂寞”的李

源潮慢慢“強硬”起來，到了2009年初，終於出手要拿選拔幹部的“潛規則”開刀。

“用人上不正之風具有很強的頑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必須有更強的戰鬥力。我們要堅持從嚴治黨、從嚴管理的方針，采取有力措施，集中解決選人用人上的突出問題。”與剛上任時發表的官話相比，李源潮 2008 年 8 月在幹部監督工作聯席會議上的言論，變得直截了當。

官方媒體稱，十七大以來，中央查處違規用人的力度不斷加大。河北省省長助理拉票、安徽阜陽市買官的兩個縣法院院長“帶病上崗”、山東濟寧市統戰部一個副部長跑官等問題都受到了嚴肅查處。但拉票賄選、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歪風邪氣屢禁不止，有相當一部分幹部群眾對用人不正之風很不滿意。

2009 年 5 月 19 日，李源潮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幹部監督工作會議上指出，近年來，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依然是幹部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要以最堅決的態度同用人上不正之風進行戰鬥，確保實現十七大提出的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目標。李源潮強調，要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方針，進一步深化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改革，加大從源頭上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風的力度，用制度和機制遏制“潛規則”。

這也是中央組織部首次公開承認中國官場存在著嚴重的用人“潛規則”問題。新華網的評論文章說更直接：人事腐敗是最可怕的腐敗，它是其它一切腐敗的根源所在。比如，有的領導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有的幹部為了達到陞遷的目的，千方百計地跑上級領導、跑推薦人、跑選舉人，遊說聯絡，請客送禮，以得到上級的提名，拉到足夠的推薦票、選舉票。在他們看來，“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拉

票是正常的，不拉票是不正常的，誰不拉票誰喫虧”，就是“潛規則”。祇有人事上乾乾淨淨，其他工作也才能乾乾淨淨。為了我們黨的事業健康持久發展，就必須“以最堅決的態度同用人上不正之風進行戰鬥”。

一篇題為“李源潮要讓用人『潛規則』不再靈”的博文寫道：



李源潮拿“潛規則”開刀

既然說是“潛規則”，就是放不上桌面、拿不到明處的，看不見摸不著，卻又是實實在在起著作用的“用人規則”。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不跑不送降級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用人“潛規則”的厲害之處。

實踐證明，“潛規則”靈驗的地方，選人用人上一定是烏煙瘴氣。“潛規則”失靈的地方，選人用人一定是風清氣正。其實這個道理十分淺顯易懂，試想，如果說一個地方，那些踏踏實實幹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為官，一心幹事，無心謀官的幹部，受壓制、遭排擠，得不到提拔重用。而哪些投機鑽營、又跑又送，無心幹事、一心謀官的幹部，受賞識、能重用，“芝麻開花，節節高”。用人“潛規則”能夠代替用人制度來決定幹部的陞遷，哪些想求得一官半職的幹部，祇能去主動適應“潛規則”的需要，其賣官買官、跑官要官之風一定盛行。

一些地方之所以“潛規則”很靈驗、很管用，主要原因就是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執行失之於寬、失之於軟。制度被“架空”，“潛規則”就管用。換言之，一個地方用人風氣不正，最大問題不是出在幹部身上，而是在執行用人制度和機製上出現了漏洞。

香港《明報》評論說，“潛規則”一直主導中共官場，想改變任人唯親等規則很難。評論指出，李源潮及其頂頭上司、總攬中共組織人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習近平，近期對中共官員的作風、用人問題作出了很多“道德勸說”，但在中共缺乏透明度和輿論監督的現行人事制度下，人們卻對僅靠這種口號能否實現“提高全黨和人民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和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的滿意度”深表懷疑。

李源潮說，要用制度和機制遏制“潛規則”。但中共現在並不乏各種冠冕堂皇的規章制度，但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官場“潛規則”，如領導人提拔下屬、退休領導人提名繼承人、互相安排自己的秘書、親屬（衹要不在自己直轄下，就不算任人唯親），在用人上的鄉親、同學、同事等觀念，拉幫結派，結黨營私，這一切弊端，衹要不經真正的公開自由選舉，沒有真正的輿論監督，始終難以根絕。

“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是救亡行動?

在大張旗鼓挑戰用人“潛規則”之後，李源潮又啟動“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跟挑戰“潛規則”引起廣泛爭論一樣，“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去幹什麼，是不是在搞形式主義等質疑，也接踵而來了。

2009 年 5 月 25 日，在中組部召開的全國組織系統推進“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視頻會議上，李源潮要求組織系統要更好地把握大局，瞭解基層，推進改革創新，服務科學發展，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作表率。

組織部長主動與不跑不要的幹部談心溝通，跑官要官的就會受遏制，老實人喫虧的現象就會減少。李源潮指出，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組織系統要作表率。要加強組織指導，紮實深入地推進“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

李源潮要求推進“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要講求實效，防止形式主義。要求每位同志都要嚴格自律，不給基層增加負擔，真心實意地為幹部群眾服務，進一步樹立組織部門“黨員之家、幹部之家、人才之家”的良好形象。

第二天，人民網發表評論文章，對李源潮要求“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去幹什麼，進行解讀：

要多做基層希望做的事，那就是一以貫之地打擊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向用人“潛規則”開戰。李源潮對於在選人用人上“不讓老實人喫虧”、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曾多次發表講話，這次要求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可謂是對此前系列講話精神的落實。衹有深入下去，情況才能摸得准，“潛規則”的藩籬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被擊毀，因此各級組織部長下去的任務重大。

李源潮要求下基層的組織部長要聽取黨員、幹部和群眾的意見與訴求，認真解決問題、化解矛盾，以公道正派、可親可敬的形象贏得幹部群眾的信任。組工幹部衹有走到群眾身邊才能“零距離”瞭解他們，關心他們，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要潛下心真抓實幹，不能“打官腔”、“耍花腔”。

《人民日報》6 月 1 日發表署名文章稱，“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要防止變成形式主義。文章稱，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搞好了



5月25日，中組部召開視頻會議，部署全國組織系統“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

正面作用很大，搞不好會變成形式主義。有的組織部門組織幹部利用週末下基層，不向當地打招呼，不找當地領導陪同，事先不確定走訪對象。這“三不”很受基層歡迎。各級組織部門一定要求真務實，注意群眾反映，防止形式主義，爭取基層歡迎。

網友評論稱，李源潮部長要求推進“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活動要講求實效，防止形式主義，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所指、有所憂，這是善意的提醒，是真誠的告誡，值得下基層的組織部長感悟和感思。

6月初，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撰文稱，中共目前正在展開一場基層“救亡”運動。從春天開始，胡總與他的愛將、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以至分管公安、檢察與法院的政法書記周永康主導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基層救亡政治運動”，其主旨是通過輪訓、調換與政治教育，培育一批道德與專業水準比較高、“又紅又專”的及格地方幹部；並把縣、鄉鎮、村一級的貪官、包括與黑社會狼狽為奸的黨棍清理掉。

李源潮推出“萬名組織部長下基層”運動，即中組部派大批幹將到基層調研，表面上是如李源潮所說，務求組織系統“更好地把握大局、瞭解基層，推進改革創新，服務科學發展”；實質上，中央已下了軍令狀，要求組織大員找出地方政權頻臨崩潰的原因並提出整治的良方！

同時，成千上萬的縣委書記在北京、上海、井岡山等主要黨校輪訓，中組部並擴大招聘有潛質的大學生去基層當“村官”。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更建議在有名的大專院校開設“村官專業”，對口培訓政治過硬、技能稱職的“土裏土氣村官”云云。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中共中央在上月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與紀檢幹部的大培訓。例如3080名縣級公安局長到北京訓練半年，主要學習“公安資訊化建設、執法規範化建設、和諧警民關係建設”。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從七月開始，用一年時間推展以“人民法官為人民”為主題的中級法院、基層法院院長輪訓工作。類似的“培訓工程”也已在基層紀委書記、檢察官與監獄幹部行列中進行。

林和立稱，理論上，中共承認基層隊伍頻臨潰爛邊緣，輪訓與教育幹部當然比什麼也不做要強。問題是，這類政治運動式培訓的性質與從毛澤東到江澤民時代搞的“整黨”沒有根本分別，基調還是要黨員幹部“改造世界觀”，向模範如雷鋒、焦裕祿等學習。最近國家副主席兼黨校校長習近平不是大談什麼“焦裕祿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永遠定格在歷史上”嗎？

中共不搞“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不願意接受“非我族類”的NGO甚至反對黨的監督，就永遠無法杜絕腐敗與提陞官員的競爭力。所謂“社會主義自我完善”是極度唯心、虛無的烏托邦主義。只講“黨管好黨”而不從制度入手的話，搞多少次輪訓與整黨也只可以起“補鍋”作用，解決不了深層矛盾！

王岐山

手握金融大權的"京城名嘴"

他是歷史學者出身，編纂過《民國人物傳》；也是中國股市推動者，曾為滬深股市的建立出謀劃策；他是學術思想界的失蹤者，在八十年代與"精英人物"酒逢知己；也是金融領域的"大頑主"，曾把大摩和高盛玩弄於股掌。

有人叫他"救火隊長"，總是臨危受命，收拾爛攤子；也有人稱他"拆彈專家"，總在危急時刻，被推上火線；他被視為朱鎔基的"門生"，鐵腕無情，雷厲風行；也被捧為"京城名嘴"，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用中國媒體的話說：從陝西延安一名普通下鄉知青成長為泱泱大國最高行政當局的核心決策者之一。他有眾多的特殊稱謂，每個稱謂背後都是一個長長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有近乎完美的伏筆，每個伏筆都會在不久的將來兌現。

但海外媒體的評論更直截了當：對他飛黃騰達所倚仗的背景，多年來不少人頗有議論——1986 年，年僅 38 歲的王岐山就攀上正局級高位；21 年後，他跨進了中國最高權力核心的門檻——這是所有發跡者難免的非議，雖然後來王岐山的能力得到普遍認同。

說白了，沒有岳父姚依林，王岐山不可能如此輕鬆地步入中國最高權力核心。沒有姚依林中意的接班人朱鎔基的知恩圖報，王岐山也不可能一次次被委以重任，又一次次得以晉陞。

因此，他被視為"太子黨"，也被稱成"女婿黨"。但縱觀中國政壇，無論是父與子，還是翁與婿，能夠相繼當上副總理的衹有姚依林和王岐山。

《財經》鬧分裂，王岐山為何幕後調解？

2009 年 11 月 9 日上午，《財經》主編胡舒立正式向她的老闆、聯辦總幹事王波明提交了辭呈，聯辦隨後批准了她的辭職。這是繼總經理吳傳暉 9 月底攜經營骨幹辭職後，這家中國最富盛名的雜誌的採編團隊也被證實即將出走。在媒體上沸沸揚揚了一個多月的"財經變局"看起來正在劃上句號。

有媒體引述知情人士說，在過去的一個多月中，《財經》團隊和聯辦雙方其實沒有太多的談判，都在為分手各自做準備。而整個過程中，胡舒立都對外界保持了沈默，包括 10 月 29 日網上一度爆出"內幕"，稱《財經》團隊"逼宮"，她亦選擇按兵不動。

有知情者向《南方週末》透露這樣一個細節：在 11 月 9 日的最後一次談判中，聯辦人士指責《財經》團隊蓄謀已久，並且宣佈不再談判，胡舒立隨即從口袋裏掏出了辭職信。

王波明和胡舒立站到了互不妥協的兩邊，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們被認為是合作良好的拍檔。

王波明是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經在 1980 年代末最早將證券市場引入中國，而胡舒立則在體制內媒體《工人日報》工作 10 年後，來到了 1990 年代頗具影響力的《中華工商時報》。1994 年 1 月 2 日，在該報改日報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的評論《改革沒有浪漫曲》，讓她開始在財經新聞界有了自己的影響力。1998 年，王波明找到胡舒立創辦新刊，胡舒立要求聯辦提

供充足的預算，並且在採編和經營之間築起一道牆，資方不得干預採編。王波明同意了。

2000年，《財經》10月號刊出《基金黑幕》，引發資本市場震蕩，中國十大基金公司聯合發表聲明，指責《財經》聳人聽聞、報道不實，胡舒立隨即以《批評權、知情權，還有“新基金”使命》一文回應：媒體的批評權與公眾的知情權作為公開性的保證，其重要地位必然地優於市場上某一利益集團自賦或他賦的“歷史使命”。

前《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麥健陸在那本著名的《10億消費者》中記錄了作為《財經》老闆　“王波明開始接到越來越多怒氣沖沖的電話……這樣的電話令王波明痛苦。他會有禮貌地聽完對方的話，然後解釋說他衹是擁有這本雜誌，但是不能干涉編輯的決定。”

《財經》的成功，被認為得益於堅持新聞專業主義和擁有深厚的政府關係，不過，2009年以來，它卻遭受最嚴峻的挑戰。

香港《亞洲週刊》指出，《財經》雜誌與投資方聯辦，在編輯理念及股權架構等方面失和，計劃另成立“財新傳媒”，正在展開最後談判，王岐山是幕後調解人。

那麼，身為主管財經和金融的副總理王岐山為何要在《財經》鬧分裂時進行幕後調解呢？這得從這兩位“太子黨”在八十年代後期為推動中國股市建立說起。

1988年3月，王波明和高西慶、王巍執筆，聯合李青原、劉二飛、茅桐、王大偉、盛溢，八人合作，寫成了《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王波明說，這是我們為建立中國證券市場提出的設想。

1988年7月8日，王波明應康華副總理賈虹生邀請，參加了“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會議在北京萬壽賓館

召開，後來被稱作“萬壽賓館會議”。這個座談會囊括了中國經濟界最有實權的機構，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計委、體改委、人行、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此外，更為積極的是官辦卻又資本味道十足的中創、中農信、康華等公司。

座談會由中農信總經理王岐山和中創總經理張曉彬發起。會後，王岐山作東，請大家到中農信喫飯，又是一陣熱議。極其敏銳的王岐山意識到此事意義重大，值得花大力氣推動。接下來就議到由誰來寫報告的問題。王岐山就坐在王波明旁邊，他向賈虹生建議，“別讓波明去康華了，讓他參與起草建立證券市場的設想吧。”他說的就是《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後來被稱為“白皮書”。

接下來，王波明等就日夜兼程、快馬加鞭地起草白皮書了。“白皮書”包括《籌建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設想和可行性報告》《建立國家證券管理委員會的建議》《建立證券管理法的基本設想》等，等於設計了一個關於中國證券業的整體框架。

最後，這份“白皮書”通過中創公司總經理張曉彬，轉給了國務院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後來由吳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層，趙紫陽的一位秘書也從另一個渠道做了工作。趙紫陽的批示很快就下來了，大意是，希望財經領導小組開會聽取他們彙報。當時，趙紫陽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姚依林是副組長。

1988年11月9日早上9點，在國務院第三會議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姚依林，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共同主持了彙報會。參與作彙報的是張曉彬、高西慶、王波明和周小川。

……最後，姚依林說：“我對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資本主義搞股份制是規範的，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產物。我以前多次講股份制

問題，都讓人給抹掉了。不管有什麼困難，要奮鬥，搞出來，是公有制的股份制，這樣，經濟的靈活性可以大大增加，這個問題我很贊成。”

隨後一個民間發起、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成立。九家發起股東之一又是中農信。

有關王波明與王岐山等“太子黨”如何推動中國股市的建立，本書後面有更多的介紹。我們再回到前面的話題，當王波明和《財經》與胡舒立鬧得滿城風雨之際，由當初的“聯辦發起股東之一”、現在主管金融和財經事務的副總理王岐山充當幕後調解人，再合適不過了。

然而，最後的結果卻不是王岐山這個副總理可以左右的。

“京城名嘴”又跟美國人侃了些什麼？

2009年7月27日至28日，新一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這也是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中美展開的首輪對話，中方代表團由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牽頭，美方代表團由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率領。

王岐山在開幕式上代為宣讀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書面致辭。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聯合開幕式並致辭。奧巴馬在談到加強兩國對話的重要性時說：“我想借用姚明的一句話說，無論是新成員也好，還是舊成員也好，都需要時間磨合，這一次對話，我相信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達到姚先生的標準。”

對於目前雙方存在的一些分歧，奧巴馬引用據稱是孟子的話說：“這好比人在雜草叢生的地方走路，總走，路就走出來了。不走，雜草就會重生，就不成路了。”

兩天的對話，兩國媒體都做了大量報道。然而，公眾們感興趣的不是官方的外交辭令，而是紛紛猜測：“美國人到底向中國做了什麼表態？中美之間有沒有達成什麼不公開的默契？”

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發表閉幕聲明開頭時面帶微笑地說：“我先給大家提供一個新聞，剛才奧巴馬總統會見中方代表時，送給王岐山副總理一個他親自簽名的籃球。可能被他藏起來了。”王岐山連忙說：“沒有，就在這裏。”說完便動作瀟灑地接過工作人員拋過來的籃球，全場一片笑聲。

此外，戴秉國在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晚宴上發表演講時又透露說：我可以告訴大家也算一個小秘密，王岐山副總理，是京城幾大名嘴之一。他是很有演講天才的，我這個人在這方面就弱一些了（笑聲）。

那麼，被稱為京城幾大名嘴之一的王岐山，在此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又跟美國人說了些什麼呢？

中國官方媒體稱，這次對話最精彩的情節發生在中美雙方舉行的閉幕晚宴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做了才華橫溢的脫稿演講，辛辣中包含幽默。不僅提到了“庚子賠款”，還開玩笑聲稱自己是美國財長蓋特納的叔叔。

以籃球為禮物意味何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贈送王岐山一個籃球成為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點睛之筆。對此國人有的洋洋自得，有的深感欣慰，但更多的是茫然不解。其實，注重研究中國文化的美國人，以籃球作為國禮是不可能沒有深長意味的。

7月28日晚，美方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宴請中國代表團。同嚴肅和緊湊的對話相比，經過一番精心裝飾的晚宴現場燭光點點，充滿溫情。來參加晚宴的，除雙方代表外，更多的是美中商界的重量



王岐山在華盛頓演講

級人物和許多中國的老朋友。

王岐山到場後，數位美國知名企業家上前，用力同他握手。一位企業家說，他希望多同王岐山握一會兒手能讓他的企業“財源滾滾”。這位美國家喻戶曉的億萬富翁高興得像個小孩一樣，有點可愛又顯得很真誠。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晚宴上也顯得格外輕鬆。在簡短地談了美中合作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性後，他說得更多的是對中國在應對經濟危機中表現的讚賞，以及他與北大和中國的情緣（他曾於1981年在北大學習中文），還有他的個人成長故事。

在介紹王岐山之前，蓋特納更是講出了一長串讚美之詞。他說，和王岐山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直率、思維敏銳、富有個人魅力又極富幽默感的人。蓋特納還說，和王岐山合作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善於解決紛爭的人，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經濟問題的“救火員”。

在主持人提出“讓大家領略一下這位中國副總理幽默風趣的個人魅力”後，王岐山開始了即興演講。

他的演講引得笑聲不斷。王岐山先是引用了他的大學校長一

位中國地質科學家領悟“海浪湧動原理”的經歷，指出人類在歷史潮流的問題上和大自然有著相同的特點，即“順歷史潮流者昌，或者說贏”。他指出，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也是順應了歷史潮流。這個歷史潮流是中美兩國人民的需要和選擇，也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接著，王岐山告訴大家，按中國的傳統，其實蓋特納應該管他叫“叔叔”。王岐山說，蓋特納當年曾在中國騎著自行車上學，而蓋特納的父親老彼得當年擔任福特基金會的駐華首席代表時，他曾和老彼得有過工作上的聯繫。而按中國人的傳統，一般如果家長們在工作中有聯繫，那麼孩子就應該稱對方為“叔叔”或“伯伯”。

王岐山的話引來哄堂大笑。在結束演講、準備離開講檯時，他還不忘再次幽默一下。他敲了一下自己的頭說：他忘了說了，自己是上海世博會的代言人，歡迎在座的所有人明年5月以後到上海做客。

主持人在王岐山演講後表示，感謝王岐山“具有洞察力、絕對刺激幽默且讓人感動的講話”，並且希望蓋特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會一直記住這個“蓋特納財長的叔叔”理論。他還開玩笑說，美方會對這個“叔叔理論”進行分析和研究，並且建議蓋特納能將同中國的關係保持永久。

奧巴馬誇王岐山“投籃”很棒

2009年9月22日下午，白宮網站發佈了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雙方會面時的開場致辭。

奧巴馬首先對胡錦濤主席訪問紐約表示歡迎，他說，他很遺憾沒能在八國峰會在意大利拉奎拉召開期間與胡錦濤會面，但是代表

胡錦濤主席出席會議的國務委員戴秉國“也非常出色”。

奥巴馬說，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他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的會面也很成功。兩個星期前，他和副總統拜登還在白宮與吴邦國委員長進行了會面。

7 月下旬，奥巴馬在會見出席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一行時，還向王岐山贈送了籃球。在歡迎辭中，奥巴馬也特別提到了這一點，“我應該提一下的是，王岐山副總理向我展示了他的跳躍投籃動作，非常出色。『投籃』這個詞在中文裏怎麼說？ ”

胡錦濤主席在致辭時表示，他很高興看到中美關係現在整體健全發展的勢頭，雙方在倫敦峰會上達成的協議已經在許多領域得以實施，雙方正在共同努力建立 21 世紀的積極、合作、廣泛的雙邊關係。

胡錦濤表示，中方願與美方一道，妥善處理兩國關係中存在的一些敏感問題，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針對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奥巴馬贈王岐山籃球一事，媒體和評論曾有過解讀，認為奥巴馬的舉行包含著五大不言之意。

一、以己所愛，取悦他人。

美國是泱泱大國，說其不重禮儀確實冤枉，然而此次一改“一哥”姿態，如此禮遇中國，也尚不多見。但眾所周知奥巴馬酷愛籃球，而作為總統送禮當然要送自己喜歡的東西，所謂“己所欲之，亦施於人”，衹有送自己喜歡的東西，才能表達對客人的喜愛和尊重。正因此理，這一插曲不僅博得了中國人的歡心，而且也把這次會談的友好氛圍推向了高潮。當籃球抛向王岐山副總理的時候，會



奥巴馬送王岐山籃球

場掌聲雷動，仿佛是“籃球一抛泯恩仇”。

二、象徵現實，不說自明。

國禮舉足輕重，不僅要取悦於人，更要意味深長，或明喻，或暗示，總有不言之意。想當初，基辛格曾贈中國一克月壤以炫耀其科技實力強大，中國則贈予美國一幅《嫦娥奔月》，予以藐視而又不失幽默。依此推論，此次的“籃球”國禮讓我們聯想到了中美兩國籃球隊的實力對比。一個是屢獲世界冠軍的籃壇霸主，一個是潛力深厚的籃壇新鋭力量。相比之下美國大腕雲集，而中國卻衹有姚明一位。雖說世界排名進步很快，但與美國隊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由此想來，奥巴馬總統班底可謂是外交有方，手段高明。

三、球場夥伴，競爭輸贏。

把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內容以及中美兩國的戰略與經濟合作，比成中美籃球隊的陣容是恰如其分的。此次雙方會談的代表幾乎涵蓋了政府的各個部門，包括經濟、能源、教育、文化、衛生等，就戰略經濟對話的平台來說其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議題。從一定意義上說，無論是會談還是今後的合作

領域，都像是一場全面展開的激烈籃球賽。人們常把競賽場、商場說成是戰場，看來戰爭不祗是真刀真槍的拚殺，合作背景之下、夥伴友誼之中也有。進行這樣的競賽，不是戰爭勝似戰爭。

四、特殊競賽，誰是裁判。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我們千萬不要忘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談也好，實際操作也好，這場比賽並沒有裁判。誰來當裁判？自然不會由別人。肯定是中美兩家出規則、出裁判。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規則對等定、裁判對等出，絕對不應當由一方主導。從一定意義上說，裁判的選擇和裁判權的確定，比競賽更重要。

五、以其之道，還其之禮。

禮尚往來是中國的傳統。中國的代表團去了美國，受到了禮遇，不管人家有什麼明示暗喻，但總體來說都是以禮相待的。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因此，在奧巴馬秋天訪問中國之際，我們也不妨學學美國人，送給他一套乒乓球拍。一來，重溫“乒乓外交”美好往事；二來，以球為禮對等合適；三來，國有機遇各有時運。

看看，奧巴馬送給王岐山一個籃球，中國人卻能舉一反三，作出如此之多的解讀，這些恐怕是王岐山在接到這個籃球，並象徵性地作出投籃動作時，所沒有考慮到的，否則這位京城名嘴肯定不會把這個解讀權讓給輿論和媒體。

父親是高工，兒子就讀“紅色學校”

中國官方公佈的王岐山簡歷 都是從 1969 年中學畢業赴陝西省延安縣馮莊公社當知青開始的，很少提及他的父母和他的青少時代。網上有關的相關資料也不多，不過，和王岐山從小在一個機關大院里長大的老驥，曾發表過一篇名叫《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經歷》文章，披露了一些王岐山早年經歷。

1948 年 7 月，王岐山在山東青島出生。據老驥介紹，王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 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築。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 1933 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

老驥後來聽王岐山說，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願給日本人幹，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游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 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台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著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於是留了下來。沒想到 1950 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後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 1956 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老驥說，王岐山的父親，當年並未給他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說話，倒是他母親給他留下很深印象，很久之後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文革”之後，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說起那段抄家往事，王

父說，“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王岐山曾對老驥說，他父親的不愛說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他父親卻因為“說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鬥，就是打掃單位衛生。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老驥說，記得1980年代初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他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著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

王岐山的母親——崔大媽，曾是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據老驥講，他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他母親和他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他家，拉著他母親的手坐在床邊，好言寬慰。

老驥在文章寫道：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後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視母親，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

在青島出生的王岐山，到了八歲時，也就是1956年，隨同父母一起到北京，因為當時的建設部指名道姓，要把當高級工程師的王岐山的父親調入北京。老驥回憶說，他家是1957年從上海調到北京的，跟王岐山家住在一個機關大院。

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老驥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則是青島口音。對於讀小學的那些往事，老驥基本都忘卻了，王岐山倒是好記性，他不僅記得老驥是上海口音，而且回憶說，剛剛轉學到北京的

時候，班上還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學叫“蓋學良”，也有山東口音，因為班上有人笑話他們倆，他們還和那些人打了一架。

老驥說，小時候，他和王岐山關係不錯，中學時代我們不在同一所中學，沒有很多來往，但“文革”閑得無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打籃球。



北京35中“遵義樓”——原圖書館和宿舍

其實，王岐山當時所上的中學就是北京第35中學，也是一所地地道道的“紅色中學”。

有關北京35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官方媒體稱，李大釗在和陳獨秀、毛澤東等人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同時，還在北京創辦了一所中學——志成學校。但該校簡介中寫道：建校董事李大釗、鄧萃英等提出“改變民族落後，發展教育事業，培養棟梁之才，有志者事競成”的辦學宗旨。

這所學校就是北京35中的前身，後來被編號命名為北京第35

中學，延續至今。

2003年9月19日，是北京35中80年校慶。當天，新華社報道說：在中國，衡量一所學校教育質量優劣的標準，一是培育出了多少名人，二是現實中的高考陞學率。北京35中學被公認是共產黨人自己的一座“紅色學校”。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現任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都是這個學校的畢業生。

李錫銘給母校寫的祝詞是“培德毓才，眾志成城”，落款是“蒼顏白髮老學生”。著名教育家陶西平給母校寫的話是：“無私者業必就，有志者事竟成。”宋平喜歡戴著印有“北京35中”字樣的旅遊帽，在中南海里散步。他有時會把母校現任的校長請去，談談學校當年的往事，並為校址問題為母校出主意“不要忘了要他們幫助建400米跑道”。

那麼，王岐山在這所“紅色學校”時表現如何，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何“作為”呢？現在已很難從官方和校方查到相關的文字資料，但老驥《南方週末》發表的文章卻提供了一些線索，我們可以從中對“文革”期間的王岐山有些瞭解。

老驥說，下鄉插隊之前，他曾隱約聽說，王岐山在北京35中（北京西城區重點中學）讀書期間，曾犯過“小錯誤”，受過“小批判”，很多年後，就向他求證，他犯的是什麼“小錯誤”，王岐山笑著說：“啊喲，那可不是小錯誤、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鬥呢！”

王岐山解釋說，“文革”之前，高中年級的優秀學生，常常會奉命擔任初中對應班級的“輔導員”，王岐山讀高一的時候就擔任了初一年級的輔導員。那個班上有個同學頗傲氣，一次開會，他堅持說自己的世界觀百分之百沒問題。作為輔導員的王岐山於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謙虛點。

王岐山說，“那時候，高中政治課上正好在講艾思奇的哲學觀點，課餘時間，我又比較喜歡看書，就把艾思奇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找來看了，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說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於是我在和這個同學談話時，講到這麼一個觀點：如果雷鋒還活著，他也不能說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第一，從哲學的高度看，『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第二，一個人如果這樣說自己，未免太過驕傲……”

那個初一的同學當時表示同意王岐山的這番話，但後來，他把王岐山的這些“大實話”——特別是用雷鋒作比喻的說法給傳了出去，同學們傳來傳去，傳得多了，就走了樣，等到“文革”來臨，就有人把王岐山的這些話給“捅”了出來，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會上，同學們批判了“惡毒攻擊雷鋒”的王岐山。

下鄉插隊之前，解放軍奉命進駐學校，王岐山支持恢復學校秩序，軍代表當時就給王岐山平了反。這時候，那些曾經批判過王岐山的同學有點擔心，王岐山對他們說，運動來了，誰都可能說錯話，辦錯事——於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後來對老驥說，“很可惜，插隊之前，他們把批鬥我的照片、錄音找來，都給銷毀了。要是留到現在，其實倒挺有點紀念意義呢。現在校慶時，我和這些同學再次見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談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老驥說，下鄉插隊，他去了內蒙古，王岐山去了陝西，他們沒有聯繫。

延安插隊兩年，與姚明珊相愛改變命運

1969年初，畢業於北京35中的王岐山，隨兩萬多北京知青來到陝西，在延安馮莊公社插隊落戶。與習近平、李克強等當過知青而且留下不少文字資料的第五代領導人相比，王岐山在延安插隊落戶的這段經歷，早已無跡可查。

不過，在2009年2月22日舉行的“北京知青赴延安縣馮莊公社四十週年聯誼會”上，100多名北京知青回憶了在延安馮莊插隊的經歷。

當時，在馮莊公社插隊的北京知青分別來自北京35中和北京女10中，而且當天參加聯誼會的知青都來自這兩所學校，其中包括王岐山在北京35中的同學。

延安市寶塔區區委及區政府及馮莊公社派來了專門的代表，另外特地邀請到了當時的兩名北京幹部：姚守堯與劉秋發。

楊樹棟作為寶塔區區委代表向馮莊的知青表示了衷心的慰問，客觀的評價了知青到延安後，為延安改變落面貌，代去了新思想、新文化，促進了城鄉交流，並在艱苦的環境中勇挑重擔，不少的知青擔當公社或隊裏的幹部，還有的擔當了老師，赤腳醫生等，為當地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後來，丹柯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說，這次聯誼活動，內容豐富，很有意義。雖然是知青中極平凡的普通百姓，但作為一名知青不後悔，正如在飯桌上大家講到的：不去不知道，不知道老百姓真正有多苦！儘管大家都動搖過，甚至滴落過眼淚，但我們經過了這一切，走過來了。對人來說這就是一種收穫，一種鍛煉。

丹柯還寫道：作為一名知青，尤其馮莊的知青大家的心中也會有著自豪的一面，在我們之中，在這種鍛煉下也必然煉就了一些人，由知青成為有作為的人，如：王岐山、李曉陽、任志強、曾鋼、杜建英……



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隊落戶

2006年10月，有一篇《留守陝北的北京知青》文章介紹了數位已在陝北扎根的北京知青，其中包括高玉珍，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回到北京。文章說，30年前，落戶陝西延安的2.6萬名北京知識青年開始返城，來自北京市朝陽區北子灣的高玉珍期盼著自己有一天也能回到家鄉。但由於種種原因，她的這一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高玉珍的願望最終隨著肝癌晚期的到來而煙消雲散。2006年9月19日，58歲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隊的延安市黃陵縣店頭鎮長牆村的家中與世長辭。她的離去，使至今還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數變為320人。

文章介紹說，在留守的知青裏面，唯有姜作濤一口純正的陝北話，“你到南橋山上，一問北京學生住哪裏，大家都知道。”北京學生，是當地人對北京知青的稱呼，這一稱呼一直延續了幾十年，另一稱呼是北京娃。

說到過去的歲月，姜作濤顯得十分激動。他曾和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一塊兒插過隊。說到王岐山，姜作濤最大的感慨是“人和人不能比”。

姜作濤至今保留著插隊時的一隻木箱子，說曾有外國記者2000塊錢買，他不願意賣。木箱子上紅底黃字的毛主席語錄依然十分清

晰，“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麼，為什麼曾經跟王岐山在一塊兒插過隊的北京知青姜作濤後來發出“人和人不能比”的感慨呢？

21 歲的王岐山到陝西延安插隊當農民時，姚明珊也是響應號召下鄉的北京知青。兩人由此譜寫的愛情故事未見披露，不過，有分析指出，正是與姚明珊相愛，王岐山才改變了自己命運。

從 1969 年初到延安插隊，到 1971 年被抽調到陝西省博物館，王岐山只當了兩年的知青。而這兩年，他與姚依林的女兒姚明珊相愛了，但這段戀情故事卻鮮為人知。有分析人士說，王岐山當初能離開農村被調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衹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在知青中表現突出；二是，他沾了姚家的光。

如果說，王岐山在延安插隊時表現突出的話，那麼就應該有相關的文字記載，就像習近平和李克強那樣，都因插隊時出類拔萃的表現而受到好評。不過，有關王岐山當知青的文字資料卻少得可憐。

王岐山沾了姚家的光，可能是北京知青姜作濤後來感慨“人和人不能比”的原因。那麼，王岐山是否真的沾了姚明珊家的光，從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呢？

對王岐山飛黃騰達所倚仗的背景，多年來不少人頗有議論——1986 年，年僅 38 歲的王岐山就攀上正局級高位；21 年後，他跨過了進入中國最高權力核心的門檻。這是所有發跡者難免的非議，雖然後來王岐山的能力得到普遍認同。

王岐山到延安插隊兩年後，1971 年就到陝西省博物館工作，這在當時的知青中，可以說是最好的，最令人羨慕的差事。1973 年，他又以工農兵學員身分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1976 年畢業後，他卻很快放棄自己的專業——民國史，轉而投入當代宏觀經濟學的研究；1982 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借調走了王岐山，從



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前排右五）回安徽老家祭祖，當地多名官員作陪

此他步上從政之路。

多維社特約記者楊韻撰寫的“王岐山：中國『拆彈』專家”文章中指出，天上接連掉下“餡餅”來，這與王岐山的妻子、北京下鄉知青姚明珊——更準確地說，與姚明珊的父親，不能說沒有關係。

姚明珊的父親是姚依林，1935 年就加入中共，參與領導“一二九”運動。“文革”前他先後在國務院貿易部、商業部、財貿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財貿政治部當領導，“文革”中遭受迫害，但是 1973 年，他被毛澤東和周恩來重新起用，擔任對外貿易部第一副部長——正是同一年，王岐山進大學。

1977 年 3 月，姚依林任國務院財貿領導小組組長。1978 年 8 月任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任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1980 年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岐山於這一時期從歷史轉向當代經濟研究。

1982 年十二大，姚依林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幾年眼看

著青雲直上，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王岐山借調到黨中央政策研究機構。

海內外不少報道將王岐山歸入“太子黨”之列，但他本人卻希望淡化對他靠“老泰山”發跡的印象，夫婦二人極少出雙入對，連年前太太一家人回老家安徽池州省親，向姚依林銅像獻花，王岐山都刻意迴避，沒有同行。坊間有傳聞，王、姚已經離婚。不過傳聞顯然有誤：王岐山的恩師、西北大學韓偉教授，妻子 2006 年病故時，王岐山和夫人姚明珊聯名祭悼師母。

插過隊的經歷，使他在當政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察底層民眾心態。2007 年 5 月，在與北京市政協委員座談時，他批評：“有些人恨不得在自己臉上都刻一『闊』字。”“『至尊』、『豪宅』、『奢侈』、『頂級享受』等廣告字眼嚴重影響首都的和諧氛圍。”

在學術界有不少“社會精英”朋友

西北大學畢業之後，1979 年底王岐山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歷史研究所民國史室。當時民國史室分為三個小組，分別編纂《民國人物傳》、《中華民國大事記》和《中華民國史》，王岐山被分到編纂《民國人物傳》組。

王岐山當初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熱情、肯幹、非常外向的年輕人”。王岐山有了在北京的第一個辦公室，一間立著兩排巨大書架的狹長房間。

王岐山獲得了第一個任務，幫助湖北作者賀覺非修訂歷史著作《辛亥武昌起義人物傳》。但是王岐山太年輕，讓賀覺非開始還不太放心。但是經過努力，最後讓賀覺非信服了。賀覺非覺得很滿意，認為王岐山的文字水平和對史料的掌握能力比同齡人要高出許多。

這本書的修訂，是王岐山在近代史研究所交的第一份“答卷”。

為了完成這本書的修訂，近代史研究所專門從北京市委黨校借了兩間房子。賀覺非和王岐山一老一少住了進去。忙活了近半年，將書稿最終敲定。王岐山並沒有在這本歷史著作上署名。

完成《辛亥武昌起義人物傳》後，王岐山又投入《民國人物傳》的編纂工作，他和兩三個人一起，負責東北、西北地區近 300 名民國人物傳記的組稿和編纂工作。王岐山擔綱一部分人物傳的寫作，並在東北等地約學者寫稿。

學者陳永苗指出，王岐山曾被公認為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歷史學者。如果這麼發展下去，他肯定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研究員。然而就在此時，王岐山開始關注現實的國計民生、開始關注金融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改革發展的步子到底能走多快？要走得快，就和資金有關，就和預算有關。王岐山被這樣的問題深刻“擊中”，所以對這個問題專門進行了研究，並寫出了兩篇關於經濟問題的有著獨到見解的論文。

王岐山有三五個人關係非常不錯，非常熱衷談論經濟問題，經常在一起爭論，寫文章。這些經濟方面的論文後來被一些高級領導看到，並且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

王岐山轉型的跡象開始明顯，他之所以能夠迅速展示經濟方面的才華，和扎實的歷史學研究基礎有一定關係。這樣的經濟問題，與政治糾纏在一起，是政治經濟學的。王岐山的歷史學研究基礎，可以讓他有“前車可鑒”，因此可以眼光獨到。

在民國史室兩年多後，他做出了一個抉擇，帶著歷史學研究的磨煉，告別書齋。文章稱，如果王岐山繼續作歷史學者下去，那後來，是不是如同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一樣，作為一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或者思想家出現？但是選擇作一名高官，就成了一個思想

學術界的失蹤者。

從政前的王岐山，恐怕更多是為知識界所知悉念叨——尤其是他八十年代曾經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

《走向未來》叢書於1984年起推出，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推出了70多種。《走向未來叢書》是當時知識分子的集體記憶。翻開《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名單，可以用“豪華陣容”來形容，王岐山也是其中之一。而在八十年代就開始活躍的那批社會精英中，在中國大陸至今還非常活躍在最前線的，政界是王岐山，學界就是秦曉鷹。

《走向未來》主編為金觀濤，副主編是陳越光、唐若昕；由包遵信、嚴濟慈、杜潤生、張黎群、陳一諮、陳翰伯、鍾沛璋、侯外廬、錢三強擔任顧問。

我們再來看看叢書編委名單（按姓氏筆畫為序）：丁學良、王小強、王岐山、王軍銜、王曉魯、王焱、尹藍天、樂秀成、朱嘉明、朱熹豪、劉東 、劉青蜂、嚴家其、何維凌、張鋼、阮芳賦、陳子伶、陳越光、易小冶、金觀濤、秦曉鷹、賈新民、翁永羲、唐若昕、陶德榮、黃江南、董秀玉、樊洪業、戴士和。

仔細一看，就會發現這份名單實在是不一般。這裏面既有後來當上副總理的王岐山，也有眼下仍在國外流亡的嚴家其，還有“六四”後遭到通緝的陳一諮，更有被譽為“中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啟蒙者”的著名異議人士包遵信。

王岐山正是同這些當時的那批“精英人物”在八十年代聚在一起，寫書編書出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朋友，後來有網友評論稱，當時這些社會精英聚在一起，也是酒逢知己千杯不醉，熱鬧的屋子裏到處都是夢想搧動翅膀的撲棱聲。

這套叢書從1984年一直編到1988年，然而，一年後的“六四”

事件改變了每一個人的命運。由於每個人的自我選擇與被選擇，他們的道路開始伸向四面八方。有人選擇或者被迫流亡他鄉，如嚴家其。而丁學良由於早期就公費赴美留學，“六四”發生後，自然了無歸鄉之意，現居住在香港。而王岐山最終選擇了體制，一路官運暢通。

《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在他的文章《1980年代是一個幸運時代》提到，《走向未來》叢書這套叢書的第一筆錢，來自王岐山，他支持了5000元。



《走向未來》叢書

作為一個知名的“學者型官員”，從政的履歷為大家熟悉。這是王岐山的明線，還有一條沒有那麼清晰，不為人太熟知的暗線。那就是作為讀書人，或作為知識分子的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是“學者”，可是對其學者生涯並不太熟悉，儘管從政而且地位顯赫，王岐山並沒有抹掉這條暗線。

“王岐山本身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學者型官員。我認為，他的象徵意義也非常重要，”美國伊利諾斯州西北大學中國政治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說。

“岐山屬於『老三屆』，是一個樂觀的人，很真誠。他個性鮮明，同時又有著比較全面的領導能力。”王岐山的老部下，著名經濟學家曹和平說。曹和平把王岐山的性格，歸功於『老三屆』的經歷。

喫苦的經歷反而增強了『老三屆』的意志力。他們珍惜這種“天賜的機會”，極其刻苦地吸收新知識。

上海大學著名教授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這樣描述了王岐山他們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重點中學的高中生，上山下鄉，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一群中學生在下班以後，過著一種既貧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麼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

那些“六八年人”——業餘思想家，他們以熱血書寫的思想而不是在紙面上羅列的講義，給他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課程。老三屆不管是高官，還是知識分子，還是下崗工人，都分享了共同的成長經歷、歷史命運、苦難和希望。

“京城四君子”與“莫幹山會議”

與王岐山在一個大院長大的老驥，曾在2004年與當時還擔任北京市長的王岐山有過一次長談，由於老驥當時答應不寫專訪，這篇文章四年後才在《南方週末》發表。儘管時隔四年，但王岐山的這次談話還是在網上引起轟動，甚至引起一陣人肉搜索。

王岐山當時跟老驥說：“你知道的，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麼你祇能盡力去做。從1980年代開始，我調來調去，工作經歷確實很『雜』，但是，從事的工作門類越多，參加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學習。

譬如社會上流傳的『京城四君子』，哪個人不聰明？哪個人沒能力？他們都是極聰明、極有水平的人……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祇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曾寫過多篇人物專訪的自由撰稿人柳紅在2009年9月發表的《組合的力量》一文，再次提到京城“四君子”：1980年，翁永曦（1948生）、王岐山（1948生）、黃江南（1949生）、朱嘉明（1950生）聯名寫文章，得“四君子”之稱，開青年組合先河。之後，青年經濟學家三五成群形成了若干組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作用和影響。其中，1984年9月莫干山會議之後，以華生（1953生）、何家成（1956生）為首的組合，連發創舉，持續時間最長。

在喻建歡和湯鐸鐸主編的《三十年三十人之指點江山》一書中，以訪談的形式採訪了八十年代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經濟學專業的十五名畢業生。他們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陸續考取研究生院的，如今都是經濟方面的領軍人物，或為學者、或為官員，或為企業家。他們親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歷程，其中有些人還深入到決策層內部，為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出謀獻策，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書中第一篇就是“四君子”之一“黃江南：歷史成就未來”。黃江南在專訪中重點談了“四君子對話中南海，親歷改革第一槍”

這段歷史：

當時研究生院還寄居在北京師範大學，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強、王小魯和我，還有兩個女生李銀河、林春，一共十來個志同道合的關心國家大事的年輕人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各種學術問題——主要是經濟和社會問題。

這些討論原本是在一個比較小的圈子裏進行的，後來我認識了翁永曦，他希望將他的一幫朋友也帶到這個圈子裏來，於是約定了一個時間，在《農民日報》開了一個“青年經濟問題討論會”，沒有請帖，沒有固定的參加者，衹是大家相約在星期天聚會。

我們這個討論會其實就像一個沙龍。第二次聚會也是一個星期天。我們沒有跟學校打招呼，找個藉口借用了一個臨建板房教室。這一次的與會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來，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很多人雖然不認識，但憑藉著年輕人特有的精神頭兒，所謂“英雄不問出處，衹較武功嘛”（笑），會議又很成功。

第三次討論會的時候，研究生院的教室已經無法容納那麼多人了，於是有人自告奮勇，借了北京市委黨校的禮堂，當時會議開始的時候，禮堂都擠滿了，連走廊上都是人。與會者大約千人左右，至此討論會名聲遠揚。但我們也怕事情搞得太大控制不了，弄個非法集會什麼的，因而就此罷手。

在談到如何形成當初的“改革四君子”，又是如何實現跟中央領導的第一次“老青對話”時，黃江南認為，這些與王岐山的加入密不可分：

……那是在1979年，當時全國又提出建設十個“大慶”，三十個“大化肥”，多少個“大鋼”……擺出“大幹快上、大躍進”的局面。當時我已經發現了計劃經濟必然不斷經歷平衡-結構失調-危機-再平衡的發展規律。而通過統計分析，認為當時國民經濟的結構失調已經到了崩盤的邊緣，不是應該大躍進，而是要采取危機對策的時候了。


朱嘉明近照

當時李銀河聽完我的分析後非常著急，說你的觀點非常重要，避免國民經濟危機是件大事，一定要讓領導層知道，我給你們介紹一個人叫王岐山。李銀河認識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而林春認識王岐山。

王岐山當時在社科院近現代史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他雖然是學歷史的，但異常聰明，吸收能力特別強，跟我們一談就理解了我們的想法，馬上就表示贊同，並且提議起草一個報告呈交中央。當時我和翁永曦、朱嘉明已經常常在一起討論問題，再加上王岐山，我們四個人在市委黨校後面的一間空房子裏關了幾天，寫出了報告。在報告裏，我們預測了1980年經濟將要出現的衰退，分析了衰退產生的原因，並且給出了危機對策。

當時國家計委每年的國民經濟預測增長的數據都是6%-8%，我們在報告中給出了自己的預測，認為1980年農業將出現零增長，輕工業會出現負增長，重工業負增長幅度會更大一些。通過王岐山，我們把報告交給了姚依林，姚依林看後覺得很重要，又轉給了陳雲。陳雲在報告上批示說：“一個學工業的，一個學農業的，寫了一份很好的報告……”其實翁永曦不是學農業的，衹不過在《農民日報》工作。

報告最後轉到趙紫陽那裏，他看了後，把我們找去，花了一個

下午的時間聽我們的彙報並一起討論是否會出現經濟衰退及應采取的對策。這就是所謂第一次"老青對話"，時間是1979年底。參加會議的都是些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姚依林、薛暮橋、馬洪等。

觀察者認為，"四君子"的報告文稿雖發在《紅旗》的《內參》上，但王岐山通過姚依林上報陳雲，陳雲再批給趙紫陽，才使報告真正起了作用，也使"四君子"迅速在政壇躍昇，《人民日報》頭版公佈翁永曦昇為副部級，朱嘉明、黃江南很快也昇為正廳級，可最後在官場修成正果的衹有王岐山。

王岐山的仕途起點，正是這份報告。

在第一次"老青對話"四年多後，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和張鋼四人又發起了"莫干山會議"，而後又有了第二次"老青對話"。用黃江南的話說，"通過對話，使中央堅定了這批年輕人是改革可以依靠的有生力量。這一次就要比第一次『老青對話』影響更為深遠。"

柳紅曾在《影響改革進程的莫干山會議》一文中指出，在中國改革時期的會議很多，能被記載的很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的兩個會議將被載入史冊：一個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會議；一個是1989年3月的京豐賓館會議。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開始影響中國的改革時代；後者則隨著那年初夏的歷史事件而暫時銷聲匿跡。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時候，"莫干山會議"一再被提起，這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它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這次會議不僅使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走上舞台，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上



從左至右：1984年1月下旬劉佑成、黃江南、朱嘉明在杭州

山"開會甚至成了一種榮耀。

開會的設想最初萌生於朱嘉明的頭腦，然後在杭州和劉佑成、黃江南交換意見決定下來，接著張鋼加入，討論、啟動、落實，張鋼成為會議最重要的組織者。

莫干山會議是由《經濟學週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經濟效益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聯合發起召開的，聲勢不可謂不大。

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們是由會議籌備組根據來自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1300餘篇應徵論文挑選出來的。在選拔過程中，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憑論文水平確認代表資格。這，也構成了莫干山會議的輝煌。

談著開會的風險問題，黃江南說："政府是由人和部門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還有總理的秘書李湘魯、張勁夫的秘書孔丹，以及王岐山。他們來，我們心裏踏實了很多。當時不像現在，沒幾杆大旗不行。沒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

朱嘉明也一再強調李湘魯、孔丹、王岐山上山的作用。因為他們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某些中央領導的態度。

莫干山會議結束後完成並上報了七份專題報告：

之一：《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

之二：《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

之三：《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應從國營小企業和集體企業起步》。

之四：《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的若干問題的建議》。

之五：《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之六：《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的幾個問題》。

之七：《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動》。

這些報告，以一種嶄新的文風示人，一改動輒引用馬列經典的陳詞濫調，從問題出發，提出政策建議。

如今，幾位莫干山會議的發起人都已年屆六十。至今人們還在不斷地提起莫干山會，是因為這些會議的發起組織者，聰明巧妙地組合了各種支持力量和資源，把會辦得有聲有色，從而影響了歷史。

在莫干山會議五年後，1989年初夏發生的歷史事件，使當初那些積極投身中國經濟改革大潮的青年學者銷聲匿跡了。用柳紅的話說，這些人各奔東西，有的陞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經商了，有的走遠了。

現在，當初的京城“四君子”早已天各一方：

黃江南：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擔任過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體改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河南省外經委副主任。

曾旅居美國，後任光大証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光大資料研究有限公司(香港)總經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

中國辦事機構負責人。

朱嘉明：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擔任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師，河南省體改委副主任，中信國際所副所長。1989年6月在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後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擔任過民主中國陣線理事長，退出民運後經商，一度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

翁永曦：任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時，才28歲，是中國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組織部有意識地將一批培養對象下放到一些落後縣市任正職或副職，其中就包括現任“儲君”習近平，去了河北正定，而翁永曦去的是安徽鳳陽，被鳳陽百姓稱為“翁青天”。

翁永曦後來又調任安徽省嘉山縣委副書記，在嘉山，創辦了第一個股份公司——科技開發公司，提出“搭台唱戲，幹部分流”的改革方案，全地區創辦了數百家企業。翁永曦成為滁縣地區乃至全國公認的改革開放帶頭人。



翁永曦、張木生參加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座談會

此時災難來臨，在陳雲干涉下，中共中央決定開除翁永曦的黨籍，安徽省委常委會也做出決定：根據上級領導的指示精神，經研究決定開除翁永曦的黨籍。省紀檢委負責人攜帶中央五人小組的函件和安徽省委的決定，以及翁永曦錯誤的調查報告，在滁縣地委委員會上照本宣讀。

調查報告列舉了翁的三大罪狀：

一、翁在讀高中時，參加了紅衛兵，學校裏有位教師受批鬥與他有關。

二、翁下放到某生產隊，想當隊長，有"篡黨奪權"之嫌。

三、翁寫過一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

從此翁永曦在政治上被判處了死刑。現任北京金同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從中農信踏上金融之旅，成股市推動者

當了近三年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後，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國農業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中農信"）總經理，堪稱其"金融"從業之旅開始的重要標幟。

一位和王岐山有過接觸的北京投資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回憶，中農信的創建是王岐山獨具眼光的一次作為。當時組建中農信的執照是中國首批非銀行金融執照之一。

組建中農信，和王岐山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背景有關。在草創時期，王岐山發現中國有商業銀行但沒有投資銀行，就農業領域而言衹有農業銀行，而沒有為農業發展進行資金支持的金融機構。那段時間興起的非金融機構，還有中信、光大、中創等。而從更大的背景看，當時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尚起步，中國資本市

場建設剛剛開始。

其實，王岐山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時，就開始對金融產生了興趣。時任民國史室副主任朱信泉研究員回憶說，王岐山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興趣卻在現實的國計民生。

朱信泉看過王岐山兩篇關於經濟問題論文的打印稿。身為領導的朱信泉並沒有覺得王岐山寫經濟論文是"不務正業"，因為他認為"年輕人需要更多發展機會"，而"岐山在經濟問題上有著獨到的見解"。據朱信泉回憶，"當時，他們有三五個人關係非常不錯，非常熱衷談論經濟問題，經常在一起爭論，寫文章。"

確實，當時有一批年輕人眼光長遠，聚焦在改革開放後的金融領域。當時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為主的政府部門，開始探討建立中國資本市場的可行性。

業內人士認為，1988年9月在北京萬壽賓館開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該會議是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的名義組織的，名為"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

當時到會人士中，就有時任中農信總經理的王岐山。其他人還包括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劉鴻儒、中創公司總經理張曉彬，以及時任外貿部部長助理的周小川。多年以後，《證券市場週刊》總編方泉在一個講述中國證券市場歷史的會議上，稱他們是"年輕的有先見頭腦的金融官僚"。

1988年，一份名為《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的報告提交到了中央高層，報告中附有歷次參加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建研討會的人員名單，其中就有時任中農信總經理王岐山。

隨後一個民間發起、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成立。九家發起股東之一又

是中農信。

在王安的《股爺，您上座》一書中記錄了這麼一個故事：聯辦成立不久後，王岐山曾經找聯辦的人員聊過一次，大意是：聯辦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難是難一點，但是畢竟在進行改革和開放的嘗試，我們在不斷地揣摩這件事是否能做，一有機會，得到尚方寶劍就不斷地去推動。在當前的情況下，應該是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幹就不知道這水有多深。不下水，總在上面做動作，沒用，但下水，就難免犧牲幾個人，多喝幾口水，要付出代價。

時任對外經貿大學教授、10年後轉任證監會副主席的高西慶回憶說："『六四』之後，中農信老闆王岐山來和大家聊過一次天，海闊天空大而無當，好像什麼也沒說，但過兩年再想他的話，那是個高人，看得遠。"

1989年"六四"之後，許多人很沈悶，覺得改革沒出路了。王岐山是學歷史的，慣以史為鑒，反沒那麼悲觀，那些日子到處給人打氣鼓勁。在1990年1月19日聯辦第四次理事會上，王岐山說了類似的話：

"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既然這件事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勢在必行，我們就不要太顧及眼前的氣候呀，挫折呀，或者誰同意，誰不同意，因為事情是人創造出來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也沒有誰給一個上方寶劍，說你先上井岡山將來可以坐『紅旗』，沒有，所以說學習老一代的革命精神，應該從這一點學起。上次我和大宮帶著聯辦的同志一起學習鄧小平的文件，講的就是這個。如果江澤民同志講，你們幹吧，王波明任交易所所長，那你王波明也會覺得沒多大勁，因為沒你的勞動，沒多大意思。"

"前兩天參加了銀行的盛會，我感到經過這兩年的金融體制改革，目前真是到了黎明前的黑暗，許多問題積在那裏，大的宏觀調控體系，財政、計劃、金融，彼此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一個摩擦係數最大的階段，愈是這樣就愈有可能發展，因為有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方向對頭，我們應該是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幹，你就不知道這水有多深，不下水，總在上面做動作，沒用，但下水，就難免犧牲兩個人，多喝幾口水，要付出代價。我從始至終就沒在外面，一直在裏面。我覺得改革嘛，有的喝幾口水還能救過來，有的喝幾口水就喝過去了，不要怨天尤人，這就是現實，所以我主張現在能幹甚麼就幹甚麼，祇有在幹的過程中，才能鍛煉隊伍，才能反饋信息，才能摸清實情，你們在國外幹過，在華爾街幹過，但畢竟和中國的情況還有很大的區別，在練的過程中，我覺得還是能夠積纍一些經驗。"

"我不太贊成說沒有尚方寶劍，尚方寶劍有過，從來沒說過失效了，是認真聽取的彙報，又不是在哪個同志家議論的，對不對？所以我認為現在可以搞，但是組織問題要解決。你不管怎麼樣，得有一個向上通的正式渠道。"

王岐山在這段講話中提到的大宮，是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司司長宮著銘，王波明則是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創辦人。王岐山所談的內容，也都跟已經構想了一年多的如何建立中國證券市場有關。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慶、王巍等八人提出建立中國證券市場的設想，時任中農信總經理的王岐山等人也參與推動，1990年，上海、深圳分別建立證券交易所。中國創立的資本市場突破了"摸著石頭過河"模式，遵循"拿來主義"，借鑒了國外成熟市場經驗，起點很高。

現任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SEEC）總幹事王波明在《回

憶中國股市建立過程，王岐山也是推動者》一文中，不但回顧了中國股市建立過程，還評價了王岐山所起的推動作用。

王波明出身名門，其父王炳南從1964年至1975年，一直任外交部副部長。1980年，王波明到美國留學。198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法學碩士學位，後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工作一段時間。

1989年，王波明創辦"聯辦"，後來正式更名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一直出任副總幹事至今。王波明回憶說：留美期間，我們發起組織了一個中國旅美商學會，簡稱CBA。當年旅美的中國留學生有三大會：經濟學會、科技學會，再就是CBA。CBA裏主要是攻讀商科的學生。大夥時常聚會，參政議政意識很強，都希望能為祖國做點事情。


王波明

CBA人才濟濟，包括高西慶、李青原、王巍、劉二飛等活躍分子。CBA在國內青年中也產生了影響，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張曉彬、張紹傑、周其仁等，與CBA都有聯繫。當時，北京還有一個青年經濟學會，周小川、馬凱、樓繼偉、宮著銘都是會員。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有三個要素市場：勞動力、原材料和資本。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資本奇缺，因此，建立資本市場的任務很緊迫。這些青年學者早就對建立證券交易市場躍躍欲試，探討時一拍即合。我們稱自己是"促進中國證券發展委員會"，能到場的每月小聚一次，熱情暢議建立資本市場。

研究生畢業後，王波明被紐約股票交易所錄用，在經濟研究部作分析師。1987年的10月19日，他目睹了紐約股市有史以來最大的暴跌。

1988年3月，王波明和高西慶、王巍執筆，聯合李青原、劉二飛、茅桐、王大偉、盛溢，八人合作，寫成了《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王波明說，這是我們為建立中國證券市場提出的設想。

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別說股票，連股份制企業都少見，更別提《證券法》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都還處於拓荒階段。王波明等認為，應當考慮三五年後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並未雨綢繆地建立資本市場，為從內資企業參與，到合資企業參與乃至國際企業參與這一必然過程準備條件。

1988年7月8日，王波明應康華副總理賈虹生邀請，參加了"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會議在北京萬壽賓館召開，後來被稱作"萬壽賓館會議"。這個座談會囊括了中國經濟界最有實權的機構，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計委、體改委、人行、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此外，更為積極的是官辦卻又資本味道十足的中創、中農信、康華等公司。

座談會由中農信總經理王岐山和中創總經理張曉彬發起，人行計劃司司長宮著銘（人稱"大宮"）主持。人行副行長劉鴻儒參加，他當時主持金融體制改革。

當時，紐約股票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訪華時鄧小平接見了他，還對他說，你們有個紐約股票交易所，我們中國也可以試試嘛。

等劉鴻儒來的時候，大宮拿著一份《人民日報》，讀了一下鄧小平的這段話。他說，現在有一份"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方案，

今天大家就來議一下。

這份方案是中農信的王岐山和中創的張曉彬發起，其他幾大信託投資公司參與起草的。張曉彬念了一下這個方案。客觀地說，方案是粗線條的，大致是說隨著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設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時機已經成熟。

可以說，創建中國證券市場的序幕就從萬壽賓館會議正式拉開了。

撰寫“白皮書”，走進中南海

萬壽賓館會議散會後，中農信的總經理王岐山作東，請大家到中農信喫飯，又是一陣熱議。極其敏銳的王岐山意識到此事意義重大，值得花大力氣推動。

當時，交易所建在何處，也是一個爭論的話題。一撥人建議設在北京，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發展相當滯緩，而北京是政治、經濟中心，也可以建成金融中心。建在北京是主流的意見。

接下來就議到由誰來寫報告的問題。王岐山就坐在王波明旁邊，他向賈虹生建議，“別讓波明去康華了，讓他參與起草建立證券市場的設想吧。”他說的就是《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後來被稱為“白皮書”。

編寫工作涉及經費、場所等問題，張曉彬表示，這一切都由他們來負責解決。接下來，王波明等就日夜兼程、快馬加鞭地起草白皮書了。

“白皮書”包括《籌建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設想和可行性報告》《建立國家證券管理委員會的建議》《建立證券管理法的基本設想》等，等於設計了一個關於中國證券業的整體框架。

張曉彬專門派許小勝為大家提供交通、資料、經費等方面的服務，把大家照顧得很好。同時，大家繼續遊說高層，闡述建立證券市場的必要性。後來，周小川也加入到他們的工作中來。

編寫這份“白皮書”，共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王波明參與了編寫工作，並負責從技術操作層面作出論證。王波明說，我們還列舉了建立證券市場應具備的其他硬件條件。他還在家裏畫了一張證券交易體系、程序的說明圖。

這份“白皮書”通過中創公司總經理張曉彬，轉給了國務院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後來由吳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層，趙紫陽的一位秘書也從另一個渠道做了工作。趙紫陽的批示很快就下來了，大意是，希望財經領導小組開會聽取他們彙報。當時，趙紫陽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姚依林是副組長。

1988年11月9日早上9點，在國務院第三會議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姚依林，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共同主持了彙報會。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周建南，國家經委主任呂東，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長金建棟等30多人。

參與作彙報的是張曉彬、高西慶、王波明和周小川。會議一直開到中午12點10分。其間，各位領導分別就股票上市向他們提出種種問題。

張勁夫開頭說：“總書記讓依林同志和我聽取有關證券交易所的研討彙報，看看條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議一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麼條件？應要國家管理機構審批，管理要嚴格。”

周建南詢問中小企業股票上市情況。王波明就進一步介紹了美

國中小企業的股票上市情況。

張勁夫又問："你們有沒有研究過資本主義有哪些可以為我們所用？我國理論界有人提出社會主義不能搞期貨交易，祇能搞現貨。"周小川回答說："期貨有穩定的作用，期貨運用好可以促進市場。"項懷誠也說："期貨可以分擔風險，有利於穩定。"

呂東問："公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與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股票上市有何區別？"高西慶用以色列國營企業上市的法律規定與具體做法作瞭解答。

姚依林問："還有一個問題，即股份制與股票市場的關係，我贊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實行股份制的企業與現有企業的關係，這裏有什麼問題需要探討？企業不透明的話，股份制實現不了，需要評估才能上市。"對此，張曉彬作了回答。

周小川提出："市場管理與組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要分開。對於管理，人民銀行本身出面不合適。"

高尚全說："年輕人花了大量時間進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證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在公有制情況下，怎樣搞交易所？我們基礎工作差，市場發育差，競爭不充分，價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強基礎工作。搞交易所可能產生問題，如投機、市場波動等，總之，到底會產生什麼問題，我們心裏沒底。要積極籌備，根據條件逐步發展。國家證券交易委員會領導小組，要不要成立？是由體改委牽頭還是由人民銀行牽頭？"

張勁夫說："我們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證券市場的積極分子（姚依林此時插話說：我也是積極分子。）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麼個公有法，現在全民不如大集體，要改革財產所有權的問題，用什麼方式解決，股份制本身是核心問題，要探討，我報名作一個志願兵。體改委為主，我參與，要趕快搞出來。"姚依林緊接著說："要緊鑼密鼓地搞。"

最後，姚依林說："我對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資本主義搞股份制是規範的，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產物。我以前多次講股份制問題，都讓人給抹掉了。不管有什麼困難，要奮鬥，搞出來，是公有制的股份制，這樣，經濟的靈活性可以大大增加，這個問題我很贊成。"他表示，此事現在看來不成熟，但看來又是不得不幹。

會議氣氛是很活躍的。大家暢所欲言。王波明記得，就其牽頭部門一事，金建棟希望由人行牽頭。姚依林打斷他說，人行負責的事太多了，還是由體改委志文同志牽頭。金建棟仍有異議，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斷。這時，項懷誠發言說，非常同意由體改委牽頭，並認為這樣較公正。這樣，姚依林拍板，有關證券市場的研究和籌劃工作歸口到體改委。

姚依林還采納了張勁夫的建議：先由基層自發研究，然後變為國家有組織地研究和籌劃。同時，這在後來被稱為"民間推動，政府支持"。

王波明撰文指出，這對我們來說，相當於拿到了尚方寶劍。走出會場，我們的心情激動得不得了，真沒想到，這樣重大、複雜的事，就這樣確定了！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我們在留學時的設想得以迅速進入實施階段。大家找了個餐館，高高興興，慶祝了一番。

因為股票交易所這詞太敏感，中央要求王波明等少說多做，低調籌備。這就需要一個機構來具體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創的張曉彬和中農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飯店召集了一些大信託投資公司、產業公司的負責人開會，討論中國證券市場的籌備工作。會議最後確定，與會的九家公司，每家公

司各出 50 萬元人民幣，組建一個民間機構，來推動證券市場的建立。這家機構就是前面提到的"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後來改名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

本來，王波明他們是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設在北京，跟中央也是這麼彙報的。因為股票交易所最好設在金融中心。當時中國沒有資本市場，祇有銀行。銀行總部都在北京。後來，由於很多原因，選擇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當時上海市市長朱鎔基籌劃開發浦東，開發預算是幾千億，對於解放以來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這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聯辦"的宮著銘向朱鎔基市長寫信建議說：要想開發浦東，就要借全國的錢。當時，銀行資金流動限得很死，要搞個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簡單樸實的語言向朱鎔基介紹了資本市場，引起了朱鎔基的重視，並表示同意。問題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兒找懂行的人呢？"聯辦"理事長經叔平告訴朱鎔基："我們這兒有撥年輕人，就是搞證券交易所的。"朱鎔基很爽快地說，"好啊，那把他們請來，我給他們解決戶口問題。"

1990 年初，"聯辦"就投入到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法律、會計、投資人、交易場所的選擇。好在即使在當時的背景下，也沒有人給這個工程設限。

上海市政府決定，籌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組成立，他們分別是上海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長龔浩成、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聖。而後三人小組給朱市長的報告中，建議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備小組，上海人行的王定甫任組長，聯辦的章知方為副組長，王波明還清楚地記得，在報告中，三人小組建議，由上海市牽頭，請"聯辦"的同志協助，朱市長還專門把協助兩字劃掉，改成合作。

1990 年年底，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北京"聯辦"申請的 STAQ 相繼投入運營。至此，以"兩所一網"為標幟，中國證券市場就此建立起來。

王波明撰文指出，現在回過頭去看，當時對證券市場的制度安排大方向是對的。另外，對於中國改革而言，資本市場的創立突破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它遵循"拿來主義"，借鑒了國外成熟市場的經驗，起點很高。"白皮書"關於資本市場結構的設想，現在基本上都實現了。

後來，有媒體指出，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後，一直游離於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職"聯辦"副總幹事，以及"聯辦"旗下一攬子財經媒體的社長或總編，包括《財經》、《證券市場週刊》、和訊網等。

曾被外界視為朱鎔基的得意"門生"

王岐山憑藉其在銀行金融領域的能力和經驗脫穎而出，贏得了 1993 年 3 月接替姚依林出任副總理的朱鎔基的賞識。這年 6 月，時年 45 歲的王岐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 當時朱鎔基開始兼任央行行長（1993 年 6 月—1995 年 6 月）。因此，王被外界視為朱鎔基的得意"門生"。

王岐山昇任央行副行長期間，正是朱鎔基主導中國金融改革，他被視為是朱鎔基的得力助手，加上他行事作風似朱鎔基，也被譽為"翻版朱鎔基"。

這一年，一場嚴重的通貨膨脹突然來襲。為配合中央應對此輪通貨膨脹危機，從 1993 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采取一系列貨幣緊

縮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還在全國範圍內清收超過限額的貸款，削減基建投資，停止用"白條"支付農民的糧款。這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當年的數據顯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借資金達332億元，增加儲蓄405億元，通貨膨脹開始得到有效遏制。

葉檀在《南方人物週刊》撰文回顧時指出，王岐山昇任央行副行長輔佐朱鎔基，正值嚴重通脹期，當時提出治理通脹的16條整頓措施，可謂中西政策合璧，主要采用美國學者麥金農等人的政策意見，動用了大量行政手段。因此，所謂"市場化"，將不排斥在特殊時刻動用行政手段。王岐山後來甚至表示不滿於"『至尊』、『豪宅』、『奢侈』、『頂級享受』等廣告字眼嚴重影響首都的和諧氛圍"，他不是一個極端的自由市場派人士，對一些利益集團保持著警惕。



王岐山

在何頻、高新所著的《朱鎔基傳》中，披露了當年朱鎔基拿下李貴鮮、自任央行行長的背景，以及朱提拔陳元和王岐山等人的內幕：1993年7月2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對外公開宣佈，幾個月前剛剛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繼任國務委員並繼續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李貴鮮，保留國務委員職務，但免去兼任的人行行長職務，人行行長一職由副總理朱鎔基親自兼任。

李貴鮮下台一事傳出後，海外評論界普遍叫好。同時，大陸上的一大批贊成和擁護中共改革派的知識分子，也都為此事拍手稱快，理由是：改革勢力在國務院裏的頭號代表人物是朱鎔基，所以他在國務院系統抓到的實際權力越多越好，親任的實權職務也是越多越好。

但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則如今大陸實行的迅猛經改政策已經到了風險最大的關頭。而在此時，首先是李鵬稱病；按著又讓朱鎔基親自兼任人行行長這一國務院所有機構中最為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在這兩件突發事件的背後，到底是有利於中共改革派的因素居多還是相反？

一般評論都認為李貴鮮其人，是因為工作能力太差或犯了錯誤，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免職的。但據內幕消息說事實上李貴鮮是主動請辭的。而且，他主動請辭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朱鎔基賭口氣，樂得一邊圖個清閑、一邊等著看朱鎔基的笑話。

在一次分析經濟形勢的國務院工作會議上，會議主持人朱鎔基當著眾人的面羞辱李貴鮮說"你懂得股票市場是怎麼回事嗎？身為主管金融、貨幣的國務院領導人，像你這樣自甘當"外行"怎麼行？"

事後，朱鎔基雖然專程登門向李貴鮮致歉，但李貴鮮不可能咽下這口氣。他先後在江澤民、李鵬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裏逐一告狀訴苦。為此，連除了軍隊工作從來不過問其他的劉華清，都曾經勸告朱鎔基"要善於團結大多數幹部"。

在朱鎔基提出了治理通貨膨脹的一攬子計劃，即所謂"16條整頓經濟措施"的同時，親自兼任央行行長的朱鎔基，還進行人事大換血，在副行長的位置上，換上了一個自己的心腹朱小華，留任了陳雲之子陳元，而且陳元還因為央行的改組，排名從第四上移到第二。

另外，新任副行長還有一個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姚依林的女婿

王歧山。王歧山原是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按照原來中央銀行位階的劃分，中國建設銀行，僅僅是由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二級銀行，其幹部位階規定是副行長僅僅為正司局級，而人民銀行副行長則是副部級，所以，王歧山現在是官昇一級。

陳元和王歧山兩人無論在改革問題上持何觀點，因為他們的老子分別是中共計劃經濟的兩大元老，所以把陳元和王歧山算在改革派陣營裏，恐怕很少有人會接受。

事實上朱鎔基兼任央行行長後，實際主持研擬大陸金融改革總體方案的，恰恰就是陳元和王歧山，可能是因為他們對加強宏觀調控措施及理念相近，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朱鎔基的政治策略、憑藉重用陳元和王岐山，作為向他們兩人的老子示好的籌碼，降低政治上的風險。

坊間有評論稱，朱鎔基欣賞王岐山，除了特別愛惜金融之才，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兩人太"像"。王確實像朱，不是指相貌，而是風格。兩人最相似的是語言風格，王岐山衹要不用講稿，說話跟朱鎔基一樣幽默；他到哪裏，官場上都愛聽他作報告。王還有一點像朱，就是鐵腕——說歸說、笑歸笑，衹要心裏定下的事，一定要辦成。

官方媒體也曾這樣評價說，當時作為朱鎔基麾下的一員得力幹將，王岐山不僅經受了考驗，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雷厲風行的風格。

1994年，又是在朱鎔基的推薦和提拔下，王岐山回到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擔任行長兼黨委書記。隨後，經多方奔走，他最終說服政府高層同意與國際上最知名的投資銀行之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合資組建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並親任董事長。

在此過程中，王岐山結識了包括前任美國財長鮑爾森在內的一大批國際著名金融機構的領袖，積累了大量的人脈資源，為他日後面對諸多金融問題挑戰，打下了基礎，也使他不論在哪個崗位上，都讓人看到一位金融幹將的影子。今天，註冊資本已達1.25億美元的中金公司已成為國內最負盛名和最具實力的投資銀行，並成功舉薦了一大批巨型中資公司在海外上市，為中國企業海外融資和走向世界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以說，是朱鎔基一手提攜了王岐山，作為回報，王岐山在離開建行前又把朱鎔基之子朱雲來引薦到中金公司。也可以說，王岐山後來的仕途暢通無阻，離不開朱鎔基這個"伯樂"，而朱雲來能有今天的名利雙收，自然也離不開王岐山當初在中金公司打下的基礎。

說起朱鎔基，繞不過他執政期間的金融班底。曾有海外媒體指出，一般認為，朱的金融班底，有王岐山、朱小華、周小川、王雪冰、李福祥、梁小庭等一班才俊，其中最得朱鎔基器重並寄予厚望的是朱小華、王雪冰。可是，這班人中除了王岐山、周小川外，均已出事。

就在朱鎔基的這些愛將相繼落馬之際，已在金融界幹得風生水起的王岐山，卻突然換軌轉向政界。當時，坊間有傳聞稱，朱鎔基安排王岐山離開建行的原因，一是不想看著這名愛將也中途落馬，二是有意讓王到地方去鍛煉，幫他處理棘手的金融問題。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香港經濟遭受重創。危機迅速向香港的後院、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省份廣東蔓延。

金融風暴的衝擊導致香港紅籌、內地國投和負內債的各種地方中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發生大面積支付危機。此前的多年間，憑藉政府信用的變相擔保，廣東省各級政府和40多家國投、紅籌和上

千家“窗口公司”，向國際商業銀行舉借了遠遠超越償還能力的巨額外債。

一時間，廣東金融危急。面對國際國內的追債狂潮，處置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燎原大火，推倒中國金融體系的多米諾骨牌。

於是，朱鎔基派自己的得意“門生”出馬了。自此，離開金融界的王岐山，便大步流星地走上從政這條仕途上……

赴廣東處理粵海重組案和廣信破產案

在危急關頭，王岐山被朱鎔基點將，於1998年南下出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主管金融，領導處理蔓延全省的支付危機。

王岐山第一天走進廣東省政府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處理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廣信”）和粵海企業的緊急債務。廣信和粵海不僅自身資不抵債，而且負債額超過省政府可以考慮的支付能力。在內部的激烈爭議中，王岐山拿出一個既乾脆又顯大局觀的方案，即，不向中央伸手，不給香港添亂，抓一個——重組粵海、放一個——讓廣信破產。

王岐山的方案體現了中央高層關於金融改革的原則——關閉嚴重資不抵債的廣信，為的是政企分開，“誰的孩子誰抱走”，改變過去政府替國有金融機構償還債務的做法，終結政府信用和企業信用不分的道德風險時代。

而保住同樣資不抵債的粵海，則是“超過了純粹的經濟考慮”。“粵海是境外集團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們要考慮香港市場的穩定。不想給香港的股市添加混亂。”王岐山向債權人和媒體解釋說。

然而，廣東省政府對粵海和廣信的處置決策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在中國資本市場早期發展的10年中，金融制度很不完備，紕漏頗多。中國特色的官商一體使國際債權銀行領會了一個潛規則——借錢給“窗口公司”就是借錢給中國政府，是最安全的主權債務。誰也不相信中國政府會在一夜之間掀翻歷史悠久的潛規則，不再為一家自己全資擁有的公司買單。一時間，憤怒，抗議，威脅，反彈的巨浪來勢猛烈。

無法接受現實的債主們聯合起來，向王岐山的意志力發起衝擊，叫喊著要廣東省政府“百分百償債”，而且馬上要現金，否則就要將粵海清盤，“大家同歸於盡”。更有國際銀行家放言，將停止向中國發放貸款。

此時，一個叫保爾森的美國人幫了王岐山一個忙。保爾森時任高盛主席。在王岐山看來，面對170餘位國際債權人，不可能由中國政府官員單幹，必須要有具備國際權威的金融機構參與。於是，王岐山拍板聘請高盛作為粵海重組的顧問。在保爾森和高盛的參與下，廣東省政府終於和國際債權人坐下來，就粵海重組展開曠日持久的談判。

當談判陷入僵持時，王岐山展示出他的鐵腕作風，在1999年6月底，面對債權銀行無休止的討價還價，王岐山宣佈，廣東省政府自7月1日起停止代粵海償付貸款利息。

面對那些大吵大鬧、威脅說要“控告”中國政府的國際債主，王岐山也放出硬話：“你們可以去告，上哪都可以，在國內、在廣東省肯定贏不了，到國外我也願意奉陪！”一面又以學者的思路從理論上廓清，解釋說：廣信的信用既不是主權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業信用，這種介於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過渡性信用，可以稱為“窗口公司信用”。隨著時間的推移，“窗口公司信用”的內涵在發生變化，“政府概念”的成分越來越少。

最終，廣信破產案頂住了海外的壓力得以順利執行，清盤結果各方也都能夠接受。王岐山快刀斬亂麻處理涉及港澳的巨大債務危機，名聲大振，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港人第一次聽到王式風格的話語："國投債務處理不好，那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大事！"

在粵海債務重組案中，王岐山也顯示出他的金融功力，借鑒美、韓等國化解金融危機的經驗，以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解決了粵海企業的巨額不良資產。他與眾多外國銀行家交手，最後成功"拆彈"，解決危機，令海外輿論刮目相看，被外界稱為"有理有利有節"。贏得了"小朱鎔基"的稱號。

《21世紀經濟報道》評論稱，這場高強度的國際博弈，王岐山贏了。1999年1月10日，廣信破產關閉。2000年12月，經過艱苦談判，廣東省政府和國際債權人就粵海重組達成協議。一抓一放的同時，廣東省政府向央行借款380億元，重組和關閉廣東省內800多家地方中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廣東金融最終轉危為安。

處理廣信和粵海案例，王岐山對金融法規建立的迫切性深有體會："核心教訓在於市場必須有法規制度剛性約束"，"建立法制是一個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過程，但唯有痛苦，才會真切感受到剛性約束的重要和必要"。

幾年之後，王岐山在一次公開場合演講時說，廣信破產後，即使有人還敢借用地方政府和部門的背景借債，也沒有人敢借給他，這就建立了防範風險的機製——"這是我們付出代價換來的機制"。

收拾海南房地產"爛攤子"

2000年年底，王岐山奉命回到北京，任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

主任兼黨組書記，協助朱鎔基推行經濟改革。但沒到兩年，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調整體制，體改辦撤銷，剛剛從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轉正的王岐山，在新一輪地方換屆中再度南下，到"天涯海角"的海南省任省委書記。

此時，海南省"爛尾樓"暴露之後，還沒有從泡沫經濟中緩過氣來，發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岐山顯然負有收拾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爛攤子"，挽救這個經濟持續十年低迷的全國最大的經濟



當初的海南"爛尾樓"

特區的使命在海南全省幹部大會上首次露面時，王岐山巧妙地恭維前任書記白克明："剛剛大家的掌聲，我很清楚不是給我的，因為我剛剛來，大家對我不熟悉；是給白克明同志的，因為他為海南人民作出了貢獻。"

到海南一個月，王岐山亮出新招——由海南省自行處理其不良資產，承諾把過去的爛攤子一起接過來，不享受中央政府處理壞賬的優惠。當然，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通過一系列振興措施，切實發展經濟，改善投資環境，從而把爛攤子變成"發財聖地"。

王岐山到海南的頭一個多月裏，除開曾在海南省冬季農產品交易會上說過一句"我宣佈，交易會現在開幕！"幾乎就沒有公開露

過面。但他沒有閑著，從海口到三亞，從瓊海到五指山，短短一個月，他幾乎把海南走了個遍，到最貧困的縣市進行調研。

考察後他說話了："有個星期天，我也沒跟誰打招呼，自己買票進去看看世界第三、中國第一的紅樹林。我一看，完了！呵！好家夥，那船開得那個快呀！鳥兒嚇跑了，浪還把兩邊的紅樹林打退了一米多。"

在海南省委的經濟工作會議上王岐山第一次以省委書記身份發表講話，學者的見識和鮮明的個性便顯露無遺。按慣例，省委書記和省長要分頭做報告，所有的講話都要印發文件。但王岐山說，汪嘯風省長受我的委託，代表省委常委做一個統一的報告，我就不講了，免得內容重複。他也不同意大規模印發會議文件，他說，興許是出於他山西人的本性，講究節約，反對發那麼多的文件；複印幾百份，也不利於保密。

在 2003 年 3 月兩會期間的海南代表團開放日上，香港《太陽報》記者搶先向王岐山發問：您剛到海南任省委書記，遇到的最難的問題是什麼？海南爛尾樓目前處置情況怎樣？王岐山稍一沈吟，回答說：最難的問題是沒經驗，從未做過地方黨委的主要領導。我要做的是認真調研，認真學習，向海南人民學習，儘快熟悉海南、熟悉工作。半拉子問題，要請我們的省長汪嘯風代表回答。

汪嘯風說，海南積壓房地產處置工作順利，房地產市場已走向較規範、健康的階段，相當多的房產已銷售到海內外消費者手中，我們目前正在著力創造更良好的人居環境。王岐山插話說，積壓房地產的處置之所以順利，既有國家政策的支持，也有海南自身的努力。這一難題必將得到徹底解決。不過我們要考慮留它一座，做博物館，讓後人記取泡沫經濟的教訓。

當記者問起，海南最近提出，要把海南建設成為中華民族的四

季花園和全國人民的度假村時，王岐山說，我們已初步提出了這一設想，目前正積極地研究這一定位。從實際出發，海南所有的發展都要服從於生態第一、可持續發展這一首要戰略。與此密切相關，當前最緊迫的是"三農"問題，沼氣、交通、水電不解決，農村不富，生態無從談起，可持續發展無從談起。如何做好"三農"工作，真正把它作為海南全部工作重中之重，還需要深入研究，這次"兩會"後，我們要廣泛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決議真抓實幹，逐項落實。

一位記者還問，海南將如何增強外來投資者的信心？王岐山說：我所有的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尊重歷史，尊重實際，尊重群眾。在歷屆省委省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下，海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與內地特別是發達地區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承認歷史，承認這一現實。有機會，我會專門向你們講一講如何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海南發展中的問題。海南的發展已經走出谷底。祇要我們一心一意謀發展，堅定不移地團結和依靠全省 800 萬人民群眾，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重要的是，不能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出錯。

王岐山接著說，我去年 11 月 20 日剛到海南，就感受到海南的會議經濟、旅遊經濟之活躍，已經不祇是一個"黃金周"、一個旺季，它已經延伸到了四季。海南發展的信心，不靠宣言，不靠演講，關鍵靠的是市場自身的表現。懂行的投資者看什麼？看市場。"祇要有需求，投資自然來。你信嗎？我信。"

當時有評論指出，在全國都在大舉擴張城市時，王岐山卻將工作重點放在農村，"五網工程加沼氣"即王岐山的提議。所謂五網是指路、水、電、廣電、通信，提出要用 5 到 10 年使海南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完成。這意味著，5 到 10 年，王岐山將沒有亮給人看的

"顯赫政績"。他不要面子工程，專注長遠發展，贏得了海南人的尊重。

王岐山的領導風格也讓海南人耳目一新。他講話一般不拿講稿，沒有官腔官調，一下子就能抓住人。他在被媒體問及"爛尾樓"處理時，直率地說："最後要留一棟，將來搞個博物館，讓後代人知道什麼叫『爛尾樓』。以後學經濟的研究生可以到那兒去，讓導師現場給他講一講『泡沫經濟』是什麼東西！"

SARS 力挽狂瀾，大手筆治京城

王岐山在海南五個月，屁股還沒坐熱，2003 年 4 月 22 日，北京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長張文康因防疫不力並瞞報疫情而黯然離職，北京 SARS 風暴最猛烈之際，王岐山被十萬火急地再次召回北京，擔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孟學農、張文康都曾說"北京是安全的"，壓制真相、掩蓋實情，使政府的信譽受到摧毀性的衝擊。在凶險的瘟疫來臨之際，政府卻喪失了民眾的信任，這是多麼可怕的"禍不單行"！

京畿重地當時如同隱藏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核彈。受命於危難之際，王岐山肩上的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恐懼、混亂、沒有信任和安全感，打開窗戶都擔心病毒會跑進來——這是當時每個普通北京市民的心態。但王岐山清醒地體察到，真實數字公開前後，市民的恐慌性質完全不同。在新聞發佈會上，王岐山強調"不論情況多麼緊急，科學態度都是第一位的"。

王岐山心知肚明：當務之急，是要修復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他以"說實話"作為修復政府信譽的起點，也作為動員民眾對抗恐懼的起點。在上任後 4 月 24 日第一次市政府常務會議上，王岐山以"狠話"亮相："我就要求你們彙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軍中無戲言。"

王岐山上任第二天，下達隔離令，對受"非典"污染的人員、場所依法實施隔離。

王岐山到北京之後，政府公佈的北京 SARS 確診病例數，頓時從 37 急劇增加到 339。但記者招待會上，卻受到尖銳追問："如果 37 個病例不是真實的，那麼 339 這個數字就可信嗎？"王岐山答復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佈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的、



當北京市長時的王岐山

坦白的。"

大員調任，最頭疼的莫過於對新領域的陌生，疫情如火，這次偏偏又沒有留給王岐山熟悉情況的時間。臨危受命，在他來說倒不是第一遭，但像 SARS 這樣緊急卻前所未遇。王岐山沒有怯場，新官上任立即實地調查。

接任代市長的當天，王岐山就一口氣走訪了新發地批發市場、崇文門菜市場、和王府井醫藥大樓，4 月 25 日視察了小湯山定點醫院的施工狀況；26 日上午，他與來自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寶潔、西門子等外資公司駐京代表座談；27 日會見世界衛生組織駐

華代表貝漢衛：5月1日先後在天壇公園、安華西裏和官園南裏小區、大運村和清華大學，調查市民和學生的防疫和心理狀況……

不到一個星期，王岐山就迅速瞭解到了來自市場供應、醫院、工商、WHO、社區和學校各個方面的第一手資料。有了這些，他心裏踏實多了。

4月30日，上任一週的王岐山，接受CCTV採訪時已經對一些基本的流行病學調查途徑和手段、醫務人員的防護措施等有心中有數，他還知道出租司機感染率相對較低。不過王岐山對未來疫情發展沒有盲目樂觀估計，他甚至稱這種估計"近乎一種賭博"。

在中國政壇，"低調"和"謙虛"是官員晉陞的不二法則。王岐山來北京之前也是信守這一"潛規則"，而危機中的王岐山不得不一反常態："面對老百姓這種恐懼心理的時候，電視、報紙、我們各層官員，都應該張開嘴巴，需要邊做邊說。"

4月20日後的王岐山保持了高曝光率，他必須讓市民知道，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市長在做什麼，說什麼。王岐山甚至希望辦公室能直播，讓市民天天看見他。

5月1日早上，王岐山出現在天壇公園晨運的人群中，與老百姓笑談"非典"。他向市民保證，作為市長，自己的正規信息渠道是暢通的，而且自己還有很多非正規消息渠道，這個話是說給老百姓的，更是說給各級官員的。

5月9日，王上任後第19天，北京"非典"上昇趨勢得到有效控制。一個多月後疫魔隱退。

很少有人知道，奉調進京一年多，王岐山的體重降了近二十斤。

香港《大公報》刊載王德軍的文章說，要在中共高官中尋出一位和王岐山有許多共同點的人，恐怕當屬常以"小女子"自稱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果斷幹練的吳儀總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從中美貿易、知識產權談判，到後來接掌衛生部處理舉世關注的公共危機，"中國鐵娘子"聲譽日隆。而王岐山也總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扮演著"救火隊長"的角色。

《大公報》文章說，王岐山處理危機的能力，從他2003年剛剛履新接掌北京的一幅景象，和當政四年半後今天的一幅景象做個對比，就一目瞭然——

2003年4月24日，SARS最為嚴重的時期，平時繁忙擁堵最為嚴重的北京二環路上，車輛稀少，路邊戴口罩的行人匆匆走過，恐慌的情緒仍在這個城市蔓延。家在外地的"北漂"們多"逃"回老家；開盤不久的樓房紛紛歇業關門，因為沒有一個顧客上門……古都經受著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

2007年10月8日，中共十七大在北京召開，北京奧運倒計時305天，家住城北立水橋的小陳在國慶長假之後，花兩塊錢乘坐剛剛開通的地鐵五號線到雍和宮，再轉乘二號線到積水潭附近上班，全程只用了不到半小時。而此時，家住南三環的老王，用一卡通只花了四角錢就乘坐公交車到西二環上班。老王說，北京公交、地鐵的票價全國最低，現在市內房價太貴了，能在兩年前買到價格還能接受的南三環房子，已經非常滿意了，儘管道路仍然很堵。

"王市長到北京以後，我們能切身感受到北京的變化，天更藍了，奧運機遇使得城市建設大大加快，北京變漂亮了。而很多人性化的政策也給了市民很多實惠，看電視上王市長講話，覺得他這人沒架子，說話挺實在的，人挺能幹。"

置辦滿漢全席，看著別人享用？

"說話挺實在的"——不知是《大公報》記者，還是這位北京

市民語帶阿諛。實際上，對王岐山的非議不少，主要就是說他作風不夠沈實，他在傳媒面前的幽默風趣、口若懸河，成了他的典型“噱頭”，也有人看不慣聽不慣。有人說，王岐山具有北京人愛“侃大山”的特點，在十七大會議間隙，許多代表都喜歡湊到他跟前聽他的高論，一邊抽煙，一邊海闊天空。中午就餐時，王岐山也每每是中心人物，所到之處，都笑聲一片。不少代表即便用罷午餐，也不離去，等著與他在“午餐會”上談天說地，王岐山所在的餐桌屢屢“客滿”。他的煙癮很大，2006 年接待香港媒體訪京團時，講到市長對於環保的責任，還情不自禁提到自己“公私不能兩全”：“世界戒煙日，在辦公室不能抽煙，我雖然很想抽，但為了以身作則，還是沒抽成。”在十七大上“人以群分”，多名“煙民”代表圍在他身邊吞雲吐霧，總是引得其他代表過來探問：是“茶話會”還是“煙話會”啊？

打退 SARS 病魔，王岐山名滿天下，由“代”轉正，又接受下一個挑戰——2008 年北京奧運，祇能成功，不得失敗。

這不僅要求王岐山必須按時完成北京奧運所需的各項硬件設施，還必須想方設法提高各種軟件水平。王岐山圍繞交通、環保、城市管理、城建、改善居民生活等展開了密集調研，並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

“我們的市政府是全世界面臨問題最多的市政府，我自然就是那個世界上面臨問題最多的市長。”“惡夢就是安全（出問題），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我最擔心的不是市民，而是 2008 年 8 月 8 日開幕式時北京下暴風雨，那我真是沒招了。”王岐山說：“我們已組織專家對近十幾年來北京 8 月 8 日 8 時的下雨概率進行了統計，並商討對策。”

北京私人購車急劇上昇，對交通的壓力極大，關於道路壅塞的

怨言、笑話、漫畫鋪天蓋地，北京早就贏得不是“首都”而是“首堵”的諧稱。王岐山索性自稱“首堵”市長，用幽默來化解尷尬，他和市政府同仁也確實下了不少功夫來緩解壅塞。2006 年 11 月，他率隊到香港學習交通管理的先進經驗，當眾拍胸脯：“奧運會 20 多天的時間，我敢保證交通絕對不會有問題。”

經幾年努力，北京城市建設、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一份民心基本認可的成績單。全市 500 多條公交線路降低統一市區票價，日均刷卡量近千萬次；地鐵五號線開通，並有 6 條地鐵年內開工，到奧運會之前，全市地鐵通車里程纍計達 198 公里；首鋼搬遷順利，市民享受藍天的天數達到全年的 70%；奧運工程進展順利，“好運北京”賽事全面考驗了場館、交通；金融業發展迅速，汽車工業也引來現代、奔馳等外國大企業入駐……

“非典”疫情和前任的失誤，造就了王岐山的機會。北京正處在奧運即將來臨，各種硬件軟件建設全面鋪開、中央、全國乃至全球高度關注的聚光燈下，王岐山的一舉一動也都處於視線的焦點，短時期內知名度暴漲，2006 年 6 月劉志華副市長落馬，2007 年海淀區眾多貪官被拘……都沒有使他受到牽連。今後中國的危機、突發事件必將有增無已，王岐山的能力和經驗大有用武之地。

據說，王岐山 2004 年在雅典接旗、舞旗之前，曾專門練了半天。走上全球億萬人矚目的雅典奧運閉幕式高台時，王岐山說：“從此刻起，全世界關注奧運的目光，將聚焦在北京，聚焦在中國。正因為如此，北京可能成為『問題最多的城市』。”

王岐山不止一次地談到：“作為北京奧組委的執行主席，既然我的任期，恰好和奧運會的籌辦、舉行相重疊，那我就必須和全體市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在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的領導下，把這屆奧運辦好。”



在雅典奧運會閉幕式的旗幟交接儀式上，北京市市長王岐山揮舞奧運會會旗

說這番話時，他可能確實沒有想到，自己並不能以“主辦城市市長”的身份，走上奧運會主席台，在全世界的聚光燈照耀下大為風光一把。連不少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也沒有想到，王岐山會鬆口同意在奧運之前調動——哪怕是陞遷呢。消息人士對多維社記者分析，王岐山是何等精明之人，他不會想不到：奧運主辦城市市長這一身份，對他的名聲和利益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他才不會在奧運之前走呢！”這些職務 並不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將奧運拿下來，不愁落不到他頭上；而北京舉辦奧運，此生只可能趕上這一次。如果籌備了半天奧運，奧運來臨之際卻離開了，就如同操辦了一場滿漢全席，卻眼睜睜地看著別人享用！

但是，中央終究還是要調他去國務院。王岐山在十七大期間說：“北京已經完全做好了迎接奧運的準備。”但他本人進入自己政治

生涯另一個十年，也是最後一個十年。一般相信，他在新任的副總理中，是最為幹練的一人，尤其是他的金融背景，將涉及以前由常務副總理黃菊主管的金融一攤子，這才有本文開始所說的一幕：省委書記們都湊過來向他表示對股市的提心吊膽。

溫家寶點將，王岐山成金融領軍者

王岐山當選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 2007 年 11 月 29 日。這天上午，他以北京市長身份會見了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一行。下午，北京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沈躍躍宣佈，王岐山根據工作需要，不再兼任北京市長職務。王岐山親自做了請辭說明。隨後起身，用他一貫的“雙手抱拳”動作，高聲對大家說：“謝謝大家！”台下頓時掌聲一片。

隨後幾個月，他銷聲匿跡，即使在雪災危機，中央大員紛紛出動之際，也很少聽到王岐山的動靜。他幹什麼去了？

2008 年 3 月十一屆人大上，王岐山才會走馬上任擔任副總理，但人們相信他決不會等到那時才研究金融政策。他一定在潛心觀察和分析。果然，王岐山在“兩會”上露面，在山東代表團討論會上透露：幾個月來在讀書學習、認真思考，一直在“充電”，以便“再就業”。

他讀了什麼書呢？他讀諸子百家，發現百家中有一半出自山東。這位青島出生的高官和山東人“套近乎”：我母親的普通話到現在還帶著膠東音呢 他讀胡適的《努力人生》，文中內容張口就來，足見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認真研讀。當說到孔孟是魯人，老莊是齊人時，他引用胡適的話說：恰恰是這幾大家引領中國思想兩千年，

"山東人闊哉！"引發滿堂笑聲；他還讀西方經濟書籍，發現西方工業化、城市化總人口加起來不足10億，而中國提出要帶領15億人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將對世界人口質的改變作出重大貢獻。"王岐山說。

王岐山也抒發憂患意識："正因為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總理才提協調；正因為不平衡，才提平衡；正因為不公平，才提公平！"他直言中國經濟"今年不輕鬆"一一點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通脹、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資源壓力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問題。

在談到中國對外依存度過高時，王岐山幽默地說：現在中國人買什麼都貴，賣什麼都賤。舉重若輕，信心十足。

王岐山從首都市長跳過市委書記（雖然他原來擔任過五個月的省委書記）、直昇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感受到溫家寶"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急迫心態。坐進國務院副總理的座椅，王岐山也將接過諸多傷腦筋的難題。

由於有岳父姚依林留下的龐大關係網，更由於自己多年在金融、經濟領域建立起來的人脈和經驗，王岐山非常強勢。甚至有人說，他是溫家寶新一屆弱勢內閣中唯一的強勢人物，是真正能幹、能打開局面的副總理，不僅與張德江相比，甚至在所有新的副總理當中，王岐山是外界最不擔心其是否勝任的一位。

很多人懷疑新班子是否能扭轉第一個溫內閣"辦事不力、政令不通"的疲態，人們也普遍認為新內閣不見得比舊的強，但王岐山算一個例外，香港不少報紙專欄作者對王岐山讚不絕口，相當看好。

王岐山將成為中國金融的領軍者。北京當局高度重視對金融的宏觀調控，將維護國內金融行業穩定和改革的希望，寄託在王岐山的身上。眼下中國金融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股市、樓市在泡沫和政府的打壓措施中越昇越高，令種種宏觀調控措施望洋興嘆。掌管

中國財金命脈的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主管金融事務的前副總理黃菊的生前身後，都各自為政，政治博弈導致改革停滯。王岐山繼承的是一個與距全球競爭力相去甚遠的銀行體系，保險及證券業也處於市場立足期，還不能向國外企業完全開放。他的使命是推行中國政府加快這三個行業整合，創建涵蓋中國七億農村人口的金融體系。

遭遇諸多難題、深感心勞日絀的溫家寶總理，無疑對新一屆內閣的助手期望殷殷。人們都看得出來，溫家寶在選拔班底時，深受黨政制度的困擾：十七大上晉陞到最高層的，還是"務虛"者多於務實者。朱鎔基和溫家寶眼中頂用的許多部級官員，像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和馬凱等，都無緣晉身政治局，當副總理也沒戲，而有地方諸侯的資歷，才是躍昇中委與政治局的"主流階梯"。除汪洋等個別人曾在國務院工作外，大部份團派官員都沒有政務、尤其是財金與外貿經驗。這樣一個群體主掌經濟將進入高風險期的中國，讓人不無擔憂。

押寶解困高手，拆解金融貿易難局

在王岐山出任副總理時，中國金融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股市、樓市在泡沫聲中越昇越高，令種種宏觀調控措施相形見絀。掌管中國財金命脈的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主管金融事務的前副總理黃菊生前身後，都是各自為政。雖然王岐山面對著諸多困難，但包括西方媒體在內的輿論都普遍看好這位"拆彈"專家。

在2008年兩會召開期間，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稱，中國押寶解困高手王岐山，拆解金融貿易難局。文章還用很長篇幅介

紹了王岐山從一名知青成為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經歷。

在管理著北京這個人口超過 1500 萬、問題多多的大都市時，前任市長王岐山從來不曾粉飾太平，無論是污染、缺水還是腐敗問題，他總能勇敢面對。

王岐山不僅是位銀行家，他還因解決了若干高難度問題、以及幫助北京備戰奧運而為自己贏得了聲望，如今他將被委以更加艱鉅的任務。

在中國的高層領導人中，王岐山有著豐富的金融從業經驗，而且他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表現了中國人少有的直率和自然。多年來，他和全球金融界和銀行業的多位重量級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其中就包括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後者把王岐山稱做是自己的朋友。兩人初相識之時，保爾森還在高盛集團任職，而當時的王岐山則是中國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行長。

保爾森說，王岐山是個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懂市場、懂人、知道如何與人溝通。他說，“我不會說中文，他不會說英文，但他讓我很容易就能與他溝通。”

西方的銀行家、律師和分析人士相信，王岐山是中國領導層中的改革派，勇於在敏感領域推進自由化進程，比如加快中國滙率機制的市場化改革，進一步開放中國的金融服務業等。

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中期，王岐山參與了中國首家擁有外資背景的投資銀行的創建，而當時中國的金融業還幾乎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近十年前，他參與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債務重組，當時兩家國有投資公司因無法償還外資銀行百億美元的貸款而深陷困境。五年前，緊急調任北京市市長的王岐山成功控制住了“非典”疫情的蔓延，而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官員一直在掩蓋事實真相。

一位與王岐山已相識十多年的外國管理人士說，上述三件事情

都頗為棘手、形勢嚴峻、也無從借鑒經驗，處理這些難題無疑可能給他的個人前途埋下隱患，但每次他都能圓滿地完成任務。

《華爾街日報》還用很長篇幅介紹了王岐山當知青和上學的經歷。1979 年，王岐山回到了北京，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並開始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問題。之後，他初涉金融界，進入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工作。

王岐山晉陞得很快。1989 年時他已是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的二號



王岐山和保爾森

人物，負責該行向商業銀行的轉型工作。當時王岐山說，我們的分支機構無處不在，但效率並不理想。現在該行已改名為中國建設銀行，2005 年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時籌集了 92 億美元資金。

王岐山隨後被任命為中國央行副行長，他在那裏遇到了朱鎔基。在做事雷厲風行的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有些分析人士表示，王岐山倣彷了朱鎔基的風格，他

對開放市場、引入外界競爭的堅定態度將推動中國公司不斷自我完善。

王岐山回到建設銀行，並於 1995 年幫助摩根士丹利與中方組建合資企業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使其成為首家進入中國的國外投行，這也是受到嚴格控制的中國金融領域中的第一批大規模海外投資。

三年後，中央政府將王岐山派往毗鄰香港的廣東省，清理中國有史以來最為糟糕的一場金融殘局。由於兩家省級大型國有投資公司宣佈他們無法償還總計 100 億美元的貸款，國際銀行家放言將停止向中國發放貸款。這一違約事件不僅影響到當地經濟，也威脅到中國能否繼續創造經濟奇跡。其中一家無力償還貸款的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後被清盤，債權人幾乎落了個兩手空空的下場。

王岐山在清理這些壞帳的同時還要穩住放貸者的信心，貸方信心一旦瓦解將給中國的信貸狀況造成極大破壞。當時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遠比現在大，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資銀行的實力那時還相對較弱。

王岐山告訴各家外資銀行的財務主管在所發生的問題上他們自己也要承擔一定責任。另據知情者透露，王岐山還親自出馬，請求後於 1999 年出任高盛董事長的保爾森幫助重組負債 58 億美元的粵海企業有限公司。

如今，面對全球經濟低迷、國內顯現通貨膨脹跡象以及收入差距擴大影響社會穩定的局面，王岐山也許會幫助中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王岐山擔任北京市市長時曾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談到收入差距日漸分化這一現象時，他將矛頭指向了腐敗。

他談到，坦白說我們現在走的路是以前從沒走過的。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種能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方法。

愛"侃大山"，一到美國就即興演講

也許是長在北京的原因，王岐山以愛"侃大山"而"聞名"，而且一到美國就發表"即興演講"，聽過他演講的美國人也都開始變成他的"粉絲"了。

2006 年 6 月 2 日，當時還是北京市長王岐山在洛杉磯參加午餐會時，發表了即興演講中，坦誠相告他的重重困難與解決毅力，結果累倒了翻譯，樂壞聽眾。王岐山作為中國首都的父母官應美國亞洲協會特邀，登上洛杉磯運動俱樂部的講檯，原本是要向各界人士主講北京奧運會建設以人為本、發展和諧社會，一看人人握有講稿，乾脆即興話說心事。

"我與洛杉磯有緣！10 天前接受了《洛杉磯時報》的專訪，幾天前又出席南加大校董會包下天安門城樓舉辦的酒會。我被問的都是樓房價格、交通堵車、環境保護等問題，都是本市長最發愁的心病。"

王岐山舉例："北京有 260 多萬輛車，近期石油漲價，每天還增加 995 輛。"他笑稱北京人的生活變化好像在學洛杉磯，也可能是好萊塢電影看多了。

這位世界大都市的市長列舉收入分配、城鄉差別、行業差距和區域差別等等問題，比喻他面臨的諸多困難，"不比一位天天說自己有毛病的人更痛苦。"但他說："看一個城市要看狀態。北京的事實是：不很好也不太糟。可是我們一直在到處學習別人，研究如何解決問題，改革開放 30 年來一直如此。"

王岐山實話告訴聽眾："北京經濟兩位數的增長率雖已 20 多年，但今天的人均收入才相當於美國 1974 年的水平。"他話題又一

轉道："如此改革發展，怎麼會威脅世界？！"

昔日下鄉當過農民的王岐山，握拳表達他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的勇氣時，一旁緊張傾聽的年輕女翻譯探身瞭解一個單詞時，一剎那從台階上摔倒在地。只聽隨著人們"啊"的一聲驚呼，市長和嘉賓們都飛快圍上前救護。

主講市長目送女翻譯在全場的鼓掌聲中慢慢被扶向樓外呼嘯而來的救護車……他又上台感嘆道："給我當翻譯太難了！"結果由出任亞洲協會會長的華裔美籍企業家唐偉上台客串翻譯，旁邊還站著駐洛杉磯總領事鍾建華協助。

最後，一位美國聽眾舉手表明他將到北京去工作。王市長笑答："很高興你成為我們的納稅人，我將為你服務！"全場皆是歡笑掌聲。

2008 年 6 月 18 日晚，王岐山在與美國政商界的晚宴上發表 40 分鐘的即席脫稿演講，中國官方媒體稱，他用自己對中美戰略經濟關係的精辟觀點、坦率真誠的態度和獨有的幽默口才，折服了參加晚宴的美國聽眾。

當晚，王岐山換上了"奧林匹克領帶"。他解釋說，美國商務部"古部長"（古鐵雷斯）稱讚他的領帶有品位。"這是（汶川地震後）第一次打紅領帶，因為第四次對話成功了。"王岐山說，中國將從災害中重新站起來，"我知道你們會提到地震，我們要鼓足勇氣，轉向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奧運會。"

王岐山談到了保護主義，"來美之前，有朋友警告我，這次去要小心，美國的大門要關了，美國盛行保護主義。但我認識的美國不是這樣的。"他說，歷史上的美國以貿易立國，是能夠容納世界各族人民的熱土。他以坐在台下的朋友科恩為例，科恩有愛爾蘭、猶太人血統，但是他當過國防部長、眾議院、參議員。



王岐山在華盛頓脫稿演講

接著王岐山話鋒一轉，"在全球化浪潮發展的今天，各國經濟發展面臨中很多新問題，出於對自己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的顧慮，美國存在保護主義也是正常的，何況現在還是處於美國的大選期間。"

王岐山幽默地說："說老實話，中國也有人存在保護主義思想，有些學者就認為中國開放得太大了，擔心華爾街那幫人太會賺錢了，把我們的錢都賺跑了。"

在這次戰略經濟對話緊張的一天半中，王岐山說他發現沒有一個人是贊成貿易保護主義的，大家談論的焦點，都是如何通過共同的努力，把對方的門開得更大些。他委婉表示，明天還想到美國國會去感受一下，到底存在不存在貿易保護主義。"但我知道美國是存在保護主義的"，王岐山說。

"從歷史的長河看，誰封閉，誰落後，中國曾經先進過，但隨後的保護主義一保保了一千多年，讓中國十分落後。"王岐山介紹說，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封閉，中國人痛苦地尋找自身存在的問題，

在30年前作出正確的選擇，改革開放的政策深入人心，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要求，而是全國人民的共識。中國政府有決心繼續走改革開放發展的道路，讓我們的人民過上富裕、文明、發達的現代生活。通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變了，變得太快了。他舉例說，北京變化之快，讓當時擔任北京市長的他連一張準確的地圖都來不及印刷。

王岐山告訴美國朋友，中國儘管躋身四大經濟體之列，但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均GDP水平，還遠遠落後於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衹有美國的六分之一，相當於坐在台下聽演講的美國前國防部長科恩在任時的美國國防開支。

除了邀請美國企業家到中國抓住戰略經濟對話成果的巨大商機，王岐山還歡迎美國朋友來北京參加奧運會。他說，“如果實在沒法去北京，那一定要在電視機前看奧運會，為美國和全世界運動員加油。如果沒有票，可以找我。如果找不到旅館，我們的旅遊局長邵琪偉在這裏。如果大家喫東西病從口入，可以找我們的質檢局長李長江。”這句話讓滿場笑翻。

王岐山以他獨有的即興口才，一開始就風趣地對全場800名嘉賓展示了自己夫人為他選定的紅色領帶，以示對這次對話的成功的慶祝，他親切地稱美國商務部部長古鐵雷斯為“古部長”，他還自我調侃說，不喜歡念講稿卻喜歡即興講話，雖然這樣容易禍從口出。不過，由於他的演講充滿睿智和幽默，讓晚宴嘉賓如癡如醉，掌聲不斷。

一位在對沖基金工作的女士告訴記者，她特別喜歡王岐山的演講，他說的非常有意思。沒有想到他這麼直率。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談開放，幽默，還比較坦誠，讓人感覺中國會真正開放。

2008年9月16日，王岐山出席在加州橙縣尼克松圖書館舉行的第19屆中美商貿聯委會後接見了駐美中資企業代表及洛杉磯總領館官員。王岐山在發表簡短講話時表示，從去年7月前，華爾街就出了亂子，因此他現在是“心繫華爾街”。

王岐山表示，他跟美國人說“老師（美國）出了問題了，讓學生（中國）怎麼辦？老師應當說說清楚。”他說，“華爾街出了如此大的事，錢到哪裏去了？”中國的一些創滙都放在“兩房”等機構的債券裏。

王岐山說，全球的經濟危機已經形成，將對世界經濟危機產生影響，這是值得關注的。近來他經常閱讀世界各地金融領域的報告，王岐山表示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也面臨嚴峻的考驗。

王岐山還指出，如果中國的經濟今年能實現兩個目標，即GDP增長率超過10%，哪怕是很微小的超過，而另一方面將通脹的增長率控制在 7%以下，那麼中國的經濟在目前世界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就可以“一枝獨秀”。

在總結前半年中國經歷的幾件大事時王岐山說，2008年中國有喜也有憂，有惡夢也有美夢。2008年初，中國先遭到了罕見雪災的襲擊，而512大地震更是驚動了全世界。王岐山說，中國政府應對災難的舉措也同樣震驚了世界。

談到奧運會時，王岐山說，中國人盼舉辦奧運百年，可奧運舉行前夕，世界上卻掀起了一股反華浪潮，讓國人不可理解。可北京奧運辦得圓圓滿滿，中國實現了美夢。王岐山表示，奧運會也讓西方媒體看到了中國的巨大發展變化。

美方人士常常提出知識產權和能源價格補貼問題，對此王岐山表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創新型國家，如果中國不保護知識產權，就等於不鼓勵創新。王岐山還表示，能源價格一定要改革，若不改

革能源價格補貼則僅是補貼了富人。

在倫敦用一段家事講“金融三戒律”

2009年5月中旬，王岐山訪問英國。訪英前，他先聲奪人地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呼吁加強中英經濟財金對話。王岐山寫道：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世界經濟衰退尚未見底，形勢依然嚴峻。中英雙方應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共同應對挑戰，促進兩國乃至全球經濟儘快恢復增長。

王岐山說，目前，中國采取的大規模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已初見成效，經濟運行出現積極變化，形勢比預想的要好。我們將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健康平穩增長，為全球經濟復甦作出貢獻。

王岐山還強調，中英關係正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應當充分運用好第二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這個平台，就可持續增長、能源環境、貿易投資、資本市場、社會福利等議題進行交流溝通，努力達成更多的共識和成果 推動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5月11日，王岐山在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成立80週年慶祝晚宴上致辭，闡述控制金融風險的重要性。他先用一段家事來談“金融三戒律”：

“在10多年前，我的一個外甥女，出國留學之前，問舅舅有什麼囑咐。我當時就送她一句話，我說你出國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安全。我說有了安全，其他的都好辦。離開了安全，什麼都談不上。因為你到國外去，一個女孩子，英語會一些，並不怎麼樣，又沒那麼多朋友，你的危險係數就大。”

在這場自稱“沒準備、脫口而出”的致辭中，王岐山說，講到

當前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很多專家作出各種各樣的分析，但其中有一條是非常地簡單，也是金融界人所共知，就是銀行界、金融界的同仁們，忘記了進入金融界的最基本的戒律：第一風險性，或者叫安全性；第二就是流動性；第三就是效益性。這個排列順序，風險性是第一位的。

“你發放一筆貸款，搞任何一種產品，你都要首先考慮到風險性。大家想一想，這場金融危機是多年來纍積的一個爆發。如果在這麼多年中，我們牢記住這『三性』，我想這場危機是可以避免的。但很不幸，這『三性』說起來很容易，做到很難，而往往是越聰明的人，忘記得越快，面對巨大誘惑的時候，人本性的貪婪一定會忘記古訓，一定會忘記這個金融的基本三戒律。”



王岐山在倫敦演講

王岐山稱，他對這“三戒律”的瞭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他進入金融界，和倫敦的朋友們學的。“我的老師就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的朋友，所以我的腦子裏老記著這個『三戒律』。我無論在商業銀行，信託公司，投資銀行，還是中央銀行工作的時候，也包括我在地方政府工作的時候，考慮金融問題，我總是把風險放在第一位的。甚至對很多企業家，不一定是金融界的企業家，我都講，我說你們千萬要注意你們的風險和流動性，我說在這兩個前提下，你去追逐你們的效益。我們現在講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而從人的全面發展來看，安全是人的第一需求，安全的需求超過溫飽，這是我人生的體會，很遺憾，很多人忘記這三條戒律，釀成這場巨禍。”

在強調安全性之後，王岐山又闡述信心的重要。他說，信心從何而來？我覺得信心應該從歷史和哲學的思考而來，人類歷史上，什麼樣的天災人禍都經歷過，中國銀行倫敦分行 1929 年開業的時候，當時就趕上金融危機，這 80 年經歷了多少風雨，經歷了多少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但是我們人類在向往著富裕和文明的同時，沒有一次沒度過，這應該成為我們信心之源。對於向往著和平發展的人類，對於擁有勤勞和智慧的人類，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後來有評論說，王岐山出訪英國，在金融界人士雲集之會議上發表言論，稱金融危機的起因就是歐美商人“貪婪”，“忘了基本規律”，令得全場“鴉雀無聲”。

網上一篇評論文章稱，王岐山出使海外，以黃鍾大呂壓倒瓦釜之鳴，絕非偶然，其才華與能力，早已為世人所公認。當年民主牆被依法取締，一眾跳梁小醜鋃鐺入獄，王岐山卻帶頭反潮流，在社科院近史所搞學生組織，不但無牢獄之災，還一頭搞進了中南海，外人每每誣為“仗著他岳父是姚依林”，顯然是猜測，不足為據。

媒體皆言，王岐山“好讀書”。從其發言中，便可略知一二。

近兩千年前，漢代大儒董仲舒便曾指出，商人“重以貪暴之利，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將社會危機的起源，鎖定在商人的貪婪上。

另一篇網文稱，王岐山在倫敦金融城 15 分鐘的即興演講，令全場鴉雀無聲，上百位金融大腕愕然。

有人說這場金融危機不可避免，這是理由。在閱讀了一些關於 1929 年大蕭條的書後，書中對危機的原因的根本性的說明越來越歸於人性的貪婪和恐懼。但不要忘了人是會忘記過去的，這就是歷史為什麼會重演。

網文稱：一本外國人寫的書說，“金融市場就活在人們的貪婪和恐懼中，恐懼是人們謹慎遵守規則，貪婪是人們破壞它，但也是一種動力。監管就是要人們不要忘記恐懼，給貪婪一個限度。”

王岐山副總理，一針見血，全場鴉雀無聲。真的很高興中國有這麼清醒地官員，中國經歷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希望人們不要忘記控制風險，在貪婪與恐懼中保持清醒。

親自監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重創了全球投資者對於美國金融產品的信心。美國政府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的救市舉措，又引發了投資者對中長期內美元貶值的擔憂。而一旦美元大幅貶值，作為美國的最大債權人，中國外彙儲備中的美元資產將遭受巨大損失。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 G20 倫敦峰會召開前夜，發表了《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這篇文章是中國首次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方向表明態度，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

在首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結束一個月後，香港媒體便引述中國政府官員的話透露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已受命率領一個工作組，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

據說，這個工作組成員分別來自央行、財政部、商業部、銀監會、海關總署和國家稅務總局六個中央機構，由王岐山負責整體監督工作，而央行副行長胡曉煉則已被任命為工作組研究小組負責人，領導研究小組推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具體建議。

2009年9月1日，有媒體以《人民幣國際化：王岐山新角色》為題報道說，“中國人民銀行和幾家中資銀行，正與俄羅斯的一些銀行商討一項可能的貨幣互換交易。”

奇怪的是，披露這項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信息並不是中國央行官員，而是商務部歐洲司司長孫永福。他於8月31日在商務部召開專題新聞發佈會的間隙時間表示，中俄能否達成貨幣互換交易，將取決於中俄企業跨境貿易本幣結算試點項目的結果，故沒有達成交易的時間表。

作為商務部專責歐洲事務的官員，孫永福如此關注貨幣互換交易這項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舉措，固然因為國務院最近宣佈，中國在東北地區將仿傚上海、廣州、深圳、東莞和珠海等五個城市，開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其中包括中國與俄羅斯的貿易，但也反映出推動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已是胡溫高層的共識，中央相關部委官員對這方面動向都極為重視。

香港媒體強調說，事實上，胡溫高層已啟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有關工作，並責成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負責統籌領導。

由一個央行副行長在王岐山的領導下專門負責人民幣國際化工作，顯示了胡溫高層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視。有評論認為，現時仍身兼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的胡曉煉，應該是一個稱職人

選，她自1984年開始，便長期在外管局工作，歷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儲備管理司司長，對人民幣的改革，不僅擁有理論根據，更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

儘管現時人民幣還未完全自由兌換，在這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中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的開放進程，也一定程度受到影響，但這些制約因素並未阻礙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計劃，因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愈高，愈受國際認可，則人民幣一旦落實完全自由兌換，以中國的經濟規模，人民幣將有條件與美元、歐元一道，組成三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9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中國將繼續參與和推動地區貨幣金融合作。在此之前，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也表示，希望G20領導人第三次金融峰會，能在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改革等四個方面取得積極成果。

自2009年以來，從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構想，到中國主管金融工作的副總理王岐山對IMF體制改革問題所提出的權力和義務的對等要求；從外交部發言人提出的對美元啟動印鈔機的憂慮到國務院批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

“這都在表明中國開始重視貨幣主導權的問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說。

孫立堅認為，以前中國都是被動地調整滙率水平，現在則變成了主動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張明認為，這是因此次次貸危機的爆發與深化給中國帶來了足夠深刻的教訓。

正如美國一位前高官所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憑藉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國人可以非常

輕鬆地舉債以拯救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美聯儲也可以輕鬆違背嚴防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戒律，直接購買美國國債以彌補可能發生的供需缺口。而一旦美國對外債務纍積到讓美國人受不了的時候，通過讓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大幅貶值，美國人則可以在旦夕之間降低實際債務負擔。

吸取教訓的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新規則的建設，更多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中國的聲音也從未這樣受到關注。

據中國央行行長助理郭慶平 9 月 16 日在匹茲堡新聞會上的介紹，經過兩個月的磨合運行，一些政策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近期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量明顯增加。“截至 9 月 11 日，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量已達到 7000 萬元人民幣。”

不難預測，中國政府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在以上兩個方面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中國將與更多的國家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尤其是與重要貿易夥伴；另一方面，中國將批准更多的人民幣跨境貿易試點結算城市，尤其是與東盟各國聯繫緊密的昆明、南寧，以及中國重點發展的金融中心城市天津等。

在人民幣國際化加速的同時，中國也積極參與區域貨幣合作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工作。相對於歐洲金融合作，亞洲國家的經濟週期與經濟結構差異更大，相互之間在歷史、文化、宗教與政治問題上存在一定衝突，要在貨幣金融方面形成集體行動更困難。

但也有金融專家指出，冷靜對比國際貨幣的形成過程，不難發現人民幣現仍沒有完成自由化的改革，尚處於區域化的初步階段，只在有限的邊境貿易和跨境貿易中行使計價單位和結算貨幣的初級貨幣職能。

人民幣國際化的起步，還需要許多條件。首先，貨幣互換並不意味著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次，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

起步階段的市場還有待培育。此外，外部限制因素則是亞洲作為持有美元儲備最為集中的區域，對美元的習慣性依賴短期內無法扭轉，儘管這種慣性已經給亞洲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和負面影響。

由此看來，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中，王岐山所扮演的這個新角色，正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考驗。

張德江

功過參半毀譽參半的副總理

張德江的父親張志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指揮員、少將，被稱為從遼瀋黑土地上走來"炮兵鼻祖"。

直到晚年，張志毅仍對已經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的兒子張德江談起，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經過，說這條路是走對了，千萬不能忘記那些沒有看到新中國誕生的革命英烈們。兒子張德江不負父望，由一名"插隊知青"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

1946 年 11 月出生的張德江，其年齡在中共十六屆政治局委員中排行倒數第二，僅比 1947 年出生的劉雲山大。在當時，想必不少人會認為，五年之後，他將更上一層樓，是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吧。但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五年，他卻是趔趔趄趄、跌跌撞撞地走過來的，到十七大時，他的民望竟然如此低落，別說晉陞為政治局常委，就是連任，都有人表示懷疑，還有人恨不得他下台才好。

當然，熟悉中國官場潛規則的人知道，張德江不可能下台；但是他進入溫家寶的第二屆內閣班子擔任副總理，是否能勝任，政治觀察家都是頗有疑慮的。

對張德江的這種疑慮，在 2008 年人大表決國務院人選的票數中也反映出來：張德江獲得贊成票 2903 張，反對票 30 張，棄權票 9 張。

鶴崗礦難，胡溫派張德江赴現場指揮

2009 年 11 月 21 日凌晨 2 時 30 分，黑龍江龍煤集團鶴崗分公司新興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發生時全礦井下作業人員 528 人，其中有 399 人安全昇井。

凌晨 1 時 37 分，新興煤礦調度室就已經接到井下有瓦斯報警的提示，調度人員立即通知礦領導，並組織井下人員進行撤離。凌晨 2 時 30 分時，礦下發生瓦斯事故。

事故發生後，官方媒體稱，根據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的重要指示，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已啟程趕赴新興煤礦事故現場，指導事故救援工作。

此外，接到事故報導後，正在湖南和貴州調研的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駱琳，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礦安監局局長趙鐵錘已立即從當地趕赴事故現場。同時，安監總局派出副局長王德



張德江抵達現場

學、國家煤監局副局長付建華率有關人員趕赴事故現場，協助指導地方開展搶險救援工作。

新華網的消息說，21 日 11 時 45 分許，張德江一上飛機，即召集隨行的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部署事故救援有關工作。15 時許，張德江抵達新興煤礦，查看事故現場，瞭解事故救援情況，親切慰問參加搶險救援的專業人員。他要求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衹要有一線希望，就要盡百分之百的努力搶救被睏人員。同時，要特別注意保護救援人員的安全，要防止次生事故的發生。

之後，張德江分別到鶴礦集團總醫院和鶴崗市興山人民醫院，看望了正在這裏接受治療的受傷礦工，轉達了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對他們的問候，並要求醫院逐個製定每位受傷人員的醫治方案，采取一切措施，全力以赴救治受傷人員，千方百計減少因傷死亡、千方百計減少因傷致殘。

礦難發生一週後，新華社報導說，黑龍江省鶴崗市新興煤礦"11.21"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最後一位遇難者遺體已經找到，最終確定該事故共造成 108 人死亡。

據事故搶險指揮部介紹，為了搜救最後一名遇險礦工，新興煤礦采取抽取井下瓦斯、清煤和污泥作業等辦法，經過幾天連續奮戰，終於在 27 日 16 時左右，在清理 2000 多噸因爆炸噴出的煤時發現了遇難礦工遺體，這標幟著遇難人員搜救工作全面結束。

11 月 28 日，新華社從龍煤集團鶴崗分公司獲悉，經分公司黨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免去許正東新興煤礦黨委書記、副礦長職務，由新興煤礦黨委副書記王清林負責黨委全面工作。

12 月中旬，張德江在《求是》撰文稱，"大力推進煤礦瓦斯抽采利用"。文章說，搞好煤礦瓦斯抽采利用是煤礦安全生產的治本之策。瓦斯易燃易爆，當空氣中瓦斯濃度在 5%—16%時，遇到火源就會爆炸，瞬間形成高溫高壓衝擊波，並產生大量一氧化碳。煤礦一旦發生瓦斯爆炸或煤與瓦斯突出事故，就會造成人員大量傷亡。

張德江還在文章中透露，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共發生 23 起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煤礦事故，其中 21 起是瓦斯事故。近四年來，煤礦重特大事故死亡人數近 70%都是瓦斯事故造成的。搞好煤礦瓦斯抽采利用，可以實現煤炭在低瓦斯狀態下開採，有效杜絕瓦斯事故發生，是保障煤礦安全生產的根本措施和關鍵環節。

煤礦瓦斯中甲烷含量大於 90%，1 立方米瓦斯發熱量大於 8000 千卡，是與天然氣相當的優質清潔能源，可廣泛用於發電、工業窯爐、民用、汽車等方面燃料或生產化工產品。搞好煤礦瓦斯抽采利用，可以增加優質清潔能源供給，改善能源供給結構。同時，可以逐步減少對進口天然氣的依賴，有利於保障國家能源安全。

不過，評論人士指出，身為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主任的張德江在大談推進煤礦瓦斯抽采利用時，卻沒有談到如何處理鶴崗礦難的責任人。在礦難發生後，衹是處理了新興煤礦的幾名領導，卻不敢追究黑龍江省負責安全生產的領導。

比如說，礦難發生，黑龍江省省長栗戰書在全省安全生產緊急電視電話會議就承認，對於這次礦難，自己負有重要的領導責任。

父親張志毅是解放軍"炮兵鼻祖"

赴東北處理鶴崗礦難時，對張德江來說也算是回了一趟老家。畢竟，他在東北長大，在東北陞官。

1912 年 7 月，張志毅出生在台安縣達牛鎮趙荒村一個農民家庭。據其女張爽介紹，張志毅的革命經歷曲折豐富。曾任瀋陽軍區炮兵靶場場長的鄧中國說過，張志毅是個有文化有理想的人，是在

國民黨軍隊也能飛黃騰達的人，但他卻自覺地選擇了革命。

1926 年，張志毅考入了當時赫赫有名的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後攻讀炮兵科，同期的同學有李兆麟、蕭軍、王再天等人。王再天回憶說，1931 年，張志毅參加了抗擊日寇的長城戰役。東北淪陷後，他隨部隊轉入關內，但抗擊日寇的滿腔報國決心一刻也沒有改變。1936 年 1 月，張志毅考入南京炮校尉官訓練班，畢業後回部隊任副連長。第二年，張志毅又先後參加了淮河戰役和台兒莊戰役。1938 年 7 月，在進步人士的幫助下，一心抗日的張志毅投奔了八路軍，同年 10 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輾轉到了延安，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抗大畢業後，他參與組建解放軍炮兵部隊。炮兵部隊最早的訓練教程和條例就是他親手編寫的。張志毅還翻譯了日本炮兵操典。

抗大畢業後，張志毅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教育科參謀、炮兵組長、軍區炮兵獨立營營長、延安炮兵學校訓練部部長等職。在著名的百團大戰中，他擔任炮兵組長，和戰友們一道打響了井陘煤礦攻堅戰。1944 年，張志毅率晉察冀軍區炮兵獨立營到延安，組建延安炮兵學校，他擔任學校的訓練部部長兼一大隊大隊長。


張志毅和夫人江亭拍攝於四平戰役前

張志毅之子張欣介紹說，戰爭時期是張志毅在軍事上最輝煌的一個時期，那時全軍炮兵都稱他為“炮兵鼻祖”。還是在 1945 年，中央決定將延安炮兵學校開赴東北戰場。張志毅的任務是帶領一批幹部和知名人士先期去東北，到東北後收繳敵人遺留的軍用物資，為炮校進入東北後編成炮兵部隊做前期準備。

曾任第四野戰軍後勤政委的陳浤在《遼瀋決戰回憶錄》中寫道，1945 年 9 月，張志毅帶隊到達瀋陽。一到東北，他便奔走各地，與各階層人物接觸瞭解情況，把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充分分析後向上級做詳細彙報，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炮校全體幹部、學員分散到東北各地，收集敵人散落在各地、被破壞的裝備；儘快建立自己的兵工廠，修理、改造、維護收集起來的各種火炮和裝備。

曾為炮校學員的杜子順回憶說，1947 年 2 月 22 日，炮兵部隊奉命配合東北野戰軍六縱十七師殲滅城子街守敵。在戰鬥過程中，通過集中火力，實施主要突擊，炮兵部隊破壞了敵方十多個地堡，及時支援了步兵的進攻，結果全殲城子街守敵。事後，步兵齊贊，張志毅的炮兵打得好。

1948 年遼瀋戰役的關鍵一役——錦州攻堅和塔山阻擊戰中，東北野戰軍以 600 門火炮（9 倍於守軍的數量），支援步兵順利完成攻堅任務。而在破解國民黨軍在塔山實施的“立體攻擊”中，解放軍首次與敵進行了炮戰。在攻打天津戰役中，解放軍又以 10 倍於國民黨軍的 1230 門火炮，為攻克天津立下頭功。平津戰役勝利後，張志毅還參加了指揮解放太原、新鄉的戰鬥。

平津戰役前，朱德總司令視察平津戰役的部署情況，對炮兵的部署非常不滿意。天津前線指揮部總指揮劉亞樓馬上打電話找來一個人，重新部署炮兵陣地。在炮兵強大的火力支援下，解放軍只用了 29 個小時就攻克了天津（中央原定的時間是 3 天）。劉亞樓所找

之人就是張志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志毅任東北軍區炮兵參謀長、中南軍區炮兵參謀長兼任牡丹江炮兵第一訓練基地司令員和鄭州第四炮兵學校校長、書記。1950 年，他肩負起炮兵赴朝作戰改裝訓練的任務，先後改裝了 20 多個團。在抗法援越戰爭中，他擔任中國軍事顧問團炮兵顧問，為越南訓練了大批炮兵幹部。回國後，他歷任廣州軍區炮兵副司令員，濟南軍區炮兵代司令員、副司令員、顧問。1964 年，張志毅晉陞為少將。

兒子張欣說，十年浩劫期間，父親受到迫害，被強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蒙受了不白之冤。那時候，時任五機部副部長的朱光已被打倒，因病在北京醫院走廊裏掛滴流，正巧張志毅出差到北京去看他。看到此景，張志毅二話沒說，就把身上所有的錢及糧票都掏給了他。朱光每提起這件事，就感慨萬千：“那時他也在挨整，但他不怕，還幫助別人。”

1981 年 8 月，張志毅離休。1998 年 3 月去世。

當過插隊知青，曾是最早的“海歸派”

1946 年 11 月，張德江出生在遼寧台安縣桓洞鎮一個叫做十八戶屯的小地方。說起桓洞鎮，不得不提到另一個在二十世紀聞名中國的大人物——少帥張學良。張學良出生在桓洞鎮鄂家村張家窩堡屯，並在此度過童年。而張德江的祖居地祁木村十八戶屯，距張家窩堡衹有不到五公里。

不過，雖然張德江的出生地是遼寧台安，但他卻是在吉林長春長大成人的，最後曾當過吉林省的“封疆大吏”。因此，張德江一直把吉林稱為自己的家鄉。

長春市第四中學是張德江的母校。至今該校的簡介還寫著：歷盡百年滄桑，經過百年沈澱和積累的長春四中擁有光榮的傳統和豐富的文化底蘊，創造了眾多驕人的業績，培養了一大批國內外知名的優秀人才，為長春市乃至吉林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同志即畢業於長春四中。

不過，始建於 1907 年（清光緒 33 年）的長春四中，前身是長春市西五馬路的一所私立小學校，1955 年遷址至凱旋路 12 號，1958 年更名為長春市第四中學，該校也是鐵北地區唯一一所市教育直屬完全中學。

在張德江在長春四中就讀時，該校衹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學，直到現在，長春四中還在爭取有關方面在鐵北地區辦一所重點高中。

也許是因為在 1953 年秋季小學招生時，因為未滿七歲而被迫推遲至 1954 年入校，張德江高中畢業時正巧就趕上了“文革”大學停止招生。1968 年，開始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太平大隊當“插隊知青”。

2008 年 3 月，已經當上國務院副總理的張德江在兩會期間對吉林省代表說：“吉林是我的家鄉，我始終牽掛著吉林，時時刻刻關注著家鄉的發展變化。”“上次我回吉林省的時候，沒有去延邊，我 1968 年插隊在那裏，在延邊工作了 22 年，延邊所有的村我都去過，我對延邊充滿了深厚的感情，希望有機會能迴延邊看看。”

張德江在長春市第四中學讀高中時，就是學生會主席，1968 年 11 月到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太平大隊“插隊落戶”，他擔任“集體戶”的“戶長”後，即要求生產隊按政策規定給分配自留地。當地“知青”和農村幹部很佩服他的組織才幹和對周圍人群的凝聚力。

張德江在插隊差一個月滿兩年時，被在縣委工作的李德洙等人發現，從有限的“提幹”名額裏擠出一個給他，成了汪清縣革命委員宣傳組幹事，工作了三個月便被發展入黨。

李德洙是汪清縣的朝鮮族人，擔任過縣委常委兼團縣委書記、中共縣委副書記等職務。“文革”結束後，他又擔任過團中央委員、團省委副書記兼吉林省青聯主席，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書記、州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1988 年 1 月當選副省長，1990 年 11 月調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1992 年 8 月，出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1998 年 3 月在朱鎔基內閣中任國家民委主任。張德江能被提拔為國家幹部，進入汪清縣革命委員會工作，全靠李德洙的推薦提拔。



張德江當延邊州委副書記的照片（左二）

在汪清縣工作不到兩年，張德江趕上了部份恢復大學招生。當時實行的是推薦入學，跨進大學門，就叫作“工農兵學員”。李德洙再次扮演伯樂角色，推薦張德江於 1972 年 5 月進入延邊大學。學習期間他擔任了班裏的黨支部書記，在三年學制的最後一個學期即

被決定留校，1975 年 1 月被任命為朝鮮語系黨總支副書記，1977 年又被提拔為校黨委常委和校革委會副主任。

1978 年 5 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正式訪問朝鮮，雙方簽訂合作計劃內容之一便是互換留學生。當年 8 月，張德江被選中派往朝鮮最高學府金日成綜合大學經濟系學習，同時擔任中國留學生的黨支部書記。在朝鮮接受了訪朝的鄧小平的接見。

1980 年 8 月，張德江學成回國，在延邊大學官復原職。研究中國高層人事的專家高新說，張德江不但是十六屆政治局裏唯一一位“插隊知青”，而且還算得上是一位“海歸派”。

張德江在朝鮮學到些什麼，讓人好奇。朝鮮的經濟體系比中國更僵化，其經濟理論更陳腐。後來在張德江主政廣東時，果然就有人將他的言行追究到他在朝鮮的留學，稱其“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當今世界最為邪惡和無賴的國家留學過”，“在廣東政壇和廣東民眾頭上耀武揚威、我行我素”。

1983 年 3 月中旬，張德江在這時已經昇任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委書記的李德洙推薦下，擔任延吉市委副書記，隨後當選為吉林省委候補委員，一年後張德江又被提陞為州委常委，仍兼延吉市委副書記。又過了一年後，1985 年 4 月，李德洙又提拔張進入延邊州擔任副手。從此之後，張德江被中共高層看中，加速提拔，超過了他的恩師：1986 年被越級提拔為民政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意味著他是第一副部長，當時他還不滿 40 歲。據高新瞭解，這次提拔，吉林省的幹部認為，是時任總書記胡耀邦聽取張彙報如何處理朝鮮人向吉林省延邊地區入境不歸的問題，認為他是個人才。

在江澤民上台後首次訪朝後，1990 年 10 月，即安排張德江回到吉林擔任省委副書記兼延邊州委書記。離開北京前，江澤民接見張德江，希望他把延邊建成少數民族“模範自治州”。張回到吉林

延邊第三個月，江澤民即前往吉林考察，把延邊作為出巡的重要一站。1992 年，張德江被安排為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

1995 年 6 月，49 歲的張德江昇任吉林省委書記。1997 年，他在中共十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次年元月，又接替何竹康的省人大主任職務。不過，才七個多月，他即奉命調任浙江接替李澤民的省委書記職務。

主政廣東五年，功過參半毀譽參半

2002 年，張德江達到他政壇生涯的又一個高峰。他在 56 歲生日的那一天，率領著浙江省出席中共十六大的代表團專機飛到北京，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剛剛為浙江地位上昇高興還不到一個星期，張德江即在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賀國強陪同下，到廣東接替李長春的廣東省委書記職務，人們才知道，政治局的這個席位，是屬於廣東，而不是浙江的。習近平接替張德江擔任了浙江省委書記。

這時，人們放眼中國政壇，發現除了所謂"上海幫"，儼然有了一個"吉林幫"。高新 2003 年初曾經在其書中列過一個不完全的名單，列出江澤民主政時期陸續從吉林省提拔至中共中央、國務院，或調昇其它省份擔任黨、政一把手的官員，洋洋大觀。其中有：

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前吉林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前吉林省副省長），朱鎔基內閣的國務委員王忠禹（前吉林省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兼國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前吉林省副省長），農業部部長、四川省委書記，十七大後為中央統戰部長的杜青林（前吉林省委副書記），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吉炳軒（前吉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公安部副部長趙永吉（前吉林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

高新指出，這些人幾乎全都是高狄在主持吉林省委工作時提拔的，而江澤民之所以器重出自吉林省的幹部，據分析，原因之一，是因為 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中，吉林省委表現得最穩定，趙紫陽下台後，吉林省委一班人及當時已從吉林調至國務院的張德江等人，最及時表態擁護江澤民。所以當宋平接到鄧小平等元老指示，派人接管《人民日報》時，毫不猶豫地選中高狄。

張德江在廣東主政將近五年，功過參半，毀譽參半。

這五年，廣東的經濟繼續高速發展。在十七大上重新當選連任政治局委員之後，張德江在全國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第三次現場會議上不無自豪和炫耀地說，廣東的經濟總量繼 1998 年超過新加坡、2003 年超過香港之後，2007 年將超過台灣。

張德江說，2006 年，廣東省生產總值 26,204 億元，約佔全國的 1/8；來源於廣東的財政總收入 5,122 億元，約佔全國的 1/7；外貿進出口總額 5,272 億美元，約佔全國的 1/3。

他還列舉說，2007 年 1 到 10 月廣東省完成生產總值 24,466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14.7%；來源於廣東的財政總收入 6,366 億元，比去年增長 50.6%；外貿進出口總額 5,133 億美元，增長 21.1%，預計廣東 2007 年生產總值有望達到 3 萬億元，財政總收入有望突破 7,000 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有望突破 6,000 億美元。

張德江這次講話，頗有點借機在即將告別之際盤點自己五年政績的意味。他說，目前，廣東擁有的中國馳名商標、中國名牌產品和中國世界名牌產品的數量均居全國第一位。但是，我們也深知廣東的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並認真地加以解決。

61 歲的張德江，是十六屆中央政治局中倒數第二年輕的成員，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成員中也還是算比較年輕的。如果論抓經濟，人們肯定他在廣東五年任內表現良好，特別是他在對外開放的交往中積累了豐富經驗。2007 年 6 月他率領代表團訪問非洲四國，隨同出訪的廣東省經貿代表團簽下總金額達 34.45 億美元的各類合同，400 多人的龐大企業家隊伍滿載而歸，給他的政績又加了分。

十七大後張德江在北京面對香港記者詢問時，表示"永遠忘不了廣東"，透露了離粵的口風，也不無躊躇滿志之意。

張德江雖然在一般人眼中被視作江澤民所信任和提拔的人，但是他也並不忽略與黨內其它派系的聯絡。就在張德江離粵到京之後，一本頌揚已故中共領導人、現任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的著述《習仲勛主政廣東》，2007 年 12 月 19 日在廣州舉行首發式。習仲勛夫人齊心介紹該書出版經過時表示，2004 年 2 月，她曾致函張德江，希望廣東省委支持習仲勛傳記下卷廣東部分的編撰，隨後 4 月 1 日，張德江在珠海會見齊心時，承諾大力支持。這本書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張德江為該書作序。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對該書的出版作出批示。與會者中還有胡耀邦之子、原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胡德平，原公安部副部長朱恩濤等習仲勛的生前好友。

據與會人士回憶，習仲勛在廣東省委書記任內曾經講過，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上去了，會超過香港。此話引起中央的關注，鄧小平因此非常支持廣東的改革開放。

"驅張運動"："張德江不倒，廣東人不安"

張德江曾經表白，自己中學時代即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和中國歷史教材中汲取政治營養，從小立志要象岳飛一樣精忠報國。但是他自己不會想到，居然在廣東工作幾年之後，廣東民間會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

"驅張運動"的高潮是在 2005 年底到 2006 年年初，尤其是在 2005 年毛澤東誕辰日的 12 月 26 日，人們藉題發揮，在談論毛澤東 86 年前在湖南發動的那場"驅張運動"時，將當年那句"張敬堯不倒，湖南人不安"的口號，改成"張德江不倒，廣東人不安"，直斥有"南天王"之稱的這位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的畢業生，給廣東人民帶來的不是"輝煌政績"，而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甚至有人不無誇張地描繪為"廣東開始了災難性歷史的新紀元"。

他們對比說：張敬堯和張德江都姓張，一個是將近百年前的北洋皖系軍閥，湖南督軍兼省長，一個則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兼廣東省委書記，是獨霸一方的黨閥。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以殘暴統治著稱，以鎮壓和強悍出名。但是，當年的張敬堯雖手握重兵，卻不敢輕易對湖南學生運動和各界的示威抗議民眾進行武力鎮壓，最後終於在 1920 年黯然下台，被逐出湖南。毛澤東當年就是靠組織和領導"驅張運動"出名，奠定了他後來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

而張德江在其主政的廣東省雖然頻頻出狀況，無論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不斷出現震驚全國和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給"胡溫新政"帶來了一個又一個的麻煩，但張德江依然陞官有望，春風得意。他們認為，縱觀張德江在廣東的"德政"，可以發現正是由於制度的原因，由於沒有制約權力，由於江澤民對他表示"放心"，才導致廣東的災難接踵而至。

當時有文章詳細列舉了張德江來到廣東後的"劣跡"——

張德江到任之後面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2002 年 12 月在廣東出現的"怪病"，即後來令全世界為之驚恐的"非典"（SARS）。

張德江主政下的廣東當局嚴密封鎖消息，嚴禁當地媒體報道疫情，也不向香港方面通報情況，錯過最佳防疫時機，導致病毒攜帶者將致命瘟疫帶到香港的酒店，進而擴散到全世界。

張德江作為廣東最高領導人，對"非典"的傳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給廣東的媒體戴上"口罩"，造成難以彌補的巨大災難。但是，張德江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在他的運作下，廣東省官員不但沒有任何過錯，反而成了抗擊"非典"疫情有功的省區，受到表彰。而曾經對"非典"疫情進行報道的媒體，尤其是廣州《南方都市報》則成了整肅對象，他要趁機把這些不聽話的媒體和不聽話的記者和編輯趕盡殺絕，以免留下後顧之憂。

在張德江的授意下，廣東省和廣州市有關部門在2003年中開始整肅在廣東省和中國內地具有相當影響力、也是最早報道"非典"疫情的廣州《南方都市報》。他們以"侵吞公款"的莫須有罪名，首先抓捕《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喻華峰，指他根據公司有關合同和規定、合法獲得的十萬元獎金"非法"，還拘審該報近十名編務人員，之後又拘捕總編輯程益中，製造了"南都報事件"，遭到全世界同聲譴責。

當局指示廣州市東山區法院判處喻華峰12年有期徒刑，後來在喻上訴後改判八年，且不接受喻及其家人申訴，程益中在海外輿論的壓力下獲釋，免於起訴，但實際上工作權利被剝奪。張德江主政下的廣東省有關當局對《南方都市報》的整肅受到黨內有識之士的批評，包括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在內的不少前高官，就對廣東當局的做法提出批評，異乎尋常地公開呼吁釋放被捕的有關媒體從業員。任仲夷甚至公開告訴張德江，不少法學家都認為"南都案"是個冤案，希望當局認真檢討有關案情，糾正這個錯案。



張德江和南方日報負責人座談

事實上，《南方都市報》遭到張德江主政下的廣東當局打擊，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張德江到任廣東四個多月時，就在他正為"非典"事件困擾的當口，《南方都市報》報道了另外一件震驚海內外的新聞："孫志剛事件"。

剛剛踏出大學校門不久的孫志剛，2003年2月24日到廣州一家服裝公司工作，暫住朋友家中，還來不及辦理暫住證。3月17日晚上，當他獨自逛街時，由於沒帶身份證，遭到廣州天河區黃村鎮派出所收容。雖然當晚他的朋友帶著身份證和錢到派出所保他出來，但沒獲批准。第二天再保，還是不准，結果第三天，即3月20日中午，孫志剛便被打死在廣州的收容站。

孫志剛死後，其父親和弟弟從湖北老家趕到廣州，但在張德江主政下的廣東，從派出所到公安局，從檢察院到法院，沒人理會他們的哭訴，將近一個月後的4月18日，自費4000元，才完成法醫鑒定，但還是沒人理會。家人只好訴諸於媒體，由《南方都市報》將事件公開。但這恰恰又惹起了張德江惱怒。報復便是順理成章的了。他當時的一句"名言"："我沒想到廣東的媒體這麼難管！"

也被口耳相傳開來。

廣東知情人士說，2005 年 7、8 月間梅州興寧發生兩次煤礦透水事故，導致 139 名礦工死亡，是張德江到廣東之後面臨的最大考驗，他是怎麼繞過去的？

梅州興寧是在 2005 年 7 月 14 日首先發生一起煤礦透水事故，16 人死亡。但調查還沒有結束，遇難礦工屍骨未寒，8 月 7 日，興寧再次發生礦難事故，導致 123 名礦工遇難。對於這起特大礦難事故，北京國務院有關部門派出調查組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發現，礦難頻頻發生的原因是官煤勾結的結果。因在興寧發生礦難的煤礦，投資者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政府的官員，當地有一個警察，在煤礦就有 2000 多萬元的投資。

這背後肯定隱藏著更大的政府官員腐敗。對此，張德江要繞開中央，不希望由此挖出更多名堂影響政績。據稱他在給中央的報告裏聲稱“廣東省有能力處理好這起礦難事故”，他要主導調查和處理，“自清門戶”，好棄車保帥。在他的主導下，衹有興寧市長、市委副書記曾祥海等 22 個中低層政府官員受到最高為“行政撤職和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省級官員中，代他受過的是副省長游寧豐，也只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

數起群體事件，鎮壓維權導致流血

多年種下的禍根終於爆發。2005 年 7 月，就在省會城市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土地幾乎已被政府賣光的村民，發現村官在出賣土地等專案上涉嫌貪污和帳目不清，決定根據有關法律發起罷免村主任陳進生的動議，獲得 800 多名村民簽名支持，超過罷免要求的法定人數。但村民的要求卻引起當局恐慌，出動包括近千名特

警在內的人員，阻撓和恐嚇，並以黑社會手段阻攔和毆打前往太石村的媒體記者和律師。當局並多次出動防暴警察企圖搶走村財務室的賬本，因為一旦帳目公開，或選出村民民選的村主任，多年來被侵吞的土地款和數以千萬計的混亂帳項，都將暴露無遺，不但涉及到村官，更將牽涉到鎮、區、市，甚至是省政府官員。這是涉及到官員生死存亡的問題。

在危機感的驅使下，在張德江支持下，番禺區政府的暴力鎮壓逐漸昇級，最多的一天出動了 63 部警車、近千名鎮暴警察和治安隊員，動用高壓水龍頭向守護村財務室的高齡女村民噴射，拘捕了 48 名村民和多位幫助村民的維權人士，而村民自己選出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在當局的壓力下，不久紛紛辭職，支援罷免動議的部分簽名村民，也不得不撤回簽名，一場村委會選舉就這樣宣告失敗。



太石村村民踴躍簽名罷免村官

張德江似乎又“贏”了一個回合。他更向北京中央報告，太石村事件有“外國勢力插手”。

但“外國勢力插手”的神話無法用於隨後發生的汕尾武警開槍濫殺民眾事件。這一起震驚國際的事件，被稱為“小六四事件”，是中國當局又一起直接向民眾開槍的惡性事件，當局後來證實最少有三人被殺害，八人受傷，其中三人重傷。但據香港《亞洲週刊》報道，被槍殺的民眾最少有 14 人，50 人受傷。

汕尾武警開槍事件源自當地東洲村民眾不滿土地被徵用建電廠之後賠償不足，村民認為至少有兩億人民幣的耕地補償款沒有發到村民手中，可能被當地官員貪污，因此群起衝擊電廠。他們在電廠工地設置路障，封鎖道路，同時希望與政府談判，但廣東省的律師事務所由於受到有關部門的警告，不願代理民眾與當局溝通。暴力抗爭在當局於 12 月 6 日中午出動五百多名武警和警察之後發生。武警拆毀村民的路障和竹棚並抓捕了數名民眾，引起民眾激烈反應，武警首先朝天鳴槍，繼而放低槍口，向人群射擊，終於釀成了這起重大流血惡性事件。

東洲村民抗爭和太石村事件一樣，都難以幸免地被廣東官方定性為“有組織的非法行動”，東洲村的部分維權代表事後被冠以莫須有罪名送進深牢大獄。但隨著民眾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東洲慘案之後廣東更是抗爭不斷，警民衝突也是接二連三。

廣東知情人士說，張德江給廣東人民一個又一個的震撼。2005 年底，張德江又給廣東人民送上一份“盛大的聖誕禮物”：根據廣東當局 12 月 20 日的宣佈，廣東北江流域日前由於沿江企業的超標排污，導致北江水質遭嚴重鎘污染，使沿江一帶韶關、英德和清遠三市飲水受到極大威脅。當局宣佈中斷三市自來水供應，引起老百姓的驚恐。

當局是在污染事件發生之後故伎重演，嚴密封鎖消息長達五天，導致數百萬民眾在這段時間繼續飲用受到嚴重污染的江水，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最後掩蓋不住才公佈消息說，北江高橋段的江水受到鎘污染，超標高達正常值的十倍。當局確定北江水的嚴重鎘污染來自韶關冶煉廠在檢修期間排放鎘污水所致，該廠是上市公司中金嶺南的下屬企業，擁有兩套冶煉生產設備，年產鉛鋅達 24 萬噸。

當局還承認，有關部門是在 12 月 15 日這天發現污染狀況，污染是何時開始則沒有明確交待。當地一位退休工程師告訴海外媒體，北江水受到污染並不是現在才有，此次污染事實上是危機的總爆發，沿江百姓長期以來就一直飲用受到污染的江水，“超標是肯定的，衹是這次超標達十倍以上，再不處理就要死人”。

據悉，廣東知識界和民眾廣泛運用包括互聯網、寫信和上訪等各種方式，向中央各個部門揭露、舉報，指出張德江在廣東的表現明顯和胡溫所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理念背道而馳，指出，只重經濟而拒絕政治的改革注定要釀造“畸形社會”，在權力被官員徹底壟斷的今天，空前的貧富懸殊狀況背後孕育著民眾難以估量的血淚。

在海內外巨大的壓力下，張德江不得不有所表示。在東洲慘案發生後，他於 2005 年 12 月 23 日在廣東省委九八次全體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發出了“三句狠話”：“今後，徵地手續不齊全、不完備的項目，不能開工；沒有與農民就徵地補償民主協商、達成協定的項目，不能開工；徵地補償款沒有兌現到農民手裏、各種補償不到位的項目，不能開工。”在 2007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宣稱應“善待媒體”。自那時起，廣東媒體的新聞自由度似乎有所擴大，廣東兩份報刊率先報道吳儀即將退休，以及習近平將被任命為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消息。

但是，其治下的廣東省仍然是中國境內因強制徵地而導致警民衝突的高發區。就在2007年，廣東潮州市龍灣村村官私賣土地資源和破壞生態導致了無數失地農民集體維權，2月4日，當地警察非法抓捕維權代表，村民去鎮政府要人時，遭到黑社會勢力暴力襲擊，上百人挨打、多人受傷。

2007年，一度盛傳張德江被列為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但在北戴河會上被刷掉云云。消息人士稱，這完全是謠傳：張德江在廣東的政績飽受爭議，不可能晉陞為政治局常委。

留給廣東的"禮物"：爛尾經濟

2002年，在習近平接張德江的棒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曾擔心當地出現"爛尾經濟"；當張德江離開廣東時，接任的汪洋同樣有爛攤子要處理：企業集體出走珠三角，成為2007年廣東最引人矚目的經濟"頭等大事"。亞洲時報在線凡心2007年12月18日報導，截止11月份，張德江留給廣東的"禮物"：珠三角有上千企業倒閉或外遷，觸動地方政府的神經。

報導說，近兩年來，房價高企、土地電力短缺和工人供不應求的幾大"硬傷"，導致廣東的企業集體遷移。有人說，勞工緊缺的問題本可通過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加以緩解；可遺憾的是，在資方提高工資吸引勞動力同時，有地方政府卻對工人群眾打起"圈錢"的收費管理牌，落井下石的"政策反做"催化了珠三角製造業走向危機中。

中國經濟整體發展導向的變化和產業轉型昇級已不可逆轉，長



張德江與汪洋

期從事低附加值、高污染的珠江三角勞動密集型企業更是首當其沖。《南方都市報》報道，由於受到土地、環境等"硬"條件的制約，一大批深圳企業有了集體"遷徙"的打算。來自深圳貿工局最新的報告更證實，到2007年6月，僅羅湖、南山、寶安和龍崗四區，已經和計劃外遷的企業多達522家，其中已經外遷的499家，工業企業外遷已不僅僅是少數行業個別企業的自發行為，而是呈現了有組織、較大規模的集體行動。

無獨有偶，央視《經濟半小時》2007年12月10日播出"珠三角上千企業倒閉調查：成本上昇致企業外遷"，稱在廣東約五六千家鞋廠當中，目前大中型廠已有一千多家關閉。其它像製衣、玩具加工、電子加工等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都出現同樣狀況，由於企業營運成本開始攀高，有的已經倒閉，更多是被迫遷移，輝煌一時的珠三角製造業，如今面臨著巨大的變化。

凡心的報導說，實際上，企業紛紛出走珠三角，並不是匆促的決定。以深圳為代表的廣東製造業龍頭城市，早在2006年6月，一項由官方發佈的企業外遷調查表明，就有119家工業企業已經或計劃外遷，涉及工業總產值90億元。其中機械、玩具、儀器儀表、塑

膠四個行業外遷企業數量較多，合計佔外遷企業總數的58%。部分遷往省內東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多數則往省外湖南、江西、江蘇等地遷徙。2007年上半年，由深圳六區政府、行業協會及部分行業龍頭企業牽頭在異地簽約設立的“深圳產業轉移園”就多達20多個，情況頗為尷尬。

企業的集體外遷，導致2007年1到5月份，深圳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增加值增幅比前一年同期回落3個百分點。而在全國大中城市里，深圳工業增長水平倒數第二，儘管深圳也希望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生產環節和有污染的企業可以轉移出去，衹是沒想到，在這場遷徙大潮中，一些高科技企業和傳統優勢產業也流失出去。

深圳企業外遷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據官方對32家工業總產值上億元的外遷企業調研所得，外遷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無法滿足”，選擇該項的企業有20家，佔62.5%；排在第二位的則是“深圳的房地產價格/廠房租金太貴”，選擇該項的企業有16家，佔50%。

深圳的工業用地短缺是關鍵。而在另一個製造業龍頭城市——東莞，勞動力的不足卻成為企業的致命傷。據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在珠三角加工製造企業最集中的東莞，幾乎每家工廠的門口都貼著常年招工啟事。2002年東莞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是450元人民幣（下同），現在是690元，五年上漲了50%多，而實際上，現在珠三角工人的工資已經遠遠高於這個數字，大約在1000元到1500元之間不等，但即便如此，企業招工依然困難。

亞洲時報在線披露，有一種意見認為，廣東勞動力大軍的轉移，雖然有國內地區經濟的強勢崛起所造成的客觀因素，但“歸根結底，地方政府才是罪魁禍首”。據透露，就在2007年6月10日，東莞市厚街鎮政府發佈了一張收費通告，收“流動人口調配費”，

共115元，暫住證費35元。一邊是企業哀聲嘆氣抱怨招工難，一邊卻是地方政府對前來打工的外來人，不遺餘力搞“圈錢”小花招。號稱為廣東最大服裝生產基地的東莞虎門，2007年以來因很多服裝廠招不到工人而關門大吉，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不能因應配合是關鍵。很多紡織品企業已迫於不斷上漲的原材料價格、水電費用、廠房租金等等，把工廠遷到粵北的韶關，河源，以及湖南，江西等偏遠地區。

《羊城晚報》報道說，緊鄰廣東的江西贛州市，就是廣東和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提高後，向勞動力更便宜地區轉移的一個收益地。在贛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落戶的外來企業，目前就有200多家，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據贛州華堅國際鞋城負責人塗火介紹，在贛州，人均月工資也比廣東東莞要便宜300元錢左右，水電成本也要低不少：贛州每度電衹有0.68元，東莞是0.9元多；贛州用水每噸是0.9元，東莞則是1.5元。

在中國經濟的版圖上，珠江三角洲曾獨領風騷多年，然而，持續多年高速增長之後，這個製造業重地最近幾年卻接連遭遇“勞工荒”、“電荒”、“油荒”，土地、勞動力、能源價格都出現大幅上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張德江主政五年，並沒有重視和有效解決這一難題，那麼他是否有能力解決更複雜、更艱鉅的問題？許多人在心裏畫上一個問號。

傳張德江也涉及中國首富黃光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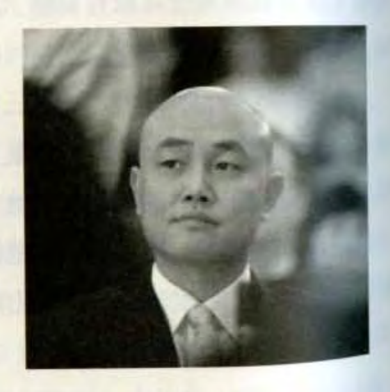
2008年10月23日，中國首富黃光裕遭公安機關拘查，其起因包括涉嫌“操縱市場”等。2009年4月28日，有消息稱其在北京看守所自殺，未遂。

就在這位"中國首富"被捕兩個月後，新華社 2009 年 1 月 19 日報道說：針對媒體有關報道，記者向公安部有關人士核實，公安部在偵辦黃光裕經濟案件中發現公安部部長助理、一級警監鄭少東、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北京直屬總隊總隊長相懷珠存在違紀違法嫌疑。目前，鄭少東、相懷珠二人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新華社還公佈了鄭少東簡介：鄭少東 1958 年 11 月生，廣東潮陽人，與黃光裕系同鄉。鄭畢業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在職研究生學歷，擁有 33 年黨齡與 34 年工齡。

來自廣東警方的消息稱，鄭少東 1980 年從警，長期從事刑事偵查工作，曾組織指揮偵破"東星輪"千萬港元大劫案、張子強特大暴力犯罪團夥案、"長勝輪"特大海上搶劫殺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屢屢立功，曾榮獲個人一等功等榮譽。

在廣東省公安廳，鄭少東歷任刑警總隊副總隊長、刑偵局局長，後由廣東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一職調任公安部經偵局局長。2005 年 4 月，鄭晉陞為公安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現為一級警監警銜，在公安部警號編製為 000010。



黃光裕檔案照

在黃光裕被抓半年後，新華社 2009 年 4 月 16 日報道，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向官方媒體證實，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因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陳紹基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因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

據悉，陳紹基是 4 月 11 日前後被有關部門調查的。知情人士透露，陳紹基被調查，與正在接受調查的原國美電器董事會主席黃光裕，原公安部部長助理、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鄭少東有所關聯。根據黃光裕案、鄭少東案相關涉案人供出陳紹基違法違紀的線索，相關部門調查了陳家族的資產，發現有巨額資產來源不明問題；且初步調查出陳紹基涉嫌受賄，由其家屬收取受賄資金。

王華元系安徽宣城人，曾長期在空軍服役。1996 年後，王華元開始在廣東省相關政府部門任職，並於 1998 年至 2006 年長期擔任廣東省紀委書記。2006 年，王調任浙江省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王華元是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紀委委員。

有媒體指出，陳紹基和王華元涉案有關聯。陳紹基和王華元的仕途自 1996 年開始有交集。當年，王華元由廣東省文化廳副廳長調任省紀委副書記，此時陳紹基擔任廣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二人在政法戰線上的工作關係持續到 2004 年。當年 2 月，陳紹基由主管政法工作的廣東省委副書記選舉為省政協主席。王華元接任了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一職。

據海外媒體披露，鄭少東案涉及到兩個後台，一個是李長春，一個是周永康，當初正是周永康力主把鄭少東調入公安部，背後李長春做了順水人情。而這兩個人，都是江系人馬。李長春 1998 年 2 月到任，5 月就提陞陳紹基為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提拔王華元為廣東省委常委、紀委書記。

出乎意料的是，此案還波及到政治局另一個江系人馬——張德江。張德江 2002 年 11 月到任，繼續發揚其前任與廣東官員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風。力主陳紹基 2004 年補選為廣東政協主席。現在有人放出陳紹基是花了 1000 多萬買的政協主席的傳言，矛頭其實直指張

德江和賈慶林。也正是在張德江的任內，王華元傳出腐敗傳言，本來要立案偵查，但中紀委考慮到自己的形象，把案子壓了下來，畢竟一個省紀委書記出醜對整個紀檢系統的形象是個巨大打擊。

在張德江運作下，王華元於2006年11月轉任浙江省委常委、紀委書記。浙江是張德江的老地盤，調過去也正好為他守住後院。隨後又有可靠消息稱，中紀委正在嚴查王華元，要他戴罪立功，一是要他揭發浙江高層官商勾結的情況，二是要他揭發廣東過去的金融問題。

在傳出張德江可能也涉及黃光裕案後，中紀委在6月8日證實，原深圳市長許宗衡已被雙規。隨後，《中國經營報》、《財經》報道，日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將其牽連入調查範圍的直接原因，就是在黃光裕案中牽扯爆發出陳紹基案。據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許宗衡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許宗衡1996年8月，調任中共深圳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兼深圳市行政學院、社會主義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2000年1月，昇任中共深圳市委組織部副部長。2000年5月，昇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部長。2003年8月，任深圳市副市長、中共黨深圳市委副書記。2005年6月，任深圳市市長。

許宗衡落馬後，有海外評論稱，打擊許宗衡，目的是揪出黃麗滿。2001年至2003年，江澤民的心腹黃麗滿任職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期間，頂住壓力大力提拔了許宗衡，先後任職市委常委、市委組織副部長、部長。

但也有評論指出，許宗衡一路晉陞時，正是張德江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可以說，許是在張德江的眼皮下獲得提拔的。

新一輪國進民退潮，張扮演關鍵角色

到了2009年下半年，歷史似乎來了一個輪迴。曾經在中國諸多產業中充當領頭羊的的民營企業紛紛"臣服"於國有企業。

山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與日照鋼鐵公司之間持續了近一年之久的並購案塵埃落定，前者以現金出資的方式，佔67%的股權，如願吞併後者，完成一家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的並購。更早些時候，中糧集團和厚樸投資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二者分別持有70%和30%的股份）入股蒙牛乳業，成為其第一大股東。而在山西，在政府的幫助下，國有煤炭大企業正在"收編"那些屢發礦難的私有小煤礦。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發表的評論文章認為，這並非孤立的幾個個案。在被視為中國國民經濟"晴雨表"的能源、鋼鐵、航空、地產等行業，正在上演著新一輪"國進民退"的大戲。如同此前的"國退民進"一樣，重新戴上"紅帽子"事件正撩撥著人們那根敏感的神經。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這對矛盾一直貫穿於新中國發展的60年曆史中。1949年以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政府全面實施了國進民退，建立了計劃經濟的模式。在中國改革開發的30年中，非國有經濟逐漸"蠶食"國有經濟的地盤，國有企業不再一股獨大，最後形成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

但在這30年中，"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一直是交織其中，"政府和市場不斷爭奪制高點的過程。"美國人丹尼爾?耶金這句話足已概括中國改革開放史的實質。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正是一部"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相互較量的歷史。

自1979年以來，中國體制轉軌先是中央"放權讓利"，再是多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而非公經濟的地位是在不斷得到承認又被否

定的螺旋式過程中得到確認。我們可以簡單的梳理一下：1978年至1989年中，“民進”禁區被逐漸打破，個體經濟獲得迅速發展、私營經濟得到認可。1989年至1991年，是清理整頓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民進”出現收縮，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民退”現象。在這三年時期，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停滯，甚至出現了明顯下降的趨勢。有的私營企業主擔心成為第二次被改造的對象，乾脆把企業交給集體，交給國家。有的則積極找靠山，想方設法戴上集體的“紅帽子”，以作掩護。“紅帽子”企業成為那一特定時期的獨特產物。

1992年至2004年，這是一個“民進”重新抬頭並且大發展的年代，但也存在較大波動。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無論在政策上還是發展中都有巨大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民營企業甚至成為不景氣的國有企業的“拯救者”。雖然其中有“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但從總體上說，民企通過各種方式並購了處於破產邊緣的國有企業，得以發展壯大，並由此開始了“民企重型化”的歷程。

2003年時，還籍籍無名的地方鋼鐵大亨戴國芳站在長江邊上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鐵本要在三年內超過寶鋼，五年內追上浦項。”而沙鋼在2002年收購了歐洲老牌鋼鐵公司蒂森克虜伯旗下的一家鋼鐵廠，並且將之全部打包運送回國內，六年後，這家企業進入了《財富》500強排名。浙江人郭廣昌購買了另一位民營鋼鐵大鱷張志祥的公司唐山建龍30%股份。他們還同時在寧波建立寧波建龍，意欲把寧波建龍建設成國內最有競爭力的鋼鐵廠之一。可以說，這段時間，是中國民營經濟的“黃金期”。

但2004年之後，形勢又急轉而下。以“鐵本事件”為標幟的宏觀調控，讓民營經濟遭遇重大打擊，“國退民進”的趨勢逆轉，“國進民退”開始冒頭。民營經濟的代表德隆系、鴻儀系、湧金系、明

天系、格林科爾系、青鳥系、斯威特系、順馳、托普都爆出資金鏈斷裂消息。其中，鐵本的戴國芳、德隆系唐萬新、鴻儀系鄢彩宏、格林科爾系顧雛軍都身陷囹圄。

此時國有企業反身成為民營企業的“拯救者”：濰柴投資接手湘火炬，中國非金屬接手天山股份，重慶渝富接手ST重實，海信空調接手科龍電器，四川長虹接手美菱電器等等。

到了2008年下半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讓民營經濟資金鏈面臨斷裂的危險。雖然2009年前幾個月銀行信貸已達天量規模，但是民營企業卻從中收益無幾。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刺激經濟四萬億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額而“野蠻成長”，迅速“巨無霸”化。

在中央政府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資金大都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上，這無疑是國有大型企業的傳統“地盤”，民營企業難以涉入其中。另外，央企得到了特別的照顧，就在民營航空公司因為資金問題面臨破產的背景下，同樣巨虧的國有企業東方航空獲得政府70億的財政註資，其他幾家國有航空公司也不例外。在資金緊張的房地產行業，央企背景的房地產企業陸續獲得證券市場的支持。6月底，中建股份IPO獲得證監會審批，融資額高達426億元人民幣；7月1日，保利定向增發80億元的方案也獲得證監會批准，華僑城、中糧、招商等央企背景的房地產企業也緊隨提出各自的重組和融資方案。

《向政府施加更大壓力，反“國進民退”聲浪見漲？》英國《金融時報》的撰文指出，

中國商界和學術界名人正在就過去一年中一些經濟領域出現的“再國有化”趨勢，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

得益於政府指導下的銀行信貸的空前擴張，中國經濟近幾月來

顯著回暖。這些信貸大多流向了國有企業。然而，批評人士指出，在實施刺激措施的同時，政府也重新掌握了對部分經濟領域的控制權，這可能會損害中國的長期增長前景。

不過，中國官方通訊社報導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9月28日在部分中央企業座談會上強調，要充分認識國有企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努力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為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張德江

張德江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經濟社會發展任務依然繁重，國有企業承擔的歷史使命依然光榮而艱鉅。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努力促進國有企業不斷發展壯大。要繼續把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作為企業的首要任務，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計劃，完成生產經營目標任務。要大力推進企業體制機製創新，加快國有經濟佈局結構調整，加大企業內部資源整合力度。

張德江的這番講話已明確表明，中央政府對新一輪“國進民

退”浪潮的支持態度，同時也引發了新一輪爭論。

《金融時報》稱，北京方面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以再國有化為目標，但商政兩界的許多人士都表示，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在產生這樣的效果，尤其是自從去年全球危機爆發以來。“政府壟斷許多行業的市場准入，是政治體制改革不充分所致，”參與起草中國國有資產法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紀鵬表示。

劉紀鵬稱，北京對私有經濟的態度發生轉變，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中國會出現類似俄羅斯寡頭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這樣的人物。霍多爾科夫斯基於2005年被判入獄。許多觀察家認為，這是克里姆林宮對他越來越多地插手政治事務的報復。

據悉，為平息人們對國有化浪潮的擔憂，中國政府已采取了一些舉措，並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領導的小組，設法扶持中小企業。

劉延東

掌管港澳事務的“大美人”

中共十七大上，劉延東成了中國女性的首席領導人。在《胡錦濤的團隊》一書中，劉延東被列為“共青團派”的“八大金剛”居首人物，其實她也是“太子黨”中職務最高的女性。

十七大之前，還有傳說指劉延東有望成為政治局常委。她何以如此被人看好？因為，她有太多優勢：既有年齡優勢，也有順位優勢，既是“太子黨”，又是“共青團”，曾被江澤民重用，又跟胡錦濤在共青團共事，還與曾慶紅情同兄妹。

父親劉瑞龍是1927年就加入中共的“老革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的創建人之一，還曾是江澤民養父江上青加入共青團的介紹人，曾經擔任農業部常務副部長。

如此的家庭背景和政治淵源，使工人出身的劉延東一步一步的成為了日後中共政壇的高級領導人。在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劉延東是唯一的一位女性，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掌管港澳、宗教和民族事務的國務委員。

與劉延東熟悉的人士說：“她年輕時非常漂亮，說是大美人一點也不為過，如今也是風韻猶存。”官方媒體稱，劉延東做事果敢幹練，但又不失女性的溫柔，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因此被人譽為“剛柔并濟”。

此外，劉延東除了與港澳事務有著工作關係，她還與港人有著

血緣關係，用中國人俏皮的話說，她還是“香港人的姥姥”，因為她的女兒是“香港人的媽媽”。

訪港24小時，稱特區政府“非常有效率”

2009年12月5日至26日，劉延東對香港展開24小時“旋風式”訪問。

新華社報導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5日抵達香港出席第五屆東亞運動會開幕式。是夜天朗氣清，面對維多利亞海港美麗的夜景，以及海港兩岸數十萬觀眾，劉延東宣佈第五屆東亞運動會開幕。

開幕式前，劉延東分別會見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及前來出席開幕式的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中新社說，劉延東此次訪港恰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際。她表示，2009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遭遇了歷史罕見的金融危機，在特區政府各位官員的努力下，香港的經濟在好轉，維護了香港經濟和金融的穩定。

劉延東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在曾蔭權特首的領導下，勤政、勵志，恪盡職守，是非常有效率、有水平和有能力的管治團隊。她對特區政府官員的努力表示感謝。

中新社報導稱，為了呼應東亞運動會的喜悅氣氛，劉延東當晚特別穿上了鮮艷的紅色上裝，而參加會見的特區官員亦不約而同地系上了紅色領帶，曾蔭權則系上了紅色領結。

12月6日早上，劉延東在紅磡一間酒店會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並於董建華及夫人共進早餐。隨後，劉延東與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及其兒子李澤鉅，和新鴻基副主席郭炳江等人見面。



劉延東在香港

上午，劉延東走訪香港大學醫學院，並參觀這裏的兩間重點實驗室。在香港大學"明德格物"的校訓前，身著藍色上裝的劉延東與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港大知名學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支志明、蘇國輝、任詠華、葉嘉安，中國工程院院士袁國勇，港大醫學院院長李心平等，以及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週一岳等合影留念。

劉延東說，自己此次訪港行程緊密，但仍專程到訪港大，因為這所世界名校曆史悠久，在科學事業、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方面的卓著貢獻，且具有很高的社會影響力。

當天傍晚，劉延東還在香港會展中心會見了香港各界青年代表，並以一位資深青年工作者的身份，向大家提出了三點期望。劉延東說，香港回歸12年來，青年工作有聲有色，影響很大，不僅培養了大量人才，亦長期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內地與香港兩地交流與合作，為香港的繁榮、和諧和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官方媒體稱，綜觀劉延東訪港的24小時，行程涵蓋了體育、文化、教育、科技與港澳事務五個範疇，雖然日程安排得"滿滿噹噹"，但劉延東每一站都保持毫無倦容的真誠笑容，給香港各界留

下了深刻印象。

不過，香港媒體指出，劉延東的訪港行程中，未有安排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但部分建制派議員已收到邀請，出席博鰲論壇酒會。公民黨湯家驊表示，至今未有收到任何邀請，他強調不會因此失望，因民主派要求的，並不是要參加康樂活動，"與領導人見一見面"，而是希望對政改問題有幫助、直接的聚焦討論，他又指出，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都親疏有別。

值得關注的是，在劉延東訪港的頭一天，香港泛民主派要求港府就普選問題作出更清楚的交待，然而他們在立法會提出的相關動議遭到否決 泛民主派決定在2010年1月1號發起爭取普選的元旦大遊行。

香港媒體早前報導說，泛民主派在政改咨詢中一直要求北京當局及港府日後立法會實行普選，必須取消功能組別，但有消息說，北京不但無意廢除，反而想利用人大釋法等方式，自行竄改、扭曲普選定義，要永久保留功能組別。此報導後，雖然港府官員立即出面否認，但已引起香港各界及國際的憂慮。不少人士對於人大釋法皆表強烈反對，認為這不僅侵害港人權利，也破壞了香港的法律制度。

在劉延東訪港前，中聯辦就發出邀請函，邀請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立法會議員等參加見面，但泛主派議員未在被邀請之列。對此，泛民主派議員梁耀忠表示，"如果他們真的希望跟民主派溝通，來香港，應當好好安排比較長的時間談話"。

父親劉瑞龍是紅十四軍創建人之一

劉瑞龍1910年10月生於江蘇南通。出生後70天，父親就去世

了，孤兒寡母生活十分窘迫。母親白日裏糊紙錠、代人刺繡，晚上挑燈紡紗線，掙錢供兒子上學。劉瑞龍小小年紀，就要用長衫的大襟包著紙錠給人送貨。母親是一個老儒生的女兒，精通文墨，她要求兒子勤奮讀書，晚上她一邊紡紗，一邊聽兒子讀書。督促溫習功課之餘，她還講一些彈詞小說裏的故事給兒子聽。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使劉瑞龍自小對中國的古典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為他以後的詩詞創作打下了基礎。

1921 年，劉瑞龍轉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學讀書，14 歲考入通州師範。此間寄宿在他表哥葛松亭家中，因為表姐夫惲子強是惲代英的胞弟，從他們那裏，劉瑞龍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開始參加革命活動。1927 大革命失敗後，劉瑞龍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通州師範的黨支部書記，他組織顧民元、江上青等革命青年開展學生運動，並吸收他們加入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兩年後，時任南通縣委書記年僅 19 歲的劉瑞龍與李超時、何昆、張愛萍、黃火青等同志參加創建紅十四軍，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心腹地帶組織工農武裝。

紅十四軍失敗後，劉瑞龍調入江蘇省委，在陳雲任書記的省委外縣工作委員會擔任副書記及省農委書記，並在李碩勛任書記的軍委任委員。1932 年秋，因為出現了叛徒，劉瑞龍不能繼續留在上海，中央讓他選擇去蘇聯學習或者到東北工作，但最後他決定留在國內工作。當時紅四方面軍剛進入四川，急需幹部，他被派到川陝革命根據地。到達川陝根據地後，劉瑞龍先在紅二十九軍工作，不久任川陝省委委員、省委宣傳部部長，後又調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董保存撰寫的《三野“空軍司令”劉瑞龍》介紹說，1935 年 5 月，紅四方面軍開始了長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紅四方面軍兩


劉瑞龍

次翻越雪山，三次走過草地。1936 年 10 月，劉瑞龍奉命參加西路軍西征。後來西路軍慘遭重創，劉瑞龍也被國民黨馬步芳殘部關押在獄中。後經多方的營救，才回到延安。劉瑞龍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一段時間後，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到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與胡喬木、馮文斌等一起擔任領導與教學工作，培養了大批抗日青年幹部。1939 年 9 月，他隨劉少奇到河南確山竹溝鎮。11 月份到達了新四軍第六支隊所在地——豫皖蘇邊區渦陽縣新興集，在那裏劉瑞龍擔任了中共豫皖蘇區區委副書記。

此時，和他一起在南通參加革命的江上青和顧民元等也在這一帶與敵人展開殊死的鬥爭。江上青 1929 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以筆為槍，寫詩撰文，創辦刊物。1938 年 11 月，江上青成功地推動國民黨六安縣長盛子瑾抗日。劉少奇曾高度評價說：抗戰初期，我黨在皖東北與盛子瑾的統戰，是一個成功的範例。1939 年 8 月 29 日，江上青在率隊談判返回途中，遇襲而死，年僅 28 歲。

1940 年，劉瑞龍調任皖東北軍政委員會書記。1941 年 9 月，淮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成立後，劉瑞龍又擔任了行署主任的職務。

在抗日戰爭時期，劉瑞龍創作了一批反映革命鬥爭生活的詩歌，著名的有收在書中的“農民歌”、“革命三字經”，“階級化分歌”等。解放戰爭時期，劉瑞龍歷任華中北線後勤司令部政委、華東野戰軍第二副參謀長兼後勤司令、豫皖蘇分局財經辦事處主

任、第三野戰軍後勤司令兼政委等職務，在蘇中、漣水、魯南、萊蕪、孟良崮等戰役和進軍魯西南、進軍豫皖蘇以及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戰役中，直接指揮和組織後勤支前工作，為前方戰鬥提供了可靠的後勤保障。

華中《新華日報》的戰地記者徐熊同志風趣地說："劉瑞龍這位戰勤司令實際上是一位『空軍司令』，他手下衹有一位秘書、兩位警衛員、兩位副手，他當時主要參與抓了三件大事：一是進行土地改革，充分發動群眾，及時有力地支援戰爭；二是把支前後勤工作由被動轉為主動，建立了支前後勤機構——北線戰勤司令部和基層支前組織；三是有預見地協助華中分局、華中軍區組織敵後武裝，就地堅持鬥爭。"

1949 年元月初，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勝利。在戰役中，劉瑞龍直接組織和指揮了支前工作。官方媒體評論稱，在淮海戰役和橫渡長江兩大戰役中，劉瑞龍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後來電影《車輪滾滾》生動地再現了當年民工支前的情景。

上海解放後，劉瑞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中共中央華東局農委書記等職。1953 年 2 月，調任國家農業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

"文革"中，劉瑞龍遭到迫害，從 1967 年 11 月到 1972 年 11 月，他被非法關押在上海監獄，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

1972 年年底，劉瑞龍出獄。1976 年後，重新回到農業部工作，當選為五屆政協常委和六屆人大常委。八十年代初，劉瑞龍先後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主任。《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部農業百科全書。

1988 年 5 月 25 日，78 歲的劉瑞龍，在廣州參加全國農史學會

學術討論會時，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猝發去世。

劉瑞龍與夫人江彤共育有四個子女。

長女劉延淮，北京東方靈盾科技有限公司總裁、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訂工作專家組成員。

次女劉延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三女劉延寧，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執行會長。

兒子劉延申，香港皇裕國際有限公司董事、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華東保育院長大，與曾慶紅情同兄妹

1945 年 11 月，劉延東在戰亂中出生。3 歲時，由於父母都在華東戰場參加解放戰爭，便把她送到華東局機關保育院，保育院負責人正是曾慶紅的母親、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鄧六金，因此劉延東一直都叫鄧六金"鄧媽媽"。

1948 年 9 月濟南解放後，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當時，華東局對鄧六金的工作做了重大變動，要她籌辦一所保育院，當革命後代的媽媽，帶好 100 多個孩子。

保育院設在離濟南幾十公里的大官營，房子是用沒收來的一個大地主的房子，教師和工作人員是在當地招了一批初中生和師範生，政治文化素質較高。李靜一任院長，鄧六金任副院長。他們把 100 多孩子按年齡大小編成三個班：小學班、幼稚大班和幼稚小班，並組織教師們編寫語文、算術、識字課本，教孩子們唱歌、跳舞。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以後，鄧六金奉命率領華東保育院從山東青州往上海搬遷。當時，保育院有一百四五十個孩子，四五十個工作人員，孩子們身穿白襯衫，外罩列寧裝，由阿姨和教師們抱著，牽著，由農村駐地走到青州，再從青州乘大卡車到濟南。之後，鄧

六金一聲號令，教師和阿姨們抱著小的，拉著大的，讓大些的孩子們互相手拉著手，隨著擁擠的人流，走進濟南火車站，踏上南下的列車。

這次為時一個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長途行軍，終於勝利完成，它猶如一支“特別部隊”完成了一次特別的戰役。直至晚年，鄧六金為此感到欣慰。華東局也為鄧六金等遷址有功人員評了功，發了“功”字獎章，開了慶功大會。

保育院到了上海以後，教學逐漸正規起來，孩子們的生活明顯改善，陳毅、曾山等每半個月就來一次保育院，看望孩子們。陳毅指示說：“你們要把保育院辦好，把孩子帶好。保育院的老師素質要高，才能教出品質、品德、學識都好的學生。對烈士的孩子要更加關心。”曾山則要保育院“要照顧好孩子，更要教育好孩子，要讓孩子們熱愛勞動，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革命媽媽鄧六金》一文說，華東保育院總共培育了革命後代近千人，包括劉瑞龍將軍之女、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以及陳毅、粟裕、譚震林等許多開國元帥、將軍的子女。鄧六金先後擔任副院長、院長。當年的孩子們現在多已成為革命事業接班人，且不乏國家棟梁之材。他們逢年過節，常會看望白髮繽紛的鄧媽媽，感激鄧媽媽對他們的培育之恩。

因此，後來有評論在談到中共太子黨的起源時，都把延安保育院和華東保育院稱為太子黨的“搖籃”，稱鄧六金為太子黨的“革命媽媽”。從兩個保育院建立之日起，這些高幹子弟就開始接受特殊的“精英”教育，為七十年代末太子黨“成幫結夥”的崛起打下基礎。

1953年，鄧六金調到北京工作後依然從事幼兒工作，為“大家”帶孩子。她擔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副主任時，分管三個幼兒園的工作。一個在北郊，一個在南郊，一個在東郊，她四處奔波，為培育下一代而忙碌不停。

侯克雲和王書萍撰寫的《悼念革命老人——鄧六金媽媽》曾對當時的保育院“大王”曾慶紅有如下描寫：

曾慶紅因在惡劣環境下，充分得到了磨、爬、滾、打的艱苦磨練。他剛到保育院，就顯得他身高力大，很快就成了孩子們的“領袖”。保育院的孩子們對他也很敬畏，大家都叫他“大王”。五十年後的一次同學聚會時，大家仍然親切地叫他“大王”、“大王”。當曾慶紅見到李克儉他們兄弟好幾人一起到來時，開玩笑說：“怎麼？你們李家兄弟還不服氣？別看你們弟兄多，不是我『大王』一個人的對手，不信咱們試一試……”說得大家開懷大笑。

不過，衹是同齡的孩子很懼怕曾慶紅，據說，當時的曾“大王”對保育院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非常關照，情同手足。

與胡錦濤的交情，“六四”影響了仕途

劉延東是家中老二，上有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姐姐劉延淮一直從事專利，原為國家知識產權局研發中心主任，任北京東方靈盾科技公司總裁；三妹劉延寧，任國家信息中心黨辦主任；最小的弟弟劉延申，是香港皇裕國際有限公司董事、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1964年7月加入中共——也是這一年秋天，她上大學，成為胡錦濤的校友——她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這個系幾位高才生都得意於官場，如學兄劉志忠當過重慶市長，學弟習近平現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

劉延東曾經同香港友人透露，“文革”發生時，她正在清華讀二年級，由於成績好而被人寫大字報。在清華大學上學時，劉延東

同胡耀邦的兒子劉湖是同班同學。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曾回憶說，二哥劉湖是預備期最長的黨員，“預備了將近十幾年！”“二哥當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工系，和現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一個班，她還是我二哥的入黨介紹人。1966年5月，他成為預備黨員。一般黨員的預備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剛入黨一個月就趕上『文革』，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成為正式黨員。”

大學畢業後，劉延東則被分配到河北省唐山開平化工廠當工人、技術員，後來成為車間負責人；兩年後她調回北京，在化工實驗廠當工人，以後八年，她在這個廠一個一個台階地攀援，從黨委宣傳科幹事，一直昇到廠政治部主任、黨委副書記。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劉延東脫離工廠，女承父業進入政壇，在北京市委組織部短暫呆了一段，1981年起當上北京市朝陽區委副書記。1982年底，她與胡錦濤同時調到了團中央，她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三把手，分管國際青年聯絡事務，這外事雖然辛苦，卻確實是一樁“美差”，迎來送往，飛去飛回，劉延東在外國的名氣大概比在中國還大。

《亞洲時報》曾撰文介紹過胡錦濤與劉延東的交情。關於胡錦濤成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衹有一年就調走，北京政圈也流傳一個說法：據說，胡錦濤作風較正派，跟一些其他具有“太子黨”背景的團中央的書記出現磨合問題，所以才被調往較為偏遠的貴州；對這問題，據說當時王兆國立場比較模糊，沒替胡錦濤說話，倒是劉延東曾私底下表達同情他。今天胡錦濤跟劉延東交情較好，似乎並非無因。

從1982年至1985年，劉延東與胡錦濤共事三年，而在胡錦濤外放貴州省委書記前的最後一年，劉延東更是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



劉延東

不過，《共青團和太子黨》一書指出，在胡錦濤離開團中央去貴州時，本來排在第二位、擔任團中央常務書記的劉延東沒能更上一層樓，當上一把手。胡錦濤而是力薦了排名團中央書記處的最後一位書記宋德福。

一直擔任團中央常務書記和全國青聯主席的劉延東，在這個崗位上度過“六四”前後焦頭爛額的一段日子。

關於那段歲月，明鏡出版的《胡錦濤傳》中有一段描繪——

離天安門廣場一箭之遙的團中央機關受到廣場沸騰氣氛影響，也熱度昇高，竟有幹部在李鵬代表國務院宣佈了對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之後，組織遊行，聲援絕食學生，向黨中央請願。這要讓鄧小平等人知道了，豈不龍顏大怒！

當時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雖然並不很清楚中央最高層內部對壘的強弱對比，卻再清楚不過：這種關鍵時刻衹能明哲保身，千萬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天，當團中央機關遊行請願隊伍集結起來，要打起“團中央機關”大旗出門之際，宋德福帶領團中央書記

們、部長們趕到門口，聲嘶力竭地極力勸阻，但他們無力回天。在最緊張的瞬間，忽見宋德福眼皮一翻，在大庭廣眾中突然倒地。“宋德福暈倒了！”現場一片混亂，有人趕忙將他送往醫院急救。

團中央二把手劉延東，不得不“繼承遺志”，繼續勸阻，但就更攔不住遊行隊伍出門，滙進廣場上和平抗議的洪流了。

宋德福從此就在醫院住下了，再不管事，直到“六四”事件平息。據瞭解內情者介紹，劉延東當時是傾向於用和平對話的手段來平息學潮的，但公務職責所系，權力所限，她並沒有什麼好辦法來打開僵局，祇能心力交瘁地支撐機關的局面。後來在清查期間，宋德福果然側身事外，一身乾淨，而劉延東不得不對機關當時大批人馬卷入“動亂和暴亂”風潮，擔負起領導責任。雖與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後來所受的處理比起來，她還算幸運，被認為性質不同，未受深責，但對其仕途還是多少有影響。

團中央機關不止一人猜測過：宋德福當時究竟是真暈假暈——是急火攻心，還是即興表演？還有人調侃地說：劉延東畢竟還是嫩了點，缺個心眼，當時她要是搶先一步暈倒，宋德福大概就不好意思再要同樣一招了吧！

得江澤民器重，在統戰部幹了16年

說起來，江澤民倒比胡錦濤更為器重劉延東。

前文已經介紹過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不但是中共紅十四軍創始人之一，還與江澤民的養父、烈士江上青有淵源，是江上青1927年加入共青團的介紹人。酷愛古典詩詞的劉瑞龍去世之後，由夫人江彤、女兒劉延東一起整理了《劉瑞龍詩稿》，出版之前，江澤民特別將劉延東召至總書記辦公室，交給他一封給江彤的親筆信，以及江澤民親手抄錄的江上青當年寫給江澤民叔叔江樹峰的三首詩詞，借以表達對劉瑞龍的深切懷念。

再加上她與被稱為江澤民“大管家”曾慶紅的“情同兄妹”的特殊關係，劉延東一直受到江曾兩人的關照和提攜。據中共人事專家高新披露：江澤民和曾慶紅對劉延東的提攜遠不是近幾年才開始。劉延東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分管對外聯絡，工作表現突出，中共高層曾經考慮過調她到外交部，出任駐丹麥的大使。

但江澤民在一次會議上表示：培養這樣一位女性青年領袖不容易，駐外大使人才並不缺她一個。考慮到她在1990前後組織中國大陸與港澳青年交流活動十分成功，又首次打破了40多年政治阻隔，成功地開創台灣海峽兩岸青年的交往，於是，江澤民於1991年3月欽點劉延東進入中央統戰部。這個時候是“共青團派”的低潮，轉業最難安排。她調到中共中央統戰部，暫時屈就副秘書長，但在江澤民關照下，幾個月後昇任副部長，在丁關根領導下工作，在這個崗位上整整幹了11年。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它在中共的發展歷程中大顯神通、居功甚偉。在北京西單繁華鬧市旁邊、與中南海相距不遠的統戰部，就是負責運用這一“法寶”的中共中央職能部門。該部門不掛牌，但往來於此、五湖四海的人卻絡繹不絕。

王兆國正從胡耀邦下台受到打擊後慢慢恢復元氣，由對台辦主任調任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與王關係一直不錯，她主管香港、台灣等地統戰工作，兼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位次陸續前移，1996年初又接替萬紹芬，擔任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級別於1998年昇到正部級。

其實，1997年江澤民等人就內定劉延東為統戰部常務副部長，



劉延東

與當時也被內部安排為中宣部長接班人選的劉雲山，一同被列進十五屆中央委員候選人。為了保證她和劉雲山的當選，還特別把她的名字放進大會主席團成員名單國家民委主任，但黨代表蒙在鼓裏。

但是，當時江澤民犯了一個策略錯誤：讓統戰部一家出了三個中央委員候選人。

王兆國以統戰部長身份繼任中央委員，而劉延東和李德洙（朝鮮族）兩個副部長也都被安排成中央委員候選人。中共高層在籌劃十五大人事安排時，是計劃讓李德洙在次年人大會議上以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身份兼任裏，對一家出三個中央委員意見很大。在各代表團預選時，因為王兆國和李德洙都已經是十四屆中央委員，大多數代表對他們兩人連任沒有意見，矛盾焦點集中到了劉延東身上。既然要差額選舉，不從這下手再從哪裏下手？江澤民主持的大會主席團在集中各代表團預選結果時，也衹能尊重代表的意見。於是，劉延東被安排進了中央候補委員，在按得票多少排序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名列倒數第五。

假如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前預料到了劉延東落選中央委員的風險，事先就宣佈李德洙為國家民委主任，劉延東就很可能是另一番命運了。

十五大開過之後沒有幾天，中央組織部正式發文明確宣佈劉延

東為正部級。劉延東在十六大上才順利當選中央委員。

自 1991 年 3 月到中央統戰部任副秘書長，劉延東已在該部工作了 16 年，廣泛涉足港澳、宗教及民族事務。

港澳台及海外工作是中共統戰工作的重要部分，中央統戰部下設有相關的主管司局——港、澳、台、海外工作局。

有三個靠山，十七大前"大美人"行情看俏

有了江澤民、曾慶紅以及胡錦濤這三個人的靠山，未來中共最高女性領導人，誰能與劉延東爭鋒？何況劉延東早未雨綢繆，有了大多數同齡女性官員所缺的博士學歷。更何況，她又那麼端莊，給人好感！在"國際女權熱"全球昇溫之際，既是"共青團派"又是"太子黨"的劉延東，十七大前也行情看俏。

近年來國際政壇上女性揚眉吐氣：菲律賓"美女總統"阿羅約屢遭政治危機，卻有驚無險，執政至今；德國默克爾經過艱難選戰當選總理後，如今威望如日中天；2006 年年初以來，牙買加執政的人民民族黨選出女黨主席米勒，自動成為該國總理；芬蘭現任總統哈洛寧成功連任；智利歷史上首位女總統巴切萊特宣誓就職；美國黑人女國務卿賴斯穿梭於世界各地折沖樽俎；前第一夫人、民主黨籍參議員克林頓正逐鹿白宮；加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波羅西挾民主黨中期選舉大勝的聲威，就任聯邦眾議院議長；印度選出了女總統……在這種背景下，北京下一屆的決策層，如能有一名能幹女性，自然更顯得與國際接軌。

十七大前，中國共有九名女性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中有三位女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顧秀蓮、烏雲其木格）；一位女性副總理（吳儀）；四位女性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郝建

秀、張梅穎、張榕明）；一位女性國務委員（陳至立）。其中幾位政協副主席肯定不可能回到政壇前台，何魯麗和顧秀蓮都年過七十，應會全退；威信最高、能力最強的吳儀，亦將退休。

有人指出，當今中國官場上，若是"無知少女"，擢昇機會就會比較高。所謂"無知少女"，指的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幹部。將這些因素列入考慮，劉延東自然是一名理想人選。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政策》第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中國高層從毛澤東開始，一直儘量安排女性代表進入領導崗位，以體現婦女能頂半邊天。不過說來諷刺，高層女性往往是"妻以夫貴"——地位最高的是曾出任國家副主席的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最有實權的是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毛澤東夫人江青。自從1985年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退出十二屆政治局之後，22年來，政治局委員清一色是男性。

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沒有見到毛澤東所稱讚的"撐起半邊天"的女性，進入中共或中國政府決策層，更不要說擔任最高職務，這點始終較為可惜。

不過，劉延東最欠缺的不是別的，而是能力。野心或者說雄心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刺激起來，但是能力豈是一日之功？——這是多位曾與劉延東同事者對她的評價。

然而，劉延東被媒體，尤其是香港媒體筆下的各種贊詞淹沒：

《大公報》說：2006年4月，劉延東到江西三清山視察。這座著名的道教聖地山勢險峻、高聳入雲。在索道不能直接通達的情況



劉延東

下，劉延東堅持徒步登上山，探望修道的道士，並送去慰問金。道士們連聲道謝，並激動地說，"從未見過這麼大的官"。

獲多名香港重要人士譽為"剛柔相濟"、"祥和有佛相"的這位劉延東，秉承"精誠所致、金石為開"的精神，大力推進新時期的統戰工作，最終得以"更上層樓"。

中新社：2004年5月，劉延東首次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身份出訪香港。她根據不同場合，一日四更衣，盡顯優雅風度。港媒稱其掀起"劉旋風"。

與一般京官不同，這位身在北京的高官粗通粵語。2006年12月29日，香港地產富豪李兆基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捐贈內地"溫暖工程"的儀式，他用廣東話口音很重的普通話表示有意增加捐贈時，在場的內地官員聽不太懂，劉延東見狀馬上充當"翻譯"，用普通話將李兆基的意思清楚地轉述。

熟悉劉延東的人知道，她待人和藹可親，總是笑容可掬，做事幹練，又不失女性溫柔，可謂"剛柔併濟"。

香港《明報》這樣寫道：劉延東非常重視自己的形象，每次出席公開場合，都會悉心打扮，配合需要。2004年5月，劉延東首次以政協副主席身分訪港，她的出現讓港人眼前一亮。據說，在港期間她曾試過一天換四次裝，以配合出席不同場合需要。而她的“慈祥笑容”，加上配合得體的服飾及髮型，令許多港人受落。

與劉延東熟悉的人士說：“她年輕時非常漂亮，說是大美人一點也不為過，如今也是風韻猶存。”劉延東做事果敢幹練，但又不失女性的溫柔，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因此被人譽為“剛柔相濟”。

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她既有女性的溫柔，也有女強人的自信和堅定，一言一行，魅力不凡。以她得體的衣著、端莊的儀態、和氣的性格和待人的真誠，擔任統戰工作，實在再適合不過……劉延東同時表現出新一代國家領導人集體的『知識型』形象和親民的作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我曾做過兩屆政協委員，與劉延東是多年同事，她十分能幹。”

未能主政上海，卻主管非議最多的領域

早在2005年8月，有關劉延東空降上海接替陳良宇出任市委書記的消息，就一直不絕當時，路透社和英國《泰晤士報》就報導說，胡錦濤屬意其共青團舊部、中央統戰部長，也是劉瑞龍女兒的劉延東出任上海市委書記，取代江澤民愛將陳良宇。

路透社說，上海一向是江澤民的根據地，市委書記陳良宇就是江澤民的愛將，若胡錦濤要把“親信”劉延東空降上海，“必會觸發惡鬥”。胡錦濤準備空降團派女將劉延東取代陳良宇。可能當時上海幫仍控制相當權力，儘管陳良宇驕橫自大，公開對抗溫家寶宏觀調控政策，挑戰中央威權，但是有江澤民、黃菊在他後面撐腰，胡溫也奈他不何。

在當時極為敏感時刻，新華社把劉延東之父當年跟江澤民養父的關係曝光，可真特別容易引起聯想。按道理，劉瑞龍介紹江澤民養父加入共青團，江澤民日後能成為“革命先烈”之後，多少跟劉瑞龍有關。劉瑞龍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秘書長，在上海人脈甚廣，江澤民後來成為上海市和和市委書記，未知劉瑞龍是否其中一個幕後功臣。可是，今天江澤民影響力甚大的上海竟傳出“不歡迎”江澤民恩師的女兒到上海任職的消息，外界多少會聯想到“有人忘恩負義”的問題。

到了2007年初，再次傳出劉延東空降上海的消息。港台媒體報導說，在兩會期間，有關上海市委書記人選成為“半透明”話題。相關人士透露，為了全力整頓上海，出身“共青團”的“團派”女將劉延東，至今仍是上海市委書記不二人選。另外，中南海準備將現任市委副書記羅世謙“扶正”，在明年接替韓正擔任市長。

兩會未結束，海外又傳出胡錦濤心腹劉延東已空降上海的消息，但幾天之後這個傳聞便不攻自破了——另一名“太子黨”成員、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空降上海，成為上海的新掌門人。

至此，傳了好幾年的劉延東“空降上海”消息，才不了了之。不過，在半年後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劉延東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第十七屆領導集體中的女性代表 外界普通認為她將取代吳儀的角色。

十七大上劉延東果然進了政治局，2008年3月，在十一屆人大上正式接替了65歲的國務委員陳至立。不過，北京的政治觀察家並沒有表現出興奮。人們還是擔心：她擔任國務委員，主管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這幾個行當恰恰是中國當前群眾非議最多的，她能摸索到正確的改革、發展方向嗎？

高票當選國家副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上任後，接手主管港澳事務，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成員也有所調整。但消息人士披露，原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劉延東，雖然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轉任國務委員，但仍留在港澳協調小組，並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港澳協調小組組長由卸任的曾慶紅換為習近平，副組長仍由劉延東和廖暉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等人都還是港澳協調小組的重要成員。

消息人士指出，接替唐家璇當選為國務委員的雖是戴秉國，但由於戴秉國主要熟悉外交事務，對港澳事務比較陌生，故原本該由戴秉國負責的港澳事務，已撥歸同為國務委員的劉延東。劉延東在擔任中央統戰部長以後，已經與港澳人士建立了很多聯繫，對港澳情況知之甚詳。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在香港情況空前複雜，台灣換屆後馬英九可能開放與中國大陸"三通"，更收窄了香港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港澳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港澳事務也就具有了特殊重要性，絲毫容不得一點閃失。這樣，由本來對港澳事務駕輕就熟的劉延東，繼續擔任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也就順理成章了。

女兒在香港生仔，特首禮賓府宴請母女

2009 年 11 月，香港媒體報導稱，北京分管港澳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將在 12 月 5 日到香港訪問兩天，期間將會出席在香港舉辦的東亞運動會開幕式。由於劉延東訪港期間，適值香港政制改革咨詢工程剛剛啟動不久，因此香港民眾對她此行的關注點，與其說是東亞運動會開幕式，不如說更多的是放在香港民主派議員是否有機會與她見面，向這位中央大員反映有關香港政改的意見。

其實，劉延東不但是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分管港澳工作的負責人之一，而且也與港人有著血緣關係，用中國人俏皮的話說，她還是"香港人的姥姥"，因為她的女兒是"香港人的媽媽"。而且就在劉延東剛剛與香港人拉上血緣關係不久，她就在 2009 年 4 月下旬悄悄非正式經過香港，並與特首曾蔭權見了面。

劉延東是在 4 月 23 日早上到達香港的，下榻港島香格里拉酒店，隨行的高級官員包括時任教育部長周濟、科技部副部長李學勇，以及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研究室以及外交部等部門的官員。劉延東一行 20 多人，是在訪問美國 11 天之後，到達香港的，並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休息了不到一天，期間的行程包括中午到香港禮賓府接受特首曾蔭權的午宴，隨即在當天晚上搭乘飛機，南下新加坡展開新的訪問行程。

劉延東率領中國官方代表團訪美，是美國奧巴馬政府上台之後的第一個中國政府高層訪問團。在美國訪問期間，劉延東一行到訪了紐約、華盛頓、西雅圖和三藩市等城市，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教育部長鄧肯、能源部長朱棣文、農業部長維爾薩克和美國總統科技助理兼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霍爾德倫等美國政要，參訪了多家知名大學包括喬治城大學、耶魯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以及美國著名的科技企業包括微軟和波音公司等。

結束了美國的訪問行程之後，劉延東即匆匆趕到香港，說是轉機飛新加坡，實際上更是想看看女兒楊帆和楊帆不久前剛剛在香港港安醫院生下的女兒。雖然貴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延東其實也是人，也有她的七情六欲，剛剛昇任外婆的她，怎能不激動，怎能不借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看看她的獨生女和這個剛剛落地不久的小外


劉延東在香港

孫女。

據稱，劉延東原計劃在新加坡訪問四天的行程，可能因為臨時借道香港轉機而受到影響。據新加坡《聯合早報》證實，劉延東在新加坡的訪問時間實際上縮短了一半多。而在"實際上大約衹有一天半的逗留時間裏"，劉延東一行訪問了新加坡萊佛士書院、國大生命科學中心等，原本的計劃中還包括訪問新加坡科研局，也因為日程滿檔而取消。在新加坡，劉延東會見了總理李顯龍和內閣資政李光耀，並接受了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的午宴款待。

劉延東的女兒楊帆，是在2009年4月初在香港港島區的港安醫院生下女兒的。按照香港的出生地原則，在香港出生的孩子，當然就是香港理所當然的永久居民，這也是近些年來，中國內地那麼多人湧到香港產子的原因，一是可以多生一個，避過內地的計劃生育政策，二是可以生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居民，給孩子的將來多一個選擇，劉延東的女兒當然也選擇在香港生孩子。

劉延東秘密借道香港，前來看望那位還沒有滿月的外孫女，當然給女兒一家帶來了驚喜和面子，也讓港府知道，他們一位頂頭上司的女兒，原來也在他們的轄區，而且剛剛在港為香港的出生率作

出了貢獻，他們當然知道應該怎麼做。按照慣例，劉延東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管是經過香港或是到訪香港，都要通過官方管道正式行文知會港府，以獲得通關禮遇和其他保護，包括在香港出行和在下榻酒店的安全警衛。

曾蔭權設午宴款待劉延東母女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的貴賓樓層，可以看到港府派出的要人保衛組保鏢。還沒坐完月子的楊帆，也帶著未滿月的女兒和夫家親戚來香格里拉酒店貴賓套房見這位北京來的姥姥，和劉延東一起共享天倫。中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禮賓府官邸設午宴招待劉延東、周濟和李學勇，據稱楊帆也一塊出席，與特首曾蔭權接上了關係。消息人士透露，港府知道劉延東有位女兒在香港之後，馬上搜齊了有關的資訊，又一位新太子黨的資料存進了港府有關部門的資料庫。

利用劉延東職位在港澳坑矇拐騙，劉延東的女兒楊帆和女婿馮琦目前都居住在香港經商。據海外有媒體報道稱，有澳門商人爆料，有人利用劉延東的職務，多次坑騙香港、澳門、北京、上海等各地商人，其中涉及澳門一家公司2億港幣。據稱因坑人太多，港澳的黑社會已經下達追殺令，據稱有人已經因此躲藏到澳大利亞，仍不覺得安全。而澳門的受害者已經向北京舉報，中紀委已經開始調查。

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劉延東這位親戚和他的一些生意夥伴，在澳門設立了一家控股公司，在2007年到2008年間，以為香港、澳門商人爭取全國政協委員頭銜以及給賭場介紹生意等名義，騙取澳門一個商人2億港幣，同時被騙的還有北京和上海的人士。據稱，有人因為幫助香港一位地產富商及其公子取得全國政協委員的位子，獲得這位富商贈送的價值2000萬港幣的房子，並常年免費住這位富商擁有酒店的高級套房，還直接用這位大地產商提供的信用卡消費。

他們還強行拿賭場的賭碼賭博，賭場對此無可奈何，比如他們有一次在某賭船一次就拿了 2000 萬港幣的賭碼不還。他們在澳門、美國、菲律賓等賭場也是一樣囂張，到菲律賓克拉克賭場還帶去美國的女朋友 EVE LAM，兩次拿籌碼 360 萬元，一直不還。另外，有人還在澳門威尼斯賭場，11 次拿走賭碼幾百萬。

有人還被指控免費常住澳門酒店的總統套房，找洋小姐嫖宿。在珠海則找 18 歲以下的處女。在澳門金龍夜總會的十八桑拿，有人每次都找兩個小姐"雙飛"，洗鴛鴦浴，並從美國、日本專門給港澳老闆找美女，有人還把自己從美國帶來的女朋友介紹給澳門的陳老闆。不過，這些指控和傳聞，至今都未能得到證實。

事實上，劉延東與香港的淵緣，除了女兒女婿在香港經商居住外，另還有一個弟弟在香港經商，目前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董事。劉延東共有四兄妹，她排行第二。大姐劉延淮原為國家知識產權局研發中心主任，現任北京東方靈盾科技公司總裁；三妹劉延寧，現為國家資訊中心黨辦主任；而最小的弟弟劉延申，原為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後棄學從商，並移民香港，現在為香港皇裕國際有限公司董事。

劉延東丈夫也是商圈中人，劉延東丈夫楊元惺，是中國東南技術貿易總公司總經理，從嚴格意義上講，也是從商，屬商圈中人。楊元惺同樣是官宦世家出身，父親是農業部前副部長、中國科協副主席楊顯東。

1979 年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楊顯東第一個帶頭揭開文革期間被大肆吹捧的山西省大寨的虛假面目，成為當時的新聞人物，顯示了這位老人的正直。

俞正聲

鎮守中國第一大都市的"大吏"

北京時間 2007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4 時，身著深色西服的俞正聲，同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和中組部部長李源潮一道出現在上海市召開的局級以上幹部會議上。

幾個小時後，新華社從北京發佈消息稱，"日前，中共中央決定：習近平同志不再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俞正聲同志兼任上海市委委員、常委、書記，不再兼任湖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至此，海內外盛傳數月的有關俞正聲調任上海的傳聞告一段落，但接踵而來的是，網絡和傳媒對俞正聲身世及俞氏家族的縱深探尋。於是，俞正聲謎一樣的身世，俞氏家族顯赫的背景，成為網民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

說起俞正聲，當然離不開俞氏家族。談起俞正聲的仕途，自然繞不過父親黃敬和兄長俞強聲。可以說，當今的中國政要沒有哪一位能像俞正聲這樣，對自己的家世"既愛又恨"，既離不開它又想捨棄它。也可以說，沒有父親黃敬的人脈關係，俞正聲恐怕不會有今天；若兄長沒有叛逃，弟弟可能早就飛黃騰達。

如今，俞正聲則成為俞氏家族在中國政界的代表。然而，過去兩年對這位人坐鎮上海的"封疆大吏"來說，卻是"難熬"的兩年，每年上海"製造"的大案——楊佳襲警案，釣魚執法案——都

能轟動全國，都讓這位鎮守中國第一大都市的“太子黨”名聲掃地。

有俞正聲坐鎮，上海還愁沒迪士尼？

2009年11月4日上午8點30分，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授權宣佈：上海迪士尼項目申請報告已於10月底獲國家有關部門核准。目前，項目中美雙方正就合作的具體內容和細節進行深入磋商，將長期合作在上海浦東新區共同建設世界一流的迪士尼樂園。

此消息一經公佈，立即再次成為媒體和網絡關注的焦點話題。官方媒體有些激動地稱，從相關部門證實，這場“戀愛長跑”即將步入婚姻殿堂。上海市政府與美國迪士尼公司“暢想”該項目已經歷時十年，終於可以修得正果。

但也有評論指出，倍受關注和爭議的上海迪士尼項目，一旦上馬勢必會給香港的迪士尼造成嚴重衝擊，讓本來平時人就少得可憐，惟節假日才爆滿的香港迪士尼雪上加霜。

此外，網上也有人質問：香港與上海相距不遠，有否必要再建同一主題的公園？再建同一主題的公園勢必分流香港本已經不多的客流，勢必導致兩地打價格戰競相殺價攬客，香港迪士尼空心蕭條對誰有好處呢？同為國人，相煎何急？同為國人爭建迪士尼，誰人樂見誰人漁利？

針對上海到底該不該上迪士尼項目，輿論已經爭執很長時間。但業界人士指出，其實，自從俞正聲空降上海後，這個爭執早就有了結果。用上海官方人士的話說，有政治局委員俞正聲坐鎮上海，浦東還愁中央不批准這個項目麼？！

遠的不說，我們就看看官方媒體2009年以來對迪士尼項目的報道，就能看出上海方面背後動作不斷，只待最後宣佈中央批准這個

項目了。

1月10日，美國迪士尼公司聲明稱，公司計劃聯同上海市政府在浦東興建全球第六個迪士尼公園，預計耗資244.8億元人民幣，最早於2014年對游客開放。



上海就要在這裏建迪士尼

幾天之後的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和韓正分別證實了“訂婚”的消息。俞正聲在浦東新區小組討論會上透露了上海迪士尼項目的進展，他說：“現在的浦東特別需要一種活力，當然你們能把迪士尼談下來特別不容易，但更要發揚浦東當年的精神。”

韓正則在此後的上海兩會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上海方面與迪士尼團隊已就迪士尼建園的重大原則問題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

在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期間，韓正坦言，上海想建設迪斯尼公園已經有十幾年了，雙方團隊的溝通交流談判始終沒有間斷過。2008年雙方以更加積極務實態度在談判，形象點說，還在戀愛，沒結婚，

什麼時候拿（結婚）證還沒有日程表。

5 月，俞正聲又在一次會議上暗示了“上海迪士尼項目”已經成為上海接下來的六件大事之一，這六件大事其中就包括了“大力爭取並推動重大旅遊建設項目落地”。

雖然俞正聲沒有解釋何謂重大旅遊建設項目，但媒體都相信是指迪士尼樂園。上海與迪士尼方面洽談建設項目的傳聞不絕於耳，不過迪士尼是否落戶上海以及迪士尼樂園何時開建的傳聞始終未獲得官方證實。

此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一把手所發出的暗示，足以證明北京批准這個項目只是個時間問題，而上海方面宣佈這個結果也只是個時間問題。

11 月 1 日傍晚，在第 21 次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之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市長韓正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明確表示：“（迪士尼項目落戶上海）這個問題裏要說的內容很多，上海市政府近日將專門召開一個新聞發佈會，公佈迪斯尼項目的最新情況，回答媒體關心的問題。時間可能是下週。”

韓正的此番表態頗讓外界感到“意外”。上海市新聞辦副主任，市新聞發言人陳啟偉對媒體記者說：“我和你一樣都是在新聞發佈會現場才知道這一消息的。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這個關於迪士尼項目的新聞發佈會具體是什麼時候開。”

還在幾天之前（10 月 29 日），陳啟偉還曾針對迪士尼落戶上海一事對媒體表示：“大型的主題公園審批權限是在中央，迪士尼是一個大型的主題公園項目，上海還在等待國家相關部門的核准，如果一旦有確切的消息，本市相關部門會在第一時間給予公佈。”

看來，北京早已口頭批准了這個項目，而這個結果只有俞正聲和韓正等幾位上海高層知道。上海市政府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的內容，則證實了這一點：“實際上上海迪士尼項目基本已經走完了應該走的所有流程，只等國務院作最後的拍板。韓正市長所說的新聞發佈會可能就是公佈項目已經獲得批准此一消息的。”

近年來，每次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媒體見面會時，記者們總是把迪士尼項目何時獲批何時開建等等“敏感”問題拋給韓正。2006 年全國兩會期間，韓正首度公開表示，上海有條件建好一座迪士尼公園，有關方面的各項前期工作都在進行，最終待中央和國務院決定，上海按國務院決定來辦。

而在 2008 年全國兩會期間，韓正再度公開談及了上海迪斯尼項目的情況。他說，已向國家發改委遞交興建公園的申請，選址浦東，但未獲中央審批。

如果說，幾年來北京因考慮到香港的反對意見，才故意拖慢上海迪士尼項目的上馬，但到了 2009 年年末，北京和上海終於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要在浦東打造出美國境外最大的迪士尼樂園。

父親黃敬，母親范瑾，都是老革命

俞正聲的父親黃敬，生於 1912 年，又名俞大衛、俞啟威。祖籍浙江紹興，是著名的俞氏家族的後代。

1930 年在上海參加南國社左翼演劇運動。1931 年至 1933 年，就讀於國立山東大學（今山東大學與中國海洋大學共同的前身）。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佔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2 年，20 歲俞啟威和在國立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的 18 歲的李雲鶴（江青）同居。後成江青的入黨介紹人。

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與姚依林等領導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1937年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參與創建抗日根據地，先後擔任晉察冀區委書記，冀中區黨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書記。參加了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期間，擔任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主任，晉察冀中央分局副書記，華北人民政府委員、企業部部長。

1949年1月15日，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在天津解放的第一天重新接通了電話，第二天全市通了水、電，第三天電車恢復通車。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迅速，到1949年底，公營工業的生產就已經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和日本統治時期的最高水平；私營企業發展速度雖較公營工業為慢，但也恢復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



當天津市長時的黄敬

1952年，黄敬又被調任中央政府政務院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為發展新中國的機械工業、科學技術和培養科技人材做出了貢獻。期間“響應中央和毛主席又紅又專的號召”，認真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由於過度辛勞而致疾，患肺動脈栓塞，1958年2月10日去世，時年46歲。

患病期間毛澤東曾傳話給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勸他好好養病。薄一波在黄敬追悼會上代表黨中央致悼詞。也有說法稱他是在南寧會議期間受到來自毛澤東的壓力，患精神病而死。

俞正聲的母親范瑾，1919年出生，原名許勉文，又名范元貞，浙江紹興人。與紹興的名門望族俞氏家族相比，許家則是個書香門弟，世代讀書之家。

范瑾16歲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地質系，也有資料顯示，她先後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的實驗學校和理學院地質系。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是南京地下婦女救國聯合會成員。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未畢業的范瑾就投奔延安，參加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至各邊區前線採訪。

抗日戰爭時期，范瑾歷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四期五隊區隊長、救亡室主任、校本部秘書處秘書，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第一組團員，冀中導報編委會主任和社長，兼任新華社冀中分社社長，中共冀魯豫區黨委及中共北方局中原分局宣傳部宣傳科科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財經辦事處主任秘書，晉察冀日報社編委、採訪通訊部主任，中共華北局辦公所秘書。1948年11月，在黄敬赴天津任職後，范瑾也隨丈夫一起調到天津，

歷任天津日報社編委、副總編輯、總編輯，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1952年8月，范瑾調北京籌辦於10月1日創刊的《北京日報》，她擔任北京日報社社長，離開了天津日報。一個月後，丈夫黄敬也離開天津，赴新組建的一機部任部長。

范瑾自1952年9月至1966年任北京日報社社長，其間，1952年兼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5年任市委常委，19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長。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范瑾卻首先受到衝擊。文革一開始就

是從北京市委開刀的，隨著北京市委被砸爛，范瑾很快被打倒，長期靠邊站，日子非常難熬，經常遭到無休無止的羞辱、揪鬥和毆打，老母親和兒女都受到牽連，下場很慘。據說江青親眼目睹過范瑾被打的很慘，但她面無表情，沒有任何表態。



范瑾

1975年平反後，范瑾不顧體弱多病，積極出謀劃策、參政議政。改革開放以後，歷任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政協主席，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曾當選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曾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全國婦聯第三屆委員會執委。

2009年1月4日17時，范瑾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隨後，中共官方給予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如下評價：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范瑾同志始終不忘革命初衷，……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革命和建設事業，是北京市的優秀領導幹部。范瑾同志的一生，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努力奮鬥的一生，是為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2009年1月8日，江澤民、賈慶林、王剛、王岐山、劉淇、李源潮、俞正聲、李嵐清、何勇、馬凱、孟建柱和鄭天翔、曾培炎、何魯麗、賈春旺、胡啟立等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

值得注意的是，范瑾的兒子俞正聲在送別母親時的"兩重身份"：既是國家領導人，又是家屬。

從"貴族學校"到"將軍搖籃"哈軍工

1945年4月，黃敬與范瑾的第三個孩子出生了。又是個兒子。這個後來一直叫小三的男孩，其大名叫俞正聲。

不到四歲時，一直隨父母轉戰在晉察冀地區的俞正聲，同兩個哥哥一起，又在1948年隨父母來到剛剛解放的天津。

1952年國慶前夕，父母因工作變動調到北京，俞家的三個孩子也跟著父母進京了。已經七歲的俞正聲到了上學的時候，便被送到一所幹部子女很集中的小學。當上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在接受鳳凰台採訪時曾提到一嘴，"我小學開始是在一個幹部子女很集中的地方上的小學，後來在五年級的時候我父母決定把我轉到我們胡同裏一個小學，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都去的小學。你可以想想他們的用心是什麼。"

俞正聲的這段話，是想告訴人們他父母當時這樣做的用心，就是希望他這個高幹子弟跟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樣，不要高人一等。

從那所平民小學畢業後，俞正聲就進入了有"紅色貴族學校"之稱的北京四中。"文革"前，北京四中作為北京最牛中學，其初中部的錄取線就是198分（兩門課，滿分200），高中部的錄取線為270分（三門課，滿分300）。那時，北京四中高考陞學率即達100%，每年考入清華、北大、哈軍工的名額都很多。當然，那時候北京市的人大、北大、清華三校的附屬中學，還不是北京重點中學。

北京四中的校史上，確可尋覓到不少紅牆子弟。譬如六十年代，劉少奇之子劉源，陳雲之子陳元，林彪之子林立果，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陳毅之子陳昊蘇、陳小魯，賀龍之子賀鵬飛，徐向前之子徐小巖，張雲逸（大將）之子張光東，王樹聲（大將）之子王魯生，喬冠華之子喬宗淮，王震之子王軍，張愛萍之子張翔、張勝，安子文之子安民、萬里之子萬仲翔，范長江之子范蘇蘇、范東昇等。

俞正聲在北京四中就讀時的表現如何，現在已很難查到相關資料，早前有文章稱，俞在北京四中上學期間表現很好，學習成績也不錯。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細節。在查閱北京四中校友錄時，找到俞正聲所在的 1963 屆高中三 5（108）班，其班主任為禹啟中。

在 1963 屆高中三 5 班的花名冊中，除了黃敬之子俞正聲，該班還有一個名氣更大的高於子弟——元帥賀龍之子賀鵬飛。

雖然俞正聲被北京四中同學稱為“母校最出色的校友”，但在近幾年特別時興的校友聚會或校慶上，只聞其名，卻始終沒有看到他的身影。

2009 年 3 月 9 日 15 位參加“兩會”的校友返回母校北京四中，可謂是陣容最強的一次校友聚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陳昊蘇、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中航集團董事長孔棟、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原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蔣效愚、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孫曉郁等應邀返回母校，只有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和正在大西南唱紅打黑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兩位級別最高的校友“不肯”回母校亮相。

1963 年夏天，18 歲的俞正聲從北京四中畢業後，考入當時很有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導彈工程系彈道式導彈自動控制專業學習。現在，俞正聲的簡歷上還寫有“1963



這是“兩會”校友在母校的合影。

前排左起：許善達、安民、張翔、陳昊蘇、劉鐵嶺、劉長銘、范曉光、孫曉郁、柯小剛

中排左起：孔棟、蔣效愚、秦曉、孔丹、燕純義、袁立本、楊淩波

後排左起：常菁、黃漢文、史康成、張小濟、鍾秉林、王兆騤、馬力

年 8 月參加工作”，因為這所學院屬於軍籍，入學等於入伍，也就等於參加工作了。

當時能進入哈軍工上學的人，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尤其是在哈軍工剛剛成立時，學員幾乎清一色都是高幹子弟。

十大元帥中有七位元帥的子女，十大將有六位大將的子女、親屬就讀哈軍工，致使哈軍工一度有成為“將門相國之後”專門學院之虞。

中國十大元帥中有朱德元帥的兩個孫子；彭德懷元帥的養女即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烈士的女兒，左太北；林彪元帥的女兒，林曉霖；陳毅元帥的兒子，陳丹淮；羅榮桓元帥的兒子，羅東進；劉伯承元帥的兒子，劉太行；葉劍英元帥的孩子，葉選寧。

中國十位大將中有粟裕大將之子，粟戎生；陳賡大將之子，陳知建；羅瑞卿大將之子，羅健；蕭勁光大將之子，蕭光明；張雲逸大將之子，張光中；許光達大將之子，許燕兵。

中央領導之中，還有五位老前輩革命家中的"三老"的子女在哈軍工讀書，即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玉；林伯渠的孩子，林東山；謝覺哉的孩子，謝開飄（後改名謝飄）。

國家公檢法三家最高領導人子女入學哈軍工的，有公安部長謝富治上將的孩子、最高法院院長張鼎臣的女兒，還有上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謝覺哉的孩子。

中國四大烈士，有三位烈士的後裔入哈軍工，即王若飛、葉挺、左權的子女。上將一級有蘇振華、陳再道、張愛萍、楊成武的子女入哈軍工等等。

這些也僅僅是我們所瞭解的一部分領導人的後代。實際在省軍一級、國務院部一級領導的子女也有很多入讀哈軍工。

像所有新學員一樣，穿上軍裝的俞正聲在進入哈軍工的第一年，要接受幾個月的軍訓。軍訓結束後，新學員正式佩戴軍銜，接受院首長檢閱，並在軍旗下宣誓，然後被分配到各個系。

俞正聲被分配到導彈工程系，專業為彈道式導彈自動控制。導彈工程系也叫五系，是哈高幹子弟最集中的一個系，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林彪的女兒林曉霖，還有羅榮桓之子羅東進，彭雪楓之子彭小楓，粟裕之子粟戎生，劉伯承之子子劉太行，謝有法之子謝名苞，以及白堅之子白克明，林伯渠之子林用三等，都是從五系出來的。

上大一時，俞正聲的鑒定評語是"積極要求進步"，讀大二時便成了同年級裏第一批入黨者，並擔任黨小組長。在當時的哈軍工，只有"又紅又專"的學員，才能在入校第二年被批准入黨。

文革開始後，哈軍工的學生造反派分為"山上派"和持對立觀點的"山下派"，兩支人馬旗鼓相當，勢均力敵，不分伯仲。有知情者稱，俞正聲當時是"山上派"。"文革"中還回過北京，批鬥過母親范瑾。

到了1967年底，黑龍江各大專院校學生基本上都回校了，兩派並存，都開始消沈。此時派性已激發不起學生們的熱情。復課是毫無希望，終日無所事事。厭倦校園生活，盼望早日離開學校大門的情緒逐漸蔓延……

俞正聲就是其中的一個。

從普通鉗工到電子研究所副所長

當初懷著滿腔熱情投身這場文化革命的哈軍工學員，開始在迷茫中反思。1968 年到來時，還未來得及對這場革命有更深刻的反思，俞正聲就不得不面對畢業分配這個"難題"。由於母親范瑾被作為"彭真死黨"、"三家村黑線人物"，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同年3月被關進了監獄，再加上當時正值"文革"高潮，俞正聲預感到畢業後無法從事自己所學的專業。

最後，23 歲的俞正聲被"處理分配"到河北張家口市的一個鏡框生產合作社（後改為無線電六廠），當了一名普通鉗工，後來成了技術員。

關馬在《遠看俞正聲》文章中說，可是，這個鏡框廠也容不了俞正聲，原因是他搞出了一項技術革新，讓不懂技術的頭頭出了洋相。他只好轉到一家木器廠當了電工。這位不起眼的電工師傅，竟然組織搞出了一種當時國內尚無生產，國防部門卻又急需的運算放大器，讓木器廠一下子紅火起來。

張家口市二輕局局長發現了俞正聲這個人才，讓他在木器廠的基礎上組建了張家口無線電七廠，並讓他當了廠長。三年後，這個沒有要政府一分錢投資的小廠就擴展到一百多人，年產值達一百萬元，並且有了很氣派的新廠房，還給職工發放了當時中國最為時髦的衣料"的確涼"加工的廠服。為此，他被上級單位指責"違反財經紀律"。上級追究，他當即表示："我自己可以做檢查，把自己的衣服也退了。但職工的衣服沒辦法退。"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科技人員受到重視。5月，俞正聲在張家口搞技術革新已經是名聲在外，被國務院第四機械工業部（即後來的電子工業部）電子技術推廣應用研究所看中，將他調回北京當技術員，後提拔他為工程師、副總工程師。1977年，由他主持設計的零五四微型計算機在上海投產，這是中國最早的微型計算機。同時，他主持研製的幾個計算機應用系統也獲得了成功。

1981年，年方36歲的俞正聲，被提拔為研究所副總工程師兼副所長。雖然畢業換了幾個工作單位、崗位也有所變化，但基本上都是在無線電行業。

直到1982年底，在中共大力提拔青年幹部走上領導崗位的聲浪之中，俞正聲才由電子工業部電子技術推廣應用研究所副所長這個業務機構的業務領導崗位，轉到行政管理系統，擔任電子工業部計算機工業管理局系統二處處長、副總工程師兼微型機管理部主任，後來提為計劃司副司長，進入副司局層級。

有評論稱，這個時候，擔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部長的江澤民，對俞正聲就有了接觸和瞭解，江對他的身世以及其意味的政治人脈資源，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實，江澤民對俞正聲早就有所瞭解，因為俞是江的老上級黃敬的兒子。黃敬與江澤民的上下級關係，江的簡歷便一目瞭然：

1946年9月至1947年7月，江澤民就讀於交通大學電機系，1947年畢業。1948年進入了美資海寧洋行下屬的食品工廠任動力科技術工程師，同年該廠被國民黨聯勤總部斥資收購，改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屬下的第一糧秣廠（屬國民黨嚴格控制的軍工企業），江仍任動力工程師。1949年中共軍隊進入上海，工廠改名益民食品一廠，江澤民仍任工程師。後汪道涵把江由益民食品廠（董事長為汪道涵之妻）副工程師調上海肥皂廠副廠長，再調一機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1952年，調任一機部所屬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氣專業科科長。

1954年11月江澤民被調往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因為工作需要學會控制全廠供電系統，江澤民被派遣前往莫斯科培訓，於是在長春進行了四個月俄語訓練。江澤民在1955年赴蘇聯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回國。回國後，江歷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副處長、副總動力師、動力分廠廠長。

而俞正聲的父親黃敬 正是在1952年從天津調到一機部擔任部長。黃敬執掌一機部後，便成立了汽車局，並開始主管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籌建工作。一汽建成投產後，黃敬經常去一汽指導工作，對一汽的情況瞭如指掌。

何況1970年江澤民被調回北京，在一機部任外事局副局長。雖然那時黃敬早已離開人世，但一機部的領導幹部一直都對第一任部長黃敬非常敬佩。江澤民從1952年到1979年出任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之前，已在一機部系統幹了 27年，可謂是個"老一機部"了。

1982年，江澤民出任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部長兼黨組書記，當選為中央委員。同一年，一直搞業務的俞正聲獲得提拔，並開始步步高昇。如果把父親黃敬和一機部與江澤民和一

機部的內在關係聯繫起來，那麼俞正聲自九十年代後仕途暢順，就顯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調到殘聯，輔佐鄧樸方搞康華公司

1984年，就在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江澤民把俞正聲提拔為計劃司副司長時，有望在電子行來幹出一番事業的俞正聲，卻突然被調到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擔任負責人，這著實讓不少人感到不解。

對俞正聲當初為何去殘聯輔佐鄧樸方，多年來輿論一直眾說不一。

一說，是俞敏聲向鄧樸方推薦的。在《鄧樸方下海始末》一書（2004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作者權延赤，光明出版社，責任編輯賓建智）第26頁，寫到俞正聲的哥哥俞敏生，向鄧樸方推薦自己的弟弟俞正聲去殘疾人基金會任職的事。

這裏的俞敏生指的就是俞正聲的二哥"俞敏聲"。前文曾提到，據說俞敏聲是鄧樸方的小學同學，也是多年的"鐵哥們"。網上也有人稱，鄧樸方和俞正聲是同學，此說根據不足，鄧樸方比俞正聲整整大一歲，是1944年4月出生的，如果說鄧與俞敏聲是小學同學，倒很有可能。

二說，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看中了俞正聲。據說，時任部長江澤民和俞正聲談話時說，"殘聯是三顧茅蘆啊！鄧樸方都找上我家來了。輪椅後面還掛著尿兜呢……我無法拒絕他。"

對於這段描寫，坊間有評論指出，鄧樸方相中了俞正聲，即使俞不想去殘聯，當時一心想與鄧家拉上關係的江澤民，豈能放過這個機會，鄧大公子不用三顧茅蘆，只要一顧就夠了，江立即把俞送給了鄧……

三說，是最初鄧樸方找到俞正聲的時候，俞本人由於極其熱愛所從事的電子專業，就十分乾脆地回絕了。那時候他可是電子工業部頗受重視的專業技術人才。但鄧樸方並不灰心，他一直不停地給俞打電話，最後，俞正聲被"逼"無奈，只好說"如果部裏同意，我就來。"本來部里正在考慮提拔他，堅決不同意放人的。沒想到第二天，時任部長江澤民的態度就發生重大轉變，他通知俞正聲："你還是去幫他吧！"



鄧樸方

有媒體描寫說，原來，就在部長當天趕回家時，鄧樸方早已扶著他的輪椅在他家門口恭候多時。部長看到鄧樸方堅定而誠懇的態度，他破例同意了鄧樸方的請求。

總之，從以上的幾種說法中，誰都看出俞家老二俞敏聲和小三俞正聲跟鄧家大公子鄧樸方關係的確非同一般。但後來有網上文章稱，"鄧樸方文革遇難，俞正聲挺身相救"，則把鄧和俞的非同一般的關係，推到了"生死之交"的高度。但此說法已被鄧家人證實，當初鄧樸方的是一名工人師傅。

不管怎麼說，1984年，俞正聲還是離開了電子工業部，擔任中

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負責人、副理事長，黨組成員。沒過多久，又開始兼任了康華實業總公司代總經理。

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大事記稱，1984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復同意中共民政部黨組 10 月 24 日向中央報送的《關於成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黨組的請示報告》。基金會黨組由鄧樸方、王魯光、俞正聲三人組成，鄧樸方為黨組書記，王魯光、俞正聲為黨組成員。

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張勝友撰寫的《鄧樸方和他的夥伴們》一書中，記述了俞正聲到基金會工作後，對全班人馬進行思想和工作整頓的情況。俞正聲幾乎是逢會必說，逢事必提的一句話是："清廉對任何黨政機關都是重要的，而對從是殘疾人福利事業的基金會來說，則更是一條生命線。"

有這樣一個"故事"，基金會管理部一名黨名員會計曾利用工作之便，從外商捐贈的外匯券中平價兌換了一百元，就沾了這麼點小便宜，俞正聲竟然抓住不放，多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嚴肅處理，直到那人退回外匯券，在黨員會上作了深刻檢查才算了結。

俞正聲曾是基金會"最忙的人"。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都有一個共同的評價：俞正聲是個少有非議的正派人。

有關俞正聲曾兼任康華實業總公司總經理這段經歷，媒體和輿論都所談不多，甚至很少提及它。因為，一說起當初曾經聞名於海內外的康華公司，人們立即把它與鄧大公子鄧樸方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可以說，"康華"就是鄧樸方的"外號"，與其形影不離。幾年後，康華在反官倒中倒下，早已跟俞正聲沒有任何關係了。

其實，鄧樸方當初死活要把俞正聲從電子工業部調過來，名義上是調到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其實是籌建康華實業有限公司，後來人們把這個公司叫"小康華"。

"小康華"是 1984 年 9 月成立的，鄧樸方是董事長，王魯光（王樹聲之子）任副董事長，俞正聲任總經理。可以說，"小康華"成立之初，它的基本任務還是以搞活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為主，所從事的"倒買倒賣"業務也都是小打小鬧，當時鄧樸方還沒有把殘聯的手伸向各個行業。

但到了"大康華"時期，一切都發生了"巨變"。"大康華"即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是 1988 年 3 月拿到執照的。公司三巨頭都是鄧樸方親自邀請出山的省部級退居二線幹部。

不過，不管是"小康華"，還是"大康華"，及其母體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樸方手下的管理人員是清一色的高幹子弟，中下層管理幹部也百分之百是憑關係進來的。無論是總公司、二級公司，還是外地分公司，都使用了不少犯錯誤下台的幹部和退居二線的高幹（國務院部位司局長以上的幹部，地方副市長以上的幹部），再加上原來的高幹子弟。因此這個公司能量驚人，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都有康華的一杯羹，國務院有什麼部位，康華就有什麼公司，有些部委撤消精簡下來的公司，康華都捷足先登收入旗下。

很多從國家部委到康華任職的幹部，都把生意做回了原系統。如石油部出來的，在康華繼續幹石油生意。跑陳慕華那裏公關，建起了康華自己的金融機構和租賃公司。

最後連保險業和民航業都想幹，被國務院堅決制止了。還想在山東和日本合資一家相當於寶鋼規模的鋼鐵公司。後來冶金工業部一狀告到國務院，才罷休。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民間流行這樣一句話：說康華是"官倒"，康華人不服氣，說它不是"官倒"，全國人民不服氣！

不過，俞正聲在康華只幹了一年多。到了 1985 年年底，他便突然走人了。當時有傳聞稱，俞進康華時已同鄧樸方談好，最多幹兩

年，兩年後要把放出去。但不到兩年，俞正聲為什麼要"強行"離開康華呢？

是他感到在康華這種"小打小鬧"的公司，以及殘疾人基金會這樣的非政府部門再幹下去，已無法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還是預感到康華的官倒問題，還有鄧樸方的敢想敢幹，遲早都會出事呢？而最讓人迷惑不解的是，千辛萬苦把俞正聲調了過來的鄧樸方，怎麼會在他還幹滿兩年時，就輕易把他又放走了呢？

這些疑問，很快就有了答案。

俞強聲叛逃美國，俞正聲心情很糟

有關俞正聲的大哥俞強聲是何時叛逃美國的，美國媒體大概有兩種說法，一是1985年下半年，二是1986年初。但負責調查金無怠間諜案的美國聯邦調查人員I.C史密斯曾透露，FBI只有"飛機人"（指俞強聲）生命安全不受到威脅時，才會逮捕金無怠。

於是，1985年11月22日下午，三名聯邦調查人員敲響了金無怠的家門，幾個小時便宣佈逮捕了這位潛伏30多年的中國間諜。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判斷，俞強聲應該是1985年11月22日之前，成功地從中國叛逃到美國。

至於俞強聲是如何"逃"離中國的，美國媒體、中國媒體，還有FBI調查人員以及幾本西方人撰寫的有關中國間諜的書籍，大都語焉不詳。但王昆之子周七月在2009年9月發表的《我認識這個人——俞強聲》一文，卻在"無意"之中，揭開了俞強聲"逃離"之謎：

巧得很，我後來遇到了一個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說，俞強聲有一天請假，說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據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

期他沒有回來，大家也不奇怪，因為那個部門的人本來就不太過問彼此的事。但幾天後有一個重要的會要通知他參加，聯繫不上本人，就找他媽媽范瑾。范瑾聽說後立即對來人說"壞了"，因為那個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強聲已經通過香港到了美國。



俞強聲

但俞強聲叛逃美國時，有沒有想過此舉會給留在中國的家人帶來多大衝擊和影響，有沒有意識到他的叛逃會給自己的三弟俞正聲的仕途造成毀滅性打擊呢？答案只能從俞正聲的政治"行情"急轉直下來尋找。

高新在《領導中國的新人物》一書中披露，胞兄出事後，俞正聲一度心情不好，雖然鄧樸方一再給他喫寬心丸。在俞主動要求下，鄧樸方提前放走了他。此時，正趕上曾與黃敬共過事、思想較為開明的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急於擴大幹部班底。當胡耀邦親自向梁推薦俞正聲時，梁立刻拍板調他去煙台任職，並對日後安排他進山東省委常委費了不少心思。

當時這篇在海外流傳很廣的文章還認為，鄧小平一度對提拔幹部子女表現得十分慎重，也同俞強聲的叛逃有直接關係。

文章說，在整個八十年代裏，與陳雲等人相比，鄧小平一直對提拔幹部子弟的問題十分謹慎到1985年以後又一再要求對幹部子女提拔一定要嚴格掌握。而導致他對幹部子女不十分信任的原因很

多，其中之一便是俞強聲的叛逃事件。也正是因為背後有鄧小平這棵大樹，所以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才敢於頂著陳雲的壓力，對提拔幹部子弟的事情一壓再壓。

到山東以後，俞正聲仍然與鄧樸方保持密切關係，鄧樸方一直安慰他：不要灰心，你哥哥的事情雖然與你無關，但給我們黨造成的損失畢竟是太大了，所以總要等我們老爺子消消氣。再者，這事在黨內造成的影響也要有個消化的時間。

還有評論指出，每一個正常的人，如果家庭遭此巨變，悲痛之餘，必然會思索產生這種悲劇的根源，更何況俞正聲這樣的聰明人，肯定會想到家破人亡背後的政治體制因素。按照中共的出身論來說，一個本應是被懷疑不被信任的人，怎麼還會連連晉級、大展宏圖呢？

這或許就是俞正聲的過人之處。他是鄧樸方的鐵哥們，是鄧家在政治台面上的代表人物，這才是他仕途未見衰微，反倒突飛猛進的真正原因。

調任煙台，聲名鵲起，成最受矚目的市長

俞正聲離開康華，調到煙台，外界普遍認為是“哥哥叛逃，弟弟遭殃”的結果。不過，也有評論稱，這是鄧家有意提攜俞正聲，要增加其地方工作的政績。

於是，1985 年 11 月，剛過不惑之年的俞正聲很低調地赴煙台報到，就任市委副書記。

上任的頭兩年，他給煙台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不錯。據說，他經常半夜騎自行車赴工作第一線，解決問題，讓不少單位領導措手不及。據當時的一些機關幹部回憶，俞正聲很有口才，在會上講兩個

多小時不用文稿，思路敏捷開闊，用詞乾淨利落。

就在俞正聲上任後不久，一個重擔落在了俞正聲及當時煙台市政府的肩上：在煙台率先展開建國以來最關鍵的住房制度改革。

在 1986 年 3 月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會議上，煙台與唐山、蚌埠被確定為全國首批試點城市。對當時的俞正聲和煙台市政府而言，這個艱鉅的任務，同時也是難得的探索機遇。

也正是從煙台開始，俞正聲奠定了在中國改革開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領域的先驅地位。

“當時之所以選擇煙台，有幾個原因：城市是中等規模、公房比例較高、經濟條件較好、改革意識強烈等。”業內專家回憶道。

對於這個關係到全體老百姓最關心的住房問題的改革，煙台第一個喫螃蟹，俞正聲很清楚其中的困難，但決心更大。

1986 年 10 月，俞正聲在煙台住房改革動員大會上說道：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它比放開菜價、肉價困難得多，比機構改革還困難。但是，即使困難，現在也要動手搞。

俞正聲當時曾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和企業用於住宅的投資約佔國家基本建設總額的百分之十幾，這麼大的投資回收不了，嚴重拖了經濟建設的後腿。

1986 年，煙台市住房改革配套試驗的第一個商品化住宅小區“民生小區”建成。1987 年 8 月，經過一年零四個月的準備和模擬運轉，國務院和山東省政府批准煙台市城鎮住房制度改革試行方案實施。1987 年 11 月，煙台市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芝罘區正式實施。1995 年 10 月，煙台出台《煙台市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標幟著煙台市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深化，舊的住房福利性分配體系逐步廢止。

在煙台房改中，出售公有住房2111套，12.8萬平方米，回收售房款2400萬元。房改，加快了煙台住房資金的回收，逐步緩解住房緊張狀況；克服住房分配上的種種弊端，特別是克服分配上的不正之風；改變不合理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實現住宅設計和建設的多樣化、實用化。

他的一張王牌就是提高房租，每平方米月租達到2.4元，但拿工資者可獲得相當於月薪23.5%的住房津貼，這一來逼得那些用各種手段霸佔公房的人乖乖退出房屋，而政府則有了資金維修舊住宅，建造新商品房，大大刺激了煙台市房地產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煙台的成功經驗曾被中央向全國推廣。



國際SOS兒童村主席的庫廷參加煙台SOS兒童村落成典禮。右一為時任煙台市委書記俞正聲

以時任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為代表的業內人士對煙台房改有著較高的評價：提租發券方案是個首創，為全國房改做出了貢獻。發券不發人民幣，可以避免沈澱住房券流入其他流通領域，衝擊消費

市場。

赴煙台上任的第三年，也就是1987年，俞正聲當選煙台市長。由於來自北京，又是高幹子弟，背後還有鄧家的支持，當上市長的俞正聲一掃兩年多的低調行事風格，開始力抓外向型經濟，加上大刀闊斧進行房改，使俞正聲高調亮相中國政壇，成為當時最受矚目的市長之一。

煙台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推開，在國內外引起強烈震動。1987年9月29日，新華社發表長篇通訊《沖出黑洞》，突出報道煙台房改的事跡和經驗。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美國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舊金山考察家報和日本東京廣播電視公司等多家國外媒體的10多位外國記者前來煙台，對煙台住房制度改革進行了深入的採訪報道。洛杉磯時報記者在採訪後，由衷稱讚道：“我非常注意住房改革，煙台的改革在中國帶了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煙台住房制度改革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和輻射力，催發著城市的開發建設。1988年3月9日，煙台大面積城市居民區改造拆遷工程開工，民生小區（一期工程）建設拉開序幕。經過來自全市28支建築隊伍和市政、電力、自來水、熱力等單位3500多人295天的緊張施工，煙台房改後的第一個試驗小區——民生居民小區順利完工，42幢住宅樓和部分配套工程於1988年底全部交付使用，實現了市委、市政府年初提出的“當年動遷，當年回遷；當年開工，當年竣工”和“動遷居民春節前搬回新居喫餃子”的承諾。民生小區的建設，實現了收支平衡，節省了政府財力，提高了社會效益。小區內居民人均使用面積達到11.7平方米，比原來增加了3.5平方米，並提供商品房300餘套。

回想當年的情景，俞正聲十分感慨：“民生小區的順利建成，在當時那個年代，為城市開發建設闖出了一條新路。它同時也用活

生生的事實說明：改革是破解一切困難的有力法寶，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剛到青島上任就接受血與火考驗

1989年3月20日，也就在俞正聲44週歲生日的前幾天，他受命擔任中共青島市委副書記，5月19日，經青島市第十屆人大常務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任命俞正聲為副市長，接著他又擔任市政府黨組副書記。也就在這一年，上任不久的俞正聲就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

8月12日9時55分，一場空前的大災難突襲青島。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管道局勝利油田黃島輸油站油庫老罐區，五號罐因雷擊爆炸起火，三千平方米的巨大罐頂炸飛天空，油噴火烈，膠州灣罩於濃煙之中。如果火勢蔓延，引起連鎖燃爆，原油、罐群、碼頭、電廠以至整個青島城必將毀於一旦，後果不堪設想。



黃島油庫爆炸現場照片

據《青島年監》1990卷P252記載：俞正聲不顧領導和身邊人員勸阻，置身火災現場最危險的一線，具體指揮、實施救火方案，俞正聲副市長與公安幹警和工人親自扛著汽油桶搶運轉移。避免了一起惡性重大事故。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說，俞正聲的臉上、身上都沾滿了瀝青和油污，簡直都讓人認不出來了。經過56個小時的拼死奮戰，硬是把五個大油罐的火勢撲滅，到16日11時，終於消滅了所有的殘火點，17日，黃島油庫碼頭開始恢復生產，全體滅火搶險人員受到國務院通電表彰。在災難面前，俞正聲身先士卒，指揮得當的作風被傳為美談。

兩個月後，市委書記劉鵬調任中共山東省顧委副主任，郭松年市長昇任市委書記，青島市人代會十二次會議第三次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俞正聲為青島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長，行使市長職權，領導市政府的工作。俞正聲承諾，一定不辜負人民的重托，腳踏實地、勤奮工作，當好人民公僕。

俞正聲說到做到，督促有關部門確保市長公開電話暢通，確保信訪接待切實為群眾解決問題。他向退居二線的老同志徵求意見，拜訪專家學者，他和企業家、經營者懇談。他還經常到工廠車間、農村地頭調查研究，走上街頭直接聽取市民意見，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找到了撬動青島經濟騰飛的支點。

俞正聲指出：“我們的外經工作雖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和兄弟地區相比，步子還不夠大，尤其與青島所處的地位還不相稱。原因何在，關鍵是我們的思想不夠解放，開放的步子慢了半拍。”

在1991年4月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俞正聲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改革絕不能停止，對外開放應該步入更高層次。在他的倡導下，全市領導機關“知不足而後發奮”，緊急動員起來，

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首先大刀闊斧地改革對外經貿體制，將原來的外貿局、外資辦、外經委精簡合併成市經貿委，一個班子、一塊牌子、一枚章子搞招商、引資、外銷。接著，在繼續改革硬環境的同時，下大功夫抓軟環境改進，貿促會，經貿委實施合署辦公。"一條龍"對外服務，提高辦事效率，為外商提供最大的便利。接著，下大功夫扶植引導鄉鎮企業跨上外向型經濟大舞台，及時調整開放格局，一面改善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環境的，一面在市區又新開闢出十多個小區，供外商投資辦廠，就在這一年，作為青島外貿首次實行自負盈虧的 1991 年，青島全市出口額增長了 31%，實際盈利 3000 萬美元，新簽利用外資項目 341 個，其中 1000 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有 10 個。

這一年 11 月，青島市召開了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設青島、發展青島的戰略構想：充分發揮青島的優勢和潛力，繼續實施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抓好經濟調整和技術進步，以城市帶動衛星城鎮和農村發展，加快開發青島新經濟區的發展戰略，努力使外向型經濟有突破性進展，在全國全省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十四大成黨內試行民主"受害者"

1992 年，是青島市建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5 月 4 日這一天，對於青島來說，是一個永載史冊的不尋常的日子。在已經是山東省委常委、青島市委書記兼市長的俞正聲主持下，規模空前的對外開放工作會議要青島體育館召開。在這次有 3000 多人參加的盛會上，市委、市政府立下誓言：到二十世紀末，要將青島建設成為山東及至沿黃區域最大的對外經貿、金融、信息中心和對外交通樞紐，

初步展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城市的雛形。

俞正聲在講話中提出了調整開放佈局的思路：，以"一園二區三線"為重點，展開佈局、全面啟動、整體開放，逐步形成一個既能各有側重、優勢互補，又能梯次拓展、合力並進的對外開放格局。一園，既在嶗山區中韓鎮石老人建立佔地 58.5 平方公里的高科技工業園，二區，既加快建設經濟技術開發區，爭取設立建好保稅區，將開發區與黃島區實行體制合一，把整個黃島區 152 平方公里全部擴大開發區，積極向中央爭取享受浦東開發區的有關政策，並要研究探索建設跨海大橋或海底隧道，從根本上解決開發區與老市區的交通問題，爭取用二、三十年時間建成一個新青島。三線，既沿煙青、濟青、環島三條公路，建設一批招商小區，采用開發區的政策，集中興辦"三資"企業、"三來一補"和創彙農業。

也就在這個會議上，俞正聲宣佈了一個令青島上下為之震驚的消息：市委、市政府決定舉遷東部，原辦公大樓向商界包括外商有償轉讓，同時列入名單的還有市人大和市政協辦公樓，國家高科技工業園也在東部破土興建。

然而，這一決策開始並不為大多數市民特別是機關幹部所接受，多年來，他們生活、工作在這紅瓦綠樹的別墅群中，自得、自樂且自足，故土難離啊！而恰恰是這幾座辦公樓（實際上都是殖民地時的意大利建築）都處在青島號稱"寸土寸金"的商業區和風景區，是商家最眼熱的地皮。數年前，曾有外商開口要把這個地段買下建高層寫字樓，就因為不少人反對，甚至上書，甚至請願，讓市領導打消了念頭。這次，俞正聲可是鐵了心，我寧願落選，也要把事情辦成。對於上面來的壓力，俞正聲也坦然相對：如果要處分我，也希望是在我把這件事辦成之後。當然，市委、市政府也通過各種辦法、各種媒體，一級級、一層層深入細緻地做好思想工作，專家

們測算的結果也讓大多數市民服了氣：市委機關原辦公樓地段的價高達數百萬元一畝，比選定的新址貴十倍以上，這樣政府就可以騰出一大筆錢從事市政開發建設。而且，當時的青島市區南北狹長，發展局促，惟一可行的城市建設規劃方案只有向東拓展，而只有搬走市直機關，才能實現城市佈局由帶狀型向品字型佈局的轉變，才能繪就一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大青島的新藍圖。



當青島市委書記時的俞正聲

然而，在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俞正聲卻成為中共試行黨內民主的“受害者”。當時海外媒體指出，在十四大上，因頗具改革思想而且成績顯著，在主掌煙台和青島時贏得“品牌市長”美譽的俞正聲，再次被鄧小平青睞，江澤民對他也很欣賞，他們想安排他進入中央書記處，作為後續接班人進一步發揮才幹和鍛煉提高。

但這個意圖不能對黨代表明說，被蒙在鼓裏的十四大代表哪能領會中央意圖？竟在差額選舉中將他差了下來，只當了個中央候補委員。這下他進不了書記處，蹉跎了幾年。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

當上中央委員。

儘管十四大鎩羽而歸，未能如願進入中央書記處，但並未影響俞正聲繼續在青島實施他的市府東遷計劃。相反，他大張旗鼓推動的改革，使青島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

1993年1月5日13時整，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位於中山路2號的原市委、市紀委、市人大和市政協四大機關的辦公樓夷為平地。市直機關辦公樓的轉讓和東遷，促使東部建設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走向輝煌。也由於開發東部，拓寬了青島對外開放的空間，拉動了青島經濟的快速發展。

隨後的六年，便是青島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

調任建設部長，成全國房改的“舵手”

1997年8月，俞正聲告別了生活和工作了八年之久的被他稱為“第二故鄉”的青島，返回北京擔任建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調回北京半年後，俞正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自己的所有家當，還裝在一隻箱子裏。他笑稱自己是建設部裏“無房戶”。

對於媒體和房地產界專家所發的他調任建設部與煙台房改和青島城市建設有直接關係的評論，上任初的俞正聲曾這樣解釋說：

“我們部現在是一個正部長，四個副部長，五個人裏面四個當過市長。我相信我們部的這個結構對城市會更加瞭解；對人民生活關心的問題會更加瞭解；對城市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難也會更加瞭解。”

領導推動煙台房改試點，俞正聲有這樣的感悟：房改對群眾來說，心理上的壓力要比經濟上的壓力大；群眾在心理上若承受不了這一次改革，改革就無法出台；承認改革還有不合理的因素，向群

眾說明，隨著改革的深入，這些問題會得到解決，從而使多數群眾能夠理解和支持改革。

多年後，中國財經媒體評論稱，正是堅持“房改對最大多數的基層群眾有利”，從1997年下半年就職建設部後，俞正聲成為新時期全國範圍內房改的“舵手”之一。

總結房改的思路，俞正聲曾對外明確表示，“住房改革的思路還是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一次重要談話中所講的，主要內容是：（一）新房老房都要出售，（二）可以分期付款，（三）提高房租，（四）給低收入者予以補貼。”

1998年10月，俞正聲由副轉正，昇任建設部部長。

“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大會上，建設部被列為國務院的29個部門之一，綜合管理全國建設事業。作為新任建設部部長，我深感任務艱鉅，責任重大。”俞正聲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開門見山，語重旨遠。

在昇任建設部長後首次接受官媒體採訪時俞正聲說，本屆政府是跨世紀的政府。建設部的任務是優質高效地完成國家確定的各項建設任務，把建設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為全面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跨世紀宏偉綱領作出自己的貢獻，可謂任重道遠。

1997年8月至2001年11月，在建設部工作的四年經歷，被稱為俞正聲“政治生涯中的分水嶺”。2001年伊始，對俞正聲來說，是一個值得欣慰的時候。因為中國房改將全部啟動新的改革制度。

作為建設部長，俞正聲在任期內，感到突破最大的就是住房改革。2001年，中國人均居住面積將突破10平方米，這是他上任伊始絕對沒有想不到的。但對於這次新房改的進程，他始終認為任重而道遠。

俞正聲在建設部任職期間有一個習慣，他喜歡叫周圍的人搜集

新聞媒體對建設部門的批語意見。在接受採訪時俞正聲解釋說：我們每年開一次建設工作會。建設工作會，就要每個司，都要把這一年覺得認為應該在會議上批評的事情寫成材料報給我，開個會也不批評點不好的事情，這個會開起來就沒有味道。

至於他本人是否也挨過批評這個問題，俞正聲回答說，當然挨過上級的批評。“國務院領導批評什麼事，說明他很重視什麼問題，這個問題解決起來更快。”



出任建設部長的俞正聲

其實，那幾年中國建築市場相當混亂，違法違規案件層出不窮，這可能也是俞正聲自稱“經常挨批”的一個內容。據官方統計，僅勘察、設計、施工、監理、招標代理單位對430063個工程項目進行了自查，就查出16410個工程項目存在著違法違規行為，佔自查工程項目總數的3.82%。截止2001年9月，全國28個省、區、市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對124433個工程項目進行了檢查，發現有違法違規問題的工程項目15510個，佔受檢工程項目的12.46%。

從當年9月份建設部會同監察部對30個省、市、區進行檢查的情況看，建築市場混亂情況還遠未從根本上得到扭轉，違法違規行為數量之大、情節之嚴重、危害之大，讓人觸目驚心。

“通過這次建設部、監察部組織的全國整頓和規範市場大檢查，我們的心情很沈重。檢查中發現了大量的違法違規行為，大量的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行為。有些問題是非常嚴重的。”2001年10月29日，俞正聲在接受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和中國建設報記者聯合採訪時說。

俞正聲說，2001年9月份，“兩部”組織了10個檢查組，歷時近一個月，檢查了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275個工程。這次檢查兩個重點，一是市場行為，重點檢查招投標問題，違反規定建設程序問題以及施工中轉包、違法分包工程等問題；二是工程質量，檢查的重點是不執行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等問題。從目前初步統計的情況看，70%到80%的工程在市場行為方面存在問題；一半以上工程存在不執行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等行為。

俞正聲強調，通過這次檢查，我們的心情很沈重。檢查中發現了大量的違法違規行為，大量的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行為。有些問題是非常嚴重的。這種情況如果長期下去，我們全國建設系統是沒有辦法向人民交代的。

俞正聲還表示，在年底召開的全國建設工作會議上，還將對違法違規者痛下殺手。他還要求強化對工程質量的監管，對涉及質量、安全和公眾利益的工程建設違規者，要嚴肅處理。他說，今後對在自然災害中垮塌的建築必須審查有關單位的“貫標”情況，對違規者要追究法律責任。

然而，還沒等到年底，還沒等到兌現誓言，也沒等到對違法違規者痛下殺手，俞正聲便帶著“任期內推動了中國房改”等政績，

離開了建設部，把整治中國建築市場的重任留給他的繼續者、原北京市副市長汪光燾。

在俞正聲離開建設部後，有網友撰文稱，俞應該為中國房價居高不下負有一定責任。因為他“把房產的這個包袱，由國家轉嫁到老百姓身上，由此獲得中共高層的賞識。後又擔任建設部長，把這個‘損招’當作先進經驗推廣到全國。時至今日，全國上下誇豪門富的幾千家房地產開發商以及如荷重負般地幾千萬個‘房奴’，其禍首根源，正在茲也！”

湖北一上任燒了不止“三把火”

2001年的最後一天，官方媒體在簡訊中是這樣透露出俞正聲去向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12月29日通過決定：免去俞正聲的建設部部長職務，任命汪光燾為建設部部長。據悉，俞正聲已調任中共湖北省省委書記。

這是俞正聲第二次從京官轉為地方諸侯。16年前的這個時候，因大哥俞強生叛逃美國，鬱鬱寡歡的俞正聲被調到煙台時，還是個副局級。不過，16年後的再度離京，今非昔比的俞正生已是一員封疆大吏。他不但在十六大上連任中央委員，還在十六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也成為中部六省省委書記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此時的俞正聲，無論是官銜還是名聲，都已超過了“做過大官”的父親黃敬。“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在建設部工作期間的俞正聲曾這樣闡述“當官為什麼”的問題，“真正做到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縛，不為欲所惑。”

“在建設部工作期間，俞正聲已經在‘機構改革’工作方面卓

有成效，”當時湖北一位官員分析說，“這也許正是他到湖北來的原由之一。”

“新的領導班子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轉變作風，”俞正聲說，“沒有一個好的作風，改革很難推進。當前湖北面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亂收費，一是機構超編。機構超編造成‘食之者眾，生之者寡’。農民負擔過重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縣鄉財政供養人員過多。不從改進黨的作風入手，這兩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俞正聲出任湖北省委書記

2002年6月15日，剛剛當選湖北省委書記之後，俞正聲就做出了這樣的表態。

新書記的“初次出手”讓很多人始料未及，也讓很多人感到“很不舒服”。俞正聲首先砸掉了省直機關的“小金庫”。以往，省直機關多數都辦有報刊雜誌，而一些鄉鎮和企業往往不得不自己掏錢完成訂閱的任務。同時，還對部門的津貼發放較亂的情況進行了整治，省直機關一律停止自行發放津貼，生活補助一律統一為400元。再次，就是進行車牌改革，“特權車”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最後500張廳級機關持有的“省重要公務用車通行證”被取消，在湖北省各路橋收費站口，公務用車同樣要交納通行費。

有人說，三項措施看起來“動作不大”，但意義深遠。“俞正聲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逐步消除幹部的特權思想。”湖北省委一位官員說。

此事在政府部門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也引來了很多的怨言。然而，更多的怨言並不在此，而是對省直機關工資水平過低現狀的指責。

湖北省的人均生產總值在全國列第10位，但幹部工資水平卻在全國倒數。一位省直機關公務員抱怨道，“我們的工資水平甚至沒有達到西部省份的水平，以前有幾次加工資的機會，但俞書記最後拍板不加。”

俞正聲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解釋說，“很多人不理解俞書記的良苦用心，一方面湖北鄉鎮改革在裁人，一方面在加公務員的工資，這讓被裁的人心理怎能平衡？由於農民增收緩慢，國企改革大量職工下崗，相對來說，公務員的工資還是比較高的。”

面對怨言和指責，俞正聲有自己的看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曾說過，“用硬措施治理軟環境，就是要硬碰硬地解決這些問題，不怕得罪人，不要怕丟選票。我相信，只要真正為群眾，為了事業的發展，也丟不了選票。”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俞正聲剛赴湖北上任就這樣三把火燒了起來——砸掉了小金庫，統一了津貼的發放，取消了特權車。不過，幾年後俞正聲在接受採訪時“更正”說，剛一上任時恐怕不止“燒了三把火”，還做了更多的事情，比如說省直機關政企要分開，省直機關不要辦報刊，等等。

那麼，政府的一些毛病出現在什麼地方呢？俞正聲說，一類叫做腐敗，貪污、受賄，這個不能簡單地歸為機關作風問題了，這是另外一種性質了；第二類就是違反財經紀律，這跟貪污腐敗不太一樣，違反財經紀律，什麼錢都敢挪、什麼錢都敢用。

俞正聲接著舉例說，一個市的國土管理部門挪用土地專款兩千

多萬，幹什麼呢？蓋宿舍、蓋辦公樓，這個局長住多大的面積呢？280 多平米，膽大妄為呀。第三類就是衙門作風了，機關作風裏的問題很多。第四類就是我們的各種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授予各個單位的權限，產生的扯皮。從北京開始扯起一直扯到底下，所以這個機關作風很複雜，有多種因素。我剛才講的我們改進機關作風，采取幾條措施是從機制上，爭取切斷謀取利益的渠道。

在 2002 年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俞正聲對全省幹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有目標、但不要壓指標；要比較、但不要攀比；要有緊迫感、但不要浮躁。俞正聲說，他到縣裏考查時去不問 GDP，也不問工業增加了多少，只想看看有什麼新工廠，老工廠有什麼變化。如果沒有什麼發展的話，那你們發展太慢了，為什麼跟你類似條件的縣人家發展快，你發展慢啊。

俞正聲說，剛到湖北提出的"三要三不"，也是他多年的工作經驗。在山東工作了 12 年。在地方工作最頭疼的就是攀比速度，一攀比速度，政府長官的經濟行為必然變形，能不能戰勝這一點，是地方黨政負責人素質的一個非常大的檢驗。

抓鄉鎮改革——主政湖北一大亮點

"俞書記最大的特點是務實、低調，不張揚。經常到基層調研，往往一下去就是幾天，不用警車開道，也不要當地官員陪同。另外，他講話不愛讀講話稿，調研不喜歡聽彙報，而是自己直接到基層詢問、瞭解。"湖北省委一位官員如是說。

俞正聲上任後，便把農村的綜合配套改革作為工作思路當中的一個重中之重。2002 年 5 月，俞正聲未接受大家的勸阻，選定農民負擔重、縣鄉財政窮、工作矛盾多、發展困難大的監利，作為自己的聯繫點，尋求破解"三農"難題的途徑和方法。

俞正聲到監利之前，監利在全國已十分有名。只是這名聲，讓監利人感到萬般苦澀 因為監利是湖北七個財政特困縣之一，是"三農問題的代名詞、貧窮落後的代名詞、上訪告狀的代表隊"。

"這麼高級別的幹部，在一個縣裏調研，一次呆了六天，我從來沒見過。"監利縣新聞中心萬東方感慨。因為工作關係，有高級別的領導來，他都會趕到現場。

2002 年 6 月 24 日，俞正聲剛剛開完省第八次黨代會就來到監利。六天時間裏，他先後走訪了橋市、棋盤、龔場等三個鄉鎮，每到一處他都先進農戶家，再找村幹部，最後跟鎮長聊。

當時，一個鄉鎮的計生站長彙報計生站一年開支 14 萬，招待費 3 萬多元。俞書記沒有責備，而是說"我們是來調研的，有問題不隱瞞，肯講實話應表揚"。群眾看俞書記"肯下深水摸魚"，有什麼就說什麼。

在監利縣委有關的記錄資料中，俞正聲為稅費改革五進監利，並且有多次是暗訪。

說起上任第一年十赴監利，俞正聲還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時省委領導幹部確定責任點時，一開始監利並沒有分到他這個省委書記的頭上，是他自己主動爭取的。俞正聲說，"有的同志建議說你別惹監利的事，監利人一天到晚告狀。我說監利的矛盾最多，它反映的情況最多嘛，我去聯繫監利農村的真實情況嘛，我能知道的更多嘛，最後確定的是我聯繫監利。"

"到農村之後，你用不著去挨門挨戶私訪，農民就把你圍住了，就給你反映負擔有多重。"俞正聲說，那一刻他心裏並沒有昇起一股無明火，因為它是體制問題，所以不能簡單地責備鄉村兩級幹部。

在談到自己對農村綜合配套改革工作最大體會時，俞正聲說，

"最大的體會就是農村的問題，必須解決農民的負擔和農民的收益，所以要解決好農民、農村的問題，必須把農民的利益問題放在我們工作的非常重要位置，放在自己心中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談及關於新農村建設應該注意的問題，俞正聲說："隨著城市支援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力度的加大，在有些農村幹部中間，產生了等靠的思想，要警惕這種思想苗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能全靠國家啊！靠來靠去，把時機都耽誤掉了。必須立足於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這恐怕是我們要注意的一個問題，要對幹部普遍進行教育。"

2002 年 11 月，俞正聲第一次到咸寧市咸安區視察。咸安改革推行者、原咸安區委書記宋亞平在回憶時說道，這次視察對咸安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咸安改革一直在爭議中推行的，以前高層領導不表揚也不批評。"俞書記肯定了咸安改革的勇氣和魄力，給了我們極大的精神支持和鼓舞，同時對有爭議的改革內容作出肯定。"宋亞平說。

新任省委書記的肯定平息了此前的爭論，此後，咸安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2003 年 11 月 4 日，六易其稿的湖北省委省政府《關於推進鄉鎮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試行）》（鄂發[2003]17 號）正式出台，這就是人們熟知的"17 號文件"。完全以咸安改革為藍本的"17 號文件"出台後，湖北省的鄉鎮改革擴大到七個試點縣市。隨後，湖北省決定在全省範圍內推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更大範圍的改革拉開帷幕。而在這一系列文件和決定出台的背後，俞正聲扮演著策劃者和推動者的角色。

有學者認為，鄉鎮改革是稅費改革後的必然趨勢，俞正聲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並將改革做大，為全國的鄉鎮改革起到了探路的作用。親自抓鄉鎮改革是俞正聲主政湖北的一大亮點。

2005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湖北作為成功的典型在大會上作了報告。可以說，俞正聲在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問題上的作為不僅得到了中央的認可，還成為其他省份學習的標杆。

當時有官方媒體評論說，作為昔日的建設部長，俞正聲主政湖北為當地帶來更寬廣的視野和改革力度。他大力推進區域內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湖北實施"千億元產業計劃"，傾全力培育壯大汽車、鋼鐵、電子信息、紡織服裝、食品、化工和金融、保險、信息、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對此，俞正聲強調，只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到位，經濟增長才有後勁和潛力。

2007 年 6 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在省八次黨代會上明確提出了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建設武漢城市經濟圈，即以武漢為核心，包括黃石等周邊 100 公里的八個城市，逐步將其發展成內陸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之一。

空降上海，稱"有一個做事的機遇"

俞正聲曾告訴湖北官員，"一定要把湖北這壺水燒開才走。"不過，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後，還沒等俞正聲把這壺水燒開，他就不得不告別湖北了。

2007 年 10 月 26 日，俞正聲告別湖北，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官員陪同下前往上海。10 月 27 日下午，穿著一身深色西裝、打著銀灰色領帶的俞正聲出現在上海市黨政負責人大會上。

會議由剛剛在十七大上晉陞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主持。同樣是在十七大後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

源潮在，在會上宣佈中央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俞正聲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決定。

只在上海當了七個月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在講話時指出，這次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中央從全國工作的大局出發，充分考慮上海市的地位作用和領導班子建設的實際，根據工作需要，經過反覆醞釀、慎重研究決定的。

李源潮在講話時說：上海是國際性大都市，也是我國最大的經



習近平入京，俞正聲進滬

濟中心和經濟發展的排頭兵，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央對上海領導班子建設一直十分重視。這次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中央從全國工作大局出發，充分考慮上海市的特殊地位和領導班子建設實際，根據工作需要，經過反覆醞釀、慎重研究決定的。在向上海黨政幹部介紹新市委書記時，李源潮高度評價說，俞正聲政治上成熟，大局觀念強。領導經驗豐富，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擔任過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和中央機關部門的一把手，組織協調和駕馭全局

能力強，決策果斷，推動工作力度大。思維敏捷，思路清晰，有開拓創新精神。事業心、責任感強，作風深入紮實，重視調查研究，關心群眾生活。公道正派，敢於堅持原則，自我要求嚴格，在幹部群眾中威信高。

首次亮相上海的俞正聲說：中央派我到上海來工作，是一個十分光榮的任務。在上海這麼重要的崗位上，承擔這麼重要的任務，是給我一個做事的機遇，我一定會珍惜這個機遇

俞正聲第一次在上海講話就提到了前市委書記陳良宇：上海的幹部勤於思考，視野開闊，忠於職守。陳良宇嚴重違紀案件和社保資金案發生後，並沒有影響對上海幹部的整體評價，上海幹部的素質是全國一流的。我認為，我們有能力、有實力做到這一點，我們更應該有自信做到這一點。我願意每一天都抓緊工作，和上海的同志們一起做出自己的努力。

俞正聲最後表示，希望大家監督我，在廉潔問題上，發現或者聽到，無論是我，我的家屬，我的親友，請你們告訴我，講得對我會改正，不符合實際的，我也會告訴大家實際情況。希望大家認真貫徹、嚴格執行中紀委決不容許給領導幹部親屬特殊照顧的決定。

就這樣，俞正聲成為上海這座大都市13個月裏的第四位“一把手”。在與上海黨政幹部見面後，俞正聲的入滬第一站，像他的前任習近平一樣，選擇參觀一大、二大會址，那裏是中共誕生地。

10月30日上午9時，俞正聲和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市委副書記殷一瓘，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丁薛祥等，瞻仰了中共“一大”會址和中共“二大”會址，並來到上海市檔案館，參觀“為民、務實、清廉——上海市加強作風建設推進反腐倡廉檔案文獻圖片展”。

隨後，俞正聲開始了密集的調研。儘管報道寥寥，但“俞氏風

格”已震動上海官場——下去調研不為肯定成績，只為尋找問題，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上任一個月的時候，俞正聲個人作風低調，經常輕車簡從出巡，不要警車開道、不按理出牌，常讓下屬單位招架不住，和因社保弊案下台的前上海一把手陳良宇張揚作風形成鮮明對比。

《南方週末》以《上海灘一年變局》為題，跨版報道俞正聲到上海後低調務實的施政風格。當今上海報紙、電視已不像陳良宇主政時，天天是市委書記大人視察、調研報道。俞正聲說，“下去調研不為肯定成績，只為尋找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俞正聲還要求《解放日報》刊文說，官員調研不是圖形式、走過場，他有意掃除“領導的政績不是在報上，就是在戲台上”的官場弊端。

在俞正聲上任整整一個月後，香港媒體說，短短一個月，上海各級官員已逐漸感受到俞正聲獨特的“俞式風格”。“在今天的調研中不避諱的‘問題’，有可能明天就成了你的‘政績’，這就是俞正聲主政上海極力倡導的一種務實的幹部作風。”一位上海官員這樣說。

以調研為例，俞正聲的“提問式調研”，讓人感受到了明顯壓力。在某區調研時，俞正聲不時地打斷彙報進行提問，內容多是彙報數據和表象背後的深層次問題，並要求彙報者主要談問題、找差距。俞正聲還要求提問必須由彙報的黨政一把手親自回答，不能由分管副書記、副區長或者秘書等代勞。

此等規矩一立，對申城政壇震動不小。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特地發文——《為“提問式調研”稱好》，雖然文章以“某位領導”來稱呼“俞正聲”，但各區縣和委辦局的領導們都已紛紛行動起來，一方面加強業務學習熟悉分管工作情況，另一方面則主動

轉變“被動式調研”的模式 並在對下級的調研中提出了同樣要求。

要求彙報者“報憂不報喜”，這是“俞式調研”的另一特點。主政上海後，俞正聲向申城各級官員強調著一種思想：調研不是去肯定下級的成績，也不是聽歌功頌德，而是要主動地發現差距、解決問題。調研不能圖形式、走過場，而必須切切實實解決問題。

上任一年，“俞氏風格”成談資

2007年10月27日，俞正聲正式走馬上任時，上海的情況多少有些特殊：剛經歷了陳良宇事件的上海，來自國內外的目光都緊盯著這座中國改革開放“橋頭堡”的城市，無數人在揣摩“俞正聲時代”上海能否消除震蕩、塑造一個嶄新的形象：陳案之後中央如何定位上海？

擔任上海市政協兩屆常委、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余源培認為：“中央嚴肅查處陳良宇事件，是為了能夠發揮上海之於全國的更大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更看重事實帶來的信號：“僅僅從中央讓習近平‘空降’上海穩定局面這一步棋，就知道在中央心目中上海的分量之重。”在毛壽龍看來，習近平雖然在上海只待了短短七個月，但事實上已把上海帶回高層關注的重心區域。

中國的政局往往通過官員調動即能窺其大概。上海市委書記一職向來是地方幹部中最重要的。京滬兩地多位學者分析，當時中央已經決定了習近平作為未來中國政治的重要高層，自然要將其安排到一個能充分考驗其施政能力的地方。恰逢上海出了陳良宇案，習近平“空降”上海正是時候，亦順理成章。

然而中央一紙調令，習近平走了，俞正聲來了。“不過，習近

平在上海贏得了政治聲譽，上海也可以放心，習近平將來自然會繼續關注上海。”在多位學者看來，上海早已被習近平“帶回”中央。

不過，更多認為“中央從未丟下上海”的人是從上海本身的特殊地位出發的。余源培對時代週報說：“上海改革開放 30 年已經打下了紮實的基礎，30 年來對全國的貢獻是巨大無比的，既有鄧小平點頭之下的浦東開放經驗，也有江澤民助推的四個中心建設。”

但是，正因為上海對全國來說太重要了，俞正聲的到來，更讓大家期盼他將怎麼做、會做得怎麼樣。一年過去了，從上海官員和學者的評論來看，“俞式風格”已經作為人們閑暇時的談資，毫不避諱，蔚然成形。



俞正聲率上海黨政代表團赴都江堰市調研對口援建工作

時年 63 歲的俞正聲一開始讓外界持“觀望”態度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他的“高齡主政”，即，他究竟是否打算真正做事。據上海市委一位官員透露，當時很多區縣一把手眼睛都“緊盯著”俞正聲，因為經歷過陳良宇案的政界，再也經不起一丁點風生水起了，人人異常謹慎。“但是，俞正聲在很多內部會議上始終表示：該幹

的還是要幹。”這位官員回憶說。

余源培就不這麼看問題，他不覺得俞正聲的年齡是劣勢，反而認為正是可以為上海實實在在做點事兒的契機。“通常在這個位子上的年輕點的官員，總還想著能再昇一升、動一動，但由於俞正聲的年齡，恰好可以使他安心在上海好好幹，而非做一個過客。”

事實上，無論從俞正聲的講話還是行動，都可以清晰勾勒出其平實做事的風格。

在 2008 年 1 月上海兩會期間，俞正聲在一次以市委書記的身份參與的組團討論中這樣說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官員幹部是怎麼想的，我是很想做點事情的，我不想等我五年後退休的時候發現自己什麼都沒做，我不知道你們急不急，但我確實很急。”而在其他的區縣組團討論中，俞正聲一直是以普通人大代表身份參與討論，而非坐鎮中間聽套話。

時代週報說，據瞭解，俞正聲對自己的秘書也“看管”很嚴，因為有陳良宇的前車之鑑，以防止出現第二個“秦裕”。除此之外，據余源培透露，俞正聲還廢除了一個土規則，“過去上海政界有個潛規則，一些局級幹部退休之前三年都要到國企去充當個什麼名分，其實就是給機會讓他們賺點錢 一直以來都是出於‘高薪養廉’的思路，但俞來了之後，就不搞這個土政策了。”另外，上海的“四套班子”成員也實行了陽光工資制。

此外，俞正聲的“全國視野”在第一年中一次次得到事實應證，亦成為上海發展新模式的指向。老百姓感受其“全國視野”更多是通過媒體報道，“上海是全國的上海”，“我們要跳出上海看上海”，“上海要更好地服務全國”……但從滬上官員的嘴裏，他們卻在大小會議上被俞正聲提醒：“我們一定要考慮人家會怎麼看。”

余源培認為，如何處理好與全國的關係無疑是一場力量的博弈，這不是上海一個地方的難題，在中央統一政策下地方特色如何體現一直就是個難以攻剋的難題。"又要考慮不出格，又要維護本地的利益，這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陳良宇時期咱們做得'過'了，俞正聲來了重提中央權威，這本身就是適時之舉，亦是明智之舉。"

在學者們看來，上海要防止成為全國的"飛地"，即特殊之地，上海過去抑或將來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央政策的支持以及全國各地的支持，若過度強調自身的"特殊"，恐會釀成"樹大招風"的不良後果。

楊佳襲警案讓上海和俞正聲名聲掃地

2008年7月1日上午，楊佳沖入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殺死六名警察，另有三名警察和一名保安員受傷。"楊佳襲警案"經媒體披露後，立即震驚全國。

楊佳28歲，北京人，中專文化，沒有工作，沒有女朋友，熱衷於參與戶外論壇組織的野外徒步活動，網名為"非常旅程"。在同行"驢友"（指參加野外旅遊、自助游的朋友）的眼中，楊佳腼腆內向，會做很好喫的雞蛋煎餅。

上海市公安局在案發後的通報，以及此後楊佳案的審判，對這起舉國震驚的行凶案做了詳盡的還原。

2008年6月下旬，楊佳來到上海，購買了一把"鷹達"牌單刃刀（刀全長29厘米，其中刀刃長17厘米）、催淚噴射器、防毒面具、汽油、鐵錘、手套等。7月1日上午9時40分，楊佳攜帶上述物品，來到位於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578號的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


楊佳檔案照

根據楊佳案一審判決書，楊佳首先在閘北公安分局門口投擲裝有汽油的啤酒瓶引起燃燒，並趁保安員滅火之際，頭戴防毒面具闖入閘北公安分局辦公大樓。

在閘北公安分局辦公大樓底層大廳等處，楊佳先用刀砍擊保安員顧建明頭部，繼而持刀分別猛刺正在工作且赤手空拳、毫無防備的民警方福新、倪景榮、張義階、張建平的頭、頸、胸腹等要害部位，致四名民警當場受傷倒地。

之後，楊佳沿消防樓梯至9樓和至11樓途中，又持刀先後猛刺、猛砍赤手空拳且猝不及防的民警徐維亞、王凌雲、李坷的頭、胸腹等要害部位，致徐維亞、李坷當場受傷倒地，並致王凌雲受傷。

楊佳繼續沖上21樓後，又持刀刺傷正在等候電梯的民警吳鈺驊，並闖入2113室行凶，致民警李偉受傷，終被在場民警林瑋以及聞訊趕來支援的幾位民警當場捕獲。

最終，方福新、倪景榮、張義階、張建平、徐維亞、李坷六位民警搶救無效，因失血性休克於案發當日死亡；民警王凌雲、李偉輕傷；民警吳鈺驊、保安員顧建明輕微傷。

在楊佳案二審的公開開庭中，此案的來龍去脈得以展現。

根據楊佳和有關民警的證詞及錄音可知，2007年10月5日晚，

楊佳騎一輛無牌照自行車，受到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邏民警薛耀盤查。楊佳表示不理解："為什麼這麼多（騎自行車的）人只有我被查？"並要求民警"拿出法律依據"。雙方發生言語糾紛後，楊佳撥打了110、公安熱線、上海公安局督察隊等電話投訴。最終，楊佳被民警帶到芷江西路派出所。

據楊佳在法庭上稱，他到派出所大廳後，一位民警說話靠他太近，並在說話時把唾液吐到他身上。他躲避之間無意走向門口時，被幾位民警"腳不沾地"地抬進了派出所裏間的工作間。而有關民警解釋稱，當時因為懷疑楊佳想逃跑，故有此舉動。這一段情節，雙方的敘述雖有一定分歧，但基本與派出所提供的監控錄像顯示的場景相一致。

楊佳與民警的證詞完全背離之處，是在進入工作間後發生的事情。楊佳稱，他被拖入工作間後，被至少六七位民警圍毆兩分鐘左右，導致自己"衣服髒了，褲子破了，手臂和後背出現淤青"。但所有民警的證詞均稱沒有毆打楊佳，楊佳也沒有受傷。關於這一段情節，派出所沒有提供錄像作為證據。

之後發生的事情是：在驗證了自行車的來歷後，派出所放楊佳走人；楊佳因"被毆打"之事"糾纏"了幾個小時後，在次日天將亮時才離開派出所。

此後數月，不服的楊佳多次投訴，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也兩次派人至北京與其協商。楊佳要求公安局方面就其投訴出具一份書面的"調解書"，未獲同意。楊佳說："你們不出書面憑證就是要私了的意思，私了給1萬元。"這句話在一審中，被法院認定為楊佳的"無理要求"。對此，楊佳在二審法庭上強調，這句話自己只說過一次，不是真的想要錢。

後來，數次交涉無果，楊佳最終於2008年7月1日踏上了殺戮之路。

2008年7月4日，就是"楊佳襲警案"發生的第三天，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實地察看上海閘北分局現場，並同閘北公安分局幹警進行座談。俞正聲說，"上海的社會治安形勢總體是好的，上海公安隊伍的整體素質也是好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充分相信上海公安有能力維護上海社會治安的持續穩定，充分信任上海公安隊伍。"

在與閘北公安分局幹警座談時，俞正聲指出，要充分肯定上海公安機關在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履行自身職責方面取得的成績，充分肯定廣大公安幹警為之付出的艱辛勞動，充分估計當前執法形勢、環境的複雜性和嚴峻性。

俞正聲表示，公安工作是和平時期最危險、最艱苦的工作，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千方百計地給予更多的支持、理解和幫助，切實改善複雜執法環境下的執法條件。上海公安隊伍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法為民的方針，堅定不移地貫徹嚴肅執法的原則，堅定不移地貫徹從嚴治警的方針。各級公安機關要一心一意地抓好當前工作，全力做好奧運安全保衛工作，繼續為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社會的安定秩序、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堅持不懈地奮鬥。



楊佳出庭受審

8月26日，作者林明理在中思網發表題為《呼吁俞正聲書記借楊佳案推進司法文明進步》一文。文章指出，“楊佳襲警案”之所以備受關注，不僅因為案情重大，更是因為仍有許多明顯的疑點沒有揭開，而上海有關方面的解釋不但不能讓公眾滿意，許多做法更是讓輿論質疑不斷。它包括：楊佳只因自行車被查而起糾葛，最後為何發展到襲警殺人；上海警方到蘇州異地抓捕在網上發佈了《上海襲警事件內幕》一文的青年郏嘯寅，涉嫌執法犯法；上海警方為何不全部公佈當初訊問楊佳時的錄音；公眾懷疑楊佳的母親王靜被有關部門非法綁架；楊佳的辯護律師謝有明同時還擔任著上海閘北區政府法律顧問的身份，并發表對楊佳不利的言論，涉嫌違法違紀等等。

10月22日，趙大華在價值中國網發文呼吁中央政府出面，還當事人以公道，還公民以信任。文章指出，上海司法系統如此審理楊佳案，是對國家法律的蓄意踐踏，是對社會正義的公然對抗，是對民意輿論的傲慢蔑視，是對社會文明的惡劣破壞。當在上海這個地方，司法系統這種非法違法行徑不能得到制止糾正的時候，中央政府應該及時出面，還法律以嚴肅，還社會以正義，還當事人以公道，還公民以信任。

文章最後說，在法制得以維持、司法系統正常運作的情形下，政治不應干預司法；但是，在司法系統破壞法制、運作出現故障、不能依法辦案、出現以暴易暴現象、明顯地極有可能地製造冤假錯案的時候，政治則必須干預司法，診治司法病體，糾正司法偏差，匡扶社會正義，救濟弱勢群體，將司法校正回歸到正常的軌道——這不僅是符合天經地義的社會法則，也是維持國家常態的恰當選擇。

“因此，我們，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正義的名義，呼吁中共中央政治局干預楊佳案的審理。”

不救樓市不減稅，挑戰中央政策？

自2008年9月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各國一方面紛紛推出各自的經濟刺激方案，同時通力協作，共同對抗這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及時出台擴大內需、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一攬子計劃，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

面對金融危機，上海將更多依靠市場手段來發展經濟。2009年1月14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表態，上海未來減稅空間不大，也沒有拯救房市的打算。企業需要依靠市場，走出一條應對金融危機的新路來。

這樣的表態，讓一直期待政府出手相救的企業深感意外。實際上，2008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形勢變化對上海企業的不利影響逐漸顯現。

進入2008年9月份以後，上海經濟增速大幅度回落，財政收入、工業生產、外貿出口等一些重要指標同時出現負增長，一些企業處於改革開放以來最差的經營情況。此外，前期降低存貸房利率等刺激房市的政策也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在1月14日召開的政協會議上，有委員提出上海應加大對房地產的扶持力度和企業的減稅扶持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俞正聲在回答時表示，上海要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在第一位，至於減稅，空間不大，也沒有拯救房地產的打算。他解釋說，目前上海的困境，雖然主要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但和2007年股市、房市虛高的因素也有關。因此，上海產業結構本身的問題亦不容忽視。俞正聲認為：“克服當前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上海要把調整經濟結構

放在第一位。”

市場人士認為，“不減稅”與上海財政收入急速下滑有關。根據統計數據，從2008年第三、四季度開始，上海財政收入就急劇減少。2008年11月，更是首次出現負增長，高達負9.5%。2008年12月，財政收入仍出現2%的負增長。

財政收入銳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地產市場的低迷。根據媒體的調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上海全年商品房用地（含住宅及包括住宅的商業用地）成交量為278.49萬平方米，成交總金額僅為174億元，而200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16.97萬平方米和602.26億元，僅是成交金額便銳減七成。而土地成交量的急劇減少，直接影響了上海市政府的財政收入。

仲量聯行亞太區董事陳立民分析了上海財政收入的客觀形勢，他說：“客觀上全國各地不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有40%到50%來自土地金，上海的具體比例雖然不清楚，但可以確認所佔份額不小。那麼如果按目前市場狀況持續下去，上海財政收入會存在比較大的缺口。”

“不減稅，不救市”的言論傳出以後，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反響。首先提出異議的是房地產企業和部分房地產專家。在他們看來，連美國都會通過行政手段來救市，上海沒有理由不救市。他們堅信，只要房地產市場復甦，就能救活一大批企業。

相比之下，普通市民大多傾向於支持“不減稅、不救市”的辦法。在他們看來，行政措施很容易服務於利益集團，最終既不能救市，也容易造成新的問題。何況，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也不一定有能力能拯救市場。

衛明不動產營銷智庫總經理蔡為民表示，自從2008年6月份開始，政府就積極采取措施救房市，但無論買方和賣方都沒反應。一

方面是政府拼命降稅，造成開發商有心理預期，以為政府降稅還有空間。政府太積極了，反而使開發商有幻想，遲遲不降價自救。不救市的提法，就是警告開發商要配合，否則政府就會“坐視不管”。

不過，俞正聲的“不減稅，不救市”在港台媒體看來，是挑戰溫家寶中央政策。中國時報稱，繼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不救落後倒閉企業”之後，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上海“兩會”中表示，“目前不救樓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已勢在必行”。但上海、廣東兩地轉型期間可能發生的溷亂不安，卻使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重視的“穩定”受到衝擊。


俞正聲談經濟

在金融危機爆發後，面對席卷而來的企業倒閉潮，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對外表示“不救落後企業”，對當時急需紓困的中小企業投下了一記震撼彈。

其後，財政收入上繳量全中國第一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面對救不救市的爭議，說出了“談不上救市，支持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言論，表明了其“不救市”的立場和汪洋一樣，俞正聲認為，上海要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唯有調整產業經濟結構。

評論稱，汪洋和俞正聲兩人從地方官的立場出發，都有著相同的思考脈絡，“危機就是轉機”，藉由這次的經濟危機，讓低廉的勞力密集性產業“出走”，進行經濟轉型，發展現代服務業體系。然而，對中共中央來說，放任企業倒閉和大量的失業農民工無疑會威脅社會的穩定秩序，對其政權造成影響。

但是，吳仁壽在《為俞正聲政府不救樓市表態鼓掌》一文中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房地產市場寒風陣陣，交易量大幅度下滑，資金鏈有斷裂的危險。在房地產市場下滑跡象明顯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悄然推出“暖市”政策，包括購房入戶、免稅降稅、購房補貼等購房優惠措施等，希望刺激房地產市場消費，挽[illegible]樓市的頹勢。

事實上，如今的房市，並不是沒人買的問題，而仍然是買不起的問題。房地產市場之所以不景氣，正是此前房市不健康的纍積效應，是房市泡沫開始破滅、房價趨於理性回歸的表現。這個時候，政府要做的，應該是儘可能讓房價降到一個合理的、大多數市民能夠承受的範圍，而不是用納稅人的錢去單方面拯救房地產。政府倘若急於救樓市，這樣做，等於變相抬高房價，其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房價永遠降不下來，買不起房的人永遠買不起房。

再者，一個法制政府，在行使權力的時候，須走必要的程序。比如說救市，就涉及到“誰來救市，救誰的市”的問題。換句話說，用於救市的資金來源和預算是如何安排的？經過納稅人同意了嗎？如果這些問題不搞清楚，政府想把錢給誰就給誰，其合法性就值得懷疑。弄不好，人們還會覺得，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穿著一條褲子，不光彩地成了開發商的推銷員。

由此說來，俞正聲“政府不救樓市”的表態是明智之舉，既切中了房地產市場的時弊，更代表了廣大老百姓的心聲。文章最後說，俞書記“政府不救市”的表態，更彰顯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智慧、膽識和勇氣，值得為之鼓掌。

市民的呼聲與期待：俞正聲來真的？

2009年8月2日晚，上海多家電視台播放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訪談節目。俞正聲暢談履新上海後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上海經濟的轉型”及“歷史遺留的利益調節”，他說，希望這些問題能在任內有所突破。

俞正聲還直言來滬後只想努力做到盡職，並感嘆“上海一把手”不好當。

俞正聲透露，陳良宇事件之後他到上海履新。當時政府在群眾中威信受損，要改變這種狀況要靠幹部自身作風的改進。他解釋：“要使上海群眾支持我們，就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努力。”俞正聲坦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提法很早就有，剛來滬時他並不知道本地缺個管金融的副市長，後來就向中央建議，選派得力人選來滬工作。



俞正聲接受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吳小莉採訪

在談及金融中心建設時，俞正聲認為，除人才外，制度建設也是重大挑戰。他表示，到2020年，上海要建成與中國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符合國際慣例的稅收、信用、監管等法律法規體系，需要做大量的艱苦工作，“我們跟香港的差距就在這，這事兒我們要把它研究清楚，然後向中央提出建議，逐步加以推進。”

俞正聲還說，今年1月母親范瑾去世後，並未謀求特權，而是將父母的骨灰合葬在某個普通公墓中，甚至墓碑上也未涉及任何與父母生平及官銜有關的內容。“父母希望我做個正直的人，做個跟老百姓一樣的人，不要有特權。”俞正聲感嘆，這樣的做法既符合父母的心願，也是他做人的準則。

俞正聲談及“閔行在建樓傾倒事故”時表示，上海市對該事故的主要處理原則有三條，即“快報事實”、“慎報原因”、“依法處置”。他表示，凡是違法都要嚴肅查處，再高的官員也不會包庇，“陳良宇中央不一樣嚴肅處理嘛，所以沒有任何包庇的理由，但是對人的處理要慎重，把事實搞清了，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俞正聲在訪談中還說，總想別人如何評價自己，就會妨礙正確決策，“我不希望做這樣的領導，要對歷史負責，對上海和全國人民負責”。

訪談播出後，多維社的文章指出，俞正聲感嘆“上海一把手難當”，感嘆的背後意味著上海高官需要重整。

其實，俞正聲舉例的上述這些歷史問題，各地都有，上海的一把手原來也並不難當，至少陳良宇在位時當一把手很有權威，很舒暢。正因為俞正聲書記的前任稱霸一時，留下的不僅是難以肅清的餘威，還有各種緊緊抱在一起的利益團夥。有些人還自以舉報陳良宇有功自居，依然拉幫結夥，包庇涉貪官員，打擊舉報者。知情人告訴多維，北京新一輪公安系統反貪，揪出公安部的高官，但要徹查上海一些公安系統的涉嫌腐敗官員，受到了來自上海市政府主要領導的阻力，難以推動。而一些舉報上海官員涉嫌腐敗的市民，更遭到迫害。

2009年8月25日出現在中文網的一篇文章，其標題是《上海市民的呼聲與期待：俞正聲來真的？》，其中心內容就是呼吁市委書記俞正聲能像重慶市委薄熙來學習，能對上海貪官動真格的：

最近半個月以來，大約有三十多名大律師紛紛與部分上海市民、訪民、冤民進行了認真的和平談判，代表歷屆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房屋拆遷、土地徵用、企業轉制等問題上誠懇地向上海市民認錯，表示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解決訪民、冤民的實際問題。律師們耐心聽取冤民的申訴，詳細作了談話記錄，並表示一定將這些情況如實向俞正聲、韓正等市委、市政府領導人作出彙報，市委市政府下定決心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我們上海市民對上海市委、市府領導人的想解決冤民實際問題的意願表示讚賞，我們將用耐心花六個月的時間觀看俞正聲的實際行動和客觀效果。

我們感到：俞正聲應向薄熙來學習，到重慶工作一年來將公安局長、司法局長等幾百個大小貪官拉下了馬。俞正聲到上海工作亦已一年多了，上海官員的貪腐情況比重慶要嚴重幾倍了，而俞正聲至今抓出了幾個貪官？

俞正聲如果工作有困難，我們說：“你不要怕，你只要真誠依靠廣大上海市民，我們會大力支持你的，你的政績絕不會亞於薄熙來的！上海的反腐定會有更大的進展！否則，俞正聲的名聲可能比陳良宇還差！

9月1日，由200多名上海維權民眾署名的《上海維權民眾致俞正聲公開信》又引起網友的廣泛關注。公開信說，現在上海地區的官員惡意勾結地方奸商、權貴，公然在與民爭利，直接侵害公民財產與傷害公民的人身權利，藐視共和國刑法懲處刑事犯罪的法條存在，無視法定的物益權人應予受到法律的保障，請求俞正聲認真負起責任，嚴肅而認真地予以查處。

尊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先生閣下：

我們是上海市民，又是上海地區性暴政下的一群難民。

在陳良宇執政下統治上海的年代，我們的家園、財產都被地區政府勾結奸商掠奪，從此我們本來富裕的生活一落千丈，一下子掉在貧困線上拚命掙扎著，許多人喪失不動產後居無定所，只能過著四處漂泊與流浪的生活。

我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國務院《信訪條例》，依法向本地政府、中央政府反映問題和提出合法合理的訴求，並要求各級政府領導人為我們作主，要求歸還我們的家園與財產。可是我們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們依法要求歸還自己財產的過程中，竟然遭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迫害，有的被關黑監獄、治安與刑事拘留、勞教、判刑入獄，有人甚至於遭到暴打後還為此喪失性命。每逢在政府的敏感期間，例如：五一、六四、六一零、七一、十一、黨代會、兩會、奧運會，乃至今後的世博期間，我們都會遭受限制人身自由，非法監控、關押黑監獄、關精神病醫院，甚至有的為此無辜被拘留、勞教、判刑。

今年是建國六十週年大慶。你們以“穩控”為由，卻把我們這些人列為假想的敵對勢力，已經早早部署好怎樣對待我們，早以由市信訪辦把黑名單下發各級部門，要對我們實施非法的、近兩個月的限制人身自由。同時，非法監控與非法關押的負面成本很大，如：所謂“穩控經費”來自於政府與警方，其權力的大小則決定“穩控經費”的使用與分配權，只要以當事的看守數人簽名為準，不用任何手續下支配該金額就能成立，他們層層分割其中的利益，每人都能從中撈取好處。刻薄我們的，他們的腰包就能多得起來，除了雙重工資外，還有津貼、額外獎勵費，級別大小又產生了獎勵的大小，當“穩控”結束後還組織他們旅遊。足以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寧肯

亂花納稅人的錢財，在行政上任意支付大額開支，就是不肯依法解決違紀、違法下的經濟賠償問題。但是，最大的弊端莫過於基層腐敗之風從此大盛其道！

……尊敬的俞正聲書記，您應該具備“黨性”，更應該具有一些人性。中共中央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在上海地區性行政方卻出現與此相悖的現象。現在上海地區的官員惡意勾結地方奸商、權貴公然在與民爭利，直接侵害公民財產與傷害公民的人身權利，藐視共和國刑法懲處刑事犯罪的法條存在，無視法定的物益權人應予受到法律的保障。眼下正值全國人民矚目上海世博即將召開的250多天之際，我們大聲地疾呼：“應該出台可操作的、有實質的懲治腐敗，嚴查官商勾結與錢權交易，根據中央精神，特別要查處：“嚴重侵害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

現在我們身上所發生的事件，正是符合較為典型的地區性行政腐敗的例證。因此，請求您認真負起責任，嚴肅而認真地予以查處！為此我們有理由要求：違法要追究，侵權要賠償！應予依法歸還我們個人的私有財產，妥善賠償已經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依法解決因動遷而發生的各項事宜。

如果您無視民意不予行使上海市最高職務的權利，不予依法維護我們維權民眾的合法權益，不予查處本市已經存在“嚴重侵害群眾切身利益”的話，即屬於執政不作為！我們決定聯署向國家監察機關控訴您，並向全世界宣佈：您與上海這些貪官污吏們是一丘之貉！

向重慶學習，上海也要“唱紅打黑”？

2009年是中共建政60週年大慶。在國慶節的前一週，俞正聲

"趕上"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出訪烏克蘭遭遇車禍，第二件是返回上海後也開始帶頭高唱紅色歌曲。

俄新網9月24日報道，烏克蘭克里木交警部門新聞處向當地媒體證實，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克里木進行為期兩天的考察訪問時，其車隊於24日8點至9點之間在雅爾塔附近的繞行公路發生交通事故。

據克里木衛生部長謝爾蓋·多尼奇稱，從雅爾塔前往辛菲羅波爾的中國代表團車隊當時與一輛逆行的 VAZ-2107 型車相撞。VAZ-2107型轎車的司機當場死亡。

中國代表團的4名成員在交通事故中受傷。其中包括中國駐烏克蘭副領事，他的顱骨底部骨折；而使館一名武官的傷勢被認為並不嚴重。使用急救車將使館武官送往辛菲羅波爾，問題仍在解決當中。

雅爾塔警方官員稱，目前正在就事故原因作進一步調查，一位雅爾塔交通警察對此透露，事故或涉超速，因為在烏克蘭，雖然限速每小時80公里，但因為只有超速20公里才能被罰款，所以司機們已經習慣於每小時100公里屬於正常速度。

此外，雅爾塔警方澄清說，有指這個中國代表團是前來參加在雅爾塔召開的歐洲戰略研討會的說法，這與事實不符，強調該中國代表團與正在召開的歐洲戰略研討會沒有任何關係。

還好，俞正聲在這場車禍中安然無恙，並於三天後出現在上海市級機關係統慶祝國慶歌會上，並帶頭高唱紅色歌曲。

東方網報道說，9月27日晚，上海市市級機關係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大型歌會舉行。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市長韓正和市級機關廣大幹部職工一起引吭高歌，共同慶祝新中國60華誕。

歌會由市級機關工作黨委主辦，市級機關近5000名幹部職工參加了演出，分成市四大機關代表隊，市紀委、組織部、宣傳部等機關代表隊，市委統戰系統代表隊，市大口機關代表隊，市級機關老幹部代表隊，市局、辦機關代表隊，市政法系統代表隊，市行政執



俞正聲也帶頭唱紅歌

法機關代表隊，市群眾團體代表隊，中央在滬單位代表隊，企事業單位代表隊等11個方陣。

報導描述說，歌會在交響歌舞《紅旗頌》中拉開序幕，優美的旋律、嘹亮的歌聲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整台歌會由序場"牢記教誨"和"歌唱祖國"、"堅定信念"、"勤政為民"三大篇章以及尾聲"唱響世博"組成。《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唱祖國》、《黨啊，親愛的媽媽》、《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我們走在大路上》、《我的祖國》、《公務員之歌》、《祖國不會忘記》、《2010，以城市的名義》、《托起城市的榮光》等一首首歌曲……

看到這一首首"紅色精典歌曲"，令人想起同是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早在一年前便開始在重慶掀起的"高唱紅色歌曲"的浪潮，

只是俞正聲和上海舉動卻整整晚了一年半。當時曾有網友質疑：難道俞正聲真的要向薄熙來學習？也要在上海"唱紅打黑"？

聯想到在上海市委召開的九屆八次全會上，俞正聲發表的"反腐打黑"宣言，上海民眾所期盼的那個時刻似乎真的不遠了。

俞正聲在會上指出，"幹部對個人利益孜孜以求損害黨的形象。"他強調："黨員幹部決不能以權謀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領導幹部可以調動的資源、財力越來越多，特別是上海這幾年正在推進建設一系列重大項目和工程，投資的力度相當大，面鋪得很開。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導幹部尤其要把好關、用好權，乾乾淨淨做事。在招商引資、審批項目等工作中，要嚴格遵守黨的經濟工作紀律和各項規定，不要超越職權插手具體建設項目或為請託人去打招呼，不能利用職權謀取不正當利益，也不能為他人及親朋好友特別是上級的親友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不斷完善監督制約機製，該集體決策的不能擅自拍板，該公開的事項不要遮遮掩掩，真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有媒體評論稱，上海市委的這次全會，實質是上海反腐打黑的總動員大會。

浦東交通行政執法大隊"釣魚執法"案

倒鉤是上海方言，意思是布下誘餌，賣個破綻，將對方引入圈套中。通常前面加動詞"放"，謂之"放倒鉤"，就是設圈套。而直稱某某為"倒鉤"，意指對方是個心懷不軌的陷阱設置者。

2009年10月14日晚7時30分左右。據當事司機孫中界稱，當時自己駕駛麵包車行駛在路上，一男子衣著單薄懇求搭車，男子上車幾分鐘後，自己的車即被兩輛車包圍、逼停，隨即被指認涉嫌

黑車經營，車輛被浦東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扣留。回公司後遭遇指責，他無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斷左手小指以示清白。孫中界稱，自己遭遇了"倒鉤"執法。

而浦東新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副大隊長嚴良民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該司機當天晚上搭載的是普通市民，並非"倒鉤"，但鑒於種種原因，這名人員的身份不便公開。在整個過程中，執法人員是"按章辦事，沒有違規"。嚴良民還表示說，按照以往案例，百分百可以認定孫先生駕駛黑車。如果當事人不服，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請復議。

巧合的是，這一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關於"倒鉤"執法的訴訟。當事人江濤有著和孫中界所稱相似的經歷：2009年6月21日，他因"順路搭載"一男一女兩名乘客，被寶山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當場抓獲"；事後，他被以"用肢體語言與乘客商定價錢"為由，處以行政罰款2萬元。庭審當天，由於"雙方意見不統一"，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宣佈調解失敗，擇日宣判。

此外，還有一起相似的起訴上海市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倒鉤"執法案，即將開庭。該訴訟案代理人、律師郝勁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雇傭誘餌假扮乘客，並且使用暴力侵犯了他的當事人人身自由權利，甚至進行搜身，取證程序嚴重違法。郝勁松甚至情緒激動地表示，"閔行交通執法大隊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人民幣服務！"

在《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2007-2008年度創建文明單位工作總結》中提到，在兩年時間裏，該大隊"查處非法營運車輛5000多輛"，"罰沒款達到5000多萬元"，"超額完成市總隊和區建管局下達的預定指標任務"。

據上海當地一位老司機透露，“倒鉤”執法在上海其實很普遍，“因為真的黑車很難抓，所以就找個‘釣鉤’來釣你上鉤，讓你做黑車、罰點款。整個上海市至少有上千個‘釣鉤’。”

更有傳言稱，“釣鉤”與執法大隊關係密切，達成的是“雙贏”的利益鏈：在上海閔行區，“釣鉤”每“釣”到一位私家車司機，便可獲得300元人民幣，寶山區給“釣鉤”開出的價格是200元，南匯區是250元，奉賢區則是600元。一個成熟的“釣鉤”，月收入少則兩三千元、多則五六千元。

10月20日，上海浦東官方對外界宣佈，經全面核查，孫中界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存在“釣魚執法”。



上海浦東通報“孫中界事件”調查處理情況並公開道歉

但當事人孫中界對這一結論卻並不服氣，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本來滿心期待能有一個公正的結論，可沒想到卻等來這樣一個結果。原南匯交通執法大隊一中隊就歸浦東新區執法局領導，他們都是一個單位的，靠這種違背基本調查規律的調查方法，做出的調查結果，誰能相信呢?由誰來保證這種調查的公正?我一定要討個說法。”孫中界強烈要求與乘客當面對質，并稱：“我向天發誓，我要是跑黑車了，出門就被車撞死!”

調查結論也受到了公眾的普遍質疑。在上海當地一項名為“如何看待浦東新區昨對孫中界案發佈的調查結果”的網絡調查中，截至10月21日傍晚5時，共有5647名網民投票，其中，2904名網友認為“自己人查自己人，難以信服”，佔投票人數的51%；2338名網友認為“應徹底重新調查”，佔41%；279名網友認為“調查不應該只有結果”，佔5%；而選擇“相信浦東新區”的只有126名網友，僅佔投票人數的2%左右。許多網友表示，這一調查結果是“老子調查兒子”，根本不靠譜。律師郝勁松也用“非常草率”和“不負責任”來形容這一調查結論。更有消息稱，連上海市政府的高層也對浦東的調查結論非常不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不得不宣佈，成立聯合調查組、再做進一步調查。一位接近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的人士向媒體透露說，成立聯合調查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他們自己現在也不知道該如何收場。”但他同時表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媒體代表，均可稱是獨立第三方，這種聯合調查的做法值得肯定，公眾有理由期待聯合調查組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調查結果來。

10月26日，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府和閔行區政府分別為發生在本區內的“釣魚執法”事件認錯，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於同日召開常務會議，承諾將對相關責任人問責。

浦東新區區長姜睴表示，浦東新區政府將責成有關部門依法終結對該案的執法程序，對當事人做好善後工作，他在隨後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所謂的乘客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乘客”，而是媒體所稱的“鉤子”。

騙術無二——比如以色誘人，開房捉姦索財；比如棄物待人拾得，上前與人分羹掉包詐錢……

所謂“新招”，不過是直接借鑒了一些下三濫的詐騙手段，引來為執法所用而已。而不同之處僅在於：社會騙術被認定為違法行為，人人喊打，抓著就法辦；而同行徑同手段同以錢財（罰款）為目的的“釣魚式執法”，卻披著“合法”的外衣，至少當下沒被法律認定這是非法的，也沒有人因此而受到法辦。嗚呼，這是什麼邏輯？

文章說，黑車不是不該打，但打擊黑車不能演化成誘民入罪，讓公眾變成驚弓之鳥。在“釣魚式執法”的語境中，何謂“黑車”？貌似除正規出租車之外的所有私家車，都有被認定為“黑車”的可能。那麼如何避免我們被認定為“黑車”？唯一能保持清白的做法，就是永遠不要在路上搭載陌生人！

過於追求執法的金錢量化，導致基層執法思維與社會道德良性追求南轅北轍。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很難相信處於鏈條當中的上海市政府會捨得會有決心痛下重手，挖去爛瘡——要知道，如果真的證實上海真有上千“釣鉤”跟執法部門合作，那麼無疑將是上海行政領域的最大醜聞，而有些官員是非常愛“面子”的，能有勇氣剖腹自治嗎？

更令我們擔憂的是，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中國法制環境中，沒人能找出“罰款指標”的依據，更找不出“釣魚式執法”依據何法。依照公權力“法無明令即為禁止”的基本界定原則，“執罰經濟”和“釣魚式執法”是典型的違法行為。

因此，公眾的憤怒，不但要朝向“釣魚式執法”開火，更應該打到立法程序的靶子上——《行政程序法》久久不見出台，《行政處罰法》關於處罰程序的規定不夠細緻，源頭上就缺失明確判定“釣魚式執法”是否合法的司法程序正義，導致終端執法者鑽了“無法”的空子，讓公眾有苦無處申訴，更導致基層官員洋洋自得的“新招”以及“工作秘密”的肆無忌憚。



10月26日，事件當事人孫中界（前右）得知處理結果後激動不已

10月27日下午，上海市委舉行常委學習會，市委書記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俞正聲指出，各級領導幹部要按照建設學習型政黨的要求，熱愛學習、善於學習，把讀書作為自己的興趣愛好，把學習作為必備的品德。不僅要向書本學習，還要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不僅要學習總結成功的經驗，更要從挫折和失誤中學習，在學習中不斷提高、不斷改進工作。

俞正聲“更要從挫折和失誤中學習”這番話，指的是不是“釣魚執法”事件，雖然他沒說出來，但很值得上海各級官員好好品味一番。

爭議再起：上海建迪士尼要當冤大頭？

早前有上海媒體披露稱，上海迪士尼樂園的項目公司早已籌備就緒，公司簡稱初定為“申迪”，由中方公司和迪士尼合資組建。

該合資公司中，迪士尼將佔股 43%，中方則佔股 57%。儘管尚未正式註冊，但業內人士透露，項目公司實際上已經開始辦公。

據迪士尼方面透露，不含地價，上海迪園首期建設投資約為 244 億元。建成後園區總面積約 10 平方公里，是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八倍。至於選址，仍定於浦東新區與南匯區交界處，距浦東國際機場僅 20 分鐘車程，而過境上海的外國旅客如果游迪士尼樂園，還可享受 48 小時免簽待遇。

至於迪士尼與上海的合作方案 是雙方各自提成 同時"申迪"公司向迪士尼支付一定品牌費用。由於園區日常管理將交由迪士尼派駐的高管負責 高管薪資也將成為"申迪"公司的主要開支之一。

上海旅遊業專家指出，與香港相比，上海迪士尼樂園不僅規模大，而且內地游客不需辦理出境手續，住宿、交通開支也相對低廉，所以在爭搶內地客方面，一定會與香港迪士尼構成激烈競爭。

還有業內人士表示，按照 2009 年上海計劃吸引 1.2 億人次游客計算，即使 10 名客人中僅有 1 人"幫襯"，上海迪士尼樂園每年的游客數量就已超過 1000 萬 而香港迪士尼自 2005 年 9 月開業至 2008 年 11 月的三年多時間裏，接待游客數量為 1450 萬。

看到這樣的可觀數據，迪士尼落戶上海到底是不是好事呢？鳳凰衛視採訪總監閭丘露薇的回答卻是"未必"。

閭丘露薇在接受採訪時說：首先，迪士尼落戶中國，不管是上海還是在香港，在整個的經濟大環境下，有比較相似的地方。當年迪斯尼落戶香港，主要是因為香港經歷了 SARS 的衝擊之後經濟相當不景氣。現在迪士尼傳出在上海落戶的時候，從大環境來說又是面領著要拉動內需，推動經濟發展的全球金融危機大背景，這一點比較相似。

在香港 特區政府預計說迪士尼可以帶來 1480 億港元的經濟效

益。但是到現在為止，只有 1173 億，比預期少了將近 300 億港元。從人數說，也比原來的預期少了很多。其中原因，第一是香港迪士尼被稱為"迷你版"的迪士尼，它實在是太小，因為香港的地非常少。另外也在於特區政府對於當時內地游客的數字出現了高估，以為迪士尼會對內地游客帶來很大的吸引力。當時對數字有很大的估計，實際上並沒有產生這麼大的效益。

第三，在香港有來自像海洋公園這樣本土樂園的競爭，海洋公園相對來說有自己的特色，地方要大很多，所以出現了迪士尼竟然比不上本土的、本地版的樂園的情況。作為傳統的、老牌的遊樂形式，迪士尼到現在，對於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吸引力到底有多大，目前還很難說。

在談到香港迪士尼有那些經驗是上海可以借鑒這個問題時，閭丘露薇指出：首先是分成的問題。當年特區政府和迪士尼簽訂的協議被稱為"不平等條約"。因為特區政府當初是又出錢又出力，又填海又建周邊的建築，有了 57%的股權，但卻沒有管理權。最近在跟迪士尼談定的協議當中，雖然股份減少到 52%，但是訂立的新條約規定，美國總部華特迪士尼總部收取的管理費必須和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業績掛鈎，而且迪士尼樂園每年必須要披露入場的人次到底是多少？之前迪士尼的經營情況，香港政府作為大股東，其實知道得並不多。

另外值得借鑒的地方就是如果落戶上海的話，肯定涉及到周邊的一些基建的開銷 包括比方說土地的平整等 這個錢到底誰來出？還有一個問題是徵地問題。在香港，給予迪士尼的土地是沒有人居住的，也就不存在拆遷賠償的問題。如果真的要落戶上海的話，如果涉及到徵地的時候，賠償方面到底是怎麼來進行安排？



香港迪士尼未來會如何？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年美國迪士尼公司看準了香港特區政府是求勝心切，因為在競爭這份合約的時候，也有來自像珠海、上海等傳出來的各個競爭對手，但因為香港政府開出優厚的條件最終落戶香港。在目前中國經濟推動內需的情況下，大家期待迪士尼為上海帶來一個產業昇級，但這樣的心態會不會讓大家在談判的時候反而處於劣勢，這一點也值得借鑒。

司馬南在《上海迪士尼，中國或再為冤大頭》一文中指出，迪士尼的米老鼠唐老鴨值多少錢？看起來是交易價格問題，事實上是文化自信問題。交易是雙方的事，自由貿易，平等交換，自願讓渡，如果上海方面概念中不認為迪士尼值這麼多的錢，迪士尼是沒有辦法要上海人當冤大頭的。可是如果上海某些人抱定了“我就是要當冤大頭”、“我不當冤大頭誰當冤大頭”、“我當冤大頭我快樂”、“我當冤大頭，我做主”、“我這個冤大頭，不是冤大頭”、“當冤大頭，就當美國人的冤大頭”、“你想當冤大頭，你還當不上呢”一類的信念，別人要攔住他，就不容易了。因為這個執著的信念在裏邊橫亙著，不解決認識問題，不改變某些觀念，阿拉們是會不認輸的。

可以肯定地說，上海自建埠以來，商業文化日漸發達，上海人精明程度在全國數得著，阿拉們從來不喫虧，很少被別人——尤其是那些在上海人看來土氣的“江北佬”“鄉下人”忽悠住。

但是，在迪士尼問題上，某些人似乎有一點神志不清，私底下受“模糊邏輯”與“源我情感”支配：其一，大家都在爭，你不上，別的省市甚至別的國家，就搶了去了。其二，反正要上項目，地方財力沒有問題，要上就尋大個的，帶響動的，GDP 拉動，起碼要挑一年一萬億的，果然有位仁兄提供了的大躍進算法，聲言一年拉動 10000 億沒問題，於是，在迪士尼的項目宣傳中，畫滿了這種拍腦袋得來的浪漫遠景，於是上海方面愈發志在必得了，於是唐老鴨米老鼠便愈發神氣活現了。

司馬南最後寫道：筆者絕不是迪士尼進入中國內陸的反對派，做買賣嘛，你可以來，我也可以去，互通有無。假如美國人以同等條件在紐約建立一個大觀園，我在上海建立一個迪士尼，何樂而不為？但是，迪士尼，假如它身不動膀不搖，僅憑品牌和攝心術，就拿走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外加管理權，這就叫不平等條約，不平等交易。

周小川

中國的“格林斯潘”？

美國《時代》雜誌 12 月 16 日宣佈，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當選為該雜誌 2009 年年度人物。“中國工人”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同時上榜。

《時代》評價稱，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這些功勞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

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選出本年度 100 名思想者（Thinker），指他們的思想塑造了 2009 年的世界。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力壓美國總統奧巴馬名列榜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因為“警醒國際不應再倚賴美元”名列第九名。

自 2000 年以來，周小川一直處於風口浪尖。兩年證監會主席，七年央行行長，九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職位，褒貶不一，毀譽參半。西方媒體稱其為“人民幣先生”，不少中國網民則要他“早點下課”。

中國總是愛問“周小川像誰”？有的說他像美國的“格林斯潘”，稱“這種類比更多基於兩者對經濟領域的影響力以及職責的相似”；有的說他像英國的“凱恩斯”，稱“學而優則仕，仕而不忘情於學，這是比較兩者的發展軌跡”。

但周小川就是周小川。如果非要類比的話，只能說他更像他的

父親周建南——江澤民的老上級，原一機部部長，據說當初在擔任中顧委委員時曾救過岌岌可危的深圳股市。

父親是江的老上司，江對周小川多有提攜

在美國著名國際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撰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中，有數段內容介紹了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與江澤民的密切關係

2002 年 12 月底，前國家證券監督委員會主席周小川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這是中國最重要的金融職務。周知識淵博，獲清華大學系統工程博士學位。他承諾要為中國的金融體制樹立新的職業風範。江澤民對周小川的成功感到欣喜。周的父親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而江澤民曾在一機部工作過 20 年。1962 年，周建南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交給江一項看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三個月內把發電系統燃料從煤改成重油。江把這項任務稱作其終身值得自豪的成就。

庫恩在《江澤民傳》中對江澤民如何給周建南留下深刻印象，有如下詳細描述：

1960，由於中國批評蘇聯“搞修正主義”，再加上邊界爭端持續加劇，赫魯曉夫命令所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離開中國。他們的離開恰逢中國最困難的時期。“大躍進”破壞了國家的經濟。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也深陷困境。沒有足夠的鋼材，沒有足夠的動力，沒有足夠的燃料，也沒有足夠的食物。車間裏，工人們紛紛因飢餓而倒下。煤炭尤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計劃者們情急之下決定將一些主要大型企業的動分改造為使用原油燃料。長春由於靠近黑龍江省的大慶油田被選為改造工程的革新試點。蘇聯專家掌握這種

技術，但如今他們已經走了。

一機部副部長周建南到第一汽車製造廠給工廠管理層下達了一個令人驚恐的發電系統煤改油的時間表：三個月。為了安全度過這個冬天，沒有任何失敗的餘地。江澤民受命全面負責（“擔任總指揮”）這一看起來似乎不可能的任務，他的朋友沈永言則被派往大慶，保證原油供應，並將其運回長春。

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險，但江澤民沒有質疑這一決定後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動，召集廠裏最好的技術人員。大家聽到任務後，驚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擔心用原油可能引發事故，其他人則對這項技術一竅不通。不過，所有人都認為三個月的時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給他們樹立信心，稱只要刻苦鑽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術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勵大家不要怕犯錯誤。他說“我們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們必須努力去學習新東西。即使我們遇到了問題，大家也會理解的。”

江澤民製訂了一個計劃。第一步是建造儲油罐。很快，四個各能容納1000噸原油的龐大儲油罐建成了。技術人員仔細研讀蘇聯專家留下來的技術手冊。大家三班倒，連軸轉，工人從 200 人增加到了 1000 人。不少人因為疲勞過度、飢餓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堅持在現場工作，每天只休息幾個小時。他十分細緻，命令下屬反覆核對各項數據。引人注目的是，在個半月後，改造工作幾乎按時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按時進食和持續不斷的壓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損害。他持續胃痛，經常靠壓著右腹來稍微緩解一下。他可能還得了肝炎。後來，他告誡其他工廠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樣忽視喫飯。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個里程碑。江澤民認為，改造工程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們在年輕的時候喫過這種苦，以後無論什麼時候回想起來都會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這段經歷，“完工後，我們開始用燒原油來提供動力，還有 10 萬人在長春的嚴冬裏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個小說家。否則，我一定要為這項工程寫本書。”

這不僅是一次個人的成功，還是一個政治上的利。這一工程對北京來說極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長在整個改造期間一直呆在長春。在此期間，江澤民的業務和領導能力給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為如此，後來他幫助調動並提陞了江。離開長春汽車製造廠是江事業中的一次重大轉捩。如果沒有那個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這一切可能都不會發生。

可見江澤民與周建南的上下級關係確實非同一般。據說，周小川家中一直掛了一幅父母晚年與江澤民夫婦的合照。2002 年 12 月周小川出任人行行長時，江澤民也表示對周小川的成功“感到欣喜”。周小川仕途順遂，多少與江澤民提攜有關。


周建南

周建南（1917-1995），江蘇宜興人。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周建南 1937 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抗日戰爭爆發後，於 1937 年底輾轉到達延安。1939 年 8 月由中組部派往重慶做地下統戰工作。

官方簡歷稱，在解放後至1952年11月，周建南先後擔任東北工業部電工局局長，曾隨李富春副總理赴蘇聯參加援華156項工程中主要項目的談判。1961年3月起，任一機部副部長兼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副總局長，曾組織領導編製機械工業科技發展規劃，為推動機械工業貫徹工業70條、科研14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以及中國援外和成套設備出口工作作出了貢獻。

周建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下放河南羅山"五七幹校"勞動，1973年恢復工作，任一機部機械研究院院長。1985年8月主動退出機械部部長職務，從事調查研究和參謀顧問工作。1985年以後，受國務院委託，主持領導了機電產品出口工作。

1995年6月28日，在醫院發出第四次病危通知後，平靜離去。

1990年3月出任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的鄭良玉回憶說，當初正是江澤民把離休的周建南留下來，幫助研究股市。鄭良玉回憶：1990年10月舉行特區成立10週年慶典，江澤民來深圳，慶典後召集各省領導座談，我們認為這是個好機會，別的工作我沒彙報，專門談股票市場，主要觀點是股票市場還要發展，不能後退。江澤民沒有馬上表態，因為接下來還有很多省市彙報，但當天晚上傳來江澤民的明確指示：股票市場問題，應該讓深圳繼續試驗。同時把參加慶典的中顧委委員周建南同志留下，請他和我們一道研究股票市場下一步怎麼搞。中央非常支持深圳特區的改革。

王安在《證監官員的前世今生之周小川——鶴舞股市污泥？》中也提到"是周建南救下了當時岌岌可危的深市"：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層第一次著手推動創建中國證券市場，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聽取了彙報。當時的會議記錄著，以經貿部部長助理身份參會的周小川相當活躍，在股票、期貨及體制建造諸方面頻頻建言。

參加會議的人中有一位叫周建南，時任中顧委委員，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建南與周小川是父子。這次會議之後半年發生了"六四"事件，在北京建立證券交易所的設想徹底泡湯。反倒是上海和深圳，一年半後異軍突起，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走了回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陣式。

1991年後，周小川在仕途上一路順風，10年中歷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彙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及至2000年2月，周小川入主證監會。

搞金融受父母影響，主政證監會褒貶不一

周小川的官方簡歷中，籍貫註明是江蘇的"宜興"。

在宜興，周氏是大姓。據史料記載，宜興籍的周氏是三國時吳國廣平太守周賓的後人。周賓一般少為人知，但他有個孫子卻很知名，叫周處。初中課本曾選摘了《世說新語》的一篇文章，講的就是周處的故事，"周處少年時，凶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後來幡然而悟，刺虎擊蛟，"終為忠臣孝子"。

"周處後代在宜興分為數支，周小川這一族是其中一支，"原宜興市檔案局局長湯虎君對《小康》雜誌說，周小川的祖父有四個兒子，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排行第三。

周小川的母親楊維哲解放前曾就讀武漢大學，解放後在化工部任職。1948年前後，周建南夫婦在黑龍江東安市（現改為黑龍江省密山市）的一個軍工廠工作，在此期間，周小川出生。

原遼寧省鐵嶺市科協主席李光致說，這個軍工廠隸屬於東北軍工部，"對內稱東北軍工部直屬二廠，一般稱東安電器廠，是部隊

建制，當時的廠長兼總工程師是周建南”。

周小川之所以從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響，“我的父母長期都在工業部門從事經濟工作，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對經濟問題比較感興趣。”幾年前，周接受《投資與合作》雜誌採訪時說。

儘管周小川一直外界視作省部級“海歸”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經歷過國內求學的艱辛。周是北京八中1966屆高三3班畢業生。1966年“文革”開始，當年的畢業生首當其沖。高中畢業後，正值“文革”開始，繼續求學已無可能。1968年，20
識青年一樣“上山下鄉”，周去的地方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852農場。

“在那裏整整呆了四年。這四年中，除了勞動，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觸，比如，對電話系統、載波廣播系統進行一些工程設計，對機床作一些技術革新。”周小川說這些實踐對他後來從事研究很有益處。

1972 年，作為第二屆工農兵學員，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四年大學生活，周除了系統地學習數學、機械、電子、電機、自動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語和日語等，他逐漸對計算機，特別是對計算機軟件工程產生了濃厚興趣。大學畢業後，周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系統研究室工作。兩年後，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機械研究院系統工程應用工業的研究生，師從中國工程界的老前輩嚴筱均教授。

如果對周在經濟學研究作一個時間段上的劃分，1978年前後這一段時間應該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周只是對經濟問題感興趣：而在此之後，周開始進入到研究的層面。應該說，這一大的變化與周所參與的兩個涉及國民經濟的大工程有關。

這兩個大工程，一個是“川漢輸氣工程”，一個是“30萬噸乙烯工程”。但這兩個工程都中途夭折。兩次“勞而無功”的經歷對周的觸動很大。他開始意識到，這些項目之所以勞民傷財半途而廢，與中國的經濟體制密不可分。恰巧當時，在錢學森等一批系統工程學者的倡導下，學界有意運用系統工程解釋社會發展問題、人口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在前輩們的指導下，周小川從那個時期開始從事經濟方面的應用開發。

1981年初，周研究出一個關於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模型。當時，正值中央提出在二十世紀末經濟翻兩番的宏偉藍圖，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構想，對發展、人口、環境以及部分經濟政策問題進行了定量化、系統化論證。這一做法後來被證明，是國內用系統動力學和計量經濟學在計算機上建立較大規模經濟發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嘗試。

同一年，周與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國貨幣流通規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網絡來描述貨幣流通的途徑以及貨幣在每個環節滯留的時間，並表明其流向。以通過數量化的模型來描述金融問題方式，這在國內也是沒有過的。

對於周在這一段時期的表現，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評價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構造了一個多部門動態發展的社會經濟仿真模型，并用於政策分析。和許多從工程界轉向經濟分析的學者一樣，他們都是先從結構問題和動態發展這種數量關係很突出的領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結構分析一開始就突破了單純物質生產領域的傳統框架。他的這項工作及事後產生的論文，至今對學術界仍有啟發。”

周小川的很多舉動是傚法格林斯潘

《人物》雜誌發表余瑋的撰文指出，這些年，周小川在人們是是非非的爭議中走過來，真實的周小川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2005年7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銀行經國務院批准，“出其不意”地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宣佈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這個決策的出台，實際上早在2003年周小川赴任央行行長之初就開始醞釀了。

2003年，周小川上任不到一個月，日本就掀起了逼迫人民幣陞值的風潮，認為人民幣被嚴重低估；隨後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的輿論日益高漲。當年9月初，美國財長斯諾訪華，公開要求人民幣陞值，並和周小川進行了一個小時的封閉會談。

一時間，國際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幣陞值的強大輿論氛圍，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進入2004年，要求人民幣陞值的呼聲依然不減。身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國際、國內各種場合始終面帶笑容，向全世界明確傳達中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聲音。

10年來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在保障中國經濟高速穩定發展的同時，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大趨勢。而且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正在逐漸損害中國經濟運行的均衡和主動。早在1999年周小川在其專著《轉軌期間的經濟分析與經濟政策》中，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改革的方向在他看來，只能是適應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進一步開放和市場化。

在周小川和他的學術密友、前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的共同主持下，2004年年中，央行初步完成了這項改革的具體方案。隨後在完善補充的同時，製定了一系列保證該方案順利實施的應急措施。也就是說，在市場感受“出其不意”的時候，匯率改革已經在政策


周小川

製定上準備了兩年有餘，理論上的準備則更久。箭在弦上，引而不發。人民幣陞值的時機、幅度只是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問題了。2005年7月21晚，中國人民銀行對外宣佈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變盯住美元為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人民幣對美元陞值2%。

這個消息迅速成為全球主要財經媒體的頭版頭條。

當日全球彙市美元對各主要貨幣持續走低，而第二天A股市場盤中上漲超過2%，這一切現象符合之前的陞值效果判斷。

央行在匯率改革啟動後不久，不但將政策越來越透明地傳遞到市場，而且針對金融機構和企業連續出台了一系列相關配套措施。2005年8月，周小川出席央行上海總部揭牌儀式時首次透露了備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調節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幣種：美元、歐元、日元、韓元、新加坡元、英鎊、馬來西亞林吉特、俄羅斯盧布、澳大利亞元、泰國銖、加拿大元等11種貨幣會成為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參考貨幣。周小川說，美國、歐元區、日本、韓國等目前是我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相應地，美元、歐元、日元、韓元等也自然會成為主要的籃子貨幣。此外，新加坡、英國、馬來西亞、俄羅斯、澳大利亞、泰國、加拿大等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比重也較大，這些國家的貨幣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也是很重要的。

周小川明確表示：“參考一籃子不等於盯住一籃子。盯住一籃

子是機械地按籃子匯率指數的變化來調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實現名義有效匯率不變 而我們所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 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周小川將中國正進行的匯率改革比作是"摸著石頭過河"，要不時看一看前一步的情況和市場的反饋，看是否真正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2006 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再一次將貨幣政策主管部門的領導者——周小川推到了輿論關注的最前沿。

"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英國《金融時報》曾這樣來描述周小川。"技術官僚"，這個國人並不習慣的稱謂，是海外對中國各級政府中大量擁有專業背景的中高層官員階層的俗稱。

2005 年 2 月 5 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和時任財政部部長金人慶聚會 G7。在這裏，幾乎與人們的預期完全一致，周小川對於人民幣升值呼聲的回答清晰而簡潔："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中國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改革銀行金融系統，為實行貨幣政策改革做準備。中國需要時間來培訓新一代銀行工作人員。"在會上，周小川顯得成熟、自信，而且富有經驗。因為熟練地掌握英語，而且擁有與他的西方同行相比毫不遜色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他成為這次會議的明星之一。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禮貌而堅守原則，這正是西方典型的技術官僚的標幟。

《"技術官僚"周小川》一文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理解周小川確實是一件費力的事情。在部分觀察家看來，周小川很多舉動是傚法格林斯潘的。對於央行上海總部的成立，"這是傚法格林斯潘"，評論者稱。在全世界，只有美聯儲實現分總部制，而美聯儲的地區總部，譬如地區金融和經濟中心的紐約分行甚至是先於美聯儲存在的。評論者認為，在信息社會，只需要調整央行現有機制就

可以解決市場監管問題，而不必多此一舉。

如果說他真的在傚法格林斯潘的話，那也應該包括格老的另一品格——拒絕做一個教條主義者。1996 年，當所有人都認為美聯儲應該提高利率給經濟降溫的時候，他說服了他的同事，反其道而行之，維持利率不變。而此舉被後來的人們認為直接促成了克林頓當政的十年繁榮。

"2005 年中國將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國貨幣供應量增長將保持在 15%左右。穩健的貨幣政策既要支持經濟平衡發展，又要注意防止通貨膨脹和預防系統性風險。同時，將不失時機地推進金融改革，解決阻礙金融業發展和影響金融穩定的體制機制問題。"2005 年 1 月 26 日，周小川在內部的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上做出上述表示。這次講話幾乎是周小川不公開的 2005 年施政綱領。會議中，周羅列了 2005 年的十大任務 其中前八個都與貨幣政策的市場基礎密切相關，這才是周真正的工作重點。

愛好音樂，走上"格林斯潘式鋼絲"

周小川當上央行行長之後，隨著中國經濟地位、人民幣國際地位明顯上昇，特別是他的學者風範和金融調控藝術，讓人們習慣於將其和各國央行行長特別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風範加以對比。

為此，有關周小川就是中國的"格林斯潘"的評論，會經常出現在中國財經媒體上，甚至有的媒體還特意將兩人的興趣和愛好進行一番對比。但有媒體也認為，拿周與格林斯潘相比，差距實在太大，便稱對周小川而言，"學習格老好榜樣"的提法更為寬容。因為，即使是"學習"，這條道路上仍然充滿曲折和艱辛。

《國際金融報》發表的署名文章認為，在音樂素養方面，格林

斯潘確實可與周小川媲美。

傳媒業的一位腕級人物曾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這位財經傳媒業內的知名人士愛好寫詩作文。由於周小川對音樂的通曉和愛好，經過熱心人士的撮合，這位人士打算和周小川合作搞一場詩朗誦音樂會。據說，各方面還真就對此事進行了認真籌劃，但因為某些客觀原因未果。當然，周小川對此次詩朗誦音樂會投入了多大精力不得而知（身居要職公務是一定繁忙的），但從一個側面讓人們感受到了周小川的音樂素養頗得稱道和肯定。

一般的觀點是音樂能給人以想象和思考的空間，能帶給人激情、柔美抑或一張一弛的節奏感，就連建築也被視為是流動的音樂。可以推想，對音樂的愛好，對不同音樂風格的欣賞對周小川在央行行長這個關鍵位置上的決策可能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據說，周小川愛好的確廣泛，他收集了許多歌劇方面的書。"你別看他溫文爾雅，酒量還大著呢。"一位在央行長期工作過的人士這樣評價周。他說："周小川個人的性格是想大事、管大事，有一些小事他是不管的。"這些也被認為是開拓者的共性。

在音樂素養方面，格林斯潘確實可與周小川類比。格林斯潘早年在美國著名的朱莉亞（Juil
一名職業音樂人，他在從這所音樂學院退學之後，曾在紐約時報廣場派拉蒙劇院下面的一家時髦的夜總會裏演奏薩克斯管。

或許兩人都已領會"鍵盤與算盤相通"的規律。否則，他們又如何在音樂與貨幣政策的製定和實施這兩者之間能從容大度、游刃有餘呢？由於所處的大環境不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和格林斯潘對其各自"音樂"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手法必然存在差異。

對兩人在音樂素養上進行比較，或許有鉤沈傳奇的感覺。但在

言談上確有相似之處——兩人講話都愛"繞彎子"。表面看去，這種繞彎子往往被直觀認為是"廢話連篇"，但細思之蘊意深遠。這也是業內人士普遍的感覺。尤其是將兩人的言談放在各自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運營的大背景下更為明顯。

為美國制訂貨幣政策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其政策調整主導全球投資方向，因此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工作與其說是金融家不如說是藝術家，他既要將政策調控的信息有效傳遞給國際市場，又不能過早暴露美聯儲的戰略部署。既需要引導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走上更為健康的發展軌道，又要為美聯儲的貨幣干預政策留好退出的後路，其難度可想而知。也正是因為事關重大，很多話不可不說，又不可明說。

格林斯潘講話一般喜歡從美國乃至全球的宏觀經濟運行講起，而少有一上來就大談利率。有時根本不談利率等貨幣政策的內容。理性的聽眾往往直到聽完格老的講話，經過認真反思，才能約略領會到他的深義所在。格林斯潘講宏觀經濟，實際上是在向人們傳達美聯儲的思考，這種思考的內容往往與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整或改革息息相關。

周曾在商業銀行、證監會等單位任職，據瞭解，他以前的同事和下屬，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周小川非常具有親和力，溫文爾雅，很有風度。同事和下屬對周的評價或許含有其性格方面的■素，但人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面對公眾的周小川形象——隨著中國金融改革進程的加快，以及改革複雜程度的加劇，周小川的講話風格越來越有格老的影子。

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剛剛啟動。匯率調整雖然是一國主權，但畢竟涉及國際主要貿易夥伴的切身利益。本質上，匯率改革的過程也是一次次金融外交的過程。有業內人士評價：從近兩年的



格林斯潘與周小川

國際匯率博弈看，周小川的應對手法漸趨成熟，言談間漸顯老辣，其風格近似格林斯潘。

說周小川講話愛繞彎子的更為明顯的一個例子就與房地產業有關。2003年12月6日，周小川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論壇上的演講，出乎聽眾包括諸多財經記者的意料。周小川一上來沒有談貨幣政策，甚至沒有談與銀行業有關的內容，他演講的主題是"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面對大批聽眾的好奇眼神，周小川娓娓道來：從中國稅收改革的一些新提法，談到增值稅的轉型，談到個人所得稅，再談到在適當的時機選擇試點實行物業稅的趨勢；又從財產稅的角度，對比"一次性批租"和"定期評估"兩種城市土地管理方式在"財產稅"徵收方面的異同，最後這位央行行長說，"無論城市設施和房地產都有價格風險，中央的各項政策也強調銀行要避免陷入某種泡沫裏邊，以免未來產生更大的風險。"至此，聽眾才豁然，原來周小川想通過"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的論述，分析商業銀行土地抵押貸款的風險傳導機製。因為，國內商業銀行一般根據初始地租價格審批、發放土地抵押貸款，但批租地價可能有泡沫，因此商業銀行拿到的土地抵押實際價

值存在相當大的風險。

文章稱，講話繞彎子只是一種講話表述的方式。實際上，無論格林斯潘還是周小川，無論他們講話的彎子怎麼繞，事實上，他們"幹什麼還會吆喝什麼"。鑼鼓聽聲，說話聽音，貨幣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永遠是他們關心的話題，他們講話的內容也一定與此相關。但是，鑒於貨幣政策對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作用之大，之深，之遠，兩人在講話內容和方式上必然思之再三。由此看來，繞彎子講話正是一種謹慎作風的體現。

2008年貨幣政策遭疑，一夜愁白頭？

2008年是中國貨幣政策飽受爭議的一年。從上半年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到下半年五次下調利率，戲劇性的變化將作為政策製定者的央行推向風口浪尖。儘管貨幣政策的轉變體現了監管層應對經濟形勢變化的果斷，但"政策製定者缺乏前瞻性，對次貸危機認識不足"的質疑聲還是令身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飽受壓力。《中國證券報》稱，這一年，他的頭髮白了。

之前的周小川無論是出席國內還是國際會議，都一頭黑髮，保持著儒雅的形象。但在2008年10月初，周小川在媒體面前亮相時，卻見他鶴髮蒼顏，疲態畢露。也許是複雜的宏觀環境和艱鉅的改革，使他無暇顧及自身的形象。當時，貨幣政策的官方口徑已經從年初的"從緊"轉到"靈活審慎"，並已經於9月、10月分別兩次下調利率，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正式提出將實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周小川卻無法放鬆，11月10日晚間，央行就部署落實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提出了五條措施，並提出要按照"快、重、

准、實”的要求。接著央行火速降息 108 個基點，調整幅度創 11 年之最。12 月 22 日，在市場廣泛預期之下，央行又將利率下調 27 個基點。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並未完全見底，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還在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周小川的白髮一如既往，12 月他在香港出現之時，曾經溫文爾雅的黑髮一去不返。

髮色黑退白顯的過程，正值貨幣政策轉變，質疑也接踵而來：央行的“變臉”過於緩慢。爭議集中在於，當宏觀經濟露出下行的端倪時，甚至局部省份出現了中小企業大量經營困難或倒閉的情況下，央行的貨幣政策依舊從緊不動搖，並屢次表態曖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微觀主體對未來的預期。

“指責撲面而來，央行卻有些無辜，儘管從現在看來，轉向的時機相對於經濟的實際發展顯得有些遲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接受《華夏時報》採訪時說，但回想起當初，絕大多數聲音還是支持貨幣緊縮，因為，誰也沒有料到，國際形勢風雲突變，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如此快速、幅度如此之深。

而曾經被評為“最堅決的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成為了“走鋼索”的人，徘徊在控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之間。2007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雙防”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並決定 2008 年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於是，堅定不移地圍繞以反通脹這一目標而行動的央行，先後於 1 月 16 日、3 月 18 日、4 月 16 日和 5 月 12 日宣佈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各 0.5 個百分點。又於 6 月 7 日宣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點。但也為加強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和加大對災後恢復重建的支持力度。

因為與此同時，美國的次貸危機卻在不斷加深，對我國出口、金融領域的影響逐步顯現，內外因交錯作用下，中國經濟增長難以避免地開始走緩。於是，2008 年 7 月 25 日，中央召開會議確立了下半年工作任務，宏調目標由“雙防”變為“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之後兩天，央行召開季度貨幣政策例會，明確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取向和措施，強調要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金融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靈活性，要求把握好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

直至 2008 年 9 月 15 日，央行才下調了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很多專家認為，“二率齊降”標幟著央行正式變臉。但央行並沒有明確表態。

“轉向，可能是出現了比較慢的跡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在記者採訪時表示，慢在整個宏觀經濟都有轉向之後，貨幣當局有些表態還是比較曖昧的。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微觀主體對未來的預期。這也是大家批評貨幣政策的原■。

但楊濤也指出，轉變的時間點選擇非常困難。歐洲央行 2008 年 5 月就實行過加息政策。加息前，歐洲央行也表現得非常樂觀，但沒想到，在第三季度，歐元區就出現了明顯的經濟衰退。

“對於貨幣政策，我們應當用歷史眼光來看，2007 年年底到 2008 年年初，我們看到的確有非常大的通脹壓力。”楊濤說。

而反通脹，一直被央行定為主要任務。《中國人民銀行法》也規定，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故就貨幣政策而言，防止通貨膨脹預期失控是對內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

當時的周小川，既要警惕通脹通縮反覆交替出現，又要面對大量的質疑，還要注意靈活運用貨幣政策以保證經濟增長，無心掩蓋

華髮，憂心忡忡也情有可原。

人民網強國社區的網文《我為周小川治理白頭髮》說，人畢竟是人，不可能永葆青春之活力。不僅周小川得白頭髮，和周小川一起沈浮的廣大同胞想必有很多也白頭髮了，去年上半年他主導下的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就讓很多股民得了白頭髮，從十七大開始，我們的股市從 6000 點一直跌倒 1700 百點，無數股民深套其中，股民的血汗錢都打了水漂，他們朝思暮想的盼望著股市上漲，可是就盼不來這一天，他們的頭髮早已雪上加霜了吧。

當股市從 6000 點一路下跌到 1600 百點的時候，我們的周小川不知是醒著還是睡著了，反正在這漫長的時光裏無人問津股市，股民看著自己的血汗錢成為泡影，此時的周小川又在那裏呀？

也許股民的吶喊吵醒了周小川，忙不迭的起床更衣喫飯，然後款步來到辦公室，急忙簽發了五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此時股市早已風雨飄搖，人氣渙散，股市暴跌所帶來的後果是整個國民經濟的萎靡不振，物價上漲，假貨泛濫，又讓多少人白了少年髮？

正當中國人民銀行向美國兩房投入 3000 多億美元的時候，美國突然冒出了個金融危機，起因就是房地美房利美出現嚴重的信貸危機，美國的兩房股價從 40 多億美元一下子跌倒幾個美元，中國投入進去的大量美元現在還不知是死是活，這一下不僅我們的所有國民要白頭髮了，連國家恐怕都要白頭髮，須知這些美元外匯可是用真金白銀換的，用大量寶貴資源換的，開數十百億條褲子換的。

美國的金融危機迅速演變為世界金融危機，從虛擬經濟危機演變為實體經濟危機，中國的出口貿易受到嚴重打擊，外需早已啟動不了經濟，為了救美國人民於水火，咱們也學白求恩不遠萬里去購買美國的國債，哪怕中國的股市再跌也要救美國，無數網民總是搞不清這是為什麼，有多少網民因此愁白了頭？

為了體現咱們的大國責任，中國緊急抽調四萬億人民幣來拉動經濟，地方又集資 18 萬億拉動地方發展，想想吧，這麼多錢從哪裏來呀，作為一行之長，豈能不費心勞心呀？全國人民都在看著，地方官員都在等待著，一些大企業、大集團都是盯著這筆巨大開資，能喫一杯羹的就能富裕起來，否則就只能被無情淘汰掉，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想必有無數企業家們為此急白了頭。

光明網喬志峰的文章認為，無須過度解讀周小川的“白髮”。查了一下資料，周小川出生於 1948 年，年齡已然不小。對一位花甲之人來說，有白髮很正常，沒有白髮才“特別”。不信去看看社會上的老年人 例如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農 比如“咱們工人有力量”的老工人，有多少不是滿頭白髮？周小川壓力大毋庸置疑，畢竟有重任在肩；但把“早生華髮”完全歸咎於“壓力”，似乎有些牽強。

無須過度解讀周小川的“白髮”，人上了年紀頭髮總是要白的，這是“自然規律”使然，跟壓力不壓力的不相干——壓力頂多只是白髮的原因之一。

金融峰會前，他捅了美國的馬蜂窩

在 2009 年 4 月 2 日在倫敦舉行的 G20 金融峰會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網站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包括 3 月 23 日的《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3 月 24 日的《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和 3 月 26 日的《關於改變宏觀和微觀順週期性的進一步探討》。

周小川 3 月 23 日文章指出目前的“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提議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倡議“必須創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答記者問

周小川文章具體內容包括：加強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金融政策監督，提陞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長期內穩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如何利用現有的特別提款權（SDR）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周小川用很大篇幅作出了具體闡述。他指出：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其擴大發行有利於IMF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

SDR也叫“紙黃金”，是IMF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IMF的成員國在有需要時，可用SDR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匯，也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但由於它不是真正的貨幣，必須先兌換成其他貨幣才能使用，在世界各國的儲備資產中所佔份額很小。中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配額為63點692億，是第8位份額最大的成員，而美國以371。493億特別提款權作為最大份額成員。

成員國擁有的特別提款權可以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用來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

周小川呼吁IMF各成員國能在政治上積極配合，儘快通過1997年IMF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以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然後在此基礎上，考慮進一步擴大SDR的發行。周小川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建議：

——建立起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係。改變當前SDR只能用於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間國際結算的現狀，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

——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使用SDR計價。這不僅有利於加強SDR的作用，也能有效減少因使用主權儲備貨幣計價而造成的資產價格波動和相關風險。

——積極推動創立SDR計值的資產，增強其吸引力。IMF正在研究SDR計值的有價證券，如果推行將是一個好的開端。

——進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SDR定值的籃子貨幣範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也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此外，為進一步提陞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SDR的發行也可從人為計算幣值向有以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可以考慮吸收各國現有的儲備貨幣以作為其發行準備。

周小川認為，現有185個成員國的IMF，是全球唯一以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為職責、並能對成員國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監督的國際機構，具備相應的專業特長，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國際機構”。

分析人士認為，周小川的說法是呼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變現行的美元為主政策。分析人士說，中國對IMF常年被美國控制，早已頗有微詞，而周小川的立論也呼應了中國政府在此一問題

上的基本立場。而強調加強 SDR 的功能和範圍，自然就會削弱美國在 IMF 中的影響力。

有評論稱，周小川是在 G20 峰會前，捅了一下美國的馬蜂窩。美元的特殊地位，本質就是美元壟斷了鑄幣權，作為唯一的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美國實際上是印花紙換回實物。美國積累了大約 6 萬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一兩年來，每年以 5000 億以上的速度擴大貿易逆差，形成了國際上巨額的剩餘美元。剩餘美元推高了國際上資產市場，繼而推高了商品期貨，繼而傳導到核心物價。而高處不勝寒的資產市場也面臨泡沫破裂的險境。於是，在這種前景下，各主要大國紛紛爭奪鑄幣權，就是必然的了。

在周小川 3 月 23 日發表第一篇文章的時候，美國總統奥巴馬 3 月 24 日作出迅速回應，他說："我不相信有必要建全球貨幣。"

對於中方提議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奥巴馬說，當前美元格外強勁，原因是投資者認為美國經濟在世界上最強勁，政治系統最穩定。奥巴馬自信世界公眾正在恢復對美國形象及其全球能力的信心。

美國財長蓋特納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 3 月 24 日在國會作證時被問到"是否斷然否認美國將拋離美元而邁向全球貨幣，就像中國所建議的那樣"，他們都表示並不認同中國的說法。這說明美國仍會捍衛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無可爭議。

而事實上，在此前的 3 月 16 日，俄羅斯總統府網站發佈了將在倫敦 G20 金融峰會上提出的一份提案，其中就包括引入 SDR 作為一種"超國家儲備貨幣"。這與周小川所提出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或可謂異曲同工。

俄羅斯的方案中，涉及了"超國家儲備貨幣"、金融監管、經

濟刺激等多方面的建議，而未對發展 SDR 作為"超國家儲備貨幣"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作詳細闡述。相比之下，周小川的這篇文章，則補充說明了發展 SDR 的理由和好處，亦提出了具體的做法。

而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等學者組成的聯合國專家小組三月底也草擬了一份報告，同樣呼吁另建新的全球儲備貨幣，取代目前美元獨大的地位；小組的報告又認為，新的全球儲備系統可行，甚至可以減輕因貿易失衡而造成的問題。

還有評論指出，周小川提出的方案寄託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良和做實特別提款權上，只是現行制度的改良，並非倡議對現行貨幣體制的革命，所以不存在"終結美元時代"的問題。但全世界各相關人士都有自己的解讀。

德意志銀行中國區經濟學家馬駿在一份報告中說，周小川的提議可能會導致全球貨幣體系發生未來幾十年裏最深入的改革之一。他認同這一提議背後的分析，稱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使美國可以過度借錢，是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的原因之一。

他說，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想法值得認真考慮，因為這是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長遠來看可能有助於結束中美之間巨大的雙邊失衡。馬駿承認，實施這個想法面臨著巨大的技術性障礙，不過他說這個想法可能會慢慢獲得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的支持。

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

爾（Ben Simpfendorfer）在一份報告中說，事實顯示，中國央行正在更加積極地推進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他指的是中國大陸與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白俄羅斯最近達成的貨幣互換協議。

他說，這些交易暗示出，中國央行正在努力朝著用人民幣而非美元進行貿易結算的方向前進，這可能是保護中國出口商免受當前美元和歐元彙率大幅波動影響的一種方式。他說，人民幣不太可能

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不過在地區內的使用可能會逐漸增加，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亞洲地區的實際貨幣。

"世界元"的可行性，一場荒誕的夢？

周小川的文章中心思想，在於"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

而在隨後的 3 月 27 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英國《泰晤士報》發表署名文章《G20 集團的目光不能僅限於自身的需求》中也指出，國際社會應大力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那麼，在現在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建立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世界元"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而實際上，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元一直維持著逆勢堅挺的強勢之姿。我們不禁感嘆，美元地位究竟誰能撼動？

我們看看國際的和國內的經濟專家的看法：

IMF 總裁斯特勞斯•卡恩：中國方面提出探討創造一種可以替代美元的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是合理的，也許有關討論將在未來幾個月內進行。關於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討論其實並不是新事物，而當前的危機再次激起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這並不意味著美元已經喪失主導地位，中國方面也持同樣看法。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認為，周小川建議從目前看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首先是需要多少 SDR，這個製定過程很容易被政治化；其次以 SDR 結算國際商品貿易，必須為私營企業所接受。

美國專家指出，美國不會放棄美元，中國也不會放棄美元。因為中國如果以人民幣的方式換回現有的美元，勢必要增發貨幣，引發通脹。而中國通過購買美元資產，也防止人民幣走強而對其出口不利。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稱，美元債券之所以安全，是因為美元不能倒，否則全球經濟一起完蛋。資本市場專家、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席勒近日參加《華爾街日報》金融創新未來會議時指出，歷史上實際至少有過一次美國債券大幅縮水的情況。在羅斯福總統使美元與金本位脫鉤，單方面對美元實行貶值後，美元債券的價值損失了約 75%。現在，是美元的又一次大貶值時期，美國要填滿 50 萬億美元以上的衍生品黑洞，基礎貨幣印刷得增加幾十倍才行。全球美元資產持有者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受害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世界上美元外匯儲備最多的中國公開批評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並提議構築新的貨幣體系，這一點誰也沒有想到。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替代美元是最快的途徑，但我認為，從長期來看，最好應成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機構。

世界單一貨幣協會主席龐帕斯：我強烈支持周小川行長的這一提議。該提議是積極而可操作的。周行長的整篇文章，連同他的其他文章我已經全文閱讀了。我認為，他不僅提出了一個良好的提議，而且很透徹地提出了對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為改革鋪了道路。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認為：從理論上來講，用 SDR 代替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可行的，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支付功能，使用 SDR 可以避免匯率風險和金融震蕩的影響。

然而，在實際的操作上有很大的困難。首先，使用 SDR 勢必削弱主權國的貨幣地位，涉及到美元和歐元地位的下降，歐美國家拒

絕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另外，就是存在技術上的困難，SDR 並不能在民間使用，只能在政府間進行使用而不能在國際貿易中使用。同時，SDR 佔全球外匯儲備的量大概只有 1%或 2%，而要增加其發行量也相當困難。所以，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用 SDR 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推進過程。

奚君羊認為，美聯儲宣佈購買 3000 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儘管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美元，使美元一度出現貶值徵兆。然而，隨著美聯儲購買國債的舉動，使得投資者紛紛預測其他國家也有可能倣彷美聯儲而采取相同的措施，而這樣的預期同樣導致歐元、英鎊等貨幣的下跌。所以相對來說，美元仍處於上昇地位。美元仍然是最具有競爭力的貨幣。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認為：SDR 充當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作為長期的改革建議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兩個問題。第一，讓美國退出，而這並不是無條件退出，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而這個成本由誰來支付呢？收益和成本如何計算？

而且，使用 SDR 作用國際儲備貨幣的話，又要用什麼來為 SDR 進行擔保？讓 IMF 來擔保並不可行，美元的背後是由美國 500 家企業的經營稅收來支樑的，而 IMF 是沒有生產力的，又如何為 SDR 提供擔保？

信力建發表的一篇博文說，周小川呼吁建立與主權國家脫鉤的國際儲備貨幣，在全球頗吸引眼球。國內很多經濟學者對這一挑戰美元霸主地位的倡議大聲叫好，眾多的網民們更有長出一口烏氣的感覺。這兩種貌似一致的看法，其實內在邏輯大相徑庭。簡單地說，學者們稱讚的只是中國做出一種姿態，而很多普通網民則把周小川的觀點理解成了要建立一種世界元，以取代美元。

作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當然不可能是後一個意思，他說的只是

“考慮充分發揮 SDR 的作用。SDR 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即便如此，歐盟貿易總司司長大衛・歐沙律文 3 月 25 日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依然如此評價“中國提案”：“想法有趣、大膽，但要付諸現實卻非朝夕之功。”更何況建立世界元了。

在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後，世界元有一天一定會誕生在這個星球上。但今天把世界元這個概念提出來，就顯得有些可笑。如果有些網民把這一設想與解決經濟危機放在一起，更是不著邊際。

這事得回到最原初的起點，錢，或曰貨幣到底是什麼？貨幣是一種信用等價物，一個漁民用一種罕見的貝殼和農夫換糧食，並約定好將來農夫可以在他高興的任何時候，用這些貝殼來換回魚喫。這貝殼便是貨幣，便是錢，便是通貨。雙方之所以同意用貝殼，是因為這貝殼足夠稀罕，天然的稀缺造就了貝殼的信用。後來替代貝殼的大規模流通的是貴重金屬如金銀，也是這個道理。為什麼不能接受一塊石頭呢？因為石頭到處都有。當然，如果你能找一塊隕石也可以，因為它也是獨一無二的。

到處都有的除了石頭還有紙幣，但紙幣的信用不是靠紙張的罕有。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前，強勢如美元，依然要與黃金掛鉤，就是此理。這體系解體以後，美元這張紙就靠美國的信用了，它的基礎是美國的制度和實力。這回美聯儲這個印鈔的衙門收購長期國債之所以挨罵，就是因為美聯儲得靠印鈔購買，這事動搖了美國的信用。而奧巴馬拍胸脯說美國絕對安全，也是自信美國跟矮子比高，依然是相對最安全的。

文章指出，具體到今天來談論世界元，至少中國的制度就與全球主要國家無法接軌，例如央行不夠獨立、人大對稅收和財政的控制權事實上歸於政府、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等，而且這樣的國家並不止中國，所以世界元在當下不具有絲毫的現實意義。所以周小川

自己也承認，要建立一種超主權的貨幣“是個長期才能實現的目標”“是人類的大膽設想，並需要各國政治家拿出超凡的遠見和勇氣”。

因此在當前人民幣尚未得到真正廣泛的流通，金融體系未有開放，經濟制度未有進行重大改革，貨幣政策從緊的情況下，貿然高喊出台“世界幣”，無異於關公戰秦瓊，不過是一場荒誕夢罷了！

“至少中國央行行長的名字已家喻戶曉”

美國《時代》週刊評選出2009年“年度人物”的冠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原因在於正是因為這位美聯儲主席的努力，2009年才成為一段“疲弱復甦”的時期，而不是“災難性蕭條”的一年。出於類似理由，《時代》把“中國工人”列為年度亞軍人物之一，對防止世界經濟跌入深淵的另外一個因素——實際上是幾千萬人表示了肯定。

在說明理由時，《時代》提到了“Baoba”（“保八”，中國預計要在2009年實現8%的經濟增長目標）一詞，並表示：“一年以前，很多人以為 2009 年實現此目標無異於天方夜譚，但中國做到了，今年它仍然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主要經濟體，而這對其他所有人也是一種經濟刺激。功勞該歸誰？首先應歸於遠離故土、遠離家人到中國沿海工廠裏工作的數千萬工人。”

美聯社發表文章稱，這種無名無姓的提名或許看起來有些奇怪，因為這幾千萬人除了作為一個符號外，或許沒有什麼共同點，而現在他們被撮合到了一個標籤之下。但《時代》在這個提名的旁邊配了八張（剛好“保八”）照片（其中包括一張女工合影），被拍攝者是深圳某家液晶顯示器工廠的七名工人，這明顯是為了用具體的面孔來呈現“中國工人”這個概念（不過要是有頒獎儀式的話，不知道誰會被邀請）。

但是，儘管中國工人很英勇，但也得說 如果沒有中國政府 2008 年年底出台的大規模刺激措施，工人們或許連工作都找不到。就在 2009 年年初幾個月，中國的工作崗位只剩下了 2000 多萬個。另外，沿海工廠裏的工人製造了中國出口產品，他們依賴於全球市場的需求，而不是推動了全球的需求。

不過在今年的世界經濟進程中，中國肯定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在早前《時代》週刊公佈的一份“年度重要人物”名單上，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名理由是：當中國在國際經濟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之際，掌管這個快速增長經濟體的官員們，往往是不出風頭、謹言慎行到了極點。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當周小川 3 月份公開主張應結束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時，他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周小川提出的這個目前還在廣泛討論的想法，清楚地展現了一種中國形象：越來越果斷的世界經濟舞台的參與者，其同時還呼吁降低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美聯社介紹說，為配合“年度人物”的評選，《時代》網站發起了一項調查，讓讀者投票決定誰是他們心目中 2009 年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最新投票結果顯示，周小川排在第九位，排在第一位的是今年 1 月份將全美航空公司一架飛機成功迫降在哈德遜河的飛行員薩倫伯格。這說明，雖然《時代》年度重要人物名單主要都是非中國人，但至少中國央行行長的名字已經家喻戶曉。

值得關注的是，在 2010 年即將到來之際，周小川在 12 月 22 日召開的 2009 中國金融論壇上，針對中國貨幣政策發表評論稱：不同於多數國家貨幣政策目標單一且政策工具僅依賴利率，中國貨幣政策目標多年來一直是“四大任務”，且貨幣政策工具形式也表現



周小川很開心

為多樣化。

路透社評論說，眾所周知，多目標往往隱含著衝突與矛盾，很難同時達到滿意成效。因此，從不同角度看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效果，也往往會引發諸多的爭議。

不過，周小川表示，中國仍處在改革轉軌階段，貨幣政策必須要考慮多目標，所以必須在當前的目標優化和未來的目標優化的程度之間做權衡，需要動態的考慮問題。他同時指出，許多國家將利率做為單一貨幣政策工具的做法並不適合中國國情，央行目前的做法除了強調要簡潔，以及加強與公眾的溝通以外，還需要有更多一點的工具來執行貨幣政策。

"改革不合理價格體系的時候，我們需要承擔一定的通貨膨脹，但你同時贏得了資源配置的優化，給未來的經濟增長、低通貨膨脹打下基礎，所以，必須在當前的目標優化和未來的目標優化的程度之間做權衡，需要動態的考慮問題。"周小川說。

目前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有四大目標，第一是保持低通貨膨脹，第二是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是保持較高的就業率，也可以理解為較多的新增就業，第四是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

周小川認為，中國目前采用所謂"四大目標綜合平衡"的做法是合適的，對克服金融危機也是有用的，但也會在今後有不斷的演變。

本世紀以來，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包括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認為貨幣政策應該簡單、單一，比較流行的是通貨膨脹目標論，也就是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目標負責，這個做法在不少國家和相當一個階段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而中國的貨幣政策要兼顧四大目標，從不同角度看，政策效果難免存在矛盾之處。

因此，中國理論界也有不少觀點提出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也應該集中在單一的通貨膨脹上。但周小川表示，由於中國經濟是一個改革轉軌期間的經濟，在市場化程度、在貨幣政策的運作機制上、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上，都跟發達國家不一樣，也跟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不一樣，因此不會選擇以單一通脹為目標。

中國近年來一直不斷地在進行價格體系改革，但專家們指出，由於價格體系改革直接牽動著通脹指標——CPI 的變化，很難做到在改革的過程中，通脹水平一直保持在低位，因此，央行的貨幣政策有時必須忍受潛在的通脹壓力。

因此，周小川也指出，貨幣政策必須考慮支持資源配置優化，要考慮能源價格、天然資源的價格、住房還有公共交通等可以收費的公共事業，包括水資源價格改革，改革央行要支持，同時制訂貨幣政策要對此留有空間。

"否則單純以通貨膨脹目標論，我們可能會抵制這些改革，因為它們不利於實現低通貨膨脹，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的。"周小川說。"不過，多目標之間就可能有一些是相互衝突的，目標 A、目標 B 相互衝突，導致你必須取捨。"他認為，"這個目標達到多少，那個目標達到多少，要找到一個折中點。"

周小川形容稱，經濟不像牛頓力學定律這麼簡單，不會有公式加以簡單化，因此，必須用比較複雜的思維來考慮貨幣政策。

對於近年來業界關注的貨幣政策工具的問題，周小川提到，歷史上看，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都有一個慢慢過時的過程，比方說廣義貨幣、狹義貨幣的概念其實已經慢慢過時了，已經不怎麼起作用了。近二、三十年來，貨幣政策理論的發展強調與公眾的溝通，強調對通貨膨脹預期的溝通和引導，把這個當作治理通貨膨脹最重要的東西。

“但溝通也會有困難，因為這基於公眾也有非常好的理性預期。”他稱。眾所周知，即便是理性預期也往往會受到挑戰，尤其是在資本市場上，因為公眾存在許多不理性行為，如羊群效應、跟風效應、僥幸心理等。這次金融危機就提醒大家，市場中總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做法。另外即便它是理性的，也不一定想追求定價的合理性。

周小川開玩笑地說，“理性是為了賺錢，而並不關心這個定價是否在宏觀上合理，是否會產生泡沫等問題。”所以，他認為，僅強調中央銀行與公眾溝通這條是不夠用。“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除了強調要簡潔、溝通以外，還需要有更多一點來執行貨幣政策。”

戴秉國

中國“國家安全顧問”

近年常以特使身份處理中國外交戰略問題的戴秉國，被認為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國家安全顧問”。這位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十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被定為溫家寶新一屆國務院內閣的國務委員，主管外交事務。

在 2008 年人大投票表決國務院成員時，他得的贊成票達 2909 張，反對票為 17 張，棄權票是 16 張。在整個表決的得票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戴秉國是中國老資格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長、文化部長黃鎮的女婿。在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期間，與胡錦濤建立了關係，深受器重。

自中共十七大成為中國外交事務的新掌門人後，戴秉國不斷展現出他的個人風采，尤其在擴大和深化中美雙邊關係方面，讓美國人感覺到他有當初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其岳父黃鎮的遺風。

替代唐家璇，成外交領域領導人

說起戴秉國，在 2007 年夏天鬧出一場插曲。中國中央國家機關選的十七大代表名單公佈，年滿 66 歲的老資格外交官、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戴秉國，竟然榜上無名！這讓不少人大呼意外。也

頓時引起外界很多議論猜測。難道他已經“船到碼頭車到站”，被當局解甲歸田了？由於戴秉國一段時期以來被看成是“胡錦濤的人”，於是甚至還有一種猜測，說胡錦濤在權爭之中受到挫折，安排外交部人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云云。

但是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其實是一條“烏龍新聞”，實際情況完全不是如此。戴秉國只是沒有佔外交部的代表名額而已，他的仕途並未到頭，還將繼續被委以重任。中國外交系統的人事調整也正在加緊進行之中，包括戴秉國、楊潔篪、王光亞、王毅等人在內的外交界新一撥人馬，很可能會使中國的外交風格讓人耳目一新。



戴秉國

專家分析，外界有人將“中直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二者混為一談。實際上這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前者指黨中央機構，例如中央辦公廳、中宣部、中組部及直屬單位；後者是政府機構，例如國務院部、委、辦、局。戴秉國的名字，是沒有出現在中央國家機關系統的名單上。參加十七大的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規模大、層次高，每個部委能攤到的代表名額實在有限，多數部委代表為兩到三人。而外交系統中十七大代表就有原部長李肇星、現部長楊潔篪、

常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時任駐日大使王毅，以及三名司廳級官員：非洲司司長許鏡湖、外交學院黨委書記秦亞青、駐比利時大使章啟月。其人數之多，只有另一個大單位公安部能夠匹敵。在這樣的情形下，戴秉國被安排不佔外交部名額，因為他還有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身份，可以列在中直機關系統的名額中當上十七大代表。

還有人分析，按照慣例，包括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被分配進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代表團。例如，胡錦濤在江蘇，吳邦國在安徽，溫家寶在四川，賈慶林在北京，曾慶紅在江西，吳官正在內蒙古，李長春在廣東，羅幹在山東，等等。領導人安排為哪個省市的代表，有時候是考慮其籍貫、工作經歷與該地有點淵源，但也有時完全八杆子打不著。戴秉國被安排為某省代表也是可能的。

此外，中央手頭還有一部分特邀代表名額。現在，當局已經宣佈十七大代表全部選出並公佈了名單，戴秉國的名字就在其列。雖然從按照姓氏筆畫的名單上看不出屬於哪個代表團，但對當局來講，這不過是名字放在哪個組的小小技術問題，戴秉國肯定要在胡溫的第二屆任期中，替代唐家璇，成為外交領域的實際領導人。

土家族赤腳高中生“勤勤懇懇做事”

戴秉國是中國老資格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長、文化部長黃鎮的女婿。知情人士說，戴秉國是在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部長期間，與胡錦濤建立了關係，受到胡錦濤的器重，他近年扮演國安顧問角色，代表胡處理外交大事，是中美、中日、中俄、中印戰略對話的領軍人物。

戴秉國是土家族，1941 年 3 月，出生於現在依然偏僻的貴州省

印江縣山村，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二。曾祖父、祖父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惟有父母還讀過幾天私塾，認得幾個字。由於家境不富裕，戴秉國5歲時就開始學做農活。但是不管酷暑寒冬，開通的父親總是催促在村裏上私塾的戴秉國刻苦讀書。

戴秉國保留著已經發黃的9歲時的習作："白雲一點在空中，一走西來一走東；霧雲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山滿目融。"在戴秉國家客廳裏，掛著一幅自己的字："正正派派做人，勤勤懇懇做事"。

戴秉國是靠國家助學金讀完中學的，母親只能每年給他縫製一套粗布衣衫，納一雙布鞋，他捨不得平時穿那雙布鞋，成了一個赤腳高中生。

1959年，戴秉國考取了四川大學外語系，滿心歡喜之餘，沒有錢的苦惱接著襲上心來。可是，決心已定的戴秉國沒有放棄，他又沿著熟悉的山路用了兩天多時間走到了學校，希望母校能夠再幫他一把，然而，同樣為有這樣一個優秀的畢業生而感到高興的學校卻愛莫能助。幾乎絕望的他想到了行署文教局，緊接著從松桃趕往銅仁，150里的山路，很快被他甩在了身後，遺憾的是他來晚了一步，儘管這樣，工作人員還是想辦法給了他15元錢。生平第一次拿到這麼多錢的戴秉國高興得差點要跳起來，連忙發電報給父母和哥哥，請他們想辦法再幫他籌措30元路費。第三天，戴秉國拿到了這30元來之不易的電匯，接著便匆忙往成都趕去。經過一番步行、搭船、乘火車的顛簸，他出現在川大時，學校已開學10天了。

大學畢業前，戴秉國以優良的成績被學校推薦參加國家外交學院研究生班的考試，並從全國眾多優秀學生中脫穎而出，幸運地成為了被錄取的50人中的一員。1964年，他第一次來到了首都北京，開始了外交學院研究生的學習生活。然而，"四清"運動開始後，戴秉國與其他同學一道成了工作隊隊員，並被派到了湖南的瀏陽。

一年後，25歲的戴秉國回到北京，被組織選調到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工作，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交火，雙邊關係急轉直下。而戴秉國就是在珍寶島衝突發生之後，遠赴莫斯科出任中國駐蘇大使館隨員。後來他回憶道："當時作了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是作為人質，最壞的可能就是犧牲了。"

"戴秉國是有名的'筆杆子'"，一位當時在駐蘇使館跟戴秉國共事的外交官說，"他是當時使館許多重要文電的主筆人之一"，撰寫了許多有份量的重要報告。在使館期間，戴秉國潛心鑽研外交業務，刻苦研究了中蘇雙邊關係、中蘇美三角關係以及駐在國國情等許多課題。

1973年，戴秉國結束駐蘇工作，返回外交部蘇歐司工作，並逐步陞遷為副處長、處長。1980年至1982年，戴秉國參加了中蘇邊界談判，擔任外交部中蘇談判辦公室副組長。1985年，戴秉國出任蘇歐司副司長。

1985年的一個冬日，蘇聯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機被劫持迫降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的某農場。此時中蘇關係非常敏感，這又是第一架被劫持到中國的蘇聯飛機，戴秉國接到任務立即帶隊連夜趕到現場。整整40多個小時未曾合眼後，他帶領工作組圓滿地處理了此次事件。

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的海參崴講話對中蘇關係透露出更積極的信息，戴秉國也恰在此時昇為蘇歐司司長。

為了推動蘇聯更向前邁進一步，中國政府還邀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塔雷津訪華，而負責此次禮賓接待任務的自然是蘇歐司。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時任外長錢其琛應邀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自1957年之後，30多年來中國外長第一次正式訪問

蘇聯，可以說是一次破冰之旅，主要任務是為中蘇首腦會晤做準備。身為蘇歐司司長的戴秉國也陪同訪問。正值嚴冬，莫斯科大雪紛飛，寒風刺骨。鑒於兩國關係的特殊和環境的複雜，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不便在室內商議談判對策，只好冒著寒風，踏著厚厚的積雪，在賓館的庭院裏不停地漫步商談。

1989 年，戴秉國被任命為駐匈牙利大使。這一年正是蘇東劇變和匈牙利歷史上風雲變幻、發生重大轉捩的一年。值得一提的是，戴秉國的岳父，曾任文化部部長和外交部副部長的黃鎮也曾擔任駐匈牙利大使。“翁婿大使”的故事在外交圈中被傳為一段佳話。

戴秉國夫人黃浩是黃鎮的二女兒。與戴秉國的性格類似，黃浩也非常低調。除了陪同一些外國駐華使節夫人出席少數慈善活動外，她在媒體上絕少露面。

兩年後的 1991 年 12 月，他回到北京，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部黨委委員。又是兩年後，1993 年 12 月，他晉陞為外交部副部長。1995 年 6 月，他轉到黨的系統，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做“接班”準備。

岳父黃鎮是美國通，和尼克松成好友

戴秉國的岳父黃鎮，字白知，原名黃士元，1909 年 1 月 8 日出生，安徽省桐城縣東鄉（現為樅陽縣橫埠鎮）人。1925 年，黃鎮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但次年即因參加學生運動而被迫退學，後轉入新華藝術大學，畢業後回鄉任浮山中學美術教員。1929 年，黃因支持學生運動而被解職，次年加入西北軍孫連仲部任中尉參謀。

1931 年，隨部參加寧都暴動，加入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

國共產黨，任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創作畫作《粉碎敵人的圍剿》等。1934 年，黃鎮隨部參加長征，在途中創作了話劇《一隻破草鞋》、歌曲《打騎兵歌》和畫作《長征畫冊》等作品。

抗戰爆發後，黃鎮任八路軍 129 師政治部副主任。1943 年 5 月，河南北部的國民政府軍隊在龐炳勳和孫殿英的率領下投敵，黃鎮遂立即調任豫北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在新淪陷區域創建中共根據地，不久轉任太行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指揮中共軍事力量在河南北部的行動。

1948 年，黃鎮被調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研究室副主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等職務，主持制訂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圖案以及一些軍事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鎮於 1950 年被任命為中國駐匈牙利大使。1954 年，調任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陪同周恩來總理出席萬隆會議。1961 年，黃鎮昇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次年又被任命為中印邊界問題特使，負責中印邊界戰爭後的外交善後事宜。1964 年，黃鎮出任首任駐法國大使。

1971 年起，黃鎮奉命秘密同美國展開外交溝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外交正常化作出了推動作用。1973 年，黃鎮被任命為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成為駐華盛頓的中共方面首席外交代表。1977 年，黃鎮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

1982 年，黃鎮退休，任中顧委常委。1989 年，黃鎮逝世於北京。被稱為“將軍大使”的黃鎮在 1973 年到 1977 年期間，擔任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但在任期時曾向毛澤東鬧過“辭職”。

1973 年 2 月 25 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中美雙方商定，在兩國首都互設聯絡處。這是在美國總統尼克松實


將軍外交官黃鎮

現破冰之旅後，中美關係尚未實現正常化之前的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中美雙方為建立一個便捷的聯絡渠道而采取的一項特殊措施。

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戴維·布魯斯，是一位“接受重要使命最多”（尼克松語）的老資格外交家。時任中國駐法大使的黃鎮，則被任命為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

挑選黃鎮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是周恩來點的將，經毛澤東同意的。黃鎮歷次受命擔當外交重任，均能不辱使命，已經蜚聲中外。他在執行中美巴黎聯絡渠道任務中的傑出表現，也獲得了美國領導人的讚賞。

1973 年 4 月 12 日晚，黃鎮赴美上任前，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同接見了黃鎮和中國駐美聯絡處副主任韓敘。毛澤東看著大家，開門見山地問黃鎮：“你從法國調到美國去當聯絡處主任，是昇了官還是降了官呀？”黃鎮笑著，沒有回答。毛澤東幽默地說：“是昇了官，聯絡處比大使館還大使館啊！聯絡處主任麼，chief，元首也是這個詞呀！”毛澤東這裏所說的“昇了官”，是指聯絡處主任定的是正部級。

據何立波撰文介紹，1973 年 5 月 29 日，黃鎮一行抵達美國。上任伊始，黃鎮所面對的情況異常複雜。他決定，把與美國政府建立關係作為重點，同時廣交各界朋友。黃鎮以自己的魅力很快便贏

得了眾多朋友，迅速打開了工作局面。在尼克松時代，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決策人是總統尼克松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黃鎮抵達華盛頓的當天下午，基辛格就接見了他。首次會面中，黃鎮將一份想會見的人員名單和打算訪問的地方的清單交給基辛格，徵求他的意見。基辛格表示很欣賞黃鎮這種“爽朗的辦事風格”，并當場告訴黃鎮：“你可以會見任何願見的人”，“可以訪問除了核武器試驗場以外的任何地方”。基辛格還表示：如果有要事商談，可以隨時找他或者尼克松。

5 月 30 日，黃鎮抵達華盛頓的次日，尼克松總統接見了他。在此後的一個月內，黃鎮頻繁與美國高層領導人見面和聯絡。6 月 4 日，黃鎮到國務院拜會羅傑斯國務卿，羅傑斯設午宴招待。7 日和 8 日，黃鎮先後到國會拜會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和少數黨共和黨領袖斯科特。在此期間，尼克松、基辛格還約見黃鎮通報情況達六次之多。

7 月 6 日，尼克松邀請黃鎮和夫人朱霖一起去“西部白宮”做客，並且安排總統專機接送。總統專機從華盛頓軍用機場出發時，一位安全官員開玩笑說：“黃鎮大使，你現在可以拿起話筒給美國三軍下命令，像尼克松總統一樣。”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西部白宮”位於洛杉磯以南大約 100 公里處的聖克利門蒂，這是尼克松的故鄉。尼克松是想借助這個地方營造一種輕鬆友好的家庭氛圍。因此，當黃鎮夫婦換乘的直昇機降落在西部白宮前的草坪上時，尼克松親自駕駛著一輛打高爾夫球用的小車將客人接進了宅院，而站在那座西班牙庭院式建築門口迎候客人的則是尼克松的夫人佩特。

1973 年 10 月，黃鎮邀請基辛格到中國駐美聯絡處做客。同時光臨的客人，還有眾議院議長艾伯特，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



尼克松訪華

德，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福特和夫人等30餘人。基辛格本來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任何大使館的晚宴他都不去，認為此例不可開，否則的話“就得跑遍（駐華盛頓的）150個使館”。黄鎮對此風趣地回答：“我們可不是大使館，而是聯絡處。”基辛格也詼諧地說：“對，駐華盛頓的聯絡處的邀請，我都接受。”此後，基辛格成了聯絡處的常客。美方還為聯絡處安裝了一部直通白宮的熱線電話，禮遇之高，確實是“比大使館還大使館”。

1974年8月20日，尼克松已經離任，黄鎮攜夫人朱霖再次專程去聖克利門蒂看望了尼克松夫婦，轉達毛澤東、周恩來對於這位老朋友的問候，表示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尼克松先生為打開中美關係所做的貢獻的。黄鎮夫婦的來訪，使尼克松夫婦非常感動。1977年10月21日，黄鎮離任回國前與朱霖又專程去聖克利門蒂向尼克松辭行。以後，尼克松多次訪華，每次都要同黄鎮夫婦會面。1991年，尼克松最後一次訪華時，黄鎮已經去世，可他仍約見了朱霖。朱霖在和平門烤鴨店宴請尼克松時，尼克松惋惜地回憶道，他1989年10月訪華時，見到黄鎮很健康，握手一如既往，非常有力，怎麼也想不到那麼快就去世了。

作為駐美聯絡處主任，與美國上層人士搞好關係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除了尼克松政府，黄鎮與之後的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關係都很好。1975年，福特總統訪華。毛澤東接見福特時，黄鎮陪同接見。福特當場讚揚黄鎮是個“優秀的人”，國務卿萬斯讚揚黄鎮“贏得了所有的美國人的尊敬”，稱黄鎮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77年11月3日，黄鎮離任回國前，美國副總統蒙代爾代表卡特總統為黄鎮餞行。蒙代爾讚揚說：“中方派了黄鎮這樣一位卓越人物為駐美聯絡處第一任主任，使美方感到榮幸。”宴會即將結束時，卡特總統親自來到宴會廳，向黄鎮道別。

向毛澤東“鬧辭職”，福特做工作

黄鎮在美國工作的大部分時間，正值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後期。在1975年，國內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黄鎮在聯絡處向上級發出的表態電報中堅決刪去了“批鄧”的字句，並表示：“經我批發的文電，決不允許有‘批鄧’的字樣。”

1975年，黄鎮任駐美聯絡處主任已兩年多。在這段時間內，“四人幫”到處插手聯絡處的工作。他們在北京圍攻、詆毀周恩來，奪取外交大權，並向聯絡處潑髒水，鼓動大家造反。聯絡處參贊冀朝鑄十分同情黄鎮的處境，他悄悄地問黄鎮：“你跟主席那麼熟，為什麼不向主席反映呢？”黄鎮嘆氣道：“主席年紀大了，也不像從

前那樣好說話了。”“跟總理說說也行呀！”“總理自己的處境也很不好，我怎麼好再去打擾他呢？”黃鎮苦悶地說：“我不喜歡越級申訴。”沈思片刻後，他又斷然地說：“但把我逼急了，我是要反映的！”

何立波的文章介紹說，黃鎮決心把聯絡處的問題擱到桌面上解決，於是召開了聯絡處黨委擴大會議。有兩個人首先“開炮”：“老幹部至多60歲就應該退休，不要擋道嘛。培養接班人嘛，應該有這個自覺！”“有的老幹部，自己不行，還要硬著頭皮幹，應該有自知之明嘛！”聯絡處只有黃鎮60歲以上，對方顯然是把矛頭對準了他。在場當即有人表示反對：“這不是要搶班奪權嗎？照你這樣說，中央領導都該下台……”這兩個人退縮了：“中央領導同志除外。”黃鎮拍案而起，厲聲說道：“我馬上向中央發報，請中央派人來。如責任在我，請示處分；如責任不在我，中央瞭解了，也就滿意了。你們也不用說什麼60歲不60歲，我完全可以辭職！”黃鎮的話讓韓敘很喫驚，他勸黃鎮道：“你這一辭職，不正中某些人下懷嗎？”朱霖也說：“這不是人讓看笑話嗎？我們又沒犯錯誤，幹嗎自己甩掉烏紗帽呢？”黃鎮搖搖頭：“你們沒看出來，我很難幹下去了。這個位置很重要，有許多人想控制對美工作，搞獨立王國。所以我只有離開，因為不把我趕走打倒，不取得這頂桂冠，他們是不甘心的！”

辭職電報發出後，由於遲遲沒有得到回音，黃鎮又直接發電報轉呈毛澤東、周恩來：“根據聯絡處的某些情況，我也很難繼續工作。因此，經過反覆考慮，為了不使聯絡處這一執行主席的偉大戰略方針機構的工作受到任何影響，特請求調動我的工作。”

外交部長喬冠華對黃鎮直接向毛主席提辭職報告感到非常喫驚，他向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做了彙報。鄧小平在八路軍一二九師當政委時，黃鎮是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對黃鎮非常瞭解。他對喬冠華說：“外交部如容納不了黃鎮這樣一個老幹部，我可以讓他回軍隊當副總參謀長。”喬冠華連忙擺手：“要是這樣，還不如把我先調走，也免得別人說我心胸狹窄。”鄧小平問：“他到底遇到了什麼問題？”喬冠華把別人整理的一些材料送給鄧小平過目，鄧小平翻閱後說：“等黃鎮回來再聽聽他的。”接著，鄧小平親自修改了喬冠華準備給黃鎮回復的電文：“黃鎮同志，你的來電收悉。你即將赴美西部會見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又已初步確定年底前相繼來訪。諸事繁多，故不宜考慮調動問題。國內考慮，可趁基辛格、福特來訪之機回國再談此事……”

黃鎮接到回電後，繼續安心工作。1975年12月，美國總統福特訪華。12月2日，黃鎮陪同福特總統和國務卿基辛格去見毛澤東。毛澤東關心地問起了黃鎮辭職一事。黃鎮順口說：“聽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問福特總統：“你們要不要（黃鎮）啊？”福特點頭說：“我們肯定要他回去。我們的關係是極好的。重要的是你們大使要回去，而布什先生留在北京。”毛澤東斷然地說：“那好，我看黃鎮還是到美國好。”黃鎮點點頭：“堅決執行主席的指示。我是想回來，我在國外太長了。主席要我去，我就去。”“再去一年、兩年吧！”毛澤東又對眾人說：“年輕人對他有些意見。他們兩個對喬老爺（喬冠華）也有意見。這些人不好惹啊，受他們的氣啊！”

回家後，黃鎮對夫人朱霖說：“主席真是了不起，他要做我的工作，並不直接跟我說，而是讓福特開口……”在毛澤東發話後，黃鎮收回了自己的請辭書，和朱霖一起重返駐美聯絡處，繼續工作。1977年12月，中央調黃鎮回國，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長，並先後兼任文化部黨組書記、部長和對外文委黨組書記、主任。

1989年12月11日黃鎮逝世後，經中共中央審定的《黃鎮同志

生平》指出："他廣交朋友，積極地促成了美國總統、國務卿以及美國國防部長等美國高級官員和美國國會一些議員的訪華，增進了中美雙方的相互瞭解，使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友好往來不斷發展，卓有成效地為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做了準備。"

1989 年 12 月 17 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向黃鎮夫人朱霖發來唁電，對黃鎮在美期間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在我們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前的艱難時期，黃大使有幸參與了我們兩國之間擴大瞭解、相互溝通的重要進程。黃鎮對這一持續至今的重要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

戴秉國曾給江澤民親戚讓位？

岳父黃鎮去世時，戴秉國剛出任駐匈牙利大使。昔日的同事說，"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岳父去世時，他和夫人都正在匈牙利使館工作。最終還是沒能回來。"

1991 年結束任期後，50 歲的戴秉國昇為外交部部長助理、黨委委員，1993 年又晉陞為外交部副部長，兩年後調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1997 年 8 月，在中共十五大前夕，在分管黨務、組織的第五號人物、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安排下，戴秉國昇任對外聯絡部部長。

戴秉國主政中聯部期間，中共對外交往取得不少進展，共派出約 400 個代表團、組出訪各國，接待了 800 多個外國政黨代表團來訪。截至 2001 年底，有 147 個國家和地區的 418 個政黨和組織跟中共建立或恢復聯繫。

然而，2003 年 3 月，他卻被調任外交部擔任常務副部長兼部黨委書記。

已經當了正部長之後，卻轉任副部長，雖然還是正部級，而且強調是"常務副部長"，但在中共建政之後正常的人事安排、職務變遷中，讓人感覺很突兀。當時有一種傳言，說這是要 62 歲的戴秉國"讓位"，騰出中聯部長職務，好安排當時 54 歲的副部長王家瑞——而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的王家瑞，據說是江澤民夫人王冶坪的侄子，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歷任長春市郵政局副局長、郵電部報刊發行局局長、國家經貿委司長。1995 年到山東青島，後擔任市委副書記、市長，2000 年調中聯部任副部長。

"騰位子之說"並沒有得到證實。相反，戴秉國回到國務院外交部系統之後，地位日益崇隆，職權日益重要。2005 年 3 月，他接替劉華秋，兼任中央外事辦主任。

分析家指出，每當重要和關鍵時候，戴秉國均被委以重任，以中國政府特使身份，就雙邊關係及重要國際問題與外方進行溝通，尋求解決辦法，所處理的都是中國的重大、敏感的外交議題，包括中美高層對話、處理北朝鮮問題、中印邊界糾紛、中日戰略對話……莫不由戴秉國領銜擔綱。

時任外交部長李肇星也很忙碌，但一般都是跟著胡錦濤出訪，要不就是替胡錦濤在會見外賓前先行熱身。戴李之間，誰才可以獨當一面，似乎十分明顯。

外交界有所謂"親蘇派""親美派""親日派"的說法，消息人士說，這種說法不確切，不如說"知蘇派""知美派""知日派"。戴秉國可以列為"知蘇派"。他長期從事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事務，這使他被選中掌管中聯部提供了條件，因為中聯部主要業務之一，就是面對易幟轉型的前紅色國家中下野或者改組了的原執政黨。而這一段經驗，又為他斡旋北朝鮮核危機打下了良好基礎。據稱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對唐家璇、李肇星等為首



戴秉國在對外交往中以謙和著稱

的中國外交部系統很不信任，認為他們過於"親美"、"親日"，而對於長期負責黨際交往的戴秉國則有好感，這就讓戴有了施展的空間。他多次以特使身份到平壤訪問，成了胡錦濤和金正日之間的最重要的傳話人。他也曾作為中國政府特使，赴美國勸和促談。

朝核六方會談奠定了戴秉國在中國高層以及外交界的地位。江澤民時代，中國外交的戰略重心是美國，但是到了胡錦濤時代，外交格局做了一定調整，儘管美國仍是中國外交的頭號對象，但是俄羅斯和歐洲的砝碼分量上昇，戴秉國的資歷和經驗的重要性也就更為凸顯。因此，雖然他比李肇星僅僅小一歲，卻可以更上一層樓，成為未來中國外交事務的掌門人。

曾有人打抱不平說，"文革"之後的中國外長黃華、吳學謙、錢其琛，不是都晉陞為副總理了嗎？為何到唐家璇只昇任國務委員，比副總理矮了半級？戴秉國也應該"恢復傳統"成為副總理才是。但是，這次他在溫家寶新一屆內閣中仍然只是被安排為國務委員。

李濱是"雙面諜"？戴親自審問

2007年2月20日，南韓第一大報《朝鮮日報》在頭版刊出駐北京特派員樸勝俊專文指出，前中國駐南韓大使李濱因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目前正被中國公安當局羈押及偵訊調查。

樸勝俊專文指出，李濱是繼首任大使張庭延之後出任該職。任期屆滿返回北京後，即擔任由目前中國駐南韓大使寧賦魁所負責的北韓核問題有關事務的大使，並從2006年5月開始，出任山東省威海市副市長。但2006年12月突然被北京公安當局傳訊並接受調查。

2006年年底，李濱在沒有任何公文程序的情況下，突然從威海市副市長去職。李濱曾於2005年8月訪問過南韓，他在會晤京畿道知事（相當於中國的省長）金文洙時，還曾提議建設橫渡黃海銜接京畿道平澤市和山東省威海市的火車輪渡。

《朝鮮日報》指出，至於李濱到底泄露了何等國家機密，目前尚不得而知。李濱曾於1986年和1997年兩度在中國駐北韓大使館工作，在北韓勞動黨總書記兼國防委員長金正日兩次訪問中國時，曾負責接待工作。由此點推測，李濱向南韓當局泄露的可能是足以影響中國和北韓的關係重要情報。

2007年9月13日，《華盛頓郵報》報導：李濱可能是"雙面間諜"：一方面，李濱因與朝鮮領袖金正日私交甚密，泄露金正日訪中行蹤等機密給媒體而遭北京調查，另方面，李濱也提供金正日、中朝關係動向讓南韓及美國知曉。

報導引述中國官員說，南韓當局常能瞭解北韓動向，李濱可能扮演一定角色。2007年初李濱被"雙規"後，全案由中國國安及外交兩部負責調查。這案情可能是自1994年中國破獲前解放軍將領劉連昆及邵正宗為台軍情部門工作來，最嚴重的一次。



李濱

究竟李濱泄露什麼國家機密至今仍不知。不過，2006年元月金正日訪問中國，並前往湖北、廣州及深圳考察，當時被日本及南韓媒體兜了個底朝天，作為金正日"全陪"及翻譯的李濱，的確涉嫌重大。

美國之音引述觀察人士的話說，李濱涉嫌泄露金正日訪華消息，讓中國政府非常難堪，因此中國必須嚴肅處理，以保持中國和朝鮮之間的高度信任。

根據以往的慣例和政治及安全方面的考慮，金正日對中國的訪問不事先公佈，中國政府通常是在金正日離開中國、返回平壤後才對外宣佈。

《華盛頓郵報》說，李濱很可能泄露的是對中朝兩國關係影響更大的機密。北京懷疑李濱既提供情報給南韓有關部門，很可能也提供"六方會談"的情報給美國，其中包括朝鮮對核計畫的構想。

不過，從北京獲得的消息顯示，說李濱是"雙面間諜"可能被誇大了。

現年53歲的李濱生於北京，曾在朝鮮金日成大學就讀五年，能說一口流利韓語。

李濱自1977年到朝鮮大使館工作後，由科員、三秘、二秘做起，1991年昇任外交部亞洲司處長，1994年出任南韓大使館參贊，1997年再返北韓任公使銜參贊。2001年，李濱出任南韓大使，2005年8月昇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並擔任朝鮮核問題特使。

據披露，李濱和金正日私交甚篤。2001年3月金正日有次曾造訪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並與時任公使的李濱長談，金正日喝紅酒，李濱喝白酒，一聊就是五個小時。

李濱出事的最大原因可能在於太貪"杯中物"。在南韓任職期間，李濱因個性豪爽，又能說一口流利韓語，經常繞過中國人辦事，讓親中僑社對他頗有微辭。此外，李濱又嗜酒，經常半夜與南韓官員到酒吧痛飲"深水炸彈"，或許正因"行為不檢點"，被告上一狀。首爾一位官員評論此事說，"酒喝太多，的確容易出事，特別是會變成大嘴巴！"同時，據傳中國駐南韓使館同僚也曾參他一本。

消息人士說，外交部領導接到多份告狀信之後，2006年5月便由中組部安排，將李濱安排到山東威海市掛職，擔任負責招商投資的副市長。同時，外交部展開對李濱的秘密調查。有媒體報導，李濱2006年12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但消息人士說，李濱並沒有被逮捕。有關對他的調查，由外交部當時的黨組書記戴秉國親自負責，並沒有發現李濱充當外國間諜的證據，不過調查顯示李濱"嚴重違紀"，包括泄密。

在回答戴秉國審問時，李濱對自己違紀行為的理由是："不滿自已被提拔太慢"。

戴秉國聞之氣結，怒斥李濱：你都當了大使、當了副司長！還說提拔太慢！？

不久，李濱被宣佈撤消了所有官職，開除黨籍，但並未送司法機關處理，而是發配到了外交部資料室。

由此可見李濱並未被定性為間諜。觀察人士指出，按照中國有關法律，泄密的問題可大可小，如果是間諜罪，刑罰將比較嚴重，像李濱這樣的級別，以及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更有可能判處死刑。

大贊年輕漂亮，與希拉里成老朋友，

2009年，戴秉國作為掌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打了數次交道，通過聊家常，兩人建立起非常好的私人關係，成為兩國新外交關係中一段佳話。

2月中旬，剛剛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開始了她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行，中國是她出訪的最後一站。在未出訪前，希拉里曾在紐約發表談話說，強調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中國和台灣糾紛的重要性。她說："我們期待台海關係進一步改善。儘管我們之間存在分歧,美國仍將致力於尋求與中國建立積極的關係。"

當時外電評論稱，希拉里上任後的首次訪問，希望將她稱為基本關係的美中關係提陞到新水平。希拉里呼吁擴大對華接觸，超越布什前政府過度倚重的貿易問題。外交專家還預計，希拉里將在與中方領導人會談時提出在地區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疾病等問題上加強合作問題。

但也有專家警告說，希拉里必須避免因在人權、西藏或台灣問題上施壓而引起日益自信的北京的敵意，迄今她在這些問題上一直輕描淡寫。此外，在希拉里訪華前，中美還宣佈將在其訪華後不久重啟軍事對話。這反映了雙方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希拉里啟程前夕，也曾用中國成語"同舟共濟"來形容中美關係。

2月21日，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希拉里時，一見面就稱讚希拉里年輕了，而且真人較電視畫面上漂亮。而62歲的希拉里就如少女般當即面紅，並一時語塞，不知該如何應對，停頓之後才表示，相信同戴秉國會合作愉快。

戴秉國在會見希拉里時指出，我們讚賞奧巴馬政府重視發展中美關係。中美兩國合作空間很大，前景廣闊。雙方有責任和義務擴大和深化在雙邊領域和國際地區問題上的合作，把雙方關係搞得更好，使今後30年中美關係發展得更深、更廣、更好。雙方還就朝鮮半島核問題等交換了意見。

這是希拉里出任美國國務卿後，與戴秉國的首次會晤，就像希拉里當時所說的那樣，兩個人不合作愉快，而且還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關係。7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希拉里曾設家宴款待戴秉國。

7月27日上午，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此輪會談為期兩天。第一天雙方舉行全體會後分兩個會場同時舉行戰略對話和經濟對話。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共同主持戰略對話，而經濟對話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長蒂莫西・蓋特納共同主持。

當天下午，戴秉國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美國國務院，美方用高規格的禮儀歡迎戴秉國一行，除了由國務卿希拉里親自在大門迎接之外，還特別鋪上了紅地毯，並且安排三軍儀隊，在門口分別高舉著美國星條旗和中國五星紅旗。

隨後，兩國代表團舉行了閉門會議。由於討論議題的廣泛，包括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以及美軍太平洋司令基廷，也都出席了中美戰略對話討論。

希拉里在對話中稱，美中將共同促進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地區的穩定。希拉里強調了中國在阿富汗衝突中的作用，稱兩國將"探索多種方式來討論如何促進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穩定"。

此外，會談還涉及了氣候變化以及核武器政策等議題。

戰略對話首場會談主題為中美關係。會談於下午3時開始。5

點15分左右，戴秉國與希拉里一起來到記者跟前，簡單總結了當日會談的情況。“我們過了非常好的一天，進行了很好的討論。”希拉里對記者說。戴秉國在一旁微笑著予以回應。

戴秉國說：“今天有了一個很好的開頭。”他還表示，適才雙方就中美關係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談“很坦誠，很深入，很廣泛”。他還透露，26日晚，希拉里在家中設宴對其表示歡迎，“昨天我們談得也很好。”

當晚，因為右肘仍未傷愈，希拉里在會見戴秉國時，還行了雙手合十的禮節，笑稱這是從剛剛訪問過的泰國學來的。戴秉國強調，兩國老一代領導人37年前打開兩國關係大門，如今兩國關係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雙方一致認為，對現在兩國關係，“我們現在應該十分珍惜，精心維護，全力提高”。



戴秉國和希拉里

在7月28日舉行的晚宴上以及稍早前中美聯合記者會上，希拉里不僅以中國人喜歡的桃紅套裝出場，還兩次溫情回憶起那天家宴的情景，她說，“我和戴秉國不談國事，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聊了聊家常”。戴秉國向她透露自己有了一個孫子，希拉里聞後說：“我們現在所作的都是為子孫後代，在開會之前應該帶上孩子和孫子的照片，提醒我們所作的工作的重要性，牢記我們對後代的責任。”

經過希拉里的兩次爆料，戴秉國乾脆正式在晚宴上宣佈，“一個月前，我當上爺爺了！”談到當了爺爺以後的不同，戴秉國說：“感受更多的是一種責任，每當我抱著孫子的時候，看著他天真無邪的小臉，我就想到，我們應該把希望留給孩子們，讓孩子們遠離戰爭、飢餓、災難和疾病，讓孩子們都能在蔚藍的天空下呼吸新鮮的空氣，在明媚的陽光下健康快樂地成長。”

他還回憶起與希拉里的兩次見面，第一次在釣魚台宴請希拉里，他發自內心地稱讚希拉里比電視上還漂亮；這次在華盛頓見面，“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戴秉國最後引述希拉里的一句話說：戰略互信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去做的，中美關係的良好發展，首先應該在人與人之間，官員與官員之間，相互瞭解，相互信任，建立友誼。

戴秉國：基辛格博士是我的老師

2009年7月28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戴秉國在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晚宴上發表演講。

戴秉國說：每次我到美國來，使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跟美國各界的朋友們歡聚一堂、暢敘友情。我第一次來美國是1986年。那個時候中國和蘇聯關係還沒有正常化，所以我們的外長

只能在聯合國這個地方跟蘇聯外長對話。那個時候不叫戰略對話，叫做關係正常化的對話。我那個時候是蘇聯東歐司司長，我到了美國才知道，為什麼美國可以成為超級大國。



戴秉國和基辛格

接著戴秉國爆料說：首先我要感謝美中貿易委員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其他友好團體，對王岐山副總理和我，以及我們代表團所有的同事們今天這樣熱情、熱烈的、令人感動的款待，我可以告訴大家也算一個小秘密，王岐山副總理，是京城幾大名嘴之一。他是很有演講天才的，我這個人就屬於比較笨了。他剛才講了還有一位地質學家的老師。我也有一位老師，我很崇拜他，就是坐在這裏的，剛才在這兒講話的基辛格博士。他是跟隨尼克松總統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老一代美國的政治家領導人。他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現在已經是八十多歲高齡了，經常奔波在中國和美國之間。

戴秉國表示：可以說，在我心裏頭，他是外交問題、國際關係問題的智慧的化身，是中美關係一個活的《百科全書》。有誰可以站

出來說比他更瞭解中美關係，我看很難找得到。所以我非常敬重他，從他那裏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他剛才講，從我這兒學東西。我想他是抬舉我了，我不敢當，不敢當。

在談到與基辛格的私人關係時，戴秉國說，“我每次到美國來，我要單獨來的話，我就會先到紐約拜訪他，然後再到華盛頓，這次不行了，因為我們明天要跟王岐山副總理坐一個飛機回去，所以沒有機會專門在紐約拜訪他了。”

在談到中美關係時，戴秉國表示：我們不搞軍備競賽，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讓我們13億中國人，日子過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喫得好一點、穿得好一點、出行方便一點。我們不可能、也不願意把大把大把的錢花在軍備上。

所以中國的根本戰略走向、意圖，對美國、對世界是可知的、是透明的、是善意的，是美國朋友們完全可以與之放心的打交道，交朋友的。用不著睡不著覺，可以放心。是不是還有不放心的？我是說真話的，我是誠心誠意致力於我們國家政府的根本方針，致力於發展同美國的長期的、穩定的、健康的、友好的合作關係。我的前輩也曾經參與了這項事業，我老早就從他那裏聽到了許多東西，聽到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最後我還要衷心的感謝克林頓國務卿、蓋特納財長和各位美國參與這次對話的朋友們，還有沒有參與這個對話，關注支持這個對話的朋友們表示敬意，表示衷心的感謝。”戴秉國說。

可以說，岳父黃鎮跟基辛格在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時所建立的友誼，現在女婿戴秉國又“繼承”下來。這一點，從基辛格每次訪華和戴秉國每次訪美，兩人都頻繁互動中便可略見一斑。

2008年12月11日，戴秉國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紀念中美建交30週年晚宴上發表演講時，再次提到基辛格，回顧了中美建交之初

的那段歷史：

戴秉國說：30 多年前，中美兩國一代偉人用小小的乒乓球帶動大球，打開了中美兩國重新交往的大門。停航許久的中美關係大船又乘風破浪啟航了。今天，在 NBA 打球的姚明成為中美兩國人民都喜愛的明星。從乒乓球到籃球，不僅是直徑的變化，更折射出短短 30 年間中美關係廣度和深度實現了巨大跨越。



戴秉國在演講

還是 30 多年前，當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之前，在人們看來中美兩國將會長久相互隔絕下去。聽說那時，當一位英國記者把博士秘訪中國消息發給倫敦編輯時，那位編輯竟然斷言，記者先生肯定是喝醉了，基辛格怎麼會去中國？於是他把這條新聞稿扔進了垃圾簍。在基辛格博士秘訪中國之後，尼克松總統去了，再後來，鄧小平先生來了……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兩國終於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開啟了兩國交流合作的新時代。短短 30 年，在幾代中國領導人、七任美國總統和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的航船迎著風雨陽光不斷前進，成為當今世界最富生機和活力，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給中美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福祉，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3 億中國人和 3 億美國人都會高興地看到，中美的高層和各層級往來越來越頻繁了……

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訪朝，世界關注

2009 年 9 月 16 日，戴秉國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特使的身份開始對朝鮮展開三天的訪問。朝鮮中央通訊社報導說，戴秉國當天與朝鮮外務省第一副相姜錫柱舉行了會談。據悉，兩人就朝鮮核問題進行了交涉。戴秉國隨即還有可能同朝鮮國防委員長金正日見面。

朝中社還說：第一副相姜錫柱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萬壽台議事堂舉行會談，在同志般的氛圍下，開誠佈公地就北中友好關係的發展、地區和國際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韓聯社分析說，朝鮮針對外交會談使用"開誠佈公"和"深入"等表述，實屬罕見。朝鮮曾對上月金正日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間的會晤、2005 年胡錦濤訪問朝鮮時與金正日的會談等使用了這種表述。

此次有六方會談中國代表團團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陪同戴秉國訪問朝鮮，因此有分析認為，雙方可能就六方會談復會的方案進行了深入討論。

兩天後，新華社發佈消息說，9 月 18 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在平壤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特使、國務委員戴秉國。戴秉國轉交了胡錦濤主席致金正日的信函。金正日感謝胡錦濤主席派特使訪朝，請戴秉國轉達他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金正日闡述了朝方對朝鮮半島局勢及朝核問題的立場，表示朝方將繼續堅持無核化目標，致力於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願通過雙邊及多邊對話解決有關問題。

中央電視台報導說，戴秉國轉交了胡錦濤主席致金正日的信函。胡錦濤在信中表示，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關係，始終把中朝友誼視為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寶貴財富，本著"繼承傳統、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加強合作"的精神，鞏固和發展中朝友好關係。胡錦濤表示，作為半島的近鄰，中方高度關注半島局勢，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維護和促進半島及東北亞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是我們的一貫宗旨。我們願同朝方共同為此作出不懈努力。

金正日感謝胡錦濤主席派特使訪朝，並帶來親署信，請戴秉國轉達他對胡錦濤主席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金正日會見戴秉國

金正日說，朝中傳統友誼是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親手締造的，牢不可破。朝中關係經受住了各種考驗，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朝鮮黨、政府和人民有意願和決心繼承和發揚朝中傳統友誼，希望以兩國建交 60 週年和朝中友好年為新的起點，加強兩國高層交往及各領域合作，推動朝中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戴秉國表示，中方願同包括朝方在內的有關各方共同努力，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繼續向前邁進。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社會正力爭啟動已處於停滯狀態的朝鮮核裁軍談判之際，作為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以胡錦濤特使身份訪朝備受外電關注。

法新社說，2003 年以來，中國等五國一直就朝鮮停止核計劃的問題與平壤進行時斷時續的談判。中國一直被視為朝鮮最緊密的盟友。朝鮮在今年 4 月退出了六方會談。但最近有跡象顯示，鑒於朝鮮已向美國和韓國提出和平建議，它可能願意重返談判桌。

路透社說，在朝鮮核武器計劃引發的緊張局勢逐漸緩和之後，朝鮮深居簡出的領導人金正日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的特使。金正日和中國資深外交官戴秉國之間的會晤顯示出兩國關係回暖的跡象。今年 5 月，平壤進行第二次核試驗後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北京一直試圖說服朝鮮重返核裁軍談判，這兩個毗鄰的共產黨國家也在慶祝正式建交 60 週年，溫家寶總理預計 10 月初將訪問朝鮮，這將使他成為朝鮮進行第二次核試驗後訪問朝鮮的級別最高的外賓。朝鮮進行第二次核試驗後，聯合國對其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並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中國曾向朝鮮施壓，要求它重返在北京舉行的六方會談。但中國一直小心地避免和朝鮮徹底的決裂。在核僵局的整個過程中，兩國仍在繼續舉辦慶祝建交 60 週年的活動。

韓聯社首爾9月18日報道據北韓媒體報道,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今天會晤了中國國家主席的特使戴秉國。目前有關國家正在進行外交努力,以期使平壤重返核問題會談。會晤是在美國正考慮就核裁軍問題與北韓舉行直接會談的情況下進行的。中國總理溫家寶預計將於下月初訪問平壤。

韓國朝鮮日報指出,表面上看,戴秉國訪北(朝鮮)的理由是,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下月4日至6日訪北之前,就與北韓國委員長金正日舉行首腦會談的具體日程以及議題與北韓方面進行討論。

但是,據中國內的北韓專家觀測認為,考慮到戴秉國總管中國外交事務的地位和胡錦濤的特使身份,那麼此次訪問不會只局限在首腦會談的準備工作。當天陪同戴秉國訪北的包括:六方會談中國代表團團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傅自應、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裘援平、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部長助理郭業洲等人。

朝鮮日報分析說,從隨行人員名單來看,包含一種強烈的意志,即,要通過此次訪北,在中國的主導下重啟於中斷狀態的六方會談。裘援平是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決策機構、胡錦濤擔任組長的“領導小組”中的實際工作負責人。傅自應隨行意味著將為說服北韓而提供不少禮物。

王毅

北京對台事務的新掌門人

1969年中學畢業後當“知青”,恢復高考後進入北二外,畢業後被分配到外交部亞洲司,自此,王毅開始了自己的職業外交生涯。此後,歷任亞洲司隨員、副處長、處長等職。

1989年9月,王毅被外派到駐日本使館工作,歷任政務參贊、公使銜參贊、臨時代辦等職,前後共五年。

1994年3月,返回國內的王毅出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次年晉陞亞洲司司長。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王毅公派美國喬治敦大學外交研究所學習,任訪問學者。回國後不久,即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99年9月起,王毅在外交學院攻讀國際關係專業的博士學位。2001年2月他昇任主管亞洲事務的副部長,成為當時外交部中最年輕的副部長。

從一名普通的外交工作人員,到亞洲司的主管,王毅在亞洲司前後工作了11年;即便是在擔任副部長時,他依然主管的是亞洲事務。1990年代初,在日本工作的五年時間,使王毅有了“日本通”的雅號。而真正使得王毅在國際外交界嶄露頭角,還要歸於朝鮮問題六方會談。在會談的前三輪,王毅作為中方代表團團長,以他對亞洲事務的詳熟和掌控問題的能力,充分地展現了自己的外交風度。

2008年6月,王毅接替陳雲林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成為北京對台事務的新掌門人。

不過，在有“金龜大本營”的外交部高層中，王毅身後的“老泰山”也非同一般 在其步入職業外交生涯的初期起著關鍵了作用。

岳父是周恩來秘書，後常駐日內瓦

錢嘉東，1924年出生，又作錢嘉棟，上海人。1946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專業，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任上海市政府外事處科員。

官方簡介稱，1953年，錢嘉東調任外交部亞洲司工作，先後參加了日內瓦會議和中印邊界劃界談判等重大活動，任處長、專員等職。1966年調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後成為周的兩名主要秘書之一，與紀東併稱為“一文一武”。

周恩來逝世後，錢嘉東回到外交部工作，任綜合研究室研究員。1983年，赴瑞士日內瓦出任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及在瑞士的其它國際組織代表處副代表兼裁軍事務大使，1985年昇任代表處代表。次年交卸裁軍大使一職。1986年7月10日，錢奉命向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提交要求恢復中國締約成員方身份的申請函。現退休在家。

冷風在《記憶深處的海棠花——西花廳最後四位秘書詮釋周恩來精神》一文中，對錢嘉東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秘書這段經歷有較詳細的介紹。錢嘉東是個會多國外語的才子，這使得原本學理科的他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外事工作者。錢嘉東一共在西花廳工作了12年，一直到周恩來去世。

曾跟隨周恩來出訪過幾十個國家的錢嘉東說：“自己最大的幸運就是曾經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人生有這樣一段經歷足矣！”

讓錢嘉東特別難忘的是乒乓外交時周恩來處理難題時的睿智。

那一次，為了打開中美封閉多年的大門，毛澤東決定讓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但是來華的乒乓球隊並非美國一支，單請他們不請別國代表團肯定會引起國外輿論喧囂，怎麼能和美國代表團暢所欲言，又讓加拿大、英國等其他國家代表團滿意，這成了讓中國外交家們傷腦筋的大事。後來，還是周恩來想出了一個圓圈排位方式——他讓各個代表團圍成一個大圓圈落座，在每個代表團團長前空出一個座位。然後周恩來就沿著圓圈到各個代表團跟前坐一坐，談一談，而唯有到美國代表團跟前他停留的時間最長……



錢嘉東

隨著創新的圓圈排位，周恩來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橄欖枝遞到美國乒乓球隊手中，從此打通了大洋兩岸兩個大國之間的外交通道。

錢嘉東在周恩來的最後四位秘書中年齡最大，1976年離開西花廳時已經56歲。根據鄧穎超“哪裏來的就回哪兒吧”的建議，他重返離開多年的外交部，而後出任中國駐瑞典大使。

1986年7月10日，擔任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及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大使的錢嘉東，將中國決定“復關”的外交照會，遞交給時任關貿總協定總幹事的鄧克爾。

曾有文章介紹說，照會其實很簡單，加起來不足350個英文單詞。時隔多年，錢嘉東還能完整地背出來：“尊敬的鄧克爾（時任關貿總協定總幹事）先生：我榮幸地通知閣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憶及中國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創始會員國之一的事實，現決定申請恢復它在總協定的締約方地位……當前中國正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並將繼續堅持這一基本國策。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期望得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的待遇。中國準備就恢復其締約方地位同關貿總協定締約方進行談判。為此目的，中國將提供其經濟和對外貿易制度方面的情況。”

因為這份簡單的申請照會，錢嘉東的名字永遠留在了中國“復關”（九年後的通行說法為“入世”）的史冊上。

錢嘉東記得，遞交完復關申請後，他是帶著既激動又相當坦然的心情離開關貿總協定的總部。因為，那時從代表團到國內全都認為：中國的復關談判四年時間肯定夠了。大家其實有足夠充分的理由這樣認為。其一，關貿總協定歷年加入國的談判時間，最長都不到三年。其二，1947年10月30日，也就是聯合國貿易與就業大會創建關貿總協定的日子，當時的中國政府就簽署了大會的最後文件，並從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為關貿總協定締約方。1950年，台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照會聯合國秘書長，決定退出關貿總協定。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並取代台灣成為世界三大經濟組織中的兩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正式成員。而成為第三個經濟組織、關貿總協定的成員，也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因為中國本來就是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台灣當局當初的退出，並不能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實意願；所以，中國申請重新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地位，理所當然。

但此後的事實證明，這樣的想法太過天真了：中國用了整整15年的時間，才最終達成了目標。

從知青到大學生，從科員到副部長

根據公開的資料，王毅1953年10月生，北京市人，是朝鮮問題專家，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49歲開始擔任副部長，主管政策研究工作與亞洲事務，是中國外交部五名現任副部長中最年輕的一位。

1977年秋，王毅考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據王毅當年北京二外的師友介紹，當時77屆日語系共有三個班，每班有16人，王毅是二班，他一直擔任該班班長。

按照其師友的說法，王毅這一批77屆大學生，是被“文革”耽誤了的一代。因此，這批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極具特殊性，年齡參差不齊，最小的十七八歲，年齡大的，有二十五六歲。在入二外學習前，王毅已在東北建設兵團呆了八年時間，1978年3月正式入學時，他已有25歲，在同學中是年齡較大的。而當時外語學院招生，對考生年齡做出的限制是：不能超過25歲。

日語系三個班級40幾個學生的來源，很是複雜，工農兵各種身份都有，但大致可分三種類型，一種是剛剛中學畢業的，一種是外語學校畢業的，另一種則是像王毅他們，靠自學考進來。日語系的這三個班，正是根據這三種類型劃分：一班是中學畢業的學生班，二班是由自學考來的學生組成的班，三班是專業班。專業班在1981年畢業。一班與二班的學生則在1982年畢業。

北京二外日語系現任主任秦明吾教授當年曾是王毅的日語教師，在他看來，王毅這一屆大學生，整體素質都非常高。秦明吾說："'文革'後第一次高考，考生有應屆的，也有老三屆的，除應屆的外，其他人參加考試，沒有一定的積纍，是很難考中的，他們肯定要在正常的工作、勞動之外，額外地多承擔一些東西。他們平時就注意學習。在當時，他們也不知道要恢復高考了，能夠考中，主要靠平時的積纍。"畢業後，這四十幾位日語專業學生，大多進入外事部門工作，有的進了外交部、外貿部，有的進了科學院、中國人民銀行，有的則進入全國婦聯、中國旅行社、高等院校。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一個是王毅，再一是一張姓女生。


王毅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他們分散在各個工作崗位上，大都已是所在崗位的領頭人。而王毅，是其中較為出類拔萃的一個。

考入北京二外前，王毅曾在東北建設兵團做了八年戰士。王毅的同學邱華盛介紹，在兵團時，王毅像其他北京青年一樣，政治敏感，憂國憂民，對國家前途與個人命運都頗為憂慮。這期間，王毅讀了很多文史書與外語書，掌握了極具功底的文史知識。王毅喜書法，毛筆字寫得很好。

邱華盛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在考入二外前，在一家工廠上班五年。他與王毅同住一個宿舍，是上下鋪。邱華盛介紹，在他們二班，王毅和他都是一般家庭出身，而其他同學，則多是"高幹子弟"，有幾位來自於外交官家庭。

王毅的師友介紹，在二外期間，王毅善於思考，興趣廣泛，對國內國際大事都很關心。他擅長寫作，"筆頭尤好"。

北京律師王小平是王毅當年的同班同學 他說""王毅在'文革'期間被耽誤的時間比較長，在兵團時學習條件不好，年齡又大，從學外語方面講，他的條件並不好。王毅文筆很好，經受過社會磨練，閱歷豐富，如果搞寫作，具備很好的條件。"

王小平介紹，當時王毅已經非常"成熟"，相貌端莊，舉止穩重，與眾不同，在這方面明顯超過了其他同學。令王小平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班上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會，在同學們的發言中，王毅的見解尤為成熟。

在王小平的印象裏，王毅的畢業論文寫了兩篇，一篇是把中國歷史與日本歷史相比較，一篇則是寫日本語言和中國朦朧詩的比較。王小平說："他的視野不僅僅在日語專業上。據說當時老師都沒辦法對他的這兩篇文章進行評判。"

北二外日語系現任主任秦明吾教授說，王毅的畢業論文質量非常高，中國日語界有個刊物叫《日語學習與研究》，是一份核心學術期刊，當時還是一個學生的王毅，把他的論文投到那裏，結果被刊發了。秦老師說："就我所知，學生能在這個雜誌上發表文章，直到今天還是很少的。王毅的論文被發表，使老師們印象深刻。"

北二外一畢業，王毅就進入外交部亞洲司從科員、隨員、副處長昇到處長。1989年，他調到駐日大使館擔任參贊、公使銜參贊，駐外五年曆練，再調回來就昇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一年之後再昇為司長。

此後王毅三年昇一級：1998 年，當上外交部部長助理。2001

年，48 歲的王毅昇任主管政策研究工作與亞洲事務的副部長，成了外交部五名副部長中最年青的一位。

“日本通”臨危受命出任駐日大使

由外交部副部長到駐日大使，王毅的職務變動，內涵頗為豐富。2004 年 8 月，王毅人還在非洲訪問，北京卻免去了他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擔任三輪朝核會談中方團長的王毅，在風頭正勁時傳來出任駐日大使的消息，其去向自然令人關注。

“日語是魔鬼語言。”美國駐日本首任大使曾經這樣調侃說。日本政治家說話不僅含蓄，而且曖昧。如果只是通過翻譯，而不能用日語直接跟他們進行交流的話，便很難把握日本政客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背後的真正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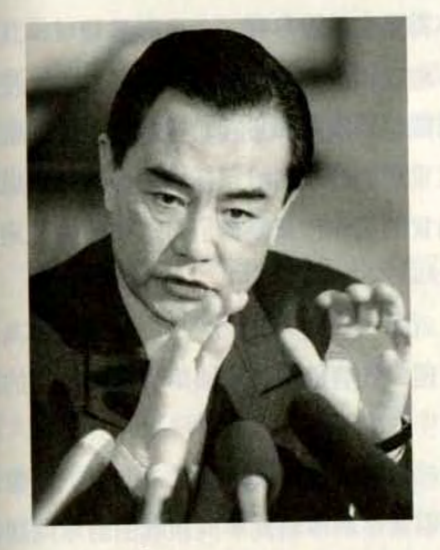
而對於王毅來說，就根本不存在這方面的障礙，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四年的深造，使他練就了一口流利的日語。另一方面，王毅對亞洲事務尤其日本事務的熟悉和瞭解也為他出任這一新職增添了不少籌碼。22 年前，大學一畢業，他即被分配到外交部亞洲司工作，其間還曾被派到駐日使館工作了五年，被外界稱為“日本通”。

從一個普通科員，到亞洲司一把手，王毅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了 11 年。即便是 2001 年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時，他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亞洲事務。而其真正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還要歸於已召開過三輪的朝鮮問題六方會談。《時代人物週報》)撰文指出，作為中方代表團團長，王毅長期積累下來的對亞洲問題的掌控能力，在這個時候得以充分地顯現出來。他在會談中的一舉一動，給各國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同日本學界和政界人士交談時，經常聽他們提起王毅的

名字。”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時殷弘教授認為，日本人之所以對王毅這麼熟悉，不單單來自於六方會談上王毅出色的表現。

王毅出任駐日大使時，中日之間衝突不斷，使本來已經很冷的中日政治關係進一步趨向倒退、甚至惡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馮昭奎認為，王毅出使日本，將給正處於低潮的中日關係注入一針鎮定劑。



王毅

2004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後第 59 個投降紀念日，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再次成為日本右翼政客們囂張作秀的舞台。當天，一些日本閣僚和身穿當年日本軍服的老兵大張旗鼓地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一路招搖過市。

此前一週，在北京工體進行的亞洲杯決賽後極個別中國球迷的行為，經日本媒體大肆渲染，引起了日本國民的不滿，進而幾乎成為一起外交事件。

當時有評論指出，自小泉純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後，因其一貫的保守外交政策，以及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使得中日外交關係滑向了建交以來的穀底；加之中日雙方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和朝鮮核危機的再次爆發，種種事端導致中日摩擦加劇。在此情況下，

王毅被任命為駐日大使。

“由於相互認為對方的民族情緒化傾向是與政府及其政策有聯繫，導致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度下降。在這種背景下，原定的唐家璇國務委員的訪日計劃也不得不延期。中日之間不僅首腦互訪中斷，高層互訪受影響的範圍也呈擴大之勢。”馮昭奎說，如果中日關係繼續糟糕下去，可能正中美國的下懷，“對破壞中日友好的人，最有利的辦法是加強合作。”

儘管日本在安全方面不得不依賴於美國，但在經濟領域，其與中國的互補性顯然更強些。這次由副部長級的官員出任駐日大使，也顯示了中國對於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和重視。在長達五年的駐日使館工作期間，王毅就極其重視與日本各界包括媒體的溝通，縮小相互的誤會和分歧，這種務實的工作作風贏得了日本媒體的普遍好感。

“他的一個突出優勢，就是應變能力非常強。”時殷弘認為，王毅在日本擁有很高的知名度，這對他今後解決中日之間出現的問題將有很大幫助。

在外交部，除了亞洲事務之外，副部長王毅另一個主抓對象是政策研究室。王毅在外交部召集了許多研究不同領域的日本問題專家，認真聽取他們對日本內政、中日關係等問題的具體意見，他說要在臨走前，帶上滿滿的智慧，去突破橫亙在中日之間的種種困難。

“官員要對政策喫得很透，這樣才能靈活地運用政策解決實際問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看來，王毅不僅是個合格的外交官，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交專家，尤其在日本問題上更是如此。

在外交部五名副部長裏面，51 歲的王毅是比較年輕的。從副部長到位置重要的大使，這樣的變化多少會讓人產生猜測：王毅的未來應該不會止於駐日大使或外交部副部長。翻開中國幾任外交部長的簡歷，其上昇軌跡都驚人的一致：副部長——駐日本或美國大使——副部長——部長。時任部長李肇星 1995 年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三年後便調往美國任駐美大使，2001 年回國後仍為副部長，2003 年開始做部長。前外交部長，現任國務委員唐家旋，在任外交部長之前也擔任過多年駐日大使。

“外交部長要統領駐全球各地大使館的工作，如果沒有做大使的經驗，在指導工作時將會顯得力不從心。”一位對外交部工作頗有研究的專家表示。一般來講，美國、俄羅斯、日本是主要派駐國，在上述任何一國擔任大使所積纍下來的經驗，對今後掌管中國的外交事務，都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

曾被召回，“日本通”也有誤判的時候

旅日學者劉迪記得，哪怕在沖繩的出租車上，司機都會說“中國太可怕”。東京街頭，常可以見到中文告示，內容竟是“警惕可疑的說中文的人”。如凶案的凶手是日本人，報紙就只有一條消息，一旦凶手是中國人，報道立刻連篇累牘。

日本外務省國際報道官千葉明等日本官員認為，王毅使日是中國“重視中日關係的積極信號”。當時，王毅和整個中國駐日使館團隊要面對的，遠不是傳遞積極信號這麼簡單。當時，兩國東海油氣田爭端正酣，而在日本入常問題上，中國也暗示要動用否決權。

“和早年友好的時期相比，那幾年的工作很不順心。”一位外交官說。從 2001 年到 2005 年，中日政府首腦沒有互訪。

2004 年 12 月，因為日本給李登輝發放簽證，王毅和日本外務省進行多次交涉。他言辭犀利，稱李登輝可能成為“戰爭製造者”，

警告日本不要‘自食其果“。日本媒體為此批評王毅”過激’，甚至表示“懷疑王大使對日本抱有的善意”。

在這一年，中日關係的堅冰日見增厚，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顯示：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民眾比例再創新低，降至38%。

“過去中日間的問題，更多的是政府間的分歧，對老百姓之間的感情並沒有多少影響。”中國駐日使館一位工作人員介紹，“但是，冰凍期太長了，輿論也推波助瀾，所以國民感情的因素日見凸現。”

2006年1月，供職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劉迪在策劃“中國大使館寄贈講座”，希望邀請中國使館的官員向早稻田大學的師生們介紹中國。“沒想到王毅大使親自來講了第一講，題目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經濟形勢‘。”

隨後，加上中國駐日使館的全部九名參贊，這個系列講座辦了整10場。

其實，早在2005年1月，王毅就已在早稻田進行過“中日關係和地域協作”的演講。據共同社報道，王毅用日語演講後，接受提問，“態度隨和親切，學生對他印象很好”。

三年間王毅作了多少場演講？大使館相關人員的回答是“數量驚人”。“針對不同人群，王毅大使要準備不同的演講稿，很有文采。”大使館相關人士介紹說，“這是前幾任大使做不到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面對日本民眾，王毅都說日語。而且，他的日語很高雅。”共同社資深記者說，“王毅特別瞭解日本的想法，也堅持中國的原則，但最難得的是，他能把中國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說出來。”

不過，“日本通”似乎也有誤判的時候。2005年5月23日下午，正在日本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以要回國處理緊急公務



王毅（右）在日本外務省向外相町村信孝提出抗議

為由，突然取消原定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會見。當日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受命表態稱其原因是：“就在吳儀副總理訪日期間，日本領導人連續就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發表不利於改善中日關係的言論，中方感到十分不滿。”

當時，香港《亞洲週刊》文章認為這是因為在吳儀出訪前夕，日本政府多次在參拜靖國神社、沖之鳥島等外交敏感問題上表示強硬立場，違背了早先小泉純一郎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時達成的互信。《亞洲週刊》稱，“北京已對吳儀此行日本作出初步評估，認為外交部，特別是中國駐日使館，沒有準確拿捏日本政府的態度，對中日目前的外交形勢有誤判成分”。

《亞洲週刊》指出，吳儀出訪前夕和訪日期間，日方多次就參拜靖國神社、“沖之鳥島”、釣魚島等一系列敏感問題挑釁中方底線，違反小泉首相在印尼雅加達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時的互信，被中方認為是“精心策劃”、“上下配合默契”。

於是，素有“中國鐵娘子”之稱的吳儀，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請示中南海，要求不會晤小泉。胡錦濤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緊急磋商後作出決定，吳儀應拒見小泉，提前結束訪日行程。

《亞洲週刊》引述接近中南海高層人士說，吳儀一踏上日本國土就被日本右翼和日本當局假以顏色，北京當局認為日方言行“上下配合默契”，是“精心策劃”，不只針對吳儀個人，而是針對中國政府和人民，因此決定采取非常外交手段，“否則便有被迫吞下小泉強行塞給中國苦果之虞，更無法給反日情緒高漲的人民一個交代”。

相對於中方強烈反彈，日本也批評中方如此失禮。《亞洲週刊》引述日本外務省一名資深外交官說，吳儀訪日期間會見小泉的安排原本是中方提出要求，日方當時認為“首相見來訪的副總理級別並不對等”，但是因為中方再三表示，吳儀與小泉會談主要是為修復中日兩國關係交換意見，於是日方“給足面子”，應允安排。

對於吳儀突然取消會見，這名外交官表示，這是“十分不禮貌的外交事件”、“一個禮儀之邦竟然如此失禮”、“有損外交形象”，必將令日中關係雪上加霜。

文章分析說，吳儀取消會晤小泉的原因包括：中方認為小泉有關參拜靖國神社的談話“出爾反爾”；日本政府在吳儀出訪前宣佈與美國著手制訂“共同作戰計劃”和“互相合作計劃”，由於事涉台灣海峽和朝鮮半島，刺激了中共敏感神經；日本政府披露國民設籍釣魚台、“沖之鳥島”，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甚至登島視察。

此外，5月22日吳儀出席日本經濟界為她訪日舉行的歡迎會，日本官方僅派出外務省副大臣逢澤一郎出席，“令中方相當不悅，認為受到冷遇”。

以上種種因素已讓北京當局對吳儀此行訪日作出初步評估，“認為外交部，特別是中國駐日使館，沒有準確拿捏日本政府的態度，對中日目前的外交形勢有誤判成分”，因此決定吳儀只參加愛知世博會中國館日活動即可，不宜再前往東京繼續展開訪日行程。

當年12月12日，王毅回到北京，療養並述職。外電報導稱，王毅日前“低調”回到北京，暫定要到春節前才返回東京，有關外交人士猜測中國可能是借機召回大使，以進一步冷處理對日政策。不過，中國外交部明確表示，王毅回國是正常述職。

當時外電評論稱，王毅此時突然提前回國並長期滯留北京，將使中國駐日使館的要職出現空缺，這似乎也預示著日中關係已無事可為，在客觀上是對日本的一個警告。

出任國台辦主任，外界一片驚呼聲

2007年9月30日，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新華社發佈消息稱，王毅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出任駐日大使。但早在新華社公佈這個消息的前兩週，“中國政府的多個消息來源”便向外界證實，原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崔天凱，將接替王毅的駐日大使之職，並已定於9月到任。至於王毅則會在9月上旬回國，準備接任外交部黨組書記兼常務副部長。

台灣媒體則引述駐北京的日本外交消息人士稱，其實王毅早在7月曾悄悄回京，當時就內定為外交部黨組書記。不過，他會等到2008年3月戴秉國接任唐家璇主管外交與涉台的職務後，才正式上任。

中共十七大上，昇任外交部黨組書記兼常務副部長的王毅，跳過候補這一關，直接當選為新一屆中央委員。

《亞洲週刊》說，王毅獲得重任及破格提拔，與總理溫家寶2007年4月成功訪日有直接關係。溫在為期三天的訪日中與全程陪同的

駐日大使王毅朝夕相處，兩人間產生了眾多共鳴。他們兩人也有共同的愛好，譬如，早起體育鍛練，喜歡詩和登山，辦事頂真，追求盡善盡美以及注重實際、體恤民情。尤其是，在溫家寶出訪前親自起草在日本國會的演講稿時，王毅寄去了不少素材資料，並提供了大量生動而又人性化的事例，令溫家寶十分滿意。

在訪日期間零距離的接觸中，溫家寶發現王毅踏實、謙和、智慧，很賞識王毅為在日華人“好事大辦、實事多辦、急事快辦、難事妥辦”的作風。《亞洲週刊》說，回國後，溫家寶於 2007 年 6 月下旬親自下令將王毅提前調回北京，昇任正部級的外交部黨組書記兼常務副部長。

但昇任正部級不久，王毅再次轉換角色。這一次他不得不離開已經工作 26 年的外交部，成為國台辦的新掌門人。

2008 年 6 月 3 日，海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上，王毅首次以新職務身份亮相。當天，新華社受權發佈了這位外交部原副部長、黨委書記的新任命：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台辦）、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主任。

在這次會上，王毅發表講話稱，在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新形勢之際，他出任台辦主任，“深感責任重大，工作光榮，使命艱鉅。”

新的任命似乎很突然。即便在兩天前，外交部的網站上還有王毅的簡歷。一天前，這份簡歷已經撤下。

雖然王毅的任命 6 月 3 日才公佈，但在一週前，台灣與日本媒體就傳出了消息，並有記者在 30 日的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問及。雖然當時沒有得到肯定的答復，但發言人並未否認。

據一位長駐北京的日本資深記者介紹，日本國內在評論王毅擔任國台辦主任時，主要認為他作為對日問題專家，會針對支持台獨的日本右翼分子有所作為。

日本產經新聞 5 月 31 日報導，前中國駐日大使王毅將出任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這項人事很明顯的是要以王毅在日本各界的豐富人脈，“牽制台日雙方的接近”。

國台辦主任是中國政府的重要職位，中國為強調“台灣是內政問題”，到目前為止都避開起用外交部出身的官員，而由地方首長出任國台辦主任，產經新聞的報導指出，對台灣的交涉因涉及對日、對美關係，必須要外交部的合作，王毅因此成為由外交部出來的第一位國台辦主任。

該報導說，最大理由是最近因台美關係惡化，形成台日關係昇高，政治家或高官的接觸日漸頻繁，尤其是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在李登輝協助下，打出“重視日本”的形象，而讓中國感到在台灣問題上，日本存在的比重越來越大，中國當局認為，“對台灣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前外相麻生太郎等保守派勢力的合作有提高警覺的必要”。

該報導指出，中國當局期待王毅以在駐日大使任內所建立政商界人脈“阻止台日的接近”。

而台灣《新新聞》雜誌總編輯盧伯華表示，現在台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台辦的角色也應作出調整。在國台辦的官員中，以前唐樹備也曾是外交系統的人，但外交部系統的人當國台辦主任，近年來還是首次。

“兩岸關係最大的麻煩點，就是在外交方面。在今後對台工作當中，必然會牽扯到外交方面，王毅作為熟悉外交工作專家來處理的話，可以當一個橋梁作用，也會在對台工作與外交工作中找到一個平衡點，讓人對兩岸關係的提陞有所期待。”盧伯華認為。

而王毅本人則表示，他將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堅決貫徹中央確定的大政方針，恪盡職守，開拓進取，為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而不懈努力。

王毅在海協會理事會致辭時說，在台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兩岸關係出現良好勢頭的新形勢下，海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隆重召開。"我代表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對此表示熱烈的祝賀"。



王毅會見連戰

王毅接著回顧海協會達成"九二共識"的歷史任務表示，"海協會自1991年12月16日成立以來，遵循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宗旨，為兩岸關係發展做出不懈的努力。"他期勉海協會做好即將開始的海基海協兩會復談工作。

台灣《中國時報》評論說，胡錦濤挑選王毅出任國台辦主任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首先，在陳雲林轉任海協會長之後，大陸國台辦高層人事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擁有中共中央委員身分的王毅，正好填補了國台辦的"中央委員"空缺，避免國台辦的官場位階下降。

其次，更重要的，由外事部門出身的王毅入主國台辦，將強化外交部與國台辦之間的政策聯繫，避免扯後腿的現象再生。

第三，除了強化外交部、國台辦的聯繫，王毅更重要的任務，是滿足台灣企求的國際空間生存尊嚴問題。既要滿足台灣社會的尊嚴要求，又要不抵觸大陸外事部門長期以來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國台辦確實需要一個熟悉外事工作的人來掌舵。

《中國時報》說，目前關於台灣以"中華台北"加入世衛組織的問題，兩岸似乎已經有了些許默契，但世衛組織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入會資格的聯合國下屬組織，從王毅的出任國台辦主任來看，台灣即使順利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世衛組織，也將只會是一個"個案"，不會是"通則"，台灣的國際空間，大陸未來將采取個別個案討論的方式進行，否則"通則"既定，何須王毅？

此外，世衛執委會2009年1月才召開，在世衛執委會之前，兩岸今年首先將碰到聯合國大會和亞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的人選問題。如何處理後兩者可能引發的爭議，將是王毅首先將面臨的考驗。

王毅上任後立即成為台灣媒體的關注對象。台北《展望與探索》月刊2008年7月號刊出文章，專題介紹其人其事王毅。該文章稱王毅在大陸內部的形象相當好，外表長相英俊，"相貌堂堂，風度翩翩"。做人方面，"人情味濃、待人真誠"，"相當的平易近人"；"舉手投足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來"。

台灣媒體報導稱，王毅接任的消息傳出時，外界一片驚呼聲，因為過去王毅從不在候選名單中，而王毅是大陸外交部第二號人物，并兼任黨委書記，已具部級資格，有必要去接任動則得咎的國台辦主任位置？但是國台辦主任由出身外交官的王毅接任，透露的訊息非常清楚，就是大陸準備與台灣展開談判，不管是進行事務性

的協商或是政治性的談判，均在其規劃之中。其中最艱難的，恐怕是涉及主權的國際空間部分。對於這樣一位對手，有必要對其背景及經歷有更深入的瞭解。

王毅在大陸內部的形象相當好，不管是其師長同學、同僚，或者是大陸媒體，對於其個人外表，以及為人處事，都有很好的讚美之詞。

在國台辦位置上極易建功立業贏得先機

2008年7月4日上午8時，大陸居民赴台旅遊暨兩岸週末包機（北京）啟動儀式北京首都機場舉行。上任整整一個月的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國台辦主任王毅在啟動儀式上致辭時指出，今天是兩岸同胞交流史上一個新的起點。

王毅說，今天，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重要日子。"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這句1300年前中國大詩人李白的名句，也許恰當地表達了我們此刻的心境。他代表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對兩岸共同迎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表示熱烈的祝賀，對所有曾經為兩岸週末包機、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付出過辛勞、傾注了心血的兩岸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王毅接著表示，今天，也是兩岸同胞交流史上一個新的起點。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我們衷心地期待這個頭能夠開好。因為，為著這一天，我們已經努力了很久，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多，同時，我們更有信心，這個頭一定能夠開好，因為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兩岸逐漸地走向"三通"，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僅兩岸同胞為之擊掌歡迎，國際社會也都普遍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在談到兩岸關係時，王毅指出，當前兩岸關係正在面臨著難得

的發展機遇，我們要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首先要加強兩岸同胞的直接交往，增進彼此之間的相互瞭解與感情。大陸首發團的旅客都是自願報名參加的，大家來自不同的崗位，有著不同的經歷，但是，今天聚集在這裏，大家都懷抱著一個共同的願望，這就是要把大陸同胞對台灣同胞的深情厚意帶往台灣。

"我相信，台灣同胞也一定會張開雙臂熱情歡迎大陸同胞的到來，這是因為，不管我們相距多遠，不管我們隔絕多久，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同屬中華民族，我們情緣於根，我們血濃於水。"

王毅最後表示，為兩岸同胞辦實事辦好事，是中央台辦和各級台辦的重要職責，只要有利於為兩岸同胞謀福利，只要有利於開創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局面，只要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和根本的利益，我們都會不遺餘力地加以推進和落實。

2009年5月28日，在其任命快到一週年之際，王毅出席第一屆重慶台灣周上致詞說："一年以來，兩岸關係波瀾壯闊、成績斐然。"《時代週報》評論說，"成績斐然"固然是中央的決策正確，但同時也和王毅及其同事們的得力執行分不開。可以說，王毅在新崗位上的頭一年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新華社港台部採訪室主任、著名台灣問題專家陳斌華說："王毅很注重政策的說明，以及和媒體的接觸。"據陳斌華介紹，2008年6月王毅來國台辦不久，接見海峽兩岸研究中心新聘研究員（陳斌華也是其中之一），在等待集體合照的間隙裏，王毅主動和在場的媒體人士聊天，並交換名片。

一個月後，在杭州舉行的2008兩岸關係研討會期間，王毅再次表現出了他和媒體的積極互動。

在2009年7月8日的歡迎酒會上，王毅開玩笑說，每年兩岸關係研討會都會有不少兩岸的名嘴、大腕齊聚一堂，他這個"新科主



陳雲林訪台，王毅送行

任”如果不來，可能會有所得罪。“有朋友告訴我，你到國台辦可是要小心哦，一不留神就會成為新聞，甚至被炒作。但我想，媒體也是一種職業，只要將心比心，彼此以誠相待，將來我同台灣的媒體們，也會結交很多很多朋友。”

在現場聆聽的台灣名嘴胡忠信事後說：“看得出，他比我過去認識的一些大陸官員更願意與媒體打交道。”

7 月 9 日晚上，王毅又邀請來自港澳台的八位媒體人一道泛舟夜遊西湖。在悠揚的古箏旋律中品茗暢聊，共話兩岸未來。那一晚合著西湖的美景，大家聊興很濃，直到深夜 11 點半才散去。

坐在王毅旁邊的胡忠信，對王毅有了進一步的細緻觀察，“當時的氣氛很輕鬆，但你也知道，我提出的問題很尖銳。王毅主任倒很願意回答，他很坦率誠懇，從不閃躲，都會誠懇回答。偶爾他會反問‘你認為怎樣呢？’以此來慎重思考我的問題。他很願意聆聽，但也有自己的立場。”“之前我預見到他會是一個很精明能幹的人，因為中日關係對中國很重要。見面之後，我想這個‘精明’的評價要修正一下，改為‘開明又務實’。”另一位獲邀喝茶的台

灣評論員葉耀鵬說。

胡忠信甚至還提醒台灣當局，“大陸已經派出一個外交經驗豐富、對日外交成功、美國也很肯定的對台官員，台灣方面有沒有對應的具備‘國際視野’的人？我覺得這方面做得不夠。台灣對大陸事務官員應多學習王毅的特點和風格。”

據瞭解，在涉台外交事務方面，還是由外交部主管。例如 2009 年 5 月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世衛大會，即是外交部主導、國台辦參與的一項談判成果。“不過，王毅當主任後，借調了一些外交部幹部過來工作，使國台辦增進對外交事務的瞭解，有助於打通國台辦和外交部的關係。”陳斌華說。

在王毅主管國台辦後，香港媒體評論稱，“王毅出掌國台辦長袖善舞仕途看高”。王毅在外交部雖是黨組書記，卻是副部長，他與外交部長楊潔篪年紀相仿，兩人有很深的瑜亮情結，四年之後中共十八大上，分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退休，王毅與楊潔篪均有機會接任，如今兩岸局勢發展迅速，他在國台辦主任這個平台上極易建功立業、積攢功名，贏得先機。

從人脈淵源上，王毅與胡錦濤關係要比楊潔篪關係更密切，當年楊潔篪安排江澤民成功訪美贏得歡心，而王毅安排胡錦濤訪日的暖春之旅，得到胡的讚許。

不過，王毅也有政治風險。台海局勢雖然逐漸好轉，但雙方實質性的衝突與矛盾並沒有解決，一旦有突發性事件的干擾，兩岸關係很可能急轉直下。

潘岳

“環保風暴”後的“沈默者”

在中國官方媒體中，潘岳素有“個性化高官”之稱。有人說他仍具有爆發力，也有人說他這樣的人最易被體制清洗出局。

潘岳平日溫文爾雅，但是談起環境問題就判若兩人。不知是否就因為如此使他像一個明星，走到哪裏都令人矚目。今日之中國，環保到底在社會上佔據什麼位置？

成龍等明星到長城撿磚頭，大型重污染企業簽訂“綠色責任”協議，大學畢業生紛紛找環保題目作調查，環保標語隨處可見：這似乎說明環保正在成為社會的基本價值之一。

然而，極大浪費的生產模式，污染嚴重的天空與河流，眾多地方政府部門和企業無視污染貽害民眾和自然：這似乎又讓人感嘆中國環保並無實質性改變，環保依舊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樓。

國家環境保護部及其前身環境保護總局，一度被視作“花瓶”機構，“環境保護”被看成空頭口號，環境保護法規被譏為橡皮圖章。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環保”聲浪越來越強，而2005年以來連續三次的“環評風暴”更是震動朝野。

環保部有部長、有黨組書記，也有好幾個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還有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長，但是環保部最有知名度的官員，卻不是部長周生賢，也不是2006年年初為松花江污染引咎辭職的局長解振華，而是黨組成員、副部長潘岳。在中國政府高層中，副職比正職名氣大，威望高，這是一個相當少見的現象，也是官場犯忌的現

象，但是在環保部，似乎都默認為理所當然。

然而，十七大過後，潘岳卻在“環保風暴”中沈默了……

太子黨＋團派＋博士官員＋業餘詩人

1960年4月出生的潘岳，是江蘇人，有歷史學博士頭銜和副研究員職稱。他的官方正式簡歷介紹說：

1976年－1982年，在解放軍第38集團軍、鐵道兵第13師服役；

1982年－1986年，任《經濟日報》資料員、《中國環境報》記者組組長；

1986年－1988年，任國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副主任兼機關團委書記；

1988年2月－1988年12月，任北京房山區委外聯處處長兼外經委副主任；

1988年12月－1989年12月，任《中國技術監督報》副總編輯；

1989年12月－1993年2月，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

1993年2月－1994年5月，任團中央中國青年研究中心主任；

1994年5月－1998年3月，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副局長；

1998年3月－2000年1月，任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

2000年1月－2003年3月，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

2003年3月，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正式簡歷上沒有寫的是：他本人既是“太子黨”成員，也與“共青團派”頗有瓜葛：他的父親潘田，是原鐵道兵司令部副參謀長兼總工程師，前妻的父親是中共老將軍、中央政治局常委劉華清。他在文、武幾條戰線都摸爬滾打過，興趣愛好十分廣泛，喜歡吟詩作

賦，自有出版機構付梓，也自有清客幕僚叫好。

"二十八歲癡少年，天下最幼清知府，宦海達練；三十五歲知天命，中華最悲迂書子，徘徊國門。"潘岳在一首詩中，用這樣半通不通的對仗句子，夫子自道經歷和心情："癡""清""悲""迂"……他希望人們記住的是這麼一個形象。

在中國某些記者的筆下，潘岳仕途頗為順暢：26 歲就當上處長；39 歲時就成了中國為數不多的副部級官員。但是他實在又是一位處在邊緣的有爭議幹部，雖然猛上過幾級台階，但是上了一步之後又停上好一氣。人們有理由相信，他若沒有引起爭議的話題，"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早就會垂青於他。直到今天，他仍然前途堪憂。

父母榮耀的身份並沒有讓潘岳的童年燦爛起來。父親的知識分子性格和眾多海外關係，使之在"文革"中屢遭衝擊。七八歲的潘岳曾經無人照管，浪跡街頭。或許正是這種家庭，這個時代環境，塑造了潘岳"銳氣如風雷"的性格。

他 16 歲時趕上"文革"結束，得以參軍在部隊醫療部門工作，但他不甘心一輩子跟患者打交道，於是離軍、棄醫，進入媒體，參與籌辦《中國環境報》任記者組組長。這一段期間，潘岳共發表署名採訪文章 18 篇，大多都與政界人物有關，如"訪濟南、廣州、福州等市市長札記"、"訪江蘇省副省長張緒武"等等。

1986 年，潘岳正式步入仕途，任國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六四"之後，"經中組部、中宣部聯合考核"，他受命空降當《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

當年潘岳未及"而立"，團中央書記處主管宣傳的書記李源潮在報社中層幹部會議上介紹說："潘岳非常有才華，他已經發表了數百萬字的研究報告。"這話的良苦用心，是替潘岳壓陣。但潘岳



潘岳

年輕，有高官顯宦的家庭背景，一來就當副總編，人們當然不服氣。尤其是他在"六四"清查的關頭前來，顯然負有整人之責。與其說是靠他的才幹，不如說靠他的仗義，儘管處境尷尬，潘岳還是與報社同仁理順了關係。他主動找資格老的業務人員交心談心，表達他的尊重，在處理"六四"參與者時也讓人感受到善意，贏得了一批擁護者。

1991 年，面對劇變後的蘇聯東歐局勢，一批年輕的中國官員和學者起草了一份口氣很大的文件，名為《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主張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批判了"浪漫主義改革觀"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強調"循序漸進的現實主義和理性主張"的經濟改革觀和"中國是中國人的惟一家園"的民族主義世界觀。這一文件直接上報中央。其背後主要策劃者，正是潘岳，那份文件，是他 1991 年 9 月出面邀請左派和右派的人一起開的研討會的討論結果。

但是這份文件提出的戰略選擇中，包括了許多在改革派看來無法接受的主張，例如：未雨綢繆，將國有資產化為中共黨產。文件

傳到海外，引起了巨大反響，異議人士指其暴露了中共黨內利益集團中一批少壯派攫取權力和財富的赤裸裸的野心。

潘岳調到團中央下屬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當了一段主任，利用機會與青年才俊廣泛建立聯繫。1994 年開始，他兩三年換一個國家部門，在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技術質量監督局和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擔任副職。

潘岳在為官期間，拿到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導師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章開沅教授。據說，1998 年，潘岳向教育部提出想學習歷史，教育部推薦了章開沅教授。潘岳從北京飛到武漢，冒著寒風大雪登門拜師。儘管弟子比原定約見時間遲到，讓老先生多等了一個小時，但章開沅教授怎麼會說個“不”字呢。他後來還對人誇獎弟子：“潘岳的歷史感覺非常好，學術功力紮實，在讀博士期間就應該有博導的水平了。”

我們沒有看到潘岳的歷史學博士論文，卻不斷讀到他關於當前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發表的看法。2001 年 12 月，《深圳特區報》、《華夏時報》等幾家報章同時發表了潘岳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文章指出，馬克思的原意對宗教的鴉片功能並無褒貶之意，只是列寧在解釋時創造性地加上了“麻醉”兩字，即改為人們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令宗教被視為毒品。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後，“一直以鴉片論作為我們認識宗教的圭臬，以致國家的宗教政策一度產生偏差，並為此付出代價”。

此文發表，仿佛是呼應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兩地同時推出，爭議迭出。批評者認為，潘岳鼓吹“宗教救國”，甚至有論者斥之為“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國大造輿論”；而支持者驚訝於潘岳能以與中國正統說法相銜接的語言，提出調整改進中共宗教政策的思路。

更大的重磅炸彈來了。2002 年上半年，一份題為《對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的“政改報告”悄悄在中央高層傳閱。這篇內部理論報告供中央最高領導作為決策參考，但又被人在海外曝光，引起滔滔猜測和爭辯的聲浪，有人稱之為中共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政改奏摺”。其策劃者，又是時任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的潘岳。

文章為執政者出謀劃策說，一要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二是要抵制思想僵化的新老左派的攻擊。文中對中共的危機憂心忡忡，但強調要硬著頭皮，集中智慧，繼續大膽地改革。這篇文章為潘岳贏取了“中共政改標籤”、“當代康梁”之類稱號 同時，也激起了極其猛烈的圍攻痛剿。

體改辦撤銷後，潘岳為何“銷聲匿跡”？

2002 年 11 月底，中共十六大調整體制，傳出了體改辦撤銷的消息。當時，港台媒體稱，國務院體改辦在機構改革中被裁撤，主要官員各奔前程，主任王岐山調任海南省委書記，四名副主任中的邵秉仁調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副主席，李劍閣調任國務院發展中心副主任，彭森調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唯獨潘岳這位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婿，還沒有任何新職。

當時曾有傳聞說，44 歲的潘岳已被軟禁，原因是他多次向中共高層上書，要求推行政治改革。香港媒體稱，潘岳前年初向當時總書記江澤民上書“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改變”，建議在中共黨內實行民主機制，不久又提出“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強調用宗教輔佐中共統治，但未被采納，反而受到保守派攻訐。潘岳後來向副總理李嵐清建議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建議獲采

納，但沒有潘岳的位子。

台灣中央社說，北京觀察家認為，潘岳的仕途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風向標，如果他得勢，證明北京將推行大膽的政治改革。

在2003年兩會召開前，有網友在海外網站發帖“尋找”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潘岳的“下落”：從網上看到各大部委的人選已塵埃落定的消息。不知道為什麼，一段時間以前頗為引人注目的中共青年政治家幾乎全部銷聲匿跡。如有“黨內康梁”之稱、以力主政改聞名的前體改辦副主任潘岳、黨內青年左派理論家，力主“共產黨要善於駕馭新興資產階級”的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等人，這些正當盛年的青年政治家，本應當是這次權力分配的主力軍，而今居然一下子都不見了蹤影，豈非咄咄怪事！

潘岳是中共青年政治家中政改的主力之一，在海外論壇上甚至被稱為“中共政改的標幟”。此次人大會議上，體改辦好像也在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中被撤消，不知道潘岳這次是否真的會永遠銷聲匿跡於大陸的政治舞台？如果潘岳真的淡出政壇，是否意味著中共內部的體制改革，將永遠遙遙無期？



潘岳

潘岳當時的“銷聲匿跡”，也讓海外媒體把半年前伊銘撰寫的一篇有關潘岳的文章聯繫在一起。伊銘在海外媒體發表了《潘岳沈浮成為中共政治改革指標》一文：

曾經被認為是中共政壇“明日之星”、現任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的潘岳由於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張，令其付出沈重代價。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的《北京市宗教事務條例（草案修改稿）》，刪除了條例（草案）中的第19條，即“宗教活動場所內不得進行卜卦、算命、看相、求籤、測字和驅鬼治病等活動”。換句話說，宗教場所內的這類“封建迷信”活動，不再被視為非法。這一動作雖然只是個案，但背後意涵令人關注。

有人認為，這是中共試圖在16大之前、“三個代表”被奉為經典之後尋求理論平衡；也有人稱，北京在啟動新一輪機構改革之際，有意為僵硬的宗教政策鬆綁。後一種觀點可能更接近北京的本意。

中國宗教政策的這個改變，以這些人的犧牲為代價：除了那些赴湯蹈火的宗教界人士外，還有一位重要的“推手”，他就是曾經被認為是中共政壇“明日之星”、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但前途暗淡的潘岳。

“9.11”事件後，潘岳在《深圳特區報》、《華夏時報》等報刊發表重新看待“宗教鴉片論”的觀點，主張扶持正教。在長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中，他指出，馬克思對宗教的鴉片功能並無褒貶之意，只是列寧在解釋時創造性地給加上了“麻醉”兩字，說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令宗教被視為毒品。

潘岳認為，中共在取得政權之柱，“一直以鴉片論作為我們認識宗教的主臬，以致國家的宗教政策一度產生偏差，並為此付出代價”。文章辯稱，宗教具有精神補償作用，具備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時還兼具服務、公益等多種功能，比如，無神論和科學無法克服民眾對死亡的恐懼，宗教卻能夠做到。結論是，必須建立新型政教關係，以利中共完成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

潘岳這篇長文的目的只有一個：中共在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後，為了維護穩定，應該利用宗教來鞏固統治。共產黨要是還想在

中國繼續統治下去，就應該多一些朋友，少一些敵人。然而如此“善意”的建議，非但未能為他帶來喝彩，反而令他付出沈重代價。

與被稱為江澤民“化妝師”的王滬寧、專職政協委員（在中國獨一無二）何新、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等中國當代思想新銳一樣，潘岳也被認為是“奏摺派”之一。

據聞，江澤民讀過潘岳的報告桂甚為激動，立即批轉政治局成員傳閱；而對於同一時間出籠的、由極左領袖鄧力群炮製的另一份“萬言書”，江澤民則叫中宣部組織批判。面對中共的執政危機，江澤民也極欲為黨尋找一個合法性存在的理由。潘岳報告似可解決這一難題。傳江澤民下令撥款十萬元給潘岳主持“東南西北經濟研究所展開研究”，予以獎勵。只是到了當年3月，事情發生逆轉，潘岳報告遭到封殺。北京高層調派廣東副省長王歧山出任體改委主任，向他傳達中央的批評，並責令他“立即停止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封殺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黨內極左派的發難，也有人認為，理論問題還是遵循鄧小平的辦法為好：不要爭論，去做好就行了。實際情況則不盡然。

如果拿他的《政改報告》與江澤民的“7.1”講話相對照，就會發現問題所在。他的報告，有相當的篇幅圍繞著“三個代表”這一核心，為意識形態合法性急遽流失的中共提供新的合法性論證。報告以西方現代政黨政治為參照，否定之鋒芒直指中共的“道統”和執政方式，對“三個代表”進行了更為大膽、明確、激進的論證……。

同時遭到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批判，潘岳出任國家體改辦副主任後，並不專心於他分管的西部大開發工作，而是組織北京、上海一批思想界人士，撰寫一系列戰略報告送交給中南海，被批“不務正業”。

他的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中共原來是個革命黨，以革命手段奪得政權後，未改變政治體制，仍以原來的革命手段治理中國，以致不能適應和平建設之需要，使矛盾積纍日深，腐敗日益嚴重，動亂因素正在發酵。

有朝一日，任何一場社會衝突和經濟危機都可能激發革命。故必須讓“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面，才能避免革命危機，使中共統治不致崩潰。

有意思的是，潘岳的這一觀點同時遭到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批判。黨內保守派份子紛紛上書江澤民、李鵬，說想當“中國的葉利欽”。他們認為，潘岳的政治方案表面上是在維護中共統治，實質上是在給中共的改造成為社會民主黨提供理論依據。主張政治民主化的右派人士認為，的政治方案實質上會阻礙民主化的進程，因為是維護江澤民、胡錦濤的現有統治，屬於既得利益群體的思想綱領。海外民運人士甚至也把的方案叫做“中共的救命方案”，例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智囊人物包遵信，就在一篇文章裏質疑：這哪是什麼政改報告？分明是鞏固和強化一黨專政的新對策。

而相當一批中青年官員，以及主張漸進變革的知識份子，卻對潘岳表現出極大興趣。他們認為，他的思想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的混合物，符合中國的國情，也將促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融合。……

在中共傳統上，政治上喜歡張揚、改革思想激進的人士，從來都是犧牲品。潘岳能否跳出這一“規律”，還有待觀察。潘岳的政治地位搖搖欲墜而不墜，當然與他的政治背景有關。他的身分橫跨了“太子黨”、“共青團”兩個陣營，與軍方、胡錦濤（潘岳的“政治改革方案”，據說反映了胡錦濤的思路）、曾慶紅等關係密切，又供職於朱鎔基手下。從這個層面看，他咸鹹魚翻身的可能依然存在。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已成為中共政治改革的指標。倘若十六大後啟動政治改革，他很可能會受到重用，反之，便會丟官，甚至會被驅離政壇。

伊銘的文章雖然講的是潘岳的沈浮，但文中透露出兩個信息都與時任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王岐山有關：

一是潘岳送給江澤民的萬言書遭到封殺。北京高層調王岐山出任體改委主任，向潘傳達中央的批評，並責令他“立即停止這方面的工作”。

二是潘岳出任國家體改辦副主任後，並不專心於他分管的西部大開發工作，而是組織北京、上海一批思想界人士，撰寫一系列戰略報告送交給中南海，被批“不務正業”。

至於同屬“女婿黨”的王岐山與潘岳的關係到底如何，坊間眾說不一，但從媒體和來自北京的信息看，至少兩人在國務院體改辦共事時，除了上下級關係外，王和潘基本上沒有互動和交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務院體改辦工作期間，被外界稱為“敢言能言”的王岐山卻一直保持著低調和沈默，尤如“銷聲匿跡”一般；而多年來“敢想能寫”的潘岳，則始終堅持自己一貫的高調，甚至讓人有種“副主任的風頭壓過了主任”的感覺。

不過，在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後不久，港台和海外媒體尋找潘岳下落的“行動”，很快就有了結果。在王岐山離開體改辦再度南下後不久，官方資料透露稱，自 2003 年 3 月起，潘岳出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兼新聞發言人。

到冷宮摸老虎屁股，猛然發力下令立威

潘岳與環保結緣，早在 20 多歲創辦《中國環境報》的歲月。有

一次跟隨國家環保總局組織的記者團下去採訪，他報導了雲南燒山開荒、違規排污等嚴重環境污染現象，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還向國家環保總局告他的狀，情形猶如“在雲南省政府大樓附近引發一場地震”，“差點斷送了我的記者生涯，但我至今對這段經歷不後悔。”潘岳後來回憶。這次經歷讓潘岳意識到了媒體的威力，也看到了環保話題的分量。

走馬上任不久，分管宣傳和法規的環保總局副局長，并兼任環保總局新聞發言人的潘岳，2003 年 8 月 13 日向媒體通報：查出十大環境違法案件，查清應關停取締的違法企業 6143 家。當時有媒體這樣評論：“潘岳一露面，就有 6000 餘家企業倒霉，魄力比當年他在國資管理局治理國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年 10 月 25 日，在首屆“綠色中國論壇”上，潘岳發表了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這篇文章以及後來潘岳的一系列發言，充滿著與別的政府部門發言人不一樣的味道。



潘岳

潘岳給環保總局部下的印象是幹事麻利、咄咄逼人。而最讓他

們稱道的，是他的魄力。2004 年 9 月，獲悉株化集團向湘江排放高濃度酸性廢水後，潘岳親自帶領"清理整頓不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保行動"督查組到現場突擊檢查，並對其嚴肅查處。

山西、陝西、內蒙古交界處的保德縣、河曲縣、府穀縣和准格爾旗所在區域被當地人形象地稱為污染"黑三角"，分佈著大量規模偏小、生產方式落後、環境污染嚴重的焦炭、電石、水泥和電力企業，區域大氣和水環境污染十分嚴重。2004 年 12 月，潘岳又帶隊赴"黑三角"明察暗訪，並由此掀起一場全國範圍的圍剿污染企業的攻堅戰。

潘岳兼了很多職，如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會長、中國環境記協名譽主席、首都青年記者編輯協會主席等，在身邊聚集起一批學者、名人、記者。環境文化促進會本來只是《中國環境報》聯繫的一些作家、記者搞的社團，在潘岳參與下，性質明顯發生了變化，請來了各界精英，比如成龍、姜昆、蔡振華等擔任副會長，光理事就達 500 多人，為中國的環境文化事業鼓與呼。環境文化促進會與有關機構合辦的"綠色中國論壇"也讓潘岳搞得轟轟烈烈，自 2003 年以來多次舉辦，吸引了眾多學者、官員、企業家和國際友人參加。

媒體的本性是最歡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們將潘岳的妙語連珠傳播放大："環保總局非但沒有'角色錯位'，反而進行了'角色復位'。""幾年前，我得意地告訴國內外媒體'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我全然沒有意識到，'世界工廠'的代價也許就是'世界垃圾場'。""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源是我們扭曲的發展觀。""我們要把他們（海外高污染和高能耗企業）'嚇'回去。"……

2004 年 12 月，潘岳轉而分管環境評價，剛接手一個多月，便摸起了老虎屁股。環保總局組織多個調查組奔赴各地，按照《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於堅決制止電站項目無序建設意見的緊急通知》的要求，督察部分違反《環保評價法》的違規項目，然後攜帶數萬字的調查報告返回北京。

2005 年元月 18 日，潘岳出現在一個新聞發佈會現場。沒有人會想到在 2005 年兩會即將召開的時候，國家環保總局猛然發力，行使"一票否決權"，采取強力舉措強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潘岳向社會披露，全國有超過 15 個省、自治區存在違規電廠項目，其中，五大電力公司裏的大唐、國電、華電三家榜上有名；地方電力公司中，四川、寧夏、福建有違規在建項目。像太倉環保發電廠和徐州華鑫發電公司等建設項目都是在環評報告書未獲批準的情況下，就已開工建設，有些工程已基本完成，屬於典型的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

潘岳宣佈：環保總局以"嚴重違反環境法律法規"的名義，下令 13 個省市的 30 個總投資達 1179 億多元的違法開工項目立即停建，其中包括總投資為 69.7 億元的三峽地下電站項目和投資 446 億元的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項目。環保總局並決定予以處罰，建議有關部門依法給予直接責任人員以行政處分。

這是《環境評估法》實施後，國家環保總局首次大規模對外公佈違規開工項目，在公眾中引起轟動。此前，由於得不到政府呼應，又無從證明民意走向，中國民間環保一直在獨立無援地呼號。

環保總局強調，今後對未按規定履行環評報批手續、未批先建的項目，一律責令停止建設，依法處罰；審批重大項目和環境敏感項目時，要通過聽證會等形式充分聽取公眾意見；嚴格環評隊伍監管，積極穩妥地推進環評市場化改革。這是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環境影響評價法》旨在從決策源頭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相對於建設項目一個一個的"點"來說，政府規劃涉及的

是"面"上的問題，對規劃的環評更應引起重視。

"環評風暴"的另一個產品就是，重創官商勾結上下其手的腐敗集團。叫停的30家違法電廠項目中，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志"、"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這被公認為是"釣魚工程"的顯著特徵：以"先下手為強"手段形成既定事實，迫使審批部門做出妥協，最終達到目的。這充分暴露了地方政府和官員同中央不一的利益理解與訴求：地方政府和官員熱心於通過投資推動本地項目上馬，借行政之力來抗躲中央的市場調控手段。其中更有腐敗官員借此斂財或者追求政績陞遷的圖謀。

國家環保總局"叫停"30個超億元項目，有專家認為，這還只是"冰山一角"。作為預防污染的重要措施，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即建設項目中的環境保護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在全國的落實情況並不理想。潘岳認為，病因主要是：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停建30個大型項目，正是環保總局在洞悉"病因"後開出的"藥方"，體現了當局宏觀調控、維護正常經濟秩序的決心，消除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隱患。環境影響評價應該成為信貸控制、土地嚴管之外，進行宏觀調控的又一道重要閘門，甚至可以說是"第一閘門"。

從"環評風暴"到"生態社會主義"

潘岳新官上任三斧頭，卻碰到地方主義的軟盾牌。潘岳狠狠地先砍出一斧頭下令違法開工項目停建，第二斧頭砍在圓明園，第三斧頭直衝水利部門、鋼鐵企業而去，發起"企業綠色責任運動"，從一個產業的角度去解決環境問題的行動，讓人感受到環保總局的決心和威力。第四斧頭、第五斧頭……

很多人為"環評風暴"捏一把汗。因為被叫停的項目大多投資巨大，有的已經被有關部門立項，國家環保總局的行動必然涉及複雜的利益關係，遭遇各方頑強阻擊。會不會鬧得騎虎難下？"環評風暴"會不會半途而廢、不了了之？

在"環評風暴"刮起來之後，30個違法開工項目停下了22個，八個項目沒有停工，包括中國三峽總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三峽工程地下電站和三峽工程電源電站。中國三峽總公司就發表聲明，否認上述三個工程"違反環境法律法規"。

國家環保總局則強硬反擊，聲稱"環評風暴將更加猛烈"。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表態：國家環保部門對新建項目的環境管理只會更加嚴格，對未按規定履行環評報批手續、未批先建的項目，一律責令停止建設，依法處罰；要嚴厲查處環境危害嚴重的大案、要案，形成違法必究的執法氛圍。

潘岳在很多場合反覆解釋：為什麼我們不能先多賺點錢，具備足夠物質手段之後再來治理污染？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非要以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要求自己？"原因很簡單"：第一是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發達國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早就劃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國際規則與市場，我們的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人均資源佔有量和環境容量只有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不能拼消耗。

此外，具有很強理論興趣、熱衷於創造新概念的潘岳，近年又提出一個新詞彙：生態社會主義。

潘岳創造新概念，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嫻熟於運用"跨學科嫁接"的方式，讓人耳目一新；二是他往往能夠巧妙地找到新概念與中共當局最新宣傳口徑的接點，讓潛在的政敵難以找到攻擊的把柄。

潘岳2006年9月16日，在第11屆“綠色中國”論壇時發言時指出，生態文明將促進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生態社會主義由於將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大發現。生態文明應成為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的基礎。

潘岳說，由於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現代化模式的一致性，使傳統社會主義不能有效應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諸如生態危機等全新挑戰。當代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使得社會主義不能只研究工業文明基礎上的階級關係，還必須研究人與自然的文化倫理。生態文明的重要意義正在於此。



潘岳

潘岳認為，生態文明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首先強調以人為本原則，同時反對極端人類中心主義與極端生態中心主義。極端人類中心主義製造了嚴重的人類生存危機；極端生態中心主義卻過分強調人類社會必須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動。生態文明則認為人是價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發展必須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另外，在可持續發展與公平公正方面，生態文明也與當代社會主義原則基本一致。

生態文明為社會主義理論的融合提供了平台。生態文明作為對工業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種更為高級的人類文明形態；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代表了一種更為美好的社會和諧理想。兩者內在的一致性使得它們能夠互為基礎，互為發展。生態文明為各派社會主義理論在更高層次的融合提供了發展空間，社會主義為生態文明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

潘岳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由於將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大發現。生態文明應成為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的基礎。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離不開生態文明，沒有生態安全，人類自身就會陷入不可逆轉的生存危機。生態文明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包括生態問題在內的一系列難題，潘岳評價說，雖然生態社會主義等新型社會主義流派的探索，理論和實踐仍然單薄無力，但為社會主義回應全球性問題提供了想象空間，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進一步完善。

潘岳指出，對中國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生態和諧觀，為實現生態文明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與思想源泉。今天，中國共產黨提出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與生態社會主義、世界可持續發展理念、中國傳統文化相互借鑒。這種融合必促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必促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續發展的新潮流，必促成人的全面發展和人類社會的和諧。

潘岳還論述說：中國20年內實現了西方國家100年的經濟成就，卻也在20年內集中引發了西方100年的環境問題。中國在創造GDP增長速度第一的同時，也成了煤炭、石油、鋼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在國際上，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生態殖民主義；在國內，東部的污染轉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轉移到農村；富裕人群消費、貧睏人群來承受生產的污染。"

潘岳呼吁：中國"對外要團結發展中國家反抗導致環境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對內要建立起防止不平衡發展導致生態危機的一系列制度。"

潘岳特別強調"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第四個階段"。他論證說：這主要包括了可持續發展三大理念（保護環境、保護資源、保護生態平衡）、一部分新教倫理、生態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以及循環經濟、新能源、綠色消費等生產生活方式。而"中央近幾年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理念，為建設社會主義新的文明體系奠定了基礎"。

他以直截了當的語氣批評說：有人把科學發展觀等同於一種單純經濟發展模式，甚至把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構建也降低到一個技術層面，"這是非常片面的"！科學發展觀追求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與制度各個領域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變革，也就是文明的變革。

一說起環保，潘岳滔滔不絕，從宏觀到微觀、從體制到民眾素質、從國際到國內……但他有時又戛然而止：談環保，不用講那麼多主義，其實就是一個"可持續發展"。

這話很樸素，也很實在：是的，中國的老百姓有了今天，有沒有明天？

新制度必須通過多次博弈建立起來

2007年1月10日，國家環保總局第三次掀起"環評風暴"，潘岳宣佈叫停82個項目涉及1123億元的投資。

輿論註意到潘岳的頭銜有了變化：環保總局"第一"副局長。潘岳是否被提陞了？很快就有媒體報導，國家環保總局黨組班子成員被中央大幅調整，任免官員涉及四位副局長，副局長潘岳昇任第一副局長。但是很快，潘岳本人出面澄清，這並不屬實。他在接受《中國日報》獨家專訪時說，由於環保總局兩位副局長剛剛退休，我是自然就排到第一，不能說是昇任第一副局長。"不管有沒有提陞，只要能為國家和老百姓干事就行。"

據瞭解，國家環保總局沒有第一副局長的稱謂。

大量違規建設項目上馬和被叫停，表面上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更深的層次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潘岳對這一點有很深入的認識。與2005年和2006年兩次風暴相比，2007年的第三次"環評風暴"涉及的項目和資金都偏少，但專家認為這次的"殺傷力"會更強，甚至會影響一些行業未來投資的佈局。

專家所謂"殺傷力強"，是指環保總局吸取了前兩次風暴中的教訓——被叫停的項目往往補辦手續先過關，然後用各種手法拖延或拒絕兌現——因此，這次采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硬手段："區域限批"。

所謂"區域限批"，就是對那些違反國家環保政策、盲目進行產業擴張的地區和行業集團，停止其所有建設項目環境審批，這意味著這些地區和行業在鬆綁後才能獲得環境審批發展空間。這是環保部門成立近30年來首次啟用這一行政懲罰手段 打擊的主要對象

除了違法的建設項目外，矛頭還直指一些地區和集團。此次“區域限批”的行政區域包括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呂梁市、貴州省六盤水市、山東省萊蕪市；企業集團包括大唐國際、華能、華電、國電等四大電力集團。

為什麼要采取這樣的手段？潘岳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2006 年，降低能耗 4%和主要污染物減排 2%的目標沒有完成，反而有所上昇。

潘岳代表官方首次證實：2006 年的環保業績，依然不及格。

潘岳說，這些地區大多本身已無環境容量卻仍然盲目發展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比如唐山市在沒有環境容量的情況下，全市依然建設了 70 家鋼鐵企業、80%沒有經過環評，規模小且佈局分散，造成大氣和水的嚴重污染。



潘岳

環保總局通報在第三次“環評風暴”被叫停的 82 個項目中，有 23 個嚴重違反“三同時”環保驗收制度，59 個嚴重違反環評制度，涉及到鋼鐵、冶金、電力、化工等 12 個行業。其中鋼鐵、冶金行業比較集中有 30 個，佔違規項目總數的 37%。

“我們真的很累，環評沒人做，做了不執行。”潘岳對記者表示，采用這樣的手段實屬無奈。“在法律上，我們沒有權力撤掉包庇污染的地方官員的職，也不能夠直接關停污染企業，就算罰款，也就 10 萬、20 萬，特大事故不過 100 萬。行政體制上，地方環保局的財政和陞遷都歸地方政府管，一些地方環保部門變成了地方政

府的‘項目經理’和污染企業的保護傘；甚至有的地方環保局長要舉報當地污染只能寫匿名檢舉信。在這樣一個權也不夠、法也不夠的情況下，中央的環保政策要麼失靈要麼大打折扣。這不光是我們的困境，也是整個宏觀調控的困難所在。”

針對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潘岳想到了類似於“連坐”的這一古代傳統的懲罰辦法：區域限批。

一年刮一次“環評風暴”的做法，自然引起很多質疑。最常見的一種就是：環保監控和處理應該是依靠法規和體制常年進行，而不是靠環保部門一年搞一次“行動”。潘岳辯解說：用正常制度處理是我們的首選 但在許多人漠視正常制度的情況下，該怎麼辦呢？首先我們不能等。一部法律的出台要好幾年，管理體制的改變可能更長。等到那一天，環境問題可能已經積重難返了。我們得在現狀下想出新的解決方案，“區域限批”就是我們的創新。

其次，新的制度不可能憑空產生，必須通過多次博弈建立起來。一次“環保風暴”就是一次和地方利益、行業利益、部門利益進行的博弈，每一次都確立一個新的規則。案例的纍積和法律的出台才能最終建立起制度。所以，不得已而為之的“非正常手段”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建立起正常的制度。更何況，“區域限批”本來就有十種法規依據，也並非什麼“非常手段”，只是我們平時忽視而沒有使用罷了。

在回答《經濟觀察報》提問時，他還回顧了三次“環評風暴”的特點和進展：

2005 年第一次風暴主要打的是程序違法，並不是說這些違規項目本身就是污染項目，而是說它們應該履行環評程序但卻沒有履行。從那之後，凡是發改委核準備案的重點項目都能夠履行環評，這是個普法過程。

2006年第二次風暴，環評由“項目”層面到了規劃層面，規劃環評的法律正在國務院法制辦的審核之中。

與前兩次“風暴”相比，2007年第三次“風暴”主要變化就在於“區域限批”政策。直接查處的金額表面上看似乎比前兩次略小一些，但是因為“區域限批”而可能停止和延緩的項目金額也許會達十倍以上。所以，無論從波及範圍還是力度上，此次環保執法都超過前兩次。

溫和的環境管理手段不頂用，就要拿出更具震懾力的手段。在2006年12月新開工項目清查專項工作中，環保總局與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國家安監總局等七部委形成共識，今後將逐步對各項建設程序執行不力的地區，采取暫停項目審批或核准。潘岳說：環保總局此次先行試驗。如如果各部委都能這麼做，就能讓中央宏觀調控的政令得以更加暢通，就能在各方面更好地落實科學發展觀。

潘岳說：至於會不會造成矛盾或遇到阻力，媒體已經問了我兩年。我想事實會比雄辯更有力量——環評風暴進行到第三次了，《環評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出台了，綠色GDP也出台了，規劃環評也快要出台了——這一個一個腳印見證著我們的艱難，也見證著我們前進的決心。至於我個人的進退成敗早已不在計算之內了。

十七大果然沒戲，得罪人太多遭整肅？

與中共政壇上許多身為黨政官員而不脫文人習氣的人一樣，本來應該兼有二者之長、能夠左右逢源的潘岳，卻好像西方寓言中的蝙蝠一樣，既不被獸類認同，也不為鳥類接納，處於不尷不尬的邊緣狀態。知識分子對他雖有好感，卻未必敢完全信任，能夠看成“自己人”與之推心置腹；而官場政客，對他的才華表面上欣賞和欽敬，

但實際上多有忌憚，視之為另類，敬而遠之。

他動不動就給中央上書寫條陳，發議論提建議，儘管這些意見中包括許多後來被中央采納吸收的成分，例如“科學發展觀”“和諧”以及最近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但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他的思想越影響中央，他本人反倒越邊緣化。

紐約一位熟悉中共政情的評論家透露說：潘岳刮“環評風暴”的動作太大，猛烈衝擊了中國許多利益集團，尤其是對地方諸侯的政績構成摧毀性打擊，嚴重得罪了這批黨內實力派，來自他們的告狀聲浪上達天庭，說他“作秀”、“嘩眾取寵”、“有個人野心”、“危害穩定和諧”，甚至有人放風威嚇說讓他“性命難保”。

胡錦濤對強大的非議抨擊，無法不受牽掣，畢竟他在許多事關重大的問題上希望得到地方諸侯的支持，在利益集團與潘岳的爭執中不敢過於傾斜於潘。而潘岳雖然自命為中共紅色江山的“忠臣”，他與“團派”（以及“太子黨”）又有深厚淵源，然而他說話放言無羈，行為桀驁不馴，也讓胡錦濤在是否提拔潘的問題上躊躇退縮，擔心如果賦予潘岳更大權力，潘岳可能幹出更讓他們為難的舉動。

潘岳調到環保總局的時間不長，但是在該局內已經擁有相當高的人望，中共十七大時他的年齡才47歲，按說他應該前途燦爛。不過，是否能夠青雲直上，環保總局的人望再高也沒有用，胡錦濤和政治局的看法才是關鍵。正是這一中共人事制度的痼疾，使許多人斷言：潘岳或許在今後的歲月中還能在仕途的梯級上攀登幾步，但中共十七大進入決策層？“沒戲！”

2007年秋天的十七大到2008年春天的“兩會”，證實了上述斷言。雖然隨著環保總局陞格為環保部，潘岳也水漲船高成了副部長，但他本來就是副部級，這一頭銜的改變並不意味著他的提陞。


潘岳

而他也並沒有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

2008年秋天，對潘岳不利的傳聞更多。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原秘書長兼法定代表人王磐璞，因該會財務問題被"雙規"，主要指向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的賬外"小金庫"，以及依托國家職能部門的環境測評工作收取企業贊助。據瞭解，此案由中央紀委督辦，北京市紀檢部門直接立案偵查。分析家認為，此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隱含的矛頭是指向潘岳的。

王磐璞長期從事媒體工作。2003年7月，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陞格為環保總局直屬單位時，王磐璞出任該會副秘書長，並於2006年昇任秘書長兼法定代表人。自2003年起，該促進會連續四年獲得原國家環保總局先進集體稱號；2005年獲評環保總局直屬機關黨委先進黨支部。

人們注意到，在2008年、2009年的"兩會"上，潘岳顯得"成熟"多了，一改為"低調"，儘量回避記者採訪，回答問題時，不時也打起"太極拳"。還有人說，他作為副部長的分管範圍也做了改動，不在讓他管環評了。但這種說法並不屬實，他仍然是分管環評的副部長。在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佈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環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在總體肯定的基礎上，指出環評法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一些環評機構與建設單位之間存在著不正常關係，"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不重質量重利益。有的環評機構緊盯建設單位的錢袋子，順從業主的意願，把法律要求的

獨立環評，完全變成業主建設願望的合理性論證，喪失客觀、公正、科學立場。分管環評工作的潘岳代表環境保護部表態，稱要"下大決心，從改革體制入手，讓環評機構與環保部門'完全脫鉤、徹底脫利'，確保環評審批不受利益干擾"。他還說，"對環評機構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嚴格淘汰機制，其次是推行'黑名單'制，第三是制訂環評質量標準考核體系，最後是建立誠信體系"。

2009年4月18日《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環保部已開通了一條實際上是大大降低環境要求的審批"綠色通道"。省級環保部門也在迅速跟進，將環境影響評估時限從原來最長的60天縮減為五天。

《紐約時報》還介紹了為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衝鋒陷陣的潘岳受到整肅的情況。文章說，國家環保部二號人物潘岳一直都是中共最公開支持環保事業的人，但近來出乎意料地在公眾視野中消失，這對中國的環保事業是個打擊。幾年來，潘岳領導開展了非同尋常的公眾環保宣傳，把環境污染企業列入黑名單，執行了嚴格的企業環境檢查。此外，他在媒體中掀起了一場"環保風暴"，影響深遠。所有這一切雖然深得民心，卻也使他與眾多省份、國有企業和各大部委負責人的關係變得緊張，其中包括他的現任上級。

這些人士指出，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潘岳已經被其對手整出局。但他不再擔任國家環保部新聞發言人，在中國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的秋季，他的兩個部下遭中紀委"雙規"，他本人及妻子也一度遭到調查。

這些人士說，調查沒有發現潘岳和妻子有什麼問題。環保總局的網站顯示，上個月潘岳公開露面的次數超過了過去幾個月。但他已不再負責關鍵的環評和環境文化推廣的工作，而且也不清楚他是否會留任環保部。

《紐約時報》最後說，按潘岳本人的說法，他近期無法工作是因身體欠佳，甚至還入院治療了一段時間。但是，消息靈通人士說，坊間都知道，共產黨的官員在遇到政治問題時通常會以生病住院為藉口。

從台前走到幕後，談使命感被官網刪除

在2009年12月23日《第一財經日報》發表的《2009中國十大環保人物》中，潘岳被列為第三號人物，其標題是"潘岳：從台前走到幕後"。記者章柯指出，2009年，有著"環保風雲人物"之譽的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度過了"默默無聞"的一年。

在這一年裏，潘岳基本上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但他並沒有閑著。"他是一個不甘寂寞、不能容忍自己碌碌無為的人。"一位知情人士說。

在這一年裏，作為中國環境經濟政策積極倡導和主要推進者之一的他，一直在關注這項關乎中國環保命運的重大改革。在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調研時，潘岳希望研究人員們，"要將已經啟動的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工作做深做實，繼續推動綠色信貸、證券、保險等政策手段對污染減排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努力協調相關部門，推進環境稅收等政策研究取得更大進展。"

因為，建立起中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不僅是最高決策層的期望，更是環保所必須。

讓潘岳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關中國環境稅制的改革路線圖已經基本確立：用三至五年時間，完善資源稅、消費稅、車船稅等其他與環境相關的稅種。儘快開征獨立環境稅；用兩到四年時間，完善其他與環境相關的稅種和稅收政策；用三至四年時間，繼續擴大環境稅的徵收範圍。

而在綠色信貸和綠色保險方面，多項改革得到了相關部門的理解和配合，很多地方已經開展試點。

這一年，潘岳也特別關注基層環保建設。"基層是環保事業的根基所在，基層環保工作做得如何事關環保事業全局的成敗，加強基層能力建設就是為環保事業強基固本。"潘岳說，環保工作的重點在基層，難點在基層，希望也在基層。

一位環保人士說，這一年裏，無論是環境經濟政策的推進，還是各類環保公眾參與活動，以及環保部的環保風暴，處處都能感覺到潘岳的身影。

不過《第一財經日報》在介紹潘岳"默默無聞"的2009年時，卻沒有提到他在9月份發表的一篇講話，曾刊登在環保部部官方網站和中國政府網等網站上，但很快便從這幾家政府網站上"消失"了，目前只能從新聞網站上找到《中國環境報》的報導：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在9月11日召開的中國環境報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環境宣傳工作應更有使命感，為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推動經濟健康平穩較快發展。

潘岳指出，在前不久召開的環境宏觀戰略研究座談會上，李克強副總理對在國際金融危機形勢下做好環保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把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結合起來，更加重視節能減排，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統籌城鄉和區域環境保護，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李克強副總理還指出"環境保護是發展問題，也是民生問題"，要堅持以人為本，優化發展，建設生態文明，保障環境安全；要求以全球視野觀察分析，用發展眼光把握處理，從戰略層面上謀

劃解決。

潘岳說，國際金融危機雖然給環保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但中央領導的多次批示講話都強調要毫不放鬆抓好環境保護，解決突出環境問題，顯示了中央堅強的決心。環境宣傳工作應以最高的使命感，及時宣傳中央精神，為加強環保工作營造輿論，為環境執法監管說話，同時對一切違反環保基本國策、不科學發展的行為方式進行批評曝光。

潘岳強調，中國環境報是環境領域的唯一一張專業報，是宣傳環境保護的主陣地。中國環境報要高舉可持續發展旗幟，充分發揮輿論主陣地作用，做大做強環境保護主流輿論：

一要提高引導輿論的能力，增強環境話語權。在社會關注的熱點環境問題上，中國環境報要不回避、不失語、不亂語，發出自己的聲音，正確把握輿論導向，促使各方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二要積極關注環境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構建主流輿論。通過新聞報道，使一些思想理念不斷創新，使一些地方推進科學發展的成功案例成為決策參考，使一些經驗建議上昇為政策法規的內涵，使一些重大問題進入決策視野，為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三要不斷深化改革，提高辦報水平。要通過改革建立高效運轉的工作機製和鼓勵編輯記者積極進取的激勵機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環境新聞報道風格，努力成為未來可持續發展領域最具有影響力的報紙。

潘岳最後指出，環保工作離不開輿論支持，環保部門也要善於借助輿論力量開展工作。希望各級環保部門支持中國環境報做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生態文明的尖刀班，做環保事業發展的突擊隊，



潘岳

做環境宣傳的先鋒模範，為節能減排和經濟結構調整做出突出貢獻。縱觀這篇報導，潘岳除了談環保宣傳的使命感，並沒有談及任何敏感的政治問題，那麼，為什麼此篇文章會被政府官方網站刪除呢？

分析人士認為，潘岳的講話雖然談的是宣傳使命感，但在尚未擺脫經濟危機影響，以及全力保八的前提下，他希望環保宣傳"為加強環保工作營造輿論，為環境執法監管說話，同時對一切違反環保基本國策、不科學發展的行為方式進行批評曝光"的言論，顯然與中央的政策精神有些不合拍。

此外，潘岳在講話中提到的"決策參考"，"使一些經驗建議上昇為政策法規的內涵"，"使一些重大問題進入決策視野"等，可能也是一些與利益集團關係密切的高層人士所不願意看到的。分析人士稱，在某些高層眼裏，早被打入"冷宮"的潘岳最好一直保持沈默，因為他一出聲就會發表不"和諧"的言論。

雖然官方不希望潘岳出聲，但有些媒體卻偏偏要讓潘岳說話。《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章軻曾在2009年11月6日發表題為《污染監管困局：沈默不再是金》的文章，稱"一項最新的調查和評價結果顯示，目前中國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總體上仍處於初級水平"。

2007年，國家環保總局原局長周生賢簽發《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下稱《辦法》），這是按照國務院實施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知情權的要求，國家各部委中出台的第一份有關信息公開的法律

文件。該《辦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據這一《辦法》，污染物排放超標的企業如果以保守商業秘密為藉口，拒絕向社會公開排污信息，將受到重罰。

“推動環保公眾參與，首先是要確保環境知情權，也就是建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環保部副部長潘岳稱，這一《辦法》主要是確保公眾得到以前難以得到的政府和企業的環境信息，為參與環境事務創造充分的信息基礎。

文章指出，向來大力主張“公眾參與”的潘岳，希望這一《辦法》的推出，能極大地促進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若沒有環境信息披露、信息發佈機製和使公眾周知的要求，公眾參與就是空話。

後　記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得到數位官員、專家學者及媒體人士指導，特此致謝。

本書引用了眾多媒體資料，並儘量加以說明。由於一些資料流傳於網絡，難以分辨來源。如有遺漏，特表歉意，請來函說明，如果有機會再版，我將加以更正。

于石坪

2010年1月

《中國掌權者》系列(34)

書　　名：新太子黨
编　　著：于石坪
出 版 人：何　頻
責任編輯：彭見月
校　　對：斯美泫
封面設計：一　劃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SA.
　　　　　電話：(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8744-24-4
定　　價：HK$ 138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一版